

# 梁漱溟全集

第五卷

中国文化书院文库·论著类

# 梁漱溟全集

第五卷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济南

鲁新登字 01 号

梁 漱 溟 全 集

(第五卷)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华光Ⅳ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850×1168毫米32开本 33.25印张 6插页 580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209—01160—9

K·150 定价：17.00元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时期之著者



1936年1月26日与参观邹平之丹麦国际民众学院

院长马尼克 (Peter Manniche) 等合影

(董渭川先生家属提供)

(前排) 梁漱溟 马尼克 卡尔森(齐鲁大学教授)

孙廉泉(副院长) 张勋仁(译员)

(后排) 董渭川(著名教育家) 卢广绵(工业合作专家)

徐树人(邹平县长)

## 出版说明

梁漱溟先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以漱溟行世。

梁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晚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深为人们所关注。为便于各界人士研究和查考,中国文化书院受著者家属委托,特将其著述编成全集,请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梁先生一生著述甚多,唯因历经战乱,屡有散失,已难收集齐全。经多方查找及各界支持,现搜得已刊与未刊文字四百万字左右,编为八卷,按专著、文论、讲演、札记、日记、书信分类,类中依年代排列,文前附以必要的版本或出处说明。预计三年内出齐。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刘定祥同志,参加编辑工作的有梁海萍、谭吉华、李善钦、唐海英、詹永媛、文利姮等同志。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1992年5月

---

# 目 录

---

1930 年

主编本刊(《村治》)之自白·····	(3)
梁漱溟启事(为任《村治》主编事)·····	(29)
各地乡村运动消息汇志弁言·····	(30)
重刊《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槐坛讲演之一段》	
两文的前言·····	(31)
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	(33)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44)
答张廷健先生书·····	(119)
冯著《从合作主义以创造中国新经济制度》题序·····	(122)
“建设新社会才算革命”答晴中君·····	(124)
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	
——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133)
答马儒行君来书·····	(174)
悼王鸿一先生·····	(189)
重刊王鸿一遗著《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	
一文之按语·····	(197)
为胡适之先生复信所写跋语·····	(198)
为北京《益世报》出版五千号纪念所写赠词·····	(202)
读李朴生先生《村治运动的正路》后志·····	(203)
中国问题之解决·····	(206)

梁漱溟启事(为《村治》延期出版事).....	(221)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222)
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	(240)

### 1931 年

《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一文编后记.....	(254)
在“七·九”誓师北伐纪念会上的讲演.....	(256)
敬答严敬斋先生.....	(258)
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 ——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	(261)
对于东省事件之感言.....	(295)

### 1932 年

为拒赴国难会议致行政院电.....	(301)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工作.....	(303)
《我们的乡村运动与现政权》按语.....	(307)
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	(309)

### 1933 年

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	(347)
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	(357)
乡村建设理论提纲.....	(364)
乡村建设是什么? .....	(373)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县政建设实验区邹平县实验 计划(摘录).....	(378)
县政建设实验区实验计划绪言.....	(386)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	(388)
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393)
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特殊困难.....	(411)
为编制《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致庄泽宣等 六先生的公开信.....	(414)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	(419)
建设与崩溃	
——为乡村建设问题答庄、崔、古三先生.....	(421)
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	(425)

## 1934 年

就邹平土地状况复许仕廉函.....	(427)
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	(430)
村学乡学释义.....	(438)
村学乡学须知.....	(448)
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	(466)
邹平乡村建设一般.....	(471)
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	(479)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最近工作概述.....	(488)
精神陶炼要旨.....	(492)
研究“乡村建设”的途径.....	(520)
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	(528)

我的一段心事.....	(532)
村学乡学之具体办法.....	(541)
孔子学说之重光.....	(548)
邹平县卫生院开幕式上的讲词.....	(557)
乡村青年的训练问题	
——乡学工作的入手方针 .....	(559)
与丹麦两教授的谈话.....	(571)
乡村建设旨趣.....	(577)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县工作报告.....	(581)
在中国从前历史上有无乡村自治? .....	(583)
乡村建设几个当前的问题.....	(589)
咱老百姓得练习着自己作主办事.....	(592)
目前中国小学教育方针之商榷.....	(596)
中国合作运动之路向.....	(603)

## 1935 年

邹平工作概谈.....	(620)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三大问题.....	(627)
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	(635)
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	
——中国工业化问题 .....	(637)
促兴农业的办法.....	(643)
广西见闻杂谈.....	(652)
广西省之新建设.....	(658)
欧洲独裁制之趋势与我们人治的多数政治.....	(665)

政教合一.....	(670)
答湖北政务研究会参观团问.....	(679)
朝会讲话四则.....	(685)
欢送实习同学之赠言.....	(687)
什么是政教合一? .....	(689)
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之我见.....	(693)
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 .....	(697)
办村学的目标.....	(712)
村学的做法.....	(722)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	(750)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756)
乡村工作中一个待研究待实验的问题	
——如何使中国人有团体组织.....	(758)
一年来的山东工作.....	(769)
《乡村建设》半月刊“邹平乡师专号”序言.....	(778)
《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序.....	(782)

## 1936 年

中国民众的组织问题.....	(783)
乡村工作人员修养法.....	(804)
公私辨	
——答吴景洲君.....	(811)
我在日本参观后的感想.....	(817)
东游观感记略.....	(825)
《欧洲民众教育概观》序言.....	(837)

中国社会构造问题·····	(841)
非常时期小学教师的责任·····	(865)
论方法兼谈理智与理性·····	(868)
我们当前的民族问题·····	(871)
对于人类女性的认识·····	(878)
帮助大家讨论问题作一准备	
——指点给大家讨论问题时应有的一个眼光·····	(894)
二十五年国庆纪念·····	(914)
中日农村运动的异同及今后中国乡村建设	
之动向·····	(918)
我们对时局的态度·····	(924)
为西安事变致张学良电·····	(931)
追悼王柄程先生·····	(932)

## 1937 年

谈儿童心理·····	(937)
怎样阅读《乡村建设理论》·····	(940)
乡村建设与合作·····	(942)
乡村建设运动纲领讲述·····	(947)
略述乡村建设运动要旨·····	(961)
中国今日需要哪一种教育?·····	(966)
中国人的长处与短处·····	(973)
中国经济建设的路线·····	(984)
青年与时代·····	(997)
如何创造中国的新学术·····	(1002)

---

我们在山东的工作 .....	(1010)
我们如何抗敌 .....	(1023)
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 .....	(1033)
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初编 .....	(1038)

# 散篇论述

(1930—1937)

•

---

## 题 记

1928—1937年著者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时期，写有散篇论述多种。其1929年前部分，即运动初期的文章、讲话等，已收入本全集第四卷；收入本卷者，为1930—1937年部分。

1932年曾结集出版之《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即《村治论文集》）和1934年出版之《乡村建设论文集》，为著者这一时期较重要论述之辑录，均按原作顺序分列本卷。

---

## 主编本刊（《村治》）之自白

我今执笔将与读者诸君在本刊相见了；那么，我想先要有一段自白。这段自白可分四小节来说，其目如次：

- 一、我是怎样一个人？
- 二、过去几年的烦闷，产生今日的主张。
- 三、最近努力所在，和主编本刊的由来。
- 四、我对国民党的态度。

### 一 我是怎样一个人？

我是怎样一个人？知道者自是知道；不知道者慢慢地亦总会知道；这似乎原不必提出向大家告白。其如社会上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都容易对我有一种误解；尤其是爱我而关心我的行止的朋友，因不了解我，而替我可惜或担心。那么，就颇有向大家剖说两句的必要了。

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实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踏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我原是个不学的人，更且从来不存求为学者之一念。十数年来，虽亦屡任大学讲席，亦屡有著述出版，都是误打误撞出来的；自家亦莫名其妙。在民国十年第一次出版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上，我曾申白：

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著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有在这里著书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要说的话。我这个人本来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从这沾滞的脾气，而有这本东西出来。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求一条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这句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把定一条意义去走。因其如此，我虽不讲学问，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被我收来，加过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地变。愈收愈多，愈来愈变：就成功今天这样子。我自始不知道什么叫哲学，而要去讲他；是待我这样做过后，旁人告诉我说：“你讲的这是哲学”，然后我才晓得。我思想的变迁，我很愿意说出来，给大家听。不过此次来不及，打算到明年三十岁，作一篇《三十自述》再去说。此刻先把变迁到现在的这一步，发表出来，就是这本书。我要作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欢对人家讲；寻得一个生活，就愿意亦把他贡献给旁人。这便是我不要谈学问而结果谈到学问；我不是著书立说，而是说我想要说的话的缘故。”

又在民国十五年春上，着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时，先写得一篇自序，亦复有类此的申白：

“……明白这一层，则知我虽然初不曾有意要讲心理学，而到现在没有法子避心理学而不谈，虽然西文程度太差，科学知识太差，因而于现代学术几无所知，原无在现

代学术界来说话的能力；而心难自昧，理不容屈，逼处此际，因不甘从默谢短也。《人心与人生》之所为作，凡以此而已！”〔1〕

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有是心。以妄谈学问之故而被入目为学者，在我只是欲逃不得；亦不过是人家呼我为牛，则牛应之，呼我为马，则马应之而已耳！区区之志固不在此。乃社会上爱我的朋友，见我近年行事似在做一种社会运动或政治活动，多有疑讶我抛开学者生涯而别取途径，担心我将卷入浊流者。亦有认此种运动必无结果，劝我不如研究学问者。更有几位有心人，认我往者从人生思想上指导社会，是根本重要的事业；乃若现在所用心的乡治或村治之事则尽可有旁的人能作，而无须乎我来作；都劝我不要轻弃自己的责任。表示这类意思的信件我接得很多，其中尽有全未谋面的。至于当面见教、问我为什么忽然改行的，更随处都遇者。于此，我倒想起我的一位知己了；——那就是胡适之先生。民国六年我游湘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归来便发表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到处分送散布，〔2〕其时我在北大任课未久；适之先生亦是初从美国回到北大。我这篇文章很得他的同情与注意。其后，事隔数年，他还提起来说，当日见了那篇文以后，即在日记上记了一句话：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要革命的。善哉！善

〔1〕此时《人心与人生》一书尚未出版，仅十六年春为北京学术讲演会讲过三个月，约得原书之半。此序则曾一度刊登在《晨报》副刊。后又作为附录收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2〕《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见本全集第四卷）。很可以代表出我在时事感触中的心理是如何；而十二年前我的思想见解亦于此可证。——那时节盖犹在梦想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国之实现也。

哉！适之先生其知我乎！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大家实无所用其疑讶。

更往上追述去，则民国元年我且曾一度热心社会主义，达于高潮。当时我亦作了一种《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无钱付印，从朋友处借得誊写板，自己写、自己印。印了几十份分送朋友。<sup>〔1〕</sup>我二十岁以后之归心佛法，实由此热潮激转而折入出世一路者。

更往前追述去，则清末光绪年间，我十四五迄十八九岁，在中学堂读书时，专爱留心时事，天天讨论我们应该“革命或立宪”的问题。始而我是倾向立宪论的，后来亦跟着朋友跑革命了。辛亥年我们组织所谓京津同盟会，亦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民国以后，我在家奉亲，闭户读佛书，似乎是不问时事了。然而心里仍抛不下。我前于辑印先父遗书时，作有《思亲记》一篇，其中有一段，很可见当时情形。

“……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惟漱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十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迕，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

〔1〕《社会主义粹言》稿已不存，忆似共分七章。民国十二年游曹州，为第六中学讲演，曾述及其中“社会主义之必要”一章的大意。六中学生崔君万秋为我笔记，标题曰《槐坛讲演之一段》，初载于六中的刊物上，后载于《北京大学日刊》。（今收入本全集第四卷——编者）。

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争。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呼！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矣！”

此段原文，意在述我对已往悖逆的悔痛。然而父子两人的一副呆气亦活露出来。以闭户家居的父子两人，表面上似乎任你天翻地覆亦可不管的，乃偏偏对于国事或社会问题，辨之必明，争之必力，如此关切认真！凡是能从性情脾气上了解我的人，就可知道我今日之社会运动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一向不过滥恻学者之林，原非“为学问而学问”者。

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用心思或云谈学问，只居其中的一段落，归结还在行动；来自实际固不归于实际不止也。追根寻源，全在有问题，全在问题之实际性。

## 二 过去几年的烦闷产生今日的主张

问题之来，要我如何能不问呢？眼前没有路走，逼到你讨一个解决，你能装聋作哑么？十年前（民国七八年间）我的心思不能不萦回在东西文化问题上，而沉思不解，必得解决而后已，只是如此。今日不能不沉思在这中国民族前途问题上，犹

是如此。东西文化问题是怎样逼着中国人讨个解决，还待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绪论中指点讲明；至于这民族前途问题之在今日，似乎无待我再讲明了罢。因为那文化问题，要抽象些，或难理会得，而此则眼前实际的水深火热之苦，数十年转陷益深，茫无涯岸，不早令人心焦了么！

“中国还会好，不会好？”“中国怎样才能好？”差不多人人都会这样发问了。然而世上亦正不少作梦发呆的人，在不可望的地方抱希望，仿佛没有什么问题似的。即我自谓爱发现问题的人，其始亦何尝不作梦发呆。盖问题所在的认取，固未易言；而不知问题所在者往往容易谓无问题也。我在民国十年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即尚不曾发现今日的问题。那时模糊肯定中国民族尽有他的前途，在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物质的增进上，大致要如西洋近代或其未来模样；便是原书所谓“对西洋文化全盘承受”的一句话了。于如何能走上西洋近代政治制度的路则亦未之深思；产业如何得发达，分配问题如何解决，总觉此诚费研究，而政治果有路走，这些总不会没有办法。“假以时日，自然都有解决的一天”；由今思之，这不是作梦发呆是什么？十一年以后，方渐渐对于一向顺受无阻的西洋政治理路怀疑起来，觉得“这样办法恐怕不行”。固然，西洋近代政治制度在西洋人或中国人尽不少提出批评修正的、尤以欧战后为著；却并不与我心中疑点相应。我所疑在其根本；我不是在大体承认之下，指摘其弊病缺短，欲为之补充修改。我已不认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洋政治制度是一时的现象。我疑心中国人之与近代政治制度怕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

谁若没有梦想过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国的仿行实现，则他不

注意这仿行的困难，实现的无望，自无足怪。然而我是做过这迷梦来的；十数年间，眼看着事实上是怎样的格格不入，愈去愈远；如何能轻易放过而不深求其所以然？于是，我就于旁人不留意的地方，发现了中国民族精神和西洋政治制度间的大刺谬点。<sup>〔1〕</sup>固然，西洋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国不能仿行成功，亦是因许多客观条件的缺乏或不合。然而那都不是根本的窒碍，无可设法的困难。唯独这中国古代文化之迈越西洋近代文化之处，涵育得中国民族一种较高精神，则是没办法的所在；——中国人将不能不别求其政治的途径。然则中国人将走一种什么途径呢？别求途径、能不能求得到呢？或问说：中国人其将怎样建设他的国家？其将怎样度他民族团体的生活？我又想不出。从此以后，便陷入怀疑烦闷之中！

我真是百般想，亦想不出一条道。假使中国到现在依然闭关自守，初未曾感受西来的势力影响，那大概数千年的旧辙是不会改换的；根本不发生今日的问题。其如人类的历史演化到这一步，使中国人一些逃避隐蔽不得。于是，这非开辟新途辙不可的形势，就逼来了。虽然即在感受西来影响已八十年的今天，皇帝的再出现，从种种情势上看，犹是颇有可能的；然而毕竟不行了。一切旧日迷信传说观念习惯等，在稍有知识的人已失坠毁灭无遗；同时其否认的心理却已很强地显露在意识上。——这就筑起了一大墙壁，使我们无法返回旧辙。“时代潮流所不许”，大家差不多皆会说这句话。语其内容，就是现时社会上自有其强有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帝制再兴）则殊微弱，

---

〔1〕此层将在《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见本卷）一文中言之。

又且背逆着那有力的倾向。社会虽是多数人构成的，而说到这“有力的倾向”则恒视乎其间少数有力分子。——此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为尤然。孰为有力分子？就是较有头脑较有知识的人，和较有勇气较爱活动的人。虽然占百分之八十多的蚩蚩农工，大都厌嫉民国而想望真龙天子，却不能在社会上形成一个较强的倾向。反而由少数最先感受西来影响的有力分子，对皇帝制度的否认，断绝了帝制再兴的命运。十几年的扰乱不定，就是指示旧辙的已经脱失，新轨的未立。

新轨之不得安立、实与旧辙之不能返归，同其困难；而世人不知也。旧辙之所以不能返归，其难在少数有力分子意识上明白的积极的否认他；新轨之所以不得安立，其难乃由吾民族（兼括有力无力分子）不明露在意识上的消极的不予承认接受。多数无力分子，从其数千年迷信和习惯，对于新制度无了解不接受，这是容易知道的；而其不接受实更有在迷信与习惯之外者，则人多不注意。少数有力分子固明明为新制度之要求者，而在其意识后背隐暗处同时复为其拒却者，人尤不注意。故十数年政局之纷扰，政象之浊糟，未尝不指示我们新轨辙之消极的不被接受；而昧昧焉期望“民主”期望“法治”者，至今犹盈天下也。然而吾知其事之不可能矣！

中国人现下就夹在这有意识地否认旧辙，无意识地不接受新轨的当间。而更有难者，有意识的一面代表西来的时代精神；无意识一面代表民族固有精神；二者有无可以融通之道，固已不可知；犹且是我们似乎照顾了精神，还应须照顾到事实，——如何应付现在脚下所践处的环境世界。世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竞争侵略的世界；我们本身是一个为其侵略下的生产技术简陋，文化老衰的民族。不但要照顾到现在事实，似乎还应须照

顾到未来变化；因为现在的这世界局面又是不能长久的，其将转变出一新局似有不容己之势。于是我们更须于此时准备着变化，含容了未来，庶乎其可。那么，这个问题就真难了！本来人类历史走到了如今日的世界可算奇诡难艰，猛烈复杂前所未有的。可说整个的世界都在问题中。而中国人此日所遭际的难题，不但是他有史以来未曾遭过，而且并世中别的民族亦不曾有可比例的。天似乎在试验中国人能不能解答这个难题；中国人似乎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个难题；我则看到，而愁闷不知所出。

在我发闷的期间，南方一种新兴的民族自救运动开始了——这就是十三年的国民党容共改组。我于这新运动的开始，虽经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领袖李守常先生从广东回来对我谈他们与国民党合作的意义颇详。（据他所谈，法国式的革命在中国尚未完成，因而俄国式的革命尚不到时机。他们已放弃了暴力革命劳农专政的主张，而从事于国民革命，争求国民的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以为发达工人组织的地步。并说他们劝孙先生不要一味在军事上用力，亲自打东江，而应当到内地各省作一种国民运动。这所说似乎与他们后来的行动方向不符。然在当时确乎是真的。1923年《前锋》是他们机关刊物，其中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发表的意思即如此）。然不久，我到山东曹州办学去了，守常亦出国赴欧，消息遂隔。迨十四年广东局面渐次统一，而党的特殊精神亦分外著露；许多朋友身预其间的，都盼望我南去。我于此时才知注意，而似不无怀疑——或者至少是无解于我的烦闷。他们招唤之不已，至于督责备致；——陈真如先生，张难先先生来信尤多。他们说我不应该关起房门，高谈哲学。盖其时方以曹州办学失败回北京，谢绝各方邀请，与一班青年朋友闭户共



读。然在我怎能去呢？自己胸中犹疑烦闷无主张，要我跟他们一齐干，还不甘心；要我劝他们莫干，更无此决断与勇气；则去又何用？却是在大局沉闷阴霾之中，忽睹此一点阳光朝气，自足使我们同情和注意。求着了解他的心是很切的。于是就从我们朋友中分出三个人——王平叔，黄良庸，徐名鸿，——去广东见识见识，历练历练；我自己则未去。

到十五年北伐，这种新兴运动到达长江；全国震动，青年界尤为兴奋。我亦于九月南下，想到武汉会见我那朋友；——原在广东的朋友陈真如先生（铭枢）率师为到武汉的先锋队；而且新去广东那两个朋友亦随师北伐一路到了武汉。但结果则我未曾到武汉，只到了上海南京。——这就可以看出我自己之一面心焦，一面又没定见，没主张了。在上海却无意中看到国家主义派领袖曾慕韩先生。那天恰好是双十节，他们用浅红纸印刷的《醒狮》上面，发表有他们的“建国大纲”（原文标题记不清，其意若此。）若干条。曾先生对我谈话甚多，一面批评国民党，一面说明他们的主张。但他虽说得天花乱坠，一样的无解于我的烦闷。换言之，我心目中的问题他们都没有。

我旋即回到北京；而以时局之变——武汉反蒋，陈先生原是卫戍武汉的，现在站不住了，——我那两朋友王平叔、黄良庸，于十五年底十六年初，先后秘密离汉北来；于是我们复聚于北京。自他们十四年南去之后，常常要以到处所观察的报告于我。他们先在广州晤会我们的朋友李任潮（济深），伍庸伯（观淇），陈真如，张难先诸先生；旋即随同陈真如、白健生两位入湘（接洽唐生智）；又回转广州，又随师北伐，沿醴陵平江而到汀泗桥贺胜桥打吴佩孚，下武汉而卫戍武汉。每到一处，必有很多信来。这一次新鲜而剧烈的经验，当然给了他们很大变

化。王平叔最先欣赏了共产党理论；徐名鸿遽尔入了共产党；只有黄良庸不移不摇。他们彼此意见竟不能归一。这一则见出我们朋友的不切实不济事；一则见出我们的空洞没有成见。回京而后，师友重聚，更相切磋，乃各大大有所进；亦是离去空气紧张人心已呈异态的武汉，而回到宁静宽舒的北京家里——那时我们十多人住在北京西郊大有庄，所谓家里便是我们的朋友团体——顿然恢复得和平正常心理，正有不待切磋而各自觉悟者。而数年往来于胸中的民族前途问题，就此新经验后，从容省思，遂使积闷夙痼，不期而一旦开悟消释。

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什么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透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所有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他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天下事，有时非敢于有所舍，必不能有所取；有时非有所取，亦每不敢有所舍。不能断然有所取舍，便是最大苦闷。于所舍者断然看破了；于所取者断然不予放过了；便有天清地宁，万事得理之观。——我们之所谓一旦开悟亦不过是如此罢了。

我们以前，何尝不自以为认识了西洋人，和西洋文化的一切；然于近代政治制度的西洋把戏毕竟不曾识得。后来觉察得彼此间的刺谬不合，则既否认之矣；似乎又何待今日而后乃否认西洋把戏？然实待共产党方启发了我们，对西洋人及其一切把戏的认识到最后通透点；而后恍然，而后太息，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原来天下事理，先时都见得些，所差只争个透不透；谁人都会得些，所争只在咬得定咬不定。

你看：共产党的理论，多么值得玩味！有聪明有头脑的人如何不倾向他？共产党的要求，多么值得同情！青年人，有心肝的人如何不倾向他？他们活动起来，有的处奋迅发扬，有的处紧密结实；这又使青年人，有勇胆能干的人，多么逗劲而爽心快意的去干！当十二三年全国阴晦沉闷，最燥人不过的时候，如何不成了最应时的玩艺？革命总不成功，正没办法的国民党，如何能不跟着他走？（代表十三年改组后之国民党的，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左派则是变相的共产党）十三年以来的革命潮流，便是这样由社会上有力分子所形成的有力倾向。然而自我们一度经历尝试过后，我们知其无能为矣！他与我们民族精神是大相刺谬的；有意识的倾向他之人，在其意识背后仍旧无意的拒却他；而以我们的精神实超迈于他之故，他将无成功之望。这有一个我们所信的大原则在，就是：凡高过我们固有精神的，便能替我们民族开新生机；若低下一些，便只益死机；在我们固不能由是开出新生命，即在他亦不能成功。我们所以敢于否认西洋政治制度者在此，所以敢于否认共产党的亦在此。我对于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于迷信过多少年后，起了深重的怀疑；正在怀疑的当儿，来了共产党；自然不易再迷进去，而且存有多少怀疑的阴影。然而当那时期，谁能对这新兴的一股朝气不抱很大的期望之意和同情之心呢？迨这一层又透过来；则不独认识了共产党，实更深刻地认识了西洋人。——所认识的初无异于前，只是重新地更深刻地认出了而已。夫然后我才断然彻底地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

我们至此方才恍然，我们几十年愈弄愈不对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是为西洋把戏所骗（自是出于自家的迷惑颠倒，怪不得人）；殊不知西洋戏法，中国人是要不上来的。而同时在认识了

西洋人的地方，亦就认识了自己，因而于所以自立之道亦就看出得差不多。所以自立之道，以前何曾不识得，只是信不及；现在所见益确，信之乃笃。更且是对于旁的方法道路断念了，则无复可以依违瞻顾者，而道路亦就有了。

本来在我们过去几年的怀疑烦闷中，亦不是没有一点正面的积极的自己所见；譬如民国十二年春间我在山东曹州中学的讲演，就已提出“农村立国”的话。这意思在我心里萌芽得颇早，然而这话则要算章行严先生说的。章先生因此而出任北京农大校长。唯至今不得闻其详（仅记得他在上海报上发表过文章，说中国是农业国，没有工商业，所以不能行代议制度而已）。当时王鸿一先生即大为注意，要去访问他，嘱我作函介绍，乃亦不曾会谈到。然我实没有鸿一先生那样积极热心。不但陈独秀先生警告我们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即我自己亦生怕是主观上的乌托邦，无用的长物，而不敢自信。所以十三年间，鸿一先生连合米迪刚先生创办《中华报》，请尹仲材先生为主笔，组织一研究部，要从这个意思讨论得一具体建国方案，我全不曾参加。<sup>〔1〕</sup>不过有时鸿一先生拿他主张的，征问于我；我必尽情贡献我粗糙的感想意见而已。后来他们以讨论所得结果，出一本《建国刍言》；内容先谈原理，后提出一《中华民国治平大纲草案》。<sup>〔2〕</sup>其中很有些伟异的识见与主

---

〔1〕 仿佛十七年尹先生的《村制学讲义》序文内，提到当日之事，亦将我名列入；实则中华报研究部的讨论会我没出席过一次。

〔2〕 《治平大纲》共十七条，每条于条文之前有一小题目；其目如次：民主传贤国体，农村立国制，村治纲目，县治与省治之实与事项，选贤与传贤，考绩制，中央行政，省行政，县行政，均田制度，因利的金融制度，公营的营业制度，工商制度，礼俗，军制，度支，附则。内容卤莽灭裂，在所不免，然亦自有难能可贵之处。

张，——大纲上第一条规定了传贤民主国体，第二条规定了农村立国制，——我颇点头承认；然我总不敢信，就是这样便行。我总觉还有疑问，和应该顾虑到的许多问题，而放心不下。《建国刍言》出书时，鸿一先生要我作篇序文，我都做不出。十五年鸿一先生避居在东交民巷使馆界内，我们还时常见面谈这问题；他极力督促我作文章介绍他们的主张于社会。我曾发愤决要将我所赞成的意思表示一点，但依然做不出。可怜我原是在怀疑烦闷的时期中啊！不拿起笔来还好，拿起笔来运思，便疑从心上起，闷自胆边生，写不得几个字又搁下！〔1〕

然则究竟有些什么疑问？这些问题后来又怎样便得解决？问题自多的；如何解决下来，更就一言难尽了。这须待在本刊上慢慢一点一点向读者请教。现在姑举出其最大三问题：

一、鸿一先生的所谓“学治主义”，“传贤政体”，我相信得及那是中国民族将来政治上必由的途径；——或者就是世界上共由的途径亦说不定；然而非所论于今日，今日无论是从本身国内情势上看，或外面国际形势上看，全都不能行的。

二、我前曾说过，我们的难题，是一面须照顾得民族过去历史固有精神，一面还须应付眼前脚下所践处的环境世界，更一面要准备着世界的变迁，未来的文化。所谓“学治主义”所谓“农村立国”，或于固有精神，未来文化，不无相应；然而独

〔1〕 鸿一先生实在是我们的急先锋。他能标揭主义；他能建立名词；他能草订制度。他每每说愿服从我的领导指挥；却是他总站在我前头！虽至今犹然。所以鸿一先生的言论，我是至今不敢替他全负责的。

何以处兹环境世界？易词以言之，这于对付今日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而谋其解脱，是恰不适宜的。

三、我不敢信鸿一先生他们几位从那主观的简单的理想，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又是关系一切的重大问题。从这三大疑问发挥去，似乎足以否认了那些主张而有余。然而我是天性多信又多疑的人；既有所信，复有所疑，便反复深思，寤寐不去于怀，何能抛撇得？迨十五年底十六年初，（那两个朋友从武汉回来后）才大半都解决了。——其间第三问题，还要算迟至十六年秋住居广州新造细墟乡间时，才得完全解决。我今日主张的成熟，盖成熟于广东。

我所用“乡治”一名词的拈出，亦在广东时；何以不用“村治”呢？这自有些意思，将来总可谈到。彼时我与鸿一先生，一南一北，音讯不通；所以亦不得商榷。现在彼此各自用惯了，亦难改得；然这其间固没什么大计较的，所以我亦不妨从着北方朋友，就用“村治”字样。说到内容主张，则鸿一先生与我亦只是大体极相近，尚不曾归一。我在本刊所欲开陈的，自是我个人的主张。

### 三 我最近努力所在和主编本刊的由来

疑问解决了，主意打定了，我便偕同王平叔、黄良庸于十六年五月南游。先于上海会到陈真如先生。他特意陪我们到西湖南高峰上住得几日，为是好谈话。记得当时同谈的，还有熊十力先生，严立三先生（严重），张难先先生等。我们所怀的意思亦大体表露得一些。随即南去，到广州，晤会李任潮先生。——他那时以总参谋长代总司令留守后方。自民国九年底

任潮先生离北京回粤，我们已六七年不见。我一见面，就问他，从他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任潮先生原是“厚重少文”的一位朋友，向不多说话。他很迟重地回答我，“那最要紧是统一，建立得有力政府”。他又慢慢地申说，从前广东是如何碎裂复杂，南路邓本殷，东江陈炯明，又是滇军杨希闵，又是桂军刘振（震）寰，以及湘军豫军等等，人民痛苦，一切事无法办得。待将他们分别打平消灭，广东统一起来，而后军令军制这才亦统一了；财政民政亦逐渐都收回到省里了；内部整理得有个样子，乃有力出师北伐。所以就这段经历而论，统一是最要紧的。现在的广东，实际上还有不十分统一之处，假使广东的统一更进步些，那我更可作些事。一省如是，全国亦复如是。我问他，怎样才得统一呢？他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责就要军人都拥护政府”。他更补说一句：“这所谓政府自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我冷然的说道：“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他当下默然，许久不作声；神情间，似是不想请问所以然的样子。——我们的正经谈话就此终止。

我南游之意，实没有想去发布我的见解主张；因为那时还是十三年改组后的国民党正盛时代，岂容得异样言论？所以去时原就预备着闲居读书，慢慢等待时变，希望过一年半载或有我机会的到来。对任潮先生，因系旧日相知，不妨揭出心曲，然而亦太冒昧了。任潮先生完全是浑朴简重，实际用力作事的；他正一心不乱的相信“党”，如何听得入我这怪话？我在广州省城住得一周，即同良庸到他乡间——离广州五十里水路，地名新造细墟——去歇暑。不期任潮先生竟于此期间，电请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我为广东省政府委员。这殊非所料。我自顾不合时宜，

万无轻就之理，当向恳辞，他亦就不勉强。〔1〕

自是以后，我常往来于省城和乡间；而以居乡与青年诸友共读为多；十六年的下半年就是这样过去了。亦就因居乡的原故，所以那年十二月间广州的赤色恐怖，幸得不罹于祸。十二月底，任潮先生由上海回来戡乱，他极盼我出乡来。他此时似乎有点回味我那初见他时所说的怪话了。我亦极愿乘机与他谈一谈；因此就住在他总部内。白天军务甚忙，每作夜谈；记得当时同谈者有刘裁甫先生。

我对任潮先生的谈话，大致是这样：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实际上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此其所以然，是在超个人的“法”，或超个人的“党”都无从建造得起来（这在中国皆是绝对的造不起，非一时现象）；故尔政治上必然地落到这地步，而不可逃。在每个小局面中握有权力者，下焉的便为祸于地方，上焉的或能作些个建设事业，这都不是我期望于你的。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走，方为最上。如何去替民族开这条路出来？则我之所谓乡治是已。

任潮先生表示接受我所期望于他的；他承认我可以在广东试办乡治。自是以后，我方始决心留粤，有时亦参预他政治的事情。

十七年春上，粤乱既定，任潮先生偕陈真如先生一同到南京去面蒋公。我特意地同他们一路到上海。因为他们在广州，一天军事政务宾客应酬太忙，不得较长时间谈成片段的话；只有

---

〔1〕报纸多传我已就委员职，即广东省政府的布告曾一次列我名，实则我始终没有就职。



这在船上的两天，没有什么外缘相扰，可以利用为我谈话的好机会。计在香港到上海的三天，我们每吃过早茶或午饭，便聚在客厅，围坐起来，由我讲说我积年之所研究的。我一边讲，真如先生便一边笔之于手册。当日同座者，李陈二公外，尚有朱骝先（家骅）先生，谢无量先生，孙希文先生等各位。

从南京回广州后，我代任潮先生担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事。随在会中提出请开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并试办计划大纲。在建委会通过后，送政治分会；政治分会议决转请中央核示。后来中央政治会议复准到粤，又由政治分会发交广东省政府照办。我审量得时机似仍不到。即自请先到国内作乡村运动各地方考查回来再办。于是我乃于十八年二月离粤北来。先在江苏昆山参观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办之乡村改进会；次到河北定县参观中国平民教育会之华北试验区；后又到山西汾阳介休等县调查村政情形。——曾有《北游所见记略》一篇，刊布在去年的《村治》月刊第1卷第4期。

当我由山西回到北京，粤局因大局之变而亦变；我即不再回粤。因借居清华园内，欲将所怀写成《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1〕顾未能就。这时因鸿一先生介绍，得识梁仲华先生（耀祖）。仲华适与他的朋友彭禹庭先生（锡田）同奉河南政府委命筹办河南村治学院，就邀我帮忙。去年秋间，同到辉县百泉——指定的院址——筹商一切。筹商所得结果，大家嘱我负写定之责，因写成《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及《学则课程》等件。十二月招生，今年一月正式开学，我即

---

〔1〕《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之目次，兹附录于本文之末（见本卷第73—74页编者）。

为他们任教乡村自治组织等课，一直到现在。

上来所叙，便是十六年来以迄于今，我所干事情的一篇流水帐。我最近心思气力之所用，就在这些地方。俗语说的好，“一心难为二用”；在最近期间我将不能作旁的事。我于旧日所谈的哲学和心理学，其热心与兴趣仍丝毫未减；然此时难于兼顾。所以去年北归后，陈百年先生要我到北大，东北大学邀我尤力，我皆割舍了。以下将叙我接办本刊的由来。

十七年我在广东时，鸿一先生曾一连打许多电报给我，催促我北来。其中有一个意思，即为要办村治月刊。那时我实不能离开广东；鸿一先生看我来不了，就先筹备出版了。十八年我北来之后，月刊同人自然督促我作文章；然我除作得一篇《北游所见记略》，结束我考查乡村运动的工作，及为河南村治学院作得一篇旨趣书外，直可说没有替月刊作文章。这期间实有一大苦处。

我眼中的乡治或村治，全然非所谓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之一种紧要工作”；我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来再转再变，转变到今日——亦是到最后——的一新方面。这实是与四五十年来全然不同的一新方向；——以前都是往西走，这便要往东走。我不能牵牵扯扯裹混在往西的人堆里，干我往东的事；——事原是大家的事，原要大家往东走才行，我一个人往东没有用的。如果大家于旧方向不死心断念，则我的乡治或村治即无从谈起！这时你和他谈些个乡治或村治的怎样怎样办法，中什么用呀？我不开口说话则已；我说话，劈头一句，就要先打破他往西走的迷梦，指点他往西走的无路可通。然而这样的说话，在彼时是不大相宜的。鸿一先生常爱念我的八字诀：“少着人力，多听无功。”不待大

家先自感到无路可走，你唤他，是唤不回来的。清末民初的那个方式的革命，衰穷之极，然后开出十三年来的革命新方式；这新方式的革命，十六年后已露衰象，迨十八年而见穷象，然尚未至于极；且听待他自然衰穷无力，社会人心对他失望已极，再来说话。强摘不成熟的果子，是不可的。无话可说，即无文章可作（我向来只晓得说话，不晓得作文章）。

夫我岂不愿说话，然不能不耐心等待一时。等待到今天，已是一周年了；看看四周形势，似乎时机正已到了么？代表十三年改组后之国民党的，所谓国民党左派者，已经没有向着社会上有力分子（较有头脑较有活力的人，尤其是青年）求同情，培势力，开前途的自信，而投到北方来。——这就完完全全倒塌下来了！再无话可以讲得！亦再没有人同情于他们！大运已终，就此了结。而同时社会上，一向被十三年来的国民党所箝制的言论，亦于此不期而发出了种种呼声。像胡适之先生他们一派的“人权论”，“我们走那一条路”？〔1〕象章太炎先生的妙论：“党国不灭，民国不兴”，“恢复临时约法，五色国旗”，像周震麟黄一欧先生一派的《坦途周刊》上的言论，都是好例子。我们记不起的还很多。其他若报纸上零星的表现，到处的街谈巷议，更不计数。这一以见十三年来的革命潮流落归无力；一以见社会人心别求出路的急迫。这不正是我们说话的当儿么？

尤不可不知者，此时实伏一绝大危机。中国这些年来，就没有一个能用深思的人。当此走头无路，急迫之间，一般人不是穷极思返，折回来走清末民初的旧道；便是穷极思异，激进

〔1〕《新月》第2卷第10号胡先生有此文；并且说他们朋友正在讨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

于共产党。这情形已明明白白显出来。不但章太炎先生代表倾向旧道的例；胡周诸先生何莫非此例？一切要倡开国民会议以打倒党治的，以及其他一切民治主义者，国家主义派，难道还有什么新鲜的道儿么？左派领袖们，口口声声的“民主”“民主”……不都是应于此种潮流不得不然的表示么？胡适之先生固然期望着中国为一“现代国家”的；乃陈公博先生现在亦复说出这话来！〔1〕试问什么是“现代国家”？你如不是指苏俄、那便自然指英法美日；——这不是你所要打倒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么？国民党自清共以来，党中空气已露有退归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的倾向，然左派则尚不肯这样；不图今日在左派先生亦复尔尔了！这就见出一般人想不出新鲜的来：离开了欧洲最近代潮流，又是欧洲近代潮流。近二十年来的教训，还开不出这混沌的窍！

这是个危机；然这危机还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在后一点；——穷极思异，而激进于共产党。青年们对于今之所谓国民党，已失望到干净地步，不消再说；你设想他是将跟着章太炎胡适之先生走呢？还是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在眼前短期间内，将成一时有力倾向，殆为必然的。我们如果不能指点出一履足人心的新方向。不能开辟一条给社会有力分子情甘努力的大道，则举国青年都要走上死路，其将成为何等的惨事啊！

以我积年之用心，既有所见，纵未便是能供给这个时代需要，担负这未有之大业的；然一肚的话，此时不拿出来，更待何时？——这是我，自告奋勇非出头接办本刊不可的由来。

〔1〕 报载陈公博在太原讲演词中有此语。

好了！我的话亦都说明了。总结几句罢：

（一）从我的生性为人，就有过去的烦闷和最近的努力；从过去的烦闷和最近的努力，到得今天，就非干这一下不可。愿各位爱我的朋友，不必可惜我抛舍了学者生涯；——我本非学者。亦不必担心我失却清高，卷入浊流；——我的行动无在不可与天下以共见。我在民国十三年由曹州回北平后，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三个整年闭户没有作事（任何事都不作，大学里教钟点都不教），非冷静；今日出头对社会说话，对各方接洽，非热闹。——这凡是亲眼看见我过去几年事实的人都可晓然的。

（二）从我所要作的社会运动看去，正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我的乡治主张正是切就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为人生大道的指点。以为我舍却重要的人生问题不谈，而办些个不相干的村政村治的那位朋友可以放心。

（三）我编本刊，专意在对着青年——尤其是左倾青年——说话：这还不外我从前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专对好人说话的心理。

（四）我编本刊，此时最着重在转移国人盲目地往西走的方向，指点出“此路不通”，使他死心断念；所以尽有些文章，或并不直接谈乡村问题，而正是我们文章要紧的所在。先此说明，以后读者可不为怪。

#### 四 我对于国民党的态度

我因为要说明我心中的所见或主张，自然不免要批评到旁人；其中间有涉及国民党的地方，因恐大家误解，所以我想向

大家先为申明我个人对于国民党的态度。

我以为所谓国民党者，就是指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那一种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团体。如果我所说的不错，则所谓国民党者其历史实是很长。总理遗嘱上说得明白：“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然则凡此四十年内为孙先生领导而致力革命的团体，都应当算作国民党；乃至在此四十年后，秉承孙先生遗志而继续努力的，亦应当是国民党；不应是狭义的单指十三年改组以后才叫国民党。凡不肯减缩我们国民党历史的人，都应当承认这句话。所谓国民党者，其所指既是如此，则我们更可看出，所谓国民党，实在是因时而变化不同。在兴中会的时代，他的党内组织，他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政策主张，与夫他的革命手段方法，是一个样子。在同盟会的时代，又是一个样子。并且同盟会中经几次变化，至少辛亥前是一个样子，革命成功后是一个样子。到民国二年与各小党合并为国民党时代，其变化的样子，尤其与前不同。到改组中华革命党的时代又不同。后来再改成中国国民党，到十三年一月又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改组宣言，在此时期学共而容共，自附于第三国际之列，完全另成一种途径，其变化为尤剧。十五年宁汉分裂以后，逐渐变化反共灭共，以至于绝俄；前后相较，判若两党。这种改变，其见于党的组织上，训练上，活动方法上者，以最近中央四次会议由蒋中正提出整理党务案为总结帐式的宣布。可以说以前的国民党，至此案提出而告一结束；今后之国民党，由此案而别辟前途。以我推测，以后自是仍有变化，绝不拘定一种格式的。由以上历史的观察，可见国民党自始至终，是因时而有变化的，是常常在变化中的。更可见惟有变化，才是对的，常常变化，是他的本性；而执着一成不变，是不对的。变化就有前

途，而执着不变即是自走死路。

此其所以然，和所含意义，并不难明白。人类的历史原是变化不已的一件事，而递演到近世来，其变化尤为急刷，往古所不能比拟。最近百十年间，更逐步加紧。好象一件物体自高处下落一样，离地愈近，速度愈加。中国社会本来是静止鲜变化的，而卷入近世世界潮流以后，乃亦急转直下，其变弥烈。因此就客观一面说，在孙先生努力革命的经过中，一时有一时的环境情势。例如在兴中会时代的环境情势与同盟会不同，同盟会的与国民党又不同，……前后种种不同，试一留意，不难考见。请问我们身处其间，能执一不变否？是即本党频频不断改组的由来了。其一切对时局的主张，和革命运动的方式随有变换，更不待言。最浅显易明的例，辛亥以前说排满，辛亥以后尚能说排满否？今日打倒军阀的口号喊的震天响，而辛亥革命时，军阀尚未发生，根本连这名词都没人说到，何能有这口号提出？即此可征一斑。再就孙先生本身一面说，则古语有之“时势造英雄”，处在此世局急变之中，自己学问阅历随时长进，其见解主张亦何能不变？自己变了，则其所以领导群伦者又何能不变？最浅近的例，当早年因奉基督教的关系，则思想上常带宗教的色彩；其后漫游欧洲的时候，则领受欧洲文化，而抱有民权思想；晚年来则又着重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一一在日本的讲演实其证验。那么，孙先生既是学问思想常以进步而变更，追随孙先生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人，或学孙先生的人，亦应时有进步，而向前变化。以往的国民党既是一变再变而不数数变了；今后的国民党之有变化自是天经地义；——亦当一变再变而变之不已，以为中国民族辟其无尽之前途！

我认为自十三年改组以后，至蒋中正提出整理党务案的时候，只算党史的一段落。此一段落可谓受惑又受制于共产党的时期；抄袭共产党的理论，模仿共产党的方法，随着共产党走。盖自欧战停后，欧洲的最近代潮流传入吾国，马克思列宁顿成圣人。即孙先生且说我们今后革命非学俄国不可，况其他之人乎？（十二年孙先生与蒋介石信再三说这话）事已过去，是非功罪亦即勿庸计较。但若果有人一定要执着十三年改组以后的才是国民党，而以前的不是，以后的亦不是，我们便要反对。简直可以说惟十三年改组以后的才不是国民党；因为此一时代，是失掉自家精神，而濡染于共产党习气甚深的时候。自四次会议整理党务案以后，从前错误多已改正，而其习气仍有未能断然舍弃者，这是我们犹有遗恨的。我所批评多在此一面，是则所批评者并非国民党之本身，乃国民党之袭取诸他人者耳。

自南京武汉先后清共，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真所谓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了。自蒋介石于十七年第四中会提出整理党务案后，凡从前之学于共产党者亦多抛弃了。各领袖虽在，左派如汪精卫亦莫不再三声明，不独要清除共产党分子，并要清除共产党理论。彼共产党理论胡为而要劳我们国民党人去清除他？正谓其混迹于国民党理论内而惑乱我耳。盖自十三年后，国民党人之有小聪明者，都由此开窍，莫不以援彼人此为能事，明偷暗窃，花样繁多。果要清党，必如此庶乎算得认真彻底。然十三年改组后之国民党所以见精神者，亦正赖有共产党为灵魂，亦正赖吃得一剂共产党的兴奋药。清除又清除，不知所余尚有何物？不几为一空躯壳乎！欲不为空躯壳，是不可不急谋内容之充实，不可不急谋新精神之代兴。是无他，亟当回头认取吾民族固有精神来作吾民族之自救运动耳。……这本是孙先生民族主义的固



有涵义，非常重要者。凡一切在党务上政治上经济上的问题，皆当以此为衡，而采取新方针新办法；一洗旧染于欧人俄人者之污。我所谓国民党应当要变化者盖谓此。——即是一种改造的提议。其具体的条陈容缓将别为文，与当世有心人商榷之。

关于我与党的关系，还有几句话，需在此申明的。我在国民党过去的历史上是有党籍的；——我曾参加光复前的京津同盟会，和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不过在十三年以后便无我的党籍。照我自己的解释，我依旧算国民党人，旁人如何论法，就非我所知。

（本文脚注均为在《村治月刊》发表时由著者所加。——编者）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3—26页，

1932年9月，村治月刊社。

《村治》，1卷1期，1930年6月1日。

## 梁漱溟启事(为任《村治》主编事)

漱溟承村治月刊社聘请担任主编本刊事宜，自十九年六月一日新编第1卷第1号起负责；对于以前本刊言论或本社事务，均不负责；即在今后，对于编辑以外之事，亦不负责。专此敬布，尚希公鉴！

《村治》，1卷1期（封二），1930年6月1日。

## 各地乡村运动消息汇志弁言

一切努力于乡村改进事业，或解决农民问题的，都可宽泛浑括地称之为“乡村运动”，或“农民运动”；——类如乡村自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乡村自卫运动，农业改良运动，农民合作运动，农佃减租运动等皆是。我们的“乡治”或“村治”主张，则是有特殊意义和整个建国计划的一种乡村运动。近年来，中国乡村问题（或农民问题）的重要，已得有识者的公认；因此向着这方向努力的，在各地方先后继起，不可计数。持一较宽态度说，这自都是我们的同调。他们进行的状况，成功或失败的消息，皆为我们极重要的参考资料。

据近来的消息，则江宁村制育才馆是失败了，湖南自治训练所是失败了，浙江地方自治专修学校亦结果不良，江浙两省农民银行及合作社亦办得不好，而倡导乡村教育的南京晓庄学校亦因故被封闭。我们很想对于这些事件，仔细调查其内容原委；除已派人前往访查外，更望各地同志就所知的赐函见告。

我们本刊每期都要采集一些这方面的消息，披露出来，供给读者。兹将这次所采集的，分志于后。

5月21日，漱溟记。

《村治》1卷1期，1930年6月1日。

## 重刊《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槐坛讲演之一段》两文的前言

这前两篇东西——《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槐坛讲演之一段》——或作于十二三年前，或则追述到十八年前的思想，自都是过时过景的了。然我把他附刊在此，实不可少。非此不足以使大家朋友明白我今日之作社会运动，实是沿着我过去历史的态度而来；非此不足以使一般人心目中认为我为“冷静学者”的旧观念改变一下。这两篇东西原来都是一种小册子，自己印了，到处送给人看的；我今日的担任《村治》月刊，亦还是我那时出小册子的心理！

更且希望的，是大家要明白我思想主张之几经变化而后成熟。如果我说的话，有一点价值可取，就是这翻过几个身的深思；——我殊无实学，但有深思。这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可以代表我自清末迄民国十年间，对于政治问题的旧见解。以它与今日之反对欧洲近代政治制度，比照看来，就见出我是怎样地入进去而又翻出来。庶乎我今所主张的，可邀得大家多一些注意么？代表我最近主张的《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的目次，亦并附刊在此，其内容则陆续在本刊上向读者请教。

5月21日，漱溟记。

## 附录：《中国民族之前途》目次

自序

### 第一篇 无路可走的今日之中国

第一章 中国民族究竟还有前途没有

第二章 政治上的无路

第一节 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政治制度的路

第二节 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第三节 政治上必然落到的地步

第三章 经济上的无路

第一节 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

第二节 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

### 第二篇 中国民族唯一的出路——我所谓乡治

第一章 乡治在解决政治问题上的意义

第二章 乡治在解决经济问题上的意义

第三章 乡治在解决文化问题上的意义

第四章 乡治在解决教育及其他问题上的意义

第五章 倡行乡治的方法

第六章 近年各地乡村运动概评

### 第三篇 今后的中国国民党

第一章 从国民党过去历史以测其前途

第二章 国民党今后的生机在认取中国民族精神以负文化复兴之使命

《村治》1卷1期，1930年6月1日。

## 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

适之先生：

昨于《新月》2卷10号得读尊作《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欢喜非常。看文前之“缘起”一段，知先生和一班朋友在这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去年讨论“中国的现状”，今年更在讨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何等盛事！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正是我们所谓“社会上有力分子”；能于谈哲学文学之外，更直接地讨论这现实问题而有所主张，那社会上所得指点领导之益将更切实而宏大。回忆民国十一年直奉战争后，我与守常（李守常先生）同访蔡先生（蔡子民先生）意欲就此倡起裁兵运动；其后约期在蔡家聚会，由先生提出“好人政府主义”的宣言，十七人签名发表。八九年来，不多见先生对国家问题社会问题抱何主张，作何运动，其殆即先生所说的：“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亦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目的地”么？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个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般不行，却亦肯想这问题。——这是先生可以了解我的，类如我民国七年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极荷先生的同情与注意，类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亦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则没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条路的决心与信力，更没有拦阻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了；——就只为对这问题虽肯想而想不出解

决的道儿来。现在旧日朋友多为这问题洒血牺牲而去（守常而外，还有守常介绍给我的高仁山安体诚两先生），留得我们后死者，担负这问题了。我愿与先生切实地彻底地讨论这问题！

先生在“我们走哪条路”文中，归结所得的方向主张，我大体甚为同意。例如先生所说的：

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因为这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我于此完全同意：还有下面一段话，我亦相对地同意：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正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之时。

这个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这个方法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别有简单容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迂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喊口号贴标语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机关枪对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暴动与屠杀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们又知道，用自觉的努力来指导改革，来促进变化，也许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许人家需要几百年逐渐演进的改革，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

然而我于先生所由得此归结主张之前边的理论，则不能无疑。先生的主张恰与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相反，这在同一问题下，为何等重大差异不同的解答！先生凭什么推翻许多聪明有识见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论”？先生凭什么建立“一步一步自觉的改革论”？如果你不能结结实实指证出革命论的错误所在；如果你不能确确明明指点出改革论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认人家，而别提新议。然而我们试就先生文章检看果何如呢？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乃不意先生只轻描淡写地说得两句：

这五大仇敌之中，……（中略）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



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灭，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么？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像这样地轻率大胆，真堪惊诧！原来帝国主义之不算仇敌是这样简单明了的事；先生明见及此，何不早说？可免得冤枉死了许多人。唉！我方以革命家为轻率浅薄，乃不期先生之非难革命家者，还出革命家之下。三数年来的革命，就他本身说，可算没结果；然影响所及亦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举其一点，便是大大增进了国人对所谓世界列强和自己所处地位关系的认识与注意；大大增进了国人对于“经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注意；——两层相连，亦可说是二而一的。近年出版界中，最流行的书报刊物，无非在提撕此点；而其最先（或较早）能为系统地具体地详细地指证说明者，则殆无逾漆树芬先生《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此书一出，而“中国问题”的意义何在，——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国问题”的解决何在，——在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桎梏束缚，遂若日月之昭明而不易。<sup>〔1〕</sup>我且抄漆君原书结论于此：

（上略）为帝国主义所必要市场与投资之绝对二个条件，环顾今日世界，已多无存；是为其外围之区域日益减少，而崩坏之机迫于目前。惟我中国，土地则广袤数千万方英里，人口则拥有四万万众，对于货物与资本之需要量，对于原料品食料品之供给，大而无伦，恰为资本帝国主义欲继续其生存发达之最好的理想也。有此原因，必有结果。

〔1〕此处“遂若”二字请读者注意；盖我意尚不然也。

结果者何？外国之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遂如万马奔腾之势，以践踏于我国矣。于是为解决其市场问题，而我有百个商埠之提供；为解决其投资问题，而我有二十余亿元资本之吸收，而有数多利权之丧失；为圆滑其市场与投资地之经营起见，而我有巨大交通权之让与。我国一部之对外关系史，略具于此矣。不但此也：从政治而言，他们在我国又有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之设定，遂在我国俨成一支配阶级；从经济而言，他们向我获有关税之束缚权，与投资之优先权，在我国遂成一剩余价值榨取之阶级。他们这一种行动，实如大盗之入我室而搜我财绑我票，使我身家财产荡然无存一样，特我国民不自觉耳！同胞乎！今日国家之大病，实在於国民生活维艰，而生活维艰之所以，即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与榨取。管子云：“仓廩实而知礼节”；孟氏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故欲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根本上尤不可不使我国经济开发。顾我国今日之经济，从本书看来，已受资本帝国主义层层束缚，万不能有发达之势。换言之，即我们欲使我国成为万人诅咒之资本主义国家，亦事实有不能也，遑论其它！然则欲救我中国，非从经济改造不可，而欲改造我国经济，实非抵抗帝国主义国家不可。以个人意见，今日中国，已成为国际资本阶级联合对我之局，并常嗾使军阀以助长我之内乱。故我除一方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弱小民族以抗此共同之敌，他方内部，实行革命，使国家之公正得实现外，实无良法也。虽然，此岂易易事哉！须协我亿众之力，出以必死，奋斗之精神，建设强有力之国家始获有济！

先生果欲推翻革命论，不可不于此对方立论根据所在，好加审

量。却不料适之先生在这大潮流鼓荡中，竟自没受影响；于对方立论的根据由来，依然没有什么认识与注意。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能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这是我们要请教于适之先生的。我希望适之先生将三数年来对此问题最流行的主张办法先批评过；再说明先生自己的“集合全国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办法，其内容果何所谓？——如果没有具体内容，便是空发梦想！所谓最流行的主张办法，便是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这种论调随在可见，我们且举郭沫若先生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所作序文为例：

（上略）大约是在今年三四月的时候罢，漆君有一次来访问我，我们的谈话，渐渐归纳到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我们都承认中国的产业的状况还幼稚得很，刚好达到资本化的前门，我们都承认中国有提高产业的必要。但是我们要如何去提高呢？我们提高的手段和程序是怎样的？这在我们中国还是纷争未已的问题，我在这儿便先表示我的意见。我说：在中国状况之下，我是极力讴歌资本主义的人的反对者。我不相信在我国这种状况之下，有资本主义发

达之可能。我举出我国那年纱厂的倒闭风潮来作我的论据。欧战剧烈的时候，西洋资本家暂时中止了对于远东的经营，在那时候我们的纱厂便应运而生，真是有雨后春笋之势。但是不数年间欧战一告终结，资本家的经营，渐渐恢复起来，我们中国的纱厂，便一家一家的倒闭了。这个事实，明明证明我们中国已经没有发达资本主义的可能，因为（一）我们资本敌不过国际的大资本家们，我们不能和他们自由竞争；（二）我们于发展资本主义上最重要的自国市场，已经被国际资本家占领了。我当时证据只有这一个，其实这一个，已就是顶重要的证据。资本化的初步，照例是由消费品发轫的。消费品制造中极重要的棉纱事业，已不能在我们中国发展，那还说得上生产部门中机械工业吗？

我这个显而易见的证明，在最近实得到一个极有力援助，便是上海工部局停止电力的问题了。我们为五州案，以经济的战略对付敌人，敌人亦以经济战略反攻。上海工部局对于中国各工场把电力一停，中国的各工场便同时辍业。还可见我们的生杀之权，是操在他们手里。我们的产业，随早随迟，是终究要归他们吞灭的。我们中国小小的资产家们哟！你们就想要在厝火的积薪之上，做个黄金好梦，是没有多少时候的了。要拯救中国，不能不提高实业，要提高实业，不能不积聚资本，要积聚资本，而在我们的现状之下，这积聚资本的条件，通通被他们限制完了。我们这希望简直没有几分可能性。然而为这根本上的原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缔结了种种不平等条约。由是他们便能够束缚我们的关税，能够设定无限制的治外法权，能够在我国自由投资，能够自由贸易与航业，于不知不觉间便把

我们的市场独占了。

由这样看来，我们目前可走的路惟有一条，就是要把国际资本家从我们的市场赶出。而赶出的方法：第一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二是以国家之力集中资本。如把不平等条约废除后，这国际资本家，在我国便失其发展根据，不得不从我国退出；这资本如以国家之力集中，这竞争能力便增大数倍，在经济战争上，实可与之决一雌雄；是目前我国最大之责任！除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励行国家资本主义外，实无他道，这便是我对于中国经济问题解决上所怀抱的管见。

中国国民党所以不能不联俄容共，有十三年之改组，一变其已往之性质；中国近三数年来的所谓国民革命，所以不能不学着俄国人脚步走；盖有好几方面的缘由。即就现在所谈这一面，亦有好几点。其一则事实所诏示，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中国问题必在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由此所以联俄，要加入第三国际，要谈世界革命。又其一则事实所诏示，中国的一切进步与建设既必待经济上有路走才行，而舍国家资本主义（再由此过渡到民生主义或共产主义）殆无复有他途可走；如此则无论为对外积极有力地又且机警地应付国际间严重形势计，或为对内统盘策划建造国家资本计，均非以一有主义有计划的革命政党，打倒割据的军阀，夺取政权，树立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必无从完成此大业；于是就要容共，要北伐，要一党专政。先生不要以为暴力革命是偶然的发狂；先生不要以为不顾人权是无理性的举动；这在革命家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在没有彻底了解对方之前，是不能批评对方的；在没有批评倒对方之前，是不能另自建立异

样主张的。我非持革命论者，不足以代表革命论。即漆君之书，郭君之序，亦不过三数年来革命论调之一斑，偶举以为例。最好先生破费几天功夫搜求一些他们的书籍来看看，再有以赐教，则真社会之幸也！

再次说到封建军阀。先生不承认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的存在，但只引了一些教育杂志某君论文，和王阿荣陈独秀的宣言，以证明革命家自己的矛盾可笑，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亦太嫌省事！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这已成了今日最热闹的聚讼的问题，论文和专书出了不少，意见尚难归一。先生是喜欢作历史研究的人，对于这问题当有所指示，我们非请教不可。革命家的错误，就在对中国社会的误认；所以我们非指证说明中国社会是怎样一种结构，不足祛革命家之感。我向不知学问，尤其不会作历史考证功夫，对此题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扫群疑，昭见实事，实大有望于先生！

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本来中国人今日所苦者，于先生所列举五项中，要以贫穷与扰乱为最重大。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假定先生不以军阀为仇敌，而顾抱消灭“扰乱”之宏愿，此中必有高明意见，巧妙办法，我们亟欲闻教！想先生既欲解决中国问题，对军阀扰乱这一回事，必不会没个办法安排的；非明白切实的说出来，不足以服人，即我欲表示赞成，亦无从赞成起。

总之，我于先生反对今之所谓革命，完全同意；但我还不大明白，先生为什么要反对。先生那篇文太简略，不足以说明，

或者先生想的亦尚不深刻周密。所以我非向先生请教不可。先生说的好：“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也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我今便是指出疑点来，请先生再彻底想想，不可苟且模糊。先生亦曾谦虚地说：“我们的观察和判断自然难保没有错误，但我们深信自觉的探路总胜于闭眼睛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并且希望公开的讨论我们自己探路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得着更正确的途径”。据我个人所见，先生的判断大体并不错；我尤同情于先生所谓“自觉的探路”，我只祈求先生更自觉一些，更探一探。我便是诚意地（然而是很不客气地）来参加先生所希望公开讨论的一个人，想求得一更正确的途径，先生其必许我么？

如果先生接受我的讨论，我将对于我所相对同意的先生所主张的那“根本态度和方法”，再提供一些意见；我将对于我所不甚同意的先生所说的那“目的地”，再表示一些意见。总之，我将继此有所请教于先生。

·说及那“目的地”，我还可以就此说几句话。先生文中既谓，“在我们之前，应该先决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的目的地；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先决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想到那儿去，又何必探路呢？”是指示非先解决此问题不可了。乃随着举出国民党国家主义派共产党三种说法之后，没有一些研究解决，忽地翻转又谓：“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在讨论这三个目的地，因为这种讨论徒然引起无益的意气，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了的笔墨官司”。岂不可怪！先生怕打官司，何必提出“我们走哪条路”的问题，又何必希望公开的讨论？要公开讨论我们走哪条路的问题，就不要怕打笔墨官司才行。既于此不加讨论了，乃

于后文又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而说，“这是我们的目的地”。难道要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是国家问题，社会问题，——将旁人意见，——而且是社会上有力党派的意见——搁开不理他，只顾说我的主张，就可解决了的么？

总之，我劝先生运思立言，注意照顾对方要紧。

十九·六·三·北平。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333—342页，

1932年9月，村治出版社。

《村治》，1卷2期，1930年6月16日。



##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 一 觉悟时机到了

我在本刊第一期，《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中，说明我现在的见解主张，是由过去几年的烦闷开悟而得。这是我个人的开悟么？这是中国民族的开悟！中国民族以其特殊文化迷醉了他的心，萎靡了他的身体，方且神游幻境而大梦酣沉，忽地来了膂力勃强心肠狠辣的近世西洋鬼子，直寻上家门；何能不倒霉，不认输，不吃亏受罪？何能不手忙脚乱，头晕眼花？何能不东撞西突，胡跑乱钻？……然而到今天来，又何能不有这最后的觉悟！

天下事，非到得最后不易见出真相；非于事过后回转头来一望，不能将前前后后的事全盘了然于胸。我们今天固已到得这时机，真是所谓“可以悟矣”！

### 二 所谓近世的西洋人及西洋文化

说到西洋人，就是指其近世的而言；这好比说到印度人或中国人，就是指其古代的而言一样。今之所谓西洋人和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到得近世才开出来的玩艺。

“在1800与1900年间，欧洲经过一次大革命。其结果，

相沿传下之封建制度，君主、贵族、特权、驿车、烛光为特征的欧洲文化归于破产。代之而起者，即今日之所谓西洋文化（western civilization）。这个文化的特征，乃是平民主义，选举制度、工厂、机器、铁路、汽车、飞机、电报、电话和电灯。（中略）是以在1750与1850年间，欧洲之进步已可比拟由石器时代而进于铜器时代。或是由铜器时代而进于铁器时代。而在此同一百年内，无论亚洲人或非洲人，仍然沿袭故旧，其所生活所作为于所思想者，实与其祖先数千年前之情形无稍差异。

世界是一个悠久而辽阔的大地，实际上已有无数年代的发展；在其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才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古代希腊，埃及和巴勒斯坦文化极相悬殊，然各能平行发展，毫无抵触。即在十八世纪时，欧洲、亚洲、与非洲之文化和野蛮，也是各自循其历史而发展；纵然有时交换理想、宗教、或货物，且亦不免有冲突的发生；但就全体说，实在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十九世纪之新欧洲文化，则变更一切了。这个文化是一种好战喜争与支配利用的文化；而其这种威吓形态，是许多原因助成的。因机器之发明，交通运输方法大为进步，缩短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在十九世纪以前，因交通运输之困难，致各大陆与各种文化间完全孤立绝缘；虽然有征服和殖民的事实，但是多属偶然，而且没有多大影响。

这个由产业革命所发生的新西欧文化有一个特质，就是在欧洲以外完全是掠夺的。就经济方面说，必须多数市场与大宗原料。产业愈工业化，则开拓新市场与新原料来源愈为必须。因此发生了对于亚洲、非洲、澳洲与南美洲

的经济侵略。这便是在各洲民族感觉新文化压迫力的第一方法。临于亚洲与非洲方面的这种压迫具有其特别形式，使十九世纪之帝国主义迥异于前世纪之政治侵略，或文化竞争。因交通运输上机器之发明，给欧洲人以绝大权力，使能开拓远方土地以达其工商业之目的。至如工业机器之发明与新式工业之兴起，则已完全变动了世界自然力的均衡 (balance of physical power in the world)。在十九世纪以前，各大陆文化平行发展，此一文化并无压服彼一文化之优势。亚洲军队为争此优势，常能与欧洲军队接战；非洲人亦能恃其毒箭、湖泽、丛林与蚊虫以求自卫，而与肩荷枪弹腰带水瓶之欧洲人相抵抗，但是这种情形不久就完全改变了。亚洲人之生活及战术与其十二世纪时之祖先无异者，顿觉其已陷于新式枪炮、军舰、飞机、铁路各种利器之重围中；更有为彼所未见且不识者，即所谓近代国家内新式工业之有组织的权力 (the organized power of modern industry in a modern state) 在。这样一来，无论亚洲人，或非洲人，都没有抵抗欧洲人意志的力量了。

所谓“近代国家内新式工业之有组织的权力”一语，实足显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与欧洲对世界关系上之另一特质。在由产业革命所发生，并由盲目经济势力所引诱，以谋操纵亚非两洲市场与出产之制造家、商业家和资本家的背后，更站立了一个由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所产生之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近代国家。这种国家的政府权力常有意或无意的，直接或间接的，被其资本家利用以侵略其他洲土民族，而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这事实极为显著，其影响至足惊异。曾有一次迅速而极凶恶之世界征服为人类

历史上所罕见者。在1815与1914年间，亚洲、非洲、与澳洲几全部皆直接或间接屈服于欧洲国家威力之下”。

这是英国学者乌尔弗 (Leonard woolf) 近著《帝国主义与文化》书中一段导言，所说虽是普通，而话甚简捷。我于此，不愿用我自己的笔墨，来叙述西洋人和西洋文化；一则是自己在学问上的自信力不够；二则是恐怕人家对我亦信不及。我只从这里指出请大家注意之点，则我的意思即尽足表达了。我请大家注意者三点：

一、西洋人是新兴的民族；西洋文化是从近代开出来的新玩艺；

二、西洋文化是以如飞的进步，于很短期间开发出来的；

三、西洋文化具有如是特异地强霸征服力及虎狼吞噬性。

这三点亦都是普通常说到的，然我为促大家注意，更引乌尔弗书的一段，不厌求详地证明他。

“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与产业革命把欧洲的社会结构完全变更了。散居村落的农民因以改变而为工商业的城市居民。这些十九世纪工业化的国家较之十八世纪的农业国家远没有自给自足的可能，所以不能不发展一种组织完密而复杂的国际商业制度。我们可说这个时代是机器、工厂、股分公司、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及财政国际化的时代。这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情形，再看政治方面，这确是由君主政体或贵族政治转向所谓德谟克拉西政治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期间，各工业国家的政治权力转移到新兴中间阶级 (new middle class) 的手里；尤其是这个阶级里面有势力的份子如财政家，工业制造家与商人操纵了政权；所有政府机关是完全仰承这个阶级的意旨。而这个时期文化

的特色便是工商业的权威，公私财富的累积，物质事物的先占，理性和科学的心理态度，物质昌盛的理想与自由平等的思潮。

我们由新文化的几种特色看去，就知道其影响绝对不仅限于欧洲，而必然的趋势是要向外扩展冲压到亚非两洲的民族与文化，随着新运输方法的进步，经济势力更强迫此新文化扩张其经济关系到更为广阔的范围，新兴城市的居民必须由国外输入食物才足以自给，新式制造工业必须有热带出产的原料供给；而机器廉价出产品的发达，更有搜掠世界矿产的必要。这样一来，其结果便有国际贸易的大扩张。同时向欧洲工业制造家原料供给地的各洲，也更加重要成了销纳欧洲工业出产品的市场。而且因为欧洲各国保护关税主义的盛行，不易开拓市场，是以欧洲工业制造家更觉有在亚非两洲多觅新安全市场的必要。

这个经济冲动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欧洲工商业化的新文化和亚非两洲民族的短兵相接。而第一次接触实在是经济的。非洲，印度，锡兰，中国与日本开始认识西方文化，是由于商人及贸易公司的关系，当然在这新文化的后面也就感觉到了欧洲国家的威力。因为文化所包含的，一半是实质的事物如火车，飞机，军舰和枪炮，一半是人们内心的信仰和欲望。说到这里，我们似乎相信人们头脑中的理想很能决定他们的历史及其文化的命运。如十九世纪欧洲人的头脑中有些事情思索着，就必然的先之以商人在亚非两洲的试探，继之以欧洲国家的干涉。我们知道“经济竞争”(economic competition)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本理想。税率与保护关税政策是这个竞争里面的武器，厉

行保护关税是给工业制造家和商人一个很大打击。所以亚洲与非洲的富源和市场还未及完全开发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国际经济竞争的对象。在这个竞争里面，各国的商人与资本家自然要请求本国政府的援助。欧洲列强利用这个时机，一面可以夺取并统治国外的领地，一方为其商人和工业制造家开拓了良好的市场与原料来源。这样一来，便是剑及履及的旗帜随着商业走，商业跟着旗帜跑了。

影响帝国主义历史的另一种思想，便是可以代表十九世纪文化一种特色的国家主义的爱国心（nationalistic patriotism）。欧洲的国家主义很早就变成了一种宗教，以国家为其尊崇的物象。不久帝国的理想和国家主义者爱国理想发生了密切关系。一个帝国比较一个欧洲国家大，乃是一个更大的国家；而一个更大的国家比较一个小的国家在国家主义者的心目中是一个更大的偶像。所以欧洲商人对于国外市场的竞争就随着爱国者对于国家光荣竞争的心理而更加奋进了；因为在亚洲或非洲获得了一块土地，在一方面是经济的获利，而在另一方面又是爱国者的天职。

既是这样，所以附着经济竞争，实用效率，开拓、武力和国家主义各种理想的西方文化，便直接袭击了亚洲与非洲。但是除此以外西方文化还带了一类由法国革命所得来的理想。这便是德谟克拉西，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这些理想对于帝国主义后半历史有极大影响，就是激起了殖民地或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以上我们只是由欧洲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然亚非两洲的形势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当新文化在欧洲开出这样茂盛之花的时候，亚洲人与非洲人仍然是在他们固

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情形之下过生活。如果我们稍为考察中国，日本及印度的情形，就知道这些民族依然生活在一种组织牢固的村落社会；这种社会是古代文化的产物，而这种文化的特色是安静的，宗教的、形式的，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这些东方民族已经发展了他们本身精巧形式的政府制度，社会阶级，国民传说、伦理标准，人生哲学、文学艺术和雕刻。至如非洲方面虽然大都是原始民族，但是他们渐渐有了特殊形式的社会和政府制度。（中略）

我们知道挟着西方新文化而与亚非两洲相接触的原始冲动是经济的。凡是替帝国主义作先驱的欧洲工业制造家和商人，他们来到亚洲与非洲都是有一定经济目的，就是贩卖棉花或棉布而收买锡铁，橡皮，茶叶，或咖啡。但是在西方文化的复杂经济制度之下进行这种业务，必须使亚非两洲的整个经济制度适合或同化于欧洲经济制度而后可。这种同化工作已经由欧洲工业制造家、商人、财政家或欧洲政府在其威力、指挥和利益之下积极推行。在这个过程中里面，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完全改变，固有文化的基础多被破坏，而给他们感触最大的，就是坐视异国政府用威力来强制推行一切外来的事物。

我们相信以前世界上一定没有像这样剧烈的事情发现过。

我再请大家注意认识的，便是西洋文化里面，资本主义的经济，新兴中间阶级的民主政治，近代的民族国家之“三位一体”。继此又可认识出其富于组织性，而同时亦即是富于机械性。乌尔弗书中亦说：

我们试将今日欧洲政府，工业，商业财政各种精密

制度和十八世纪的简单制度比较，就可知道近代文化和过去文化的差别所在，各种制度的精细与复杂确是近代文化的要害之点：如果除掉了这个精细与复杂要素，我们就立刻转到了前世纪的生活状况与文化形式。

所谓精密复杂就是组织性，亦就是机械性，其文化的强霸征服力和虎狼吞噬性，实藉着这组织性机械性而益现威力，并成为不可勒止的狂奔之势。凡走上这条文化路径的民族无论在欧在美抑在东方如日本，都成为世界强国，所谓“帕玩”(Power)者是。就从这个名字，其意可思了。其实这一个字所含的意味，亦就可将西洋全部文明形容得活现，所以有人说西洋文明即可称之为“帕玩”之文明（日本人金子马治尝为此说）

要而言之，近代的西洋文化实是人类的一幕怪剧。这一幕怪剧至今尚未演完；我们上边所举，更未足尽其万一。我们还应当要举说他侵略非洲、印度时演出怎样贪残惨酷；——注意，这是与个人贪残惨酷不同的、文化之贪残惨酷。我们还应当要举说他在民族社会内演出怎样强悍猛烈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例如1925年的英国大罢工。我们还应当要举说他在国际间演出怎样明争暗斗以迄1914年空前的世界大战之爆发。我们还应当要指出他在最近未来又将演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应当要推论他——这一幕怪剧——将演到什么地步而结局。自一面言之，这一幕剧亦殊见精采，值得欣赏；然而不免野气的很，粗恶的很。

### 三 中世的西洋社会和他们的文明程度

现在我们自不免要追问：这一幕热闹剧是怎样发生的呢？那须回头看近世以前的——中世纪的——西洋社会和他们的文明



程度。

中世纪的西洋社会是所谓“封建制度”(Feudalism)的。此封建制度在北欧，西欧，南欧各地方不能都一模一样；更且是其中有些情形，已不易确考，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说法亦都不一样。但我们如不晓得这封建制度，则中古千余年间之欧洲史即茫然无从说起。他大概是这样；那时社会都是靠农业，而土地则都分属于君主，大小诸侯、僧侣寺院、骑士等所有；其从事生产的农民，或曰农奴，则附于土地之上而亦各有所归属。于是社会中显然成为两大阶级；一面是领有土地者之贵族僧侣；一面是占绝对大多数而服役的农奴。各领主于其采邑(Manor)大多是形成一个一个的村庄；领主宅第居于中央；农奴绕居其四周；其外围，即为耕地；又外为林地；又外为公用牧场之草地。农奴为领主耕耘，服定期及临时劳役，节日纳贡，尤要在绝对服从。据说：〔1〕

- 一、农奴不经领主的承认，不能离去他的采邑，而到别个采邑。
- 二、农奴应依照领主所命令的方法与分量而从事任何的勤务。
- 三、当领主认为有收回之必要时，农奴应将其一切之人与物权奉还领主。

农奴不能有任何权利；他的不动产不用说，就是动产亦完全属领主所有。〔2〕又亚西来教授说：从Glanyill时代到爱德华四世

---

〔1〕W. Page: The End of Villainage in England, 今此据《中世欧洲经济史》(民智书局译本)。

〔2〕Maine: Early and Custom, 今据同前书。

时（十五世纪）的法理论上，都说农奴绝对不应有任何的所有权。此外，农奴还要常受种种琐细的干涉与束缚。例如：不得领主许可，不能结婚，（有处领主还享有所谓初夜权）；不得领主许可，不能卖牛；女子出嫁到外方，要课其父母一定赔偿金，等等。

在这时，统治权是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领主在他的采邑中，有些职员小吏督管或料理种种事务。更其要紧的，则有“采邑法庭”，其裁判官便是领主的管事人充任。据说：〔1〕

每个“采邑国家”的管理，差不多都由同一原则组成的。国家机关是与封主（领主）的经济管理机关合在一起的。

封主个人的佣仆，也好似国家的官吏一样。如马舍管理员，封主的寝室侍从，文件保管员以及酒室等，一面替他们主人照料门户和经济，同时又为国家管理机关的指导者，料理军队财政法庭和行政等事务。愈大的独立的封主，实际上亦愈少为佣仆，而多为国家的高官。

所谓政事或行政就是这样。政治大权操握在贵族领主手中，而贵族多是不读书没教育，世代作威福，不晓得什么政治的。

采邑的经济，是专为满足私自的地方需要，不为销售而生产。他是自给自足的，完全闭锁的经济；因为每一个采邑都是离开其他采邑而可独立的；差不多不取任何东西于外方，亦不为外方生产任何东西。除非当时封建地主想要贵重的武器，或丝织的长套，金石嵌的装饰品等，才须转向外来的商人。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从这样封建制度社会开出来的。货

〔1〕《世界社会史纲》132页，平凡书局译本。

币盛行，工商业发达起来，交换经济打破了闭锁经济，封建制度才站不住，而资本主义代兴。故尔封建制度的毁灭，以经济进步为主因，而人为的革命助成之。其毁灭时期，在欧洲各处遂亦迟早不同；英国是在十七世纪，大概从依里莎白女王时起，到“三十年大战”时代（1558—1648年）；法国是在十八世纪，1789年大革命时，国会乃议决废除农奴制度；德奥又在法国之后，如普鲁士在十九世纪初叶者是；俄国则直待至十九世纪，1861年才有解放农奴的命令，而且实际问题还并没解决。

我叙说这些个干什么？我意在请大家注意认识几点：

- 一、在中世西洋社会，是一阶级这样绝对地压制并剥削他阶级；自非惹起大反抗，大冲决而翻过来不可。
- 二、社会中似这般绝对地压制与剥削，普遍地存在着，显出文化很低的征候。（无论从施者或从受者那面看）。
- 三、似此野蛮低下的西洋社会，实距今不甚远的事；——一二百年前的西洋人，其文明程度便是如此可怜。

请大家先记取这三点。我们将再检看中世纪西洋人的文明程度。于此，则就要看他们的宗教。这不但因为中世纪千余年间，是整个的宗教时代；更为宗教是那时文化中心之所寄，文明程度之最高点，我们先看宗教在当时的势力：〔1〕

教会为欧洲中古最重要之机关；中古史而无教会，则将空无一物矣。

中古教会与近世教会——无论新教或旧教——绝不相同。言其著者，可得四端：

第一，中古时代无论何人均属于教会，正如今日无论

〔1〕何炳松编译：《中古欧洲史》，127页。

何人均属于国家同。所有西部欧洲无异一宗教上之大组织，无论何人，不得叛离，否则以大逆不道论。不忠于教会者，不信教义者，即叛上帝，可以死刑处之。

第二，中古教会与今日教会之端赖教徒自由输款以资维持者不同。中古教会于广拥领土及其他种种金钱外，并享有教税日 Tithe 者。凡教徒均有纳税之义，正与吾人捐输国税同。

第三，中古教会不若今日教会之仅为宗教机关而已，教会虽维持教堂，执行职务，提倡宗教生活，然尤有进焉。盖教会实无异国家，既有法律又有法庭，并有监狱，有定人终身监禁之罪之权。

第四，中古教会不但执行国家之职务而且有国家之组织。当时教士及教堂与近世新教不同，无一不属于罗马教皇。为教皇者有立法及管理各国教士之权。西部欧洲教会以拉丁文为统一之文字，凡各地教会之文书往来，莫不以此为准。

教皇既统治西部欧洲一带之教会，政务殷繁，可以想见，则设官分职之事尚矣。凡教皇内阁阁员及其他官吏合而为“教皇之朝廷”（Curia）。

此外为主教者，并有管理主教教区中一切领土及财产之权。而且为主教者每有政治上之职务。如在德国，每为君主之重臣。最后，为主教者每同时并为封建之诸侯而负有封建之义务。彼可有附庸及再封之附庸，而同时又为君主或诸侯之附庸。吾人使读当日主教之公文书，几不辨主教之究为教士或为诸侯也。总之，当时主教义务之繁重，正与教会本身无异。

教会最低之区域为牧师。教会之面积虽大小不一，教徒之人数虽多寡不等，然皆有一定之界限。凡教徒之忏悔、浸礼、婚礼等仪节，均由牧师执行之。牧师之礼拜堂，为村落生活之中心，而牧师则为村民之指导者。

这在中国人看来，未有不诧怪者，为什么宗教僧侣要称王作帝，负起政治上责任来？又为什么能取得这大势力？这就为他们对于他们以外的人——无论下层阶级或国王贵族——实为最智慧最有知识教育，为文化之所寄的原故，希腊罗马的文化，经那北方过来的野蛮民族侵入破坏之后，秩序大乱，文物荡然；而先时由东方传过来的希伯来宗教教士则能为之保存一些。历史家说明当时的情形云：〔1〕

西罗马帝国政府虽为蛮族所倾覆，而蛮族卒为基督教会所征服。当罗马官吏逃亡之日，正基督教士折服蛮族之时。昔日之文明及秩序，全赖教士之维持；拉丁文之不绝，教会之力也；教育之不尽亡，亦教士之力也。

教会之代行政府职权，并非僭夺，因当时实无强有力之政府足以维持秩序，保护人民，则教会之得势，理有固然。凡民间契约，遗嘱及婚姻诸事，莫不受教会之节制；孤儿寡妇之保护，人民教育之维持，均唯教会之是赖。此教会势力之所以日增，而政治大权之所以入于教士之手也。

据说西罗马帝国瓦解以来六七百年间，教士而外，直无通学问者；所以在十三世纪时，凡罗马人欲自承为教士者，只须诵书一行以证明之。因为这样，所以“各国政府之公文布告，端赖教士之手笔；教士与修道士无异君主之秘书，每有列席政务

〔1〕何炳松编译：《中古欧洲史》，22页及28页。

会议俨同国务大臣者，事实上，行政之责任亦多由教士负之”。〔1〕

基督教士既然成了彼时社会最高明的先生，则我们只须看当时那基督教高明到如何程度，则中世西洋人的文明程度可知矣。但我们要叙说旧日基督教的迷信可笑，顽固可怜，和十六世纪教会的腐败罪恶，实不胜说，我们只须看为宗教起的惨杀恶战，绵亘与蔓延，无穷无已，便足令中国人咋舌！“宗教改革”运动起后：

英王 Henry 曾亲身审判信奉 Zwingli 主张之新教徒，并引据圣经以证明基督之血与肉，果然存在于仪节之中，乃定以死刑而用火焚杀之。1539年国会又通过法案曰“六条”者：宣言基督之血与肉果然存在于行圣餐礼时所用之面包与酒中；凡胆敢公然怀疑者，则以火焚之，至于其他五条，则凡违背者，初次处以监禁及籍没财产之刑，第二次则缢杀之。

女王 Mary 在位之最后四年，虐杀反对旧教者前后达二百七十七人；多用火焚烧而死。

Charles 第五曾下令严禁人民信奉路德等派之新教。据1550年所定法律，凡异端不悔过者则活焚之；悔改者亦复男子斩首，女子受火焚之刑。在 Netherlands 地方人之被杀者至少当有五万人。

1545年法国王下令杀死新教徒 Waldensian 派之农民三千人。

1572年8月23日之晚，法王发令杀死巴黎之新教徒

〔1〕何炳松编译：《中古欧洲史》，134页。

不下二千人。消息既传，四方响应，新教徒被杀者至少又达万人〔1〕。

我们更不必多举了；其发生之长期内乱与国际战争亦不必说他。为什么他们多用火焚活人呢？因为不愿令他流血；流血便不合教会法律了。这便是当时的宗教之程度！中国历史何尝没有惨杀的事；然而像这样愚谬凶顽的大规模举动则没有。中国社会何尝没有迷信；然而像这样浅稚的愚迷，容在社会之下层或妇女有之而已。一是代表一社会文明最高点的上层，一是社会里程度低陋的下层，二者固不得同论。

我们于此可以明白，像前面所叙那蛮不讲人理的农奴制度所以能行，正为那时人是这般愚蠢的原故。我记起民国十七年夏间，有一日陪同卫西琴先生去访朱骝先先生。卫先生原是德国人，而朱先生则亦留德多年。因为谈乡村小学教育问题，卫先生极称中国乡下人之聪明可教，而极不主张官府去厉行所谓义务教育。他说德国国家厉行的义务教育，于许多乡间全无好结果。朱先生赞同他的话；因而说出一件他亲自遇见的事。他说，他曾由德国某地移居某地（此地是一矿区）；照例到警察那里去登记注册；适先有一廿余岁女子亦在办这手续，乃见那女子竟不能书写自己的姓名。他始而颇诧异，后才明白官办义务教育之无实，和德国乡下人生来的蠢笨。于是他们两位就齐声叹息。中国乡下人资质怎样胜过德人，因为中国乡下人是没曾受过一点伤；而德国乡下人则将从那酷虐的农奴制度下解放不过两代，千数百年的压制锢蔽，受害太深，脑筋不开化。当时听过他们的话后，使我益深深省识得所谓封建制度和中世纪西

〔1〕何炳松编译：《中古欧洲史》，277—281页。

洋人的粗蠢愚昧。

历史家称欧洲中古之世为黑暗时代 (Dark Age)，盖有由然。

#### 四 由中世到近世的转折关键何在

在今日说起来，似乎再没有文明过西洋人的了。即在仿佛百般看不起西洋人的我，亦不能不承认他在人类文化方方面面都有其空前伟大的贡献。二百年前尚那样野蛮，何以忽地二百年后一转而这样文明呢？前此似乎一无可取，现在何以忽地有这么多的成就出来呢？这个转折关键何在？这个转折关键，如我从来所认识，是在人生态度的改变。

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说明中国、西洋、印度三方文化之不同，是由于他们人生态度的各异。近世的西洋人，舍弃他中世纪禁欲清修求升天国的心理，而重新认取古希腊人于现世求满足的态度，向前要求去；于是就产出近世的西洋文化。此我十年前之所认识的，至今没变，而历久愈新，愈益深刻。这论调亦非独创自我，西洋历史家哲学家盖多言之，中国人亦有取而申言之者，我不过更加咬定，更体会得其神理其意义。读者最好取前书一为审看，今不暇多说，我们只能说两句。

我们先说欧洲中世的人生态度。欧洲中世的人生态度，是否定现世人生的，是禁欲主义；其所祈求乃在死后之天国。这是基督教教给他们的。基督教以为人生与罪恶俱来，而灵魂不灭当求赎于死后。历史家说：

古代希腊人与罗马人之观念，对于死后不甚注意，无非求今生之快乐；基督教则主灵魂不灭死后赏罚之说，其



主义乃与此绝异，特重人生之死后。因之当时人多舍此生之职业及快乐，专心于来生之预备。闭户自修之不足，并自饿自冻或自答以冀入道，以为如此或可免此生或来世之责罚。中古时代之著作家类皆修道士中人，故当时以修道士之生活为最高尚。〔1〕

相传中世教会以现世之快乐为魔；故有教士旅行瑞士，以其山水之美不敢仰视，恐被诱惑者。在这态度下，当然那为人生而用的一切器物、制度，学术如何开得出来？一世文化之创新，不能不靠那一世聪明才智之士；聪明才智之士倾向在此，还有什么可说呢？同时我们亦可看出，那封建制度所以得以维持存在，是靠多数人的愚蠢；多数人的愚蠢所以得以维持存在那么久，是靠为一世文化所寄的出世宗教。

然而人心岂能终于这样抑郁闭塞呢？无论锢蔽得多久，总有冲决的一天。果不其然，当中世之末，近世之初，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两件大事；而西洋人的人生态度，就于此根本大变了；——完全转过一个大相反的方向来。所谓“文艺复兴”便是当时的人因为借着讲究古希腊的文艺，引发了希腊的思想，使那种与东来宗教绝异的希腊式人生态度复兴起来。即我在前边揭出的；“舍弃他中世纪禁欲清修求升天国的心理，而重新认取古希腊人于现世求满足的态度，向前要求去”，是也。他把一副朝着天的面孔，又回转到这地上人类世界来了。所谓“宗教改革”则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说的明白：

“所谓‘宗教改革’虽在当时去改革的人或想恢复初时宗教之旧，但其结果不能为希伯来思想助势，却为第一路

〔1〕何炳松编译：《中古欧洲史》，26页。

向帮忙，与希腊潮流相表里。因为他是人们的觉醒；对于无理的教训，他要自己判断；对于腐败的威权，他要反抗不受；这实在是同于第一路向的。他不知不觉中，也把厌绝现世，倾向来世的格调改去了不少。譬如在以前布教的人不得婚娶，而现在改了可以婚娶。差不多后来的耶稣教性质，逐渐变化，简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帮手，无复第三路向之意味。勉励鼓舞人们的生活，使他们将希腊文明的旧绪，往前开展创造起来，成功今日的样子。”〔1〕

蒋百里先生在其《欧洲文艺复兴史导言》中，亦说的好：

要之，“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佳谷生矣，萑稗亦随之以出。一方则感情理智极其崇高；一方则嗜欲机诈极其狞恶，此固不必为历史讳者也。惟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现；一曰世界之发现。（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Renaissance were the discovery of world and the discovery of man）人之发现云者，即人类自觉之谓。中世教权时代，则人与世界之间，间之以神；而人与神之间，间之以教会；此即教皇所以藏身之固也。有文艺复兴而人与世界乃直接交涉。有宗教改革而人与神乃直接交涉。人也者，非神之罪人。尤非教会之奴隶；我有耳目不能绝聪明；我有头脑不能绝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绝判断！此当时复古派所以名为人文派 Humanism 也。

好了！炸弹爆发了！那北方森林中的野蛮民族，一副精强的体力，新鲜的血轮，将出得山来，就遇着闭智塞聪禁欲藏精的宗

〔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答案讲明的第三步”一节。

教，紧紧地圈收铜蔽，一直郁蕴积蓄到千年之久，现在迸裂发作起来了！而文艺复兴便是他的导火线。这一发就不可收。什么“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民主革命”，非美亚澳四大洲的侵略，地球上有色人种的征服，世界大战，“社会革命”……所谓近世西洋文化的怪剧，就是这样以奔放式而演出来的。而同时亦就是因这要求现世人生幸福的态度之确立，一世之人心思才力都集于这方向而用去；于是一切为人生利用的学术器物制度，才日新而月异，月异而岁不同，令人目眩地开辟出来。<sup>〔1〕</sup>你问他为什么忽地一转而为世界顶文明的民族？就是为此。你问他为什么忽地有这么多成就出来？就是为此。

我曾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指说近世西洋人所为人类文化之空前伟大贡献，综其要有三；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科学的学问，德谟克拉塞的精神是已；而审是三者无不成功于此新人生态度之上，因一一为之说明，读者可取来参看，此不多及。现在要请大家注意者，仍在此态度：

第一，要注意这态度为重新认取的，与无意中走上去的大不相同；——他有意识取舍理智判断的活动。

第二，要注意这态度，盖从头起就先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我”，而自为肯定；如从昏瞶模糊中开眼看看自己站身所在一般；所谓“人类的觉醒”，其根本就在这一点。（闻蒋百里先生译有《近世“我”之自觉史》一书正可资参

〔1〕 蒋梦麟先生在《新教育》（第五号）有《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述丹麦哲学家霍夫丁氏之言，极论文艺复兴为人生态度之改变之意。以为人生态度不同，则用力方向以异，而文化之有无开创成就系焉。其开首数语极扼要：我生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的生活，必有一个态度；我的能力就从那方面用。人类有自觉心后，就生这个态度；这个态度的变迁，人类用力的方向亦就变迁。

考)

第三，要注意这态度，就从“我”出发，为“我”而向前要求去，一切眼前面的人与物，都成了他要求、利用、敌对、征服之对象；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皆分隔对立起来；浑然的宇宙，打成两截。

总括起来，又有可言者。一即这时的人，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这是他一切成功之母；科学由此而开出；社会的组织性机械性由此而进入；西洋文化所以有其特异的征服世界的威力全在此。一即个人主义太强太盛。这亦是他一切成功之母，德谟克拉塞的风气由此而开出；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由此而进入；西洋文化所以有其特异的虎狼吞噬性盖在此。

## 五 中国人则怎样

中国人则怎样？中国人与西洋人是不同的！而有些人则以为中国人只是不及西洋人，不认为是“不同”。却是谁不知道这“不及”呢？但我则以为是因其“不同”，而后“不及”的；——如果让我更确切地说，则正因其“过”，而后“不及”的。

谁不知道这不及呢？以烛光和电灯比较，以骡车帆船和飞机火轮比较，一则未进，一则进步很远，还用说么？不独物质生活如此；社会方面，学术方面，精神方面，我早都比较过是不足的了。然而请不要这样简单罢！自世界有学问的人看去，中国之为不可解的迷也久矣！“亚洲的生产”“东洋的社会”不是在马克思亦不得以例外而看待么？马克思不是只可以亚洲的政治历史来证经济的停顿，而不能解明其经济所以停顿的原因

么？〔1〕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还存在不存在”？不是绞尽了中外大小“马学家”的脑汁，亦没有定论么？〔2〕奥本海末尔（Oppenheimer）作《国家论》，将世界上历史上一切国家都估定而说明得；却不是独指中国国家的特别例外么？我是见闻极陋的人，而我偶然翻书所遇着这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古怪神秘难解之谜的言论，在东西学者简直不可胜举；我亦没留心记数，更不须多数说以自壮。凡不肯粗心浮气以自蔽自昧的人，自己尽可留心去看好了。

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请你注意，不要昧心欺人，随便解释，或装作看不见：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这两大问题，如果你要加解释，请你莫忙开口，先多取前人议论来研究看！如你又要说话，我仍请你莫开口，再沉想沉想看！你真要说话了，我何敢拦；然而我希望宽待一时！这是于你有益的！

这中国社会的历久不变，文化的停滞不进，原为谈社会

---

〔1〕顾孟余先生《社会阶级论中几个根本问题》文中有云：“亚洲的政治历史实在是马克思一个难题。他曾说，“这种旧者死去新者复生的，然而在形式上永远不变的自足社会，这种简单的生产机体，是了解亚洲社会永久不变的神秘的钥匙。这个很特别的亚洲社会中，不断的表演国家的兴亡朝代的更易。至于这社会的经济要素的构造，是不受政治风潮影响的”。马克思的意思，是要用亚洲的政治历史，说明经济停顿，社会亦随着停顿，这个道理，由一方面讲，固然不错；但是我们于此自然而然要提出一问题，为什么亚洲社会的经济停顿？其原因究在那里？”

〔2〕此问题已成国内论坛聚讼之点；多少论文和成本著作都出来了。始而是中国共产党领着国民党喊打倒封建制度的口号，而国民党有学问人如顾孟余先生便先来否认中国封建制度的存在，惹起多少辩论，乃至今则共产党如陈独秀派亦出而否认了！据说俄国干部派与反对派剧烈政争，曾以中国问题为争点；而所以争则原于对中国社会认识之不同。干部派认中国是半封建的；杜罗斯基则认封建早没，资产已立。《三民》半月刊（第4卷第67期）宇心君《俄国党争与中国革命》一文，可参看。

史者谈文化者所公认，更无须申言以明之；然仍不妨说两句。我们说中国不及西洋，然中国的开化固远在近世的西洋人以前。当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蛮生活之时，中国已有高明的学术美盛的文化开出来千余年了。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其与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生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他在这三四千年中，不但活着而已！中间且不断有文化的盛彩。历史上只见他一次再次同化了外族，而没有谁从文化上能征服他的事。我们随手摘取一本《世界社会史》上的话：〔1〕

中国的文明，好像一个平静的大湖，停滞不动。这样的文明，自然不难吸收同化那经由土耳其斯坦而间接输入的印度文化的精髓——佛教。

当古代西洋文明没落以后，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历史的本流处于干涸状态的期间，中国文明的大湖反而现出了最汪洋的全盛时代。

那在第四世纪北方侵入来的所谓五胡蛮族，不久也被这湖水所吞没而同化了。这些蛮族，在北方建立了十六个几乎完全与中国文明相融合的国家，在晋朝灭亡后，约有一世纪半南北朝时代的战乱之间，与南方诸国相竞争相混合。到了第六世纪末叶，中国又渐渐统一于隋朝了。

其后三百余年隋唐两朝的治世，使中国成为当时的世界中最安定的文明国，达到繁荣的绝顶。那破坏于秦而复兴于汉的儒学，在这期间大为发达，产出绚烂流丽的诗文；又发明木版印刷术，因之唐朝的宫廷有了藏着几万册

〔1〕 上田茂树著（施复亮译）：《世界社会史》，46、48页。

典籍的图书馆。那佛教，也因为与印度直接交通，输入名僧经书，以致迅速地普及起来；各流各门的钟楼伽蓝，耸立于一切深山冷谷之内；幽雅庄严的佛书，佛像，把当时美术的显著的进步流传于今日。然而就社会全体来说，并没有产生什么本质的进步，和根本的变化。他们的经济生活，依旧一点没有脱离古代以来的旧套，在土壤肥沃的大平原里保守着那祖先传来的农业生产所生的社会制度；中国人便安然的在这种静稳和幸福的范围内过活。商业与货币，虽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决没有像古代希腊那样在社会内获得重要的地位。市场上物物交换，还流行得很广。这里并没有农奴制度，连兵农的封建的阶级差别，也不甚明确。万物宽裕而且悠长的这个巨大的社会，却妨碍了那奔放不羁的冒险的活跃和独创的发展。

在唐朝末年，虽有了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者通商，与沙拉星文明接触，及基督教的输入等历史事件，也不能成为什么动因和刺戟，连以前北方蛮族侵入在这沉滞的人类大湖里所掀起的那般表面的波纹也没有。

长期的安逸和倦怠，在支配者的宫廷里，产生了阴谋，紊乱和虐政。一般民众，只是糊里糊涂地期待天命的变革，“真命天子”的出世，即欢迎新的较善的支配者出来代替。但这只是改变支配地位和国号的政治上的大事件，决不是像上述那种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异的社会集团间的阶级或民族战争一样，引起社会的本质的变革。

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遂夺取中国的南部，把宋朝灭亡，建设了连结欧、亚两洲的一大蒙古帝国；这诚然是流入东洋史上中国文明的大湖里的外来蛮族的最大的

浊浪。然而就是这个浊浪，也仅仅浮动于这悠久的大湖的水面上，并没有像侵入罗马的日尔曼人那样掀起了根本倾覆湖床的怒涛；不过一百年光景，在十四世纪的中叶，又被中国的原住民族明朝所灭亡了。

中国民族在今日好比七十老翁，而西洋人只是十七八岁小伙。如果简单地说，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不及西洋进步；那就如说七十老翁身体心理的发育开展太慢，慢至不及十七八岁的孩子阶段！社会生命或不可以个体生命相拟；然而这一类“进步太慢，落后不及”的流俗浅见，则非纠正不可。

普通人总以为人类文化可以看作一条路线，西洋人进步的快，路走出去的远；而中国人迟钝不进化；比人家少走一大半路。所以说“产业落后”，“文化落后”，落后！落后！一切落后！然而我早说过了：“……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洋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1〕他将永此终古，岂止落后而已！质言之，他非是迟慢落后；他是停滞在某一状态而不能进。束缚经济进步的土地封建制度，像欧洲直存在到十七八世纪的，在中国则西历纪元前二百多年已见破坏了；而却是迄今二千多年亦不见中国产业发达起来。这明明是停滞在一特殊状态；万万不能说作进行迟慢。大概许多有眼光的学者都看出是停滞问题，而不是迟慢的问题。但一般人模糊无辨别力，多将停滞与迟慢混说不分；这于学术上，可以贻误很大。

现在我请求读者大家赐予十二分的注意！我们在前面指出

〔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中国文化的略说”一节。



西洋文化是以如飞的进步，于很短期间开发出来的；现在我们又知道中国文化是入于停滞状态既千余年；我们就应当怪问：他为什么飞？而他为什么停？这一飞，一停，岂是偶然的么？谁若没脑筋，谁可不发此问；如果不是没脑筋的，他就要大大怪问不解，非得到惬意贵当的解答不能放过！

其次，我将请大家看历史上中国文化，第二大古怪处——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今日国内论坛上，第一热闹事，即封建制度尚存在于中国社会否的聚讼；一面令我们觉得此讨论追究的不可少；一面又令我们觉得此讨论追究的好笑。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这是非弄清楚不可的，在这工作中，从经济的社会史眼光以为观察研究必不可少；而且是基本的，必须先作。那封建制度尚存在否，便成了当前不可避的问题。为什么又好笑呢？当为此研究时，实先有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和西洋走一条路线的一大假定；——因现在这经济的社会史眼光是由西洋社会养成而锻炼的。然而这一大假定不免是好笑的笑谈！大约亦必须本此假定而研究下去，然后自见其好笑，乃能取消此假定。然在聪明点的人，知于大关口处注意，则亦何待如此；只消从大体上一看，便明白二者不可相拟。偏有人执着地说：〔1〕

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亦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1〕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好了！中国社会方在未进状态，不敢与西洋现代社会比；比中世吧。请你看中国像欧洲中世那样的宗教制度、教会组织在那里？欧洲那时可说是完全在宗教下组成的一社会；中国历史上曾有这样的社会吗？欧洲那时几乎除了“教祸”“宗教战争”就没有历史；然而像这样的纪载似不容易在中国历史上找出一，二页！这类最容易触起人注意的大关目，都看不见，他尚何说。

然我欲大家注意者，尚不在组织制度之间。有眼光的人早应当诧异：中国人何竟不需要宗教？——从历史上就不需要？！——从其二千多年前历史上就不需要？！中国社会之“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是比无论什么问题都值得诧异疑问的。罗素论中国历史相传的文化，最重大之特殊点有三：一是文字以符号构成，不用字母拼音；二是以孔子之伦理为标准而无宗教；三是治国者为由考试而起之士人，非世袭之贵族；实则其余二者远不如“无宗教”之可异。自西洋文化之东来，欲以西洋政治代替过中国政治，以西洋经济代替中国经济，以西洋文学代替中国文学，……种种运动都曾盛起而未有已；独少欲以西洋宗教代替过中国无宗教的盛大运动。此因中国有智慧的人无此兴味，且以在西洋亦已过时之故。然由此不发生比较讨论，而中国无宗教之可异，乃不为人所腾说，则是一件可惜的事。

人类生活难道定须宗教么？宗教又是什么？照我的解释，所谓宗教者都是从超绝人类知识处立他的根据，而以人类情志上之安慰勸勉为事者。<sup>〔1〕</sup>人生极不易得安稳；安之之道乃每于超绝知识处求得之；为是作用者便是宗教。人类对他果需切至何

〔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宗教问题之研究”一节。

程度，只能于其作用发生后见之。我们知道人类文化上之有宗教，是各洲土各种族普遍存在的重大事实。文化每以宗教开端；文化每依宗教为中心，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其文化之统一，民族生命之久远，每都靠一个大宗教在维持。从过去历史上看是如此。这就尽足客观地取证其有自然的必要。我们又知道，宗教在人类文化上见衰势，乃由挽近人事有下列四点变动而来：一，富于理智批评的精神，于不合理性者难容认；二，科学发达，知识取玄想迷信而代之；三，人类征服自然的威力增进，意态转强；四，生活竞争激烈，疲于对外，一切混过。然而历史上的中国人固不具此条件。于是我们不能不问：二、三千年前历史上的中国人果何以独异于他族而得逃于此“自然的必要”？果何所依恃而能使宗教不光顾到中国来？此诘非怪事？谁能说中国人没有迷信，然而中国人没有一大迷信——整个系统的宗教信仰。谁能说中国人没有宗教行为；然而中国人没有一大规模的宗教行为——国家制度团体组织的宗教活动。似此零星散见的迷信，无大活动力的宗教行为，实不足以当偌大民族统一文化中心之任。（亦显然地不在此，而别有在。）以若大民族，若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维持树立其文化的统一者，其必有为彼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然此中心在那样古代社会，照例必然是一个大宗教无疑的。却不谓二千年前中国人之所为乃竟不然——他并没有这样一个大宗教；诘非怪事耶？

我们为什么不说，“中国没有宗教”；而说，中国“几乎没有宗教”？这是几层意思。“几乎怎样”，意即谓不是“干脆怎

样”。中国如我所说，原是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他就没有干脆的事。此其故，待后说明。一般人就因不明此理，总爱陷于无益的聚讼纷争；如争什么“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不是封建社会”等类。其实从其“几乎是”言之，则几乎是；从其“几乎不是”以为言，则亦不是也。彼固隐然有其积极面目在；但你若不能发见其积极面目，则未有不徘徊疑惑者。或致不得已从其负面（消极方面）而强下断语，如说：“只有在与‘前资本主义的’同其意义而应用时，我们可以把中国社会的构造唤作封建制度”〔1〕照此例推之，则亦可说：“从其前于科学发达而言，则中国可以说作有宗教”；岂非笑话！是否封建，有无宗教，本不干脆；倘更有意为之曲解，则更没办法矣。然你能从大端上发见其积极面目，固将知其不是也。

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有人即以孔子之教化为宗教；这就弄乱了宗教固有的范型。孔子的教化全然不从超绝知识处立足，因此没有独断(Dogma)，迷信及出世倾向；何可判为宗教？不过孔子的教化，实与世界其他伟大宗教同样的对于人生具有等量的安慰勸勉作用；他又类似宗教的仪式；——这亦是我们只说中国几乎没有宗教，而不径直说没有宗教的一层意思。孔子之非宗教，虽有类似宗教的仪式亦非宗教，这在冯友兰先生《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一文中，说得很明。〔2〕这篇文全从儒家固有理论，来指点儒家所有许多礼文仪式，只是诗是艺术而不是宗教。他们一面

---

〔1〕E. Yarga 著《中国革命的诸根本问题》一文中有此语；此语实不通。此岂非说，以其不白故谓之黑乎？

〔2〕冯君此文见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第三期。

既妙能慰安情感，极其曲尽深到；一面复极见其所为开明通达，不背理性。我们摘取他总括的几句话于此：

近人桑载延纳（Santayana）主张宗教亦宜放弃其迷信与独断，而自比于诗。但依儒家对于其所拥护之丧礼与祭礼之解释与理论，则儒家早已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古时所已有之丧祭礼，或为宗教的仪式，其中或包含不少之迷信与独断。但儒家以述为作，加以澄清，与之以新意义，使之由宗教而变为诗，斯乃儒家之大贡献也。

此下他就丧葬祭各礼，一样一样指点说明，皆饶有诗或艺术的趣味，持一种“诗”的态度。他并且指说，不但祭祀祖先如此，对任何祭祀亦持此态度。儒家固自说：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巫然后决大事，非以为求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

儒家所为种种的礼，皆在自尽其心，成其所以为人，没有什么求得的对象。象一般宗教所以宰制社会人心的，是靠着他的“罪”“福”观念；——尤其是从超绝于知识的另外一世界而来的罪与福，存在于另外一世界之罪与福。而孔子对人之请祷，则曰，“丘之祷也久矣”！对人之向媚奥媚灶，则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如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全不想借着人类对另外一世界的希望与恐怖，来支配宰制人心，是很明的。这样如何算得宗教？

现在我们可以说到本题了。中国没有一个大宗教，孔子不是宗教，都已分明；则历史上中国社会人生是靠什么维持的？这“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怎样度日过活来？这非求得一个答复不可。当那古代没有科学，知识未充富，理智未条达，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大而自然的威力方凌于人类之上，谁个民族社会不靠宗教为多数人精神之所寄托而慰安，所由约束而维持？乃中国人有什么本领，能超居例外？宗教在古代是个“乘虚而入”的东西；何独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乃不能入？这些问题，谁若没脑筋谁可不想到；如果不是没脑筋的，他就要大大怪问不解，非得到惬意贵当的解答，不能放过！

## 六 解一解中国的谜

中国的谜（古怪可疑之点）本来随处可以发见；只怕不留心，留心多着哩！我今姑举上边两大疑问而止。凡欲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从此入手去求了解，便可豁然。这好比那大门上的锁窍；得此窍即可开此锁而开门看见一切。我一面指出锁窍，请大家有心人各自试探研究；我一面将再贡献一把钥匙，备大家试探时的参考采用；同时我亦借此说明，我前所言中国之于西洋是因“不同”而后“不及”，因“过”而后“不及”的所以然。

我这把钥匙还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提出的：

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人类生活人，所秉持的态度（即所以应付问题者）有三不同；因而人类文化有三期次第不同，

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即眼

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质上为我所可得到满足者。

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在所谓“他心”；——此其性质上为得到满足与否不由我决定者。

第三问题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乃还在自己生命本身；——此其性质上为绝对不能满足者。

第一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逼直向前要求去，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

第二态度是两眼常转回来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调和融洽我与对方之间，或超越彼此之对待，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得满足于内者。

第三态度——此态度绝异于前二者；他是以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

问题及态度，各有浅深前后之序；又在什么问题之下，有其最适相当的什么态度。虽人之感触问题，采取态度，初不必依其次第，亦不必适相当；而依其次第适当以进者，实为合乎天然顺序，得其常理。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

此其所由树立，盖从人类过去历史文化反复参证而得。古希腊人之人生盖类属第一态度，其文化即发于此；古中国人之人生盖类属第二态度，其文化即发于此；古印度人之人生盖属第三态度，其文化即发于此。总之，所谓世界三大系文化者，盖皆有其三不同之人生态度为根本。然综观人类文化至于今日，实尚在第一问题之下；而古之人唯希腊态度适相当，又不久中断；

中国印度则均失序不合，其所成就既别有在。近世之西洋人乃重新认取第一态度而固持之，遂开人类文化新纪元，大有成就；迄于最近未来，殆将完成所谓第一期文化。<sup>〔1〕</sup>在最近未来第一期文化完成；第二个问题自然引入。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态度。而完成所谓第二期文化。如是第三问题又自然引入；第三态度又将重新认取；而完成所谓第三期文化。此余前书大意，欲得其详，必审原书。

如果让我解一解中国的谜——顷才提出的两大古怪问题，则我仍将用我从来用以解开一切文化之谜的钥匙来解。

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不需要宗教？我的回答是：中国因为走入人生第二态度故不需要宗教了！既没有一个大宗教，则其一大社会之人生所由安慰而勤勉，所由维持而进行，又靠什么？我的回答是：他所靠的是代表人生第二态度所谓孔子一派的思想学问礼俗制度。

近二三百年来西洋人为什么飞？而近千余年来中国人为什么停？我的回答是：从中古欧洲史看去，他既郁蕴有非冲决奔放不可之势，一旦得人生思想之新解放，恰不啻由代表第一态度之人生观使这冲决奔放得一根据，得一公认；而恰好在人生第一问题下正需切这第一态度，以开发其第一期文化，种种恰好凑合，集全力以奔注于一点，如鱼得水，如虎生翼，安得不飞跃起来！中国文化的所以停滞，因其不持第一态度，就根本地冷息了在第一问题上之进展；而处于第一问题尚未解决之下，以基础条件之不备，环境之不合，其发于第二态度之文化亦只能达于可能的最高度而止，这样交相牵掣，就陷于绝境，苟外

〔1〕请参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因经济改正而致文化变迁”一节。



缘之不变，即永无新机杼之可开出；不停滞，又何待？其历久不变的社会，即此中重要现象之一，尽其社会构造之特殊，虽出于第二态度之人为调制，而究必以其在第一个问题上所得几许成就为下层基础，今在第一个问题上既无复进展，则社会其何由变？

关于答案的前提说明，既有前书，非此所及。所以我们就从解明答案说起。

宗教这样东西饥不可为食，渴不可为饮，而人类偏喜欢接受他，果何所谓呢？这就因为人们的生活多是靠着希望来维持，而他是能维持希望的。人常是有所希望要求，就借着希望的满足而慰安；对着前面希望的接近而鼓舞；因希望之不断而忍耐勉励。失望与绝望于他是太难堪。然而怎能没有失望与绝望呢？恐怕所希望要求者不得满足是常，得满足或是例外哩！这样一窥而尽，狭小迫促的世界，谁能受得？于是人们自然就要超越知识界限，打破理性酷冷，辟出一超绝神秘的世界来，使他的希望要求范围更拓广，内容更丰富，意味更深长，尤其是结果更渺茫不定。一般之所谓宗教就从这里产生；一般宗教，莫不以其罪福观念，为宰制支配人心之具，而祈祷禳祓成了必不可少的宗教行为，亦就为此。<sup>〔1〕</sup>如果我们这个解说不大错，则我们倘无所希冀要求于外，宗教即无从安立。这无所希冀要求于外的人生态度非他，即我所谓人生第二态度者是。历史上的中国人所以既不具挽近西洋致宗教于衰微的四条件，（如前第五段所陈），而能独若无所需于宗教，而宗教亦于中国古代社会独若

---

〔1〕此良未能概括所有宗教，较高宗教或面目不改，而内容意义变异；更高宗教则或面目内容全变；然一般之宗教则固如此也。

不能入者，只是因周孔的特别聪明教化，大大修正了或变化了当人类文化初期所不容少的有所希冀要求于外的态度，而走入人生第二态度的缘故。

说到中国的人生，俗常都以为孔子的教化实支配了二三千年的中国人，而西洋人对于中国之所知，更只于孔子的伦理而止；其实孔子的教化久已不得而见之，所贻留于后者不过是些孔子的语言道理，其影响到人生的势力是很勉强的，真正中国的人生之开辟一定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中最有力之成功者。周公并没有多少道理给人；——他给人以整个的人生。他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怎样能有这大本领？这就在他的“礼乐”。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得那古代社会的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替换得那宗教！中国文化之精英，第一是周公礼乐，其次乃是孔子道理。（孔子只是对于文武周公所创造的中国文化，大有所悟的一个人。）礼乐之亡甚早甚早，即真正的中国人生湮失已久已久。周秦之际已是王道衰，霸道起，两相争持之候（孙中山先生尝以王道霸道分别中西文化颇洽）；汉代去古未远，收拾余烬，仅存糟粕，仍可支持，至魏晋而衰竭，不复能维持矣，印度文化之佛教由是以入；唐代佛教盛行，中国人生（内容兼面目）于此呈一变例，由此异化之刺激而使固有路子稍得寻回，则宋人是已；然内容虽见活气，外面缺憾实多；明代继有发明，而其味转漓；有清三百年虽有颜李不世英豪，惜与墨子同为缺乏中国人的聪明者，自不足以继往开来；而大体上中国的人生远从两千年（汉）近从八百年（宋）递演至此，外面已僵化成一硬壳（体合人情的伦理渐成不顾人情的礼教），内容腐坏酵发臭味（儒释道三合化为文昌帝君教，读书人

咸奉之，贪禄希荣迷信鬼神)；自欧化东来予一新颖而剧烈之刺激，近数十年乃一面为硬壳之破裂崩坏，一面为腐臭之宣播扬达；苟非残生将次断命，便是换骨脱胎之候。盖不独于今日为西洋所丑化了的中国人不足以见所谓中国人生，即倒退六七十年欧化未入中国之时，固已陵夷衰败至最后一步，不成样子；——几乎从无宗教复返于有宗教。乃不谓罗素于民九来中国住得一年，对中国人生犹复称美不置；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1〕

吾人文化之特长为科学方法；中国人之特长的人生究竟之正当概念 (a just conception of the ends of life)。

中国人所发明人生之道，实行之者数千年；苟为全世界所采纳，则全世界当较今日为乐。

吾人深信自己之文化与人生之道，远胜于他族；然苟遇一民族如中国者，以为吾人对彼最慈善之举莫若使彼尽效吾人之所为，此则大过矣。以予观之，平均之中国人虽甚贫穷，但较平均之英国人更快乐。

其在中国，人生之乐无往而不在，斯中国之文化为予所赞美之一大原因也。

好动之西洋人处如此之社会，几失其常度，而不知向日所为之目的何在。及夫为时渐久，乃知中国人生之美满可贵；故居中国最久之外人即为最爱中国之外人。

素称冷静客观的罗素亦许独于此有偏见而挖扬太过，然总不能毫无故实。这就为中国人虽丧失他祖先的俊伟精神，而数千年之濡染浸淫，无论如何总还有一点不同处。中国的人生无他，只

〔1〕 罗素著：《中国之问题》，中华书局译本，191、195、4、186页。

是自得——从自己努力上自得——而已；此即其东别于印度，而西异于西洋者。此“自得”二字可以上贯周孔精神，而下逮数千年中国社会无知无识匹夫匹妇之态度，虽有真伪高下浅深久暂千百其层次而无所不可包；此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而我所谓人生第二态度，其所以几于措宗教于不用者，盖为此。

前引冯友兰先生论文，谓中国儒家将古代宗教修正为诗，盖正是以礼乐代宗教耳。在初时，非周公礼乐不能替换得宗教；然二三千年来为此一大民族社会文化中心之寄者，则孔子道理也。我们前说，“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言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维持树立其文化的统一者，其必有为彼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正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孔子之遗教。此中心在那样古代社会照例必然是一个大宗教——中国原来是需要宗教的，但为有了孔子就不需要他。这好比太阳底下不用灯；有灯亦不亮一样。孔子的教训总是指点人回头看自己，在自家本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理性）与自求（意志）。这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恰好相反；亦明明是人类心理发育开展上一高一下两个阶段。却是人们一经这样教训，要再返于那下阶段就难了。所以虽礼崩乐亡，而中国人总不翻回去请出一个宗教来，——不再用灯，散碎的宗教迷信不绝于社会间而总起不来，——灯总不亮。中国人自经孔子的教训，就在社会上蔚呈一大异彩，以道德易宗教；或更深切确凿地说，以是非观念易罪福观念。

罗素在他著的《中国之问题》中，曾深深叹异中国人没有

“罪 (sin)”的观念；又说：“在中国‘宗教上的怀疑’并不引起其相当的‘道德上之怀疑’，有如欧洲所习见者”。〔1〕中国人向来要凭良心讲理的，谚所谓“有理讲倒人”，“什么亦大不过理去”，皆足以见。凡我们之有所不敢为者，自恶于不合理，知其“非”也，欧洲人则惧于触犯神和宗教教条，认为是一种“罪”。这个分别很大。一是诉诸自己理性而主张之；一是以宗教教条替代自己理性而茫无主张。在中国社会虽然道德上传统观念时或很有权威，足以压迫理性，然此唯后来硬壳已成时有之，非古人原初精神。孔孟原初精神，如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君子不安故不为，汝安则为之”；皆彻底以诉诸自己理性判断为最后准归。欧洲社会只是有宗教，以宗教为道德，中国社会才真道德。这个关系很大，必须一为申论：

一是因诉诸自己理性，而抽象理解力大进，不复沾滞于具体的特殊名象仪式关系等。中国人最喜说，“宗教虽多，道理则一”的话，诚然是模糊侏侗的好笑。然亦正见其不注意表面名色仪式等，而注意各宗教背后抽象道理。这实是进了一阶段。

二是因反省而有自己抑制及对他人宽容的态度。欧洲人信一宗教为真，则以其余宗教为必假；由其宗教上之不宽容 (religious intolerance) 彼此仇视，致有遍欧洲千余年之教祸；中国人实无此偏见隘量与暴气。罗素云：“中国人之宽容，恐非未至中国之欧人所及料；吾人今自以为宽容，不过较之祖先更宽容耳。”又云：“道德上之品性为中国所特长，……如此品性之中，

〔1〕罗素著：《中国之问题》，35、189页。

予以‘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1〕这实比欧人进高一阶段。

一是因大家彼此都要讲理，而又有其一社会所共信共喻之理(孔子道理)，又有平和从容以讲理的品性，故社会自然能有秩序，不假他力来维持。旧日中国社会之维持，第一不是靠教会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国家的法律；——或者只可说是靠道德习惯。辜汤生先生尝讥西洋社会不是靠僧侣拿上帝来威吓人，便是靠军警拿法律来拘管人，〔2〕而西洋人自己亦说：“中国国家就靠着这千万的知足安乐的人民维持，而欧洲的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来维持的”。〔3〕好像宰制中国人的是公理，而宰制西洋人的是强权。我们很勿须客气地说，这实比欧人要高一阶段。

一是因讲理之风既开，人心之最高倾向乃唯在理。理是最能打动中国人心的东西。他实最有服善之勇气与稚量。虽然无论哪个民族哪个社会于其不相习的道理都不易接受，中国亦何能独外，然而恐怕没有再比中国人接受这样快，冲突扞格这样少的，因为他脑中的障蔽最少。科学与德谟克拉塞，中国人皆

〔1〕罗素著：《中国之问题》，194、211页。

〔2〕辜鸿铭先生以英德文写著《春秋大义》一书以示西人，其中有云：西洋之教人为善，不畏之以上帝，则畏之以法律，离斯二者虽兄弟比邻不能安处也。逮夫僧侣日多，食之者众，民不堪其重负，遂因三十年之战倾覆僧侣之势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权威。于是继僧侣而兴者则为军警焉。军警之坐食累民其害日过于僧侣，结果又以酿成今日之战。经此大战之后，欧人必谋所以弃此军警，亦如昔之摒弃僧侣者然。顾摒弃军警之后其所赖以维持人间之平和秩序者将复迎前摒弃之僧侣乎？抑将更事他求乎？为欧人计惟有欢迎吾中国人之精神，惟有欢迎孔子之道。（原书未见，此就李守常先生《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所引录者转录之）。

〔3〕德国F. Müller-Lyer著《社会进化史》，陶孟和译，第62页。

以理之所在而倾向之。中国人之革命率以趋赴真理之态度出之；其革命势力之造成乃全在知识分子，对于一道理之迷信与热诚的鼓荡。他并没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却含有道德的意味，这个关系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甚大，当别为文讨论之；此刻我们只指出请大家注意，中国近三十年一切改革或革命大抵出于所谓“先觉之士”主观上的要求，而很少是出于这社会里面事实上客观的要求。以前一切的贻误全由于此，但今后却仍无法舍此路而不由。

古时的中国人心思之开明远过于西洋，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西洋人唯入近世乃趋于开明耳。然我欲请大家注意者尚不在此。孔子使人心开明，宗教不起，而代之以道德，是固然已；但人类是何等难对付的东西，岂是“人心开明，宗教不起”，就算行了么？人心开明，正可以嗜欲放纵；宗教不起，正可以肆无忌惮，文化毁灭，民族衰亡，并不难由此而致（希腊罗马之往事殆即如此）。开明不难，开明而能维持其开明实难。这似就是靠道德了！却是老生常谈的道德教训就能行了么？开明是孔子的长处之易见者，而其真正的长处乃在开明的背后更深的所在。苟不能于此有所识得，即不为识得孔子，亦不能识得中国人生和中国文化。

人类是何等难对付的东西！古代所谓“圣贤英雄”莫不以愚蔽他，为好对付的；孔子乃独去其障蔽，使他心思开明，而后对付他，这是何等的大胆！这其中又是何等手段！一般人之对付犹非难，聪明人之对付实难。聪明人都是好怪的，你不显出些神奇高妙新鲜希罕的玩艺收罗不住他。孔子乃独以老生常谈，浅近平庸的东西摆在你眼前，说在你耳边，仿佛都是让人看了不起劲，听了要睡觉的，而他却不怕你不要。这是何等的

大胆！这其中又是何等手段！大胆是空有的么？手段是随便就有的么？自非有极高的眼光极深的见解，将人类是怎样一个东西，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完全洞彻了然于胸，其何能如此！呜乎，圣矣！这真可以俯视一切！（孔子不俯视一切，我替他俯视一切；孔子亦无大胆，无手段，抑本无对付人类之意，我替孔子作说明，不得不为是引人注意的说词耳。）

生物进化到人类，实开一异境。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中，而人类则以“有对”超进于“无对”。——他一面还是站脚在“有对”，而实又已超“有对”而入“无对”了。这就是说，一切生物，无法超离其“个体对外性”，——或简云“对外性”，因有时或为个体之集团故。他总要一面有所利用凭借，一面有所对待反抗，这是他辗转逃不出之局；而人类则可以超乎此。人类唯以超有对，故能有超利害的是非心，故有道德。人类唯以超有对，故能有真的自得，故生活非定靠希望来维持，更不必靠宗教来维持希望。人类唯以超有对，故能洞开重门，融释物我，通乎宇宙万物为一体。我们今日乃深有味乎中国人之言；“仁者人也”，“仁者与物无对”。除非中国人数千年白活了，于人类文化无所发明，无所贡献则已，如其有之，则我敢断言，便是他首先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认识了人的无对。有此认识者非唯孔子，然孔子实承前而启后，凡数千年中国人生中国文化所为与西洋大异其趣者，要唯以中国古人有此一点认识，前后相承，勉力趋赴，影响所被演成前所谓人生第二态度之所致耳。人生第二态度之于“无对”或即之，或违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百变不离其宗。然人生第一态度则正是人之“有对性”所表现发挥。中国人之精神与西洋人之精神，各有其在人性上之根据；然西洋人盖自人与一切生物所



同具之点出发；中国人则自人性中所以异乎一切生物之点出发。此问题太大太大，他日当为《人心与人生》一书专论之。

孔子就因为把握得人类生命更深处作根据，而开出无穷无尽可发挥的前途，所以不必对付人，而人自对付了，——人类自要归了他的辙。看似他收罗不住聪明人，而不知多少过量英豪钻进去就出不来。看似他了无深义，令人不起劲，而其实有无穷至味，足以使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你不要以为他平平常常就完了；——他比任何神奇者更神奇，他比任何新妙者更新妙。罗素在他书上说：“孔子之功何在，予实不知；读其书，大都注意于小端之礼节，教人以在各种之时会，处己之方法”。〔1〕泰戈尔对我谈，他诧异像孔子这样全非宗教而只是一种的人事教训，为什么亦能在社会上有根深蒂固伟大而长久的势力？〔2〕他们只见其处处割切人事的许多教训，而没发见他整个精神，一贯之道；外面的“中庸”看见了，内里的“高明”没看见。当然要对于他的价值和势力，生疑发闷而不解。其实假使孔子只中庸而不高明，只有许多教训和礼制而没有整个精神，一贯之道，中国的事倒好办了；——他不足以范围聪明人，聪明人很可以另开他路。中国人所为深入于人生第二态度，南北东西一道同风，数千年而不变，聪明才智之士悉向此途中之学问或事业用去（唯唐宋佛教

〔1〕罗素著：《中国之问题》，186页。

〔2〕泰戈尔来北京，徐志摩先生劝我与他为一度之谈话，我原意欲有请教于他者，不期乃专答了他之问。此段谈话将来须另为文叙述之。大致是因杨震文先生以孔子为宗教之一，泰戈尔则不承认孔子为宗教，引出他对孔子不解的夙疑，而我答之，当时多劳徐志摩先生为我翻译。

禅宗收去聪明英豪不少)，有如印度人之深入第三态度，聪明才智悉用于宗教者，以孔子大启其门，深示之路，后之人采之不尽，用之不竭，遂一入而不能出也。不然，则局于第二态度不可能，而人生第一态度或有可能已。唯人生第一态度隐昧开不出，就耽误了中国人！

你看科学为什么偏出于宗教障蔽最强的欧洲，而为什么中国人心思开明，无为之障蔽者，却竟尔数千年亦没有科学产生出来？这是什么缘故，你能回答么？这就为两眼向外看（第一态度）与两眼转回来看自己（第二态度）之不同而已。两眼向外看则所遇为静的物质，为空间（其实化宇宙为物质，化宇宙为空间耳；曰遇物质遇空间，特顺口言之。）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洽便适用之地。回来看自己则所遇为动的生命，为时间，〔1〕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不便适用之地。西洋天才英伟之伦，心思聪明向外用去，自就产生了物质科学和科学方法，更以科学方法普遍适用于一切。中国天才英伟之伦，心思聪明反用诸其身，其何从而产生物质科学和纯乎理智把戏的科学方法邪？其所成就盖早与西洋殊途；然而没有科学，就耽误了中国人。（老庄思想及道教、佛教或属第二态度或属第三态度，亦以此同为耽误中国人者，顾究非中国人生之正宗主脉，关系影响不如是重大。）

孔子不单耽误了中国的科学，并且耽误了中国的德谟克拉西。礼乐亡失，中国人所受用者为孔子之遗教；然此可粗判为

---

〔1〕为近三十年西洋哲学上之一新意义的“时间”，非俗常所说者。俗常所说为分段的时间，盖以空间的法式移用而来。此为西洋哲学接近东方哲学之一大变迁，非此处所及说。

思想学问及礼俗制度之二大部。思想学问仅为少数人所得享；礼俗制度乃普及于全社会。礼俗制度之时代性地域性极重，本不同乎思想之有个人性；以礼俗制度属诸孔子非诬则妄。然中国之有“伦理”，孔子似极有力，此伦理又为数千年礼俗制度之中心骨干，无甚大之变化。于是孔子乃有其任何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于人群所不能有之伟大而长久的势力。（此种伟大而长久的势力唯大宗教有之，然孔子固非宗教，此泰戈尔所以疑也。）中国人如果像罗素所说那样安乐幸福，亦唯此伦理之赐；中国人如果像前两年的时髦话有所谓“吃人礼教”，近两年的时髦话有所谓“封建遗毒”，亦唯此伦理之赐。

伦理者，盖示人之人生必为关系的；个人生活为不完全之人生。男或女，孑然一身，只好算半个人；必两性关系成立，全整人生乃于是造端；继之以有父子，又继之以有兄弟。——此即所谓家。家而外，又从社会关系而有君臣朋友。人生实存于此各种关系之上，而家乃天然基本关系。故所谓伦理者，要以家庭伦理——天伦——为根本所重；谓人必亲其所亲也。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依以为慰，所谓亲也。人生之美满非他，即此各种关系之无缺憾。反之，人生之大不幸非他，亦即此各种关系之缺憾。鰥、寡、孤、独，人生之最苦，谓曰“无告”；疾苦穷难不得就所亲而诉之也。此其情盖与西洋风气不孤而孤之（亲子异居，有父母而如无父母。）不独而独之（有子女而如无子女），不期于相守而期于相离，又乐为婚姻关系之不固定者，适异矣！家为中国人生活之源泉，又为其归宿地。人生极难安稳得住，有家维系之乃安。人生恒乐不抵苦，有家其情斯畅乃乐。“家”之于中国人，慰安而勸勉之，

其相当于宗教矣。〔1〕故中国社会以家构成，而西洋人昔则以每个人直接宗教，近则以每个人直接国家。我们或者可以戏称西洋人生为单式的，中国人生为复式的。（以经济上农业工业之殊，解释中西人之有家无家，仅为片面理由。）

现在我有请大家特别注意的，中国人不期于此引入我所谓人生第二问题是也。伦理复式的人生，使得中国人触处发生对人的问题，——如何处夫妇，如何处父母子女，如何处兄弟乃至堂兄弟，如何处婆媳妯娌姑嫂，如何处祖孙伯叔侄子乃至族众，如何处母党妻党亲戚尊卑，如何处邻里乡党长幼，如何处君臣师弟东家伙伴一切朋友，……如是种种。总之，伦理关系罩住了中国人，大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概；故如何将此各种关系处得好乃为第一问题。于是当人类文化初期，本在人对物的问题之下，其人对人问题尚不迫切地到达人面前的，乃不期而到了中国人头上，迎面即是，无从闪躲。而此所谓人生第二问题者乃与第一问题绝异其性质的，如我前所开陈——

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即眼前之自然界，——此其性质上为我所可得到满足者。

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在所谓“他心”，——此其性质上为得到满足与否不由我决定

---

〔1〕王鸿一先生尝有如何解决三世两性问题之说，据其所见，则中国人正是以家庭伦理代宗教。三世者，过去、现在、未来；两性者，男女两性。禽兽但有现在，人类则更有过去观念、未来观念。宗教为解决三世问题者，是即其天堂净土，地狱轮回之说也。中国人则以祖先、本身、儿孙，所谓一家之三世为三世；过去信仰寄于祖先父母，现在安慰寄于两性和合，未来希望寄于儿孙。较之宗教的解决为明通切实云云。

者。

宇宙本来在“我”——每一生命为一中心，环之之宇宙皆其所得而宰制；但他人身体在内，他心不在内；以他心为别一生命，别一“我”也。我们对他人身体有绝对制服力（性质上如此），对于他心无绝对制服力（性质上如此）。所谓“性质上为我可得到满足者”，得到满足与否亦不决定，但性质上为我可得到满足者；我不但有力于决定此问题，且其力为绝对的，以对方之“物”静故也。所谓“性质上为满足与否不由我决定者”，我固可有力于决定此问题，但其力只为相对的。如何结果尚待他来决定，而不由我，以对方之“心”动故也。由是而吾人对付问题之态度乃不得不异：对付人生第一问题，宜用人生第一态度，而对付人生第二问题，乃不能不用人生第二态度。——一往直前的办法，强硬征服的办法，专于向外用力者于此皆用不上。我们此时实只有“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而已。例如不得于父母者，只有两眼转回来看自家这里由何失爱，而在自己身上用力，结果如何不得期必，唯知尽其在我，此为最确实有效可得父母之爱的方法。其他一切关系均不出此例。盖关系虽种种不同，事实上所发生问题更复杂万状，然所求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与我心之相顺。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于是事实上训练出来的结果，乃不得不以第二态度易第一态度矣。然继此更有可言者。

伦理关系之弄得好，本在双方各尽其道；然此各尽其道只许第三人言之，当事之双方则只许先问自己尽其道否，——此先为永远无尽之先。故由此大家公认只许责己不许责人。伦理上之双方多有尊卑长幼主客轻重不同

之势，虽曰各尽其道，而责重则在一方，亦人情所恒有。故孝弟之训多于慈友之勉。伦理关系期于合而不期于离；有时合之不能，离之不可，则相忍为国，以无办法为办法。事实上其真出于离，或真能行合之道者既不多，则归于两相忍隐耐受者其在十之八九。故由此养成国民的妥协性与麻痹性。凡此或为道理之推论，或为事实之所演，皆第二态度之余义。试问以如此态度，在上之威权其何由推翻？谁都知道，“德莫克拉塞”是由西洋人对于在上者之压迫起而抗争以得之者；所谓平等与自由，实出于各自争求个人本性权利而不肯放松，以成之均势及互不侵犯之承认。然而从数千年伦理生活所训练出的人生态度，所陶养的国民性，你怎能想象他亦会有这么一天开出这些玩艺来呢？

然而德莫克拉塞之不得出现于中国，尚有更有力之原因在，即中国社会组织制度之特殊性是，中国制度之特殊不一而足，此处所指盖在其与西洋对照有全然相异之形势——西洋制度完全造成一种逼人对外求解决的形势，而中国则异是；中国制度完全开出你自己求前途的机会。欧洲中世的封建制度，我们已于本篇第三段《中世的西洋社会和他们的文明程度》叙说过了。西洋近世的资本制度的大概，则人都知道。他们这一古一今的两大制度，虽然外表上不同的很，然而骨子里有其一致的精神。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农奴生下来，他的命运前途就决定了，——就要如前所叙的那样为奴。全部农奴的命运实在操握在封建领主手里；然而那封建领主方面的命运呢？其实亦握在全部农奴手里，——农奴若造反起来，他们亦就身家覆亡。于是全社会造成一种形势：你的命握在我手，我的命握在你手；我非打倒你没出路，你非制住我，没活命。总而言之，非向外冲去，别

没有造自己命运，开自己前途的可能。在资本社会里，其形势亦复如此。一个人生在无产阶级家里，他的命运亦就规定下了，——就是要作一辈子工。全部劳动阶级的命运都在资本家手里握住。然而资本家方面呢？如果劳动阶级起来推翻资本制度，夺取生产机关，他们亦就覆亡。劳动阶级非向前干，无法开拓自己的命运，资本家亦只有严阵以待，不敢放松一步。形势逼着人对外求解决，对外用力，这就是前后两大制度的一致精神。然而中国制度其所形成的趋势，恰好与此相反，他正是叫你向里用力。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人不拘生在士农工商什么人家里，其命运都无一定。虽然亦有有凭借与无凭借之等差不同，然而凭借是靠不住的。俗语说的好：“全看本人要强不要强”。读书人可以“致身通显”，农工商业亦都可以“起家”，虽有身份不同，而升转流通并没有一定不可逾越的界别。从前人读书机会之容易，非处现在社会者所能想象，没有一点人为的或天然的限制，只要你有心想读，总可以读成。至于为农为工为商，亦一切由你，都无所不可。而从中国的考试制度，一读书人能否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就全看你能否寒灯苦读，再则看你自己资质如何。如果你资质聪明又苦读，而还是不能“中”，那只有怨自己无福命，——所谓“祖上无阴功”，“坟地无风水”，……种种都由此而来。总之，只有自责，或归之于不可知之数，不能怨人，即便怨人似亦没有起来推翻

商业的人，白手起家不算新鲜之事。土地人人可买，生产要素非常简单，既鲜特权，又无专利。遗产平分，土地资财转瞬由聚而散。大家彼此都无可凭恃而赌命运于身手。大抵勤俭谨慎以得之，奢逸放纵以失之；信实稳重，积久而通；巧取豪夺，败不旋踵。得失成败皆有坦平大道，人人所共见，人人所共信，简直是天才的试验场，品性的甄别地。偶有数穷，归之渺冥，无可怨人。大家都在这社会组织制度下各自努力前途去了，谁来推翻他？

尤可注意的是中国的皇帝，他是当真的“孤家寡人”，与欧洲封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阶级，以与农民相对的形势大不同。除了极少数皇亲贵戚以外，没有与他共利害的人，而政权在官吏不在贵族，又失所以扶同拥护之具，官吏虽得有政权，是暂而非常，随时可以罢官归田，而他生长民间，所与往还因依之亲戚族众邻里乡党朋友一切之人，又皆在士农工商之四民，其心理观念实际利害，自与他们站在一边。于是皇帝乃一个人高高在上，以临于天下万众，这实在危险之极！所以他的命运亦要他自己兢兢业业好生维持。此时他不能与天下人为敌，只能与天下人为友，得人心则昌，失人心则亡。他亦与四民一样有其前途得失成败之大道，其道乃在更小心地勉励着向里用力，约束自己不要昏心暴气任意胡为。有所谓“讲官”者，常以经史上历代兴亡之鉴告诉他而警戒他，有所谓“谏官”者，常从眼前事实上提醒他而谏阻他，总都是帮助他如何向里用力，庶乎运祚其可久。于是举国上下每个人都自有其命运，须要你“好自为之”，而无障碍其前途的死对头，非拼不可（虽偶有例外，然大体如是，原则如是，谁亦不能否认）。这社会是何等巧妙的结构！真成了一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



局！

照此制度所形成的形势，的确是使天子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但天子与庶人能不能以修身为本，却仍是问题。换言之，照此制度的确使人有走人生第二态度之必要，但人能不能应于此必要而走去，固未易言。这里至少有两层问题。一层是人生落于第一态度则易易，进于第二态度则较难。人眼向前看，自是开初一步，及至转回来看自家，已是进了一层，人力向外用去，自是开初一步；及至转回向里用力，乃更大进了一层。反省，节制，自家策勉，所需于心理上之努力者实甚大，而不反省，不节制，不自策勉，乃极易易不成问题之事。一层是人生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亦同有其必要。盖从人与人的关系以为言，此时固以第二态度为必要，而第一态度殆无所用之，——此其异于西洋社会者，然从人与物的关系以为言，则此时固以第一态度为必要，而第二态度又殊不适用，——此其不异于西洋社会者。两个必要交陈于前，两个态度乃迭为起伏交战于衷，数千年的中国人生所为时形其两相牵掣自为矛盾者此也。由上两层困难，第二态度虽为中国人所勉自振拔以赴之者而有时失坠，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所为一治一乱交替而叠见者此也。

天子而能应于此制度形势上的必要，而尽其兢兢业业以自维持其运祚之道，四民亦各在其道上努力开拓他们各自的前途，本来谁亦不碍谁的事，哪里会有问题？于是制度见其妙用，关系良好，就成了“治世”。——此治世有西洋中世社会或近世社会所不能比的宽舒自由安静幸福。天子而不能应此必要以兢兢业业，而流于懒散的第一态度（这差不多有其一定时机，此不详说），或民间出了枭雄野心家大发展其雄阔的第一态度（这

亦差不多有其一定时机，此不详说)。那便天子碍了庶人的事，庶人碍了天子的事，而问题发生，于是制度失其妙用，关系破裂，就成了“乱世”。——此乱世迫害杂来，纷扰乱糟，不同于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有一定要求方向及阶级营垒。治乱问题就存于天子与庶人彼此向里用力，抑向外用力之间。由此数千年得一大教训就是消极为治。虽然孟子尝倡导行仁政，而经验的结果，大家都颇知道还是不必有政治的好，——国家政府不必作事为好。有人说一句妙语：“近代的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中国人自数千年之古昔，已把国家当作‘不必要之恶’了”。〔1〕政治虽不必要，但教化则为必要；此所谓教化并不含有一个信仰，只是教人人向里用力。〔2〕人人向里用力，各奔前程，则一切事他们都自谋了，正无烦政府代谋也。——这正是最好的“中国政治”。如此天子及代表天子之官与庶民之间，乃疏远而成一种无交涉状态，免得相碍相冲突，而庶乎得较久之相安，真有所谓“无为而治”之概。(王荆公不明此理，所以为呆子。)

此万国所无之国家制度，已臻妙境，寻不出复有何人必要来推翻他，但有效用之继续，而无根本之变革；一但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其不能有革命是铁的；其不能有德谟克拉西之产生是铁的。中国人虽自古有比任何国民更多之自由，〔3〕而直至于今，人权仍树不起保障，亦不能比于任何国

〔1〕长谷川如是闲作《现代国家与中国革命》有是语，见《东西学者之中国革命论》，152页。

〔2〕中国的法律政治都含有教化，而《圣谕广训》一类之物，更为其具体表现。

〔3〕孙中山先生尝说西洋人以前是没自由，而中国人以前是自由太多。

民。这个古怪矛盾似乎不可解的现象，于此可得其解。其自由非自由也，人人以向外用力为戒而收回之，大家各得宽放舒散耳，人权保障必须有不可犯之强力，即人人向外要求形成之气势，此则于中国历史上永不能望见其开启之机者也。

利害祸福本相倚伏，今若问创为此制以赐福于中国人者谁，或始作俑者谁，则孔子脱不了干系，——亦止于有干系。此巧妙之结构制度果从何产生，本不易言，大体上不能不认其人为调制者多，而物的方面影响者少。所谓人为调制似乎有三点可言者：

**一为伦理复式人生之推演。** 伦理关系本始于家庭，乃更推广于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君与臣，官与民，比于父母儿女之关系，东家伙计，师傅徒弟，社会上一切朋友同侪，比于兄弟或父子之关系。伦理上任何一方皆有其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此固不能取人类所恒有之“自己本位主义”而代之，然两种心理一申一抑之间，其为变化固不少矣。由是一切从“自己本位主义”而来之压迫对方剥削对方的事实，虽仍不能免，而影响变化亦不少矣。迫害对方之西洋制度所为不见于中国，而中国制度迫害性所为最少者其在此乎。此制度之伦理化固出于人为。

**一为人生第二态度之应用。** 从中国制度看去，调和性非常之重；此似为第二态度应用之结果。第二态度之应用，本为屈己让人，故“让”字遂为中国人之一大精神，与西洋人由第一态度而来之“争”的精神，正相映对。而其结果见于事实者，一则为互让，一则为交争。遇有问题，即互相让步调和折

衷以为解决，殆成中国人之不二法门，世界所共知。<sup>〔1〕</sup>又中国人自古有其一部“调和哲学”，为大智慧者与庸众所共熟审而习用。由此哲学之所指示，则“凡事不可太过”，而调和实为最妥当最能长久不败之道，所谓“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人道恶盈而好谦”，“有余不敢尽”，……此类教训深中于人心，其影响于临事之措置者甚大。于制度之订定，更务为顾全各方，力求平稳妥贴，期望长久，乃果然这种制度就长久起来，一直二千多年犹不能见其寿命之边涯。而审此思想实唯好反省的中国人擅长之，一往直前的西洋人所无有，故亦为第二态度之应用。溯其注意调和之始，固又属人为。

**一为讲理的精神之表现。** 从中国制度看去，国家有超乎社会中任何一方而立于第三者地位之公平性，此似为中国人讲理的精神之表现。奥本海末尔(Franz Oppenheimer)著《国家论》，谓一切国家皆成立于一阶级压迫并剥削其他一阶级之上，然其演进之趋势，则最后将脱却阶级性而成为“自由市民团体”。此“自由市民团体”所为异于前此之国家者，赖有一种官吏制度为“公共利益的公正无私的守护者”，而近代国家中之官吏制度则其萌芽也。官吏制度实为近代国家之一个崭新的要素；——假使无此新要素之加入，近代国家将无以异于前此之旧型。盖近代国家虽仍为一阶级(资本阶级)压迫并剥削他一阶级(无产阶级)，但间之以官僚政府，不同于封建国家以领主贵族直接行之。此由国家金库为给养之官僚制度——立宪国家之君主实亦在

〔1〕罗素于中国人之喜欢互相让步曾再三言之。

内的一个官吏——为两阶级间有第三者出现之渐，将来社会阶级不存在，将更进至无所偏党。他曾说中国国家为最近于自由市民团体者。其以中国官僚制度出现最早，且大体上无阶级剥削关系存在于社会之故么？〔1〕中国是不是近于他所谓自由市民团体不敢说，但比欧洲今昔国家均见公平意味讲理气息则似可相许。所谓“天子一位”，“世卿非礼”，皆其自古要讲理的口气，而社会间太不公平，说不过去的事，中国人实怯为之。假使非由此表见，而有人为之调制，则何能破世界历史上国家之常例，而奥本海末尔所为期之于世界未来者，独于中国先见其影？

好了！我们因为说明中国人如何没有宗教，而靠孔子遗下的思想学问礼俗制度而生活，不知不觉将中国之不能有科学，不能有德谟克拉西，乃至文化之停滞不进，社会之历久不变亦牵连说及，——因为这都是受孔子之影响的。我们截止于此，总束两句。

吾人不知中国人其由人生第二态度引发而且形成其第二问题欤（指伦理及其他礼俗制度），抑从人生第二问题的形成而牖启其第二态度欤；其数千年的生活往复此二者之间，相牵相引，辗转益深，不可复出，以致耽误人类第一期文化则事实也。吾人每语及东方文化——无论中国或印度——必举其古者以为言；盖东方的文化和哲学诚有一成不变，历久如一之观，所有

---

〔1〕顾孟余先生极戒人滥用“阶级”一词。他以为“阶级”的特征，在生产工具生产工作分属社会之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他部分人专任生产工作，造成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如欧洲中世封建社会的阶级或其近世资本社会的阶级者是。由此中国社会，在他看来大体是职业社会而不是阶级社会。见其在《前进》杂志所写各文之中。

几千年后的东西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一切今人所有都是古人之遗，一切后人所作都是古人之余。此与西洋文化和学术，花样逐日翻新，一切都是后来居上者，适异其道，虽戏称之曰“演绎式的文化”亦无所不可。是何为其然？是盖自中国文化上之特别地无宗教与印度之只有宗教为文化上畸形发达者既显示其非循夫自然之常矣。又何为而有此“非常”？吾不欲举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人生创造历史都是突然而来之说；今亦不暇述我的“一切皆缘而无因”之说，更不暇批评冒充科学的唯物史观。<sup>〔1〕</sup>这样向上追问去，便入于玄学范围（自由论或机械论），须待专论也。我只请大家留意此“非常”，认识此“非常”，而知历史如中国者，正未可以西洋历史进行之一路线概之。西洋历史进行之一路线，盖以“向外用力”的第一态度，于人生“对物”的第一问题下演出者也。他这样最能解决第一问题，其一切社会进步，均随其第一问题之逐步解决而进步，照第一问题之形式而解决。明白言之，其社会上层建筑之政治法律风俗道德为被推进的，以机械规律而进步，以物理形式而解决，殆亦有如唯物史观家所说者。本来人类文化之初，莫不在第一问题压迫之下，第一态度即以自然必要而无问何洲土何种族而皆然；其文化演进之序，自有类似从同之点，而一与其对物问题之进展相应。此实为使唯物史观家相信他们的所见可以

---

〔1〕斯宾格勒 Spengler 德国近年一奇伟之思想家，从其特殊文化史眼光，著《欧洲之沉沦》一书，震耸全欧。他反对一切机械的历史观，而谓人生创造历史皆突然而来，非肤浅的因果观念所能解释。我的《一切皆缘而无因》之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一略见，将来于《人心与人生》一书中详之。唯物史观喜《客观立言》，其精神略近科学。若能谨严自守，就事论事，未尝不有几分科学价值；若跑进玄学里面硬有所主张，不问诚伪，皆属玄学，不得再白号科学。

普遍适用之故。然不虞中国历史上之伦理及一切相缘而来之礼俗制度，是从人生第二态度照着第二问题来解决，来建造的。明白言之，此虽亦不能不有其一定经济条件，然非被经济进步所推动者，实出于人为调制，意识地照顾于事先。于是竟倒转过来而从社会上层牵制了他的下层之进步发展，自陷于绝境！

关于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在近世一飞一停，西洋社会中国社会一变一不变的问题，自以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之或见或不见为其最重要关目。虽西洋人飞，中国之停，皆有其存乎产业革命之前者，然其产业革命或见或不见，则其社会文化或大变化或不变化之所以分也。产业革命与工业资本主义殆相连之一事，故其问题亦即中国何为而不进于工业资本主义？论者于此辄比照西洋往事而为解释。或以为中国不是海上国家如英国，从其自然地理上不能有殖民地之扩大；〔1〕或以为西洋于经济上不能自足，而中国能自足，无向前发展之必要；〔2〕或以为中国无大量资本之聚积与自由出卖劳动力之多数劳动者；〔3〕或以为中国封建制度虽已破坏，而犹有所谓封建思想封建势力，

---

〔1〕中国手工业何以不能往前发展到近代工业？决不由于中国没有强力的政权与自然科学，而主要的是因为中国商业资本太狭，及中国不能有殖民地的扩大。（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克仁译本，28页）而中国所以没有扩大殖民地是由自然地理条件，详言之，中国不是海上国家如英国。（见《新生命》3卷5号《托洛斯基派之中国社会论》，第6页）。

〔2〕何以欧洲人要找寻东方贸易有这样的热烈？这显然可以看出他们经济力之不足。（中略）中国历史上每一期扩大的经济区域都可以使那时这种社会满足，于是代替封建社会的商业农业结合而成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遂这样长久地存在下来。这只可供环境主义的解释。（梁园东著：《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196页）。

〔3〕见朱新繁著：《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56页。

桎梏着资本主义不能作进一步的发展。〔1〕诸如此类，大抵都归于无此需要，或某条件之未备，或某障碍为之抑阻。这是何等浅薄没力气的话！人类只有主观方面的不贪，绝没有客观的满足不需要之事。以十六七世纪欧洲人向外发展的渴热强烈寻求，回证他们经济的不能自足；以中国安于其农业上的生产方法和商业的贸迁流通，回证他们的可以自足，何其无意味！全不理睬那时欧洲人冒险进取精神和他的贪欲——这是从他人生态度和郁蕴的力气而来；全不理睬中国人精神又另从一途发挥去，和他的淡泊寡求。从自然地理上解说西洋中国产业革命之见不见，工业资本之成不成，如果中国在自然地理上的差异居然会到这程度，则论者原初想将产业革命工业资本说成人类文化上普遍一定的阶段，却恐说成是局于欧洲一隅所特有的现象了。说封建制度虽已破坏，犹有封建势力抑阻着经济进步，不知制度既破坏者抑阻力强大，还是有制度存在者抑阻力强大？有制度在抑阻不了西洋人，而制度破坏却抑阻了中国人，这是什么道理？假定其犹有所谓封建思想势力，亦只有主观的无力，容他残存，不好说作客观的有力、阻我进步。客观的阻碍可以说没有的。你只看见他所为生产主于自给自足，大体上只是地域经济未进于国民经济耳。你只看见他商业资本早见于数千年之前，而自然经济犹滞于数千年之后，为大可异耳。你绝寻不见客观上有什

---

〔1〕顾孟余先生分析中国社会而为之结语云：这个构造可以叫做一个“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思想是封建的，保存这个思想的有圣经贤传；经济与社会倒是初期资本主义的。陶希圣先生则更请以圣经贤传是什么势力保存着的，而为之说云：士大夫阶级的势力表现于政治则为官僚政治，对战斗团体的依赖性及对生产庶民的抑制性是官僚政治的特征；表现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则为隶属关系；表现于思想则为等级思想。这种社会实具有封建社会的重要象征。工商业资本主义在这种势力桎梏下没有发展的可能。这种势力只有叫做“封建势力”。



么闭锁障阻他往前进的大形势存在着。欧洲中世封建下的土地支配制度，手工业的基尔特组织，所为经济上之闭锁抑阻，中国初未有之，而中国却总是不前进，是其故必有在矣。我非能断言诸此推论一一绝无影响关系，然举轻末不足数者，大言之以为原因在是殊无聊，而一般人之耳目或不免为所蔽，不可以无辨。

我们首先要一眼看明，这是陷入顿滞一处盘旋不进的绝境，而后“进行迟慢”与“客观阻碍”等说乃一切刊落不必更提；其次很容易看出，其往昔成就大有过人之处，其全体表现自有积极精神，则知其既向别途以进；产业革命之不见，工业资本之不成，固有由矣。更次乃见其所遗之一途固为所遗而不进，其向别途以进者亦卒有所限而止于其可能之度，而同时又还以此所牵，不能复回向于彼一途。彼此交相牵掣，是即绝境所由陷，而后产业革命之不见，工业资本之不成，乃决定矣。倘更能参伍错综比较寻绎，以发现世界各系文化之所以异趣，与人类文化转变之前途，则知中国文化者盖人类文化之早熟，如我往常所说者。<sup>〔1〕</sup>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而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质言之，中国不是幼稚而是成熟；虽云成熟，而形态间又时显露幼稚，即我前说的“非循夫自然之常”是已。

---

〔1〕参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一节及“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一节。

循夫自然之常理者，必先完成人类第一期文化，乃开始第二期文化。所谓人类第一期文化之完成，以人对物的问题得解决为度，——恩格斯有几句话将这界划说得很清楚：

社会掌握生产手段的时候，商品生产已取消，同时生产物对于生产者的支配亦已取消。在社会的生产内部，以计划的意识的组织而代浑沌的无政府状态。个人的生存竞争亦随着停止。接着，人类在某种意义上决定地与动物的王国分离，由动物的生存条件进至真正人类的生存条件。围绕着人类，而在今日已是支配着人类的外界，于此时乃服从于人类的支配与统制，而人类对自然乃开始为意识的真实的主人。<sup>〔1〕</sup>

人类必自此以后，乃逼近于人生第二问题（人对人的问题），而引生第二态度，入于第二期文化。<sup>〔2〕</sup> 顾不料数千年前之中国，当农业略有进步商业资本初见之时，去此界度尚远，而已迈进于第二态度第二问题之途，向内而不向外，勤于作人而淡于逐物，人对物的问题进展之机于是以歇。此其中重要可指之点，殆在商业资本虽有，而始终不成其为商业资本主义以演动于社会，产业革命乃无由促成。产业革命工业资本之不成，社会组织结构自无由变。虽数千年中国人之所为，忽于物理，明于人事，而人事之变卒所不能尽；而由物理之忽，科学及科学方法不能产生，学术发达上乃大有缺憾与局限；所谓向别途以进者亦止于其可能之度，即谓此。此时亦更不能返于向外逐物之第一态度，

〔1〕 参看千香译《社会进化的铁则》，74页。

〔2〕 参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有关段落（见本全集第一卷，493—524页——编者）。

以牵于既进之精神而不许也。进退两所不能，是其所以盘旋一处，永不见新机杼之开出的由来。大抵一切不能前进之事，莫不有此一种交相牵掣的形势在内，——只有此交相牵掣其为力乃最大也。中国文化之所以停滞不进，社会之所以历久不变，前就礼俗制度本身言之，特言其一义，语其真因乃在此。

我们重说几句结束这一段。中国数千年文化，与其说为迟慢落后，不如说误入歧途。凡以中国为未进于科学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科学。凡以中国为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同样之理，其以中国为未进于资本主义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不能理会及此，辄以为前乎资本主义社会，而称之以封建云云者，此犹以前乎科学而判中国为宗教，实大不通之论，极可笑之谈，为学术上所不许。中国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则诚然矣；然是因其不同而不及；或更确切言之，正唯其过而后不及。时至今日吾侪盖已察之熟而辨之审矣。

## 七 我们一向的错误

我以 1893 年生，其时中国人不幸的命运，早已到来好几十年，而一天紧似一天了。其次年，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中国人的大倒霉，更由此开始。而我们许多先知先觉，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亦于此加紧的、猛烈的进行了。（康梁一派变法维新运动，孙先生的革命运动，均自此猛进）。我真是应著民族不幸的命运而出世的一个人啊！出世到今天（1930）已是三十七年，所谓命运的不幸，已非止门庭衰败，而到了家人奄奄待毙的地步。民族自救运动就我亲眼见的，前后亦换了不知多少

方式，卖了不知多少力气，牺牲不知多少性命，而屡试无效，愈弄愈糟，看看方法已穷，大家都焦闷不知所出。究竟我们怎么会到得这步天地？事到今日，不能不回头发一深问。

这自然是我们数千年文化所演的结果。我既曾说过：

譬如西洋人那样，他可以沿着第一条路走去，自然就转入第二路，再走去，转入第三路，即无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的输入，他自也能将他们开辟出来。若中国则绝不能，因为他态度殆无由生变动，别样文化即无由发生也。从此简直就没有办法，不痛不痒真是一个无可指名的大病。及至变局骤至，就大受其苦，剧痛起来。他处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而于第一路没有走得几步，凡所应成就者都没有成就出来；一旦世界交通，和旁人接触，那得不相形见绌？而况碰到的西洋人偏是专走第一路大有成就的，自然更禁不起他的威棱，只有节节失败，忍辱茹痛，听其蹴踏，仅得不死。国际上受这种种欺凌已经痛苦不堪，而尤其危险的，西洋人从这条路上大获成功的是物质的财，他就挟着他大资本和其经济的手段，从经济上永远制服了中国人，为他服役，不能翻身，都不一定。至于自己眼前身受的国内军阀之蹂躏，生命财产无半点保障，遑论什么自由？生计更穷得要死，试去一看下层社会简直地狱不如，而水旱频仍，天灾一来，全没对付，甘受其虐。这是顶惨切的三端，其余种种太多，不须细数。然试就所有这些病痛而推其原故，何莫非的的明明自己文化所贻害，只缘一步走错，弄到这般天地！还有一般无识的人硬要抵赖不认，说不是自己文化不好，只被后人弄糟了，而叹惜致恨于古圣人的道理未得畅行其道。其实一民族之有今日结果的情景，全

由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西洋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印度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中国人之有今日全由我们自己文化而莫从抵赖；也正为古圣人的道理行得几分，所以才致这样，倒不必恨惜。（此几分是天然限定的，即前云“有所限”是也）。〔1〕

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西洋的胜利自然亦是他文化的胜利。我们前曾说过西洋便是一种强力，〔2〕现在要补说一句，中国文化的特征正是弱而无力。

文化随人产生，人随文化陶养。岂唯中国文化非失败不可，中国人亦是天然要受欺侮的。罗素在他所著《中国之问题》上说：“欧洲的人生是以竞争（strife）、侵略（exploitation）、变更不已（restless change）、不知足（discontent）与破坏（destruction）为要道；而中国人则反是”，又说：“中国人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与尼采（Nietzsche）之道相反而已；不幸此性质不利于战争，然实为无上之美德”。又说：“世有‘不屑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国家乎？中国是已。中国人之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3〕大概一种特异处，单看不易见，两相对照，便易看得出；自家看不出，人家却易见。东西人诸如此类的说法，实不胜征举；要皆所见略同，而都不明其所以然。试寻绎我前边的话，便自明晓。近

〔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一节。

〔2〕本文第二节之末引日本人金子马治说西洋为帕玩（power）之文明，又本文第四节之末尾指出西洋文化有其特异征服世界的威力在人心向外，科学发达，而社会以进于组织性机械性。反之，中国文化所以弱在人心向内科学杜闭而社会特别散漫。

〔3〕罗素著：《中国之问题》，中译本，11、74、192页。

世的西洋人是新兴民族而又曾被宗教关闭过，绝似小孩子关在书房，一旦放学，准他任情玩耍，自尔欢奔乱跳、淘气冒险打架破坏。（先时颇可喜爱，久而闹的太凶，就不免讨厌，而且损伤亦太多。）而中国民族则正好象年纪大，更事多，态度自宽和，举动自稳重了。理会得此层，更须加意理会：

一则是从人类与一切生物所同的“有对性”出发的人生第一态度；

一则是向往人类所以异乎一切生物的“无对性”的人生第二态度。

西洋人自近世以来，大发挥其人类的“有对”精神，真是淋漓尽致！（此句话无贬无褒，即褒即贬）。这在今日风气将变之会，回看当年是尤其清楚的。今日无论在经济上、法律上、政治上，一切学术思想，都从个人本位主义翻转到社会本位思想，更易感觉那近世来个人主义之强盛，而弥漫一切。本来一部近世史，就是一部个人主义活动史，就是人的自我觉醒开其端。从认识了我，肯定了自己，而向前要求现世幸福，本性权利；后来更得着“以‘开明的利己心’为出发”的哲学论据，“以‘自由竞争’为法则”的社会公认，于是大演其个体对外竞争的活剧；所有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打倒特权阶级的民治制度，一切有形无形，好的坏的东西，便都是由此开发出来。大概好一面，便是打倒排除许多自然障碍，人为障碍；不好一面，便是不免有己无人，恃强残弱——例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此为两眼向前看，力气往外用，必有的结果，原不足怪。然在我们正为太不具备他这种精神了，正为与他恰相反了，所以一旦相遇，当然对付不了他。自鸦片之役以来，所有我们近八十多年间的事，就是为这种强力（西洋文化）强人（西洋人）所欺凌、侵略，颠

倒、迷扰的痛苦史。我常说，现在眼前的种种，身受的种种，实不必气恼着急，叹息发闷，更不用呼冤喊痛；你若看清中国这一套老骨董是怎样，再明白西洋那一套新玩艺是什么，试想他们相遇以后该当如何，则今日的事正一点一滴都有其来历，无足异者。从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大，很快地为西洋之实际的优胜打击无存，顿尔一变而为虚怯之极。方当受欺吃苦，民族命运危殆之时，我民族志士仁人，先知先觉，未有不急起以图自救者；而内审外观，事事见绌，不能不震惊歆羨于他，所以自救之道，自无外学他。始而所学在其具，继所趋求在其道，自曾文正李文忠以迄共产党，虽再转再变，不可同语，而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无能外之者。所谓“屡试无效，愈弄愈糟”者，其病正坐此。由是他加于我之欺凌侵略，犹属可计，——漆树芬先生一部《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计之甚悉，推阐甚明——而我颠倒迷扰以自贻伊戚者，乃真不可胜计！吾人今日所食之果，与其说为欧洲人日本人所加于我者，宁曰吾人所自造。此由今以溯观近四十年间事，不难见也。

近四十年间民族自救运动，总算起来，可大别为一个前期，一个后期。此前期后期者，非果我所自成分段则然，特以西洋近事有此转变，思想有此迁易，其所以为我刺激者，前后分殊，于是我亦被动的截然有二期。所谓欧洲之变易者何也？其始也制造帝国主义，其继也则打倒帝国主义，以是成其近世潮流，与最近代潮流焉。感受着欧洲近世潮流——其最有力之刺激则近在眼前之东邻日本——而讲富强，办新政，以至于革命共和，虽其间尽多不同，而总之结晶在一“近代国家”的目标。此即所谓前期运动。感受着欧洲最近潮流——其最显著时期，即在欧

战一停之后，其最有力之刺激则西邻之俄国——而谈思想主义，采取直接行动（五四，六三以来各运动），以至于国民党改组容共，十五年北伐，纵其间不尽一致，而总之背后有一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空气。此即所谓后期运动。于前期种一有力之因，则练新军是也；辛亥革命由之以成功。然十余年军阀互阉之局，非食其赐乎？于后期种一有力之因，则培养共产党是也；十五年北伐赖以成功。然两湖粤赣其他各省焚杀之惨，不知多少有才能有志好青年为之葬送，非食其赐乎？又有贯乎前期后期而种一深且远之因，则全不对题的教育制度是也。今日社会现象种种皆成问题，非食其赐乎？任举一事，何莫非自己铸错？

又试观廿年间，凡今之所谓祸国殃民亟要铲除打倒者，皆昨之沐受西洋教育或得西洋风气最先，为民族自救的维新运动革命运动而兴起之新兴势力首领人物，初非传统势力老旧人物。已往之研究系北洋派固皆此例，而眼前之南京政府不尤其显著乎！近二三十年间事正为维新革命先进后进自己捣乱自己否认之一部滑稽史。其关乎私人恩怨，喜怒为用者此不说，且言其一时所谓公是公非者。始则相尚以讲求富强，乃不期一转而唱打倒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矣！始则艳称人家的商战以为美事，今则一转而咒骂经济侵略以为恶德。模仿日本之后，菲薄日本；依傍苏俄之后，怨诋苏俄；昨日之所是，今日之所非；今日寇仇，昨日恩亲。所谓“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者”，自己之颠倒迷扰，曾无定识，固白白之矣；改过虽勇，宁抵得貽误之已大。自救运动正是祸国运动，时至今日吾愿有真心肝的好汉子一齐放声大哭，干脆自承；即不自承，而事实不已证明之乎！何为而颠倒迷扰如此？则震撼于外力，诱慕于外物，一切



落于被动而失其自觉与自主故也。是又何为其然？则以有清一代实中国文明外面光华内里空虚之候。吾前既言之矣：“中国的人生远从两千年近从八百年递演至此，外面已僵化成一硬壳，内容腐坏酵发臭味，……盖不独于今日为西洋所丑化了中国人不足以见所谓中国人生，即倒退六七十年欧化未入中国之时，固已陵夷至最后一步，不成样子”，民族精神浸浸消涸，自不胜外来新颖剧烈的刺激。虚骄自大之气。瞬即打破，对西洋国家乃不胜其景慕。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象样的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这不但数十年前，一般人的讲富强是如此，便试问，今日大家的心理，果真明断不存此想，又有几人呢？原只有十三年后容共期间的空气，稍为不然，然而现在又随着反共潮流，而消散了那股盛气，模糊了那刚刚萌露的方针；“近代国家”，仍是多数人理想的梦！曾不知近代国家是怎样一个东西。他的政治背后，有他的经济；他的政治与经济出于他的人生态度，百余年间，一气呵成。我国数千年赓续活命之根本精神，固与之大异其趣，而高出其上，其何能舍故步以相袭？至于数千年既演成的事实社会，条件不合，又不待论。乃一切不顾，唯亟亟于摹取追踪，于是：

乍见其强在武力，则摹取之；乍见其强在学校，则摹取之；乍见其强在政治制度，则摹取之。乃其余事，凡见为欧人之以致富强者，罔不摹取之。举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产物，悉以置办于此村落社会而欲范之为近代国家。近代国家未之能似，而村落社会之毁其几矣！〔1〕

〔1〕引自《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见本全集第四卷——编者）。

迨所求既不得达，正在穷极思异，而欧洲潮流丕变，俄国布尔塞维克之成功尤耸动一世；于是我们亦掉转头来又唱打倒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近五年间，表面上为国民党领导着，精神上为共产党领导着的革命高潮，遂应运以实现。所谓共产党其物者，从其所以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方向来看，则诚然一变于欧洲之故，而从其所由出发的人生态度来看，则正是从来西洋人根本精神赤裸裸地表现，最彻底地发挥。沿着“功利主义”“自由竞争”的理想，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演到大家都受不了的时候，自然要从个人本位主义翻转到社会本位思想；然当社会本位的经济将现未现之时，则正是经济抬到最高位，人们视线所集中，摆开阵营大事决斗之际。以“唯利是视”解释人类行为，以经济一事说明社会一切现象的“唯物史观”，就成了人们的指针。而共产党便是最擅长以战阵攻取之略，巧用之人群社会的。人类“有对性”的发挥，固非此不算到家，而西洋人所耍的把戏，这亦就为其极轨。乃不谓夙讲理义是非，最耻言利，夙爱礼让和平，最恶相争的中国民族，亦抛丧他祖宗高尚伟大精神，跟着人家跑，而不复知耻。盖自光绪年间讲富强，已开其渐，今亦不过更达于赤裸裸耳。无论前期后期运动，一言以蔽之，总皆一反吾民族王道仁义之风，而趋于西洋霸道功利之途（孙中山先生在日本讲演，对中西文化作此分判）。然讲功利，则利未见，而固有之农业反以毁，民生日以蹙，讲强硬，尚武力，则武力之施，强硬之果，不中于人而中于己。凡今日之“穷且乱”，正由三十余年唯尚“利与力”而来：一言可以尽之矣。

呜呼！数十年间，颠倒迷扰的可怜，亦可怜极矣！时至今日，其可以知返矣！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

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自家前途，自家新生命，全在循固有精神而求进，而向上，不能离开向外以求，不能退坠降格以求。只有发挥自己特长，站在自家原来立脚地上以奋斗，离开不得这里一步。譬如一个忠厚老实者，一个精明强干的漂亮人物，你受欺负是一定的，相形之下，觉着人家种种可羨是一定的，然而你索性老实到家，发挥你忠厚的精神，不要学乖弄巧。你要学，学不来，并失忠厚。所谓邯郸学步，并失故步，匍匐而归，真为善譬。今之救国不得其方者，还要出洋考查，真是可笑已极！古人说的好：“归而求之有余师”，如再不赶紧回头，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则真不知颠倒扰乱到何时为止矣！

然而，错自是一向都错了，但天然不能不有此错。譬如他以拳来，我自然要以足当〔挡〕；他手中握着利刃，我自然亦要急觅个家伙。以御他为自救之道，以学他为御他之道，此盖必有之反应，未假思索者。仿佛机械的反射运动一样，未有自觉的意识。在今日不可不悟昨非，而却不容责当日之错——当日无论是谁，亦要错的了。即因错误而生出的灾祸痛苦，似亦并不冤枉。好比流行传染病，要不传染已是不行的，倒不如小染其病，而得一个免疫性，到今日可算是种种的病都传染到了。如果不是体不胜病，则今后吾民族其必有回苏之望乎！

## 八 我们今后的新趋向

无论前期运动后期运动，我们皆见其始盛、继衰、终穷，由极有力的高潮退落归于无力。自其加于社会的结果言之，始而都像是好消息，继而影响远近，实际地感受到了，似利弊互见，

希望未绝；最后则祸害酿成，社会上的痛苦乃有长足的进步。前所谓“愈弄愈糟”者，盖真痛心绝望之言。方其造端经始，亦非没人看到其将酿乱贻祸，预断其错误失败；然个人的先见可以有（究不能彻见真切），社会则是没有先见的。当一世之人心思耳目方有所蔽之时，要扭转得这社会倾向，实有绝对地不可能。远从世界来的剧变，将这数千年历史长久不变的庞大社会卷入旋涡，而扰动发生的大转大变，其波折往复非有偶然；我们已往的错误或者一一皆是铁的。然即今事后，有些人犹不能悟，于兹后期运动途穷之际，或则复返于清末民初的旧梦，或则激进于共产党，总之囿于西洋把戏的圈而不能出，则未免太笨！且由此而民族自救运动的新趋向为其所蔽，不得大开展，则是我们所为不能已于言者。

关于这些错误的批评，我将分别为四篇文章，在本刊上继此陆续发表，其目如次：

- 一，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 二，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 三，我们经济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
- 四，我们经济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

现在只想对于至今执迷不醒的通蔽，说一句话。此所指之通蔽，便是他们大家总以为：我的药方还没吃下去，不能怪我的药方不对。有此一段谬误心理横亘在衷，所以总不死心，总不服气，更不往旁处去想。在法治梦想家，便谓：法治何曾在中国实行

一天来？都是不照法去行，毁法弃法，所以才致今日之乱。在作党治梦的先生亦是责某某毁党弃党，全不按照党治路去走；如果没有个人独裁，没有小组织，没有新军阀的割据，则党治实行，三民主义的建设岂不早见？夫谓法治未行，党治未行，我亦何能否认，抑且亦半点都不想否认。我想这正是药不对症的证验。政治上的路向不是有形的药水，你可以眼看他吞下去，再验他效果的。要问一条政治的路向是否合我们之用，就全看其用得上，用不上，以为断，而更无其他可以为验者。中国民族既曾往这条路向（法治或党治）上努力来，即可于其努力之无成，进行之多乖，而判知其不对症。其所以始终未见实行者，正以其实行不去也；若实行得去，便已对症，早任何话不必说矣。谓必实行后，再看其对症不对症者，此不通之论也。更细审之，并不是谁毁法弃法，谁毁党弃党，而实在是方方面面自大端以迄末节，皆见出法或党无可树立得起之机；所谓实行不去，正非推论之词，固有可征。乃以归罪某某所为，未免太看重个人；天下事固不如是偶然也。……试以这两层研思之，其或可以省悟乎？

不管你怎样执迷，民族觉悟的时机是已到了。自近年以经济上将资本帝国主义揭穿，一切欧化的国家……或云近代国家，是一个什么东西，亦既明白矣。“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是后期运动在中国人意识上开出的大进步，〔1〕此时还要复返于前期运动，真是所谓思想落伍，谁则能从公等之后者？清末民初旧梦之又作，不过是后期运动落归无力之时，观念上的一时回溯耳。自最近两年于革命热潮过后，沉下来讨论中国革命

〔1〕参看《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见本全集第四卷——编者）。

问题，乃补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研究一段工夫；今后之革命运动将非复感情冲动的产物，而不能不取决于理性。此时还要激进于共产党，谁则能从公等之后者？这不过是短于智慧而富革命性的朋友，于后期运动穷促之际，显出的一时急迫神情耳；后期运动诿以是而为进一步的开展哉！要知今日已是西洋化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终局。前期运动过去了，后期运动过去了，再不能有第三期。就中国一面言之，一向懵懂糊涂，既没认清他人，又不了解自己者，由事实之推演而逐步进于认识与自觉。就西洋一面言之，西洋戏法到得共产党这一步，亦就穷了，更没什么新鲜的了！中国人学西洋，学到这一步，亦就完了，更没什么可学的了；不觉悟，亦会要觉悟了！今后除非中国民族更无前途，即亦没什么自救运动再发动起来，如其有之，此新运动之趋向，将不能不从“民族自觉”出发。

所谓从民族自觉而有的新趋向，其大异于前者，乃在向世界未来文化开辟以趋，而超脱乎一民族生命保存问题。此何以故？以吾民族之不能争强斗胜于眼前的世界，早从过去历史上天然决定了，而同时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亦为历史所决定；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以吾民族精神早超过一般生物之自己保存性，而进于人类所有之宝爱理义过于宝爱生命之性；吾人今日正当宝爱此民族精神，而不以宝爱民族生命者易之；不然者，苟为生命之保存而不惜吾民族固有精神委于尘土，则顽钝无耻，岂复得为中国人哉！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中国人其果如此而不知耻也，则是其生机已绝矣！复向何处有前途？中国人其果知耻而至死不易吾精神也，则是其所以生者方劲然以在，何忧前途无活命？中国人其果审于世界文化转变之机已届，正有待吾人之开其先路，而毅然负起其历

史的使命，则民族前途之恢张，固又于此日之志气卜之矣。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

呜乎！中国人虽不识此义，而西洋高明之士则有识之者矣！罗素于其所著《中国之问题》开首即云：

中国今日所起之问题，可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区别。三者互有连带关系，不能为单独之讨论。惟余个人，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以文化上之问题为最重要，苟此能解决，则凡所以达此目的之政治或经济制度，无论何种，余皆愿承认而不悔。<sup>〔1〕</sup>

此其意盖宝爱中国文化上之精神，宁牺牲其他，不愿稍损及此也。又有云：

由华盛顿会议之结果观之，远东问题欲得一乐观之答覆，较前更形困难，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苟不大发达于中国，中国能否独立？此问题也，尤难答复。余不愿提倡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但爱国之中国人苟以不提倡何以图存为问，恐无辞以对。余研究至今，仅能得一答复。中国实为世界最忍耐之国家，历史之永久，远非他国可比，他国终不能灭之；即多待亦不妨也。<sup>〔2〕</sup>

此实为最有深情与高识之言，细味之，可为坠涕。更于其书结末处，谆谆焉郑重言之不已：

余于本书，屡次说明中国人有较吾人高尚之处；苟在此处，以保存国家独立之故，而降级至吾人之程度，则为彼计，为吾人计皆非得策。

〔1〕 参看罗素著：《中国之问题》（中译本）1页。

〔2〕 同前，8页。

中国政治独立所以重要者，非以其自身为最终之目的，乃以为中国旧时之美德与西洋技艺联合之一种新文化非是莫由发生也。苟此目的不能达，则中国政治之独立几无价值可言。

苟中国之改良家……而开创一种较现今更良之经济制度，则中国对世界可谓实行其适当之职务，而于吾人失望之时代，与人类以全新之希望。余欲以此新希望，唤起中国之新少年。此希望非不能实现者。唯其能实现也，故中国当受爱人类者极高之推崇。<sup>〔1〕</sup>

呜乎！贤矣，罗素！伟矣，罗素！即此言其当受吾人极高之推崇。如我向者之所测，世界未来文化正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罗素之言，果“非不能实现者”，我能信之<sup>〔2〕</sup>。我匪独信之也，抑又深识其所以然之故，而窃有见乎其达于实现之途术，一是即我所谓村治或乡治是已。我将于本刊陈其议，约分为五篇文字，继此陆续发表，其目如次：

- 一、村治在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上的意义。
- 二、村治在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上的意义。
- 三、村治在解决中国文化问题上的意义。
- 四、村治在解决中国教育及其他问题上的意义。
- 五、倡行村治的方法。

罗素以政治经济文化三问题中，必先文化问题，其言虽是，其计则左。中国问题原来是浑整之一个问题，其曰三问题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此问题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皆通；不然，

〔1〕 罗素著：《中国之问题》（中译本）241、253页。

〔2〕 参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见本全集第一卷——编者）。



则一切皆不通。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此不必虑，亦不待言者。吾人但于此政治经济之实际问题上，求其如何作得通，则文化问题殆有不必别作研究者。倘先悬一不损文化之限定，而文化为物最虚渺，则一切讨论皆将窒碍，陷于捉空，问题或转不得解决矣！我之研究中国问题，初未尝注意有所谓文化问题者，而实从政治经济具体问题之研索，乃转而引出比较抽象的文化问题之注意，此愿为朋友告者也。

我们于是恍然，中国人今日之痛苦，乃大有意义。使吾人倒返于百年以前之中国社会，或无今日之痛苦；然而正是文化上生不得生，死不得死，“无可指名的大病”，更无一毫办法。西洋文化之撞进门来，虽加我重创，乃适以启我超出绝境之机，其为惠于吾族者大矣！凡今日一切问题皆若不得解决者，正以见问题之深且大，意义不寻常，而极勉吾人之为更大努力，以开此人类文化之新局也。呜呼！吾人其当如何以负荷此使命！

## 九 附 志

我为此文方竟，乃得见汪精卫先生的《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一文，殊有可以互资参证处，不胜欣喜！用摘取其文附志于此。

汪先生文云：

孙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而三民主义尚未能实现，探其原因，由于两种模型心理为之障碍。

第一种模型便是十八世纪自由主义之制度。（中略）试观自甲午以来，从事于政治的改造者约分为二派：其一是

主张君主立宪，便是以普日为其模型；其二是主张民主立宪，便是以美法为其模型。（中略）举例来说，如最近所谓“人权论”者，亦属于此一派的。（中略）这一种以十八世纪之自由主义的宪法为无上模型的心理，便如一座砖台塌下来，虽然还有不少残砖剩瓦，然其为坍台，已无可辩护了。

当这种模型心理坍台的时候，第二种模型心理继之而起，萌芽于民国九、十年间，至十五六年间而极炽烈。（中略）换句话说，即是一般青年心目中的中国改造，已换了一个模型，不是法美式而是苏俄式了。这一种模型心理至十五六年间，到了沸点，亦就从此下降，至于今日，已降至冰点，更无再有上升的希望了。

这话说得何等响亮干脆！让我们更无进一步的话可说。还有汪先生结束的话，亦非常好：

两种模型心理瓦解之后，一般青年最大烦闷，是关于中国之改造，到底采取那一种模型才好呢？在青年心中，失了回答的勇气。（中略）要除去青年的烦闷，惟有供给青年以一种合理的适用的改造中国的模型。刚才说过孙先生关于改造中国，已有整个计划，见于三民主义，及种种方案。这些计划，在原则上，已经建立起来，只在条理上，还有待于一般同志的充实研究。举个例来说，“耕者有其田”是一个原则，而实行的方法，则有待于诸同志之研究，这是孙先生于13年8月23日农民运动讲习所指示于一般同志的。以此为例，其他可推。（中略）必如是，始可为整个的模型。因为整个的模型，必须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决不能求之于外国；外国之所有，仅足为整个模型之参考材料

而已。

我们想要说的话亦不过如是，差不多不必更赞一词。或补充一句解释的话：所谓“整个模型必须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不能求之外国”者，此不单有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民族历史的关系乃更重大。从数千年绝殊于西洋的民族历史演下来，一种绝殊于西洋的社会组织构造，和社会风气、民族特性，乃是使我们没法步趋于人家的历史，摹拟乎人家的社会，而不能继续我们自己的历史，以创造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根本缘故。

我但祝望这两种模型心理果真如汪先生所说的瓦解，大家一齐断念于他。我但祝愿中国必须自创模型的认识，在大家心目中日益深刻，则吾民族自救运动的新方向，其必可大开展无疑也。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27—100页，

1933年，中华书局。

《村治》，1卷，2，3，4期，

1930年6月16日，7月1日，7月16日。

## 答张廷健先生书

张先生：

顷承吕振羽先生，介绍先生的这篇论文给我看。吕先生并且说，他认为这是很能平心静气地讨论的。我读过后，对先生所立三义完全赞同，无异议。文中后半，似承先生对我及王鸿一先生有所劝告；——因我好标举“民族精神”这名词，而鸿一先生则爱谈他的“伦理化”。这是十分感激的。我在《村治》第一期，只算发表得一篇自序；民族精神的特点如何，当然没有来〔得〕及谈到，而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但幸好我这个人，是呆笨认真的一个人；你便让我空空洞洞不着实，我都不会。我非把捉得实际问题争点，我便不会用思，不会说话。请先生注意，我非守旧之人。我因呆笨认真之故，常常陷我于苦思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幸免传统的影响，因袭的势力。“民族精神”这回事，在我脑筋里本没有的，“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我本是厌听的。我皆以发见实际问题争点，碰到钉子以后，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受的。十几年前，我就因其这样的愚笨不能早悟达，使我先父伤心，弃我而去。我于十四年所为《思亲记》上说：

“……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

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味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悟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

有一次梁任公先生对清华大学研究院学生，介绍我，说我有家学。我即声明，我本无学，尤其没有家学。先父在时，我正归心佛法，和胶执西洋政治思想；等到我倾向于故土文化中国思想时候，先父已过去两三年了。然而当那民国十年前后，即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我还没有提到过“民族精神”这句话；——这句话实是我近几年更有所见，而后拈出的。这名词绝不空，不泛；慢慢当向张先生及读者诸君请教。

关于先生所立三义，我还有两句话贡献。此三义自属平妥，然而这问题原是非常大的问题，非这样短篇论文所能解决。希望先生从学问上（不从常识上）将此三义很精严地建立起来，则于青年思想之启发必极有益。否则，亦是无甚效的，闻振羽先生说，先生是研究心理学的，那正好请先生从心理学谈这问题。有许多自命为科学的心理学者，对此类问题不敢深入，怕进了这哲学范围。我则以为心理学家不当避而不谈；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一九三〇·六·八·梁漱溟

附： 张廷健先生来论所立三义

- 一、物质经济之发达，不能直接产生道德；
- 二、物质经济之发达，为修养道德之基础或条件；

---

三、经济生活，应以道德指导之或规定之。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323—324页，  
1932年9月，村治月刊社。

《村治》月刊，1卷2期，1930年6月16日

## 冯著《从合作主义以创造中国 新经济制度》题序

我常常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到最近三五年来是（此）一次革命，有大进于昔者：“知注意于经济而于此求自救之方，一也；知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不为资本主义，不为近代国家，二也”。（见《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事到今日，革命的结果与革命的初意正相反，已无烦再说；然而这三五年工夫亦有不白费处，就是在民族自救运动上有大大的启发，“知注意于经济而于此求自救之方”。我们可以说，谁对于中国经济问题拿不出办法来，谁不必谈中国政治问题；若还想着“政治上轨道”，再谋发展，早已是不值一笑的笑谈。根本上，谁不注意经济问题，就不会了解现在的一切问题。然而一说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办法，大家心目中总不出国家资本主义一途。这又病在不明白中国民族从来在政治上的特殊性；——非常特殊地没有政治，不象国家。而这个计划的前提，必在建树起强大的国家权力；——这无论从物质基础讲，或从心理习惯讲，都不可能。想学着隔壁人家（苏俄）那个方法（党治）来行，尤其是不顾事实的妄想。于是这国家资本主义一途，在我们又断了希望。——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有专篇文字讨论，现在不去说他。我们以为现在只有有办法地借着地方政权来促进农业的社会化一条路。我们以为中国的工业问题，只能于此而得解决，我

们以为中国经济上的生产和分配两面问题只能于此并时而解决。而农业的社会化呢，只有取径于“合作”。

“合作”虽始而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下消费者的一种自救方策，或救济农民的方策。然而发挥起来亦正是一种主义；本此主义以为建设，正可成一种制度。例如丹麦或即可称为合作制度的国家。中国产业的开发与发达，不能不从农业入手，而且以他为主要，是铁的；则其必取径于“合作”亦是铁的。我尝怀此见解，而不期近年得遇冯梯霞先生所见适多相同。冯先生本是农业科学家，又以农业经济的研究，而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五六年来，复多从事乡村运动，于中国内地乡村社会，既具有一种观察和经验。据他自己说，他已完全认定中国必须从合作主义来建造中国的新经济制度。他现在这篇文字即在申明他的主张。我虽尚不曾得见他的全文，然夙闻其议论，故极愿为之介绍；我想这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上必有所贡献。

十九年六月廿四日漱溟识。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255—256页，

1932年9月，村治月刊社。



## “建设新社会才算革命”答晴中君

昨接友人黄良庸自粤中来信云：“读《村治》一期《主编本刊之自白》一篇，是吾师一向的精神态度，全体甚好；唯微觉仍有几分客气，此即生对吾师未放心处。青年易为气所动；稍一不慎恐人人以意气相高，而惻怛悲悯之怀无从以见，然惻怛悲悯之怀乃村治运动之真骨髓；吾师其以为有当于万一否？”黄君之言深切吾病，读之不胜警惕。然黄君所见犹为《自白》一篇耳；使见此答晴中君稿及前期通讯各篇，其必更为吾惴惴嗟惜！余一向以矜气浅衷，改化不易，既貽朋友忧；今出与一般社会接，对社会立言，感应捷于影响，犹不知戒，则于今日天下拂乱强戾之气将适以益之，其何能以回众人察理向善之心？吾诚过矣！用志于此，愿改吾过，并以谢当世之君子焉！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漱溟记。

我向来文笔迟钝，故《村治》第二期已届出版日期，尚未发稿。而师大社会学会即于此期间，要我讲演，再三辞谢不获，顺手抓了眼前一个题目，说两句话。我讲演向无讲稿。只有《新晨报》所载吴培申君的记录，是我曾于半小时内过目点窜数字者；此外各报所载，我皆未过目，漏略甚多。我于讲演记录

稿向不负责任，今吴君所记，经我过目一次，所以仍可负相当责任。但外间批评殊不能引起我答辩的兴味；又因我将有整篇文章整个主张，陆续问世，现在无就此一部分的话，重行申论的必要；所以很想不答。后见晴中君一文，态度颇见真诚，我不好不理睬，因写此篇。

我那题目何以说顺手抓来的呢？一则我正于数日前写一封公开的信给胡适之先生，请教他怎能置帝国主义与军阀于不问，二则适之先生恰来平又讲演他的五大仇敌说，三则我两年来要写的《中国民族之前途》一节，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其中一小部分是说，“革命对象难”；所以我那天专就此点，来指给大家看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此外并不想说旁的话。当讲时，一开首我即声明，“中国怎样才能好”非今天所能回答。讲完照例有结尾的两句话，我便说：“好好研究问题，仔细想一想，是于救国有必要的”。我怀抱主张之未曾提出，何等明白！乃尚有人将我与胡先生并列为目前两大救国说，而加以批评，未免太不懂人话！

我因为胡先生《我们走哪条路》一文，反对以暴易暴的盲目革命，是我所同意的，而他对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忽略没有认识，并且完全不想办法，则令我深所不解，不能不向他请教。例如，他文中只反问一句；为什么帝国主义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五大恶魔毁灭，遂没有抵抗能力？便轻轻将帝国主义撇开不提；他文中只说封建制度早已崩坏，便不再提军阀之事；（看《新月》2卷10号胡氏原文）这都是可骇怪的。故我叹息一般革命家已轻率浅薄，而非难革命家者，还出革命家之下。我一面请他注意认识革命家有其深确的理论根据；一面更请他先将一般最流行的主张办法先批评过，再指明

自己主张如何更有效而可行。我一再地说：

如果你不能结结实实指证出革命论的错误所在；如果你不能确确明明指点出改革论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认人家，而别提新议。

我希望适之先生将三数年来对此问题最流行的主张办法先批评过；再说明先生自己的“集合全国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办法，其内容果何所谓？——如果没有具体内容，便是空发梦想！

中国国民党所以不能不联俄容共，有十三年之改组，一变其已往之性质；中国近三数年的所谓国民革命，所以不能不学着俄国人脚步走，盖有好几方面的缘由。即就现在所谈这一方面，亦有好几点。其一则事实所诏示，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中国问题必在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由此所以要联俄，要加入第三国际，要谈世界革命。又其一则事实所诏示，中国的一切进步与建设既必待经济上有路走才行，而舍国家资本主义（再由此过渡到民生主义或共产主义）殆无复有他途可走；如此则无论为对外积极有力地又且机警地应付国际间严重形势计，或为对内统盘策划建造国家资本计，均非以有主义有计划的革命政党，打倒割据的军阀，夺取政权，树立强有力统一政府，必无从完成此大业；于是就要容共，要北伐，要一党专政。先生不要以暴力革命是偶然的发狂；先生不要以为不顾人权，是无理性的举动；这在革命家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在没有彻底了解对方之前，是不能批评对方的；在没有批评倒对方之前，是

不能另自建立异样主张的。

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本来中国人今日所苦者，于先生所举五项中，要以贫穷与扰乱为最重大。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假定先生不以军阀为仇敌，而顾抱消灭“扰乱”之宏愿，此中必有高明意见，巧妙办法，我们亟欲闻教：想先生既欲解决中国问题，对军阀扰乱这回事，必不会没个办法安排的；非明白切实的说出来，不足以服人，即我欲表示赞成，亦无从赞成起。（见《村治》第二期通讯）

那天讲演既非与胡先生对谈，不能说这许多话。然而从我指“中国人对资本帝国主义之认识，及其与自身之关系，中国所处地位之认识，和对于经济问题之注意与认识”，为三五年革命运动不可磨灭之成功；则我对中国问题中帝国主义与军阀，抱何意见态度，已都概括无遗；何须再多说？从我说：“很明白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仇敌，却不是一下子革命可革了的”；又说军阀“不能以拳打脚踢的简单方法去对付”；都可见我初不放松他们，而是要觅求更切实而有效的办法。乃尚有人写些无关痛痒的批评，以为我放过帝国主义与军阀不管，便义愤填膺起来；这等稚态，可发一笑，何足与论天下事！

晴中君虽亦不免此稚气，然有稍胜于此者。他文中共分三段来指驳我。第一段，他说：

梁先生只看到不安旧秩序起来推翻的直观的事实。而没有看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演进到矛盾地步”，才会感到旧社会秩序的不安，也没有看见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才算革命，所以他只知道书本上告给他的对于直接握政治权

力者的革命，……剥削者正不必显明的非为国中政权属有者不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也正不必非限在一国内不可；则革命的对象，当然不能非限在国内不可。

什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便要革命的老调，实无烦晴中君为我申告；这句话于解释中国革命上是不是适用，亦正有问题。请晴中君亦不必以马克思当圣经！不过“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才算革命”这话谁都承认，不成问题。我即从此意义，认我们在中国所要做的事，是革命；我即从此意义上，不能苟同于胡先生的改良派；然而这于我说的“国际间不能有革命”固无碍也。我们今日便是想推翻世界的旧社会建设世界的新社会，亦不得说“国际间可以有革命”。因为无论如何不是此一国与彼一国相对而发生革命也。何况我们说话自有范围，我们讨论帝国主义是否革命对象，原为中国革命而言；中国革命是指国民革命而言。共产主义之世界革命的革命对象，诚不必限于国内；然而若称为“国民革命”，乃以外国为革命对象，则未之前闻。中国对帝国主义者只多通告废约，不承认废约便宣战；那时中日之间，中英之间，只有所谓国际战争，无所谓革命，谁亦不得强辩。晴中君并不能驳倒我的话。

又须知者，我并不否认中国革命兼含有社会革命世界革命性质；我乃否认中国革命对内对外须用武力。我那全篇讲演无非是发挥中国革命问题的特殊性，按之常例均多不合；因而亦不能用寻常之所谓革命的手段——武力解决。所以我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非想作些“正名工夫”而已；而是要研究有效的办法。我说，“若是非干不可呢，则亦不必定计较名词”；即意在从办法上商讨。那么事实上又告诉我们，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十七年日本出兵山东，革命军退避三舍，不是胆怯的问题；

十八年因东铁事件中国人亦对俄终于屈服，亦不是忍耐力不够；实在是武力的无可比较。我们都没有研究过中国国防问题，不必瞎争论。然而凡是承认科学工业的威力之人，我想都于这“无可比较”，是不言而喻的。唯物的先生想不致靠义和团的忠勇来解决实际问题罢！至如我引北伐到武汉时，帝国主义者经济上的总退却，中国人受不了；这经济上的威力，似亦非诸位先生可以认为从精神上克服的罢！乃晴中君于此笑我为“资产阶级臭味充分表现出来”（见晴中君原文第二段）；他主张彻底革命，不能遽尔投降。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书中，叙及当日之事，早叹恨的说道：

“今日帝国主义之在中国，其实力还不在海陆军，而实在根深蒂固的经济力。我们可以学甘地提倡不合作主义，不穿洋布而返于古代的手摇机，但我们终不能不用煤而停止铁道的运输，及工厂的活动。我们纵可以停止铁道运输工厂活动，我们终不能叫一般工人停止食饭，待不合作主义的完成。所以我很感觉帝国主义不倒，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但要国民革命成功，先要对帝国主义者妥洽。”

晴中君或者要本其“无产阶级的精神”，批评他为“代表买办阶级的政府，无疑义的只好投降帝国主义者；……只可认为骗人计穷，现其鬼形，不可谓反帝之路走不通。”共产党对国民党，自然当如此批评。晴中君又隐约其词的说另有救济之方——“至于救济之方到底何指，只因内容的复杂与其他关系兹姑不谈”。可惜那时没有请晴中君一派人物领导中国革命；不然早有救济之方而完成革命了。不过那铁路上的无煤，兵工厂的无铁，十二三万工人的无饭吃，革命政府财政的无税收，若晴中君救济之方赶来不及，而坚持那大无畏精神，却要提防四面八方的

起反动，——就是革命党的本身没有方法可以维持革命的力量；亦会趋于反动的倾向，而崩溃起来。晴中君不要始终作梦才好！

陈公博说得很对：“我们应当先有反抗帝国主义者的准备工作”。大约经济上相当的基础实为必要；非此不足以替换那“经济上的鸦片烟”来。

晴中君第三段是同我讨论军阀问题的；可惜我不能把握他反对我之点何在。他说：“须了解革命非只破坏，而且绝对的还有建设。……梁先生大概——的确只见中国近年来嚷嚷革命，却只见破坏，只见军阀日多，遂以为革命不是中国所急须的，谓‘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否认秩序，不是如何破坏’……”。我正是反对必以武力破坏为革命的隘见，而主张以“革命建设”为革命的人。晴中君既不持必武力破坏为革命的隘见，则彼此所见正无不合。本来在社会旧秩序尚有权威时，武力破坏亦自有必要，却是今日中国旧社会秩序早已破坏无存。中国今日正是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未能安立，过渡期间一混乱状态。军阀即此混乱状态中之一物；其与土匪只有大小之差，并无性质之殊（土匪大了即升为军阀，军阀零落即为土匪）。他并不依靠任何秩序而存在；而任何秩序乃均因他之存在而失效，而不得安立（约法因他而破坏失效，党章因他而破坏失效）。他的存在实超于任何法律制度之前。他可以否认他自己的合理，承认他自己是社会一危害物，而于他之存在依然无伤；这是何等巧妙玩艺！打倒军阀；只能使某个人倒败下来，并不能打倒这巧妙玩艺。某个人不过基于这巧妙玩艺而偶然得势；这巧妙玩艺初无待任何个人而维持。从任何秩序均不得安立而言，则今日正不劳武力再来尽破坏之功；从这玩艺之巧妙而言，则复非武力所

能破坏得了。武力破坏的革命功夫，现在已经过去而不适用；现在所需要是“革命的建设”。——建设一新社会。

我说军阀非革命对象，亦不过指出他全不合乎革命对象的常例，亦即不能用平常革命手段武力解决他。所以我那天讲演只说到他存在于膏肓之间，隐微之地，非拳打脚踢简单方法对付得了而止。至于军阀果靠什么而成其“不倒翁”的存在，则我会让大家去想想看；什么是使他必倒的切实有效方法，我更未说出。今天既说出建设新社会的话，则我似不得不解释两句。

军阀存在于何处？军阀是一面托足于旧秩序之无形有力部分为基础；一面更头戴新秩序之有形无力部分为帽子。何谓旧秩序之无形有力部分？法律制度一切著见形式者为旧秩序之有形部分；此在今日多已破坏无存。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乃至思想见解，为旧秩序之无形部分；此在今日以社会上物质的进步之缺欠（视昔有改变，而无大进步），教育之所及又偏枯微弱，故尚为有力的存在，——在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的内地社会为尤然。按现在流行的语调去说，数十年来政治改革运动，文化改革运动，多使中国旧日社会上层建筑破坏；但下层构造则无甚进展（进展的范围与程度都不大）。于是所破坏者多为上层之有形部分，而无形的则效力未失。任何新秩序之不能为有效的安立，正在于此。新秩序只能为名色的安设，有形而无力；军阀即戴此为帽子（都督或省主席，革命军总司令或临时大总统），混迹于新秩序中。上轻而下重，正合了“不倒翁”的原理，摇摇来摇摇去，总是不倒的。本来他不能倒么！你不能从经济上使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有进展，他永世不得倒的——除非中国社会灭亡。然而武力破坏的革命法，其无益于中国经济的进步是很明白的。非“革命的建设”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建设



新社会才算革命”，是一点不错的。建设入手在经济；——我曾批评现在各地乡村运动或从教育入手，或从政治入手，皆不能行；而我所谓乡治则是从经济入手的（《村治》第一期通讯）。建设路径必须是革命的，——我所以反对胡适之先生以现代国家为目标；我所以叹息于国民党左派亦翻回头来说现代国家，就是为此（见《村治》第一期）。资本主义在中国已不可能；而非资本主义倒是非常的可能。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靠着经济问题有解决，而不能先得政治问题之解决，再解决经济问题。

然而旁人必要问，革命的建设果如何而可能呢？不解决政治，就能解决经济么？我现在只能答你以一笑！我这方才露一点我的意思而已；许多问题；许多原理，许多方法，还没有谈到十分之一；如果你真热心这问题而又有理解力，我总还有东西值得你研究思索的！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343—350页，

1932年9月，村治月刊社。

《村治》，1卷3期，1930年7月1日。

## 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

——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我刚才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上说过，几十年来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就其思想主张来看，不外一个前期的，即感受着欧洲近世潮流而来的，一个后期的，即感受着欧洲最近代潮流而来的。无论在政治一面或经济一面，都有这前后两期思想。然而我们看上去，民族自救运动之前期，可说是偏重在政治一面，而后期则偏重于经济一面，所以我们现在谈政治一面的前期思想，几乎亦等于谈全部的前期民族自救运动了。

中国怎样才能好？要改换一种政治制度才能好。因为政治制度是决定国家权力之如何运行与使用的；国家权力用得对，则国自会好。大约前期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是着眼在此，要废除数千年相沿的政治制度，而确立一种新政治制度，以此为救国之根本方策。自光绪年间的变法维新以迄民国七八年的护法，总不出此意。然此新政治制度又何所指呢？大约在大家心目中所有的便是欧洲近代那种政治制度。似乎这二十多年间思想变化不知有多少，总不该统括来作一回事看。然而你试看民国七八年的护法运动，其唯一的信念，不是法治吗？其所拥护的约法，不是从欧洲近代政治制度抄来的吗？而在光绪年间所唱的变法维新，其所要变的法虽多，类如剪辫易服亦是其一；但其主要

者，亦何尝不是此物——欧洲政治制度。因为那时节已经都知道注意英国所谓“巴力门”，所谓“议绅”了。岂但民国七八年与光绪年间是一回事，即在今日，前后相隔三十多年了，似乎今日即最不高明的人，亦不致与彼时变法维新家同其思想；然而说到政治上的路，大家期望着要走的，在我看，还不出那套。

这种思想，这种运动的最盛时期，要算光绪末年迄民国七八年（1905—1920）之一期间。因为在这期间内，这种政治制度差不多已成了有知识的人之间普遍的信念，而其他种运动亦可说尚未发生。前乎此，则此信念尚未得普遍；后乎此，则疑议渐兴，异种运动发生矣。在我自己，因为恰好是在这期间内生长大的，所以早年曾是一个热心于这种运动的人，而且直到民国十年我讨论东西文化问题时，所见尚无改变。（自我十七岁迄二十九岁，即（1909——1921）如果将我的救国思想分作两期，则第一期亦只是如此。

## 一 欧洲近代民主政治有使我们 不能不迷信者两点

欧洲人在近世纪开出来这一种新政治制度，渐渐为其他洲土，其他民族所仿行，几乎要成了世界化。虽然在个别的国度里，具体的表见，有很多的不同；然而显然的是出于同一精神，即所谓民治（Democracy）。以我的了解，则此种制度实有使我们不能不迷信的两点；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合理；一点是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巧妙。

所谓合理是什么呢？第一层，便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

与作主的权；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干涉过问的权。前一项，即所谓公民权；后一项，即所谓个人之自由权。在这种制度，大概都有所谓宪法，所以又称立宪制度；在宪法里面，唯一重要的事，即关于这两项的规定。如果以这种制度和旧制度去比较，其唯一特殊新异之点，即在此。又如何是他的巧妙呢？他这种制度，使你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人才各尽其用，不待人而后治。其结构之巧，实在是人类一大发明。如果问这种制度的真正价值，则其远胜过旧制度者，实在此。我们试分别说一说。

## 二 所谓他的合理

虽然十八世纪的《民约论》，《人权宣言》一类思想，在今日看，是陈腐的，甚或不通了；然而个人应有其自由，毕竟是自明之理（不假论证的）。在欧美国家里，对于个人自由的尊重，保证，拥护，毕竟是深入人心，非常可爱的精神。大抵个人的种种自由，类乎身体自由，财产自由，意见自由，以及信教集会结社等自由，都于宪法予以规定。这就是表示尊重；而其保证与拥护，则赖有国家的各种机关，尤其是司法机关。司法独立，绝对尊严，就是为保障人权的。国家权力虽大，而个人的行为不到妨碍公众秩序和侵及他人，是不受干涉的；所谓犯法，只是妨碍公众秩序之意，除此而外，无所谓犯法。法律是出于公众意思所订定；犯法时节，亦只能按照一定法律手续来拘传，来裁判，来处罚。若官厅无故拘系一个人，那问题便大的很；便是警察随便入人宅，都不行的。象我们中国从前乃至现在，不但拘捕人不算事，生杀予夺，亦无不如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绝无半点保障，真是野蛮世界；可怜已极！在他们只有紧急戒严时期，人民自由是受些干涉拘束的；然而戒严令之发布，是非常慎重的。只有在战争和其他大事变发生时才可，其手续亦必依照宪法所规定。决不象我们随便就下戒严令，——其实戒严不戒严都是一样，简直亦不必分了。

以上是说个人之自由权一层；还有那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一层，即是人人都有分预闻政治。虽然这句话实际上没有全作到；资产阶级的操纵把持，亦是真情；然而这种种意向，当初毕竟是有的。而后来普选原则的采用，比例代表制的改订，直接民权的实行，亦明明是本着这种意向，逐渐在作。在这新政治制度里面，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机关是议会；议会最重要的职责，便是议决或制定国家预算案；——这就是公众的事大家均得参与作主的方法。因为国家办一件事，总得需钱；钱总是从大家出；所以钱的如何征取，如何支配，便是政治上一切举措兴施所由决定。象这样大家出钱，商量着来办大家的事，这岂不是顶合理的吗？在旧日制度，政府可以随便抽捐加税；收得钱来，用到那里亦无人能问，不得而知。此在欧洲百年以前，早已行不通的事，然而在我们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而且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十倍于从前，谁敢说个不字？拿得钱来，养兵养官，任意的滥用，谁敢请问一声？真是野蛮已极！

大概前后两层——自由权与公民权——是相因而来的；两回事，实是一回事。自公众的事；众人共同作主来说，谓之公民权；自各人的事，各自作主来说，谓之自由权。这一回事由何而来？由人类认识了他是一个人，有了他“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才有所谓公〔民〕权，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上说明这是“人的个性伸展”。(24—41页〔1〕)我以为在人的个性屈抑着的时代，人类实未曾得有完全的人格；完全的人格，必于人的个性充分伸展以后的社会才配说。虽然个人本位主义现在已不时兴，社会本位主义将有代兴之势，然而社会本位主义，必于人的个性伸展以后才能说；个性不立，绝不是健全的社会组织。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尊重，毕竟为永恒的真理。欧洲政治制度的民治精神，不独为我二十年前所迷信的，抑在今日，仍不能不承认他。

### 三 所谓他的巧妙

他的妙处。就是使你为善则可以，为恶则不容易。先就司法方面来说罢：从前我们立法，司法，行政是不分的；而在他是三权分立的。法官不能自己出主义〔意〕定法律，只能依照国家法律审判而已。不象我们一个知县，就可出张告示，甚或口头说一句，禁止什么什么；犯了的，便算犯法。法官在审判以外，旁的事亦不能作；检举与执行，都不归他。他不能逮捕人，或用刑罚于人；想要作威作福，完全达不到。就在审判之时，如陪审制度，如律师制度，以及公开观审等办法，都是使你为恶不容易的。而无论法官大小，都是独立审判；虽总统皇帝，不能干涉。又终身任职，按年增俸，不但不能轻易免他的官，随意迁调都不能。总而言之，无机会给你舞弊，只有一条路让你走——好好安心尽你职责，公平审判。说到检察官与警察，虽能逮捕人了，又不能径予处罚，而须送交法庭。其所能

---

〔1〕见本全集第一卷第365页——编者。

处分的，都很小，如警察官得依违警律罚人两圆钱而已。要凭藉官权作威作福，没有多大可作的；人亦不怕他。至于行政之其他方面，只有尽本分，谋建设，更不能奈何人。就想作弊赚两个钱，大概亦不易。甚么都得依照国家预算案，不能活动开支。又有财政上的司法机关，即审计院，在审察监督；簿记有一定格式，非常清楚。财政征收机关，有一定税则，款交国库，或许不经手银钱。一切行政官吏，若所为行政处分有不对，人民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撤销之。作弊则有刑事罪。至在上握政权的人，负政治上的责任，与一般行政官吏不同，则又有国会监督他。小则提质问案；大则提不信任案；犯法则提弹劾案。对外结约宣战，要得同意，增赋募公债一切加负担于民，都要同意。百政之兴施，都见于预算案；预算案，是要经国会通过的；诸如此例，大概，误国殃民，实有些不甚容易了。这都是说，使人不能为恶。然而他的妙处，尚不在此。

妙处在使人为善，在才智之士，得尽其用，在政权从甲转移到乙，平平安安若无事。我们要知道；在从前君主专制下面，不但为恶容易（为恶的机会都预备好了），实在是为善不容易。何以说呢？大权在一人，无限制，且不分；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托于他，一国兴衰存亡托于他；他稍为一动作，关系影响不知道多大。而一人的耳目，如何能够用？一人的心思如何能够用？他作事实在太危险了！无心为恶，而遗祸为害，已不知有多少。若再加以佞幸妇寺等的蒙蔽、调弄，更不得了。即此都不说，算他有心要好，人亦不糊涂，而日久腐败呆滞与偏敌，亦不得了。人，性情总有所偏，见解主张，总有所偏，政策办法，总有所偏；不偏于此，则偏于彼，完全不偏，决无此事。日久了，总在一种空气之下，一个方向之下，没有不陈腐的，没有

不出毛病的。所以如何救济从国家权力机关所生出的危害，腐败，偏弊，实政治制度里面第一大事。然而，在此直无法救济。只有暴力革命，实在牺牲太大，太可怕！近代政治制度的妙处，就在免除这样可怕的牺牲，而救济了上说的弊害，能有政象常新，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竞于为善的机会。此其妙用，盖都在他的政党。

记得苏东坡有一篇文章《论养士》，说战国如孟尝君等各家，都讲养士数千人，秦并天下而不知养士，故不旋踵，而揭竿者蜂起。大概才智之士，没有不露头角的；不给他出来，便要逼得捣乱。莫妙于替他开出路来，使之自由竞争，则不但不致为乱，而且尽得其用，食其利，在欧美国家里，只要你有本领，在政治上有主张，尽可邀结同志，领袖一党，取得议席，致身政府。总统，总理，由贫贱出身的，很多很多。总而言之，在选举制下，毕竟权在多数人，才足动众，德能服人，决不会湮没你的。你只卖力气干好了！所谓人竞于为善，就是指此。而在国家机关一面，或如美国总统，四年一换，或如英国总理，不必定期，静等着漂亮角上台，自有推陈出新之妙。何必象旧制度，不知何年，不知那里，生出圣君贤相，政治才得好。所谓人尽其用，不待人而后治，就是指此。

在这种制度里面，一切人才固然得着自由竞争的机会，他并使国中各种不同的势力，如不同的宗教团体，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职业社会，不同的地方自治团体……都汇聚消纳在上议院，而听其自相磨荡，自为药剂，自寻出路；而我无所容心，无所用力于其间。因为人才不给出路，固易生乱，而社会上、或大或小各种不同的势力，若不容他各如其量的发挥活动出来，亦不得安。古人常说求一个长治久安之策，其实



照从前制度，总要一治一乱的；只有如此，乃真所谓长治久安。其所以然的巧妙处，就在“无所容心，无所用力”八字。

前后总起来说，旧制度是为恶太容易，便有心为善都不容易，而新制度，恰好与此相反。其价值自不可同日而语了。

#### 四 中国仿行这种制度之不成功

这种政治制度如此合理，如此巧妙，真使我不能不迷信他。在清季则期望着开国会，在民元则期望着有政党内阁，民二以后则痛心约法的破坏，主张护法，并期望联省自治，无非是在梦想这种制度的成功而已。直到民国十一年才渐渐觉悟，——这觉悟当然由十几年的变乱，所给的启发不少。因为极期望他成功，而总不见他成功，并且愈趋愈远，则总要推求他所以不成功之故，最后乃完全从这迷梦中醒觉出来。以我推求所得，其不能成功而反以召乱者，大概可分三层去说。三层之中：从头一层看，可以明白他所以未得成功，从第二层看，可以知道他一时无法成功，从第三层看，便晓得他是永远不能成功的。

先说头一层，二十年来所以未得成功之故。须要知道，在这种制度里面是要权操自多数人的，所以又称多数政治。要由多数人造秩序（宪法及一切其他制度法律等），要由多数人来维持他，但中国的政治革新，却是出于少数知识分子所作的模仿运动，在大多数人是全然无此要求的。这少数分子以日本的游学生，或受其激动感化的为中坚；连热心者附和者统算起来不能超过四万人。这在中国人全体里，只是万分之一。说句笑话，还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六万人，不具附和之情，不参预这种运动。以士农工商来说，农工商三项人都不附和，士人亦只

一小小部分。而这件事却是要待多数人来作的，试问如何能成功？（顷见日本长谷川如是闲《对中国作如是观》一文，有云：中国革命几为知识阶级的事业，是在孤立状态。又云：这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的，但是产生他们的是欧美及日本的近代国家的历史。正好与此参照。）有人说这多数政治不过一句骗人的话，其实仍旧少数人操纵，固然亦说的不错，然而能受操纵亦就够程度了。他尽可于这制度不甚了解，于当下的问题亦不清楚，更昧于操纵者的存心；但只〔至〕少他承认这制度，信用这制度，不怀疑，未曾拒却。而在中国则大多数人，正是怀疑与拒却呢！怀疑与拒却是深一层的看法，最浅而易见的是他没想要这个。参政权，自由权，虽然在你看是好东西，但人们自己未起需要，你送到他面前，他亦是不接受的；强递给他只有打烂了完事！天下事总要饿了再吃饭，渴了再饮茶才行啊！乃想以极少数人替大多数人建设多数政治；当时热心运动者，何不思之甚耶！

还有上面所说“摹仿运动”四字，亦当注意。这就是说，在少数作此运动者，亦非有真要求。假使中西不交通，中国人自己发生自由的要求，参政的要求，方为真的。而在当时，实在不过看见了外国的好，引起一种摹仿心理，——是从外面引动的，不是自动的。天下事是自动的，是真要求，乃有结果；否则，多半无结果。

## 五 物质条件之不合

欧洲制度，在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第二层原因，就是物质条件不合。此又可分为三项来说。

中国人生活向来是单简低陋，近二三十年，又加以特别困难。大约在前数十年，生活低简的现象，比现在普遍，而现在已少变。一则都市颇形西化，资本主义化。一则农村人口颇形减少，——自新交通新工商业之开辟，添了许多工人商人；又政局变乱，添了许多军队土匪；又以经济政治教育诸原因，而使人口趋集都市。但这些由低简而进于不低简的现象，并非真是国内富力增进，只是形式变动了。所以随着这不低简现象而来的，是生活之极不安稳与困难。但不论前后那种情形，都与民治制度条件不合。因为生活简单低陋，其知识能力，亦必简单低陋；而且由其拙笨，极少闲暇。中国不识字的人，比例之高，就是为生活低简，用不着文字；（《东方杂志》二十五卷某号，有《中国之文盲问题》一篇，谓中国之文盲约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欧洲民治发达之国家，如瑞士，如英伦，或不足百分之一。）根本上连文字符号都不用，更何从说上知识能力？民治制度之不能行，实属极明白之事。或者在极小范围（人数少，区域小），如一小农村、办起事来，略具民治精神，犹或可能；而建设民治的国家，尤其象中国这样广土众民的大国家，直为不可想象之事。又人必有余力，始能过问政治。仅足一饱的人，不能过问政治；忙于生业，心思不能旁用的人，不能过问政治。古时雅典所以能行民治者，就因为生产的事，另有奴隶一阶级担负去作；市民都有闲暇，人人可预闻政治。欧洲近世的政治，若不为产业发达，增进一般的富力，一般的知识，而有余力余闲，则亦不会成功。我们后来虽有些人。生活不象从前低简，而低简的仍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又何补呢？不但此生活进步者为数甚少，更且他们生活极不安稳，随时有陷入困难的可能；因此他们无法自成一种势力，来过问政治，而反倒以其竞争饭碗

扰乱了政治。此意俟后尚须论及。

物质条件不合之第二项，是交通太不发达，而国土太大。中国人之不注意政治，并且没有国家观念，其一大原因，即在于此。原来中国一国的疆土，是与全欧洲差不多相等的，而人家又有缩地法——交通发达。我们的交通不发达，不知比人家差多少倍；那末，中国之大，直可说数倍于全欧了！大的直仿佛没有边，在内地人民的感覺上，实在不能不麻糊了，——他看不到国在那里。政治上无论怎样大事件，他亦听不到；或者听到，亦是不知过去好久了。目不及见，耳不及闻，而在他又是一个不会利用符号智慧，而专靠感觉的人，则试问将何从使他们知有国家，注意政治邪？注意不及，更何从有什么意见主张？即其中有意见主张者，以国之大，人之多，交通之不便，其力量亦难有什么影响达于国家政治。不能有影响，则懒于发表，或发表活动一番，而卒归败兴灰心。盖物质条件，实在教他无法过问也。在内地农业社会的人，直有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外间的事不晓得，外间的人不识的。要办选举，则选民与被选人之间，自多无关系。而况民国国会组织法，要按八十万人口，选出众议员一名；其范围太宽，更将隔膜。选民去投票，或要费他一两天的路程；初选当选人去投票，或要费他十几天的路程。不论他不肯赔钱，并且他不肯赔这个工夫。所以单就选举来说，交通不便，都无法办。

物质条件不合之第三项，即是工商业之不发达。其实，前说物质条件种种不合，总不外产业不发达一句话，可以尽之；而至此方说工商业不发达，意盖专有所指。在欧洲，这种政治制度之所以成立，实为工商业发达，贵族僧侣之下，农奴工人以上之中间阶级地位势力增高，取得政治上地位所致。他们非参

预政治乃至管理政治，不能护持和发展他们的工商业，于是国家大权，就从皇帝，贵族，僧侣手里开放出来，而公诸他们。就中国看，则民治之不成功，亦即吃亏工商业不发达，没有这一阶级起来。前于第一项曾说中国人生活都是低简的；少数不低简的，其生活又极不安稳。换言之，这少数人若有他们一定的生活基础，则为自护持其生业之安稳，并发展繁荣起见，必要过问政治；一面其知识能力闲暇，既足以过问政治，则政治必能公开来有个办法。但中国以前固然没有什么工商业，而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直至今日亦还没有多少工商业可言。故此少数人生活之较优，多非从工商业来。有钱的人，不是工商业主，而是军阀官僚政客买办。买办除靠外国人外，亦常藉接近军阀官僚政客以发财。此外更有些藉官营商，半官半商的人。总而言之，他们都是要争夺政权直接以发财，不是要参预政权藉法律护持其财产、藉政策发展其营业。与欧洲工商业主对照，恰好相反。彼则利政权之公开，此则利政权之独占；彼则利秩序之安定，此则利局面之常翻。还有好多说不上有钱，而生活已属不低简者，自是那多数受过点教育，靠运用观念吃饭而不能劳力的人。其最高形式为教育家，知识阶级；而下至一切在军政商学各界混饭的人，亦俱在内。不但此中止在谋差求事的人，成千累万在各大都会向军阀官僚政客求怜，即好似清高的教育界、学生界，为取得或保持或预算自家生活起见，亦莫不求接近政权，贿赂官府。其不能站在自己生活基础上，要求政治的清白，而反倒追逐军阀官僚政客之后，推波助澜，以扰乱政局是显明了。

总结上说而重申之，所有的中国人，可别为两部分：一大部分（总在八成以上），是生活单简低陋，无法过问政治的；一

小部分，生活不算单简低陋，可以过问政治了，但其中自有生业者，如工商业人占数过少，而大都是集中于靠政权为生一途。其对于政治，势必本于个人眼前利害而出发活动，全然非所谓过问政治；因此民治不得成功。记得民国十一二年间，章行严先生曾一度唱农村立国之论，而始终不得闻其详；仅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是农业国，没有工商业，所以不能行代议制度。其如何立论，不大记得，仿佛有“荷包问题”的话。何谓荷包问题呢？是说在欧美一切议员政客，总都以他们的政党为大本营，政党皆以工商业的资本家为靠山，由资本家荷包里出钱，作政治活动。故议员政客，一切人等之生活费，乃至一政党之大批选举运动费，均有所从出。不似中国议员政客生活全无着落，乃不能不以其个人生活为前提。所以历年来国会议员南播北迁，尤其是曹锟贿选前后，明白的视金钱为去就。政党的费用，亦无不出于政治上的野心家图谋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而下的本钱。其病即在真正作政治活动的人背后没荷包。资本家出钱，纵然偏于为资本家谋好处；然其目的，私中有公（多数工商业家的好处，非一个人的好处，）其手段，尤须公开，（法律与政策）其结果亦大家同蒙其利（工商业发达）。政治上的野心家出钱，则政治立刻陷于腐败，扰乱，可不待言。章先生这个意思，与我上边所说，话稍不同，而本一事。

从上三项物质条件之不合，则我们在中国图谋民治制度之实现，实为天然明白的不可能。然而，若问题仅止于此，则尚非无方法可想；因为所有这物质条件的缺欠，都为产业不发达一个原因而来，只须我们使产业慢慢发达起来，就可解除这困难。所以从这里说明中国民治的不成功，还只是一时的不易成

功而已。以下我们将说明其永远不得成功。

## 六 永不成功在精神不合

欧洲近世所开辟之政治制度，仿行于中国，使吾人深见其永远不得成功，大有在前说物质条件缺欠之外者，则精神条件不合是。此制度所需于社会众人之心理习惯，必依之而后得建立运行者，乃非吾民族所有；而吾民族固有精神实高越于其所需要之上。这就是我在本刊屡次提到的话：

我已不认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洋政治制度是一时的现象；我疑心中国人之与近代政治制度怕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固然，西洋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国不能仿行成功，亦是因许多客观条件的缺乏或不合。然而那都不是根本的窒碍，无可设法的困难。惟独这中国古代文化之迈越西洋近代文化之处，涵育得中国民族一种较高精神，则是没办法的所在；——中国人将不能不别求其政治的途径。

新轨之不得安立，实与旧辙之不能回归，同其困难；而世人不知也。旧辙之所以不能回归，其难在少数有力分子意识上明白地积极地否认他；新轨之不得安立，其难乃由吾民族（兼括有力无力分子）不明露在意识上的消极地不予承认接受。多数无力分子从其数千年迷信和习惯，对于新制度无了解不接受，这是容易知道的；而其不接受实更有在迷信与习惯之外者，则人多不留意。少数有力分子固明明为新制度之要求者，而在其意识背后阴暗处同时复为其拒却者，人尤不留意。故十数年政局之纷扰，政象之浊

糟，未尝不指示我们新轨辙之不被接受；而昧昧焉期望民主期望法治者，至今犹盈天下也。然而吾知其事之不能矣！（以上并见《主编本刊之自白》）

曾不知近代国家是怎样一个东西。他的政治背后，有他的经济；他的政治与经济出于他的人生态度；百余年间，一气呵成。而我数千年赓续活命之根本精神，固与大异其趣，而高出其上，其何能舍故步以相袭？（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

这些话都是很空洞抽象，自非具体地指实其内容，或不为读者所了解。我们即其荦荦大端，指出四点来说。

## 七 所谓精神不合者其一

中国人和西洋人，在人生上是迥然不同的两样态度，两副神情；——这是我们先曾一再说过了的。<sup>〔1〕</sup>态度精神之间，其几甚微；而天下大事正须于此取决。如我所说，不同之文化实源于不同的人生态度。西洋近代制度之辟造，虽有种种条件缘会之凑合，然语其根本，则在其新人生态度；——这亦是我们先曾一再说过了的。<sup>〔2〕</sup>试看英国宪政是如何一步一步始得确

〔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见本卷），皆发挥此义。

〔2〕“谁都知道‘德谟克拉西’是由西洋人对于上者之压迫起而抗争以得之者；所谓平等与自由，实出于各自争求其个人权利而不肯放松，以成之均势及互不侵犯之承认。”“本来一部近世史，就是一部个人主义活动史；就是以人的自我觉醒开其端。从认识了我，肯定了自己，而向前要求现世幸福，本性权利；后来更得着以开明的利己心为出发的哲学论据，以自由竞争为法则的社会公认，于是大演其个体对外竞争的活剧；所有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打倒特权阶级的民治制度，一切有形无形，好的坏的东西皆由开发出来。”以上俱见《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一文。



立；法国革命是如何一次再次始得成功；以及其他各国革命史，就晓参政权是怎样争讨而得，个人自由是怎样反抗而得。若不是欧洲人力量往外用，遇着障碍就打倒的精神，这“民治”二字，直无法出现于人间。他不但要如此精神乃得开辟，尤其要这个精神才得维持运用。我们不是说过欧洲制度的妙处，使你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不待人而后治么？但他这种妙处，必要有一个条件才能实现，就是各人都向前要求他个人的权利，而不甘退让；如其不然，必须良善者受害，而恶人横行；善人为善不足，而恶人作恶有余；虽有圣人，不能为治。因为这制度里面，即以这制度本身（宪法及其他）为最高，更无超乎其上的来维持，运用他，其赖以维持而运用者，即在此制度下的大家众人；又非要待大家的热心好义来维持，只是由大家各自爱护其自由，关心其切身利害而维持，而运行。如果不是大家自与其本身有关的公共利害问题而参加，则大权立即为少数人所悉取；如果不是大家自爱其自由，而抱一种有犯我者便与之抗的态度，则许多法律条文，俱空无效用；这是一定的。态度神情实为生活习惯的核心；而法律制度不过是习惯的又进一步，更外一层。自其人之态度神情以论其社会之习惯法律制度，原是一脉一套，不可分析。法律制度所以为活法律制度而有灵，全在有其相应之态度习惯，虽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其势力伟大关系重要固远在形著条文者之上。但中国 1919 年革命后则徒袭有西洋制度之外形，而社会众人之根本态度犹乎夙日之故，相应习惯更说不上。所以当共和成立以后，十多年扰攘不宁，一般人说这都是大家太爱争权夺利的缘故，我则喜说这正为大家都太不爱争权夺利的缘故。此话看似有意翻案，而其实在当时正是一点真的觉悟。读者试翻取我十三年前所为《吾曹不出如

苍生何》一文，十年前所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便晓然我当日的用心。我曾一再地说：

我们历年所以不能使所采用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实际地安设在我们国家社会的原故，全然不是某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虽然前清皇室宣布立宪之无真意，袁项城帝制自为之野心，以及近年来军阀之捣乱，不能不算一种梗阻，而却不能算正面的原因。其正面的原因在于中国一般国民始终不能克服这梗阻；而所以不能克服这梗阻的原故，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其东方化政治制度下所抱的态度。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与西方化刺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全设上去！<sup>〔1〕</sup>

（上略）我们眼前之所急需的是宁息国内的纷乱，让我们的生命财产和其他个人权利稳固些；但这将从何种态度而得作到？有一般人以为大家不要争权夺利就平息了纷乱，而从佛教给人一服清凉散，就不复争权夺利，可以太平。这实在是最错误的见解，与事理真象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所用的政治制度是采自西洋；而西洋则自其人之向前争求态度而得产生的。但我们大多数国民还依然是数千年来旧态度，对于政治不闻不问，对于个人权利绝不要求，与这制度根本不适合；所以才为少数人互竞的掠夺把持，政局就翻覆不已，变乱遂以相寻。故今日之所患不是争权夺利，而是大家太不争权夺利。只有大多数国民群起而与少数人相争，而后可以奠定这种制度，可以宁息累年纷乱，可

〔1〕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章，“以为这问题还远的不对”一节。

以护持各人生财产一切权利。如果再低头忍受，始终打着逃反避乱的主意，那么，就永世不得安宁。在此处只有赶紧参取西洋态度，那屈己让人的态度方且不合用，何况一味教人息止向前争求态度的佛教？我在《唯识述义》序文里警告大家，“假使佛化大兴，中华之乱便无已。”就是为此而发。（下略）〔1〕

此其用心亦良苦矣！一面既察见乎彼西洋制度背后所凭依而建立而运行者，有其一种必不可易之精神；一面复审于我们从来态度之与他刺谬不合；然而尔时犹是这样肯定西洋制度为我们所必须努力实现者；态度有不合，我们是必须改变了以求其适合的。这实在是清末民初率然要建起西洋制度于中国，碰钉子后，一向梦想民治如我者一点真的觉悟。然由今视之，盖犹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我前答张君廷健云：“即在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我还没提到‘民族精神’这句话”；“‘民族精神’这一回事，在我脑筋里本来是没有的”；盖正指此时，此时盖犹以为中国人态度纵与西洋不同，而参取舍融，稍变其故风，宜无不可。故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总结，论“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有云：

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定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舍融到第二态度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

〔1〕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一节。

第二路的过渡时代。

我们可以把孔子的路放得极宽泛极通常，简直去容纳不合孔子之点，都没要紧。儒书有一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话，我想拿来替我自己解释。

呜呼！由今视之，这直是糊涂！是徒见夫此制度之有需于中国人之改其态度，而未识乎中国人态度既有其不可改者矣。语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特极言其难耳；更翻过来极言其不难，虽曰初无本性其物，亦何不可。然于此有一大原则焉：改移而上，可也；改移而下，不可也。迨吾见夫西洋风气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精神之弛散懈败陵夷就下，至于不可收拾，而后憬然有悟中国人态度有不可改者已。中国人一般的态度是安分守己；——这是最标准的态度。由此而上，含藏着更高明的人生思想，更深厚的人类精神，说之不尽；由此而下，便流于消极怕事，不敢出头，忍辱吃苦，苟且偷生等习惯心理；——一言以概之曰，“不争”。使中国人从其文化之稚愚而不知争，或欲争而不得，其消极不前徒为习气之陋也，数千年生活至今而犹未望见西洋人近世之所为也，则设非奇蠢至愚之劣等民族，或民族衰老不堪再造，其必于新风气之来，有一种新精神之勃发焉；其必于民族生命上开一新生机焉；纵以制度不相习，骤难得其运用之道，而瞻其气象当不可同焉。然而验之廿年间眼中事实果何如哉？吾是以知其有不可改者。质言之，中国人之“不争”固有其积极精神，以视西洋人之“争”在人生意义上含蓄深厚，超进甚远；乃欲降而从西洋人之后，将无复精神可言，并不能有如西洋人之精神。向上求进，其势若甚难；然是生命之自然要求，进必有所就。降而未退，其势若甚易；然退则坠矣，不能复有成就矣。故曰：改移而上，可也；改移而下，则

不可。

原来中国人数千年生存至今，自有其妙理妙用，就是各自消极节制，而彼此调和妥协，适与西洋人之往外用力，辗转于彼压迫此反抗，或相抵消而剂于平者，其道相反。此其形著为中国文化的特征者，莫若其“不象国家的国家，不要政治的政治”，莫若其人权虽直至于今树不起保障，不能比于任何国民，而自古既有比任何国民更多的自由。吕新吾《呻吟语》治道篇有云：

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兴，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起敝。

其言实代表一般人之言，非个人之独见。与此消极无为的治道相应者，即其散漫地自生自灭的社会众人之安分守己的态度。如我前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中所说者，其社会已构成一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局；士农工商以及天子每个人心思力气还用诸其身，以求其各自之前途。其社会秩序人生幸福皆于此得之，故数千年相安而不改。如或乱作而生民苦，则以为有失于是道，务求所以循归之，盖无有异议者。于是所有人生思想，人类精神，悉向此途以发挥，高明深厚，有说之不尽者，并以蔚起而陶成。即其处己有以自得，处人仁让谦礼，于人生意趣之所进诣，已远非近世西洋人日以逐于外争于人者所能梦见。两者相较，此实为更需要精神上努力自强之一种人生。虽若邻于消极，正非不用力；——其用力弥大而不形。其有所谓消极怕事，忍辱偷生等习惯心理者，力不逮于是而不能不敷衍乎是，乃不免为下等习气之流行。抑吾既言之矣，中国文化本乎人生第二态度以创造去，而不能不为其物质上之不进展之所限；是即所谓人类文化

之早熟，其形态间不免时现幼稚。行于其社会间之种种习惯心理，论者以比于所谓宗法社会所谓封建社会者亦未云全非。一社会之习惯与制度所为范铸以成，固必应于其社会生活之所需切，社会生活又必有其物质的基础也。无识者动辄曰，是专制帝王之所为也；专制帝王其何能有为？与其曰专制帝王之所为，毋宁曰中国圣人之为。圣人其何能为？其言有当于人心，其所指示于人者既有效验而人安之也。是与其曰一二圣人之为，又毋宁曰中国人之自为之。文化的特殊方向既萌，后之人皆于是竭尽其聪明才思，益为种种安排种种教训，上而为精神，下而为习惯，以振以励，以濡以染。所谓“无有异议者”，事实所在，不得不尔；虽圣智有不能越，而别为计者已。“民族精神”一词，宽泛用之，兼赅有力精神无力习惯以为言，狭义唯指精神。以言中国人之精神有所偏，吾不能否认；以言多数中国人之习惯猥陋驯懦，视近世西洋人生有愧，吾不能否认。近世之西洋人生亦自有其一种精神，然而吾固尝评判之矣：“这幕剧亦殊见精采，值得欣赏；然而不免野气的很，粗恶的很。”〔1〕使既造于深厚温文之中国人复返于粗野之为，有不可能已。上焉者诚有所不耐；下焉者将无所不至。吾民族生命数千年传演至于清代，民族精神浸已消涸；所谓中国人者适当躯壳徒存内里空虚之候，其将无所不至者正在多数固宜。凡吾所有，虽上而精神；下而习惯一切都与欧洲制度所需条件不合，眼前为碍的，似尤在多数人的下流习气，牢不可破，但其真使中国人与这种制度绝缘的，则在有力精神之隐约仅存。如果单是陋习为碍，则从我们的向上心，非改除不可，亦没有不能改除的；当改除之

〔1〕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第二节末。

时，即创造出新生命之时——一切新生命皆以向上奋发为根苗。若有力精神不合，则无办法。因为要牵就这制度，不能不学着欧人向外争求的态度。这回视自家精神（现于意识上或隐约于意识后），实是一种退坠；实在松懈萎靡下来，则丧身失命，就在于此，尚何有于新生命之创造？南宋以来之中国社会正是患着文化上“无可指名的大病”，生不得生，死不得死；其必待外力以推转开动之，而后乃有一新生命，固无疑。1911年的中国革命，原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发的民主革命；——此固于中国历史上永不能期望见其开启之机者；〔1〕而实为激于西洋文化的打击，由少数仁人志士先知先觉所发起之一种藉模仿以自救的运动。——此绝类于人之因病而求所以自药。药之，诚是也；然所以药之者，“高过我们固有精神的，便能替我们开新生机；若低下一些，便只益死机，在我们固不能由是开出新生命，即在他亦不得成功。”〔2〕若欧洲近代政治制度殆犹非其选乎。

胡适之先生尝判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是可与顷所云西洋人精神在争，中国人精神在不争者，互资参对。其警切语有云：〔3〕

他们（西洋人）说，“不知足是神圣的”（divine discon-

〔1〕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第六节。

〔2〕见《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第二节，第十二段。

〔3〕胡适之先生于民国十二年《努力周刊》批评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尝否认我说的中国人态度是调和持中，寡欲知足，随遇而安；谓此为世界各民族的常识里的一种理想境界，绝不限于一国一民族。又诘难我云：“梁先生难道不睁眼看看古往今来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万的提倡醉酒的诗，整千整万的恭维娘子的诗……这种东西不是代表一个知足安分寡欲摄生的民族的文化？”又于我以奋斗向前改造局面满足欲望之态度专属之西洋人为不当。然越三年胡先生自为《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见十五年《现代评论》第4卷第38期），则于其文中总断之曰：西洋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此为胡先生见解之一长进乎。

tent)。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不知足诚为西洋文化之原动力；知足则未可以赅举中国人之精神。又不知足也，争也，其积极精神人得而识之；知足也，不争也，徒为负面之词，其积极精神不著。姑就知足论之。人原来是不知足，初不待教的；其必转进一层，而后有所谓知足。此时欲其复归于不知足，非复出于天真自然矣。不知足出于天真，则是一切活动之源泉，于文化之创造有勃焉以兴沛然莫御者。然天下事唯人生不可以为伪。今曰“我将求为不知足”；真力已失，勃焉沛然者不可得，将唯嗜利无厌之归而已，无创造之可言。我初时亦何尝不想引进西洋不知足之精神，以奠民治之基，以应付这生存竞争的世界，卒乃悟此徒为固有精神之懈弛，而西洋精神固不可得于我。吾思之，吾重思之，中国人所适用之政治制度他日出现于世者，或于某一意义亦可命曰民治；然视欧洲近代制度固形神俱改必非同物，此可断言者。

## 八 所谓精神不合者其二

在欧洲政治里，一桩基本重要的事，就是选举。象英国国会的选举，美国总统的选举，每届其时，都是举国若狂的奔走，其精神亦自有可爱处。然而只看他“选举竞争”四个字，就可想见其意味如何可怕了。绝无温恭撙节，顺序就理之致，而极有血脉愤兴迸力活跃之妙。人说西洋人是动的，东方人是静的，



当真不错；实在使我们有望尘莫及之叹，学亦学不来。所谓学不来者，在他是动，而不免于乱（指选举中一切丑劣之态，暴乱之举），在我们学他，将只有乱，而说不上动。盖所谓动者，必有一段真精神，一腔真力气，在那里活动始得算；非下流习气，行尸走肉之动可冒算也。然而中国之动，将只有此；中国之办选举，其丑劣暴乱，将过于欧洲十百倍，而此外无所有！

这是什么缘故？这就为西洋人的行事。其中果含有高于我们的精神在；则我们可以学他；而无如其不然。我承认他的精神亦自有可爱可喜之处，但以视吾民族从来之所尚，则殊不逮我们精神之高明，之深厚。我们从来之所尚是谦德君子。谦者尊敬他人，佩服他人，而自己恒歉然若不足。人没有向上心则已，果其有之，必自觉种种不足，所以自责勉者，恒苦莫能致莫能胜；夫何能不谦乎？人不回头看自家则已；回看反省，则必自觉种种不足，而服善推贤之心，油然而莫能已；夫何能不谦乎？谦则精神浑收聚于内而向上，斯则中国人之道也。由中国人之道则必谦，谦本是中国人的道；而西洋反是。我尝说中国人照例应当是“鞠躬如也”，西洋人则都是挺着胸膛；善理会此两边的神气不同，则其所由途径不同可得之矣。中国而有选举也，其必由众人所尊敬，有所佩服之心，而相率敬请于其人之门而愿受教焉。殆非“我选你为代表”之谓也；或“我帮你忙，投你一票”之谓也。而在其人则必退谢不敢当；辞之不可，或且逃之。——这不是做作，向上自强时时回省自己的中国人固真真如是。断不能炫才求售，以至于运动焉，竞争焉，如西洋人之所为。——西洋政治家到处演说，发表文章；运动选举，在中国旧日读书人眼光中，无论如何，是不能点头承认的。故中国人而为此，面上总有点不好意思，心里总要援西洋为例，强

自慰解，此于向上自爱之意，稍稍懈下了！这便是吃紧关头，不可不注意者。开头，其几甚微，而其结果，则将无所不至。因人的精神之降下，是不会降到恰好为止，一降落便要落到底。中国议员愈到末后来愈下流无耻，到一个万分不堪的地步，就是为此。故尔外国的政治家，未尝不是豪杰之士。中国人而自比于外国政治家者，则都是不知羞耻的流氓而已。又所谓其几甚微，特就其个人心理言之耳；若自吾民族精神言之，则是大大离开固有途辙，而早已失去向上努力之点；其不至于混乱稀糟，固不可得。我敢断言中国今后若仍照以前模仿那外国风气的选举制度，政治即永无清明之望，中国民族即永无前途开出来。中国人所适用之政治制度他日出现于世者，假犹有所谓选举也，必非这样个人权利观念的选举，彼此竞争的选举。

### 九 所谓精神不合者其三

欧洲人以其各自都往外用力，向前争求的缘故，所以在他制度里面，到处都是一种彼此牵制，彼此抵对、互相监督，互相制裁，相防相范，而都不使过的用意；人与人之间，国家机关与机关之间，人民与国家机关之间，都是如此。这在他，名为“箝制与均衡的原理”（principle of checks and balance）。所谓政治上三权分立，就是这个意思，其他之例，在政治制度上，在一般法律上，不胜枚举。中国人于此尤不适用。用在中国政治上，则惟有使各方面互相捣乱而已。记得十七年春上张难先先生曾给李任潮先生同我一封信，说中国政治制度，以人性善为根据；西洋政治制度以人性恶为根据。在西洋总怕你为恶，时时防制你；在中国以人为善，样样信任你，付予大权。因而深

叹好人在今世之无法行其志。这话未必全对；不过在西洋制度里面，隐含着不信任对方人之意则甚明。有许多人指责民国元年临时约法专为防制袁世凯的不是；这或者有不是处。然而，在西洋制度里，一面抬你作总统，一面防制你，本是他固有精神，不足为异。然而这在中国民族精神里，是不许可的——在旧日涵泳于中国精神的人，定感觉出，而断然不许可。孔子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彼此既要共事，而一事未办，便先将不信任你的意思放在前头，而预备着如何对付你，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然这在西洋自亦有其很深的理由：

(一) 人本是自家作不得十分主张的。外面的形势机会，容易为不善，不善之发生总难免；外面形势会不易为恶，恶之成功总要少。明乎人类心理者，自知此实有深且强的根据。在立法者，并非有意以不肖之心待人，人实不可信赖故也。与其委靠于人，不如从立法上造成一可靠之形势故也。

(二) 又除非绝对不要法律制度，要法制就是不凭信人。因法制之所从产生，就是想在凭信人之外，别求把柄；则似亦不能独为西洋制度病。

(三) 又西洋立法如此，似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科学是讲一般的，普通的，平均数的；而少数的，特殊的则不算。法本是为众人而设，其不信任人，只是说看人只能从平均数来看；我固不能说你是坏人，亦不能说你是好人。

凡这几层，都有很长的意思在内，我们亦不否认。然而人类的精神，自有高于此者，诚有会于中国古人之精神者，则于此应当如何存心，应当如何表示，是可以想得出的。人类应时时将自家精神振作起来，提高起来——中国古话谓之“诚”，谓之

“敬”。于国家大事，尤其要以全副心肝捧出来，——出以至诚无二之心。彼此相与之间，就存心言之，第一要件是“信”；就表示言之，第一要件是“礼”。——崇敬对方人，信托对方人，有极高期望于对方人。虽然你不一定当得起这样崇敬信托期望，而我之待你应如此；我亦不一定当得起这样，而你对我应如此。彼此看待都很高，这才是中国人的精神。必这样，中国政治才可弄得好；彼此感召，精神俱以提振而上故也。反之，此之待彼者不高，则彼自待及还待我亦不高；彼此精神，俱因而委降于下。无礼不敬，则国家大事一切都完了。这在西洋人亦许不要紧，因为西洋人的精神要粗些——他于人类精神未造到较高较细的地步。从他的精神，不感觉到无礼，则亦无害于事。中国人则不能复反于无礼。即在今日，大家都象不觉得这是如何无礼，其实特未现露于意识上耳，其各自精神之弛散苟偷，则既不可言矣。即此弛散苟偷便是对此制度一种否定。故西洋以收制衡之效者，在我乃适滋捣乱；天下事之不可相袭，如此。

所谓在西洋以收制衡之效者，大概有两大效果：一是其政治上运转灵活，不滞于一偏，而常有推陈出新之妙者以此；一是其人权能得保障，所不见摧于强权者以此。<sup>〔1〕</sup>然而我们今欲得此于西洋制度却不可能。似此权力分立，相依为用，复又相对抗衡，各有所限，或互得为制裁，原是沿着英国历史不知不觉演成的事实；然后孟德斯鸠乃从而为之说；然后若美国若欧洲大陆国家乃有意识地著为法律制度。即在后之取法设制者，虽非自然演成的事实之比，固亦有其相当的历史根据，或一种新兴气势可凭。一言以蔽之，西洋法律制度所为如此安排配置者，

〔1〕孟德斯鸠《法意》言此，于后一层尤详，见严复译本，卷十一第六章。

正为其事实如此，有在法律制度之前者。然在我们则何如？一点的事实无有可凭，而曰“我今欲如是云云”；但凭条文期收大效，诎非梦呓！天下莫巧于自然，莫拙于人为。自分权标为学说而刻画失真，订为制度而胶柱不灵。今世仿行之，以支配运行其国家权力者遍于各洲土，察其政制曾非其相悬，而政象之一美一恶一治一乱乃不啻天壤之殊。是其故，盖全在其制度或本乎事实之自然，或较近于事实，或离乎事实而徒人为之拙也。然若法之于英，南美之于北美，亦不过仿行其制而事实有所不逮耳；犹未若事实根本相反而冒昧相师如中国之于西洋者，则其事之止于拙而几于妄矣！

何谓事实根本相反？造成西洋先乎法律制度而存在的事实者，是其个人主义，权利观念。但中国最大的事实则为伦理；一切事都在伦理关系中。其意义恰主于非个人的，义务的。——我前曾说过了：

伦理关系本始于家庭；乃更推广于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君与臣，官与民，比于父母与儿女之关系；东家伙计，师傅徒弟，社会上一切朋友同侪，比于兄弟或父子之关系。伦理上任何一方皆有其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sup>〔1〕</sup>

由伦理，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乃无由萌生相对抗衡的权利平等观念。由伦理关系的推演，而在中国政府与其人民之间，乃无由形成相对抗衡的形势。从而更不能有拥护权利平等的法律，维持势力均衡的制度。然在西洋民治主义政治制度中，代

〔1〕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第六节。

表国家权力的政府与构成国家分子的公民之间，一种相对抗衡互有推动力互有制裁力的均势，实为必要。必如是，一面乃可有公共秩序与幸福的进行而国家权力的运用得其道，一面又不致妨碍分子的自由而其个性亦可得到发展。而西洋恰好以其具有个人主义权利观念而又能发挥之的新兴中间阶级，起而与旧日统治阶级君主贵族僧侣对抗，作成政治上两方面的均势，于是近代的“准民治制度”（对真正民治制度而言）遂以开辟实现。——这是在西洋制度背后之一根本重要的事实。如我前所说者，〔1〕中国以文化迈进于一特殊方向——无宗教而有“伦理”，向人生第二问题第二态度以趋——其经济顿滞不进而封建制度顾早得解除；其社会形态乃极殊异之致；密于家庭，疏于社会，而几无所谓国家；贫富贵贱转易流通，几无所谓阶级；彼此相与之间松软温和，几无所谓压迫。如是散漫无纪，流转不滞，软和无力的人群社会，其阶级对立的形势根本不可见，则求其如欧洲有中间阶级之兴起以与统治阶级抗争扯平，作成政治上两方面的均势，更无自而有；而由封建社会以经济进步所蜕出之准民治或初步的民治，当然不见于中国。此就欧化未入中国时之历史言之。及至1911年的革命，一举手而满清统治者即被推翻，在政治上曾不能保留其尺寸地位，如欧洲日本国家之君主贵族。自表面上看，此人人平等的中国社会更没什么障碍势力；宜乎一步而跻民治才是。然临时约法——西洋式的民治制度——公布施行以后，民治竟不能实现。此其故当分别言之。一则从来的中国社会，只有个人势力而无阶级势力或集团势力，类如欧洲宗教集团势力（僧侣）封建阶级势力（贵族）城

〔1〕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第六节。

市新兴资产阶级势力者，皆未有之。个人势力不长久，又于社会中无所代表，实在不算一种势力，不可凭依。于是在彼以阶级间或集团间势力均衡（此中自以新兴阶级有力持自由主义之必要而又能发挥之为不可忽之要件），而开辟得之民治（准民治）；在我乃直接求之散漫无统纪的个人，其难不啻百倍。国家与其组成分子公民间两方的均势而不间之以特种意味之势力，本为真民治。真民治乃必经济及一般文化有大进于今日方能实现者；岂所论于经济稚陋之中国？此分属本文前半所论物质条件不足问题，兹不更谈。民治不成，而国乃大乱，二十年犹未有已；则又以此西洋制度大反乎吾数千年所习尚之道故也。

我们所习尚者为“礼”；这是与伦理相缘而俱来的。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初无所谓法律制度，而只有礼。这在有学问见识的西洋人似乎亦很能见及此，严几道先生译本孟德斯鸠《法意》有两三段云：

（上略）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也。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惟彼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于所生表其年德者，皆将为孝敬之所存；则长年也，主人也，官长也，君上也。且从此而有报施之义焉。以其子之孝也，故其亲不可以不慈；而长年之于稚幼，主人之于奴婢，君上之于臣民，皆对待而起义。凡此谓之伦理；凡此谓之礼经。伦理，礼经，而支那所以立国者胥在此。（原译本十九卷十九章）

支那之圣贤人，其立一王之法度也，所最重之祈向曰惟吾国安且治而已。夫如是，故欲其民之相敬；知其身之倚于社会而交于国人者有不容已之义务也，则礼义三百威仪三千从而起矣。是以其民虽在草泽州里之间，其所服习

之仪容殆与居上位者无攸异也，因之其民为气柔而为志逊，常有以保其治安，存其秩序；惩忿窒欲，期戾气之常屏而莫由生。（十九卷十六章）

（上略）而支那政家所为，尚不止此，彼方合宗教法典仪文习俗四者于一炉而治之。凡此皆民之行谊也，皆民之道德也；总是四者之科条而一言以括之曰“礼”。使上下由礼而无违，斯政府之治定，斯政家之功成矣。此其大道也，幼而学之，学于是也；壮而行之，行于是也；教之以一国之师儒，督之以一国之官宰，举民生所日用常行，一切不外于是道。使为上能得此于其民，斯支那之治为极盛。（十九卷十七章）

严先生为按语，自谓“不觉低首下心服其伟识”；并引曾文正之言：“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以证成之。又曰：“惟吾国圣贤政家其所以道民者常如此，是以闻西哲平等自由之说常口呿舌矫，骇然不悟其义之终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前期之所为，乃欲举数千年土生土长之“礼”而弃之，凭空采摘异方花果一西洋之“法”以植于中国者；其事何可能耶？

我承认凡是人类社会都有礼；并且人类社会大概是先有礼，礼里边就有了法律制度；与礼分异不同的法律制度，是社会又演进一阶段至近代才有的东西。换句话说：现在的法律制度，是跳出宗教的魔圈打破封建的枷锁而后有的，而古代一般所谓礼，则正是宗教的玩艺，封建的产物。我绝不能说，对于平等自由“口呿舌矫骇然不悟其义之所终”的中国人，尚可自骄于西洋人之前以为高。但这其中大有曲折，非率然一言可以下断的。

宗教必有仪文，封建最严等差；但我们不能说是等差即封建，舍宗教无仪文。礼之为物，固离不开仪文，离不开等差；但



我们不能说离开宗教和封建即无礼可言。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无宗教，中国社会的封建早得解除，而中国卒以礼者著于世界；则中国的礼其自有发展的途路可知。中国的礼最发达时代，诚然正是个封建社会；但封建成过去，而礼不成过去。中国人尚礼之风直垂于后，且差不多好礼之故，至于追慕封建；则以礼之发达有在封建之外者，超过甚远，其感于人心者至深故也。由此，虽亦不少类近宗教仪文之礼，表示封建体制的礼，顾其内容不同宗教之愚蔽而含义高明，不为封建之苛虐而雅度温恭。所可惜者，中国的封建制度因此竟没有经过被压迫阶级反抗而推翻的这一回事，就过渡到另一特殊构造的社会；象欧洲近代之一段“人的个性伸展”史，在中国人生上就缺少这段功夫〔1〕其闻平等自由之说而舌矫不下者，固所难免的陋相。如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说者，“他对于西方人之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面是淡漠的很，不懂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的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2〕然即此亦见他不同乎正吃着不平等不自由苦子的人，闻平等自由而勇跃欢喜于得解放也；而亦就证明他方游于另一不同之路上而耽之也。封建社会之礼拙抑人格，其视近代西洋法律自为有所不及；而此中国特殊发展之礼则固根乎人类的无对精神而来；其视近代西洋法律制度一切植基于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契约观念之上，不出乎人类有对性之表现者，正为有所超过。〔3〕中国所谓礼者无他，只是主于谦敬，随事而自见节文。是其所期于天子以至庶人无贵贱贤愚共由而

〔1〕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章，“西方化德谟克拉西精神”一节。

〔2〕《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章，“西方化德谟克拉西精神”一节。

〔3〕人类之有对性、无对性，参看《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第六节，第九段，倒数第六段，及《读〈东西之自然诗观〉》一文。

无违者，初非统治阶级片面的以课于人。唯敬无二，唯谦斯和；是故曰“无对精神”。于斯际也，方有所崇高隆重而仿佛没有自己；转视自己本位的西洋人何其狭小！前不云乎，中国人“鞠躬如也”，西洋人挺着胸膛；观乎两方人情风习所示，总不外敬肆之分，谦侈不同；而究实言之，只是文化深浅精粗之差。所谓不能以西洋之法易中国之礼者，既造于深厚温文之中国人不能复返于无礼也。

如我所说，此礼的路为人类未来社会所必由；——在近代法律制度后更进一阶段的文化便是礼。西洋言法律者，现在已转变到社会本位义务本位思想；以为人只有其一种“社会职能”和为国家应服之务，而无所谓自由权与公民权的“权利”。因此，法律的内容最初是义务，其后是权利，最后乃复返于义务。此其意向盖已颇接近于我们。要知道，在新趋向中实涵盖了平等自由，而不与平等自由之义相冲突；但最好要经过此一番转折，则双方之义俱得圆满。而中国人偏偏并两步作一步，径从最初之礼以进于最后之礼；一些封建社会所有的稚态短处不免隐混而遗留下来；——此其所以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中国问题的不好解决亦就在这里。在他自己这面，于深厚精神中又见稚陋偏弊；在外来的欧洲近代潮流具有一种进步的精神似可矫其偏失，而又粗浅不足以相胜。所以彼此都不能爽快的诚服；而恰好牴牾扞格，两不相下，乃各不得立。自变法维新以来，礼日以毁，而法亦不建，扰攘州年犹未有已，全从精神上的一大苦闷冲突不解而来。假使中国果是一种稚陋的文化，或欧洲果是顶进步的文化，有一面是决定的，都好办了。事实既不如此简单，则前途正恐不能不费些时日才见分晓。然使吾人于人类文化转变前途有所窥，则知二者原非无可通，而在未来事实所归

上得其解决也。

我们总结几句罢。中国数千年有其治道曰“礼”；在近二三十年乃欲代以西洋式民治制度。此于其从来习惯事实正是前后全不接气的文章；其运用不来，原意尽失，祈福得祸，既已昭然〔1〕。其实将来中国的民治并不是不能有；但决不如近世西洋人从自己本位向外用力寄民治于彼此对抗互为防遏之上，此我可断言者。〔2〕

## 十 所谓精神不合者其四

欧洲近代政治有其很好的成绩，就是造成了地上的天国，实现了人类的现世幸福。求之其他洲土或历史上其他时代，似尚未见更有能替人谋福利的政治如此者。然而不免有三层缺憾：一层，是对外肆行侵略，以旁的民族供其牺牲；二层，是在其国内，亦有以此部分人供彼部分人牺牲之势，或至少是幸福不平

〔1〕西洋式政治制度在中国之徒滋捣乱，如前已说；西洋式的法律不合中国人情，其为祸亦烈。在他是很想保护人的权利；而柔懦怕事甘心吃亏以消极为良善的中国人，则于他这种法律下，享不着一点保护。然恶人为恶，却多半无法制裁；法庭要主持公道，而被害者不说话，和证人不敢到场，即无办法。因为法律上原来打算你尽量争持辩诉，绝不退让的；犯法者罪名的成立，是靠证人证物种种条件的；法官是不能自作主张，扶弱锄强的。我于此道太外行，不敢谈；但知此中大有问题，须从头研究耳。

〔2〕汪懋祖先生为某君西洋近世文化史序文，有云：民治主义之产生盖有二源，一曰势力平衡，一曰物欲相应。又云：基督教祸亘千余年而未已，相煎相摧，至各不能自存，于是信教自由之说得以成立；所谓民治主义者无他，乃出于势力冲突，而跻于平衡之结果已耳。其言足参考，附记于此。又近见庐信先生《党争救国论》小册，主张以党争替代兵争；谓对共产党宜于不犯刑事范围内公开承认之，国民党既有三全大会之争，不妨经分为两党各自为一系统。其言均有可赞成者；然这自是一套西洋政论也。

等；三层，是表面幸福，未必真快乐——这是罗素所再三叹息的。他叹息人生之乐（joy of life）在欧人已因工业主义而失之；但于中国则无往而不见〔1〕苦乐存于主观，无法称量；罗素之言，亦或抑扬太过。然而欧洲的文明，实一病态的文明，其中人生乐趣，究有几许，诚属疑问。所以这三层缺憾，大概是不能否认的。然何以致此？试究其故，则以当初本从个人为出发点，而以现世幸福为目的地，——质而言之，便是中国所谓私欲或物欲——其不免于有己无人，而损人以利己，逐求外物，而自丧其天然生趣，固必致之符也。

欧洲近代政治，实是专为拥护欲望，满足欲望，而其他在所不计或无其他更高要求的；我名之曰“物欲本位的政治”。其法律之主于保障人权，即是拥护个人的欲望，不忍受妨碍；其国家行政地方行政（尤其是所谓市政），无非是谋公众的欲望之满足。从来的中国国家固断断乎做不到此，要亦未甘如此，不屑如此。

仿佛记得清末宪政编查馆草订新刑律时，新旧两派法律思想很多争执，其中有一问题即“和奸不为罪”。照新派法律思想（代表近代民治制度的），凡个人行事，无论在道德上如何评论，但不妨害公众，不侵及旁人，则国家权力过问不到。和奸既是他们彼此同意；亦未尝碍着旁人，这是他们的自由，不能为罪。若有夫之妇，犹有侵着夫权之说，否则更无所谓。因此假设有族侄与寡婢通奸一案，在旧日法律是要凌迟处死的罪（极刑）；而自新法律看，则无罪可言。此中国有其一大发明在：——

---

〔1〕罗素游华以后著作，无处不见其说这类话；在《中国之问题》中尤再三见。大概旧日宽闲的中国人生确亦很乐，今日则难言之矣。

发明了公私界划之当分。在古时以“公”的名义（国家或其他团体范围，而国家为甚）压迫干涉个人是无所不至的。虽然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自古有更多的自由，其实严格地说亦还是没有自由；即因公私界划不立之故。其所为压迫干涉亦许很少，但要压迫干涉起来初无限度。自近世西洋人个人本位契约观念盛行，乃认定没有私，公即无从来。团体无论如何重要，亦不过为的是个人；因团体之故，个人自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干涉，而只于维持公共秩序所必要者为限。前所谓个人行事，但不妨碍公众不侵及他人则国家权力过问不到者，其根本即在公私界划之确立。然而其所谓私是什么，不过是个人的欲望要求；所谓公，亦就是大家的欲望要求已耳。其拥护自由亦即是拥护欲望。

此其精神，本是从禁欲主义的宗教之反动而解放出来的；则政教其何能复合而不分？尤且欧洲宗教凭藉国权，武力相争，为祸既烈；则信教自由，析宗教于国家，早为人心所渴求。公私界立，政治乃与宗教分家，法律乃与道德分家。——欧洲人之道德原与宗教相裹混的；此裹混实种下摒道德问题于国家外之因。于是国家乃只管人的生活，不复问其生活之意义价值。——象这样的国家，全非旧日中国人所可想象其可以有的，所可承认其当有的。中国并没有禁欲主义的宗教；然而为其最有力的反对者，正在中国人。

中国人与西洋人同是肯定人生的；但他不承认将人生放在欲望上面，生活就是欲望的满足。他与西洋人同是注重现世的；惟其注重现世，乃益有其所致谨而不敢苟者。他不承认欲望，承认什么？他所致谨而不敢苟者什么？不得已而强为之言曰“理”；亦就是人生的意义价值所在。理欲之争，义利之辨，非

此所及申论；我们但欲指出人类有其一极强要求，时时互以责于人，有时亦内以讼诸己；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殊不见其所失。——这便是所谓理。此其所由来，就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甚相似而大不同。在物类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无有从违可言；而人类生活尽多歧路。在动物生活没有什么对不对；而人类行为则是最容易错误不过的。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人类之得充实其价值；享有其价值（人而不枉为人），就在他不甘心于错误而要求一个“对”。此即人类所以于一般生物只在觅生活者，乃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也。呜呼！对也，合理也，古今几多志士仁人于此死焉，于此生焉！人类生命之高强博大于此见焉！使人类历史而不见有此要求于其间，不知其为何种动物之历史也！奈何今之人必一则曰人类求生存；再则曰人类求生存，日从乎共产党之后以生存利害解释社会之一切，而不复知人心有是非，几何其不相率入于禽兽之途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中国人具此观念独明且强。此以中国古人得脱于宗教的迷蔽，而认取人类的精神独早之故。在欧洲人心中所有者，为宗教上“罪”的观念；在中国人则为我自己对不对的问题。“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见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这是他的心事；这是他努力所在。唯以人类生活不同乎物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也，其前途乃有无限的开展。有见于外之开展，则为人类文化之迁进无已；有存乎内之开展，则为人心日造乎开大通透深细敏活而映现之理亦无尽。中国古人之所谓修之讲之徙之改之就有道而正之者，盖努力乎理的开展或心的开展。以为“是天之所予我

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外是而求之，无有也已！不此之求，奚择于禽兽？在他看去，所谓学问应当就是讲求这个的，舍是无学问；所谓教育应当就是教导这个的，舍是无教育；乃至政治亦不能舍是。固然以前中国国家之不要政治，只重教化，有其事实的不得不然。<sup>〔1〕</sup>然而“作之君，作之师”，政教合一，自是他的理想。欧洲人可以舍其中世纪所倾向的未来天国，而要求现实幸福；中国人则不能抛却其从来人生向上的要求，而只要你不碍我事，我不碍你事，大家安生就得了。从欧洲言之，政教分离是可以的，或且是必要的；从中国言之，政教分离则不可通。——人生与人生道理必不容分家。

夫我岂不知政教分离，不独在欧洲当时有其事实上及理论上的必要，而且在何时均不失为最聪明的办法。夫我岂不知，天地间没有比以国家权力来干涉管理人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再愚蠢

不求他心与我心之相顺，粗恶笨硬，于未来社会全不适用；非以教育的方法及人种改良的方法替代之不可。此教育要在性情的陶养；那么，莫胜于中国的礼乐。<sup>〔1〕</sup>所谓国家，将成为一教育的团体；而凡今之所谓政治，在那时大半倒用不着；法律制度则悉变为礼。我前云：“在近代法律制度后，更进一阶段的文化便是礼”；意即指此。这些原都不是这里所及申论者；不过为破今人拘墟之见，略略指点一二。今人拘墟之见，正自难怪他。他一面去古未远，方得脱于干涉妨碍，如何肯放心得来？又一面正值生存竞争激烈之秋，救死唯恐不贍，其实亦未暇作此理

〔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因经济改正而致文化变迁”一节：“从前社会上秩序治安维持，无论如何不能说不是出乎强制，即是对物的态度对人。人类渐渐不能承受这种态度，随着经济改正而改造得的社会不能不从物的一致而进为心的和同，——总要人与人之间有真妥洽才行。”

同前书第五章：“就生活三方面推说未来文化”一节：“现在这种法律下的共同过活是很用一个力量统合大家督迫着去做的，还是要人算帐的，人的心中都还是计较利害的。法律之所凭藉而树立的，全部是利用大家的计较心去统驭大家。……这样统驭式的法律在未来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如果这样统驭式的法律没有废掉之可能，那改正经济而为协作共营的生活也就没有成功之可能。因为在统驭下的社会生活中人的心理，根本破坏了那个在协作共营生活之所须的心理。……近世的人是从理智的活动，认识了自己，走为我向前的路走到现在的，从现在再往下走，就变成好象要翻过来的样子，从情感的活动，融合了人我，走向情谊礼让不计较的路，——这便是从来的中国人之风。刑赏是根本摧残人格的，是导诱恶劣心理的，在以前或不得不用，在以后则不得不废；——这又合了从来的孔家之理想。从前儒家法家尚德尚刑久成争讼，我当初也认为儒家太迂腐了，为什么不用法家那样简捷容易的办法？……到今日才晓得孔子是一意的要保持人格，一意的要莫破坏那好的心理，他所见的真是与浅人不同。以后既不用统驭式的法律而靠着尚情无我的心理了，那么，废法之外更如何进一步去陶养性情，自是很要紧的问题。……本来人的情志方面就是这宗教与美术两样东西，而从来宗教的力量大于美术，……，实亦从未有舍开宗教利用美术而作到非常伟大功效如一大宗教者；有之，就是孔子的礼乐。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

又同书第四章，“孔子之宗教”一节，亦可参考。



会。然人类之要求向上而自谦焉，则人类一天不灭绝，固一天不得息止；更且以文化之进，而此意识愈明了焉。又人类除非不生活，生活则必是社会的；更且必日进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则如何导达畅遂此要求，终必为社会之所从事；人类文化变迁之归趣固将在是，可勿疑怪也。这件事又必将以中国人开其先路。此无他，中国人在昔既曾为此要求，蔚成其民族风气；其今后果有政治上之新途径也，遂不能不与西洋有殊。西洋近代的民治，非政教分离不得开发出来；但中国的民治（果其有之），则非政教不分不得开出来。此我可断言之者。

中国的民治，如何由政教不分以开发出来，此不及说（以后谈村治内容时当具陈之）；此所欲言者，只在政教果分如西洋近代民治，非我所能袭耳。只要看清西洋近代政治是如此一回事，是与中国从来精神不合，全不能满足中国人精神上无形的要求，则我之不能学他，亦既可明白矣！天下原无干脆的模仿袭取，无模仿不有创造在内，绝不是不费力牵率凑合便行的。而况要组织新国家，走出一条新政治途径，这是何等需要努力的大创造！此新途径又非徒藉少数人物所可完成，而有待于多数人有形无形直接间接的力气参加乃可，此自为吾民族的大事也。凡创造都是生命中见精采处，在个人如是，在民族如是。于此际，你要激发一民族的精神，打动一民族的心——他生命的深处——而后他的真力气，真智慧，真本领始得出来，而后乃能有所创造，有所成就。然而你今悬的如此其卑——只在他固有民族精神底下；所以刺激之者，浅在肤表，够不到他的心——他的心方隐在高处；精神振拔不起，力气开拓不出，其结果只有糟与劣而已；尚何能有积极精采可言！二三十年间现象不既可见乎？所谓不能学他者，意正谓此。

中国人求前途，求新生命，乃求之于孕育发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欧洲近代政治制度，无乃不可乎。中国今后而有前途，则其开出来的局面，不能不比他既往历史进一步，不能不视西洋近代史高一格，这亦可说一个定命论，曾慕韩先生一派的国家主义者，张君勱先生一派的热心民主政治者，所以均为不识时务，一则拿着过景的西洋货（近代国家）当好东西，一则拿欧洲政治的旧路当新路（张君等十七年出版的杂志名《新路》）。而其病则均在不能致察于此理，亦适与光宣年间的思想同其命运而已。十三年以来之后期民族自救运动，虽一般的是西洋货，然其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薄国家主义而不为，悬世界大同以为的，可谓能进于前之富强论矣。独惜其方法不善耳；不然，则中国民族之前途，未尝不可于是求之也。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01-141页，

1932年9月，村治月刊社。

《村治》，第1卷，3、6、7期，1930年7月1日，

9月1日、9月16日。

## 答马儒行君来书

奉读惠书，知能留意实际问题，不为门面空谈；所为见质数端，更见于乡事具有深忧，亟亟求所以挽救之道；欣喜不胜！使各地乡村皆得有切实笃厚如吾弟者一二人于其间，则中国乡村问题其不难解决乎！往者十三年夏秋间从我于曹州，不过月余，濒行涕泣为别；自尔六七年无音问，而不知犹时时以我为念，至于两度离乡并奔走南北以求见我，弟之用心可谓勤矣！然弟之为人感情过重亦于此可见。于所好而深好之，于所恶而深恶之，不能从容宽平以遇物，此其病恰与我相似。即如来书论山西村政，以弟身受其苦，自不免痛切言之；然于当局宅心之仁，谋索之苦，办事之难，便有不及理会者。愚前为《北游所见纪略》亦论及山西村政；朋友见之者，或以为痛快，或以为持论过刻。窃自省，确有失于宽平二字；所谓痛快，正是痛快自喜，不能得其宽与平耳。吾近年回环省思于四五十年来民族自救运动之错误，乃悟天下大祸皆出于人之无识不智；而谓谁于其民族，于其国家，于其乡里社会不思振救，果有怀恶意者哉？然自救适以自祸，救人适以祸人，则未得其方故耳！此不独十年专志地方，淡泊勤苦如阎公，得失利弊相参如村政者为然；虽在野心家如昔之袁氏，今之蒋氏，吾以为方其窃国窃党殆亦必有其自喻而自慰者在，其卒以貽祸酿乱，犹非其心也。识得此意，则当局所兴作一切不适合处皆可原宥，有不容激切其

词，苛刻以衡论者已。又不独其存心当体谅也；即方法之讲求谋索，当局亦未必皆疏于我。山西村政史中，禁烟方策之数度变迁，一层一层皆足见当局之苦心力索；更易一能者为之，亦未必有进于是。其成效似曾达于其可能的最高度；其不能完全成功，及已成之功后亦失坠，皆有其事实上困难为限制，或不得不然之势。——此中皆有其事实所指，非泛语，非臆度之词。故在方法上，办事能力上，亦皆有未可轻议人者。

然山西村政今已到达不能进行之地地，非改弦更张不可，则亦不可讳之事实。此在阎公以次之山西政府当局亦多承认之；所惜其最大病源，诸公似犹未十分明悟。其最大病源为何？即弟所认为“凡乡下事，万勿使官府过问”者，而山西村政乃几乎整个靠官府督办是已。此虽亦有其种种不可避的致误之由，例如：一、事属新创，政府不能不为提挈振导；二、从消极的禁革旧俗入手（禁烟禁缠足等等），不能不有官府力量于其间；三、阎公以军人为政，从其治军之习惯不免流于强制；——就中尤以第二点为最有力。然当局昧于其前途错误危险之大，而不能小心戒慎于官力之不宜用，以致官力愈用愈重，循至民间“不推不动，推亦不动”，“生机枯绝，则其咎不可诿者”。此官力不宜用之一义，包含甚多，详悉言之可成专篇，此不能及。然要作事，何能不用力？说不宜用力，当局必不服。吾昨年在太原省府，承村政处之囑，贡献我对山西村政的意见，村政处同人诸先生莫不以我为太空想，太好说高明话，而不知实际作事非用力不可。盖有心要好之人不得正当用力之道，未有不死用力气者；必须他得着用力之道，方明白我们所谓官力不可用者，亦不可死用，不可正面直接硬用之谓耳。官府本为行法之地，而于此则最忌以法相督，以法相绳。岂独不可用法，并不可用

赏；——山西村政处恒喜用赏，实属大错。正当用力之道，要在精神之鼓舞。弟谓“官府之为物，纯系机械性，无内在精神”；此语诚有几分近是。然苟不能变其机械性，而以一段真精神充实之，更以此一段精神鼓舞村人，则诚如弟言官府万勿过问为佳耳。徒为精神之鼓舞，犹未可。官府正当用力之道，更在为环境之开拓，使其前面有大路可走，则机杼自活。——我指先从经济上安排辟造农业社会化的机会与趋势，则村治之可能境地与自然必要乃形成。凡事当从环境上机会上着眼；当从旁面用力，无从正面用力者；当从间接上用力，无直接用力者。弟问官办民办以何为标准，吾今所得答子者如此；其详细内容办法，吾当于本刊依次第以发表，非此处所能谈。

弟所为第二问：往昔乡村敬重有人格之人，而今则唯崇拜金钱，将何以转移之。此问甚好；吾以为与第四何以改除迷信问题正相连。拜金与拜神，益同一内里空虚精神衰敝之象也。吾民族古昔自尊尊人讲理尚义之风，近年日以斫丧，垂垂尽矣！可不痛哉！然苟不能振起夙昔自尊尊人讲理尚义之风，则中国社会问题即无解决之望。——中国社会问题，绝不如共产党或传习共产党脑筋之国民党人所想象，可以斗争斗出结果来的。此吾望天下有心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人谨记者也。乡村政治问题之解决，乡村事业之进行，尤全赖此民族精神之恢复，吾今所得答子者止此。至于如何去恢复此精神，则先不必问旁人，先问你自己；能不能充实地有此精神。振起村风的办法就在先求诸己。要我更多说两句，须待将来另一机会。

改除迷信问题，讨论起来话亦长得很，须待专篇。吾前未知弟有亲切之感触与所见，以为不过顺着一般破除迷信的论调的一句话，故表示如无大碍可以听之。盖迷信原于知识不够，理

智未条达，为整个文化简陋中，不得不然之一种征候。只能从经济上促进整个文化之进步，自然消灭迷信，而不能单提出来医治的。一般庸人以毁庙打像，法律禁止的手段行之，实笨谬可怜，有损无益，吾心所最伤之哀之者。迷信实非打所能倒，非破所能除；而粗暴的举动则予乡间人心理上以很大之创伤也。弟既是亲切有所感触，非泛泛言之者，则吾自赞成弟在可能的范围内解决此问题。大抵其道亦在积极有所倡导，而不在消极破坏；此弟或能喻之者也。佛法精义似于此用不上；吾不能答。

第三问洋货销行于乡村日多之问题，自是危险。然此经济问题恐须总解决；一乡一邑无甚好办法。或在相当可能范围内有些小办法亦不定，但我则不能知不能答耳。（吾侪所为与办“模范新村”绝异其途者，即在注意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是牵全中国社会为一身的问题，非求总解决不可，不能自辟一世外桃源也。）

十九·七·十九。

梁漱溟

附： 马儒行君来书

漱溟师座：

两次晤面，甚以为快；惟仓卒接谈，未能畅所欲言，不免耿耿。嘱“写乡村状况，并举出问题”；实抱此心久矣。于归寓后，即拟定节目，分为：位置，沿革，氏族，人口，职业，生活，土地，水利，租赋，村政，教育，娱乐，礼节，岁时，神教，恶习，儿童，妇女，等十数项。旬日以来，继续叙写，约得万余字。生对此事，原有极奢计划；思将一村之情形，完全写出，巨细无分，善恶不瞒，如历史家之作史，如科举家之状

物，使乡村组织，尽量表出，则中国社会形成之初步，可以大明；其间究竟孰好，孰坏？何项宜兴，宜革？欲谋改造者，自有真正可据之资矣。（尤有大望，则望全国二三十万乡村，均有热心人，为各作乡志；则中国全盘情形，真实为何，不亦尽昭矣乎。）因有是志，故连日所写，零零碎碎，略述大概，自视殊不满意。欲再求详，而旅中无可参考访询，仅凭忆想所及，难免缺漏错误。因而改变初志，与其范围太广而模糊言之，何如就一部分写出，剖解详细，指出难处，较为的当耶！

吾常居乡，乡下情形，知之颇深。二十年前，所谓“我朝列圣相承、深仁厚泽”；“黎民雍雍穆穆，安居乐业”之“奴性”生活，吾时为孩提，无知无识，不审乡人对之，感觉究为苦痛抑愉快，要亦不见有甚怨怒也。辛亥以来，打死抚台，推倒宣统，共和建造，民国勃兴，乡民眼界，骤起变动！然此事一完，不过作街谈巷议之资而已。真是“那一个皇上手里不纳粮”？“反正发疯逃不了死”！“管他们谁走谁坐呢？”因乡人生活习尚，根本一切如故；虽曰革命，原为国中极少数人之冲突，非乡民本身感觉困难而自动也。惟自近十年来，推行所谓“村政”者，始弄的乡间左右为难，疾首蹙额。其初尚勉强应付，其后简直无法。然而推行者仍强推行，为难者愈加为难；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模范既腾誉于全国，精力实疲枯于小村；其间真情实况诚有外间所不能尽知者矣。吾历年居乡，见此情形，且目击心伤，故尝欲将年来吾乡所感之困难，叙而出之：一望推行村政者，知其村政之对民实惠为何；二望国中留心村政者，思所以改变救济之道也。因暂置乡间其他情形不谈，而独先述村政；想吾师亦必愿闻之已。

吾乡曰永兴村，属山西五台县第四区，在县城之西南三十

里。西至东冶五里；东冶者，吾县之一大镇，本区公署之所在也。村南临滹沱，北依仓城，文山、筒子二山，隔河相对；其他东西北诸方，亦均有山在望；盖相离无出十里者所在也。村前有村寺、古刹也；丰乐渠蜿蜒其前，树林繁茂，景色尚佳。村西距永安村一里，东距文兴村一里，屋舍相距，才一二百步耳；三村编为一村，然实各自为政，不相关也。又东二里，为石村、前堡村，合称曰“下五村”。以居东冶之下游，地力水利及白村寺庙会，乃五村合办者也。村中住户，百二十余，人口约八百有零，分为五间；马白二姓者较多，徐杨张姓次之，朱苏吴康又次之，赵薄李等姓，各一二家耳。村人务农者，居十之七。养骡驴馱炭为生十之一，余为牧工商兵及机关混事者。士人在清时吾族颇多，今甚衰落；以教书糊口者，仅三四人矣。全村有地二十顷而弱；其中水地约三顷许，余均岗地。屋宅场圃约百份，足四合房者仅及半，平顶土壁，无一瓦房庭院。男校一，约四十学生，二师教之；女学一，十数人，一师教之；均本村人也。全村财产，曾大略估计，约十五万上下耳。

往昔村中，无所谓村政。以办村事言，则有“纠首”，系自择村中有土地钱粮之家充当之。共二十六家，分为三股：马姓者一股，白姓者一股，杂姓者一股；配成三班，班值事一年，三年一轮，周而复始。所办之事无多，不过敬奉神道，商议农事、收钱算账而已。敬神，如按季节礼牲、上供，唱戏时伴神请神之类；农事如禁约，看田，祈雨，祭蚜妨之类；算账则一切出入花消等类也。各家纠首，例于每年正月初三，聚会一次，商议种种，前后交代；然亦无甚交代，不过新年大节之欢会而已。村中苟有较大之事，则排难解纷，另人说合，不必一定纠首也。纠首而外，有乡约一人，农之豪强者当之，以供衙门官府对乡下



有事时之传呼充役等差而已。(村人常言，今之村长所办三事，实即如前乡约耳。)

民国成立，令举村长，以家境充裕，认识文字，如童生秀才之类，而又身闲者当之。其时共和初兴，法令森严，搨神像，立学堂，剪辮子，纂脚板(解放缠足)，三令五申，查验纷纭，人心骚然，慄慄不安。惟村无庙宇，(仅村前白村寺之神像被毁，然寺固属五村，今犹空废)，学堂已立(光绪三十三四年已立)，故二者不甚担心；后二者则催逼极紧，风行草偃，多数服从，——间有二三顽固者，一经受罚，亦遵办矣。人民对此表示，不过曰“男人尽成和尚，女人半象尼姑，世道成个甚样！”而已。村长之下，雇乡巡一人，供其支使。纠首之办事如故；乡约之为役取消。村长曾一度改名“村正”，不久复故。旧契曾一度税验，按价纳钱。公家开追悼会，去追悼之；开运动会，去运动之。选举议员，着数人去投票(吾村得一县议员；迄洪宪称帝时，议员又一齐取消矣。)民国初期新政，乡下不过尔尔也。

民国七八年间，阎督军兼省长，初令办理村政，调查户口，编制间邻，划分村界，提倡六政。所谓六政：如栽树、种棉、牧畜、放足、禁赌、戒烟等等。又颁发《人民须知》，传习注音字母，于是村长事烦矣。调查户口，托人按门询问，年龄氏姓，记之于册，乡男村妇，颇以为异。常问“记此作甚”？“他们要此何为”？然略加解答之后，亦均从实相告。调查既毕，造成户册，呈于区上，算是完事。编制间邻、则略按村中巷口，分为五间，每间中择一较宽裕老干之农为间长；伊或推辞，一加劝导，亦即担任。又按间分邻，亦以在家之老实农人为邻长；然邻长实无一事，姑告之，姑诺之，麻麻胡胡，承担而已。划分村界，则召集邻村，商同办理，略以旧壤指定；然强霸之村，每欲多占

地面，因此不免引起纠纷，则亦含混过去算事。至于推行六政，则加烦矣。督促栽树，每人二株，贫寒之家，每有怨言，常曰：“叫栽树！叫栽树！到他妈肚上栽去咧？”村长为之设法，或植坟边，或植门外，或帮他人担水，多种几株；有地之家，或植桑数百株，以供养蚕者；一时植树颇多。特穷家白代人出力，不免生异议耳。要亦姑且过去，无敢反对。种棉一事，则凡种地十五亩者，必种半亩；——人民勉强试种，手术未谙，气候欠合，或旱而不芽，或花而被霜，见效甚微，收获不佳，一二年后，再无种者。牧畜一事，未大推行。且村中喂羊者，几乎家家有之；而闻省中花多钱买来洋羊、洋牛等畜，亦不数年多死；再无过问者矣。缠足一项，民初已尽行解放，后再解缠者，故无须督责也。赌博一事，吾乡昔亦非盛。因先有吾族八世祖翔云公，尝施水地一亩于村，谓之“禁赌地”，令乡约严行禁赌，将赌禁绝，则白种此地以酬其劳；而诸先辈，亦督责甚力；故赌风不盛。尔后虽有无知之徒，间为赌者，亦必秘密或野外为之，决无敢在村中公然放赌者。年久禁弛；然亦不盛。及复行禁赌，故甚易为力；然终是禁则止，不禁则有，不能根本不为也。鸦片洋烟一项，清时既种且吸，迨光绪末，有诏除毁烟苗，尔后即无种者；然吸者仍多，不论贫富，十五嗜之。民初禁烟，已有瘾者难骤退，而新吸者则减少；且烟自外来，质料日坏，价钱日增，人以其贵，吸者更稀。民七八间，禁烟加严，多不敢犯，不能全无，终算有效。然烟赌两类之人，多与区警有来往，且暗与钱，村中又惜情护面，不易为力也。《人民须知》，人民间有看看者而已。注音字母，传习半月，麻胡过去矣。初期村政，乡下所知，略尽于此。白墙上尚写过几种格言，亦写写而已。凡此种种，村长公正能干者，督责亦力；囑间长告于民而

实行之，亦能遵从；然纯系被动，非出自愿，不过不起反抗耳。村长庸懦，进行无力，成绩即少，——糊涂呈报，被上查出，则受区长辈之斥责，亦容忍安之耳。村民概无关也。因重力全在村长一身；村副间长，聊以备员；邻长村民，局外旁观。村长负责重而代价寡（年俸六元），人渐视为畏途矣。至于纠首，原本事少，既有间长，因有议取消之者，后即于十四年春取消云。

民十一二年间，办理第二期村政，大施法力，督责最紧。其目为整理村范，开村民会议，立村禁约，设息讼会，办保卫团，——事件愈多，手续愈烦，村长愁怅于前，村民厌烦于后。如整理村范，要使乡无不良，人无失学。但村长对村人，既无权力，又碍情面；查办太紧，兴仇结怨，而仍无济于事，故多数衍，不能实行。儿童入学，贫家多推诿无钱，供给不起。而村上或苦无地址，或苦于无先生，如要进行，必多花钱；而花钱若多，村人咸怨。且上学数年，出来亦无甚用；以故村长学董，亦即含混了事。开村民会，人亦厌之，多数推诿不去。免强召来，村长说：“有公事叫办甚办甚，咱们该怎样？”人民亦大都不言，言亦不获准。因而谈及别事，则反喧噪不绝，大家散说一气，渐次消沉，或打盹，或打虱，又渐而走去。余三五人，你吃烟，我喝水，他信口开河，村民会议完事。若问所议为何？议定者何？可谓毫无结果。因村民本无事可议，强使来议，实议不来。禁约一事，原所固有，然含义不同。原系秋禾既长，众纠首商议禁约，先杀一羊，二十六家纠首分食之，从而写一纸条曰：“闾村公议，严行禁约，倘敢故违，重罚不贷！”自此以后，凡遇偷田禾者，则罚伊大羊一只，名曰“拉著禁约”，众人从而分食之，此外无他意也。今复令行村禁约，叫多写几条禁此禁彼，则是具文而已，何尝能约束禁来也。息讼会，

虽亦举几个会员，亦有名无实。且村中向来少讼，纵有小纠纷有人说合，即可了结；如大冲突，会亦无法；故息讼会，实亦息讼不来。惟保卫团一事，真令大家头痛！初办之时，因较丰之家，男多外出；凡居村者，多系农人，自己无贵物须保，何乐代他人保？又年纪大小，难以求真，你说他三十五，他却说三十六；有嫌疑者不挑，人反羡慕嫌疑者焉；勉强选出，巧拙不一，教者苟去其拙者，则又有假装拙者以求去焉。况多系壮农，馱炭无暇；他本方馱炭回来，身乏力倦，叫他来操，十分不愿，——手僵足笨，亦操不来。及至会操，故不经意，——恐公家见他能操，而选去当兵（因前办在乡军人，原说保卫乡村，及后有战事，均强迫叫去故也）。而操不好时，委员反说村长办理不力；殊不知此次来操，团丁们还赚几角工资也！总而言之，村人极不愿为此，公家强令为之，每因此致村人不和，贫富不睦，上下交难，空花银钱，实使村中难堪不审催办此者，亦知此中困苦否乎？上次民七八年间办理村政，虽不久皆空，然尔时尚有小小成绩可言；此次办理村政，不独无成绩可言；反使村中为难万分；诚规模愈大，用力愈勤，而民苦益甚也！然此其小焉者也。

民十五六年，战争大起，官府派差，要人，征草，摊款；民家左躲右避，前推后拉；村长身当其冲，困难万状，艰苦莫名。对上之供给稍迟，命令之责斥立至。时而派兵坐催，时而使警立索。村长无法对付，间长面面相觑，村人愁眉不展。竭力恫喝逼迫，将差或款交去，困难方幸少疏，不久催者又至。前走后来，三番五次；人民之脂膏殆尽，村长之心胆已寒。而走差之家，既虑出者之生死莫保，又愁居者之衣食无方，——母悲妻愁，儿哭女号！风传战事不利，立即面无人色，求天不应，呼

神无灵，只能寻见村长，要人要畜，要钱要食，声泪交流，求死不去。村长竭力哀告，其如老幼饥寒何？其如人畜不归何？惨苦之形，千言莫罄。痛哉痛哉！尚复何言！当是时也，村长欲辞不许，求脱不能，公家之催索如故，人民之怨声遍村。更加不善持筹，未谙运算，银钱出入愈多；账目紊乱益甚；糊涂过去，人所不许，结算清楚，已又不能；最后托人清算，弄的亏累倾产，由此积劳成病，以终其身。十七年战事告竣，大将庆祝功成，小民宣告破产矣。事至于此，村政之实况为何，村长之职责为何，村人虽愚，亦可窥见十九矣。“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为粉饰；自治不本于乡，则治无根蒂”；乌乎！果其如此，达也不如粉饰，本也不如梢末，若是之“村本政治”，实成为“村崩政治”矣。伤哉！“用众治众”，亦即“以民杀民”；“政治放在民间”，不过便于官府剥夺人民之有系统的道路，民间何尝乐此政治哉！谓余不信，请反观历年所令办之村政，迄今均如何矣。男耕，女足，成绩最高；然此身体上事，一度改变，虽有依恋，久亦安之。（此二种实民元保安社倡办之功，非七年以后事也。）此外尚有何哉？禁烟禁赌：禁者自禁，作者自作，——实则禁者且多作，作者何能禁乎？栽桑种棉，蚕既不养，桑早枯矣；花既不收，棉早绝矣。调查户口，更为伤心！——呈报上去，惟按户以摊款。（如差徭费，保安费，编遣公债，金融公债等。编遣摊款，去一兵乎？金融摊款，省银行永不兑现。）因而村中住户，惟望减少，不愿加增；惟欲其合，不乐其分。纵有来者，亦不敢添；虽早另居，亦不注分。加以催报送区，永搁不观。故年来户册，均麻胡添注，略将总表上，移易几个数目字而已。况保卫团丁以岁数计，学龄儿童以年纪定，村人年龄，从而惧旁人知；今欲调查详细，反无法矣。如此根本要事，

而致弄坏如此，宁不悲乎？整理村范，早见厌矣！村民会议，谁愿来乎？村禁约，原亦无实；息讼会，更是空名；保卫一团，尤令人闻而骇走。从兹村长一职，为人民之怨物，成官府之奴隶，事件繁杂，报酬低微，心力俱碎，名利两亏。能者不屑为，庸者不敢为，无论如何推举，宁死亦无人愿任之矣。——如有提及彼名，则彼怒目相向，有如投井下石之仇。山西村政，见采于全国，恐中国人不死于外患，不死于内争，而死于此等模范全国之村政也。不察民性，不问村情，徒以个人之一知半解，群僚之随声附和，强迫施行，是真庸医杀人之类也。善哉吾师之言曰：“山西村政，若作自治者，则自治之生机已绝”。呜呼！自治生机既绝，则乡村尚有望乎？

去年春间，吾村村长一职，无法解决。历任之村长，既以老成凋谢；后辈之人，无一愿出而任事；搁置既久，愁闷无出。至不得已，村中旧闾长们与我相商，我勉为参酌旧法，复行分班办事制。以在村之成年男子，不论贫富，略以每户一人为准，其得八十五人。分为五班，每班十七人。第一五间闾四人，第二三四间闾三人，组织村政府，推一人为主席，书记会计各一以副之，学董二，闾长五，杂务六，民警一。因同大家商议，众亦以为可用，即将人数大概配好，占闾以定先后。本年任事诸人，继续商定，某人任某职；以前村长副支薪事（村长十二元，村副半之），亦取消之，——除民警年支工资二十四元外，余人均义务职。如此安顿停当，村事方有人负责，然此亦消极布置而已。后有令举监察员事；不过村长（即主席）着三四人去区听话一次，每人由村中给三角饭费而已。又令办息讼会，随便写几个人报区而已。更令办保卫团，未之能办，后亦未催，麻胡过去。其在村中，则拆盖神厅为男校教室，又另盖女校数间，

动工花钱颇多；而村长性颇刚愎，多所惩罚，不甚满人意耳。今年第二班人接办，人较和缓，现在进行中。明年班中有我，思于家乡尽点力，故来求教于吾师也。

村中公共花费，全由人民直接负担之。唯一来源，为按粮摊钱；视花费之大小，定起钱之多寡。村粮共四十两余。民初年，每两起二三吊；民六七年间，起六七吊；十三四年，起三四元；后上七八元；战事起时，加至十七八元；去年每两起十三元云。其次为地亩钱。村共有二十顷弱，每亩摊洋五六分，专供唱戏之用；又次为看田钱，亩约起六七分，以作雇人看田及民警工资之用。——此两项中，有盈余，亦归入村中。学校收入，有学费，仅四五十元；骡驴走差，则不出者，以帮出者盘用。——此二项中，入不敷出远甚，即由粮钱以补之也。其他不论什么花费，均由粮钱担之，此收支情形之大略也。总之，村中花费，年年加增；村人收入，无甚来源；以故衰败零落，人家多沦于下坡矣。

吾乡村政，拉杂写来，二十年间情形，略具于此。惟回头自视，以云详尽，仍未能也。至其他项目，则欲详细写明，更非一时所能矣。今于此提出几处疑难问题，生苦想不能得解决之道，敬求吾师指教焉！

村政一端，年来所行，全属官办自治，乡下纯处被动地位，揠苗助长，斫丧生机，行之愈力，害之益深。且由此而原能自办之事，一与官府令办者稍带关系，必将原有生机亦从而失去。如吾村学堂，在光宣之交，吾兄长辈，自行提倡，甚富活气，民初尚有此风；后来官令整顿，学校反日益腐败不整，再有出而倡者，人反疑官令而却步。又民元吾族伯型渊，倡办农民半日学堂，人均踊跃加入，每夜一二时，行之三月，功效大著。

二三十岁不识字者，从此能记账矣。且同时乡风为改，邪行绝迹；相逢则互问文字，甚有生气。及后官令办补习学校，极力催迫，仅来数人，数日之后，再不来矣。后即欲自办，人又疑官令而不来也。又往年元宵节，村人之好热闹者，联合众人，办社伙，耍拳弄棒，甚有精神。后官令办保卫团，习拳习操，前之好拳者，亦故不要矣。是后则社伙亦不易提倡。种种如是，难以悉举。总而言之，凡事一经官办，无事不坏。吾意官府之为物，纯系机械性，无内在精神。彼辈只管手续，不问实情；以故乡下办事，初尚认真，继则敷衍，终则只存空名。归于失败，成为必然。（其实官府中人，亦深感干燥无味，故流于吃喝赌嫖吸料子——惟此关法治根本问题，暂不及论。）故吾疑凡乡下事，万勿使官府过问，任人民热心再办，未有不善。然而人民自办，又当以何为标准？吾疑莫决，望吾师有以教之。

往昔乡村，其思想以良心为标准，以正人为表率。苟其人，人格卓绝，则虽贫贱，人亦敬之。今则渐以金钱为标准，每不问人格如何，只要能弄钱，则无不羨之。吾意此风甚可惧，欲求转之之道将奈何？又望吾师有以教之。

二十年来，吾乡人家，洋火柴，洋油，洋布，无家不用之；洋烟卷吸者亦常有；洋袜妇女多穿之；洋车汽车通后，轿车无乘者矣，近年又有洋面，其他外国货物，花样翻新，妇女爱之尤甚。凡此均自然流行，无待宣传，而输入日盛。然无留意及之者。吾意此中有危机存焉。即乡下生产之术，依然如故，而外来之诱惑日多，其消费因而数倍于前；入不敷出，如何得了！



世，他人对此，不甚注意；而乡下疾疫时生，因之迷信加盛。于是请此辈善友作会念经之风，大形蔓延。而神婆之类，亦较盛行。日前与吾师曾言及此，似表示“如无大妨，不妨听之”之意；然吾见此事流行加广，前途危险，弊害亦正多。吾师曩于佛法研究极深，不审妇女所信者，亦有精要之点，可助长社会之美风乎？亦望便教之。

总之，民国以来，吾乡日趋衰落；外来经济之侵蚀，官府政治之摧残，乡下道德之坠落，都会繁华之诱惑，均足以斫丧毁灭乡村而有余者。苟不从此想法整理，其前途诚不堪问矣！生此来之求见吾师，即因见此情形，愁闷无方，而思得彻底之解决也。（余略）

学生 马儒行敬上

十九年六月三十号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351—362页，

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

《村治》，1卷4期，1930年7月16日。

## 悼王鸿一先生

郟城王鸿一先生7月26日在北平作古。呜呼！二十年来，吾民族精神之颓败极矣；于兹而得一见先生其人，所以扶倾起衰，正有赖焉；而天不假年，吾自今宁能复见有斯人哉！

以言乎学问，则先生非老师宿儒也；以言乎行谊，先生非必可为世楷则也。岂但如此。先生于学问，盖正多疏略不讲者；其行事亦复多疏于小节。然而吾先民之精神，正唯于先生其人可以见之。是何也？先生，古之所谓“狂者，其志嚶嚶然”；所赖以扶倾起衰者无他，唯资乎其生平行事莫能自己之一念。狂狷所为近道，乡愿所为贼德者，其判在真伪；先生盖今世之一个真人也。呜乎！吾先民之道，亦岂有他哉；要唯人类所固有之精神而已。果存乎其人者真也，斯近道矣！果存乎其人者真也，则光明壮盛，斯足以苏垂死之人心！抑吾民族文化，远从西汉，近自南宋，传演至今，浸彊浸腐，乃有西洋之变。于兹时也，文质并衰，而求文必于质，自非真劲朴厚得于天者，其孰能稍稍振起之？其优于学问，谨于行止者，或适非其选也。呜乎！天生斯人，扶倾起衰，正有赖焉，而又不假以年，莫能竟其功；天命其果不可知也！

愚之辱交于先生，盖自民国十年暑期愚应山东教育厅聘，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其时先生方沉疑烦闷于新旧思想问题，数访于当世通人而不得解；其门有陈君亚三、王君星五

肄业北大哲学系，既尝闻愚绪论，辄为先生言之。邀愚为讲演，实先生意。既敷讲，先生每日从众人列座就听，自始讫终四十日间，未尝一日间断。此四十日中，大雨兼旬，人或阻雨后时；然先生又未尝不先时候于座也。每讲罢，欣快握手，高谈甚豪；于今回首十年矣。古人有云，“如鱼得水”，先生之于愚，愚之于先生，窃有是乐；彼此相得，固大有在言语见解之外者。

愚于先生最有知己之感，而亦自信颇知先生。先生知交遍海内，其人格映于众人心目，或者人亦各有所识。愚交先生十年，所识得者唯在先生生平行事莫能自己之一念。先生固自言之，“吾一生之行动，无论为政为学皆受此不安之一念所支配”〔1〕。先生所不安者，吾可得而分疏之：其殆心有不平而必争之乎。先生所为不平者，亦尝自言之矣。一则曰：

吾幼年每到邻家，睹其寒苦状况，颇感不安。归即代为想法，而无如何。所以当麦秋时，遇有偷窃者不肯揭发；辄故作不见以避之，怜其羞且悲其饿也。吾生平不愿呵斥仆人，亦是此种心理。及长，有童年狎友沈某及同学于某皆因为盗丧命；吾心理上，复受有极大感动。因此事推知为盗者多由生计压迫，实可怜悯。而曹属多盗原因，并非生性使然也。及详考乡村会议皆是保富政策；又考之县政省政亦大率类此；贫民苦状无过问者，深觉天地间不平之事莫大于此。

再则曰：

〔1〕语见先生《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一文中，曾附录于《村治》第1卷第5期。凡本文所引用先生语，均出于此，不一一作注。

同时又与韩君季和商量学问，认为后世奴儒讲学其根本错误之点，即在君臣一伦妄加附会。明明君臣有义，竟解为君臣有忠；明明是师统政治，竟解为君统政治。胜则神圣，败即盗贼；春秋大义，荡然无存。此实为产生一切不平之总原因。遂感政治有改革之必要，此吾加入革命之动机也。〔1〕

三则曰：

吾与中校同人及学生作学术上之探讨，乃提出中西学术比较问题。认为欧西学术思想归本于教育实业；中国学术思想归本于教养；两相参证，是欧西学术精神积个人之有余，中国学术精神补众人之不足也。积有余而社会更感不平，补不足而国家乃可言均。至欧西科学，当然充分容纳以补我之缺；而政治教育上之原则，尚不如吾国学术含有均平意义也。

抑先生更有所大不平者，则在新旧学术界之两种风气。先生既有深爱于孔孟之学，而自宋明以来谈学者，或离体于用，守内遗外，非复孔孟之本来面目；故于旧学界风气尚论乎心性之微，群趋于独善自全，近于佛老之为者，不能不有所大不平焉。朋友学生有误于此者，在所必争；或至于痛哭深伤之。以言先生毕生力气之所用，其用于此问题为不少焉。而十数年来国人崇

---

〔1〕《中华特刊》38页，《恢复民族自信力之研究》一文中，曾解释及此：明明君臣有义，竟解为君臣有忠；所以民族能为盗贼的奴隶，便能为异族的奴隶。胜者即圣祖神宗，败者即为盗寇，全是为奴性学术误了。此等错误直至清初的几个大儒顾黄颜李傅等，才将此点认清。故傅育主谓唐宋以后之儒为奴儒。这几位先生既认清此点，故备历艰难，始终不屈服于异族。辛亥革命推翻满清，都是由他们这种精神生出来的结果，中国民族之能复兴，民族革命的动机，全是清初几个大儒的学说造成。

拜欧洲，抨击固有文化之新学界风气，则尤不能不使先生大抱不平者；晚年之不遑宁处，胥为此一大问题，非有他也。综先生一生，无日不在拼命奋斗之中，忘身忘家，老而弥勇，虽病不衰，而求其果何所为？则莫知所为也，一念不安不平，鼓荡而驱使之耳。

以“有所不平”为说明，似说得先生有如许客气未除。然先生自是一豪侠丈夫；其生质所为近道者，即在一腔侠气。比至于晚年，乃深造于学，则似在五十以后矣。且先生固尝自白之：

吾同韩君季和，自幼而壮而老，一生皆致力革命工作；而其根本两观念，即一为解决贫民生计而革命，一为不满秦汉以后奴儒学术，及更不满奴于欧化俄化而革命是也（今之醜心欧化俄化者亦皆奴儒之类）。明知狂妄心理说出徒惹人笑，然生平志事确是如此，事实俱在，亦无庸讳言者也。

虽有所不平哉，然迹其生平行事又无在不见其恢廓和平之度，则以有其大本故也。试即先生所为不平者，而分求之，则或动于恻隐之心而有所伤惜，或发于是非之心而有所排拒，皆根于其不得已之天怀；夫岂寻常计较之为哉！呜乎！是其所以伟也！

先生之惻惻于民生问题，其一生所举事业于此为多，人所共见；然其是非心之强，思想上务求一是，不肯含糊承认，随俗苟活，则用力虽勤，而有不形于外者，不可不一言之。于此又可以说，先生所谓不安之念者，有心有所疑而不安之一义。何所疑？疑于是非，而莫知所向。生活所向亦唯在利于生活者耳；胡为乎有是非之说？是非观念则人类所以异于禽兽者也。孟子

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盖于一般生物但求饮食活命之上，乃有其更高要求焉。故生或有所弗乐，患或有所不辟，而顾酌问乎是与非，合理与不合理。往者风教相沿不改，众人习于一是，所向若不难知；自西洋文化之来，旧日文化浸以摇坠，虽众人亦疑于所向，而含糊承认，随俗苟活者多矣。其意识明强之士，乃讨论乎新旧之理，各求其所是，此固吾先民以理性导人，而无宗教锢蔽之好果。先生又吾民族之杰出者也，既一向有其自觉的主张，非徒习于众人之是，其整个生命力方向于其意识上崇高之点以进；此而动摇，骤失所向，其生命直无处安放；其不能不奔走亟亟以求之也，不得止，有必然矣。此先生所以虽无意谈学谈思想，而又无日不心于斯，口于斯，反复剖别务求乎一是，以为其致力之所向者；凡在朋友学生盖靡不见之矣。征之于先生所自叙者，如云：•

吾平日好谈事实，不好谈思想，恐引起纠纷，反于事实有碍也。同人多谓我事实派，非思想家，吾亦云然。今为事实所推演，又多牵涉思想问题入于文化政治范围，非吾预料所及也。

（上略）……更感到此项大问题非从文化上不能得根本解决。适于此时北大新潮发生，蓬蓬勃勃，大有横扫一切之气势；旧欧化尚未认清，新俄化又席卷而来，致使教育界同人目迷五色，莫知所从。而吾所得一知半解之教养思想，亦遂不敢自信，心理上乃稍稍发生变动，以为只要社会能均平解决，自不必执定一说。遂约同六中校长丛禾生先生经北大学生徐彦之介绍晤见蔡子民、李石曾两先生，谈许久不得要领，……后又谒见胡适之先生，并参读各种新书，……乃盖觉疑莫能释。在此思想未得解决时期，个

人应向何处努力，实为自身最感困难之问题。（下略）

吾因思想不得正当出路，南胡北越，寻师访友，积二十余年之久，始能认出致力方向，吾因此推知疑难烦闷者之大有有人在也。

盖其生活上必自觉的有所向以进乃安，诚大有莫能自己者在，斯其人所以为真也，所以为古人之狂者也。呜呼！是也，合理也，古今几多志士仁人于此死焉，于此生焉！人类生命之高强大于此见焉！使人类历史而不见有此要求于其间，不知其为何种动物之历史也！奈何今之人必一则曰人类求生存；再则曰人类求生存；日从乎共产党之后，以生存利害解释社会之一切，而不复知人心有是非，几何其不相率入于禽兽之途也！凡此辈也，其盖试一省乎先生之为人。

唯以先生自求其致力所向，而非欲讲说于人也，故异乎口耳之学。抑先生之才与境，亦不适于世所谓学问一途。故先生尝自白之云：

吾因苦于无学，枉费半生气力，终无一点是处；且有时心虽知之，而口不能道之，任听邪说横流，青年误入歧途，致陷于悲惨境遇而不知自悔；每一念及，不寒而栗。此后只有勉力为学以补我之缺憾而已。

其写文章，作讲演，只在晚年，即最近一二年事耳。虽无著作传世，或其他可形著于外者，然而毕生精力固尽瘁于是，正不异乎一个思想家。其所见到之处，无论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每每伟异精卓，开人心胸，耐人寻味，大有资益于世；是则有待于朋友学生为之记述阐发矣。

先生最近尝与朋友书云：“吾一生自矢信条，即赤条条而来，复赤条条而去；既不愿居功，更不愿居名，为感于人类之悲惨

及民族之危亡，迫而献丑于世，不唯不愿与人争短长，即学问亦无暇成就得，一本无对无我之精神，尽心力以为之而已”。〔1〕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先生盖一无意于是。及今盖棺论定，愚不敢为阿好之言，先生于斯三者殆一无所似。然而凡在朋友学生，甚或与先生仅有一日之雅者，类皆于先生人格有深刻印象之遗留。是何谓也？吾总以为是唯先生行事有莫能自己者行乎其间，信如先生所自言受支配于不安一念者。或有所伤侧而不安，或有所不平而不安，或有所疑而不安，凡是念也，一一可以动天地泣鬼神历千古而不磨；如之何其不感人深且长也！凡是念也，一一为人类精神之表征，为吾民族精神之表征。人类苟不长此沦溺于贪利斗争之道，自趋于灭绝，而犹有世界新文化之开出也，其必由是念以充之达之；舍是无他道也。吾民族苟不长此颠倒迷扰于西洋文化之后，而犹有其民族生命之再造也，其必由是念以昭觉之苏起之，舍是无他道也。先生往矣！先生精神所感于人心而遗于后者，得不失焉，得因以继续发挥光大之焉，则近为民族所利赖，远为举世所利赖；类是在先生固自有其不朽者矣。

呜乎！居今日禽兽奚择之世，使吾犹得识乎人类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先生在也。居今日民族垂亡之际，使吾犹得识乎民族精神未死者，以有先生在也。今也，既不可复见矣！吾唯以先生感于吾心之印象，拳拳焉藏于吾衷，冀得昭觉扩充吾莫能自己之一念，继续先生之精神于万一。民族生命乎！人类文化乎！薄劣如愚，虽知其不能堪，顾得已于自奋乎！

〔1〕愚见先生与朱桂山先生书中，自述其与米迪刚先生书有此数语。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325—331页，  
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

《村治》，1卷5期，1930年8月1日。

此文写于1930年，其时吾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且有偏见，故  
尔出语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语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过。

1965年5月梁漱溟识

## 重刊王鸿一遗著《三十年来衷怀所 志之自剖》一文之按语

鸿一先生生平不喜写文章。虽极好与朋友学生讨论辩论各种问题，顾亦不喜作讲演。其发表文字及应外间之约为广众作讲演，乃最近一二年间事耳。盖晚年来，于其所见乃益坚定不疑，而哀时又益切也。然所发表文字，仍以口授于人，而后录成者为多；其讲演稿更多出于记录略加修饰者——或且未经修饰。唯此篇，则十八年中秋节前，先生在太原客寓亲笔属草，且曾两易其稿，最后删略而成。方属草时，常出示其故交朋友；更举自己眷清一分郑重付愚。虽语其生平志业，于此犹为未备；而其意与情要概见于此矣。曾一载于去年《村治》月刊第11期；今以先生之丧，特再刊于此，供读者参阅。先生逝世后一个月漱溟记。

《村治》月刊，1卷5期，1930年8月1日。

## 为胡适之先生复信所写跋语

适之先生此信，重申其前旨，别无重要提示；且许我们，“将来一定要详细作答”；则此时殊无可以置论者，故我即不写答论。

前次张崧年先生在师大讲演，谓我与适之先生向来常常对垒互骂；而我在师大讲演“中国怎样才能好”，是对适之先生在北大讲演骂我之一“回敬”。此全与事实不符。就往事言之，我与适之先生的论战只有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评我，乃在十二年春初发表于《努力周刊》，相隔一年余。其后我又取适之先生批评我者，而作答论，则已是十二年冬间，相隔大半年矣。此其间似尚没有什么彼此互不相让而急相对付的神情。就眼前事言之，则适之先生在北大讲演，怎样骂我，如果不是看见张先生演词中说到，我尚不知有此事；即至今我仍不悉其内容。指我讲演为对适之先生一“回敬”，果从何说起？今观适之先生此复，态度很好，益觉张先生于两方面均失言！

今日之中国问题实在复杂难解决，非平心静气以求之，必不能曲尽其理。若挟意气说话。伤个人感情事小，诚恐天下事理转以意气之蔽而迷晦；言词纠纷，亦乱读者耳目。罗素最佩服中国人的“平和气”（pacific temper）；我想适之先生与我，都

不致十分失却中国人的态度。如果适之先生能给我们很详细的答复，我一定小心勉勵着以此态度而讨论中国问题。——我前请教适之先生的信，虽没有冒犯的话，然不免气盛了些。

梁漱溟。十九，八，十六。

《村治》，1卷5期，1930年8月16日。

附录：

### 胡适之先生复信

漱溟先生：

今天细读《村治》二号先生给我的信，使我十分感谢。先生质问我几点，都是很扼要的话，我将来一定要详细奉答。

我在“缘起”里本已说明，那篇文字不过是一篇概括的引论，至于各个问题的讨论则另由别位朋友分任。因为如此，所以我的文字偏重于提出一个根本的态度，便忽略了批评对方理论的方面。况且那篇文字只供一席讨论会的宣读，故有“太简略”之嫌。

革命论的文字，也曾看过不少，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先生所说，“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如说，“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如说，“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今日冯、阎、蒋之战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

这都是历史事实的问题，稍一翻看历史，当知此种三尺童

子能说的滥调大抵不中情理。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莺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先生要我作历史考证，这话非一封短信所能陈述，但我的论点其实只是稍稍研究历史事实的一种结论。

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状态之下，什么救济和改革都谈不到，只有跟着三尺童子高喊滥调而已。

大旨如此，详说当俟将来。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二十年来历史的明训。处置军阀——其实中国那有军阀可说？只有军人跋扈而已——别无“高明意见，巧妙办法”，只有充分养成文治势力，造成治安和平的局面而已。

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已失掉其依据，只靠做官或造标语吃饭，故不复能澄清政治，镇压军人了。

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

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即以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几次互战看来，何一非长衫同志失职不能制止的结果？当民十六下半年宁汉对峙之际，长衫同志方奔走和平，而武装同志已开始战事。又当民十八春间，长衫同志与苍髯元老方奔走和平，而武装主席已调重兵压境，战祸遂直到今日。当此两次战事爆发之时，所谓国民政府，所谓国民党，皆无一个制度可以制止战祸，也无一个机关可以讨论或议决宣战的问题。故此种战事虽似是军人所造成，其实是文治制度未完备的结果。所以说扰乱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似乎不太过罢？

《新月》已积稿两期，尚未出版；我若作详细奉答之文，恐须在两三个月之后始能发表。故先略述鄙意，请先生切实指正。

胡适。十九，七，二十九。

## 为北京《益世报》出版五千号 纪念所写赠词

中国革命，不出于其社会内客观事实的要求，而实发动于少数人意识上的先见；即所谓以先觉后觉领导之民族自救运动是也。此其性质上与欧洲革命为其社会内部问题爆发者大异。故欧洲人之问题或得以斗争解决之，而中国则天然的必当从理性取决。抑又当知者，中国于历史上为世界最尚理性，最有理性之国民，甘于服善，而耻于用暴。吾民族今后而果有新生命之辟造也，其必自此精神之发挥以得之。乃国人为共产党所误，亦欲以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是有乱而已，不能有积极的结果也。今其事亦既可验；国人宜可以猛省而改途矣乎！言论机关如报纸者，则一社会间理性发挥之具也；吾人愿祝其发达与永久，吾民族新生命之开辟于是赖焉。十九年八月书为北京《益世报》出版五千号纪念。

梁漱溟书赠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42页。

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

《村治》1卷8期，封二，1930年10月1日。

## 读李朴生先生《村治运动的 正路》后志

朴生先生此文，恐怕我们村治运动的朋友忽视了科学，忽视了物质方面，而主张我们应当先从科学的领导解决物质问题；这自然是对的。如果大家取我各篇文参看，或亦可知道我主张亦正是如此。

但是我有几句话要声明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我有点小意见，即朴生此文所引我作《村治学院旨趣书》上的几句话；但我既尚未暇分条解释具体提出我的主张来；——因照我讨论中国问题的篇目次序尚未到。在未整个发表以前，希望批评家不必赐教。至于我的主张是否在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上有点点参取价值，尚难说的很；而且亦不能算谈村治的朋友共抱之主张，还有待同人研究。又关于反对欧化俄化的议论，以王鸿一先生为首倡；而我亦是一个。但我们所指为欧化俄化者，均专就其人生态度社会风习而言；若科学方法及其所成就（许多学问及物质文明）则是天下公器，从人类智慧发挥去，自然有的结果；虽欧洲人开其先，固非欧洲人所得私也。例如电气化非俄人所得私，亦即不在我们所谓俄化范围。好象一个人的品格脾气才情是属于他的；我们说到某人时皆就此等处而说。若他发明了什么音乐的乐器，文学的格律，园艺的新方法……等；我们顶多不忘他先发明之赐而留下这一名字，而此乐器格律新



方法则早属一社会或全人类公有，与其人尚有何干系？“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一句话是有理的；彼亦不过偶得之耳。文学艺术犹或有家派风格之分别，科学则更是公的，没有个人或民族的关系在内。如让我具体的说出，则我平常所用欧化俄化两名词，亦不过指从欧洲近世社会所产生的“法治”，共产党新兴的“党治”而言而已。换言之，亦即汪精卫先生所说“两种模型心理”耳；请大家不要误会。又关于“精神生活”这一名词，我要声明我向来是不用的。生活就是精神的，再加精神二字于上，我不知是什么东西？（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的对用法，根本不对，我们向来看作愚昧笑话。）生活就是吃饭穿衣睡觉读书作工游散等等，精神亦在内，物质亦在内；同样没有可以离开物质的生活。说个物质生活，人都知他就是眼前的生活；所以尚无流弊。说个“精神生活”，则人很容易想他是超离物质的；尤其容易想他是与眼前不同的一种特殊生活；这就大不妥了。与眼前生活不同的一种特殊生活，印度似有之；中国则没有。中国儒家所讲求的只是眼前生活如何乃妥善合理，即所谓礼义是也。礼义即在穿衣吃饭之中，不在其外。村治是与礼义有关系的；而与含有特殊意味的精神生活则无关系。孟子说，“救死惟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固然不错；而要知救死之中亦正有礼义在；没有礼义的救死，亦是救不了的。不要说“合作”里面大有礼义在；即农业技术改良，亦须有礼义才作得通呢！最粗糙简单的礼义，就是人与人间的是非。有生活就有是非；生活进于丰美，较高较强的礼义乃发生而亦必要。固不能先礼义而后吃饭；亦不能先吃饭而后礼义。吃饭与礼义二者，可以并进而不可以相离。至于礼义以外，其他的什么“精神生活”，我们当然不管，不成问题。

**漱溟读后附志。**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331·332页。

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

《村治》，1卷6期，1930年9月1日。

## 中国问题之解决

近承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先后来邀讲演，均为取此题粗陈意见。所陈，自然还是我的“乡治论”中之一片一段，疏略不完。然既讲了，则亦姑存于此；好在将来于本刊尚要依此讨论的。漱记。<sup>〔1〕</sup>

我们提出此题，是想讨论以下两点：

一、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量何在？换句话说，靠什么人来解决中国问题？

二、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这是许多有识见的人，绞脑汁而未有明白解决者。我们要在一小时内谈他，自是粗糙的很了。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问题？比如认定中国问题是在外不在内，如同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整个中国民族来解决这问题；对第二点，就应当说是民族革命。又如认定中国问题在内而不在外，如同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或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社会某阶级或其如何联结为原动力，对第二点，就应当是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诸如此类，可推而知。

---

〔1〕此为《村治》发表时著者所加按语。——编者

但说到中国问题是怎么样问题就难了。从1911年的中国革命看去，很像是中国社会内部问题，即是对待满洲皇帝之一种民主革命；但从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看去，又像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而且含着浓厚的经济革命色彩。现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不独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即在国民党内或共产党内，亦复见解纷歧，派别对峙；至于其他如国家主义派等等更不须说了。又如胡适之先生不认中国为对外问题，亦似不认中国为对内问题，而有其五大魔之说；殆认中国问题在其本身文化上的缺欠。本来自数十年前之变法维新运动，以及十年前之新文化运动，大家都是着眼在自己文化缺欠，而从事于改良运动的。罗素亦尝说中国问题包有政治、经济、文化之三者。大概中国问题是在内或在外，是政治或经济或文化，几乎因时而异其向，因人而异其词；但似乎只是敬轻敬重之不同，没有专执一面或一点者。

照我想，我们的中国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复杂难言的一个问题，原不如别人家的问题之简单决定。中国问题的特征，一则是“不一”；二则是“不定”。“不一”是说外面内部以至种种都有。“不定”，因其不一自然不定；而我们意见更指问题中的各方面，其关系不决定。关系决定者，如封建地主与农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与其殖民地。但中国问题中，方面既多，关系复含混模棱不定。就外面说，压迫侵略我们的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能一致对我，形成彼此简单的两方面；而且我们亦只是半独立国家，未曾干脆地作了人家殖民地。就内部说，则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与资本社会之间，谁亦说不清是个什么社会；俄国共产党干部尝名我们为“半封建”。——大概遇到中国事加一“半”字都颇适当。其实中国社会，一半因其

不进步，一半因文化的特殊，乃异常散漫而流动。他不独没有形成阶级的对抗，乃至职业的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亦每为家族的或地方乡土的关系之所掩（中国社会构造密于家族亲于乡里，其他关系皆轻）。自满清推翻，共和宣布，法律上看去更像是政治机会已经公开而平等；但实际上则任何法律制度均未建树得起，二十年来已陷于无法律状态。于是乃由散漫流动，而更进于混乱不清。此时而欲于其间分出几方面，判定其关系，直为不可能。我暂且只说到这个不一不定为止；至于我对中国问题所抱见解，其侧重之点则于下面略有表露。

中国问题既如此不一不定，因而于我们所要讨论之两点，自有许多不同意见出来。关于第一点大概有下列几说：

一、全民革命说，国民党中吴稚晖先生主之，又国家主义派亦同此主张。大意在反对沿用共产党之阶级斗争观念，为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之说者。他们大都声明“全民”非中国人全体一个不缺之谓；但表其为各阶级大家合作，不出于某阶级或某部分人。

二、各阶级觉悟分子团结革命说，国民党中汪精卫先生主之。他说国民党是超阶级的，由于各阶级觉悟分子的结合来行革命。他从民族对外来立言，其意亦在反对一阶级革命说，及某某等阶级联合革命说。

三、农工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联盟的革命说，国民党中所谓改组派如陈公博等许多人倡之。他们说国民党要在这三项人上成立其革命队伍。并且最好有一定比例，即农百分之五十，工百分之三十，小资产阶级百分之二十。其意革命必有某阶级或某部分人为被革者，及牵于利害不肯革命者，若云“全民”即等于不革命。

四、被压迫民众的革命说。十七年南京中央党部颁发出来的《党员训练大纲》，于上列三说均为不取，而说：“中国社会大体只有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地位职业和性别的区分，而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之显著事实；而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民众互相间不仅没有激烈的普遍的深刻的利害冲突，他们所受痛苦和所欲消灭的敌人大体又复相同；所以全国被压迫民众不能不团结一致，共立本党旗帜之下，谋全民族的解放和全社会生存问题的解决。”

五、有产者革命说。1923迄1927以前的共产党，大都认中国革命属于对外的民族革命及对内的民主革命；而这种革命都是要出自资产阶级的。1927年以后共产党里面对中国问题分开两种不同见解，其中斯大林派（或称干部派）仍不出此意，所以他们以为中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资产阶级性的工农民主政府。

六、无产者革命说。共产党中反对现在干部之杜洛斯基派，认为中国社会已资本主义化，而且自经两度革命（1911年及1925—1927年）后，资产阶级亦已掌握政权，此刻正革命高潮一时歇落之际，将到临之第三度革命应当是无产阶级起来树立其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如同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

上列各说，有的不能令我们满意，有的我们认为错误。论者若非否认中国革命之内性，即不应将革命力量笼统地属之中国人，如所云“全民”，或“一切各阶级”。我们本来问，靠谁革命？乃回答，全都革命；实没指得出来。汪说亦不能稍愈于吴说。所谓觉悟分子之“觉悟”何指？必不能是和尚悟道之“觉悟”，自该是觉悟要革命之“觉悟”。说各阶级觉悟分子来革命

即等于说：“谁革命？要革命的人革命”。这话如同没说一样，何能令人满意！被压迫民众说亦不能稍胜。这等于问，谁起来反抗压迫，而回答，被压迫者起来反抗压迫，宁非无味。况且眼前的中国社会已完全陷于无法律无秩序状态，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已失其决定性，而没有分野。因最高权力寄于枪杆，大小不等，头绪纷纭，又且是转移无定，得失瞬变的。凡此近于滑稽，无当事实，囫圇吞枣的说法，一半固由中国人喜作不着边际的巧文章，一半正为中国原是那么混乱复杂没从指划剖别的一个东西。其他三说的批评，及各家说法的真正短处，则讨论到后面比较之可见。

我对于第一点的答案是：

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

欲说明此答案，还须翻回说明中国问题。照我的分析研究，现在之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势力（欧美并日本皆在内）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绌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问题。大家要注意，中国社会内部并不是没问题；——至少满洲统治者是一个问题。但若东西始终隔绝，中国还是中国，不受西洋文化影响，即有问题爆发出来，其性质其形式亦必非如现在这样。他将为旧日历史的重演，而必不会有新式的民主革命，民生革命，共产革命。“现在之中国问题”，发自内部者轻而来自外面者重；或亦可说，由外面问题引发内部问题，并以外来的新形式演之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能点出中国问题的内涵是些什么。其民族主义就是外面问题；——民族对外自求解放。其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就是内部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虽曰内部问题，而

实从外面引发的。所谓“外面引发”，具有三义：

- 一，受外面的压迫打击，激起自己内部整顿改造的要求；
- 二，领会了外来的新理想，发动其对固有文化革命的要求；
- 三，外面势力及外面文化实际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将其卷到外面世界漩涡来，强迫地构生一全新的中国问题。

因此，其所谓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乃含有多分世界新性质，而不能不与外面相关，直可说成了世界问题之一部分。问题虽如此具有外面性，然而语其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外面迫害所以有不可抗之势，及新理想为什么使中国人对固有文化起革命，乃至中国为什么不能改变推动外面世界而被改变于外面被卷到世界上来，胥由自家文化的特殊性与其很大缺欠而来。唯有将内部文化补充增高，使其物质与其人渐得跻于外面世界水平线的程度，是其问题解决所必要的工夫，而断不是以排开外面迫害为解决的。说到此处，使我们想起胡适之先生于打倒帝国主义不置意，而独创其五大魔之说，虽立言不免稍笨，而正非无所谓也。本身的缺欠由外面相形而益见。中国人于其固有政治固有经济，初未必到了不能安不能忍的分际；其所以成为问题，实有文化改良文化提高之意义与其不得不然之势在。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本亦可概括政治经济在内。

按照上面的分析与说明，就可知道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最先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解这个问题的只有他，问题之紧迫虐苦或更在蚩蚩无知之分子，而感触亲切成为问题并有一方向摆在面前的，则必在他。我们试按之于历史事实，自变法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以迄两度革命运动，其



发动奔走者何人，就可证明了。日本人长谷川如是闲的话是对的，他说：“中国革命几为知识阶级的事业，在一种孤立状态”；又说：“这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但产生他们的是欧美日本近代国家的历史”。我们还可加上一句注释，第一度革命多是游日学生，第二度革命则是游俄学生。而革命人物多出自沿江沿海的南方各省，革命势力且必以南方为根据地，似亦皆由问题性质所规定而然。

不但问题发动，非于问题有认识的知识分子不可；尤且是解决问题的功夫，即是文化之推进增高，更非富于世界知识知识分子不办。所以我们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似乎社会问题之解决，原无不靠其社会中有头脑有知识的人者；革命运动之前驱，原无不是思想家知识分子为领导者；何必独于中国为然？这其中却有个分别。在问题简单决定的社会，其问题是摆出在客观的，凡在问题中人于其方向所指，不必宣之于口而已喻之于心。大抵是两方面：一面是要维持现秩序，一面是非破坏现秩序不可。所谓思想家者，不过于此时供给一套否认现秩序的理论与建设新秩序的理想，其破坏现秩序之革命基础力量，原别有在而不在他。新秩序之建设完成，自亦要假手有头脑的人才行；然而方向之决定不在他身上。于此际，思想家有头脑者是宾不是主；主人自有在也。然若中国问题之真正主人是谁邪？以民族问题言之，宜为吾全民族；以政治问题言之，宜为有资产者；以经济问题言之，宜为无产阶级。问题复杂牵缠，主人多歧不定，互相消而等于无。如前所示国共两党各派领袖之聚讼纷纭，是有头脑者且迷于所向，彼社会中一般人更不自辨其出路；此时所得而依为解决问题之能动力量者果何在邪？于此际也，所谓在

孤立状态的革命者之知识阶级，已自落于主人地位，欲不为主人其又让诸谁？更进一层言之，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其民族问题并不径直对外排开迫害，而引发内部问题；其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均非径直自己发生的问题，而实于对世界为文化增高上有其意义。若果径直对外抗敌，或可合全民族为一力量；今引发内部问题，则何可能？若果径直自己发生的政治问题，或径直自己发生的经济问题，则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或可当主人之位；今顾非是，则何可以相拟？要知道，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重大的民族自救文化改造问题，早掩盖了其他问题；纵有革命亦是在民族自救意义内的。此民族自救运动，求诸全民族则宽泛无当；求诸某阶级某部分人，则狭窄不洽；而谓不在接触外面之先知先觉感触亲切之志士仁人而又在谁？文化改造之任，不在一社会文化中心之知识分子，而又在谁？于此际也，先知先觉知识分子明明是主而不是宾矣。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许多先生呆笨地想从农工，无产者，被压迫者，寻求中国革命的动力之错误。在他们是设想这些人都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机会最不好的，则要起来推翻现状，求政治上经济上机会平等的，必是这些人。他们殊不知：

一、散漫流动又加混乱失序的中国社会，其政治上经济上机会之种种不等，非限于阶级大势之定然，顾落于个人运际之偶然；个人自求出路于现状之中，较诸破坏现状为社会谋出路容易得多，“非革命不可”的形势造不成。不要说他不革命，革命了，他个人稍得地位机会，便留恋现状而落于不革命或反革命去。

二、在大势上定无好机会者，则唯穷乡僻壤蚩蚩无知之人。可以说：在中国现社会受压迫剥削最甚者，即于知

识智力最低者。他不但没有新知识而已，同时他大半是离开外面世界最远者，陶铸于旧习惯最深者。他不动则已，动则为翻转回去的动。天下岂有问题中正主人，其解决问题的方向，走向反面去者？与其认他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运动力，不如说他正是中国问题的对象，前所谓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其工夫正要在他身上做也。

反之，如果我们承认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必对于现代问题有判别力，则无论从其知识程度之取得测之，或既得后推之，其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机会固已甚优越。中国问题真可说是一个变例；革命的，不在多数被压迫剥削的劳力生产者，顾在少数可以压迫剥削他人以自了之人。这全为中国革命，是受外来文化刺激而为意识地牵拉使之向前改变；不同乎因经济演进而社会自尔机械地被推动向前变化，如西洋往例。

据说中国不识字的人在百分八十以上。此百分八十以上之不识字的人，大概被压迫剥削之劳力生产者占成数很多；其百分之十至二十识字的人，则军政各界土豪劣绅一切混饭寄生之辈占成数很多。而革命分子正亦居其中。中国革命至少要出于识字的人；因为不象在西洋社会里，纵或受不到有形教育，其无形教育影响正大；在中国社会里，不靠有形教育作接引，更靠什么？但虽说中国革命必出于知识分子，而不能说知识分子一定革命。其革命与否，全在他意识的自由，几乎就是热心不热心的问题。在共产党自不爱听这话，然而他自己正亦不能逃于此例。北平的大学学生虽多，究不胜洋车夫多，而共产党尽多是大学学生。此大学生之愿意作共产党，正如他同学之或愿作传教师，或愿作买办，或愿作官僚政客一样。

我们对于感受迫害虐苦之多数人之亟求解除苦痛那件事

实，原不否认；只是他自己太没方向。然此自是社会中潜伏的解决社会问题之一大力量，为有革命方向的知识分子所必凭借。否则，知识分子而热心革命者为数几何；又何能斡旋得全个社会，成此远业？不过照我们的认识，他是宾而不是主耳。主与宾，何由定？方向在谁身上，谁是主；从乎其方向来完成其事者为宾。于此，可以打个譬喻。一社会知识智力之士，是其社会头脑心思之所寄，社会众人离他不得。一个人的行动，虽无不经过头脑判定而身体活动出来，但方向有早决于体内者，有待决于头脑者。唯社会亦然。西洋革命往例，好象一个人饥饿或干渴的问题先发身体的，而头脑为之觅饮求食、虽问题的判明与如何活动无不经过头脑者，而方向固已早决于体内，且上达之于脑，头脑不过从而映现于意识完成其事耳。饥一定求食，渴一定求饮，无容商量。现在的中国革命，好象一个人病了，身体内种种不适，而头脑为之觅药求医。此时问题的认取，——病在哪里？解决的方向，——当吃什么药？一待头脑慎思明辨而后决，甚至身体初时尚不爱吃这药，待服下去后，方感得好。是则头脑决定方向，身体从而完成其事，比之前例，主宾互易，正自不同也。

所谓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必凭借的社会中潜伏之一大力量，我是指乡村间居民而说。我们可以看见历来对于中国问题之发动，有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通习外面世界情势之知识分子所发动者；历来的各种维新运动，各种革命运动皆属此例；一种是不通外面情势之内地无知农民所发动者；同光年间闹的无数教案，1900年义和团之扶清灭洋运动，以及近年北方各省之红枪会、天门会，四川之神兵等等皆属此例。虽然前一种亦未见

得果能认识中国问题，而为有眼光的发动，但其所认识的在当时就算最有眼光，而仿佛无以易之的了。若后一种则正同于一个病人为痛痒苦楚所激起的身体乱动。许多先生期望径从这里得着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当然是错想；然事实上却亦不能外乎此，而成其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殆在引后种动力并入前者，而成为一种动力。然而这引的工夫，是要由前者来作的。换句话说，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并一起而拖引他上来。

于此，我们要分两步说明。

先说明我们为什么不用“农民”“农工”“被压迫民众”“无产阶级”等词，而特标“乡村居民”。我以为“有产”“无产”是不适于拿来分别中国社会的。“产”若作生产工具讲，则有二亩地的贫农与自营手工业者都应有产了；有产无产相去不能以寸。产字若即作钱字解，则有钱无钱其以多少为准，更不好分。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来分，没有指实，不成一句话；而且已混乱无序，分别不来。农工二字似有所指，然其散漫与不一致，亦几为一空概念，没有实体。现在中国社会，其显然有厚薄之分舒惨之异者，唯都市与乡村耳。此厚薄之分，在旧日固已有然；自西洋式的经济西洋式的政治传入中国，更加取之此而益于彼；近年军阀与土匪并盛，一切压迫掠夺所不敢施什一于都市者，骈集于乡村；既饱则飏于都市。固然中国无所谓逃于封建领主的自由市民，然身体生命财产的自由，在都市居民比较还有点，乡村居民已绝对无可言者。乡村居民的痛苦，表现中国问题的灼点。不堪其苦者，避居于都市或外国租借地，便仿佛入了另一世界。故中国社会本不好分判得开，唯乡村与都市无论就政治言就经济言，却见形分势异。逃离乡间者皆地主

乡绅；其所余乡村居民内部非无问题，然宜留待后一步解决。我们所以不称“农民”而称“乡村居民”，其意盖在此。又交通不便，阶级不明，散散漫漫的中国人，其职业的或阶级的联系，远不如地方同乡里的关系之深，团结之易。而在都市中人则不足语此，他们是疏落不相干的。只有同一个乡村的人较为亲切，有时能形成一个力量。一面激于痛苦，一面易有团结，此所以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必凭籍也。

次说明怎样开发这潜伏的大力量，而引入正路，现其功用。从历来中国问题之两种发动看去，其间有一大苦楚，即两种动力乖离，上下不相通。在下层动力固盲动而无益于事，在上层动力，以其离开问题所在而纯秉虚见以从事，其结果乃不能不落于二者：一，搔不着痛痒，二，背叛民众。

所谓离开问题，即指其离开乡村，所谓纯秉虚见，即指其但袭外来眼光，摸不着自身问题，不为欧洲近代文明之景仰，即为欧洲最近潮流之追从。欧洲近代文明，一都市文明也；景仰都市文明，岂所以振拔乡村痛苦者？自教育实业警察陆军之兴，法律政治种种之改良，而乡村痛苦乃十倍于前，然此其背叛民众犹为不自觉的。欧洲最近潮流，一都市文明（或工业文明）之反响也，追从都市文明之反响，其何当于解决乡村问题？自国民革命兴，而军阀益以强，捐税征发益以重；自共产革命兴，而土匪日以张，乡村圩里日以毁，纵将巍巍的中央政府成立起来，其如早已离开民众而至背叛民众何？当初固自号代表多数民众，现在亦非不自知其离开民众背叛民众，而究竟无法纠正，无法善后！盖不从乡村起，自不能归本乡村，离开乡村，即离开民众；入手即错，其不走向背叛民众去固不止也。

我敢断言，如果这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不接气，则中国

问题永不得解决；而上下果一接气，中国问题马上有解决之望。如何可以接气？当然是要上层去接引下层，即革命的知识分子下到乡间去，与乡间人由接近而浑融。知识分子而且是革命的，其下到乡间去未有不扞格冲突者。求其浑融，谈何容易？本来这是工夫之始，亦是工夫之终；——最后目的所在。我们自始至终，不过是要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最后二者没有分别了，中国问题就算解决。这其间的步骤，我推想是如下的：

一，知识分子于回到乡间去之前或后，必须有相当联络组织。

二，即从回乡的知识分子间之广大联络，逐渐有于散漫无统纪的中国社会，形成一中心势力之望。今日社会太没力量（尚不如清末），而只见滥充执行国权的军阀有无限威力；由此形势可望转移。

三，知识分子下乡后，其眼光见解乃剖切问题而不骛虚蹈空，其心志乃一定于革命而不移；——知识分子若徜徉于空气松和的都市或租界，无望其革命；只有下乡而且要到问题最多痛苦最烈的乡间一定革命。在乡间人一面，则渐得开化不再盲动于反对的方向去；不为土豪劣绅所操弄，乐近知识分子而不疑。双方各受变于对方，相接近而构生一个新动力，于是仿佛下层动力得了头脑眼目，又象上层动力得了基础根干。

四，此广大联合而植基乡村的势力一形成，则形势顿即转移过来，彼破坏乡村的势力乃不得不软化威胁克服于我。这好比病人身体元气复，生机开，则一切客邪不成问题一样。所谓社会中潜伏的大力量上升发而现其功用，即

指此。

浑括地说，大概是这样；其详更俟另为一文论之。由此再进一步，乃有真正乡村改进工夫——亦所谓文化的推进增高工夫——可做，其方案更须另谈。乡村改进的功夫作到家，革命的知识分子与乡间人二者乃浑融没有分别了。所以我以为解决中国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如何将乡间人拖引得上来一件事。

中国问题之解决方式，为改良抑或革命？在这里没多少讨论，不过就上边的话，更为申明而已。我上边的话，曾说：“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很象是一个改良派。但处处又表露革命的口吻，颇若自相矛盾。现在我肯定地说，中国问题之解决方式，应当属于“革命”。

革命是秩序的改造；但这秩序的改造，每每必先之以某种势力的推翻。因秩序不过是法律制度习惯教条等；这些东西所以有效，总必有一种势力为之后盾，即秩序总必有人拥护维持；——他们多是凭借这些秩序而存在的。革命以对秩序为主，对人为副。中国问题本含有民族革命意味，所以对秩序即历来各不平等条约及其不著条文之惯例；其人即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者。然其事不同乎印度人朝鲜人非先与英国人日本人拼命不可；而顾在有以自强，从事废约修约。中国问题本含有政治革命意味，然自1911年革命后，既号民主共和，所以对秩序既代之以临时约法或准约法（国民党谓孙先生遗教即约法），所以对之人则已不存在；——现在更无拥护维持旧秩序而凭藉之以存在之人。中国问题本含有经济革命意味；所以对秩序即个人本位的经济制度，而其人则殆不存在。因工业资本没形成，真正非反对这秩序不可，及真正非拥护这秩序不可之人，两俱不存在。其不赞



成这种革命者，亦许正在多数，然只是耳目心思有所蔽，非其势所不得不然。因此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皆是如何建造成功新秩序的问题，而没有旧势力之可推翻。凡以军阀为民主革命的对象，以有钱有地的人为社会革命的对象，均属错误笑话。此外以我说：“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然毕竟是一种革命；从旧秩序——君主专制政治，个人本位的经济，根本改造成——全新秩序——民主政治，社会本位的经济，不说他是革命更是什么？

附带的声明的：此处所称“民主政治”，“社会本位的经济”，皆不过指示一个大方向，其内容颇非容易说的；此处所云“文化改造”即指经济政治等改造而言，于我平日常说“文化复兴”，意指中国人生态度的复兴者亦无悖。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77—192页，

1933年，中华书局。

《村治》，1卷8期，1930年10月1日。

## 梁漱溟启事(为《村治》延期出版事)

漱旧有失眠症，自弱冠迄兹，时犯时愈。月前以事赴鲁（事见本刊乡村运动消息栏），〔1〕，往返两周，于本刊撰稿已多耽搁。乃返平后，忽触发旧疾甚剧，精神疲顿，不能运笔构思者又及兼旬。第9期出版延期已久，不便再延，用即出版；一俟小愈，当有稿发排于第10期。特用声明。

《村治》1卷9期，1930年10月16日。

---

〔1〕此栏本期刊有消息两则：《河南村治学院停办消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举办消息》。后一条消息中说：“此次韩公移主山东省政，因又有在山东为乡村建设倡导之议，迭有函电约梁仲华、梁漱溟诸先生赴鲁商拟办法。”“其梁氏所拟计划，则为设一乡村建设研究院，内容分乡村建设研究部及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并拟请省府指定一县为试验区，俾便实地研究训练。此计划经已交付韩主席，其举办则尚待省政府议决云。”——编者

##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筹备招生，同人因推院长梁仲华先生撰写此文，期与招生简章一同发布，借作本院创立意义及内容办法之一种说明。其后仲华先生以所事过忙，不遑执笔；执笔之责，终于落归我身上。乃就同人所夙昔讨论者，综取大意，写成此篇；既经同人采用公表，复以载诸本刊。合用声志于此。<sup>〔1〕</sup>

**梁漱溟**

中国原来是一个人的农业社会。在它境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大乡村，说得上都市的很少。就从这点上说，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

假使中国今日必须步近代西洋人的后尘，走资本主义的路发达工商业，完成一种都市文明；那么，中国社会的底子虽是乡村，而建设的方针所指犹不必为乡村。然而无论从哪点上说，都不如此的。近代西洋人走的这条路，内而形成阶级斗争社会

---

〔1〕此为刊于《村治》时著者所写之按语。

惨剧，外而酿发国际大战世界祸灾，实为一种病态文明，而人类文化的歧途，日本人无知盲从，所为至今悔之已晚矣；我们何可再踏覆辙？此言其不可。西洋其实亦何尝愿为工商业偏蔽的发展，都市的畸形发达；然而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路，则农业是要受到桎梏，乡村是要归于衰落的。在他们那地势、那时际，犹且吃得住，索兴走上工商业的偏锋，回头再谋救济农村；在我们如今则万万吃不住。此言其不宜。抑更有进者，我们今日便想要走西洋的道儿亦不可能。在这世界上个个俱是工商业的先进国，拚命竞争，有你无我；我们工商业兴发之机早已被堵塞严严地不得透一口气。正不是愿步他们后尘或不愿的问题，而是欲步不能了。因此，除非没有中国建设问题可说；如其有之，正不外谋其乡村的发达，完成一种“乡村文明”。

所谓乡村文明，初非与都市文明相对峙的；“乡村的畸形发展”是没有这句话的。因为乡村发达就是它的文化增高，物质设备，近代都市的长处不妨应有尽有，亦可说“乡村的都市化”；则是调和了，而非趋于一偏。而且乡村文明的开发，天然是要植基于经济上一条平正路子的。前面说过，农业在资本主义下受到桎梏；那么，农业的发达是在什么道儿呢？那便是“合作”。工业国家所以救济其农村的方策在其农民的合作；农业国家（如丹麦）所以立国之道在其农民的合作；即以共产为旨归的苏俄，其入手处亦要促进其农民的合作。西洋所以陷于工商业之偏蔽发达的，全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而来。合作既异乎所谓个人本位，亦异乎所谓社会本位，恰能得其两相调和的分际，有进取而无竞争；由此道而行，自无偏蔽的结果，并不是利于农业者，又将不利于工业。唯此农业工业自然均宜的发展，为能开出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而唤它为“乡村文明”的，

以其为由乡村开发出来的文明也。此由乡村开发出来的文明，一切既造于都市文明的国家大都不容易去成就它了；只有中国人尚未能走上一条路，前途可有此希望。那么，亦就是只靠中国人负此伟大使命。从此义言之，中国的乡村建设不单在它自己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具有如是重大关系，深远意义在！

我们且不说远的吧。摆在眼前最大的问题，不是许多人没饭吃么？天灾待赈先不计；自求官谋差，投军从匪，以至官无可求，军无可投，匪无可为，与西洋失业又自不同的一种劳力过剩，年年逐增未已，情形何等严重而急迫！就从解决这问题上说，那么，又是应当走农业路而不应当步趋于工商业；——这是几如东西之异途的。现在资本主义下的工商业，只是发财的路而不是养人的路。不要说它在中国没有发达的可能，便发达到美国今日之盛，亦不是有七百万失业之众么？农业则不是发财的捷径而正是养人的路，尤其是从“合作”发达起来的农业，最是养济众人的一条大道。诚然，中国所患在生产不发达；但这不是徒然生产发达能了的事；其中更有如何得均宜地发达，和如何分配问题在；不可不注意。而想要农业发达，不是农业片面的事；在其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教育）都有密切关系，而实为整个乡村的事。如此方方面面都顾到的促兴农业，换句话说，那便是“乡村建设”了。——只有乡村建设，促兴农业，能解决这多数人没饭吃的问题。

更进一层，试问这许多没饭吃的人何由而来？其始大都是安住乡村的；皆由不得安于乡村而来。最易见的，频年兵祸匪祸是破坏乡村，偏迫着人离开乡村散荡在外觅食的；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全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是专门诱致乡村人于都市，提高他的欲望而毁灭他的能力，流为高等乞丐的；轮船

火车的交通，新式工商业的兴起，都市文明的模仿，皆是诱致人离开乡村而卒之失其简易安稳的生涯的。更其有间接而致之于此的普通形势，则自欧人东侵以来，一面以他们对我之侵略，一面以我们对他之模仿，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内外两重一致的朝着侵渔乡村摧抑农业的方向而猛进；乡村乃日就枯落凋敝。然而中国所有者，则只是乡村，只是农业。使果得如日本人之机缘凑合走上工商业的路，亦还算别开生机；无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又将此路压挤得严严的。于是乃前后无路，以致没饭吃的人一天一天增加，还有什么结果可得？民族生命其犹得维持至今者，盖唯赖吾农民之过人的勤勉耐劳与过人的节约耐苦。因此，离乡流荡无归者固属没饭吃；其株守乡井者亦多在生活最低线以下，与饥饿没什么分别的。

那么，我们可以明白了，今日的问题正为数十年来都在“乡村破坏”一大方向之下；此问题之解决唯有扭转这方向而从事于“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要在于此。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

现在中国社会中吃饭最成问题的，似更在受过教育，有些知识的那般人。在简拙的旧农业上用不着知识分子；而象前所说农民勤苦的习惯能力，他又已没有；因此，在农业道上没处养活他。况他生活欲望已高，亦自然要竞趋于都市的。但这没何等工商业可言的国家，都市中又何曾替他们开辟出许多位置来？于是就都拥到军政学界来了。其无处安插之苦，生存竞争

之烈，已是有目共睹，无烦多说。大局的扰攘不宁，此殆为有力原因；他们固自不同乎无知无识的人比较好对付的。

乡村向来是在文化上、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全都被都市占了上风的。有知识的人均奔向都市，乡村乃愈加铜蔽愚昧；亦愈加没人理会，没人注意；因之，其所受政治上的压榨与经济上的剥削亦愈甚。智力与金钱与权势三者原是相连环的：愈愚，愈弱，愈贫；愈贫，愈弱，愈愚。而此时都市人染接欧风，生活欲望愈提愈高，政治上名色愈出愈多，经济上手段愈来愈巧，其压榨剥削于乡村者愈厉。因既无工商业为对外生财之道，都市人生活的奢费自唯仰给于乡村，直接间接无非要农民血汗。乡村凋敝，都市亦无所托；军政学界的生存竞争愈烈，大局扰攘益无底止。因果相寻，都市上一天一天知识分子充斥拥挤，乡村中愈感贫枯；过剩的过剩，贫乏的贫乏，两趋极端；其势愈亟，其象愈险，而中国问题亦以愈陷于无法解决！

其实何必这样自走死路呢？不单为民族着想，这样是走死路；即为知识分子个人计，这亦是愈走愈窄，终于不幸的。大家尽想吃一碗现成饭，而且要吃便宜饭；安得有那许多现成而且便宜的饭可吃？——只有自家创造出饭来吃才行。尤其知识分子不要自家看得太贱，自承是个高等乞丐，只好混饭吃。在教育发达的国家，受过教育的人或者是不希罕的；在中国社会则云何不足珍贵？无论如何要算一社会中有力量的分子；民族自救的大任，除了我们更将靠谁？须知民族的兴亡，系于乡村的破坏或建设；而其关键正在自家身上。只看脚步所向，一转移之间，局面可为之一变的。大家一齐回乡，骈力作广义的促兴农业工夫——乡村建设工夫，开出乡村建设的风气，造成乡村运动的潮流，则数十年来乡村破坏之一大方向，又何难扭转

过来？自身的出路，民族的出路，一一于此可得；不过总要自己去求罢了。

在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好象没得用处；然而挪到乡村来，其作用自现。即最无多少知识能力的，在乡间至少亦有两种伟大作用：

1. 乡村最大病症是愚蔽，从他的一知半解，总可替乡下人开一点知识，最低程度亦能教乡下人认识几个字。

2. 乡村最大缺憾是受到祸害没人理会，自家亦不能呼唤人注意；而他则容易感觉问题，不似乡间人疲钝忍默，亦有呼喊的工具——即文字。

第一种作用，好比为乡村扩增了耳目；第二种作用，好比为乡村添了喉舌。如果不是回乡来作土豪劣绅，图占村间人的便宜，则我想此两种作用是一定可以见出的。尤其是回乡的人多了，此作用必自然发生无疑。果真化除得几分乡村人的愚蔽，果真乡村人受到祸害能呼喊出来，中国民族前途便已有了希望；乡村建设便算成功了一半。其作用还不伟大么？

若是较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其在乡间将见出第三种更进一步的作用，那便是替乡间谋划一切建设事宜，好比为乡村添了脑筋一样。

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虽分三面，实际不出乡村生活的一回事；故建设从何方入手，均可达于其他两面。例如从政治方面入手，先组成乡村自治体；由此自治体去办教育，去谋经济上一切改进，亦未尝不很顺的。或从教育入手，由教育去促成政治组织，去指导农业改良等经济一面的事，亦可以行。



但照天然的顺序，则经济为先；必经济上进展一步，而后才有政治改进教育改进的需要，亦才有作政治改进教育改进的可能。如其不然，需要不到，可能性不够，终是生强的作法。我们从事乡村建设，原是作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夫，固不能待其天然自进；然于此中相因相待之理不知留意，建设必将无功。

所谓乡村经济的建设，便是前所说之促兴农业。此处所说农业并概括有林业、蚕业、茶业、畜牧、养鱼、养蜂、各项农产制造等，——一切乡村间生产事业皆在内。所谓促兴农业又包括两面的事：一是谋其技术的改进；一是谋其经济的改进。技术的改进，是求生产的品质与量数有进益，诸如改良种子，防病除虫，改良农具，改良土壤，改良农产制造等事皆是。经济的改进，是求生产费之低省与生产值之优厚，一切为农家合算着可以省钱或合算着多赚钱的办法皆是；其主要者即为各项“合作”。如信用合作、产业合作等。这两面的改进自有相连相需之势，即技术上的改进，每有需合作才能举办者；而合作了，亦会自求其技术的改进。二者交济，农业之发达是很快的。农业果然兴起，工业相因而俱来。或应于消费的需求，径直由消费合作社举办；或为农业原料之制造，由产业合作社而举办；其矿冶等业则由地方自治体以经营之。由此而来的工业，自无近代工业所酿的危害。在适宜情形之下，农民并可兼作工人；近代工人生活机械之苦于此可免，那是文化上更有意义的事。

说到政治一面，大家都常听到“要赶快完成地方自治”——包涵乡村自治——一句话；其实这是未假思索之言。政治都是以经济为背景的。照原来中国乡村的旧经济状态，本不会有“欧化的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欧洲政治里面的一回事，故冠以欧化字样；普通所说，类多指此。照现在中国一天

一天枯落的乡村，更没法子有这事实实现。非待中国社会经济有进展，是不会完成“自治”的；然而中国经济问题又不会走上欧洲那条路，中国终不会有那种“地方自治”是很明白的。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天然只有一条路如上所说者，因此中国亦将自有其一种政治（包涵地方自治）。中国从合作这条路去走，是以“人”为本的，不同乎资本主义之以“钱”为本。又从乡村而建设起来，层层向上建筑，向大扩张，虽然合作社的联合中枢机关在都市，而其重心则普遍存于各乡村。由是，其政治的重心亦将自普在乡村，普在人人。象欧洲那样“钱”膨大起来驱使人，而人转渺小；又由都市操纵国权，乡村轻末不足齿数，上重而下轻者这里都不会有。可以说欧洲国家政权好象偏起而耸立的；此则是平铺安放的。尤其是个人本位自由竞争的经济，其经济属私事，政治乃为公事，二者分离。此则合作经营，即私即公；经济与政治固可以不离为二。孙先生遗教曾说，地方自治体不单为一政治组织，抑并为一经济组织，指示甚明。大概事实上，亦非借经济一面之合作引入政治一面之自治不可。不然，则虽将区村间邻按照法令编制起来，自治公所的招牌悬出来，至多不过奉行上面命令办些行政事务而已；不能举自治之实。

眼前若成立自治组织，宜注意担任自治公职者之人选，取谦谨平实一流，使其消极地少些流弊。其积极的功用，则要以能和睦乡党尽诱导教育之劳，使于自治生了解生兴趣者为最上。

乡村建设之教育一面，眼前可做之事甚多；而要以民众教育为先，小学教育犹在其次。民众教育随在可施，要以提高一般民众之知能为主旨。经济一面、政治一面之得有些微进行，统赖于此。内地乡民之愚暗，外间多不深悉，一为揭看，便将兴

叹无穷。倘于此多数民众不能有所开启振拔，则凡百俱不相干，什么都说不上。丹麦之兴，盖全以其农民教育为推动力；其事有可仿行者，但非下乡之知识分子倾注于农业改良研究，为其先导不可。

乡间礼俗的兴革，关系乡村建设问题者甚大。不好的习俗不去，固然障碍建设；尤其是好的习俗不立，无以扶赞建设的进行。所谓合作，所谓自治，都与从前疏离散漫的社会不同。人与人之间关系日密，接触日多，所以行之者必有其道。此道非法律而是礼俗。法律只可行于西洋，行于都市；若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乡党之间是不行的。何况有法律，亦要有礼俗才行；即法律之行，亦莫不有资于习俗。古时如吕氏乡约等，于此是一种参考；第如何因革损益，大不易言。

以上就乡村建设三面，略陈其义；其具体事项，若者先办，若者后办，如何办法，则各处情势不同，要在谋划的人善为揆度，不能一概而论。一则要看当地是什么情形，一则要看自己是什么力量。乡村建设的事，什么人皆可作，政府作，社会团体作，私人居乡亦可作。所以力量是不一样的。力量不一样，自然作法不一样。地方情形，又有地理的不同和人事的不同。就地理说，不但南北异宜，即一省之中，一县之中，正复不能一样。要因其土宜为之兴利，因其所患苦为之除害。例如苦旱的地方，自然要兴水利；——怎样兴法又不一样。产棉的地方，自然改良棉种；或棉种已有办法，而须指导其为棉花贩卖合作，亦不一定。他如山地可以造林，交通不便者急须修路，等等不一。人事不同者，如其社会经济情形不同，政治情形不同，教育情形不同，或风俗人情不同等。万般不齐，随宜施设，说之不尽。但有三桩事可以提出来说的：

一则地方不靖者，莫先于举办乡村自卫。孙先生遗教，原有警卫完成再及自治之说。最近国民政府为肃清匪祸安辑地方计，亦极力督促地方保卫团之成立。诚以秩序未安，人心不定，一切建设无从谈起。中央及地方政府法令所示，仅属一种大概办法；认真去作，仍须当其事者悉心讲求。最要众志成城，先安内部；先清内部，则根本已立。无论平常时或有匪患时，都应该作此工夫。

一则地方有红枪会或其他帮会组织者，亟宜作一种化导工夫，务使其尽相当之用而不为害。乡民愚昧而有组织，且为武装组织，其危险性实大。第一，要化导他向开明进步的方向去；不然，必将为乡村改进的绝大障碍。第二，要慎防他势力扩大，为人利用，酿出祸乱。这是一件最不易对付的事；然只许用软工夫，不可以强硬手段摧毁之，——这是违背乡村建设之理的。

一则鸦片毒品发现流行的地方，亟宜公议查戒杜绝之方。毒品流行，为祸最烈；然其始必自村中有不务正业之游民，又每与娼赌等事相缘，实为村风败坏的问题，非单独的一件事。唯靠乡中老成端正之士，团结一致，共负起挽救整顿之责，建树良好村风，别无他法。此虽为法律所厉禁，却终非外面官府力量所能及的。

在今日纷纭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岂胜枚举，方法何可预定。只要认清题目，握定纲领，事情到手，自有办法；——即不然，办法亦无难讲求。我们总括上文大意，以为我们的题目和纲领，即此作结：

题目便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其纲领则在如何使

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乡村是个小单位社会，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皆天然要造端于此的；一切果从这里建造起来，便大致不差。恰好乡村经济建设要走“合作”的路，那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组织；由是而政治亦自形成为民主的。那么，所谓富与权操于人人，更于是确立。现在所急的，是如何遵着这原则以培起乡村经济力量，乡村政治力量；这培起乡村力量的工夫，谓之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起乡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资，而作用显现要在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资，促进组织者，都是我们要作的。然力量非可由外铄；乡村建设之事，虽政府可以作，社会团体可以作，必皆以本地人自作为归。

山东省政府为谋本省的乡村建设，经政务会议议决而有本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设立。所有一切办法，或秉承省政府命令所示，或由院拟订呈请省政府核准备案；其既经公表之文件，则有本院组织大纲，本院学则及课程。兹分项撮要，概叙如次。

本院所要作的事，是一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一面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本院内部组织，即准此而分为：

-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 二，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
- 三，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县区。

乡村建设研究部的命意，约有两层：一层是普泛地提倡这种研究，以为学术界开风气；一层是要具体地研究本省各地方的乡村建设方案。大概初创之时，以前层意思为多；渐渐才得作到后一层。——因为这不但要萃集各项专门人才，并且要有

几个机关协同着作才行的。此项研究生的招收，原是要受过高等教育者为合格；不过亦不愿拘定大学专门毕业的资格，致失奖励知识分子转向乡村去的本意，所以又有“同等学力”的规定。大抵以具有较高知识，对于乡村问题向曾留意者为合适。其研究程序，先作一种基础研究；——那便是乡村建设根本理论的研究。次则为专科研究；随着各人已往学识根柢的不同，和现在兴趣注意的不同，而自行认定一科或数科研究之。例如原来学农业的，就可以从事于农业改良研究；而现在有志于乡村教育的，就可以从事于乡村教育研究。各科的范围宽狭不同，细目亦得别为一科。但科目的认定，必取得研究部主任的审量许可；作业的进行，须听部主任及教师的指导。本部课程，除间有必要外，不取讲授方式；或个别谈话，或集众讨论；并于南北各大学聘有特约导师担任指导，以函授行之。修业期限，规定二年；但于修业期间，得有研究结果，提出论文经部主任及导师评定合格者，亦得请由院长核准予以提前结业。

此项研究部学生，差不多都要到觅求职业的时期，颇难再由家中供给费用，所以本院定章，除供给膳宿外，并给予津贴每月十元。其学有专长者，在适宜情形下，并得在院中兼职兼课（训练部功课）；要无非掖进有志，扶助苦学之意。将来学成结业，自本院希望言之，实以留院服务为期。因本院训练部第二期必须扩充办理，正多需才之处。以是本院学则，于此有“酌留本院服务”及“呈请省政府录用”之文。

本院第一届招生，研究部限招三十名。并以一切费用均出公家供给之故，其省籍即限于山东本省。但为提倡这种风气起见，外省自备资斧请求附学者，亦得酌量容纳；其名额不得逾本院学生十分之一。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特定之试验县区，是从“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那一面工作而来的两个机关。我们对于实施乡村建设的进行，计划着第一步要预备到乡村服务的人才。这不须说，当然是要就地取材的，其条件略如下开为合适：

一，世代居乡，至今其本人犹住家在乡村的。——这是为他不失乡村生活习惯，尤其要紧的，为是他熟谙乡村情形。

二，曾受过相当的教育（略如初中），具有普通知识的。——非有知识和运用文字的能力，不能为公众作事。

三，年纪在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内的。——这是为年力正富可以有为，而又不要太年轻。

大概果能具此三条件的人多是在乡村教过学或曾任乡村公职者；亦可说是于乡村服务有些经验的。因其受过相当教育年达二三十岁，而没有升学或作事于外，则其末后居乡的几年总不免要作点事的；其升学或作事在外而新回乡的，成数必然很少。前项闷守乡村的，诚未必是俊才；然在这知识分子回乡尚未成风气的今日，舍此更无可求。后一项新回乡的，或有英发之士；而多年在外，情形隔膜，亦是缺欠。无论哪项人，非经一度训练之后，总还不能担任乡村建设的工作。此所以有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之设。所要训练于他的，约计有三：

一，实际服务之精神陶炼。——要打动他的心肝，鼓舞他的志趣，锻炼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尤其要紧的，是教以谦抑宽和处己待人之道。

二，为认识了解各种实际问题之知识上的开益。——非有一番开益其知识的工夫，则于各种实际问题恐尚不易认识了解。

三、为应付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之技能上的指授。——例如办公事的应用文，办合作的应用簿记，办自卫的军事训练等。

必须受过了这三项训练，而后乡村服务人才的条件才得完具。因此，本院于训练部的课程，有五大部之安排：

甲、党义之研究；概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其他等目。

乙、乡村服务人才之精神陶炼。

丙、村民自卫之常识及技能之训练；概括自卫问题研究、军事训练、拳术，及其他等目。

丁、乡村经济方面之问题研究；概括经济学大意、农村经济、信用生产消费各项合作、簿记、社会调查及统计、农业常识及技术、农产制造、水利、造林，及其他等目。

戊、乡村政治方面之问题研究；概括政治学大意、现行法令、公文程式、乡村自治组织、乡村教育、户籍土地各登记、公安、卫生、筑路、风俗改良，及其他等目。

我们为实行“就地取材”，所以对于招生特别仔细；为训练得有实功，所以对于课程不得不认真。所谓招生特别仔细的，就是训练部学生的招收，由招考委员会分组出发到各县，召集当地人士，宣布乡村建设的意义和本院进行的办法，唤起地方上人的同情愿来参加，而后分区就近考试。——其如何分区分届招生办法详后。所谓课程认真的，则有部班主任制和一年到头不放假的办法。

本院训练部学生以四十名为一班，班置班主任及助教各一人。班主任对他一班的学生之身心各方面活动，皆负有指导照管之责；凡学生精神之陶炼，学识之培益，身体之保育锻炼等，



固自有各样的课程作业，但必以此班主任的指导照管作为训练的中心。所以班主任有“应与学生同起居共饮食”，“以时常聚处为原则”的规定。学生每天都要自己写日记；这日记亦是由班主任为之阅改。各班学生成立其自治团，凡经本院划归该部自行办理之教务、庶务、卫生清洁等事，亦都是在班主任指导之下，进行自治。各班主任之上，更由部主任总其成。——是所谓部班主任制。

训练部课程期以一年结业；这一年到头是不放假的。不但不放寒暑假，并星期例假及一切纪念节假都没有。一则是因为功课多，而修业期短，不得不加紧。一则是农家生活除农暇外，没有哪天放假停工之说；本院期在养成乡村人才，于此不合农业社会的习惯，应予矫正。在此一年之中，每日廿四小时生活，依昼作夜息分为二大段，排定公共生活时序表，全院遵守。例如自某时起床、盥漱、朝会、健身拳术、早餐、作业、午餐、作业、晚餐、洒扫、作业、写日记、夜息为止；大家同作同息。计午前、午后、晚间三个作业段共八小时。这虽似太紧张，行起来却亦很自然。因所谓作业包括种种活动，不定是讲课读书。尤其是星期日多为出院外的活动，如野外操练、巡回讲演、乡村调查等。

仔细取材之后，尤恐学生中有难于造就的，所以有随时甄别的办法。本院学则规定：“学生在修业期间，本院得随时就其资性体质思想行为，加以甄别而去留之。”认真训练之后，临近结业，犹恐其有出外作事难副所期者，因而本院学则有规定云：“本院期在培养实地服务人才，凡学生结业必须具有解决乡村各种问题之知识能力及勤劳奋勉之精神；其有修业期满而不足以副此者，本院得缓予结业。”

以上都是说本院如何预备乡村建设人才的办法。但这招生之事，山东省一百零七县实不能同时举办，此其困难有二：

一，本省各地方情形不同——鲁西不同鲁东，鲁南不同鲁北——要同时了解它，研究它，替它想办法，势所来不及；而这是在训练学生时，多少要指点给它的。尤其是在指导实施的时候，一定要帮它解决地方上的问题，普泛地照顾。

二，训练后回本地作事者，每县人数若过于单少，则事情不易进行；假定每县十人左右，同受训练，便达一千余人。本院人力、财力一时均有不及。

因此，本院计划划分区域，分期次第举办。其区域即以本省旧日行政区之四道为准。现在第一届招生，即就第一区旧济南道属廿七县先行办理。将来第二届或就第二区旧济宁道属办理；或力量宽裕，第二、三区合并举办，亦不一定。

第一届之廿七县，除指定之试验县特别招收四十人外，每县招取人数规定八人至十人；其总数约为三百人以内。招考委员会拟分五组出发，分赴各县宣传后，就济南、邹平、蒲台、惠民、泰安五地点举行考试。其报名手续，考试项目等，另详招生简章。

在储备人才的时候，即应就一地方试行乡村建设，这有两层用意：

一，是训练学生不徒在口耳之间，更有实地练习试做之资。

二，是以此为各县乡村建设的示范，以此为本省乡村建设的起点。

故此特由本院请省政府指定一县为本院之试验县区。此试验县区的条件，要以地点比较适中，县份不过大，不甚苦而亦

非富庶，不太冲繁而交通又非甚不便者为合适。现已奉省政府指定，在离胶济路周村站三十余里之邹平县。照本院组织大纲规定，本院院址应即设置于此，并以该县县长兼本院试验县区主任。县长人选亦经发表；将来尚须成立一委员会，以为设计进行之机关。

又在训练上为学生实地练习之资，在乡村建设上为各地示范者，尚有本院农场。农场场址亦随本院置于试验县区内。举办之初，规模有限，必须应于实际需要次第扩充之。例如棉业试验、牧畜试验、蚕桑试验、或者其他，审其为地方所切需，陆续添办。或商请省政府农矿厅举办，协同进行。我们总希望有个可以为试验县区及第一区其他廿六县，农业技术改良上之一研究指导机关的农场。

然我们对于建设进行，颇主张先侧重经济上种种合作。其确实计划，此时尚不能言。我们将先举行两个调查工作：一，试验县区的农村经济调查；二，第一区其他廿六县的农村经济调查。前一调查工作，有训练部的本县学生四十人为助，当易进行。后一调查工作，拟向省政府请款举办。必此两调查办完，如何建设，方有计划好商量。

至若建设的实施，在第一届学生训练期间，所可着手者只限于试验县区。在第一届学生结业回乡服务时，其他廿六县始能着手。训练部各县学生回乡如何服务，与各县建设实施从何着手，殆为一个问题。本院于此，有两种策划：假使各该县政府秉承省政府命令，于此乡村建设之事从上面有所兴举（例如县农场、县农民银行、县自治筹备事宜，县办民众教育等类），自应照本院学则所规定，分派各地方或发交本县服务；其所着手之事，即因所兴举而定。假使上面机缘不好，或政府未暇兴

举，或徒有名目难期实益，则各该学生应各回乡里，在本院指导之下，自行办理一种“乡农学校”为宜。此种“乡农学校”的办法，随宜解决当地问题，俾信用渐孚，事业自举；其详须待另陈。

总之，事属创举，须一面试做，一面规划，有难于预定者；待第一届办过后，当可开出些道路来。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207—225页，

1932年9月，村治月刊社。

《村治》，1卷，11.12期合刊，1930年11月16日。

## 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

“地方自治”的一句话，在今日几于人人会说，人人爱说。当局者尤其亟亟从事，国民政府督促于上，各省政府赶办于下，即要“克期完成”。这实在是使我们听见了头痛，看见了害怕的。天下岂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囫囵吞的观念？天下又岂有这样咄嗟立办，如玩幻术的政治大业？

昨读本刊第十一二期乡村运动消息栏，广东中山县进行自治现况，政府当局所以谋地方自治的卤莽灭裂做法完全现露出来。中山县的筹办自治，是以其为孙总理的故乡，由国民政府任命好多位党国要人组织“中山训政实施委员会”来主持的；而这段“现况”又是承一位现办这件事的张汉儒先生所寄示。那么，我们是正好即此以为征验的了。从张君寄示文中，我们知道中山县当局的做法便是：

- 第一，订定公布种种法令章则，和自治施行政程序计划；
- 第二，依法将县区乡镇等组织编制起来，机关成立起来；
- 第三，竭力筹经费；
- 第四，……。

据说困难就是经济问题；竭力以筹经费而犹不可得，自治遂无下文。噫！可惜这经费未得宽裕地筹到；不然，这“自治”想来一定是可以完成的了！

我们不解，这便是筹办自治？自治便是这般筹办能以实现

的？在广东似乎不是没有明白人，何以竟然如此？记得广东民政厅长许崇清先生，某次对各县长训示其自治施行的意见，曾说过〔1〕：

“照中央规定，应将各县自治制度，依限成立；但县自治制度成立，未必即县自治真正成立。县自治制度，可以用法规命令而施行；但一县之真正自治，绝不能因法规命令而产生。如欲县自治真正成立，必须一县人民之社会公共精神，社会连带意识觉醒起来，以运用维持自治之制度。但此社会公共精神及连带意识之觉醒，须在经济文化之开发达到相当阶段，始能成功。否则文化未开发到相当阶段，则人民于社会公共事业不易感觉兴趣；社会公共利益，亦不易见到。经济未开发到相当阶段，则社会公共利害关系不能统一，对于公共问题之解决，自无一致之意思；是则自治制度虽告成立，亦只徒具形式，且难免为少数土劣所操纵，反致有害而无益。”

我们要知道一地方社会之自治，是由散漫而入于组织；此自治组织原是营实际生活之一好方法。果真需要到来，人自会求之，无待强迫。在中国初未有此，而我们想采用这好方法，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无非求社会加速长进；但绝不能不顾他（社会）自然形势之如何，而尽着我想要怎样就怎样，强迫为之。所谓社会之自然形势，即许君经济文化达于相当阶段之说也。更简捷地说，总要他自己实际上有这种需要与可能才行。既无需要又无可能，强迫为之，不独白费力气，而且弊害百出。所以要举办地方自治，先谋其地方经济与文化之推进，形成一适宜

〔1〕见《村治》1卷1期《各地乡村运动消息》第9页。

之形势，使有一点自然而非强迫的把握在我，而后可为。如此乃可说筹备；如此乃可说训政。不然，则卤莽灭裂，笑话而已。以数千年经济文化顿滞不进之中国社会，又当七八十年外人经济侵略，二十年国内秩序骚乱之余，产业凋残，地方疲敝，而基本之农业，下层之乡村为尤甚；于此际也，国民政府果欲完成地方自治，则如何挽回我固有经济日就颓崩之势，而开动其生发进步之机，使地方向荣、乡村兴起，实为最当先解决之绝大问题。乃当局者似初不照顾到此，只是颁布自治法令，督促实现。这好比对着干枯就萎的草木，要他开花一样，何其愚昧荒谬。在当局似亦明知办不到，而要指限克期完成；明知没有实际，而必要摆这面子；如何虐苦人民、贻害地方，在所不计，试看中山县筹办自治的结果：

县自治筹备处成立之后，即行委任各区自治筹备处主任，设立各区区公所筹备处，计共九区。复由各区指导各乡镇，设立乡事务委员会；全县计共成立者约一百余处。（中略）有些区筹备处主任借着经费支绌的理由，呈准县政府抽收什么公路汽车附加捐，什么更谷费，什么壕塘附加费，海埠、鸭埠特别捐……等等。苛细夹杂，名目繁多，徒使人民未得自治之益，而先蒙自治之害。

这种横抽滥捐已骇人听闻，更妙的是钱筹到以后的结果：

虽然有些区筹备处得了这项特别收入，但除了应支几个职员的薪俸和开销一些办公费，此外均未能切切实实做事。致令自治施行程序所规定的半年完成筹备的自治方案，只成了“官样文章”。计由民国十八年十月成立县自治筹备处开始地方自治工作，至十九年三月止，整整半年，检阅过去，都未有好的成绩表现。迄至十九年三月黄居素氏接

任中山县长之后，即行裁撤县自治筹备处，所有自治工作划归县政府第二科办理。

如果黄县长是明白的，正可以即此收帆转舵，不再往前作。那知他反而觉得筹备工作已办半年之久，“自应正式成立各区区公所，以符名实”。并且积极扩张，又新委任许多乡镇公所筹备员，“计连前共已成立乡镇公所筹备处二百九十五处”。其结果自然又得竭立筹经费；而筹经费仍不外有圈里打麻烦。

自治经费……除了各区已有捐可抽，或由各乡补助外，依样感觉经费无着。黄县长见到这种情形，于是在中山训政实施委员会提议整理县区乡镇族公产；将所有县区乡镇族有之公产，分别成立管理委员会，实行整理，以便厘定自治经费。但在管理公产章程公布之后，平素把持侵占公产之豪绅，一面在叫苦，一面却在反对。所以有些区乡镇公所奉令前往接收公产，便惹起不少的纠纷。虽然经县政府严令移交，究竟亦免不了祠堂白蚁们（豪绅）联结反对，糊涂了事。因此除了现在一部经费解决外，尚有许多仍然感觉困难。

我不明白，凭什么就可以加捐抽税？凭什么就可以严令人家族中公产移交出来？借着自治二字，就可以横征暴敛无所不为么？自治的要义，就在尊重地方上人的意思，承认他们有此一种新权（自治权）。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地方上人的意思，蹂躏他们既有的权利；诟有这样筹备自治的道理么？诸公知道，农民的血汗几已剥取到最后，将不能自养活其身，将无以营其下一〔年〕度之生产么？你留给他一分，或者此一分用在生产上（用在肥料上，或种子上，农具上，或他自己吃了增加其体力），而多少有点出息。若剥取来，养些职员，把他消耗



了；则生产益减，农民益贫，自治之机益将断绝。诸公知道，自清季到民国历次举办新政，三十余年间无一次不是欺骗农民，农民听到新法新政就厌嫌头痛么？今你一上手又是使他厌嫌头痛，他从此认所谓自治又是来骗局，退缩逃避之不遑，则向前参加之机益以绝，自治之事实其安从而得？这是筹备自治呢？这是断送自治呢？

听闻湖南的地方自治，就是这样由筹备而断送的。湖南自民国十七年五月成立省自治筹备处，自治训练所，各县自治筹备处，积极从事筹备，用去省款七十余万，县款二十余万，结果不到两年光景，通统烟消火灭。其所以然，就为“……需费极钜，在目前牵萝补屋之省库，既有不可为继之势，在灾劫余生之各县，更深不胜负担之感；重以少数县分自治人员，操之过激，筹款苛细，故外间不少流言，多有呈省政府省党部请停止各县自治进行者”。〔1〕。请问自此以后，在湖南谁还敢提自治，不敢提呢？

直捷了当地说罢：现在要举办地方自治，就是莫大的苛政；除非你有办法，挽回固有经济日就颓崩之势，而开动其生发进步之机，形成一适宜形势，导达于自治无待强迫而后可为。

举办地方自治，岂独增加农民负担，更其凶猛可怕者是助成土豪劣绅的权威。在张汉儒先生所写示的中山县筹办自治之困难中，虽未提到土豪劣绅一层，然而实在隐伏着有了。如他说：

因为肃清烟赌，各区区公所与各区公安局，就发生许多权限上的争执。原来办理肃清烟赌，在名目上是冠冕堂

〔1〕 详见《村治》1卷1期乡村运动消息栏。

皇不过，但内里却有利可图。破获烟赌案件，最少便得一百半百元的罚款。

在中国，所谓保障人权的法律始终没树立起来；而最足诱致有权力者之横恣，使法律难得树立的，就是烟赌两项事。如盗匪或近年所谓反动分子，固然都要以军法从事，受不到普通法律的保护；然其事究不甚平常。唯烟赌两项随在多有，事甚寻常，而亦没法律可说；是禁是纵，是打是罚，一任当地驻军或警察，官府或民团、以意为之，俨成他们的大好收入。此种情形不变，民主政治难言，地方自治难言。因为从此等处可以看出多数人愚昧懦弱之可欺，而少数人威福自恣之易行，在国家即无法实现民治，在地方即无法不出土豪劣绅。所谓土豪劣绅，即指乡间一般人之愚懦受欺，一二人之威福自恣的事实；却非某个人的品行问题。破获烟赌而罚款，军警机关行之，其祸犹小；自治机关行之，为害实大。禁烟禁赌，诚然最宜由地方自治来作这功夫；但假使自治区公所亦能破获烟赌，随意罚款，那便是形成土豪劣绅的绝好机缘了。

乡民愚昧懦弱，自是社会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非经济进展，文化增高，无法免除土豪劣绅的事实。但若本着数千年无为而治的精神，让他们度其散漫和平的生活，却亦不见得有几多土豪劣绅。所怕的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那就没有土豪劣绅的地方，亦要造出土豪劣绅来。我们试想想看：

第一，本自容易受欺压的农民；

第二，将他们划归一个区域，而安上一个与地方官府相衔接的机关；

第三，此机关时时向他们发号施令，督迫他们如此如彼；

第四，此机关可以强制的向他们加捐要钱；

第五，此机关可以检举他们某项罪名（例如烟赌）而处罚他们；

第六，此机关或且拥有武力——保卫团。

这简直是替土豪劣绅造机会，让他们正式取得法律上地位，老百姓更没法说话罢了。不独给他以法律上地位而已；并给他开出许多可假借的名色题目来，又且资他以实力。最近中央政府因为剿除共匪，盛倡要以人民自卫组织为根本方法；谓必人民如是起来协助政府，而后匪共可清〔1〕。这自然是不错的。我们希望树立乡村自卫组织之念，比政府还切。然而这岂是一片期望心就成功的么？第一，这项军械和常备团供给的负担，乡民是不是能负担的了？第二，“人民自卫”，“民众的武力”，自然好听不过；但事实上怎能逃于土豪劣绅之手？我们试想想看：

第一，军械一定是出自地主有钱的人购置的多；

第二，养这些常备团兵的费用，一定是地主有钱的人出的多；

第三，军事重在有统制有指挥，所谓“平民共和”的精神是不适用的；

第四，有果断专制性的人物乃适于为军事首领，而事实上的陶铸，更养成这种习惯势派。

〔1〕二十年三月国民政府曾限令湘鄂赣闽皖豫浙等省政府，于本年八月以前将保卫团一律组织完成。令文有云：“自来弭匪之法，治标则用兵力，治本则用民团。良以匪徒出没无常，往往兵来则散，兵去复聚，徒令兵力疲困，肅清之效，急切难收。故以兵卫民，不如使民自卫。近年来，各省匪共猖獗，民不聊生，现政府正派大军包围，必可剿灭。但欲图根本铲除，非组织民团，兴办保甲，使良民有恃无恐，奸宄无所逃遁，不为功”。

由是地主绅士一二人的尊严威猛遂以建立；怎能保他不滥用权威呢？多数乡民是素来愚懦的；怎能免于受欺压，被鱼肉呢？我们并不是说作团董的没有好人。这是事实要如此。何况今日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呢？我们试想想看：

第一，令人欲望比前高许多，而生活的艰难及风气的丕变，更使人歆慕金钱势力；

第二，频年的变乱，使人变得险诈狠毒，残忍胆大；

第三，社会旧秩序（法律制度习惯教条等）已失，而新秩序未立；于此际也，多数谨愿者莫知所凭循，最易受欺，而少数奸猾乃大得乘机取巧纵肆横行之便。

在这种社会形势之下，有好人能有几个呢？其生活稍高，或沾染嗜好者，在乡间正当生业实不足以济其欲，则唯有巧取豪夺，借损人以利己，时势所演，理无可怪。再加上“地方自治”，“人民自卫”，适以完成其为人民之蝥贼，一方之小霸王而已！然而当局之提倡地方自治自卫者，似绝未留意到此。空言是知虑

第二，平日乡公所区公所的行政，亦是要经过会议的。〔1〕

第三，平日与乡公所区公所对立而监察之者，又有乡监察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2〕

第四，在县，在省，一层一层尚有上级机关之监督。〔3〕

第五，最后还可以由乡民大会、区民大会行使人民的直接罢免权。〔4〕

如是一重一重都所以开发多数势力，防制公家职权的滥用，裁抑个人威权的恣行，难道还不足杜绝土豪劣绅的产生么？

这话自表面上看，未尝不象有理；可惜事实不是这回事。宣传来的新观念，移去不了多年的社会旧习；何况如二十年经验所语，这新观念一次一次总归幻灭，谁复敢信得及呢？至若求效于组织制度之间，对于声威所在实力所在的豪绅，欲以白纸写黑字，振起数千年农民散漫积弱之势而胜之，更属妄想。然而在这互相牵掣抵制之下，一个人独霸之局诚亦不易成功；演为地方上几个人分结徒党明争暗斗之局，大概是一定的。因为一地方不见得就只一个人有钱，有势，有资望，有胆智；长于此，继于彼，高矮不齐而各不相下的，总有几个人。此几个人始亦未必彼此作对。然而从这制度之所安排布置，其不引之促

〔1〕乡公所有乡务会议；区公所有区务会议；照乡镇自治施行法第三十条，区自治施行法第廿六七条所规定，凡区乡办的事廿一款目，其十九款目都须会议取决而后行；此会议并应通知监察委员列席。

〔2〕见县组织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区自治施行法第五十四六各条，乡镇自治施行法第五十一二三各条所规定。其最严重的，是监察委员会纠举乡长或区长违法失职情事，得自行召集乡民大会或区民大会。

〔3〕详见县组织法，县组织施行法，区自治施行法，乡镇自治施行法所规定。其条文不一一指数。

〔4〕见县组织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三条，又乡镇坊自治职员选举及罢免法所规定。

之于结党分派、构怨成仇又何待？除此外实更没有什么结果可得！在立法者所自诩为防杜土豪劣绅的妙方，不过换一换局面；而此种捣乱打架之局，比之个人独霸之局，究竟那个好些，谁能说呢？

在时下人浅薄稚劣的头脑，方于西洋制度粗有所闻者，当然亦只能有这一套，想不出别的来。然在这中国，却从没见过这样安排着要人打架的制度；——固然中国亦不大经见多数政治。这套制度是怎样与中国人从来社会生活不合，尤其拿到乡间去将发生怎样结果，在立法者似绝没有设身处地踏实想一想。——本来这亦不是在内政部衙门里写字台上所能沉想的。想亦白想。中国的政治制度（地方自治在内）是要各地方社会从事实上慢慢探求创造以成的，不是在写字台上斟酌条文，可以照图样制造的。这是事实问题；非亲身在地方上作事，委宛曲折的经验苦思，不能于此参赞一词。尤非有大智深心，莫能开出一条道来解决这问题，于已往西洋法制中国礼俗之外，为人类文化的创新。

多数势力的开发，多数政治的形成，是无疑的必要。但欲以这套制度为中国开发多数势力之方，形成多数政治之式，则是昧于中国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很象一句空话；这句空话，唯有事实经验才得充实他。在《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中，我虽曾剴切地指出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国的不适用，很多人不易相信；除非等待他撞在事实的礁石上，到底撞不出路之时。前文中已经说过的话，此处不便重叙；除请读者检阅前文外，我只说两句话，指明这绝大问题：

经济有进展，文化有进展，多数人的智力相差不远，是

多数势力所以开发的基本条件；这诚然在中国亦不异于西洋。但在西洋即此可以形成一种多数政治，而在中国则不能。在中国更需要一个条件，即必得一更高等的政治形式，发抒他的民族精神，乃能实现其一种多数政治——中国的多数政治，不是借着多数人智力相差不远，个人专擅无所施，就可以为积极地实现的。

要促成地方自治，而其办法不协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条件，是鹵莽灭裂；若不协于中国社会的精神条件，亦是鹵莽灭裂。

我们从土豪劣绅问题谈到民族精神，是因为一般人最容易以不协于民族精神的办法，来对付这问题；而这问题实唯从复兴民族精神或稍得对付。这问题既是当前无可闪躲者，故唯从这事实上可逼讨出民族精神的下落。我们绝不以民族精神笼统名词，要大家承受信服；我们只是警告大家，在可怕的土豪劣绅问题未有办法，莫言地方自治。

我们以上都是说，地方自治不能如玩幻术的咄嗟立办；以及要照当局法令计划立刻办成，便是莫大的苛政，祸害不堪言。自1911年来，因“民主共和”的好名，已是将国家闹得天翻地覆。然而地方上偏僻乡曲，兵匪不到之处，犹或可以安生过活；或兵去匪过之后，乡民亦可抽空过安生日子。若果如中央政令克期普遍地举办地方自治起来，则从此“地方自治的”好字样，必将闹得无一处得安生，无一时得安生，其为祸之周匝深刻又十倍于前也！呜呼！政府当局其曷一省思之乎！

政府当局之不假思索，而辄为不负责任之政令者，盖实由言者之不假思索，而辄为不负责任之言论。地方自治之言盈天下，而所谓地方自治者果何指而言，无人确切言之。地方自治，

一欧化政治之所有物也；中国人将遂效外国人之所为乎？抑犹不尔乎？在外国亦有多种形式；将何取何舍？若俱不取，将如何创造？何者乃为我所需要，何者乃为我所能行？言者囫囵吞过，一无别白。

或曰：地方自治不既有现行法令，为具体之指示乎？何诿无别白所指？此言似是。然我们眼前看见的，是日诵总理遗教的国民党政府；同时我们所耳闻，则孙先生遗教之《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与今之政令固大不侔。使其果有别白也，则何为如是？孙先生之言，固明明曰：“此所建议之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经济组织”。其具体的说话，则指出地方自治之执行机关，“首要在粮食管理局”；“其余‘衣’‘住’‘行’三种重要之生产制造机关，亦悉当归地方之支配，逐渐设局管理”，〔1〕“此外更有对于自治区域以外之运输交易，当由自治机关设专局以经营之”。〔2〕又有云：

一境之内，如人尽所长，为公家服一二月之义务。长于农事者为公家垦荒，则粮食足矣；长于织造者为公家织布，则衣服足矣；长于建筑者为公家造屋，则屋舍足矣。……自治区之人民，各有双手，只肯各尽其所长，则事具备矣。〔3〕

综其前后，虽没说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话；而其企图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化，意向所在昭然可睹。然而我们于现行地方自治法令中，试求其为一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者果何在？

〔1〕见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第二“立机关”一段。

〔2〕见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第六段结束。

〔3〕见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第六“设学校”一段。



我们并不要国民政府即据孙先生的说话，以为国家法令。孙先生所说，从其意向未尝不可有实行之道，事实上大概没有一句话可以照办的。我们何敢希望照他的话，订定法令？不过如法令所示和孙先生所说，太不是一样东西、殆青红皂白之异色；则中国国民党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遂无从知道。此实由言者一例包涵，不加别白，不独从客观地指说中国地方自治所可能成功是什么样，不能成功是什么样，没听说过；即主观地想要那样，不想要那样，亦没听见人分别指说过。只囫圇吞地当他是一件“善举”，一件“好事”，贸贸然求之。这一片好善心，未免太匆忙了些！

例如我们所标举的“乡治”或“村治”，并不是地方自治或乡村自治的简称，而是一个有特殊意义和整个建国计划的主张，不过要从乡村入手，又归本于乡村。<sup>〔1〕</sup>我们对于各方注意乡村问题，作乡村运动，办乡村事业的，一例欢迎奖进；这是持一较宽态度，从某种意义上引为同调。地方自治必及乡村，因而亦在所乐闻。但我们从没有称过地方自治为“乡治”或“村治”；本非同物，不可以混也。而张汉儒先生辄以国民政府在中山

〔1〕《村治》1卷1期各地乡村运动消息汇志弁言：一切努力于乡村改进事业，或解决农民问题的，都可宽泛浑括地称之为“乡村运动”，或“农民运动”；——类如乡村自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乡村自卫运动，农业改良运动，农民合作运动，农佃减租运动等皆是。我们的“乡治”或“村治”主张，则是有特殊意义和整个建国计划的一种乡村运动。近年来，中国乡村问题的重要，已得有识者的公认；因此向着这方面努力的，在各地方先后继起，不可计数。持一较宽态度说，这自都是我们的同调。

所谓“乡治”或“村治”之特殊意义，即要在近代都市文明之外，辟造一种乡村文明；其道则在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以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一文颇详此义。

县举办地方自治，目为村治运动。于其写示本刊之文中，屡屡混称不分。这在我们既不敢当，在国民政府亦不愿受罢！一般人这样混称地方自治为村治的颇不少，不止一张君。

其实大家喜欢谈地方自治乡村自治，谁还不欢迎呢？但敢请大家踏实了谈，于下列几个问题，必须先有个分晓：

所谓地方自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此必于欧化政治中通常所称之地方自治，得其大意。你所要的地方自治又是什么样的？此必确切指出其在政治上为如何，在经济上为如何。

你想的那样可能行么？此必切就中国眼前状况，一一指其难关，而确得其解决之道；勿自忽过，勿自瞞昧！

如果能这样，就可以谈；不能这样，就不必谈！

**6月30日邹平**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06页，

1932年9月，村治月刊社。

《村治》，2卷1、2、3期，1930年12月1日，

1931年6月18日、7月15日。

## 《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 一文编后记

马君原文稍嫌冗长，经我摘录如此。文中所述各情，去年夏间尝闻其面谈及之。于模仿西洋袭取他人之无当，与官府督迫外力横施之戕贼，感慨甚深。旧日社会之教育，其病在无教育可说；是消极有所不足。三十年来之新教育，则为个人生命上添病，为社会生活上添病；是积极的中毒。原以药饵而服食之；然药不对症，不毒而毒，一也。服食复不得其方，而强进之，不毒而毒，二也。人类社会的事，一切有生命的都是好的；一切缺乏自然活力的都要不得；若要悖乎生命之自然，则一切都是害命毒物，杀人利刃。旧教育无论如何缺憾不足，究为其社会自然演来者；没用处，亦多少有点用；即不然，亦绝无扞格刺谬之苦剧，为庸俗之所便安。唯此外来之教育，复以官力督行之，乃真无一点是处，害煞了人！

如马君所述其族伯型渊公之所为，实乡间极好之民众教育。其好处在不独能教人识字，更能训导乡人，解决问题；而最大好处尤在引发鼓舞乡人生活向上之兴趣。以我之一点生命，引发开动他人之生命，齐呈活气，天地间至可贵之事，殆无逾于此者矣。山西当局阎公之所谓“补习学校”，就其形式言，殆与此马公所为同一事也。然一经官府命令施行之，其机顿斩；后有欲进行者，亦杜塞了路，无复提倡者矣。其他事例，于此可

---

悟。内里源泉，外面形式，生途死路，可不分别？漱溟于编录后记。

《村治》，2卷2期，  
1931年6月18日。

## 在“七·九”誓师北伐 纪念会上的讲演

刚才主席同本院院长孙先生将北伐之经过及精神已讲得很详细透彻，我想说一点我所认识的北伐纪念意义。现在大家也许对北伐纪念有点失望，觉得前途暗淡，不过在我认识的还有值得纪念的地方，今为大家说一说：

1.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七·九”？我们中国自同西洋接触以后，觉得自家处处失败，处处受欺凌，两下比较，不免相形见拙，于是国内有心肝的仁人志士来领导中国人民作自救运动。这种自救运动，据我个人的观察，可分为前后两大期：前期为辛亥革命，后期即今天的誓师北伐。两次的自救运动，却酝酿了许久时间才开发出来，然两次的革命的意味，确不相同。后者确大大的进步于前者。何以见之？如前期革命的目标全以西洋近代国家为矫矢，唯西洋近代国家之马首是瞻。一到第二期，风头转变，不但不以西洋近代国家为可慕，而且以西洋近代国家亦不必法，不可法，不能法，要从新开辟新世界，创造新文明。这一转之念，有多么值得为我中华民族庆幸！这次的革命运动，实在含这个意思很清楚，而又很饱满，谓之为有大的进步诚不谬也。今天虽然有许多希望仍然觉得没有达到，然而这点意思希望大家不要忘掉——从新开辟新世界，创造新文明。

2. 两次革命的着眼处——在第一次革命单单着眼在政治

革命，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主要旨趣，虽然孙中山先生那时已提出民生主义，但为多数人所不注意，将民生主要认为民生政策，换句话说也就是忽略经济问题。到第二次确含有很浓厚的经济革命色彩。认识了经济问题之重要，革命才有开展，一、则非从经济问题上着眼，开不出一条中国的革命路子，二、则非从中国经济的观察找不出中国是什么样一个社会，就想不出一个好办法。二次革命（北伐誓师）才开出这一点见解眼光，否则革命终是很模糊，摸不着头脑的事。今天值得纪念的，也就是这种眼光见解风气。虽觉无所得，然已是有大大的进步，值得我们纪念的。我希望今天凡为“七·九”而开纪念会的同志们，要继续着这种眼光见解，更深深的来认识中国的社会，来为我民族找出路，想办法，才负得起中国革命的使命，才认识得“七·九”革命的真意义！

· 录自《乡村建设》旬刊创刊号，

1931年10月1日。

《乡村建设旬刊汇要》，93—94页。

## 敬答严敬斋先生

敬斋先生：

十八年春，在太原得奉教言，至今念之在心。漱数年来南北所遇谈乡村问题者，条理晓畅不乏其人；而求其恳切笃实具有深心，则无如先生者。是以不能忘也。本刊二卷三期先生惠示之《村治与乡治之研究》一文，绎读至再，尤切怀想。文中提示各点，均关系重要，与漱所怀抱殆多同符，徒以事繁才短，迄未及写出以就正于当世君子耳。兹分别约略奉复，其详更俟异日。——

（一）先生自谓近中意见，欲以“乡治”易“村治”；——不以村为单位，而扩其范围于一乡区。先生申言其故有五（详见原文），漱以为皆中肯綮。漱所倡于世者，本为“乡治”；徒以北方友人习用“村治”之名，沿之未改。所以称乡治者：一则中国古有是言；虽今古不必同实，而此有谋中国文化复兴之意义，固亦乐于称用古语。一则嫌村之范围狭小，而乡则广狭无定实，可随宜而划其区域。然尚无定见，以为必宜如何也。近年遇冯梯霞先生（锐），其所见乃确定以十数村乃至数十村从经济上所自然形成之区域范围。例如乡间交易，每十数村或数十村必有其一中心集镇；即从此中心联络其周环各村为一范围，一切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设施皆自此进行，以此为对象。冯先生著有册子，

专言此义，惜忘其标题。又去年美国谈农村改良之专家白德第博士来中国；考察乡村设计改良；其所贻言于吾人者，亦以为至少四五个村庄为一范围，就其比较适中之村庄设置机关为事业之进行。友人曾为漱述其言如是；又齐鲁大学之杂志上亦曾记其讲演词；惜皆语焉不详。又尝闻杨开道先生（专研农村社会学者）谈其意见，亦谓必三百户以上之村庄始有办法，而普通村庄多嫌过小。凡此诸说似皆可供参考；而问题之解决似犹待从事实上推勘试验也。

（二）先生文中极言乡、村间礼之不可废，古礼（乡饮酒、乡射）之当予复；此最有眼光之言。然一般人或不识也。中国乡村生息濡染于中国文化以至于今日，流风亦已歇，流弊亦已深；谋乡村改进者自非有真情实意运乎其间，盖未易识得其问题之深曲，而有以见乎其出路之所从。出路何从？则“礼”是也。此掏出心肝之言，毫不杂以书生迂阔之见，文人矜奇之意者。漱前为《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曾指出中国社会之唯一问题在求其从散漫入于组织（分言之，则为政治的民治化，经济的社会化）。然此组织，所以行之者必有其道。在西洋近代则有其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法律，在中国未来则将靠其古先哲人所发明之“礼”。呜呼！此掏出心肝之言也；欲明其所以然而祛天下之惑，盖真未易易也。因先生之言，一吐露所怀，此固不能尽其辞。

（三）先生于乡村自卫，主张以习拳较射行之，法良意美，可阐发之点亦甚多。在匪患不迫急之区而倡自卫，非此不能入手；求自卫行政之有恒，更非此不可得。一般办自卫者之种种流弊，于此大多可免。



(四) 先生又言人与人之结合，必有实物维系，而着意于经济上之合作，此亦不易之言。然或不限于先生所云信用合作之一种也。

大抵先生所提示，一一皆出在乡间作事阅历甘苦之所得，非敷衍许多名色巧作文章者，或意气自雄好发议论者，所能窥见其一二。漱生长北平，未亲尝乡间生活，纵有实心，缺憾正多。愿先生时有以教之也。如先生自述在本村事业，所云“今三百人家中，有小学五，信用组合三十，兴学会，婚葬互助会、奖勤会各一，各有相当之基金，去年又议定提出相当款项，建设讲善堂与贫民住所”。其间进行经过必有许多史实及先生用思之曲折，倘不吝开示，为益于我者何可量耶！临楮不任企望！

梁漱溟卅年八月五日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363—365页，  
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

《村治》，2卷4期，1931年8月16日。

## 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

——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1〕

在1911年以民主政治为企图的革命以后，十多年不见所企图的 success，反而去原有希望愈远，于是革命运动乃从另一种途径而再起，是即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容共以来的国民革命，我所谓民族自救运动的后期运动也。所谓另一种途径，宽泛言之，则为感受着欧洲大战后的潮流而来；径直的说，即是采自俄国的布尔西维克。布尔西维克自是一个企图经济改造的党，然而他这种企图的成功，则将寄于他的“革命政治”，——这是他的新发明。中国人因亦想取径于此，排除国外压迫，国内障碍，建设理想的国家，近以自救，远以世界大同为期，虽然这后期运动，特别将前期运动所忽略的经济问题，看得十分着重，是从布尔西维克得来的眼光；而关系影响最巨者，却还在政治方面所摹取于他的方法手段。究竟俄国共产党从他的革命政治能完成他的企图否，我们未敢论断，但中国人现要抄他的方儿，是不是能抄得来，则我们不能不一研究者。

---

〔1〕此文分三次于《村治》上刊完，其中第二次刊出（1932年5月15日）部分于文末写有“十八年旧稿，廿一年修改”等字样。本文第四节注释中又写有“此文写于十八年秋冬间”。——编者

## 一 取法于共产党的必要

罗素说，俄国“党治”是共产党的新发明，为寡头政治开一特例。<sup>〔1〕</sup>这话诚然不错。从来政治上的途路，总不外两大分别：一是少数政治，或云寡头政治，一是多数政治，或云民主政治。虽然这两种政治，各有其几种不同的形式，然而在少数政治里面，像共产党这样，既不是世袭的贵族，又不是教皇巫师，又不是富豪财阀，而是一般“同志”，则为前所未有。此一般人以一种政治经济上的主义信仰为中心而结合，从其对现社会的观察，凭藉其一定的基础势力，采取其一定的步骤，努力实现其一定的理想，而这理想又是他本身（寡头政治）的取消否定，实为特殊新颖。此于改造社会，建设理想的国家似甚合用。所以罗素说，这对于解决东方的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贡献。<sup>〔2〕</sup>为中国设想，似更合用；我们试列举几点去看：

（一）凡为一种社会改造或革命，总出于一部分人或一个阶级之意，而非社会全体，所以革命天然是由少数人来作的。倘若这革命具有一大计划，或一复杂的改造方案，而又处境艰困危险，则此方案计划的执行，外面环境的应付，更不能不有赖此少数人，所以革命党一个期间的专政，亦事实上所不容己。在中国拥有这样无比的多数人口，而又民智不开，其改造事业，尤不能不以少数人任其功，这是很明白的。

〔1〕 见罗素著：《工业文明之将来》，有邓家彦和高佩琅两种译本。

〔2〕 见罗素著：《工业文明之将来》。

(二) 这少数的社会改造者，如何能有大力量来作这旋乾转坤的大事业呢？那必靠团结组织。少数人原敌不得多数人，然而结合组织起来，则大力量于是发生，足以宰制多数人而有余。所以“党”是必要的。在中国散漫愚暗的多数人口，不能自成势力，而只听军阀之鱼肉宰割，固势所必然，若非由一般觉悟分子起来团结组织，发生大力量，以上抗军阀而下导民众，更进一步，取而代之，作一个到达民治的过渡桥梁，则将何以换过这军阀的局面？又将如何一步实现了民治之局？所以舍觉悟分子集中组织一个革命党，于解决政治问题更无办法！

(三) 中国此刻问题，不单在政治，尤其紧要的，是经济问题；即民治之实现，亦必有待于经济条件的进步。但走怎样一条路以发达产业呢？即顺着走资本主义的路，要象中国现在的情势，任其自然，不加计划调度推进，犹且莫望成功，而况不肯走资本主义路？其必赖国家权力居上为之意识的选择、计划、调度、主持而进行焉，夫然后庶几可望，盖断然也。所以非有主义（非资本主义的主义）、有理论（从历史的解释社会问题，以说明其主义）、有计划办法（本于其理论，所为实现其主义的设计）的一个革命党秉政，运用国家权力以为之，必然是不行。如果对于中国要走非资本主义路不发生疑问，则对于布尔西维克式革命政治的采取，所以必要，亦即可认识了。

(四) 无论要解决政治问题，要解决经济问题，都要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才行，这在今日，几乎三尺童子皆能言之。为对外计，更不能不集中革命势力而统一之，俾成一浑全的大力量，以外抗强邻，解除种种欺压束

缚。所以一个总揽全局强有力的革命政府，自是十分必要的。

## 二 取法共产党的不可能

以上四点只是举荦荦大者，说明亦欠周详，然而其为必要，似甚明白了。但要此事成功，却亦非容易——

第一，必须有好方法团结成此一大力量；

第二，必须有好方法保证此一大力量用得正当，不致走入歧途。

于第一层无把握，则根本不会成事；于第二层无把握，则必致有反乎自己初意的结果。然此在布尔西维克都是虑之已早，计之甚熟，而布置的很好者。中国人有几分聪明的，看了这方法巧妙，便想我们正好照方抄袭。纵然事实条件不尽相符，亦不妨善师其意；好在布尔西维克之于马克思已只是师其意了。所谓十三年改组以来的国民党，无非走这一条路而已。照他们——自马克思以下——自己所标榜的，常有“历史的”“唯物的”……一套话语，大约原初是设想凭藉一种准机械的力量以谋社会改造之推进的。换句话说，他们原意是想走“因势利导”的路。从其势，必要有一大力量产生，而更利导使之强大；从其势，原必向一定方向以趋，而更利导使之明确。唯其是势必如此的，是准机械的，所以于第一层第二层自是都有把握。固有之形势愈强，方向愈明，则后加的人力愈小，亦愈有把握。然布尔西维克之所为，其视马克思之所设想，客观的形势固已较弱，方向较不明，几乎都赖主观人力为之调制，侥幸或有成功。至于国民党之在中国，其可取的形势直是没有，视布尔西维克更不逮

甚远，人力直无可施，把握二字更说不上。我们纵算是唯心论者，而他们自号唯物论的唯心倾向似乎比我们更大呢！

马克思以机械观的眼光来解说社会的蜕变改进，我想在欧洲或是适用的。人类比诸其他动物本来特别见出其能事先的考虑思量，而有所拣择趋避——这便是所谓意识。因此人类的历史似乎就应当不是机械的。“机械的”这句话是指意识之先，意识所不及，或意识无容施的。然我之有生本非意识的；有生以后，生命本身自然流行，亦几乎是意识无容施的（注意几乎二字）；意识为他用，被他所左右，——而不能左右他。单就一点一点上看，似乎意识作主，横览社会，纵观历史，而统算起来，意识之用正不出乎无意识，生活上基本的需要尤其当先，（基本需要的范围，是随着文化之进而俱进的），则看成是机械的，而从经济上握其枢机，推论其必然之势，亦何不可。唯物史观所以说来近理的，大概是这原故吧。然而这只为意识被役于盲目的生命，故只在这圈里转，而不得出耳。使一旦意识之向外用者，还而对于生命本身生其作用，则此圈遂破，不得而限之矣！例如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产生，便都是超出这唯物史观的圈外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但这意识的回向生命本身，就个人说，不到一定年龄，即生理心理的发达不到相当程度，是不可能的。同样地，就一民族社会说，基础条件不备，即其文化的发达不到相当程度亦是不行。所以东西各民族早期的文化大抵相去不远，唯物史观均易说明。到得后来，则除欧洲人尚复继续盲目地奔向前去外，东方有智慧的民族，则已转变了方向。其最大的见征，即在经济方面，生产方法不更进步，生产关系不更开展，现

出一种留滞盘桓的状态，千年之后，犹无以异乎千年之前，唯物史观家莫能究其故。而在唯物史观家所谓“上层建筑”的法律、政治及一切精神的生活过程，应视其经济基础为决定者，在东方殊不尽然；有许多处或宁说为从上层支配了下层，较近事实。至于欧洲人之为盲目的前奔。这亦有一大见征，即在其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破坏最大的欧洲大战所含经济上的机械必然性。总之，若没有以经济为主力而推动演出的欧洲近世史，亦不会有马克思演绎得唯物史观的理论出来；大体上这理论亦唯于欧洲社会史可以前后都适用。倘必以此为准据要普遍地适用于一切民族社会，恐其难通；尤其本此眼光以观测印度文化或中国文化已开发后的社会是不免笑话的。

更进一层说，仿佛物体自高处下落一样，离地面愈近，速度愈加，欧洲社会到近世晚世以来，其机械性亦愈深。这时节，意识不但无救于其陷入机械之势，而且正在为意识作用的发达，愈陷入无法自拔的机械网罟中。使得近代社会日益演成为机械的关系者，举其大要有三：一是经济，二是工业，三是科学。三者各为一有力之因，而尤在社会关系的一切经济化，经济的工业化，工业的科学化，互为连锁因缘以成此局，而归本则在科学。科学者，人类意识作用发达所结之花。今日一切成了科学化，即无不经意识化。于是就化出了这天罗地网！人类之有意识自生物学上看是一种解放，却不料乃从意识而作茧自缚也。此皆由意识居于被役用地位之故。然于今更不得自休，只有这样走下去，倒要他彻底才行；彻底自然得到解决，——欧洲问题的解决或者更无他途呢？

如马克思派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孕育了社会主义社会，于

其成熟之期，便蜕去资本主义的壳而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于此，举三点为论据。一是从其无秩序的生产而随着愈演愈剧的恐慌现象，以知其结果不使资本主义趋于没落不止，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自坏作用。二是从其生产行程日益为社会化的发展，生产机关名义上握在资本家手中，暗地里已造成是社会的，以知其结果恰是创造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未来社会的准备作用。三是从无产阶级数目日益增多，他们的组织和阶级意识的日益发达，阶级斗争之日益逼紧而无可转圜，以知资本主义不但一面自坏，一面为新的作准备，并且培成这敌面大力量，迨改造机会到来能动地去实行，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他坏作用。所以资本主义的覆亡，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所谓共产党便是领导着无产阶级来革命的特殊组织。因其在历史上，一步赶一步，能进不能退，而却又构成个两相对抗的形势摆在前面，相激相宕，势逼处此，偃同物理学上的装置一般，所以我们上边说他是“一种准机械的力量”。固有形势既达于准机械的地步，那不过加一番因势利导的工夫就好了。前举第一第二两层问题原自有客观的保证，再加一道工夫，当然把握更稳。马克思乃至列宁本领的高处，就在能认取这客观的形势，窥见其中的枢纽机械，善为加工利导而运用之。除此而外，更无其它巧妙。若以为手法高的人便可如玩幻术的一般，无中生有，那就错了。此义既明，则我不知以文化路数历史背景绝不不同的中国社会，要想抄袭共产党方法办党以造一大革命力量，果如何可能？藉使各种方法手段并用，此一大力量以胡乱凑并而出现了，但要保他不流于反动而葬送革命前途，又如何可能？亦许有人方在自诩独出心裁，不肯承认他是抄袭共产党，并且事实上好像十三年改组以迄于今，党



内派别杂出，异论繁兴，亦未可一以概之。然是抄袭不是抄袭，最好照北京人的一句话，“各人心里分好了”。流派虽多不同，自我看去无大两样。并非我笼统，实在从十三年改组开出这风气以来，百变不离其宗，所犯的病本都一样。我有归总一言断定的话：中国社会往高里说则已超过了机械性，往低里说则够不到什么机械程度，总之根本上是极不机械的；而你们诸公却觉得隔壁人家操弄机械的手法巧妙可爱而摹拟之，以为不易之方，这便所谓聚九州铁铸一大错了！

以下我们将分条逐一指点来看，此事是如何的不可能。

### 三 第一阶级基础难

第一，我们便要看像共产党所凭藉的那种准机械的力量，在中国社会有没有？照马克思所设想共产革命应以近代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为其革命的基础力量。——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即是无产阶级。因此中国的革命家亦常喜欢谈他们自家的阶级基础问题。本来要摹拟共产党的手法办党来革命，这自是根本的必要啊！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那里没有阶级基础的革命党？总要比拟着寻个根据才是。然而如近世的产业在中国又有几何？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其于全社会比例当然微乎其微，简直可以回答没有那种准机械力量可资凭藉。好在中国革命家原不过窃取其义，亦不须拘执如此。所以就有农工小资产阶级（或云小市民）同盟之说了。此说不独出于国民党左派，听闻“自十五年夏间以来，曾为大多数革命者所公认”。〔1〕三者之中，农工尤

〔1〕见《前进》11期，公孙愈之文中。

为主力所在，且有人主张构成党的成分最好有一定的比例：即农居百分之五十，工居百分之三十；小资产阶级应居百分之二十。<sup>〔1〕</sup>倘照此比例向社会吸收革命分子，则党的基础自植于一定阶级之上，代表这些群众的利益，得这些群众的拥护和推进，必然有力量，而且向一定方向以趋了。便是布尔西维克在俄国，亦以产业的发达有限，单靠产业工人力量不足，未尝不大大借重农民，虽然农民在共产革命里是不中程的。而况我们行的是国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原自有我们应有的群众，何必同。——这可谓摹拟隔壁人家操弄机械的手法之第一步。

原来所谓操弄机械的手法，其精义亦只一言可尽，就是要领会得兵家用兵之法，而以战阵攻取之意行之便好了。请看近年谈革命的各定期刊物的命名，总不外《前锋》《冲锋》《前进》《进攻》《猛进》《猛攻》《环攻》《夹攻》《突击》《战线》……真好比商店字号总不外“兴”“发”“隆”“盛”一样。象适才所云，便所谓要造成农工小资产阶级的“一条联合战线”，农工为基本队伍，小资产者为同盟是已。但比之用兵微不同处，敌我两方以及左右前后的形势，皆客观既定的事实而不可易，只能从知彼知己因其固然而善用之以取胜，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所以这革命的基本队伍是否可靠，大有审量的必要。尝闻顾孟余先生于《什么是阶级》研究的最为精审。他分析职业，阶级，身分三者不可相混，其有以贫富或所得多寡来划定阶级者大是笑话。中国社会，在他看来，大体是职业社会而不是阶级社会。阶级的特征在生产工具生产工作分属社会之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他部分人专任生产工作。造成剥削和被剥削

〔1〕 见陈公博著各文中。

的关系。如欧洲中世封建社会的阶级或其近世资本社会的阶级者是。似此阶级，中国殆不存在，其所有者只是职业，身分之殊。<sup>〔1〕</sup>大约阶级一词，如从广义解作层级重叠之意，则中国或亦有之，独若俨然彼此敌对两大壁垒的阶级，则中国实未曾有。然作革命基础的阶级，固非俨成敌对形势者是不中程，不合用的。农工小资产的一条战线，原不过强为划分的，未见得是可靠的革命队伍罢！若以为重叠的层级中，总有处于政治上或经济上较不利的地位者，联合起来，未始不可权当那真的阶级而利用之，此诚不失为革命家的一种好策略。但如孙中山先生之言，中国无非是大贫小贫，原没有几个大资本家，则中国人不在这农工小资本阶级之内的亦就很少了。——阶级基础广漠宽泛到如此，犹得为阶级基础吗？大约所以要分别基本队伍与同盟者，所以要党的成分比例上，小资产阶级必居最少，其用意胥在此，亦可谓具见匠心了。然在农工们究竟革命不革命，似尚待分析。曾见有人，从苦痛最深，即地位最为不利上推论农工阶级是最革命的。推算着说道：“中国有产业工人三百万，手工业工人一千多万，雇农一千七百万，佃农一万四千万以上，还有店员，当然亦是劳动者，他们经济地位与手工人相同，——这都是绝对革命的。”其实未免太乐观了。

第一让我们先来分析工人。中国所有近代产业工人甚少，靠他革命是靠不来的。而且他们生活地位比较其他粗笨工人和农民都还优越，在今日社会上未始不算幸运者。他但愿维持现状而生活得安全，不愿革命。广州机器工会向来右倾，反对共产党，而殊接近无政府主义者，即其一例。中国的工人大多是手

〔1〕见《前进》杂志，署名公孙愈之各文中。

工人。他们彼此虽亦有些组织，而实际上“同行是冤家”——这是人所共知的谚语。因为他们与工业社会内无产工人性质绝异，——他们恒自有其生产手段，实是一有产者。无产工人同行共利害，而此则同行即为商业上竞争者也。关于这层的情形，我想引陈公博著《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的两段话尽明白了。陈著云：过去工人运动当中，最感困苦的，工人本身有下列两个难点：

(一)地方主义 工人是一个阶级，这不只是社会主义者的熟语，也是研究劳动问题者所承认。但是在产业落后的中国工人无处不充分含有地方主义。广州的工人有各府的分界，上海的工人有各帮的分界，汉口的工人也有各县的分界，甚至庐山抬轿子的也有九江帮和黄冈帮。不要说工人形成一个阶级非常困难，就在一职业以内他们要统一团体也非易事。一个职业以内工人的力量是离心的，他们的斗争是向内的。这是劳动运动中第一个难点。

(二)行会色彩 中国行会有他们千数百年的历史，不止手工业者一时不能变成近代式的工会，产业工人也受了这种极远且久的行会影响。他们在一职业以内相互斗争，在一职业以外互相排轧。他们并不视工人是整个的，而视工人是分散敌对的。据我个人在广州的经验，一百件工人纠纷当中，劳资斗争不过是百分之二十，职工与职工斗争占百分之三十，同一职业的职工斗争竟占百分之五十。农工厅所做的工作是“调停”和“仲裁”，总没有时间去想出一个根本解决。这是劳动运动中第二个难点。<sup>〔1〕</sup>

〔1〕 陈曾在广州任农工厅长。

这就证明这些手工业者不是什么“阶级”，不能结为一大势力，以向外斗争，亦就是缺乏革命倾向。

其次，让我们来看农民呢。中国土地的分配状况是怎样，中国农民究竟自耕农与佃农是怎样一比例成数，同时几种不同的估计推论，争辩难决，我们亦不想从自耕农如何多那一面立论。然而因土地久已是买卖自由，遗产又是诸子均分，生产技术经营形态又无使土地集并之势，所以土地的集散转移是很快的。谚所谓“十年高下一般同、一地千年百易主”，“穷伴富，伴的没了裤”，藉见地主佃农升沉变化之易。形势既如此不定，再加以农民散漫非常，只有个人，不成阶级。将如何能期望他们革命？将如何能依以为基础呢？何况还有下列几点：

**（一）内地乡村社会的锢蔽** 这是因为物质的不进步，交通不便，见闻太隘，风气不开。在诸革命家自是二十世纪的人物，却没看看内地农民犹是在那一世纪过活！恐怕相差几百年不止。诸革命家即非游欧游俄，亦曾在沿江沿海呼吸过新鲜空气，自要干二十世纪的事，农民们却追随不来！

**（二）传统的观念和习惯太深** 农业社会向来是最保守的，此人所共知无烦多说。又何况这是技术简拙，用不着文字的小农社会呢！中国文字本难学，农民生活上亦不需用文字，尤且无余力求学。通算起来，中国人不识字的占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1〕分开来说，都市视此应低减，乡村视此尚有增加。不识字的人无知无识，甚少为观念的运用，意识的拣择，而多是在迷信与传统习惯下度生活。凡

〔1〕见《东方杂志》，25卷中国文问题。

违反他的信仰，不合他的习惯之事，他都要拒绝。又何况是这历史太久文化太老的中国乡村社会呢！他们的信仰和习惯数千年沿用，无大改变，保守性格外深重。所以要向中国农民谈革命简直是碰壁不通。什么“民主革命”“社会革命”这些外国话头，怎敌得他源远流长，濡染极深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之顽强？

**（三）消极忍耐性太强** 蔽塞已是革命家难题，顽固更是革命家难题；然革命家或以为“狗急了跳墙”，人当痛苦已极将亦不管什么信仰习惯。无如中国农民具有不可思议的忍耐性，忍受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这是西洋人所为看了惊诧不置的。忍饥挨饿，至死无怨，颇能作到。任何欺凌皆以消极应付。所以在你以为苦痛到这地步还不革命吗？而他正自能够耐受下去，你其奈他何？革命家遇到这般不革命的民众真不能不长叹一声了！

在革命家想象他是“绝对革命”，其实他是与革命无缘的！我敢说，一切劳苦群众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劳苦，均不存破坏现状之想，除非他们失业流落，或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者。然即至于此，仍未见得“绝对革命”；投身土匪，或投身军阀的军队，或为窃贼，或为革命先锋，在他们是没甚分别的。这就因为客观事实没有明白摆出来，叫他革命。本来人们初不必了解“革命”这名词，而要在社会客观事实明白摆出来他的前途应在那里求，自尔走向前去，其奈可怜今日的革命方向——本应该简单明了客观存在，不待宣诸口而已喻之于心的——乃纷纭聚讼于学者笔墨间，连篇累牍还在辨认不清，莫衷一是。蚩蚩之氓，更如何知道走向那里去呢？曾见某君论文有云：“中国许多劳苦群众虽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

以致流离失所，然而他们并不感觉谁是他们的死对头，何处是他们的出路，以此中国革命几十年，仍不能深入群众”。〔1〕此言甚是，而犹有一间未达，我窃恐其是永不能深入群众罢！

工农阶级既有这许多不可救药的缺憾与困难，那其次就要讨论到小资产阶级（或亦用“小市民”）了。小资产阶级有余闲余力求学，并且极易有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甚少蔽塞和顽固之弊，颇有革命的可能。事实上，中国革命1911年那次就是靠游日学生和他们的再教出的学生。在1926年那次就是靠游俄学生和他们的再教出的学生。“学生革命”殆为中国革命的特异处，亦许有他的必然性罢。然学生的家世总都要属小资产者；小资产者在其社会上的地位关系究倾向革命乎，则又群指为摇易不定。所以提倡农工小资产联盟说者，将其成分比例减少，为百分之二十，亦是不敢靠他们之意了。事实上，诚尔革命是他们，反革命亦是他们，确不是可靠的革命队伍。

再讨论到资产阶级如何呢？曾见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2〕照他的分析推论，则正是资产阶级为主；虽则他亦说国民革命是要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压迫下的各阶级合作才行。他叙说历来资产阶级倾向革命已有见端；而且“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他倒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

〔1〕《现代中国》，5卷1号，亦愚君论文。

〔2〕《前铎》，1932年第2期。

题)。但普通谈国民革命的，总多认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差不多就是买办阶级或为军阀官僚的化身。一个阶级乃被诸革命家有恰相反的认定，此固由诸革命家对于题目（国民革命）的认识稍有不同，推论起来不免大有出入，然亦可见其本身性质倾向之难定。他既可以为革命主力，又可为革命对象，当然不是可靠的革命基础了。

说来说去，究竟谁革命？殊不易确指。于是聪明的革命家颇不愿再从阶级上立言了！而有“被压迫民众”之说，及“觉悟分子”一名词。

十七年南京中央党部发出的《党员训练大纲》上说：“中国社会上，大体只有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地位职业和性别的区分，而没有阶级对立的显著事实，……所以全国被压迫的民众不能不团结一致共立于本党旗帜之下……。”又说：本党的基础是确立在被压迫民众，被压迫民族当中。所以从党的构成上看，本党是向被压迫民众、被压迫民族中去吸收革命分子，而不是阶级化；从党的效用上看，我们的党是为被压迫民众，被压迫民族求解放谋利益，而不是为任何阶级谋私利而革命”。像这样撇开阶级而不谈，倒亦痛快；被压迫三字亦极浑括含蓄之妙。可惜现在中国社会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正如《易经》上两句话：“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好难分别呢。自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以迄县署一名小小警察，当其在位有势都能压迫人，却是转眼下台失势便被压迫。土匪在今日社会内亦算一重要成分，当其绑票劫财算不算压迫人？土匪本身算不算“被压迫的民众”？无论什么国家，总要在国家制度法律有效之时，其中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方有可凭，方可识别。此刻中国直捷了当的说，今日有枪便可压迫人，明朝失枪便被压迫，——盖法律制度均



已无效，唯枪有效耳！〔1〕压迫与被压迫早已无从说起，公等知之否乎？请不如干脆说一句，革命不但无一定之阶级，并且无定人！

说任谁何人都革命，似嫌太无边涯，于是巧妙的拈出“觉悟分子”四字。自汪精卫以次各大领袖都喜说“各阶级觉悟分子”这句话了，而且声明“本党是超阶级的”。敢请大家注意：“觉悟”是心理方面的事，而非是客观境地；若果说革命不革命视乎觉悟不觉悟，詎不以唯心论为嫌乎？从此请不要再标榜什么“唯物史观”了！党已“超然”，自不须再觅基础，却不怕革命的力量，革命的方向，都弄到灵空园妙里去么？当初所预想之偃同物理学的机械装置，至此已完全抛弃；所预期之必然组成的大力量和必定不移的方向，自无把握。敌方我方两条战线已划不清，还说什么战胜攻取的策略？朋友！马克思列宁以来祖授心传的手法，请你们承认在此地用不上罢！

#### 四 第二革命对象难

如上分析，革命家的基本队伍联合战线，既已如此散乱危摇，然而果能望见敌阵所在，猛向〔前〕冲去，亦未始不能侥幸一胜。其奈这些敌人，或者知其所在而不可躁进轻试，或者

---

〔1〕十九年10月31日《大公报》社论，有一段话录如下：“一切支配于军权之下，而非支配于法律。上自中央，下至一县一村，其代表统治权者唯是枪杆。枪杆所至，权力随之。一切职业中之一切人民，随时随地，皆是自枪杆上讨生活，枪杆许其存则存，要其亡则亡。四万万人民对于其生命财产事业言论思想皆无权，而唯听命于枪杆。枪杆所有者之一喜一怒一动一静皆足以影响四万万人民之生活。政轨云云从何说起。此十九年来国民普遍享受之事实，无须详为说明者也”。

一扑之下，旋既不见，转而出现后营，隐身两翼；再扑三扑，愈迷愈乱，手伤足残，头晕眼花，欲罢不能，——不罢亦不能！这便是中国革命的现况写真。<sup>〔1〕</sup>盖不惟革命脚下基础难得踏实，抑且革命的眼前对象目标亦正自难捉到也。

大家或以为：革命对象在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甚属明白确实，尚何所疑？我以为这只是不用思虑的话，如细心思之，则知其正大有问题在。试分别论之如次。

大家说：我为被压迫民族，压迫我者即是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敌我岂不分明？这一层，因其在民族间，所以界别最清楚，较之在民族社会内，从阶级上寻求敌我界别容易。因此革命领袖有欲置党的基础于整个民族之上，专从民族问题阐明革命意义，而重在以帝国主义为目标者。如汪精卫复林柏生书，于林所谓“本党在于集中被压迫民族中各阶级最觉悟最革命分子，组织之，训练之，使成一超阶级的革命党”大表赞成，以为反共以后之今日最紧要的工作，莫过于清厘本党理论，而此则已解答了其中最紧要的一个难问题，且引申其说，举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皆归重在民族问题，而总结云：“所以本党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实在是三民主义里边一贯的道理”。<sup>〔2〕</sup>这外面是一个堂皇的态度，内里实是一篇巧滑的措词。因为实际上并不能对帝国主义者进攻，而只是对内作战。对内作战，在他亦极有说词：“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非先铲除国内军阀何能对外？且铲除军阀已就是对外了。”当你从理论上向他讨问党的阶级基础

〔1〕此文写于十八年秋冬之间，其时的痴心革命家盖真有“手伤足残，头晕眼花，欲罢不能，不罢亦不能”之感。若今日则“国民革命”一词早已变成假面具而玩弄之，说不上“欲罢不能，不罢亦不能”矣。

〔2〕《前进》，1卷6期。

时，他便遁藏于民族间的问题，而不说是阶级问题，——阶级问题实说不清也。当你从实际行动上向他讨问革命的目标时，他又自外转回到内，闪避开民族间的冲突斗争，——民族间（国际间）的斗争实不敢轻动也。明明斗争于民族社会内，而不欲居其名，明明不能对外族积极进攻，而欲标其名，纵不是有意骗人，亦是他自己有莫明其妙者在，而骗了自己。我们非将不能积极对外进攻的苦情自行揭出，不足以戳破这巧遁之词，不足以见革命对象之难言。

我们之不能对外进攻，还用多说吗！事实是最有力的雄辩。十七年北伐时，日本出兵山东，演成济南惨案，完全是挑战行为，而革命军马上退避三舍。日兵强驻山东一年，莫敢谁何，至于要绕道行军才得完成北伐。试问天下有这样遇见革命对象（如其领袖所言，更且是唯一对象），就赶紧回避不遑的革命军么？天天喊着：奋斗！打倒帝国主义！等到遇着他，又向后转！这是什么原故？乃更若今日者，日兵占领东三省，我以不抵抗著闻，数千万同胞沦于亡国之惨，而军事领袖引据总理（革命党魁）的话：「若竟动兵则日本上日便可占去日本」，还是……

的总退却，其结果直至我们无法可以救济。

工人直接因之失业者三万七千人，连带商业和手工业者失业的，去年五月间我约略统计，大概要救济的约数是十二万人。——这是关于工人失业的一种恐慌。

武汉每月销煤量自六万吨以至八万吨。为着帝国主义者的退却，粤汉京汉两路大起恐慌。兵工厂水电厂和其他商办工厂时时都有停工的危险。五金缺乏，兵器制造额亦不如前；在北伐进展期间而至兵器的制造停顿，多么危险！美孚和亚细亚计划停止，长江上游几乎入了夜间缺乏燃料的状态。——这是关于原料缺乏的一种恐慌。

自英美下了在长江的侨民总退出令以后，太古怡和已预备停航；纵不停航亦停运商品。江汉关的税务司有一天收过四百余元的税。长江上游的商业可以说几乎停止。这么一来，本无几何的社会经济完全破坏。政府的财政亦无复可以维持。——这是关于交通缺乏的一种恐慌。……所以去年4月至9月半年时间，工人和外交部所打笔墨官司，外交部和外国领事所打笔墨官司，都是要求外人复业。归根一句话，我对帝国主义亦为总退却的妥洽。

陈公博因而很痛切的说了些老实话。他一则曰：“在目前我个人最感痛苦的，如要国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但同时果要国民革命成功，非妥协帝国主义不可”。再则曰：“……所以我很感觉帝国主义不倒，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但要国民革命成功，先要对帝国主义者妥洽”。三则曰：“国民党的政府……无形中不得不对帝国主义妥洽，在我个人的批评，对帝国主义为某限度的妥洽是对的”。盖事实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原重在经济的侵略，我们受他侵略既深且久，固一面吃亏愈大，而

一面亦愈依赖于他。好似吸鸦片烟一般，烟瘾愈深且久，身体愈伤，而愈离不了他。所以他若将其经济侵略手段一旦骤然撤回，我们便大起恐慌，支撑不住，反倒要哀恳于他，“请你还是侵略我罢”！所谓“士气”无非利用其一点敌忾之心；照这样，士气安得不坠？革命队伍何能维持不解溃？这条战线谁复能联结？此即我所说：“革命对象难”，而党之所以终于无办法亦即在此。——然而我谓“革命对象难”，其义犹不在是。

上面的话不过指证我们对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反抗，或经济上不合作来反抗，眼前都不行，彼此力气强弱相悬，较量不来。这只算革命难，不算“革命对象难”。却是革命对象之难言，正可从这里发见出来。中国革命军为什么自己要回避革命呢？就为得革命难么？我想革命难易本来不会成为问题的，其所以成为问题，知难而退，正因为他有“知易而进”者在。换句话说：他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革命，或者不革命。更明白地说：他因为对帝国主义者有运用外交一路可走，所以到底不肯开战。从其事属两可，就见出分际不到，帝国主义者不是真正革命对象。因为有外交可讲，就见出彼我各为一国家，而是国际间的关系。民族间可以有革命，即所谓民族革命是，国际间（此一国家彼一国家）却无革命可言。我们如果同印度或朝鲜一样，干脆做英国或日本的殖民地，那自然除革命外还有什么出路？英国或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然是我们的革命对象，还有什么疑问？但今日我们无论如何还算个独立国家或半独立国家，各帝国主义者对我之压迫侵略无论如何严重，还不曾直接统治，而借着一部不平等条约。于此际，最激烈的办法亦不过通告废约。他不承认废约而开战；那是一种国际战争，似乎不好唤作革命。虽然

实际意义上，亦许同革命差不多，而究竟不同一点。这一点不同，关系正非常之大，一切差错原都发生在疑似之间。由此而革命对象难言，由此而对于“这些敌人知其所在而不敢躁进轻试”，由此而两相激宕的准机械力量造不起来，由此而党不能成功。

中国革命既以不到民族革命分际，不能实行对帝国主义者进攻，因此革命领袖欲置党的基础于整个民族之上，专从民族问题阐明革命意义，重在以帝国主义者为目标，完全是句骗人的空话。在实际上原只有对内作战，则其所认取封建势力为革命对象，是否合适，我们现在要接着讨论的。“封建势力”一词。一般革命家是指着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而说。其中自以军阀为首要，所以现在亦即是要问：军阀果为正确的革命对象否？

照我的回答，军阀不能成革命对象。欲说明此意，须得先说明如何方为革命对象，而更先要说明何谓革命。革命是一社会根本秩序的推翻与改建。然在人类历史上，秩序与国家二者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先乎国家，则秩序之义殆尚未见，后乎国家而存在的秩序（无国家的秩序）则犹期待于理想之未来。自今以前，人类社会所有的秩序，没有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的，而所有国家没有不是武力的统治。秩序一词包含法律制度礼俗习惯，乃至其他类乎此的东西。当然其所由维持不全恃武力，而武力每为后盾。革命就是否认秩序，否认这秩序背后根本的最高权力。所以革命就必是国家内里面的事。前言民族间可以有革命，国际间则没有革命，其义即在此。而革命恒要以暴力行之，亦就是为此了。我们虽然可以分别反抗异族统治的为民族革命，争取政治自由的为政治革命，要求经济改造的为经济革

命，但一切革命实际总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实际都是要推翻那一种秩序的统治，而从新安排过，因此革命对象主要在那秩序，其次乃对人。类如朝鲜人要推翻日本所加于他们的那种秩序统治，如其日本放弃那种统治，就没问题，不过日本人总是要拥护维持那种统治的，朝鲜人乃不得不以日本人为革命对象。经济革命并非要杀尽资本家，政治革命并非要杀尽皇帝贵族。不过一种秩序不利于这一部分人的，恰好即为那一部分人所凭藉而存在，他要推翻，他要拥护，就发生了对人问题。绝没有单单对人的革命。像中国从前的改朝换代，张家倒了，李家出来，没有社会秩序（组织制度）的根本变革，都不算革命。——那只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圈。

如果我们在上面所说的话不错，则我们将问：军阀是人的问题，还是秩序的问题？我敢决定说，不是秩序问题。我们遍查中国国家法律制度没有军阀这一条文。从民元的临时约法一直到今天国民党的法律，谁亦不能指得出军阀是根据何种法制而产生，是凭藉那部律条而存在。反过来看，很明白地正因为军阀而国家法律失效，而社会秩序破坏。他恰好是与法律秩序势不两立的东西。我早曾说：

中国今日正是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未能安立，过渡期间一混乱状态，军阀即此混乱状态中之一物，其与土匪只有大小之差，并无性质之殊（土匪扩大即升为军阀，军阀零落即为土匪）。他并不依靠任何秩序（如贵族依靠封建制度，资本家依靠资本制度）而存在，而任何秩序乃均因他之存在而失效，而不得安立，——约法因他而破坏失效，党章因他而破坏失效。他的存在实超于任何法律制度之前。他可以否认他自己的合理，承认他自己是社会一危害物，而

于他之存在依然无伤。〔1〕

这里要注意的：他固然于民国的新法制上无根据，并且亦非从社会旧秩序传统存在的；他固然于法律制度无所凭藉，更且无藉于道德观念或宗教信仰。在1911年革命时，我们心中毫无知军阀这东西，亦且绝未听说这名词，明明是入民国后的新产物，故不得云传统存在。社会上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向来有与国家法律制度协调一致的必要。因为法律制度除了有武力作后盾外，更须理论拥护，使他成为合理的。这在喜用阶级一词的人，就谓之阶级理论。例如日本天皇的神圣尊严，不但宪法上有标订，道德上宗教上的维系力更大。乃今日中国的军阀偏不如此。社会人人诅咒军阀，他毫不为意，甚至他自己亦应和着诅咒军阀。从来不见有这样的反阶级理论。这就是他毫无所藉于道德宗教的维护。这就证明他并不立于一种秩序之上。

军阀既不是秩序问题，难道是对人问题？这亦不然。反对军阀，殊非单对某何人，而实是反对政治上这一种格局或套式：政权附属于军权，军队俨若属于军事领袖个人所有。此一种格局或套式如其不仔细分别的话，就谓之一种制度亦无不可。他盖为社会阳面意识所不容许，而又为社会阴面事实所归落的一种制度，故不得明著于法律，故不得显扬于理论，故不得曰秩序。然以其事实上的必要，故二十年来千方百计欲去之，而展转卒不出乎此局！于是要问：此社会事实与社会意识之间，何为而不相应如此？以常例言之，则一社会中，其意识恒为其现有事实所映发者，其事实又恒为其意识所调整而拓展。二者互

---

〔1〕《村治》，1卷3期，《建设新社会才算革命答暗中君》。（见本卷——编者）



为因果，息息相关，不致相远，此社会秩序所由立也。假有社会事实既迁进而秩序未更，则发为革命。革命之发作与成功，莫不有新事实为根据，亦莫不有新意识（革命意识）为先锋，否认旧秩序，要求新秩序。新秩序此时盖既伏于新事实而萌露于意识之上。绝未有事实所归落与意识所趋向两不相应，如中国今日者。是则由社会事实以演自中国数千年特殊历史者为本，而社会意识以感发于西洋近代潮流者为强；二者固大不侔。所谓中国社会问题原非发自吾民族社会之内，乃从外引发而来，实为革命之变例。<sup>〔1〕</sup>社会内部自发之革命。大抵因新事实而有新意识，意识事实一致同趋，其著成新秩序也不难。从外引发之革命，意识与事实不侔，旧秩序既以不容于新意识被排而去（1911年革命）；而新秩序顾又以缺乏新事实而安立不起来。在此两夹间中，意识拗不过事实，就归落到军阀之局。为中国革命对象的中国社会旧秩序，早随满洲皇帝之倒而不存，此不成秩序之军阀制度固革命的产物，非革命对象矣。他唯以无新秩序起来替代，故暂时消极存在耳。他不劳再否认，——因他并没有被承认。他不劳再推翻，——因他并没有建立。但盼望社会如何产造出一个替代的东西便可。说到此处，我们可以看出革命家以军阀为对象，而施其武力破坏之功的错误。

谁愿意承认军阀？然而要以武力破坏对付军阀，则文不对题。从全局（军阀之局）说，正是个秩序破裂与不稳定之局，夫何劳武力去破坏？武力破坏适以加重其祸，延长此局！从军阀本身说，毫无法律凭藉而自能存在，人人厌嫉，社会充满反对空气而卒能存在，其必有事实之不可移易者甚明。事实无进步，

〔1〕参看《中国问题之解决》一文（见本卷——编者）。

军阀即一日不得去。武力破坏妨碍社会进步，是助长军阀，不是消除军阀。因此，以武力解决军阀的结果，不过是旧军阀倒，新军阀出！以暴易暴，无以自解。我前说“一扑之下，旋即不见，转而出现在后营，隐身两翼，再扑三扑，愈迷愈乱，身伤足残，头晕眼花，欲罢不能，不罢亦不能”，意正指此。革命至此，乃真穷矣！

时至今日，革命家乃不能不自己打嘴巴，流于不革命以至反革命去。与帝国主义者妥协（乃至求妥协不得）早不必说，对于军阀不亦有许多巧妙的妥协论么！右派的“分治合作”唱之于前，左派的“以均权（中央地方均权）求共治，以建设（不以武力）求统一”应之于后。我们慎勿徒笑革命家的怯懦与滑头，实在是误于当初革命对象不清楚正确，结末自不得不如此。

大抵力量以愈得其用而愈出，以愈感受外围压迫而愈坚固。革命对象抓不到，革命力量无所施，不得其用而枉用滥用，那得不自己溃败？敌（革命对象）我（基础力量）分不清，没有沟界，那得不散乱？——国民党果又何从成其为党？

## 五 理论统一难

要求“革命理论统一”的呼声，现在固已是疲缓低微了，然而在当年（1927）清党分共后数年间，确真是许多青年和革命党人最急切的要求呢。在以前的时候，事事取决鲍罗廷，一切跟着第三国际走，不发生这问题。尤且是革命高潮中革命冲动正强，未假思索，到1927年才转入沉想研思时期，而理论争辩开始。“国民党代表的是什么”？“国民党要不要革命基础”？“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是国民革命还是全民革命”？诸如此

类的问题，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党内的纠纷和革命高潮初落而聚讼纷纭起来。这聚讼至今并未解决，不过是疲下去就是了。

似乎党内思想理论纷歧亦是平常事；俄国共产党亦未尝不纷歧。然而未若中国国民党之极离奇幻妙之大观的。三民主义既可从《大学》《中庸》来训释，而以孙中山继承孔子（如戴季陶），又可以从《资本论》来训释，而化孙中山为马克思（如甘乃光等）。高呼要破除宗法社会观念，打倒封建社会思想，而在三民主义总理遗教里面正不少发见。追随总理多年的党中先进，建制出一个政府表现五权遗训，而其他领袖和党徒们却认为归拢作一权。究竟五权应如何安排，谁亦说不清。像这样离奇怎能成为一个党？但你不要看作他们个人的笑话。这正是中国的现社会。中国的现社会原来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大杂烩，所以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亦就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大杂烩。孙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是几十年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唯一大集团，又安得不离奇复杂，包罗万有？

根本思想的驳杂已甚危险，尤其是与行动方向直接相关的革命理论莫衷一是，便无从成为一个党。革命所以一定要有他的革命理论，为是要从问题的分析得到解决问题的方向之指示，行动即由此决定。然而根本上就说不清中国是什么社会，亦就认不定是什么问题，应当有一种什么革命。自来中国社会古怪成谜，所谓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例之旧日中国都不象。而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今日中国，问题似更复杂，社会内部问题亦有，外面问题亦有。诚如孙先生三民主义之所示，中国革命包含民族革命（争求国际平等）民权革命（争求政治平等）民生革命（争求经济平等）。一个革命包含三种革命意义，已觉头绪纷繁，无从着手，而细究之，三种革命似又都不是。我未尝在外族统

治下，则说民族革命非真，后两种革命意识自外启发而来，缺乏我历史演出的事实根据则亦非真。不独纷繁更且混淆。于是或者说没阶级，或者说有阶级，或者从这观点而认某阶级为革命对象，或者从另一点上认某阶级为革命主力。总之，在革命理论界中，有两大可注意现象。一是极见纷歧，一是每每流于灵空玄妙，如所谓“全民革命论”，“超阶级的革命论”，“各阶级觉悟分子革命论”，等等不一而足。何为而若是？这断非谁愿意纷歧，而自有使之不得不纷歧者在。这亦许因为中国文人喜说不着边际的话，或东方人天生一副玄学头脑；然正恐事实上亦有逼着他不得不走入浑玄者在。——你不要看作这是某个人的笑话，这正是中国现社会所映射出的文章。

在十七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的党员训练大纲上，曾有一篇话：

各被压迫阶级结合的党——代表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换句话说，代表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利益，彻底推翻一切压迫势力，反对妥协改良，同时对于各压迫阶级互相间的利害冲突加以合理的调节，预防阶级斗争的惨剧，并从根本上消灭阶级的存在，以期实现一切被压迫民众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幸福；所以要严密各被压迫民众被压迫民族的团结，以防止革命斗争历程中战斗力的分散，而一致朝着由国民革命进于世界大同的道路前进；他的革命性是合理的彻底的恒久的，这便是唯一无二的中国国民党。

满纸的“阶级”“压迫”“代表利益”“冲突”“斗争”“反对妥协改良”，却又口口声声要“合理调节”“严密团结”“共同幸福”。一面从阶级立场出发，一面又要扭转阶级的立场。完全学得一套分划眼光，而持论强归于浑融，充满一身唯物气息，而终成

其大唯心论。此绝非偶然的笑话，实大有他的苦处。

质言之，理论不成其为革命理论，只革命就是了；方向没得准确方向，只行动就是了。这就是中国的革命！此在前面“阶级基础难”“革命对象难”，两段话原已可表出，实无烦多说。然象这样，又何从得成其为一个革命党？

## 六 结束上文更申一义

我们回顾本文开首所说，要行党治亦非容易的话：

第一，必须有好方法团结成此一大力量；

第二，必须有好方法保证此一大力量用得正当，不致走入歧途。

如今看来，团结的好方法没有，分崩涣散倒充分可能！不走入歧途的保证初不可得，乱走横行，背叛了自己，颇有把握！党且无有，何有于党治。“以党治军”、“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一切无非梦想而已！

就党论党，约略如上，更有为谈党者所少留意之点，愿一申言之。则这一套西洋把戏于吾历史习惯，民族精神至不合也。此在许多处可以指见出：——

（一）共同信奉一主义，要许多人结合起来往前走，此中国夙昔殆所未有之事，尤于中国士人风气习惯不合。中国无宗教，而理性开发最早。所谓“读书明理”要在启发人的理性，而非有所信仰于外，服从于外，受支配于外，故其势散。与其同信奉一个主宰，而崇服，而受支配者，其势恰相反。故中国社会之散漫，其起因实在于没有宗教集团组织，如基督教或回教者。于旧日士农工商四民中，结合起来成团体之事，唯工商尚多见

之，农民以头脑简单亦尚可行，若士人乃最无团体者，他要“从吾所好”，而不愿跟着人走路。他好出己见，而不听人话。虽然“党”是新知识分子发起的，并且要靠新知识分子居重要成分，但从士人传下来的脾气，不惯“党”的生活，终究破坏了“党”。因为一时模仿心，终究敌不过好多千年养成的风习。

(二) 因其夙来散漫无团体，故团体生活中的两大要件，组织的能力和纪律的训练，他都没有。无组织能力则对于团体不是意态消极，好歹不管，便是喜欢把持，易生争持而决裂。无纪律的训练则行为散荡浪漫，工作不能敏活紧张。党中人于此亦尝感慨言之；摘录以见一般：

在革命根据地的特别广州市，区分部就不常开会；开会亦从没有过总出席。而且省党部或政治上稍占重要地位的党员，一百人当中没有一个在区分部有过登记，一百次开会当中，没有一次出席过区分部的会议。

最重要的党员最不注意严守纪律的素养。例如总章所规定的党员纳费，党员开会，不管如何，这亦是一个纪律。但据我所知，有几个重要党员月月去党部购买印花，次次出席小组会议？更有些重要党员至今并党证而无之。人人都有蔑视纪律的习惯，纪律即象非为我辈而设。

每次官吏就职都宣誓，决不雇用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不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而每年因营私舞弊得免职处分的不知多少；实际上党就没有处罚过，严厉不严厉更谈不到。是党员犯罪只有政府处分，没有党的处分。甲地犯事的党员跑到乙地可以任事；有时不止任事，还可升官。

当时党部派出一个特派员，以后这位党员的工作怎样，

党部绝不过问。这位党员究竟到了什么地方，党部无从知道。地方民众对于一县的党部不满，省党部很少考查不满的原因和检阅过去的成绩。如果这个县党部执行委员被人打倒，省党部便另派几个委员。如果这县党部委员能站得住，省党部亦乐得听其存在。尤可怪诧的，为着经费问题，为着用人问题，县党部和县长冲突，几乎成普遍现象。遇了这种场合，省党部一封公函送到省政府便算完事。党部和县长究竟谁的不是，省党部懒得去管。省政府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把这封公函一批批去民政厅，民政厅一搁便搁得毫无结果。

(三) 中国士人个性发达，乐于自尊，不乐于依附，对于强权或大势力易生反感。我不敢说中国士人都是如此，不过愈是有才有品的人个性愈强愈要如此。曾记得民国十四五年间张难先先生任琼崖行政长，所辖有十三县，要物色人才共襄治理。那时革命空气正紧张，党内外界别甚严。不在党者即不革命，不革命即反革命。张先生更为认真，非党人不用，用必入党而后可。但因此发生一大困难，即他的好朋友或好人才，他欲挽来共事者，均以不肯入党而谢不来；党人愿为他用者甚多，又均不好。他写信给我，深有“好人不党，党人不好”之叹，此独非可注意之现象乎？十七年党军初入北京，党部张贴标语，大书“党权高于一切”。某老士人过而笑之，于其日记中记云：这高于一切显露着刀山剑树的神气；以强权压人不自知其可羞耻，便是从前的皇帝亦何能写出“君权高于一切”来！〔1〕“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其言实倡之数千年前，在我尚理性的国民固应

〔1〕此著者所亲见，第不欲揭举老先生之名。

如是。

(四) 从乎中国社会之组织构造，使中国人无国家观念，无阶级意识，亦即使中国人照顾其一身一家之私，而少超身家的公共观念。西洋人反此。正以其势相反，故中国人要讲是非，而西洋人尚谈利害；此唯讲是非乃可以存公道，彼虽谈利害亦不流于私也。今党人谬袭利害观以代是非观，于吾民族精神，于吾社会事实均不合。散漫流动又加混乱失序的中国社会，其政治上经济上机会之种种不等，非限于阶级大势之定然，顾落于个人运际之偶然；个人自求出路于现状之中，较诸破坏现状为社会谋出路容易得多；“非革命不可”的形势造不成。不要说他不革命，革命了，他个人稍得地位机会，而留恋现状而落于不革命或反革命去。故居中国而言革命，正当从是非心出发。凡今之否定军阀者皆从其是非之心，而不从利害心。从利害，则朝害而夕利，为敌为友可以一时而变。今顾不从其不可变之是非心倡导之，而乃欲依利害心为基础，无乃惑乎！其于吾精神不合，则参看前为《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文中“所谓精神不合者其四”可以明白。

(五) 旧日之中国社会，其组织构造与西洋殊异：

一、大体上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其前途命运可求，与西洋之阶级社会异；

二、伦理本位与西洋之个人本位的社会异。

由此两异，其在西洋自然要向外用力的，而中国人则心思气力无可向外用，必须向里用。凡此意义曾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中（第六段）具陈之，不更申说。亦即由此两异，故西洋有革命而中国无革命。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所诂甚确。这自是西洋社会要有的事，中国社会顾何从而有



之？中国社会只有他历史上的一治一乱，改朝换代，而社会组织构造无何等变更，谚所谓“换汤不换药”。若革命则社会组织构造根本发生变化。西洋人无时不在向外用力，而革命更是显著的大规模的向外用力的进发；革命党更是纠合众人有计划步骤，有部勒办法，有讲究，有训练的向外用力。此全非中国所有，抑亦非中国所能学。所以不能学，请审前作《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文中“所谓精神不合者其一，其二，其三”三段自详。

（六）中国是尚和平的民族，最宽容而有理性，斗争非所屑；以斗争救中国人，是悖乎其精神之大者。即此一点，足以断定此路之走不通，这一套把戏之演不好。抑中国民族老矣，譬诸个人，血气既衰，不流于巧滑近利，即落于呆板拙笨。非同乎少年血气，可酣畅地精采地演一幕大武剧。质言之，他不能作革命斗争。血气已不能用，此时但问他还有心没有心？有心有救，无心无救。然世俗固见不及此，妄欲用其血气，宜有今日。<sup>〔1〕</sup>

（七）中国实一“不像国家的国家”，数千年以消极不扰为治。语其所以然，则殆有两个原故：

一、自秦汉以后，变列国分争之局而为天下一统，外围环境不同，

二、同时其内部构造但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

读者请审我前为民族自救运动觉悟及论政治上第一不通的路各

---

〔1〕所谓民族衰老不衰老果于何定之？其衰老者是否同于个体生命之将近死亡？抑犹可有新生命开出？“有心有救，无心无救”何解？凡此问题必另为文言之，此不能详。

篇，可知其意。若往若今，有知识的西洋人或日本人，于此虽不能道其所以然，要皆能注意揭出，表示诧异。其言甚繁，不可胜征引。此中国历史之特殊，固有目者所共见也。乃今之梦想党治者（又近来惊羨俄国五年计划成功者），昧昧焉要举数千年收缩不用的国家权力，大用而特用之；一改消极无为的政治史而积极有为。岂今之中国人已经不是原来的中国人，而满换过一批人么？岂今立社会条件完全变更了么？不然，岂有数千年历史而可骤变于一旦者？此譬犹多年不跑路的两足，一旦要他大跑其路，吾不信其能跑得了也！呜乎！亦适成其主观的梦想而已！

（八）从前的中国人与其国家，殆成两无交涉的状态。老百姓向政府缴纳钱粮过后，便有“他亦不用管我，我亦不用管他”之概。中国人虽至今自由无保障，不能比于任何国民，然自古确有比任何国民更多之自由。罗素云：“在大战时，人们讥称严格主义为普鲁士主义，现在称之为布尔塞维克主义；我承认我对于这种观念抱同情，并且有见于中国，而这种同情越发深厚，因为中国是最优游自如的民族。”〔1〕布尔塞维克主义（严厉干涉制裁的生活）方且为欧洲人所不惯，其于数千年生活习惯正相反的中国人，更当如何？不问可知，是调融不来的。乃今之革命者昧昧焉从其主观一时的贪慕（贪羨隔壁人家之工作紧张，行动敏捷，抑压反动之有效，妄欲以之规律党员，钳制异己，施行于此顽皮的老社会。卒之本身先行不通，党内先行不通，更说不到一般社会。原想党员无自由，党以外被统治的一般人民更无自由，唯党有自由；卒之，党员自由，一般人亦

〔1〕见罗素著：《工业文明之将来》。

自由(虽有时受残虐干涉),反而党倒不得自由!以其分裂牵掣,麻木不灵故也。不顾历史,不察人情,宜有今日,夫何足怪。

上举八点,不过约得其要。我们可以重举本文开首第二段的几句话作结:中国社会往高里谈则已超过了机械性,往低里说则够不到什么机械程度,总之根本上是极不机械的;而你们诸公却觉得隔壁人家操弄机械的手法巧妙可爱而摹拟之,以为不易之方,这便所谓聚九州铁铸一大错了。

十三年改组以来的国民党之无前途,吾人在其全盛时代(十六年之初)既先察见而断言之,更不待今日事实结果之证明。今国民党虽失败,而梦想党治者犹大有人在;虽大有人在,而吾知其无能为。诚以其想凭藉的客观形势,在此社会中固无有,而事实所有者乃处处与其预期需要的形势相反。吾所命为“后期民族自救运动”者大致将近结束。此后之民族自救运动将转入一新方向。吾敢为读者告者,吾兹所得为读者告者,此新方向绝非不革命;此革命更非可以不靠社会客观形势。所谓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民族平等的蕲求,谈中国问题者夫何能外?中国现社会自有其一种形势;中国问题的解决必有赖乎此形势之自然,夫何能外?所不同者,从乎民族历史之演变,民族精神之趋向,所谓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其势固将有异乎西洋之民主与共产;所谓有赖社会形势之自然,尤非昧昧焉摹拟他人者所足与知耳。其详,将别为文继此以请教于读者。

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43—176页,  
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

《村治》,2卷5期,9、10期合刊,11、12期合刊,  
1931年9月8日;1932年5月15日,9月5日。

## 对于东省事件之感言<sup>〔1〕</sup>

最近日本进兵东省事件发生，迫得人不得不对此事件发言！我对于日本进兵东省之感想，可分数点来讲：

（一）日本出兵东省并非新鲜的问题——日本欺压中国不只一次，是若干次数了。象这种类似的事件，用强大的势力欺压弱小民族，也有百余年的历史。所以这种事件不算新鲜。我们须知道，在最近百年间，或百余年间，算是世界上很新的而又很特别的时期，就是欧洲发生一种新的文明；此文明之中心是工商业，即工商业文明。这种文明把全个世界包围了，侵略了，把地球上不同的民族征服了，压倒。全地球上不同的民族，感觉很大的压迫，于是只有两条道路可走：第一条道，就是自己追上这种文明，跟他跑，学他，模仿他，赶上他，如此可以自立于世界；第二条道，就是不学他，或学而不能赶上他，如此即落于被他征服之地位，在世界上不易独立生存。如日本就是走上了第一条道，工业商业很发达，有侵略别国的力量。而其余学而未及的国家，象中国，则被其征服。然在百余年前，无有这种事情，更无有一个文明可以征服全世界的。但在最近百年上下以内，欧洲之工商业文明，把全个世界征服了。今日之日本进兵东省事件，即是工商业文明向外侵略，已有百余年

〔1〕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讲演。

的历史了；且昔日此类事件，又有甚于此者。日本既走上工商业文明之道，所以也要走这条路——侵略的行为。他的工商业文明既发达，于是有不得不侵略别人的事实，同时，亦须有相当的财力，此三事是相联的。就是一方工商业发达，一方有财力，再有能侵略之武器，所以要侵略别人。可是这种事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所以说日本出兵东省，不是很新鲜的。

（二）望大家回想中国本身的历史——中国本身的历史非常特别。在三四千年前，有发达很高度的文明，对人类文化很有供〔贡〕献。即中国之文化，即中国人民。此种民族东西洋亦有，但有开发高等文明之民族，在今日之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了，即有亦非独立的国家；然在上古自己开始文明，又将其文明保存至今日之国家，恐怕只有中国了。所以中国现在视他国之近代文明，全为后辈。此时若回想我国已往之历史，我们这个民族诚然是特强的民族。他能自己开发其文明，又能保存其文明至于今日。在三四千年中，亦尝为外人看〔征〕服，如清朝即一外族并吞了中国。再往上说如元朝，亦是外族并吞了中国，再有其他侵略中国一部分的也有。但无论统治中国之时间有久暂之不同，总有一奇怪的事情，即侵略中国之民族，武力虽战胜了，强并中国之土地，但在文化上，是不能战胜中国的，终必为中国文化所同化，而服属于中国。我们回想历史，我们的特别的历史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武力上强权上暴威上，我人有时要落后的，但在和平上文明上公理上，我们是不落后的，不能被征服的。吾国民族有很大的文明，至今日又能维持此文明，是一个极喜和平的国家，似当为人征服，但结果不能为人征服。

（三）既明白前二点即当想到现在应如何努力——

(A) 吾人之前途，自救之道，努力之点，究在何处？我以为我们不应该跟着近代文明走，若有自信力，我们不必怕他，我们不必学他而求自存。这种国家的势力，未侵略中国以前，我们羡慕他，效法他；在侵略中国以后，我们恨他或想用同样的势力去抵抗他，我以为这是很卑贱的事；故吾人在起首即应当反对此西洋近代的文明。我不承认这种强暴行为算是高尚文明。若有自信力，不应怕他；若因为怕他而学他，这是最可卑贱的。

吾人对日本出兵东省事件，当他是一件人类的罪恶去反对他，非因他欺压我们而才去反对他。当他欺压朝鲜时吾人即当反对。吾人反对此等事件此种文明，非只因吾人之目前问题，若如此则属于自私心，而他人之侵略亦系自私心，那末，吾人又那里配去反对他？！我们必须立在人类的高尚精神上去反对他。所谓人类的高尚精神即是人类之理性。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也是所以与禽兽不同之一点。吾国能维持自己的文明存立数千年之久，即因其有一理性之民族，最和平最讲理的民族。

(B) 西洋近二百年之文明，已到了末路，快要崩溃。在此危机之时，各强国不得不自谋武力之发展。如1914年之大战，即为各国侵略所引起之战争。世界第二次大战为期非远，此大战将为各强国毁灭之时期。因大战一发，各国家必起社会阶级争斗，故社会革命与国际战争，即各强暴国家之致命伤。由此观之，吾人对此事件不必过于心惶；因为日本无论如何，不能避免社会革命，其国家的命运可以推知，试看现在时候，各工商业强国虽常开军缩会议，而实际则各国的军备有增无已，这就是他们自己求灭亡之道。故吾人不必岌岌去效法他们，跟着他们跑，增加军备。我国非工商业国家，财力亦不充足，无力增加军备，但亦无理由要增加，亦不必增加。

(C) 近代之战争，乃一工业科学之比较。谁的原料充足，工业进步迅速，谁即占上风，能打胜仗。若如此；中国实无办法，中国只有多数的人民，和充足的原料，但无近代科学进步的工业，故中国对于战事谈不到。中国的军备与工商业强国比较是等于零。尤其是近数十年来，国防毫无。又加内战不已，官吏的心都用于内争而不顾外交，再有条约的限制，炮台不许设立。即无国防与军备，对外打仗是谈不到的。

他们在前跑，吾人无能力去跟他，然亦不必跟。吾人不必扩张军备，吾人自救之道是什么？何处去求？我人之前途，即在武力反面，向武力反面去求。即设法使国人向理性方面去发展。具体的言，即中国社会应当向有组织方面求进步。有组织一句话包括很多：如增加国民的知识，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及关系，知识感情与关系的增进，即理性的发展。理性一面包含明白又兼有感情。如中国社会系有组织的社会，则完全不必怕强力之侵略，虽无武力亦不必怕，可以完全独立于世界。今日中国所以怕武力者，乃因中国是一个无组织无条理无秩序的国家。中国已往的二十年，不是没有武力，但有许多武力，全被滥用了，所以无组织虽有武力亦不会用；若有组织，即无武力，而亦不怕武力。中国目前所急需者，是组织，秩序，条理，和理性。希望速成一个有组织有条理有秩序有理性的国家。

兹举两例，以指明吾人应取之道及努力之点：

第一个例就是印度。印度在英国统治之下业已有一百二三十年的时间，但近日印度首领——甘地，在伦敦与英国首领开圆桌会议，此乃英人无法，不得不承认印度之地位，无法把印度视为属地，英人无法不承认与印度和平。印度无有武力，英人虽有武力，而不能以武力对待印度。印度既无武力，何以能

到这个地步完全因甘地之引导。甘地最著名之主张，即非暴力的主义，他积极反对英国，但不用暴力去反对。甘地主要的法子，即引起印度人之理性，组织，情感等。印度之民族，本很复杂。宗教分两大派：一为回教，一为印度教；阶级很多，其著者尚有八十四种之多。在此情形之下，甘地能引导他们反抗英国强大之武力者，因甘地能发展他们的理性，引起他们的组织，领导他们去合作，共同对外。甘地著最下阶级人民的衣服，与英国首领见面。甘地又与最下等人民常来往，意在打破印度阶级的观念，而成一个统一民族，合作民族。印度复杂的民族既能联为一体，英国虽强无可如何。今日之中国，最坏者是自己不能合作，不能组织，一团糟，同室操戈，一团糊涂，所以人家有办法，可来侵略我了。若吾人有组织能合作，即有办法；于是我有办法，别人就无办法，就不能欺压我。

第二个例就是丹麦的复兴。丹麦在一个教育家领导之下，而造成国运复兴。以先丹麦国运不好，为德战败，割地赔款。丹麦之衰败乃五六十年以前的事，在那时国势不支，是个将亡的国家，人民心理涣散，振不起精神，工商业亦不发达。然而近四五十年来，丹麦变成世界上最好之国家。面积虽小，而富力则较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内社会情形非常安定，无有劳资之争。其富力是很平均的。然其何能如此？非因其战胜他国，乃系由提倡教育而致也。丹麦为一农业国。他们提倡农业合作，发达农业。此种文明由一位老教育家——格隆伟——之努力而来。他办一个国民高等学校，此校设在农村，令十八岁到三十岁的青年全受此教育，使农业发展，提倡农业合作，于是国家大兴。近代各国多仿效此种平民教育。格隆伟把丹麦的平民程度提高，使国民都有理性，所以国运复兴。



我们举此两例，即希望我们也设法在促进国民之理性、组织、感情、合作等等方面努力，当仿效甘地及格隆伟之努力方法以救中国。

《大公报》（天津），  
1931年10月7日。

## 为拒赴国难会议致行政院电<sup>〔1〕</sup>

洛阳国难会议秘书处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钧鉴：前准国难会议秘书处通知，漱溟奉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敦促出席。正准备赴会间，乃闻于会议范围重有厘定，凡一时舆论所主张撤消党治早行宪政诸议，皆阴示拒绝，而同时各方人士之在征聘者以政府此举有失博谘众议共定救国大计之初意，亦相率不肯赴会。国难当前，正宜举国一心，而国内乃竟有此乖离之形见，可胜嗟痛。古人有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前者宁粤之间不尝以外侮之逼而委曲合作，以有今日第四届中央乎。凡党内夙昔异同之见，仇怨之情，既无不可尽捐，则诚愿推此义于一国之内外各党之间，更进一步而求举国一致之合作。年来国民党以反动概一切异己者，不容异党之存在，以国库供党费，以党费养党员，为国人所痛嫉积不平者久矣。专政五年，其失政更仆难算。每见各大领袖发表谈话，言之无不透悉。盖自北伐以来，国人所予国民党之同情至今毫无复存，凡今之以早施宪政为言者，大抵不胜其厌嫉专政之情，固非心信宪政之果善。漱溟之愚，以为宪政固不可行于中国，眼前御侮，其道尤不在悬。国民党虽失政，而环顾国内其畴又足以易之者，则今之所深望者难在国民党执政而能收党外各方面攻错之益，诚心以求国民之同情与

〔1〕标题为编者所加。

援助一途而已，岂有他哉。所谓举国一致之合作其义如是，愿我政府深察此意，而由国民党自动以出之，则国家之幸也。辱承征及微末，义当趋赴，而漱溟怀此欲申，又恐其言不在会议范围，敬用电陈求鉴，即赴会所献要无外是已。临电无任主臣。梁漱溟叩微。

《大公报》（天津），

1932年4月7日。

##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工作<sup>〔1〕</sup>

中国问题的解决，在要重行建设一个社会的组织构造；但必须从乡村去找头绪。——这便是“乡村建设”之意义。

要使社会为一新组织的开展（即进行乡村建设），先须经济为有方向的发展；而经济问题之解决，必须靠政治，才有力量。因此第一要解决政治问题；第二要利用政权解决经济问题；第三从乡村开出新组织来。

至于邹平的工作，则大体如下所述：

### （一）研究院之组织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内部组织分（1）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即以邹平县为试验区。（2）乡村建设研究部，学生三十人左右，入学者为大学专门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修业年限二年，课程分基本研究，专科研究二阶段。前者如乡村建设根本理论，后者如农村经济，乡村自治，乡村教育等等。（3）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学生约三百人。第一届先就旧济南道属二十七县招生（目前计邹平四十余人，他县平均十人）。其人须世代居乡者，入学资格，中学毕业，修业年限一年，课程分党义研究，精神陶练，村民自卫，常识及技能之训练，乡村经济生活之研究（如农村

---

〔1〕1932年7月23日，与中华书局编辑所及《中华教育界》社同人谈话，《中华教育界》记者笔录。

经济,合作、簿记、社会调查统计,农业常识,技能,农产制造、水利、造林等),乡村政治生活之研究等(如政治学、法令、公文、乡村自治、乡村教育,户籍土地登记、公安、卫生、道路、风习改善等等)。训练部学生,仅供给膳宿,研究部学生每月更有津贴十元。

上述三部,每部设主任一人,实验县区主任,兼任邹平县县长。一院对县行支用令。

## (二) 工作之进行

二十年3月(召)开〔始〕筹备研究院,并接收邹平实验县区。6月半开学,7月开始地方工作,也就是开始进行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乡村建设工作必以本地人为主,而我们为客。客要帮主人的忙,须先得主人让他帮忙才行。

此即是必须先得农民不猜疑不排拒,须得农民自己来给予我们尽力的机会。农民平素心理,最不信官厅能作好事,最嫌厌新事物新花样。研究院要从官的系统(如村长之类)上去找办法,一定不通,贸然教学生直接到乡村中去活动,也不能得到乡农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先走两个步骤。第一步,我们举行一个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由杨效春君主办),召集各乡小学教员,约三百七十人。这个讲习会不但讨论些小学教育问题,而且得从生活指导上,无形中进行了乡村运动的工作。即将学员分成许多小组,每组派一院内学生作为导友,参加他们的生活,随时讲述乡村建设之意义及方法,使之明白认识。讲习会结束以后又教他们成立一个同学会,以期日后的互相通问。小学教员究竟是乡村间比较有知识的人,容易接头;而他们散处全县,又散得很匀。经过这一番浸染,回到乡里自然会替我们的工作向乡下人说明说明了。

第二步,是举行农产品展览会。这个会于二十年阳历九月间开幕,展览品分表征展览与普通览二大类。前者意在示范,后者意

在相互比较。两大类共计二千余件。除直接征自农民者外，有征自各农业试验场者，如青岛大学农场，金陵大学农场，以及青岛商品检验局等处。就中以青岛商品检验局送的标本，最有指示改进农产的意义。开会四天，参观者人数共有四万六千余，占邹平县全县人口四分之一。来的人老幼妇孺皆有。他们在院内随便看看，知道院内所讲所做以及会上所陈列的，也都是庄家人的东西，在农业电影中所看到的也是庄家人心中所有的问题，这样就无形中消灭了误会和远离的心理了。

再加展览会结束以后，有比赛优胜奖品的赠予；奖品或者是一方匾，或者是联语，这样又可以使农民对于我们工作的印象更深些，更了解些。

经过这样劝诱接近的两个步骤后，我们乃敢派学生赴乡间六个自治区去办理乡农学校了。乡农学校成立关系至为重大。表面上是乡村民众学校的形式，实际上是初步的组织乡村。

乡农学校之组织，以一相当大小之乡村社会为对象（大抵人口在二百户左右，小村落间相隔只能二三里）来进行的。一个乡农学校之成立，先须组织校董会。被邀为校董的大多为本乡稍有资望的领袖人物，由校董推出校长（校长不必就校董中推出，校董不必识字，且于其个人私德的要求稍宽；校长则必须识字且立身纯正），由校董校长出头召集本地成年农民来入学，而教员则为本院训练部出去的学生。这样办法，可使乡农学校成为乡人自己发动、自己进行的学校。论其构成分子是当地领袖、当地农民和乡村运动者，三方面合成。而研究院训练的学生，就成了推动乡村的一个力量。他们的后边，是有组织的乡村运动团体。于整个的乡村运动进行中，乡农学校占根本重要的地位。

乡农学校功课，分有定的与无定的两种。前者如识字、精神

陶炼、珠算、唱歌等等，后者视当地的实际问题及事业而定。所以要有精神陶炼一项，且视为极重要者，因乡村生活日趋消沉：旧的生活秩序之逐渐摧毁，新的风气新的变化非常猛骤，农民们跟着跑是不愿的，可亦无力否认拒斥，处在这样情形之下，他们心理，已多感伤气氛，而内心无主，加之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乃更无乐生之心。对这样活力消沉的农民，我们要以精神陶炼的方法，引动他们的生机，使之有定力，有意志，而勇往向前；知道前面还有开展广阔的人生大道在着。

所谓不定的功课，即是因时因地制宜来解决当地的问题和进行当地事业的。如有乡村自卫需要的，就进行自卫组织与自卫训练。地多荒山且群众以不能保护林木为苦的，就进行种树运动，和林业公会。蚕桑区域就进行蚕桑改良，和养蚕合作。凡此种种，即以农村事业为乡校功课，以学校为办事机关。乡村运动者的作用就在设计与推动。照我们所认识中国乡村自治必如此入手去才行，更无他路。

邹平分七个区，城区除外，四乡即为六区，每个区有中心乡农学校。就邹平情形，先订定农业改进计划，因南乡及西南乡多荒山，则决定提倡造林，北乡及西北东北乡为棉作区，则决定改进棉作，于前者之区域内，更为提倡蚕桑之改良，于后者之区域内，更为提倡棉业之改进。这些事情都靠乡农学校去进行。今年下半年接着便在进行邹平以外二十六县中的乡农学校。

《中华教育界》，20卷4期，1-4页，

1932年10月。

## 《我们的乡村运动与现政权》按语<sup>〔1〕</sup>

上年愚在邹平，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同学讲中国问题之解决，前后历八个月之久，王君静如以外省人附学，备聆其说。今王君此文，大体即用愚意为之者。中国问题如愚所见，殆非发于其社会内部，而在受外来文化影响，不得不为固有文化之改造。二十年来中国政治问题所以苦不得解决，正以其原为整个文化问题，不能外于整个文化改造而得解决；而整个文化改造断非朝夕之功，虽二倍三倍于此二十年要不为多。质言之，中国政治问题之根本解决必待一种政治制度从事实上创造成功之后；此新政治制度即所谓文化改造中最重要之一事。然此文化改造或新文化之生长，夫岂在眼前乱局下所得进行所能成就者？则如何稳定眼前乱局，俾新文化新制度得萌芽生长乃最成问题之点。抑有进者，此包含政治经济一切实际问题之新文化运动必得现政权顺成其事而后可；仅仅不乱而现政权所作所为悉相逆阻亦万不行也。则如何控制现政权俾得护其顺成文化改造之功乃最成问题之点。易词言之：在此过渡期间——旧政治制度已毁新政治制度未成之期间——如何过渡又必有其道。或云：在中国政治问题未得根本解决前，又必有其相当解决之道。吾人于此万不可从主观要求上寻办法——万不可从如

〔1〕为王静如《我们的乡村运动与现政权》一文发表于《村治》时所加按语。



何乃得稳定乱局，如何乃得控制政权上着想。吾人但当溯从历史的演变而循求此乱局此政权将作何归落。事实看清楚、办法自尔发现。不然，则不免从办法上演绎事实，未有不陷于自欺者。愚盖远从千年来历史，近从百年来历史，而有悟于中国社会变迁所将从出之途，而后审于吾人不能如通常以社会改造运动团体夺取政权完成其社会改造之功之例，而必须间接控制政权以顺成文化改造之功者。其办法正不待强索，顾从事实上恍然有见之矣。此意于王君文中约见其概；有未尽者，愚他日当更为文详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梁漱溟记

《村治》，3卷1期，

1932年11月30日。

## 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sup>〔1〕</sup>

中国现在有许多人很注意提倡推行地方自治，但有许多困难问题。这可以从过去的事实看出来。“地方自治”这件事，在中国倡议实行始于前清光绪三十四年，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日子不算很短了；可是直到现在仍然看不见一点踪影，还在倡议之中，全国任何地方，都无其可行之端倪。这就可以证明此事推行之困难。光绪三十四年，满清预备立宪，筹备地方自治，颁布一个城镇乡自治章程，每县之中县城划为城区，较大的市镇划为镇区，多数乡村划为乡区。宣统二年山东开始着手进行，许多县设立地方自治讲习所，训练自治人才。筹备下级——城镇乡为下级，省县为上级——地方自治。至宣统三年训练人才后，即实行划分城镇乡，山东有好多县都如此办理。宣统三年就是辛亥年，革命成功后，仍然继续进行，城镇乡设立议事会，县有县议会，省有咨议局；在清末民初，省县议会在全国各省差不多都成立了。可是现在反倒找不到，转回头来重新提倡进行设立，其实现在要进行设立的议会，二十几年前都已实现成立过。到了民国三年，袁世凯政府时代，一半因有许多困难推

---

〔1〕据《乡村建设论文集》编者李激所写之此文“弁言”中说：“《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一稿，乃先生于廿一年十二月出席第二次内政会议前所讲于乡村建设研究院者，当时激为笔记，曾呈先生阅过，而未及改订。”

行不动，一半因袁氏认为地方自治虽好，但须作预备工夫，不能即行办理，主张从缓进行，所以让袁氏取消了，城镇乡自治章程不算了，地方自治讲习所也不办了。后来到了民国八年，北京政府的内务部，旧事重提，另行制定自治章程，命令各省筹备实行；但因政局屡次变更，南北分裂，扰攘不宁，又于无形中搁浅了。这时联省自治的声浪甚盛，是以一省为一自治团体，二十几省自治团体，连合起来组织一个中央政府。当时倡此议最力者为广东陈炯明，湖南赵恒惕；广东曾实行县长民选——广东实行县长民选更闹许多笑话，——湖南实行省长民选，赵恒惕氏即为民选省长。在这联省自治声浪甚高之时，湘、粤、赣、浙四省，都定有地方自治法规——我都看见过——但因军阀互相打仗，赵恒惕被唐生智撵跑，陈炯明被孙中山赶走，大局变化，联省自治的呼声也就随着消灭了。接着就是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改组，十五年的北伐，十七年的全国统一；从十七年起，地方自治运动又起。有好些省设立自治筹备处。湖南就是这样，曾设立自治人员训练所，大规模的训练人才，举曾任湖南省长的曾继梧先生为自治筹备处长，从十七年至十八九年约数年之久。又江苏江宁县亦进行地方自治，设立村治育才馆；浙江则设立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凡此皆是从民国十七年开办，不过有的从省来作，有的从县来作。从县作的除江宁县外，还有孙中山先生的家乡——中山县亦办地方自治，定为全国模范县，有大批的款项，派好多党国伟人筹备办理，到了今日，无论从县作的，从省作的，所有地方自治统统失败，所有地方自治机关统统取消了！只听见取消，没听见有人反对取消；取消之后亦无人可惜。如湖南花费二百余万款项，经历数年之久的工夫；毫无成绩，只有取消完事。假若办理地方自治真有好处则必有人

拥护，取消必有人出头反对。现在虽然尚有存在的，如浙江的地方自治专修学校，还有中山模范县不好意思取消，不过都是没有办法，人民很感痛苦。我在《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见本卷——编者）一文中曾详细说到中山县的情形，大家可以参看。现在统起来说，在过去经验上告诉我们，地方自治经多次提倡统统失败！他所办的事情，只不过筹经费，定章程，立机关，派人员，人员虚掷经费即完了！而现在中央又提倡乡长民选，区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但困难多端，与昔日并无分别。这次南京开内政会议，大概就是讨论“地方自治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成功”的问题。我下月将出席该会的专家会议，现在先将我对此问题的意见，向大家讲讲。——

先讲一个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我们说到地方自治，必须注意而不可忘记的是：“地方自治”为一个“团体组织”，要过“团体生活”；实行地方自治，就是实行组织团体来过团体生活。地方自治是一不完全的名词，应是地方团体自治；普通我们说话把团体二字省去了。等到地方自治组织成功，应称为地方自治团体。现在大家不单在字面让忽略“团体”二字，即在事实上进行地方自治时，亦常常忽略了团体本身，而太着意于另一方面，——就是上级官府所委托的事。照例说，地方自治亦应奉行上面的政令，兼办官府的委托；不过大家太着意于此，太着意于国家行政，而忽略了地方自己本身是一团体。如大家一提到地方自治，便想起中国古代的所谓乡，党，州，里……；其实这许多都是自上而下的“编制”，而不是有他自己的“团体组织”。所谓地方自治，必须地方本身是一个团体组织。如一个村庄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团体，而且是有他“自己”的团体组织；若自上面划分范围，名为乡，党……那是编制而非组织。组织是

“主动”的，有“自己”的；编制是“被动”的，“属于人”的。地方自治就国家往下说，是一个编制；而就其本身说，则为一团体组织，实是具有两面的性质。现在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办地方自治时，当然着重在地方团体的自治组织，而其对上之义不居重要地位；即重在团体本身之组织而不重从上而下之编制。组织是有其“自己”的，可以有自己的主义，而且是有生命的，有历史的，有事可进行的，有开展发达可言的；编制却恰好相反。现在大家偏重于其编制一面而忽略其组织本身，则地方自治之失败，乃必然矣。

地方自治之不易推行于中国，其困难即在组织能力，团体生活、为中国社会素所未有。中国民族数千年的生活是“非团体的生活”，其习惯亦是“反团体的习惯”，故无组织能力；地方自治即是团体组织，而组织能力恰为中国所无，这是唯一的困难。地方自治之“自”非指个人而言，实指地方民众；如地方民众不能自成一体，则此“自”乃空洞无物，“自”既没有，则治亦无从治起。必须有“自”始可言“自治”；必须有地方团体，始可言地方自治。吾人今日唯一所苦，即在吾社会没有“自”——团体，亦就无法自治了。

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团体？是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按理说，许多人合在一起，有一共同目标，有秩序的去进行，以求达其目标，就是团体组织了。如果我们去分析的话，则共同目标，大家合起，有秩序，去进行，是必要的四个条件。现在我们于此须加以解释。有两句话是顶重要的：第一句话就是在团体里有秩序的去进行其目标时，必是机关分职；团体中各管各的事，你管这个，他管那个，大家合起来去进行其共同的目标，机关虽分仍为一体，大家分开作事，而所作之事仍为一个，

这就是所谓组织了。第二句话就是团体构成分子，个个必须有其自己的位置。大家要注意团体不是一块东西，一言团体，就显然是多数分子合在一起的；但如多数分子合在一起之后，而即失掉原来每个分子的存在性，那就不成其为团体了。所以团体一面是有共同的结合，一面是在结合里还有构成分子的位置。如共同结合后，止看见团体而看不见分子，就不是团体。这团体的机关分职，与团体结合中不失构成分子的位置，是组织团体顶重要的两个意义。现在举例以明：如同学大家在此组织一个饭团，大家都意在吃饭，就是共同目标；大家合在一起吃饭，就是团结；大家吃饭不起纷扰，就是有秩序，大家吃饭本身，就是进行；大家选举人员管理炊事，就是机关分职；饭质之好坏，饭费之多少，凡吃饭的同学都可发表其自己的意思，就是不失团体构成分子的位置。这一个饭团的组织，就是一种理想的团体标准最进步的团体形式。团体生活，就是团体构成分子的共同生活，他是“活”的、有进行的。在进行中，个个构成分子都可参加意见，所以是活的；如由少数人作主，而多数人不能发表意见，那就失掉了团体的意义。这种团体有活动有进行，分子有位置能说话，就是理想的团体组织。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人类社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而这种理想的团体，至今不但在中国没有实现过，即在文化很高的西洋社会亦没有实现过；只可说是人类此时的团体生活正在往理想进步的组织里进行而已。刚才所说最进步的团体形式，如同学饭团的组织，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因为题目简单，人数较少，又有教育程度，种种条件合在一起，所以就容易成功；反之如题目复杂，人数众多，程度很低，则此理想的最进步的团体形式就不易组成了。我们知道人类生活，最重大最紧要的团体就是国家，而国家的构

成就完全不是按照这种形式；人类历史虽很久，文化虽很高，而国家团体生活，还未作到如是境地。从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国家，都不是由构成分子个个同意而组成的。这句话包含两个意思：（一）即国家的构成，是由强迫来的——不是大家同意的；（二）即国家的构成，是无意识的——不自知的。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组织成功，并没有实现过理想的最进步的方式；不过最进步的方式，虽未实现过，而人类团体生活，的确是往最进步里走。比如西洋近代历史就发生一很显著的走向进步的变化，就是对于国家的组织发生一个崭新的要求，由无意识而变为意识的，由强迫而变为同意的；这就是十八世纪法国卢骚的《民约论》所引起的变化了。《民约论》在西洋国家的变化上，发生很大的影响；西洋国家由封建专制，变到民主共和，其转纽全在此思想之鼓励。《民约论》中说，“人类原有天赋权利，各有自由，不得干涉；但人类不好单独生活，须组织团体，愿意把自己的自由让出，成立国家以管理大家。国家就是这样由民约同意组织成功的”。这个思想虽不合历史事实，却是一个很对理想；让国家由强迫不自知的形式，而进于意识的同意的组织，确是由不进步往进步里走，不过现在仍然没有走到最进步的境地罢了！于此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国家越变成了民治的，则其国家就越成了出于大家同意的有意识的最进步的团体组织。地方亦然，地方越变成了自治的，则此地方越是一个进步的团体组织。团体生活亦是很进步的生活。我们现在可以说到本题了：“地方自治”就是让地方自成一团体，而往前共同生活；象刚才所说有意识的团体生活就是自治，有了团体组织才有自治。现在我们所苦的是没有团体组织，没有自治的“自”，虽有“治”亦属无用；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字，不必注意“治”字；

有了“自”字，自然可以“自治”了。

现在我们可恍然明白地方自治止作“编制”工夫是不行的！因为编制只是让某一地方有所属，乡属于区，区属于县……有所属是使一地方没有“自己”而属于“他”！所以编制不能有“自”，而只有“他”，必有组织才能发生“自己”，才能“自治”。现在政府提倡自治，单作编制工夫是不会有结果的！政府应作促进组织的工夫，站在旁边帮助地方，使自治组织由无而有就对了。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提倡自治，单注重编制的不对；我们尤应知道想要地方自治在中国实现是有顶大的困难，因为地方自治，须要团体组织，而团体生活组织能力，恰为中国一向所无，今欲使其实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提倡地方自治差不多有三十年的历史，而总不成功，为大家所深怪不解；其实应当怪异的，是当初大家把这件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如当初大家认清其困难，而慎重从事，则地方自治，必不能失败到如今日的一无结果也。

现在从事实上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没有组织能力，和缺乏团体生活。所谓“团体”，我们须从两面去观察：一面自团体内部而言必须合而亲切；一面自团体对外而言，必须分有界限。对外不分，对内不合，不能名为团体；具备内合外分的两面，才算一个团体。可是中国人恰缺乏此两面的精神——一面缺乏内部的公共观念，一面缺乏对外的分别界限。例如在人类团体生活中，最容易有分界的，莫如国界；而中国人向来对于国界，就根本模糊不认真。中国从古就是世界主义者，讲天下太平，不与人分家，单单自己国家好了不算完事，世界大同是他的理想，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子。“爱国”二字，在中国系一新的名词，圣人的教训旧日的书籍，完全找不到。从前虽有所谓“忠君爱



国”之说，然所谓国者乃是专指君主而言，并非指国家团体；所以中国人最缺乏国家意识，象西洋人（如法德）国家意识之强，在中国可说完全没有。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国家意识这样薄弱，对外不分，对内不亲呢？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国家太大，象中国这样大的土地，若在西洋，可有二十余国之多。在欧洲是许多小国林立，此疆彼界，历史上彼此常常交战，成为世仇；这样就逼着他们对外不得不分，对内不得不合，遂演成了严密坚强的国家组织。所以欧洲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比如德法二国，世有仇怨，时相戒备，设计国防，预备战争，其中一国如防备稍疏，他国即乘机侵扰，人民即不得安宁；所以他们人民的生活与国家发生密切关系，国家生活在他们人民的生活上占很重要的位置。如把国家观念从法国人或德国人的头脑中抽掉，他们几乎就不能生活的；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生活完全要靠国家来保护的缘故。中国自秦汉以来，差不多都是大一统，国家非常之大，虽有时发生敌国外患，但因地域辽阔，一部分人民纵受摧残，而全体民众，却受不到多大影响；如晋之东迁，宋之南渡，在历史上是不常有的变动，几乎成了例外的样子，所以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疏远不相关联，国家团体存在的必要，人民简直感觉不到。加之人民程度太差，知识低劣，仅能有具体事物观念，缺乏抽象的理解力，国家既是一抽象观念，普通理解力低的人，实不易具有；国境既大，人数又多，国家意识之形成，实为至困难之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甚高，环伺中国的邻国文化都低于中国，没有与中国平等的文化，不易发生敌对竞争的心理；他对于南蛮北狄，东戎西夷，一向即抱鄙视的态度，包含怀柔，不屑与对；对抗的局面不成，国家的界限自不易有。以上是从中国民族对外关系上说明其国家

界限不易发生之由来。

现在再从中国内部以观其国家与人民之关系为如何。从中国过去情形说，人民之于国家实在无多大关系。人民自己过日子找不出那一点必须与国家发生关系，顶多不过是被动的交纳钱粮，消极的打官司而已；此外再找不出什么积极的关系来。这种情形的所以演成是从两面来的：（一）是中国国家向少与外国对抗之势；如上所说欧洲小国林立，互相敌对，互相防备，政府为对外计，对于人民当然持干涉态度，政府之于人民，差不多如军队中总司令之于兵士一样，当国家与国家互相敌对之际，政府对人民不仅持干涉态度，且含有帮助人民的意思，所以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甚为亲切。中国国家既是大一统时候居多，差不多没有什么对外的问题，国家之于人民，既不干涉，亦不帮助，完全放任，听其自生自灭，以消极不扰端拱无为为治，这样人民对于国家当然不会有亲切观念，所以彼此便成一种疏散不相关连的局面。（二）是中国社会内部没有阶级；中国人不但对外没有国家观念，对内亦无阶级意识。“意识”二字，亦可诌为“自觉”；自己觉着这是自己的国家，自己觉着这是自己的阶级，此疆彼界的情形，如欧洲国家意识之强明，阶级对立之严重，在中国完全没有。中国国家的统治力操诸个人的掌握，而不在阶级手里；中国只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这是一向中国政府对于人民不得不采取放任消极之最大原因。假如是阶级统治，则共利害者多，统治力量强，政府对于人民虽强施压迫，人民亦无如之何。中国恰是一人在上，万人在下，只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统治力单弱，不敢压迫人；如其倒行逆施，妄用权力，则叛乱必生，皇帝个人的命运立有发生危险之虞。所以他为自己前途计，一面消极无为，不扰人民；一面开放政权，

与天下士人共之。中国过去的考试制度，给读书人开出向上的机会，人人都可赴考作官；同时在经济制度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工商业因无大机械的发明，生产简单亦甚自由。人人都可自谋出路，单看自己能力如何，因为这种种关系，中国人在社会上的成败升降，是顶容易的，成了一种个人自由竞争的局面。这样就把中国社会给散了，让中国人只有身家观念，读书中状元，经营工商业，辛勤种庄稼，都不过为身家打算，光辉门庭而已！中国从古圣人虽反对私利，而社会组织制度使中国人除了身家观念外，再不能找出什么公共团体连带关系来。或者乡里宗族，多少有连带关系，但亦无若何具体组织以对外；所有人们的活动都属个人，而无共同活动。团体活动在中国从前社会，简直发现不出。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农最为散漫；团体连合，在工商业里还可找到，士农简直没有。可是士农为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分子，因为士人虽然人数很少，但为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是社会的头脑，而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几是农人，人数占最多，所以士农，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分子。中国从前的士人读四书五经，甚为简单，实不需要团体进行；农民种地，顶多一家子去种，或者雇几个人帮忙就行了，更不需要结合大的团体。在中国从前社会实在找不到团体的必要，不但小团体不必要，即大的国家团体亦不必要；不象西洋人没有国家，即不能再往前生活。如法德二国不具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则他国即要侵略烧杀，人民当然无法往前生活——所以国家生活在他们成为一个必要。在中国，国家种族阶级……种种界限都没有；对外不分彼此，不相敌抗；同时内部相互的关系亦不亲切。中国实是一个不分不合的散漫社会，所谓“一盘散沙”正是这种情形绝好的形容语句。他不单是没有组织——自动的团

体组织，且连自上而下的编制亦疏忽。很显明的证据，就是国家不丈量土地，不调查人口，对于自己的土地、人口，完全没有精确的统计；中国数千年来都是这样子，清代更是如此。

中国社会散漫的情形，若从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风尚三面加以考察，更易明白。中国国家对于人民；放任消极，既无组织，又无编制，国家与人民很少发生积极的关系，这是在政治生活上让中国社会不能不散漫的原故。中国以往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人民日常生活用钱向外购买物品的需要很少，点灯的油自己可以榨，穿衣的布自己可以织，吃饭的谷自己可以种，人与人在生活上不发生连带关系，很可以关门过日子，几与老子所说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相仿佛。这与西洋社会比照着看，更为显明；西洋社会经济生活连带关系是很密切的，在一千几百万人的大社会中，大家饮用一个自来水公司的水，点灯用一个电灯公司的电，一旦自来水源发生故障，磨电机械有了损坏，水电断绝供给，社会立刻发生问题。中国社会，与此恰好相反，人人可以闭门生活，没有密切的连带关系；这是在经济生活上让中国社会不能不散漫的原故。现在再从中国社会风尚说明中国社会散漫的原故；个人可以有特殊嗜好，有他最爱讲究的事情；同样社会亦有其风尚，亦有最爱讲究的事情。支配中国数千年人心风俗的无形势力，莫过于儒释道三流派。而儒家在中国社会占最主要的位置，所以中国大多数人爱讲究个人道德，伦理，孝弟，贞节，忠义……凡此皆是个人与个人关系的讲究，如子对父孝，弟对兄悌，妇对夫贞，友对友义……而不是团体生活中分子对整个团体关系的讲究。中国人既好讲究个人伦理道德，便不能不漠然于整个社会团体的关系。况且中国数千年来，表面上固是儒家的教训占最大的势力；可是社

会风尚的骨子里，“黄老无为”的气习，实大过于儒家。黄老派在西汉时就很盛行，到了晋魏之间的清谈派，“无为”的风气就更厉害了；大家既然清谈无为，那里还会有什么团体活动共同生活呢！我们现在再看佛家：儒家重伦理，道家尚无为，佛家更进一层，捷直厌弃红尘，否认人生，要出家当和尚，这么一来，就更无团体活动之可言了！所以团体生活，在中国从前简直是不会有人讲到的。大家的好尚，都是反团体的；则社会安得不散漫呢！这是在社会风尚上让中国社会不能不散漫的原故。

中国过去的政治生活是端拱无为放任消极的，经济生活是自给自足不相关联的，社会风尚是背反团体共同活动的，种种条件凑合成了中国社会的散漫性。近百年来，这个庞大散漫的国家，遇到了与其恰好相反的，特别以团体组织力见长的近代西洋国家，其失败乃是历史之必然！近百年来，西洋文化的战胜，胜于其组织能力；中国民族的失败，败于其散漫无力。中国国家虽地大人多，以其散漫，遂等于无力；散漫无力，实为中国近百年来所以失败的唯一原因！中国旧有的文化，（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亦随着实际上的失败打击，根本动摇破坏，不复能用；时至今日，已不容我们敷衍生活，非根本改弦更张不可了。我曾经说过：“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研读外国书籍，讲究外国道理，有如今日者！”今日中国的情形；为历史上的中国从所未有；对历史上的中国言，实为一根本的变革。历史上的中国，在武力上虽曾经数度失败，而在文化上总占胜利，从未失败；到得今天，我们的文化，遭遇到从所未有的难关，真真是失败了！事实上逼迫着中国人非转变不可，这时代真是中国文化的大转变期。“地方自治”这件事；如果能够成功，正是中国文化大转变期中的一事；因为“地方自治”与从前中国社会

的散漫生活根本相异，完全为一新的方向。文化的大转变何时成功，地方自治的新方向，何时才能踏得上去。文化大转变的何时成功，实是很难说定的事情；政府下命令要地方自治尅期成功，真是谈何容易！中国社会的散漫生活，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素无组织团体的训练习惯；旧有的风习制度虽于二十余年短期中间破坏殆尽，新方向的转变形成岂能于二十余年的短期中间望其实现！“地方自治”我们如看成是一“大的文化转变事业”才算是懂得他的意义；如认为是容易的平常的行政事务，可算是没有懂得今日中国的地方自治问题了。我们上边曾经说过，大家不应怪异地方自治的难于成功，因为假如你认识清楚地方自治是中国文化大转变的一个新方向，那么，你对他的难于成功，就毫不觉其可怪了。

地方自治的难于成功，其原因究竟何在？现在再从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及物质经济加以分析说明。从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去观察，有两个大缺乏点：第一缺乏“纪律习惯”。我们知道纪律在组织与编制二者之中都很重要，组织与编制都是关乎多数人的事情，而多数人有秩序的向一个目标进行，必赖纪律之维持；如无纪律维持，则秩序必乱，事情亦无法进行。所以团体生活，纪律是最重要的条件。中国人最爱随便，缺乏纪律习惯，在社会公众问题上尤其显著；梁任公尝说中国人私德不错，公德不行的意思，即是指没有纪律说的。西洋社会与我们恰好相反，他们的公共生活很有纪律；比如在欧洲的电影院或大戏院，并无警察管理，观众均须按先后次序购票进场，很自然的遵守纪律，不能为自己便利，越次而行。中国人如遇此种场合，那就非争先恐后，一塌糊涂不可了。还有常常听他们留洋学生说，从西洋回国到上海海岸下船，看见乱七八糟的情况，心里必发生一

种奇异的感想，假如外国人初次来中国看见此种情形，必要以为发生了什么特别的故事。中国人之于纪律真是最欠讲究；开会很少秩序；戏园中观众彼此谈话，声音嘈杂，所以戏子就非大声唱不可。团体生活如无纪律，则必发生困难，事情无法进行，这个习惯恰为中国人所无。（我在《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一文中，曾谈及此，大家可以参看）。第二缺乏“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就是多数人在一块商量进行事情的能力。一人作主，不是组织；听人支配，亦非组织；大家商量进行，才算组织。这个能力，亦为中国人所最缺乏。中国近几十年来，渐有团体生活，几十年前，社会上所没有的党派会社，近年成立甚多。但我们如留心去看，所有团体统统组织不好，大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团体分子热心者太热心，冷淡者太冷淡。即在一人，当热心时，总愿意把团体的事情，归他一人支配管理才痛快；如发生问题，心情冷淡，他对于团体事情便不加过问，好歹不管。分子对于团体，应当是参加进去，尽其分子的力量；对于团体事情不能不管，可也不能归一人管。要归一人管，那就是把持，非起纠纷争闹不可了。分子是团体的分子，尽其分子应尽的力量就对了。而中国人不能如此：个人在团体中，热心时，便要把持，心冷时，拂袖而去矣！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一向没有团体生活训练习惯的缘故。还有中国人在团体开会时，自己的主张如通不过，旁人主张，亦不赞成，不服从；团体事情之进行与否，他都可不去理会，甚或故意阻碍团体事务之进行。这都是因为中国人可以离开团体而私自过日子，所以他于团体生活的进行就可以不去积极的注意。若社会上人人非团体事情有进行，则自己不能生活时，就不能如是随便；自己主张虽通不过，亦必服从他人意思去进行团体的事情，进行总较好于不

进行。西洋社会恰是如此。中国社会，一向无团体生活，故服从多数的习惯，组织团体的能力，均极缺乏。中国人在历史上都是关门过日子，很少发生关联公共的事情，就是有了公共的事情，亦全由皇帝宰相出主意解决，老百姓不过被动的听话服从，当顺民而已。中国社会对于“公事”原来即如此，主脑领袖作主命令，多数人民被动顺从；直到现在的乡村仍是这样。乡间的公共事情，如由乡间领袖，或地方官吏拿主意，农民都可听话，事情自易解决。如领袖或长官召集大家开会商议，则大家各具意见，议论纷纷，事情反倒无法施行；此时领袖长官即出主意，亦商量不拢来。这就是因为大家没有组织能力的缘故。组织能力，就是会做团体中分子的能力；中国人不是好自己一人作主，即作顺民听话，所以不会作团体的分子。他一向都是关门生活惯了，现在来过团体生活，多数人在一块商量作事，不能随自己意思爱如何便如何，必须彼此互相照顾，他实没有如此耐烦的能力。如何去作一个团体分子的能力——组织能力，纪律习惯，是中国人素所缺乏的；我们现在要想实现地方自治，国家民治，就必须注意养成新的心理习惯才行。一人新习惯的养成，尚非一朝一夕所能济；现在要让四万万人的大社会，在心理上发生一根本的转变，由被动变为自动，由散漫进于组织，由消极趋于积极，要他尅期成功，真是作梦！以上是就人的习惯能力方面说明要想让中国地方自治成功非作心理培养启发的工夫不可。现在再说物质经济方面：地方自治，不能单靠人心习惯的转变，物质经济的转变亦甚重要；如果经济事实不逼着使人转变，则新纪律习惯新组织能力，亦很难养成。经济是眼前脚下最实在的事实，事实不变，无实际的鞭策逼迫，一切均不易变。中国以前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大家闭门过日子，彼此



在生活上，无连带不可解的关系，所以不能产生连带意识。如在实际上社会发生连带关系，人民不能各自去谋生活时，社会连带意识，自然就会产生（如家庭在经济上有连带关系，故有连带意识）。固然事实上在社会里可以发生连带关系的，不止限于经济一端；而经济确是使社会发生连带关系的重要条件。西洋社会即因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的进步，把人联合在一起了；日用寻常的生活需要（如自来水，电灯，电车，……），都有一个总的预备，大家生活互相连带，关系密切，团体自治的需要乃自然发生。中国社会，事实上不需要团体共同活动，虽去强迫组织，必无成功之理。现在办理地方自治，划乡划区，该乡该区的人本无连带关系，你从上头强行加以区划，认此小范围为一自治团体，那是毫无用处的；必在事实发生具体变化，人与人互相关连需要，团体生活自然形成，地方自治自然可讲了。所以经济的连带关系是很要紧的。现在提倡地方自治，完全忽略此点；不在经济事实上促进大家的连带关系，而只从编制上忙碌区划，这是地方自治失败的一大原因。假若社会上经济进步，关系密切，则此刻地方自治所要进行的公众卫生、交通、教育、皆易办理，而团体生活习惯，亦自易养成。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实须靠物质环境的进步；必须事实逼迫我，非具有此新习惯与新能力，生活就要发生困难，而后新习惯新能力才可养成。现在之地方自治，是被动的，从上面强施，划乡划区，乡民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有积极的目标，没有活动进行，更不会发生连带关系；顶大的结果，不过是行政上或者较为便利而已。

从上面的分析研究，我们知道中国人在心理方面缺乏组织能力与纪律习惯；在物质方面，缺乏经济上的连带关系；无怪

地方自治之困难多端，不易成功！但是我们因为他困难，就不进行了吗？当然是不能这样的！如何促成地方自治，如何使中国人会过团体生活的办法，我们已有研究，此时无暇去讲；现在要讲的是如想促成地方自治，有四点必须注意：

第一新习惯新能力（纪律习惯、组织能力）的养成，必须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如不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必不易养成。此中含义甚多，姑举例以明：中国的旧精神是崇尚情义的，社会的组织构造是伦理本位的；西洋人是讲究权利的，其社会组织构造是个人本位的。团体生活之于中国如有可能，则必从其固有情义之精神以推演，而不能如西洋权利之奔趋以成功。西洋从权利观念出发，故其社会须赖法律以维持；中国从情谊义务出发，故其社会唯赖礼俗以生活。过去数千年的中国恒循由此道以生活，今后我们的社会岂能根本异其途辙？唯有团体生活与团体生活的习惯，组织团体的能力，在中国是新的方向，为前此所无；然而这些无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当然无法单独生活，必须加入社会共同生活，则人与人自然发生关系），吾中国人素重伦理，义以待人，卑以处己，则此问题，苟得其道，解决何难？现在唯一的问题，就在今后我们要过团体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还更加密切，事业进行的交涉接洽更加频繁，所谓行之必有其道，我们究应走那条道路而已。以我们的推断，我们确认中国今后之团体生活，仍须接续中国过去情义礼俗之精神。如不此之图，而欲移植西洋权利法律之治具于此邦，则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团体组织新习惯之养成问题，必永无解决之希望！今之言地方自治者，乃至中央政府之自治法令，相率抄袭西洋之余唾，从权利出发使社会上人与人均成为法律之关系；比之乡间，乡长之于乡众，或乡

众之于乡长，均成为法律之关系。大家一谈地方自治，必云训练民众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其实大家若稍澄清头脑，加以研究，则必发现自己蹈犯重大显明之错误。权与义恰好相反：权是“我能怎么样，你不能把我怎样，我有自由权，你不能干涉我，……”，而义是由情而有；情是对人关切爱惜之意，父之慈爱其子，子之孝养其父，兄之爱护其弟，弟之敬重其兄，朋友之过失相规，乡里之患难相助，……均由彼此相与之情，而有其各自的义务——我对你应如何；不应如何如何，衷心蕴藏深厚热烈之情感。由情而有义，隐然以对方为重；父以子为重，子以父为重，……彼此交相爱重，交相感应，趋于合而不趋于离。西洋社会一切从个人出发，以权利为重，人与人彼此成一对待争持之局面，其情味与此土迥不相同矣。如今日之地方自治法令，乡长与乡民之权各有规定：乡民如不服从乡议会之议决，乡公所之命令，或触犯刑法，乡长即可检举，甚至逮捕送官；乡长如有渎职情事，亦可由乡监察委员会，乡民大会，检举罢免之。凡此皆是抵制对抗的安排，彼此对待手段粗而且硬，并非领导乡民彼此爱惜团结，而是领导乡民打架捣乱。乡监察委员会，如实行检举乡长，则委员与乡长成一对敌之势，乡间公共事务必无法进行。又中国人自爱之情甚重，如全县乡民开会罢免乡长，则此乡长之感情，必受莫大之损伤；将不能一刻居矣。乡长犯法，乡民不加以忠告；乡民有罪，乡长不加以劝戒；径行法律解决。此以检举之法觐彼，彼以罢免之方回敬，互相伤损，毫无情义，此种法令，全从无情义处着眼想办法，使彼此制裁抵抗，而无爱惜尊重之意；乡村社会将沦于纷扰捣乱之局，而永无宁日。所以“四权”实是使人民捣乱打架的工具；西洋行之甚便，中国仿之，只受其毒害而已！这

完全因为中西历史不同，社会组织不同，所以合于彼者未必能适于此也。西洋国家恒有敌国外患相煎迫，故其社会内部。团结力重。大而国家，小而社团，因其团结力强大之故，恒易用团体之力压迫分子，轻忽分子过甚。个人受制于团体者重，屈抑太甚，实不甘心，又加社会事实之变化推演，为抵制团体伸展个性计，所谓“个人自由权”之要求，于是乎生，此其一也；西洋国家为阶级统治，阶级统治之权力，必强且大，同时被压迫阶级之屈抑不得伸亦必更烈，亦缘社会事实之变迁进步，被压迫阶级群起谋有以抵制反抗压迫阶级、统治阶级，于是所谓“个人自由权”之要求，乃更炽，此其二也；西洋社会上面统治力强；团结力重，实为下面人民发生“个人权利”要求之因。大家试留心去看西洋政治制度，其国家组织法或根本法，防备牵掣的意思，大于向前作事的意思。这全由于当初政府压迫人民太甚，人民被迫不得不抵抗政府；政府为大势所迫，亦不得不发生变化；这样争持的结果才产生了这种彼此牵掣平衡（政府有政府的权，人民有人民的权），政治得以推动，社会赖以维持的现代政治制度。于此大家更应注意西洋社会，一面因为他有敌国外患，一面又因为他有团结习惯；故虽上下彼此牵掣抵制，而仍可巩固团结，不致分裂离散。中国社会则不然，中国社会原来就很散漫，所谓中国人无五分钟的热度，无三个人的团体，这话亦许过甚其词；但中国人难于团结合作，乃为人所共知无可讳言之事，而我们今日之唯一所苦，亦就在此。现在推行地方自治，仿用西洋办法实是故使之分！在原来散漫消极向无团结习惯的中国社会而安排西洋制度，使其社会彼此牵掣抵制，本不易合而乃故使之分，非打架捣乱，即成呆定不动之死局矣！此乃势所必然，有非人意所可左右者！西洋制度其尚可行于吾社

会乎！故吾人之意，欲使中国社会有团结组织，欲使中国人民过团体生活，必须发挥中国固有之情义精神，用礼俗维持推动，往前合作。礼有“谦”义“敬”义，人在团体生活中，“谦”以处己，“敬”以待人，互相感召，情义弥笃，则团结合作之路，在中国社会其尚有一线可通可行之曙光乎！如大家仍不觉悟，袭西人机械之法而不知矫正，使吾社会陷溺于“彼此对敌”，“彼此抵制”、“无谦无敬”之粗野境域，为日愈久，受害愈深，那就只有“地方自乱”，非所谓“地方自治”了！吾人旷眼四观现社会受西洋之毒甚深甚深，人贻之乎，自取之乎？今之言地方自治者实不可不一审之也！大家尤应注意者，今后中国社会如不恢复崇尚礼俗之固有精神；处处己，如不出之以谦敬爱惜之情，而仍出之以抵制牵掣之法律态度，取法而遗情，重律而忽礼，则中国问题永无解决之日，中国社会仍无匡复之期矣！何则？法律乃机械的、呆板的、无生机的，呆板机械的办法，行之于中国社会，固无可通之理也。诚然西洋制度有许多长处，吾人必须学以用之；四权原义亦未始不好；但吾人只可如其分际的师取其意思，而不能毫无斟酌的迳行其办法。如于彼我情势不加审察，昧昧焉生强以为之，则组织团结之新习惯，必无法养成，地方自治之失败也，正为应得之果。故欲地方自治成功，新习惯必合于旧精神，此应注意之点一也。

第二我们欲促成地方自治应注意政治与经济天然（注意“天然”二字）要合一。我们上边已经说过，要想地方自治成功，须赖经济进步。经济进步则人无法闭门生活，在经济上必发生连带关系，由连带关系而有连带意识；连带意识发生，地方自治之基础即树立矣。西洋地方自治，是经济进步所促成的，但西洋经济与政治不合一，在经济上走个人本位之路，（财产是个

人的，虽父子夫妇，亦分而不合）人人在经济上自由竞争，不知不觉的，由于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的进步，使个个散开的人发生连带关系，地方自治，因以促成。西洋社会组织团体，共营合作，并非由于先见的有意的安排，而是基于生产技术（如大机械的发明）的进步，生产组织（如大公司，大工厂的创设）的进步，于不知不觉中，使人在生活事实（如坐电车，喝自来水，点电灯……）上，发生了连带关系，即在消费享用一面连到一块，而生产制造一面，则属于个人私有（即资本家）。此时所谓地方自治是某一意义团体的生活，可是在经济上是个人管个人的，穷富甜苦至不均一；这种个人本位自由竞争的经济，他们说是“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所以我说他们经济与政治不合一，在经济组织之外，又有政治的组织。西洋地方自治组织，即是属于政治的组织，中国地方自治如果成功，大概政治与经济天然要行合一。中国地方自治不单为一政治组织，同时犹为一经济组织。本来孙中山先生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上，即有地方自治，政治与经济合一的话；此次南京内政会议邀我出席，他们邮来几个问题，让先研究，其第一问题，即是“如何实现总理遗教中地方自治政治与经济合一的主张”。我们应当知道：地方自治成功与否，政治经济的合一与否，并不是什么主张或理想的问题，须看自然形势以为定；如不看社会自然形势，而只是在主观上理想什么，或主张什么，则此理想与主张就能够成功吗？天下好的理想，妙的主张，多着哩！所以从理想与主张出发，单止想圆满某人的理想，或实现某人的主张，是错误的。“地方自治”，实是天下大事，岂能靠一人之主张，一人之理想，所能成功？必须要注意“天然”形势，其庶几乎！西洋近代经济，是由个人本位自由竞争，因生产技术的进步，不

知不觉的，不期然而然的，让社会发生一种生活上的连带关系，连带意识；地方自治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可是在经济上他们是走个人本位，自由竞争的路，个人只为他自己营谋，不但彼此不相照顾，而且此人之失败反有利于彼人之成功，彼人之成功正有资于此人之失败，形成一种剧烈竞争的局面。再则因为经济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大家只为自己打算，盲目的奔求个人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无总的安排，无总的计划，国家政治，除消极的维持秩序外，在经济上是任人竞争，谁成谁败，谁生谁死，政府一概不管。因此西洋近代经济便发生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生产过剩，价值过低，不便出售，常有销毁之事（美国烧麦之事，报纸常有纪载），一方面生活无法维持，呼求救济者犹盈千盈万，这就是他们所谓经济上无政府状态了。但是一社会中，如在经济上有一总的计划，总的安排，按照此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农业工业能够生产什么，大家需要什么，给他一个总的打算，总的解决，有一个总的脑筋；这样就是有政府的经济，亦就是社会主义了。我们为什么说中国政治经济天然要合一呢？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一自然的形势，使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得不归于合一（自然形势，是最有力的，我们必须看清楚他；即有理想与主张，亦必须合乎自然形势，不然就是空想）。中国社会，自其旧的组织构造崩溃，政体变更，皇帝推倒之后，使原来即患散漫的社会，更加散漫，更无何物足以维系于其间；中国今日最急切的问题，当无逾于新组织构造如何创造开辟的问题。而新组织构造，天然须由乡村从新起手，创造开辟，天然是“乡村自救”。一人一乡村一地方……无法自救，必须散漫之社会，作一广大之团结联合，而后乡村乃可言自救；而团结合作必须从乡村萌芽。乡村无论进行何事；必须有赖于“合

作”，在经济上更是如此。中国如走西洋个人本位自由竞争的路，则中国经济必不能进步，故欲中国经济进步，必“合作”乃可。我们即撇开中国特殊情形而单就普通经济原理立论，欲发达农业，必不能走个人本位自由竞争之路，任何社会皆是如此也。西洋近代经济，由工业而进步，所以能够走个人本位自由竞争之路（即资本主义）；当初西洋经济，若从农业起手，必不能循此路以进步。所谓经济进步，无非是生产技术，与经营组织的进步，此种进步，均从小规模进于大规模，从零碎生产进于大批生产（当然不能说是无限制的大，但大体上总是往大里走；如不是由小而大，经济即不能进步）。这种情形，都是竞争的结果。当竞争时，胜利者吞并失败者的一切，资本由小而大，劳力由散而集，由小规模经营而到大规模，由零碎生产而到大批，都是经过如此的历程而来的。农业进步亦需要大规模的经营，与工业同；但是如走竞争路子，则演成相持之局，无法迳行吞并。个人要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除非在新开垦新拓殖的地方，有其可能；中国立国已久，人口土地分配，无特别悬殊偏畸之病，实无其可能也。农业既不能走竞争吞并的路，其经营复须相当的大规模，则舍农民同意的自觉的“合作”，殆无他途。这就是因为在农业上走个人本位路，得不到由自由竞争而胜利吞并的结果，有如工业者然；故只好让大家自己自动的、有意的去“合作”了。这不单在中国应当如此，农业原理天然要如此的。比如工业国家救济农民除在经济上采取“合作”办法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用；在以农立国的国家如丹麦，更是这样；再如共产主义的俄国，欲在农民社会实现其主义，亦是除领着农民走合作路外，再找不出其他办法（最终目的虽是共产，而起首不得不走“合作”的路）。总之，要想救济农民，或农民自救，



凡关于农业上的问题，非“合作”莫办。合作是大家彼此帮忙，彼此依靠之义；“合作”可以产生一个社会的脑筋，对于经济可以有一总的计划，总的安排，总的解决。由小范围的合作组织，连合成功一个大范围的合作连合，可让社会对于经济有一总计划，按照消费而生产，不含营利的目的；这正是由合作路走到经济上的有政府状态。经济与政治合一，是天然要如此的；因为政府对外代表全国人民，对内统治全国人民，政府是国家的脑筋，现在经济一面如有总计划、有政府、有脑筋，则二者的合一乃是必然的。其所以然，大家亦许不好想象，现再就我对于此事的观测多说几句：大家首先要知道政治与经济的合一，并非骤然可以作到；就是“合作”亦非骤然可以成功——由小范围的合作，逗拢为大范围的总连合，乃至合作程度之由浅而深，均非骤然可以作到。不过我们望见中国经济的方向，是往合作里走；合作渐渐由小而大，由浅而深，往进步里走，乃是理势之所必然。我们前边讲过的“团体生活”，“连带意识”，……在眼前的中国亦很难成功；事实上非有困难问题紧逼着大家，使大家自觉的连合起来自救，同心协力，解决大家本身的问题，连合团结，锻炼出组织能力，纪律习惯，则散漫的中国社会，实无法进于组织，所谓“合作”“团体生活”“地方自治”，均无法使之成功实现。现在中国社会有两个最真切最实在紧逼着中国人非团结不可的问题：就是治安问题，与生计问题。如乡间有土匪扰乱，大家即练红枪会，这就是大家连合起来；解决自己治安问题的团结，这是由于治安发生问题，逼迫着大家非团结自卫自救不可。但武装自卫的团结，并不是培养中国人组织能力的顶合适的路，这样的团体，不容易成功一个顶好的组织，不容易启发中国的民治精神，不容易养成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我

们前边已经说过，所谓组织能力，就是会作团体分子的能力；关于团体公共的事情，天然由分子参加公开商量进行，这就是民治。国家越是民治的，地方越是自治的，则其团体组织越是进步的合适的。反过来说，如国家或地方，越远于民治，则越不是一个合适的团体，或竟不象是一个团体。武装自卫团体既是一种军事的组织，对外有事，天然要求应付敏捷，不容商量，领袖易于独断；对内维持，天然须要纪律严明，不容松散，兵士须要绝对服从；如果不是这样，军事运用必不能灵活，必不能有效。所以在此种武装自卫的团体里，天然容易产生豪强的领袖，不易培养民治的精神，合作组织的能力，团体生活的习惯。只有生计问题，能逼迫着中国人合作，是养成中国人团体生活习惯、合作组织能力的最合适的道路；第一生计问题最切实的，不容淡漠视之；第二生计问题不象军事组织的过于含有“对外性”“临时性”，——武装自卫团体含此性质甚浓，逼人服从领袖，容易产生豪强。生计问题可以很切实的引入过团体生活，会作一个合作社的社员，就会作团体的分子，会作团体分子，就有组织能力。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而引导中国人“合作”，训练中国人使作最好的合作社员（顶关切顶尽心于他的社务，而不独自作主；就是最好的合作社员），是训练中国人会作团体分子的最合适的办法。恐怕要让中国地方自治成功，形成地方自治团体，除“合作”外再无旁路。他恰好一面可以改变中国人的心理习惯，训练培养新的能力；一面因他进步，亦即经济进步，自然的使大家生活问题各方面发生连带关系，在事实上欲分而不得，地方自治，自然随合作的成功而亦成功了！这真是再恰好合适没有了！如与西洋比较，则西洋社会，由散而合，是缘于经济进步，——生产技术进步，经营组织进步，虽在经济上

是个人本位自由竞争各不相谋的，但于不知不觉中，使西洋社会形成连带关系。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是自觉的，有意的走“合作”路，社会连带关系从事实上自然促进的时候，就是经济进步的时候。西洋的团结，是不自知的，中国的“合作”将必是自觉的。中国社会将因解决生计问题而走“合作”路，社会连带关系日趋密切，越往前走，关系越要密切，散漫之病自可随之解决；组织能力在事实上即可受到训练，团体生活不求而得。这样就由经济问题的解决引入政治问题的解决，由经济上的农民合作引入政治上的地方自治，政治与经济自然的合一，地方自治组织，同时亦就是经济组织。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什么主张与理想的问题，而是事实所趋，形势所归，不得不尔。还有应注意的，就是这种事实确非骤然可以作到，不过我们望见终有这样的一日就是了。现在热心提倡地方自治诸公及政府当局，实应该转换眼光，改变用力方向！政府欲促进地方自治，在地方自治本身实无功夫可作，作亦白费力气，倒不如着眼注意农民合作，用力促进农民合作，反可间接收促成地方自治之效。“合作”应当如何促进？实是很重大的待研究问题。现在政府对于地方自治欲收急效，要尅期完成，而完全忽略经济一面，实在是不对的作法。我们可以说，经济不进步，地方自治必无成功之望。必使为公就是为私，为私就是为公，急公好义与为私图利合为一事，则地方自治始可谈也。西洋社会，从其国家生活与阶级利害上，经历长久之训练，个人私事与团体公事，发生密切之关系，拥护公权即所以保障私利，故国民与国家，分子与团体，休戚相关，其势不可一刻分。中国社会，今后果进于团体组织，亦必须公私合一，始可成功。而公私合一最有效最妥当的当然是经济上走“合作”路，由经济问题引入政治问

题，政治与经济合一，则地方自治当然可以完成矣。

第三中国将来无论地方或国家政教天然要合一。中国的政治如脱离了“教”，则必不会有办法的。我们前边所说的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须合于旧精神，政治经济合一，与现在所说的政教合一，三者都与西洋恰好相反，恰好是两条不同的路。中国目前要想地方自治成功，必须经济合作；但无论是经济合作，或地方自治，都必须经过教育的工夫才会有办法。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纪律习惯，科学知识，我们须作启发训练培养的工夫，这些工夫就是教育。如不经过教育功夫，则政治与经济均无办法。人类文化，本来是会不知不觉的往前进步，但中国此时实须要有意的自觉的去改善、补充，促进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一种教育工夫，亦可名之为社会教育，他是要有意的有方向的培养多数人的能力，促成大社会的进步。乡村建设运动，所以与民众教育相似者就因为他是一种领导农民进步的运动。至于我们中国政教何故天然要合一呢？一切事情，何故均须装在教育里去作呢？这个意思如果要研究明白确定须要许多话来讲明。我在“中国问题之解决”一文中，会列举现在国内各党派，对于中国问题之解释；比较研究之后，指明他们对于中国问题都没有认识清楚，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何在，亦来认识确定。同时说明中国问题很特别，与其他社会全不相同，其他国家的问题皆是社会内部问题，革命即内部问题的爆发，且其问题亦很简单，或要求政治上权利平等的民主革命，或要求经济上平等的社会革命，或受外族统治要求民族平等的民族革命，进行题目都很简单。而中国问题则殊为复杂，且非发自内部，而是由外面引发的。中国革命实非社会内部问题暴发，而且问题很复杂，政治、经济、社会……种种问题，实难指明确定问题性质

之所在，只好叫做“文化问题”了。我常用八字说明中国革命问题，即“文化改造，民族自救”。本来问题总不外乎二者，一是社会内部的问题，一是受外族统治的对外问题，（如印度朝鲜之于英国日本）非此即彼，总不外乎二者。我说中国问题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表明他既非社会内部问题（阶级斗争），亦非对外问题（民族斗争）。因为我们并未干脆的被外族统治如印度、朝鲜者然，如我们落到印、鲜的地位，除了与英日拚命斗争外再无其他办法。但我们的问题尚未到此地步，我们受其经济侵略者重，在政治上没有直接受其统治。再者我们此刻的问题非打倒外国人即能解决，中国现在不是急于和外国人拚命而是急于使自己社会进步的问题。所以“民族自救”非对外的民族斗争，非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社会进步的意义。中国问题必如此才可解决。

中国民族几千年来有他自己很特别的文化，且很高深。不过他的文化有一缺点，就是“散漫消极和平无力”，所以虽很高深，而不能与人争强斗胜。创造此文化，代表此文化的汉族，在战争时常常失败，屡次被外族武力征服，但是汉族虽常被外力征服，而征服他的外族在结果上却每每被汉族同化。外族武力征服我们是一时的，我们文化同化他们却是永久的，最后胜利总归我们。这是一种文化的胜利。这种高深而和平无力的文化，传递绵延数千年而颠仆不破；其他民族文化皆可毁灭，而我们的文化则独否。可是到了近百年来，世界交通，东西相遇，我们所遇见的外国人亦有很高的文化，与往昔中国人所遇到的外族，如蒙古，满洲，突厥等完全不能相比，他们的文化都低于中国，而此次所遇到的外族，——西洋人，其文化与中国比较，究竟谁高谁低，实不敢说；但可说此二个文化是很不相同的，而

不能说人家的文化低于我们。当这两个很不相同的文化相遇，中国文化的弱点（和平无力散漫消极）完全显露出来，社会的一切无不根本动摇；不单打仗失败，外交软弱，而且文化自信力亦根本失掉，自己不敢信任自己。从前中国被满洲人武力征服，但在文化上依旧自信，而不把满人看在眼里。这次与西洋人会面，文化根本动摇，完全不同往昔。往昔只有外国人跟中国走，念中国书，讲中国道理；而此次中国却跟外国人走，念外国书，讲外国道理；这就是表明中国文化的根本动摇，旧社会组织、构造、风俗习惯、乃至一切文物制度，均被破坏而崩溃了。所以此刻的中国问题，只是新文化的建造开辟问题，或者是旧文化的补充改造问题；既非对外敌对，亦非内部冲突，而只是我们社会自己生长进步的文化问题。我们既然认识清楚中国问题的性质，那么我们现在应当有意的认准方向，赶紧去作推进社会的工夫；此工夫亦即教育工夫。中国此时一切应兴应革的事业，均须放在教育里去作。此所谓教育非以个人为对象，而是以社会为对象，所以是社会教育。我们在前面曾说地方自治与经济合作均须养成新习惯新能力，而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显然就是教育工夫；这就是说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则中国问题才可解决。但此义尚浅，我们还须有进一层的阐明。我们刚才所说“教”的意思，较为宽泛，识文字、学技艺、求知识都算教育。而真正严格去说，则政教合一之“教”范围甚狭，他是特别指“关乎人生思想行为之指点教训”而言；再明白点说，政教合一之“教”；差不多就是道德问题。在其他过去历史上的民族，“道德”一事常归宗教包办，故我们政教合一之“教”与宗教有关，可包宗教。但在中国从来“教”与宗教没有关系（宗教与“教”在中国本即无甚关系）。此政教合一之“教”乃道德问题，

名之为教育或宗教两不合适，“教化”二字庶几近之；故所谓政教合一，即政治教化合一也。

我们上边曾说中国地方自治有四个应注意之点，而此四点与西洋恰好相反，非出诸故意，乃天然如此。中国政教，天然要合一。而西洋政治与教化分，法律与道德分，其所以然是因西洋当团体生活进步时，团体须尊重个人——团体构成分子；换言之，就是个人不承认团体过分的干涉他的自由，所谓过分的干涉，是指超过了大家公事的范围而干涉到个人的私事而言。在西洋公与私的疆界划的很清楚，团体大家的“公事”大家商量作主办理；与团体或他人无关系的“私事”就由个人自己作主，国家与任何人皆不得干涉（此即所谓“个人自由权”）。西洋近代法律不是中国古人眼中的有规矩管束之义的法律，而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不让别人或国家来侵犯的。西洋所谓犯法是妨碍大家及国家团体的秩序，如此国家就得干涉，此时警察与检察官代表国家为原告，犯法的人为被告，逮捕后由法官来审判治罪。这是刑事，国家不许人妨碍团体秩序，所以才这样作。如系关乎个人的交涉、债务的事情，则为民事诉讼；人民彼此互相争讼，由国家来审判，保障个人私权。但事情于团体或别人毫无妨碍，单是个人自己的事，无论怎样不道德，国家团体或他人均不能管，因为是个人的自由，别人不得干涉。这是西洋近代的法律思想。法律与道德是完全分开的。在清末时，因受西洋法律思想的影响，政府要修订法律，发生一新旧争论。比方寡婢与侄和奸；按中国旧法律判断，要凌迟处死；而按西洋法律判断，则未犯罪，——因他二人愿意，未妨碍团体或别人，所以就不得干涉治罪（但叔如生存而有此事，则应治罪，因侵及夫权也）。可是在中国旧日法律与道德不分，对于这种事情，

当然感到不合适，目为逆伦，不能承认。二者意思不同，出发着眼点不同，结果差别很大。大概西洋国家在近代因讲究不干涉个人，故法律与道德分，政治与宗教分。个人信教自由，思想行为，无碍于人，则人不得干涉。国家尊重人民，团体尊重分子，为西洋近代的民主精神，很有道理，我们不全反对。不过他的出发着眼点不同；法律与道德分开，若用之于中国，老实不客气地说，是完全不行的。这里边有很大的原故，大家必须注意。就是从人类有历史直到现在，国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无意识的组成，目标并不甚清楚。但当它正在进行组织成功的时候，隐然有他奔求趋赴的目标存在；我们从旁观察自可看出。我们现在可以说西洋人是为满足欲望而组织国家。西洋人对于人生的观念与我们不同，他看人生是欲望的人生；人生天然有许多欲望，满足这许多欲望人生之义就算尽了。所谓尊重个人自由就是尊重个人欲望。国家一面消极的保护个人的欲望，不妨碍个人的欲望，一面还积极的为大家谋福利，帮助个人满足欲望。故西洋政治可谓“欲望政治”。组织国家是为满足欲望的。我们知道所有的国家，都是不知不觉演成的，而中国今后却要有意地组织团体，自动的合作，自觉的团结生活。但组织团体必须有一明白切实的目标，而后团体始有进行，组织始可成功。我们现在讲地方自治，就是让中国人自动的组织团体。但组织团体要干甚么？自动的组织团体要从那里动起？如果单单拿一个谋生存满欲望的意思来作组织团体的目标，而欲从此处让中国人自动的如何如何，实在打不动中国人的真心，拔不出中国人的真劲！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人，——中国古人，已经提出一个更高更深更强的要求，此要求比谋生存满欲望的要求更高更深更强，此要求即所谓“义理”之要求是也。中国人所读的四



书，完全讲究此理。他把穿衣吃饭生活放在第二层：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不求安饱而求安饱以上的；如“就有道而正焉”，作人作事正诸有道以求其“对”；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所忧不在他而在“此”。此要求比图生存谋福利的要求更高更深，在人心深处有其根据。当人类尚未觉悟及此，从浅处引动或可有效。但他既已觉悟深处高处，今从浅处动之，实动不了，即动亦发不出真力量，无真力而动，恐亦只成一如北平俗语所为“糊笼局”而已。所以如不从人生向上之义来打动中国人的真心，引发中国人的真劲，则中国地方自治，必不能成功，组织国家亦无希望。这全因真心不动，真力不出，则无论进行任何事业必不会有丝毫结果。反之如要使中国人组织团体，只有靠引发中国人的真精神以担当之；而真精神之引发，又非单从图生存满欲望所能济。故在中国如公私分清，则团体组织不成，政治与道德分开，则国家组织亦不能成功。而且组织国家非先提出标明道德与法律合一不可。如此的团体生活不单是图生存过日子而且还有领导大家向上学好之意。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众人之事”，那只是西洋政治的“的解”；中国未来的团体生活将不但管众人之事，而且寓有人生向上互相勉励之义——就是政教合一（把众人生存的要求，与向上的要求合而为一）。再具体明白的说，如中国宋代蓝田吕氏乡约，就是从此意出发。他的乡约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团体生活，大家连合起来，在方方面面如经济治安……种种事情均行合作；但大家相勉向上则居第一义。他的乡约共有四条：（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这是一种乡村组织，中国地方自治大概是要这样的。可是现在我们要问如此的组织是在干什么呢？他标的很明白，是要干德业相劝，过

失相规的；这个团体很特别，在西洋是找不到的。西洋恐怕只有宗教政治经济的团体，而没有这样的组织。乡约是大家自动的相勉于人生向上之途（这在西洋是很新鲜的），在此相勉向上之时即含有互相照顾之义。为我们生活的方便计，种种合作，如防卫匪患，组织仓库……有其必要时即进行合作。自卫就是政治组织，仓库就是经济组织，无论政治或经济均行放在乡约的组织里，此组织只好叫他为“教学的组织”。政治，经济，教化，三者合一炉而共治之。而教化实居首位。此政治经济教化三者合一之组织，乍听之仿佛是一很高的理想，其实不然，在此刻谁要想到乡村去使乡村进步，他非让乡民连合共同努力不可；而让乡民连合努力，如政治经济教化三者不合一则事情必作不通。现在乡间最急切的事情，是整顿人心，与革除陋风弊俗。乡间的不良分子如在根本上无办法则乡村事业实无法进行。可是对乡村不良分子必须按照中国办法，以情义相感，方可感化；如靠法律制裁，则必归无效。在中国自治团体组织里，从爱惜关切之情，对乡村不良分子，加以劝导管教，则他慢慢可以学好；可是这与西洋尊重个人自由的道理就完全不合了。如禁止缠足，按西洋法律道理讲，则人尽可自由缠足，他人不得干涉，国家不得过问。所以革除弊风陋俗，必须由教学组织从情义出发，勉其向上才行。若以法律干涉，则不合法律的道理。再则弊风恶俗问题即靠法律亦解决不了；如鸦片，海洛因，金丹、吗啡，……等毒品，靠法律或警察来查禁，在都市或可发生些许影响，可是在乡村就无许多警察去查，禁止更不可能。这必须用“教”的办法，从爱惜的意思出发，使大家自动的禁绝，则此问题算有解决的可能。此教的工夫必须由团体去作，而此团体又必是教化政治经济三者合一的团体。这并不是什么高的理想，事实形

势所趋必然这样。

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现在所讲的与西洋恰好相反，但我们果真与西洋毫无相同之点么？我们经过长久深刻的研究观察，才发现我们所讲的正合乎西洋最新的趋势，最新的道理，真是巧妙之至！如西洋近代政治经济分开，可是现在正有要求合一的倾向；西洋近代政治不主张干涉个人自由，可是如缠足吸毒品……自己残毁自己，自己不爱惜自己的事情，在西洋新法学道理亦主张干涉。西洋近代法律思想是个人本位、权利观念的，最新的法学思想是社会本位，义务观念的。此种思想上的变动，关系很大；以前讲个人应有什么权利，现在讲个人应有什么义务。社会本位以社会为重，个人本位以个人为重。现在的新法学虽亦讲尊重个人自由，但讲的意思与前不同。国家所以尊重个人自由，是要让个人充分发展自己的才性与可能；如果个人不爱惜自己残毁自己时，国家就要加以干涉。因为如仍让你自由，与尊重个人让你自己充分发展自己的愿意，就不相符合了。从这一点上可以见出我们政教合一的主张，与西洋新法学思想是很相合的。本来西洋近代政治上，有两大精神：一是尊重个人自由，一是服从多数，二者均为中国所无。中国一切事在过去历史上均是由皇帝或皇帝代表者作主，人民大家常居被动地位。西洋关于多数人的事情，大家共同作主，一切均靠“多数表决”，无论选举或其他事，均服从多数。所以西洋近代政治，又叫“多数政治”。刚才说过如尊重个人自由，公私界限划清，则政教不得合一。现在我们还可以说若服从多数，政教亦不能合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是众人之事，而众人之中糊涂人常居多数，贤智者寥寥无几，现在政治上的服从多数，无异是让“贤智者跟着糊涂人走”；而从“教”来说则应让“多数人跟着贤智者

走”，二者恰相刺谬。所以说服从多数，则政教是不能合一的。不过在事实上我们政教合一的要求——服从多数、尊重贤智二者合一的要求，与西洋最新的政治学说，很有符合相似之处。西洋最近流行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叫做“专家政治”。政治问题的解决，尊重专家或学者的意见，不必服从多数。西洋科学发达，所以尊重智者（学者专门家）。中国人看重德行，所以尊重贤者。尊重贤智与服从多数，在西洋政治上将要融会变化，慢慢合一，而在中国政治上一向即富于尊重贤智之精神，今后社会团体生活发达，则政教二者天然趋于合一。

我在前边已经对大家讲过，人类历史到现在所有的国家团体都是强迫构成的，都是于无意识中不知不觉的组织成功。中国未来的团体生活恰好是要有意的自觉的出乎自然要求，而不是强迫的，中国将来如能组织国家则将非强迫所可成功，而是自觉的意识的自然的渐渐演成，开一历史之新例。因为是出乎自然的要求，非可强迫的，所以他缺乏强制力，须多靠精神力——精神感召力。如多靠强制力，那还是法律统制的局面；而社会等到不靠法律的强制力来统制的时候，那就非靠“礼俗”来维持不可了。礼俗是自然慢慢演成的，法律是强制造成的。西洋近代社会，完全靠法律统制，一刻都离不开。历史上的中国人，本靠礼俗生活，而离法律远甚。今后中国仍然要走礼俗的路，他天然不会变到法律的路。所以此刻的中国问题唯在新礼俗的如何创造开辟，而绝不是由礼俗维持再变到法律维持的问题。

法律的事。所以只有失败，没有成功。今后大家如不彻底觉悟，改变方向，而仍靠法律来推行地方自治，结果仍然是要失败的。所以我敢断言，中国地方自治；要想成功，必须从礼俗出发，进行组织。而礼俗的地方自治组织，亦就是情谊的、伦理的，与教学的地方自治组织——政治与经济，统属于教学的组织之中，而教学居于首位。这就是政治经济与教化三者合一之地方自治组织。

第四中国地方自治，不是普通的地方自治，而是特别的地方自救。原来“地方自治”一句话，是对国家的行政而言，——地方二字，是对中央说，在民主政治的国家里，国家尊重地方的意思（仿佛尊重个人自由似的），让出一部分权归诸地方，使地方有“权”去作他自己的事情；不必由中央政府来直接行政；管理地方的事情。国家让出权来使地方按照地方自己的情形与可能，商量作主进行自己的事情要比国家来直接处理或者更为便利，更为良好。所以地方自治是这样由国权演下来的，是先有国家最高权，而后分出地方自治的“权”。中国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形。中国的地方自治，不但不是由国家演出，而倒要先从小范围开手来建设国家。普通是先有国家，后有地方自治。中国恰好是要倒转过来，先从小范围组织慢慢联合扩大，最后成功一个国家组织。认真说来，中国现在，很不象一个真正的国家，因为国家的基本责任在维持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国家须一面防御外侮（侵略土地，杀人放火）一面镇压内部变乱，必须外人不来侵略，内部一切事情均有轨道，均按法律礼俗来解决进行，才算是有序的国家，或真正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国家一切事情均靠武力解决，而不循轨道，成功一种群雄割据的局面，那就不是国家了。所以武力军权，必

须统一，只许国家操有，甚至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权，亦须统属于国家之手，不许微有分割，而后国家秩序始可维持。如武力不统一，那就只有扰乱了。我曾对大家说“现在中国破坏乡村最大的是政治的力量。而政治力所以破坏乡村，是由于政权多的缘故。政权多的背后是武力多，武力多则凡操有武力者彼此戒备防范，招兵，买枪，筹饷，无不需大批钱财。这大批钱财只有从乡民身上剥削压榨。这是军阀平时对乡村所施的破坏。一旦操有武力者彼此决裂冲突，实行开战，对于乡村的破坏更大（如此时的四川）。武力多，政权多，对于乡村的破坏是必然的，不容逃避的。所以此时乡村无法再靠政权，只有乡村自救了。现在湖北江西等处政府提倡人民自办保卫团，人民自己可以有武力，这等于政府宣布“政府不能维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人民自己保卫自己罢！”政府对于最低限度的维持治安责任都放弃了，还能为人民谋福利么？所以中国的地方自治不是地方自治，而是地方自救。——“地方”二字非对待中央，乃小范围之意；“自治”二字，实是自救之义。这个事实的真确非诬，从各地方自己可以有武力一点就完全证明了。

这个世界万国所无的地方自治，实非政府所能力，天然是一社会文化运动。中国此刻最高唯一的国家权力尚未树立起来，所以地方自治无法由上推演（上指政府），而须从下往上生长，由小往大开展，慢慢建设新的国家。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想从乡村自救运动、社会文化运动，慢慢来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贤明的政府当局假若从旁帮助我们的社会文化运动，那就是尽了他促成地方自治的最好责任。要知道政府如不帮助乡村自救，如不促进乡村建设，那就只有破坏乡村，摧残乡村了。天下事固每每如此，非建设即破坏，非建设方向即相反的破坏方

向，故政府实应觉悟及此也。

现在我们应当结束了。中国文化运动由乡村起手，慢慢由小往大开展，从下往上生长，经过长久的培养演进，文化运动必可成功。那时的中国，名之为国家可也，不名之为国家亦可也。人类历史在今日以前，国家与社会分而为二；在今日以后，国家与社会将合而为一。好象社会生长发育，国家自然没有了；名为社会尚属合适，名为国家不甚相符。一切国家均将如此，而中国独先成功。这是人类历史演进自然的变化，将来事实归趋必是如此，而在目前却是一个最新的理想。

《乡村建设论文集》第一集，155—196页，

1934年11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

《山东民众教育月刊》，4卷9期。

1933年11月25日。

## 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

邹平的乡村工作，是以乡农学校来进行。乡农学校就相当于江南一带的乡村改进会，或农村改进区；也相当于北方定县的平民学校。不过都不很相同。故略说明于下：

我们的办法，是在相当大小范围的乡村社会（二百户以上五百户以下的村落自然成一范围者为最相当）以内，成立乡农学校。在成立之初，必须先成立乡农学校校董会。因为在乡间倡办此事，非先得乡村领袖的同意与帮助，就无法作起。此好比平教会要成立平民学校，先联络地方人士成立某地平教促进分会一样。校董人选，起先须放宽些；例如不识字的人，亦可作校董。数目不必一定，五人乃至十余人都可。由校董会公聘当地知识较开明、品行较端正者作校长。校董与校长在乡间比较是有信用有力量的人；他们如肯出头提倡，学生就很容易召集。所谓学生，就是当地的全民众。不过初入手时，范围不能太宽；应先以成年农民为学生。至于教员一人或二人就是我们作乡村运动的人来充当了。学校的组织，大概如此。

于此要注意看：乡农学校即是以此小范围乡村社会而组织成的，同时乡农学校所作的工夫，还即以此乡村社会作对象。乡农学校的组成分子，就是此全村社会的人。我们的目的是要化社会为学校，可称之为“社会学校化”。在此简单组织中，我们已看见此乡农学校的构成成分，有三种人：一是乡村领袖；二



是成年农民。此二种人即此乡村社会的重要成分，故先从他们入手，使他们在此形式的名义下联合起来，造成一种共同向上的关系。因为我们学校的宗旨，是谋个人的和社会的向上进步。第三种人就是乡村运动者。如果没有乡村运动者，就不能发生向上的作用与进步的意义。乡村运动者于此可算一新的成分。所谓新成分不一定是外来的人之意，他亦许是本地人，不过要知道他是代表一个新意思新运动而来的。他在此乡农学校或乡村社会中所以是新的成分，就是因为他怀抱着志愿要来更新这社会的。这三种人在这样的名义形式关系上（校长、校董、教员、学生）能联成一气，就可以发生作用，就可以让乡村社会活起来。

我们试加说明：在一乡村社会中，他们的乡村领袖不一定常常见面。就是彼与此、此与彼常常见面，也不一定是大家聚合。就是聚合，也不一定同多数民众一齐聚合。我们办乡农学校的第一个用意，就是使乡村领袖与民众因此多有聚合的机会。在平常的时候，没有聚合的机会，有什么困难的问题，只是心里苦闷，各自在家里为难叹气。现在聚合了，就可将他们共同的困难问题拿出来互相讨论，相向而叹气。自然就可以促他们认识他们共同的不幸命运，促他们自觉必须大家合力来解决。如匪患、兵祸、天旱、时疫、粮贱、捐重、烟赌盛行等，见面的时候，最易谈到。谈到以后，自然就要设法解决，因此或许就能发生大作用。假使他们不十分聚合时，我们的教员（乡村运动者）要设法从中作吸引的工夫、撮合的工夫，使他们聚合。假使他们虽聚合而谈不到问题上，则我们要提引问题，促使讨论。假使他们虽谈到问题，而想不出解决之道，将付之一叹的时候，我们要指示出一条道路，贡献一个办法，或彼此两相磋商研究

出一个办法。因为单使他们设法，往往没法可设；单是我们出主意，又往往不能切合实际而可行。现在我们要与他们合在一气，则想出的办法或能合用也。我们不但帮助他想办法，我们还要引发鼓舞激励他们的兴趣意志，如此则乡村可以活起来。

中国近百年史，原可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国际与国内的两重压迫，天灾与人祸的两种摧毁，使得乡村命运，益沉沦而就死。如此严重的压迫与摧毁，在知识短浅而又零散单弱的农人或农家有什么办法呢？非我们（知识分子作乡村运动者）使他们发生公共观念，教他们大家合起来如何解决问题不可。合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力量，然后乡村才可以起死回生。此力量所作的事，所解决的问题越多，则越能增厚而开拓出去。如此则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求，便是乡村人有自觉有组织的来自救。所以我们的运动，实在就是乡村自救运动。

以上所说的“大家聚合”、“讨论问题”、“想出办法”、“发生作用”等等，都必须先从平淡处入手，别有日常的工夫可作，然后才能慢慢作到此效果。若想急切的径直发生作用，那一定不行。所谓平淡入手日常工夫者，是指乡校中识字、唱歌、讲话等功课而言。乡校功课约可分为两大类：

甲、各乡校同有的功课：如识字，这是普通都有的功课，因各地农民多是不识字的，所以成为普遍的必要。又如我们正在试验而尚未作好的，如音乐唱歌，亦是各校一律宜用的。还有一种我们以为重要的，就是精神讲话。这门功课很有它的意义，在我们看现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不止是经济破产，精神方面亦同样破产。这是指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此其所以然：（一）是因我们文化或社会生活的变化太厉害。

农业社会照例是最保守的，尤其是老文化的中国乡村社会有它传之数千年而不变的道德观念。自近百年来与西洋交通以后，因为受国际竞争的打击，世界潮流的影响，乃不能不变。最近二十余年更激烈急剧的变化，或由上层而达下层，如变法维新革命等是；或由沿江、沿海而达内地，如一切生活习惯等是。而最后的影响都是达到农村。他们被迫的随着大家变，却不能了解为何要变，并且亦追赶不上，但又没有拒绝否认的勇气与判断。失去了社会上的价值判断，是非好歹漫无衡准，即有心人亦且窘闷无主。（二）是几十年来天灾人祸连续不断，他们精神上实在支撑不了。消沉寡趣，儿无乐生之心，况复进取之心？此种心理如不能加以转移开导，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则一切事业，都没法进行。这种工夫就是我们的精神讲话。大概起初要先顺着他的心理，以稳定他的意志，将中国的旧道理巩固他们的自信力。如此则我们与农民的心理感情才可以沟通融洽。然后再输入新的知识道理来改革从前不适用的一切，以适应现在的世界。乡农学校的普通功课，差不多就是如此。

乙、各乡校不必相同的功课：各乡校事实上必须应付它的环境来解决问题，才能发生我们所希望的作用与效果；故须自有它因时因地制宜的功课。例如有匪患的地方，他们自要感觉到讨论到匪患问题，我们的教员就可以帮助他们想办法。大家都赞同一个办法以后，就可以领导着农民实地去作。例如成立自卫组织，作自卫训练，这就是此时此地乡校的功课。再如山地可以造林，我们的教员要指点出来使他们注意，并且帮助他们想办法，象邹平西南部即多山，问他们本地人为何不种树？他们说：“种树有好处，我们都知道；但种树容易，保护难，总不能长成材。”然研究商讨的结果，要大家合起来有组织的共同造

林，共同保护，就可以解决这困难。当这去实行的时候，就是此地乡校的功课。邹平第二、三区一带地方，所成立之林业公会，不下数十处，皆乡农学校所倡导也。又如产棉区域，我们要帮助他们选用好的种子，指导种植方法，然后再指导他们组织运销合作社。这一切都是我们乡校的功课。因此乡农学校可以随时成立种种短期的职业补习班或讲习班，在实地作时就与他们讲解，如种棉、造林、织布、养蚕、烘茧等等。又因此可以随宜成立种种组织，如林业公会、机织合作、棉花运销合作、储蓄会、禁赌等等数不尽。

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乡农学校的用意。我们要干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总结起来，就是“推动（或推进）社会，组织乡村”。我们一向认定此刻中国顶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进步的问题。并且要注意，此进步必须为有方向的向前进。原来人是活的，社会亦是活的，自能进步的，无待你推他而后进。但是中国的全社会，此刻是陷于矛盾扰乱之中；再就基本的乡村社会说，又是入于沉滞不动枯窘就死的地步，所以不是摧残进步妨碍进步的，便是疲顽不进的。此时非认明白一合适方向把定往前作，不能宁息纷乱；非作推动工夫、领导工夫，将必不能进步。但要作推进领导的工夫，又必须先加点组织，使它有自体，然后方好着手。因为我们是推动它进步，而不是替代它进步。所以要在使乡村人有自觉有点组织，仿佛成为有生命的一点萌芽，这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如何组织呢？如刚才所说乡农学校的组织便是。然即此简单的组织，又非加推引工夫不能成功。可以说，“非组不能推；非推不能组”。“推进社会，组织乡村”，两句话是循环的。更要知道：有一点组织，就有一点力量，亦就能有一点进步；有一点进步，便增一点力量，

亦就更促进组织之发展。愈有组织愈有进步；愈有进步愈有组织。最有组织的社会，就是理想中最进步的社会。这两面亦是循环的；并且是一回事。

以下要声明叙述的，就是乡农学校不是一个零碎设置的，此乡校与彼乡校是要有联络的；更重要的是乡校之上须有一个大的团体或机关来指导提携他们的进行。这就是说乡校里边的教员（乡村运动者）不是孤单的，他是大的团体分派出去负着使命作新的运动的。——也或者在作乡村运动以后乃与大团体取得联络——如果不这样则他的工作不易进行，就是进行也进行不好。这有两点原因：（一）乡村所遇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一人不是万能的，如不与大团体取得联络为他的后盾，则一人的能力来不及。所以必须得到后方的帮助，他才可以帮助农民。各地乡校教员，仿佛是到前线的士兵，许多材料与方法，都需后方大本营的传递供给；乃至人员的调遣与支配，皆需后方有作主脑的总机关才行。（二）如没有此大团体或总机关恐怕他们作推进社会的工夫，没有一定的方向。这个向东，那个向西，乱七八糟，即无效率。必须有总机关高高在上，望着前面确定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指挥着去作，才能应付得当，而不致散乱走错路向。

以上所说的“推进社会，组织乡村”的工作，我们拿来与其他相近似的工作相比较，则更容易明白我们的意义。有两种与我们相近似的工作：

一，已往革命工作中的农民运动；

二，近年教育界里新兴的乡村教育与民众教育运动。

（一）已往的革命工作中的农民运动，据我在广东看见的农民协会和农团军，名为国民党的组织而实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南

北各省后来都有这种工作。在某一点上说是与我们相同的，就是要农民自觉、有组织而发生力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但从另一点上看是不相同的。他们的农民运动是在乡村社会里首先作一种分化的工夫，使乡村社会成为分离对抗的形势。在乡村社会之内就发生斗争。我们则看乡村社会的内部，虽然不是全没有问题，然而乡村外面问题更严重；——就是整个乡村的破坏，所以我们现在必须看乡村是一个整个的。至少我们中国社会的多数乡村，是必须如此看法。我们要求整个乡村社会的改善与进步，故我们所作的工夫，是积极的、培养的、建设的，而他们是消极的、破坏的。我曾见毛泽东分析广东乡村社会为八个阶级，只其中低级之三、四阶级准他加入农民协会，其余些人不准加入。划的界限非常严。农民又武装起来，为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团；与绅士们领导的民团，彼此之间，就发生冲突。在花县一带地方曾有过大规模的战争。现在我只说到不同为止，而不评论他的是非优劣。因为我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解释与估量，与他们不同。此问题太大，须专文说明。（二）近几年来从教育界的觉悟发生了一个新的风气，就是乡村教育与民众教育运动。现在南北各地都很盛行，政府当局也很提倡，如乡村师范与农民教育馆设立之众多，都是这种风气的表现。这种运动与我们颇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积极建设乡村，改善农民生活。但在另一点上看也可说不相同。他们比较的缺乏一根本的注意——要农民自觉有组织发生力量而解决自身问题的注意；不免枝枝节节的帮助农民，给他一点好处。尤其是政府所提倡的农民教育馆之类不免如此。可以说恰好我们与革命工作中的农民运动相同的一点，恰好也就是革命工作中的农民运动所缺乏的一点；他们都各站两极端，而我们居中间兼而有之。从

这比较中就可以明白我们的工作。故我们的运动，不称农民运动，而称乡村运动；不称乡村教育，而称乡村建设。但最好是称乡村自救运动。乡村自救运动这一名词，既可以表现乡村的整个性；又可以表现工作积极的建设性；更重要的是表现靠乡村自身的意思。因为近百年来乡村在国际与国内两重破坏之下，更无可依靠，天然的逼成乡村自救。从现在许多省份要乡村武装保卫自己，就完全可以证明这句话。

或者我们亦可以这样说：必须乡村自救为本。——这就是必须乡村自救，而后才能去救他之意。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乡下人的，如一切农业试验机关，都愿意将它改良农业的方法以及好种子、好材料推广给农民。但如乡下人自己没组织、没办法，在人家就很难帮得上忙，在自己也难接受人家的帮助。又如现在的银行界，都很愿意将都市过剩的资金出贷给农民。一则资金可得流通活动，一则希望农民借着它的资金恢复生产，直接间接都于他有好处。但都因为乡下人没组织，没法子得到这种帮助。只有极少数地方（如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各县，本院在邹平，金陵大学在乌江等例），乡下人因得指导略有组织，银行界才得投资，实在微乎其微。似这两边不得接头，实在很苦。国内的政治势力、国际的经济势力，固然都是破坏乡村的；而其实政府机关乃至外国人，也有许多愿意帮助农民的。除江西、湖北等地方政府正在竭力想救济农村不说外，我最近在南京看见卫生署的工作，对于社会公共卫生很有许多筹划，如果乡村有自觉有组织便可得到许多好处。至于外国人的帮忙，定县的平教工作全靠国外募款就是一个好例。总之，外面有许多好机缘给乡村，但都必须以乡村人的自觉、乡村人有组织为根本，才能得到这许多的帮助。

大体上说，总括来说，我们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就是如此了。要往详细分析里说，还有许多话，现在都不说。但邹平等二十余县所举办的乡农学校都有高级部；这一点尚须略说几句，因为以上不曾提到高级部。以上所说本来是以成年农民为学生的普通部。但也声明过，乡校入手不得不从乡村重要成分的成年农民下工夫。但这只是一个入手处。我们的工夫是以整个社会的全民众为对象的，我们为完成推进社会的工作，应当在乡校中逐渐分设许多部或班。如就年龄的分别可以设儿童部、少年部等；就性别可以设妇女部等是。高级部则是就着求学的程度不同而分设的；——是要以受过四年、五年以上教育的青年为学生。但这样的学生在小范围的乡村社会中不易多得，所以高级部的设立必须在较大范围的乡村社会，如一区或十几个乡村才行。这样的学生我们希望造就他成为乡村事业的干部人才。因为一切乡村事业的举办，无不需大家合作成立一种组织，才得进行；而在一切的组织中，多数民众固然是不可少的成分，但如果没有一二或二三较有头脑的干部人才，则此组织亦不能成功。在乡间曾受过几年教育的青年，正好作此种人选的预备。高级部设立的意义大概如此。他们的功课着重史地与农村问题。史地是让他们明白历史的变迁，而有自己所处时代地位的自觉。农村问题是让他们从眼前身受种种问题，往深处认识之，了解之。非明白历史的变迁，必不会应付现在的环境而创造未来的前途。非从深处认识问题，就不知道问题的来历，得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这两件事皆非一般粗笨的农民所能谈到的。我们只能够领导曾经受过教育的乡村青年，向此目标去求了解。同时养成他作乡村事业的技术也是必要的。因为较进步的事业都要有技术的训练；而技术的训练也天然要施



之于少数人，天然要施之于青年。——这便是乡农学校的高级部。

我所说的的大约是许多原则；事实上也有与此相出入的地方；或正在向此方向进行而未能作到的地方。

录自《乡村建设论文集》，130—140页，

1934年8月，乡村书店。

《梁漱溟教育文集》，137—147页，

1987年8月，江苏教育出版社。

《乡村建设》，2卷16期，

1933年1月1日。

## 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时时在刺激我们，问题的杂多，问题的严重，可以说无过于今日的中国社会了。所以随处都可以看见社会上人们在诅咒，在笑骂，在愤激，在悲叹，在相对无言，在议论纷纷，在搓手无计，在东撞西突。此时最需要有见识有眼光的人出来指点，来分析，来说明，使众人晓然这些问题的所从来和如何的关系，亦就从而望到问题解决的前途，——这正是研究学问、富有见闻、具有头脑的人之责任。然而我竟很少看见有人能尽这责任；——这又是多么危险的事！

如果我们觉得这样没头脑胡乱下去的危险可怕，我们应当赶快用心来研究社会问题。我这劝大家研究社会问题的话，不独为众人言，抑并为有学问有见闻的人言之。我今借这机会，愿向国内有学问的先生进一言。

我近日抽空将平津出版的杂志如《独立评论》《再生》杂志《国闻周报》等翻阅一下，使我感触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亦欠研究。如何得谓有研究呢？就是他识得问题不是简单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复杂相关的，有所从来的；他不轻言问题的解决法，而深刻用心于问题的认识。而他们诸先生正好不能如此，不客气地说，正是缺欠研究精神。例如《再生杂志》的张君勱先生等，《独立评论》的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国闻周报》的马季廉、吴前溪先生等都在提出一种解决中国问

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在这些方案或出路中，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其究有多大见诸实行的机运乃寄于没把握的偶然。更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试问这算于社会问题有研究么？

比如《再生》第二期上张君勱先生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提出要求于军人者四条：

“第一，不论中央军人与地方军人，应一律去职，今后之总司令，由国民代表公举，地方军人由政府任命。

第二，内战中之和与战，应取决于国民代表。

第三，军队之增加一兵一马，应经国民代表同意而后执行。

第四，现役军人除在师部旅部训练军队外，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

又提出关于政党者七条：

“第一，国民党以政权还诸国人，退为普通政党之一。

第二，凡信仰民主国体，有党纲而行动公开之政团，皆得参与国政。

第三，政府改为举国一致之国防政府，由各党共同组织之。

第四，今日要务，不外裁兵平匪，振兴实业，廓〔扩〕充教育诸大端，由国民代表议决一种五年以内之行政大纲，交由政府执行之。

第五，每一年或数年之终，由国民代表推举人员检定行政成绩；如有不合于政府对人民所宣言者，应使关系部之部长辞职。此外不可轻易更迭政府。

第六，政策由国民代表公决，自得平和公正之旨，不

至稍涉偏激，而引起各党间之仇视。

第七，各党根据以上条件，实行各党间之息争，以期全国一致从事于建设事业。”

所有以上共十一条的要求如何可以达于实现呢？张先生则以为是在“大家一齐放手”。原文如次：

“或者曰：如君所提二端，一以杜军人干政之源，一以平各党相仇之气，必如是而可以语夫宪政之建设，诚哉然矣；然所以责望于今日之军人与党人者，不亦太过其分乎？君言而真能实现者，必彼等尽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圣贤而后可焉。应之曰：吾固知吾言为书生之见，为理想之言。然要知今后国政之解决不外二途：一曰理性的，一曰非理性的。理性的云者，即上文所述大家一齐放手之方法也。”

张先生说这是唯一理性的解决之道。除此便只有非理性的解决；但他不相信全国四万万同胞尽为非理性的政治动物！（原文“虽然，吾不信全国四万万之同胞尽为非理性的政治动物也”，）在我们看张先生一味逞其主观的要求，而将历史深远关系复杂的偌大中国政治问题之解决，期之于大家一转念间，真是太没理性！假使中国问题果如张先生期望而解决，那中国社会便是个没理性的社会！那宇宙间将无复有事理可讲！然而终究中国社会远不曾没理性；空落得张先生独擅他之所谓“理性”！

此外张先生所提出关于政治的国家民主政治论，关于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论，虽自号“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实乃无一非主观自己作梦，我们很难寻见其从客观事实用心的来路，而如何见诸实行，在张先生又复托之于主观。如他论宪政：

“革命者，取得政权之手段也；施行宪政者，政府人

民共同履行约束也。能革命者于大功告成后开放政权，自守法而责人民以守法。若财政之出入，若军队之增加，一一听诸人民监督；而政府绝不以人民指摘为忤。大军人以身作则，小军人孰敢不从？则不出数年宪政之习惯自然养成”（《再生》第2期21页）。

又如他泛论政治制度：

“一国之政治制度，所以发端而能持久者，有两大要件焉：一曰主持之诚意，二曰培养之时间。所以立国，不能无政治制度，负推行此制度之责任者，则为政府。”（《再生》2期2页）

我们真没想到天下有以这样的主观论来观察社会制度的！照这样什么社会学，社会史都不用研究了！

丁文江、胡适之诸先生似乎与张先生尚非一派；然而亦一样地是这“请愿式”的政论。虽然是“科学派”而依然不出乎一些主观的要求与希望。全不见他们如何观察事实，了解社会的变迁，从客观上得到解决问题的线索。《国闻周报》马季廉先生虽与丁、胡两先生彼此批评辩论，但在我们看依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能追根问题所从来而把握到问题将从何去的；没有一个能深察中国社会所由沉沦，而确见有转机在那里，抓着要紧处用力，恒久不懈以赴之；大都是感受问题的刺激而脑海转了一花，藉着没气力的侥幸心，说了一篇没关紧要的话，有人听便算，没有人听便罢！假如偌大中国问题靠这样便得解决，那真有些“神”了！所以他们自己亦有些信不及，试看：

丁先生说“……这是我认为我们政治上的出路。纵然我们的能力知识环境不能使我们有个人的成功，至少我们不至因欲为善而反造孽；至少我们可以得到自己良心上的

安慰”。（《独立评论》第11号）

胡先生说：“我想在一种积极的建设的有益于国家民族的目标之下，应该可以产生一个有计划有力量的政治大组合。”又“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建国的大目标之下，把中国的知识、技术、职业的人才组织起来，也许就是中国政治的一条出路罢？”（《独立评论》第17号）

马先生说：“作者提出的不敢说是一种中国政治的出路，但不失为漆黑一团的今日，比较勉强可以实行的办法；退一万步说，这种办法实是利多害少，倒不妨试验一下！”（《国闻周报》第9卷第32期）

我敢正告大家说，社会问题都没有简单的、偶然的。何况中国问题更是许多复杂微妙相关的问题，是有深远历史所从来问题，他的出路将只有天造地设的一条路，一毫出入不得（就因为他关系太多太微妙，所从来者太远）。你们果真于此有所见而后乃可以说话。这岂是猜一猜，碰一碰的事；什么“有益无损，且尽我心”，“倒不妨试一试”，真是笑话无聊！国事临到今日，亦要请诸位先生赶快醒一醒罢！

我很承认诸位先生之发念用心都是可敬的。必要有好人好心什么事才有办法，亦是我十分认识的。象吴前溪先生的“如何救中国”？全在有政府，而好政府又在有好领袖人物的答案；我亦承认他确是“数十年想救国的痛苦经验上得到的简单结果，老老实实地说出来。”但我们须知道，这好人好心的一类主观条件原无多可说；要紧的是客观上的指点。客观上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些勉励教训的话或主观的要求梦想，有什么用呢！吴先生自叹“这十年中我们介绍的救国文章与方案不少；但是这内忧外患却比十年前更加严重；同人费了十年心力，于救国事

业有什么相干”！诚然有什么相干呢！如果心力还是这样用法，管保再十年亦不相干呀！

心力要用在研究社会问题上。诸位先生对于问题，简直有些不去探索，仅在问题本身上说来说去的；比如马季廉先生论《中国政治如何能上轨道》：

“中国政治何以不上轨道？可归纳为下列几种原因：

- （一）纪纲废弛，法律荡然；
- （二）权力乱用，威信扫地，
- （三）领袖言行，轻率浮夸，
- （四）风俗颓废，制裁丧失。

在我们看“政治不上轨道”与“纪纲废弛，法律荡然”似乎是一个问题的两句说法。我们若说：法律何以废弛失效？原因在政治不上轨道，不亦可以么？但这样说来说去有何意味？试再看马先生的下文：

“作者不揣冒昧提出如何使中国政治上走上轨道的办法数条，试行讨论使中国政治走上轨道的步骤：

第一，励行法治，整饬纪纲，……。

第二，善用权力，树立威信，……。

如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照前数下去；每条又分析为几点言之，但内容还是一样意思。全文末后结语云“苟能照此办法作去，中国政治或有走上轨道的一线希望。”我们觉得马先生太谦了！岂但“或有”，简直“一定”；岂但“一线希望”，简直“十分做到家”！因为“苟能照此”的“此”，原即政治的上轨道也。所苦的我们到底还没有明白为什么中国政治不上轨道？又如何乃能上轨道？

象这样的说话，说了等于没有说；不说还好些，说了更糊涂！我请还是研究研究问题，待认识得问题之所从来，认识得问题之如何复杂相关系（不是简单的、偶然的、孤立的），再来

说话。本来中国社会问题有些难研究，他非复普通一般国家的社会问题；——他超越这范围。一般国家不过是在根本秩序下有些零碎问题（如失业问题等）；而中国现在则根本整个不成国家，几于返于野蛮没文化的世界的一大问题。

丁先生胡先生张先生都是我以前熟识而敬重的朋友；上面的话冒犯太过，但我之为此，非对个人而发。我愿在见面时领受教斥！

录自《乡村建设论文集》（第一集），37—47页，

1934年10月再版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

《村治》，3卷4期，1933年3月25日。

《大公报》（天津），1933年2月15日。



## 乡村建设理论提纲<sup>〔1〕</sup>

### 一、乡建理论一科与其他科目之不同

在本院功课中，其他科目大抵为乡村建设的方法；唯此则阐明乡村建设之根本意义，指示目标。

### 二、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甲 浅言之，起于中国乡村的破坏；即是救济乡村运动。

总计破坏乡村的力量有三：

1. 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征等；
2. 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之经济侵略等；
3. 文化属性的破坏力——礼俗风尚之改变等。

而三者又相连环，辗转影响加紧加重其破坏。

中国近百年史即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

1. 前大半期，顺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中国乡村。
2. 后小半期，又由反近代都市文明的潮流学西洋而破坏中

---

〔1〕此提纲在《乡村建设》旬刊刊出时，文末写有“（未完）”字样。

国乡村。

乙 进一层言之，是起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

三大破坏力以文化居先而政治最大。因破坏不外两面：国内的与国外的，国内的固当由政治负责，即国际的侵略，其责亦在政治。政治于乡村为害为益可分为四层：

1. 为益于乡村的政治——人类未来文化乃得有此。从来所谓政治，无不有剥削在内，无非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者，尤不利于乡村。

2. 为害为益均甚少的政治——此指中国旧日不扰民的政治。所谓政治大抵均为阶级统治，而旧日中国独不然，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演成消极无为之局，遂得如此。

3. 为害乡村较大的政治——此谓封建阶级统治下之政治，其剥削最甚；资本阶级下的政治，其妨碍乡村最甚。然为一个统治力，究有秩序，故犹有保全。

4. 为害最大的政治——此谓今日中国之政治，统治力为多个的，无复法律秩序，但有一往不顾之破坏。每个统治力各顾自己，乃绝不稍顾惜乡村；乡村如此，乃纯落于被牺牲地位。

例如河南镇平等地方非靠自己保卫不可，乃至乡村自卫的讲求成普遍风气，皆不得不自救之表征。

丙 进而言第三层，是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乡建运动即我民族社会的新建设运动。但其他国家之建设未闻必为乡村；即如日本亦为东方农国，其自维新以来之建设固未尝为乡村建设；中国建设何为而必于乡村求之？

a, 从过去言之，中国未能如日本之走上近代工商业路；此

其原因可分两面：

1. 国内情势不同之比较：日本皇室万世一系，尊王为新空气；中国皇室则为外族，排满是旧仇怨。使中国当时非外族必较好，或外族而新入主中华尤好。但均非是，故满洲皇室不能不倒而中国政治制度顿然随以一同倒废。全中国社会无复可以尽维系作用之政治中心。且日本维新与复古同时，借旧精神吸收新文化，借新朝气维系旧系统。政治有办法，故经济有办法，于是走上近代工商业之路，而模仿成近代都市文明。中国则政治无办法，一切无办法，走入破坏之路，无建设可能。

2. 国际情势不同之比较：日本维新距今六十年，其时（1）欧洲国家正在侵略澳非等洲，尚未集中力量进攻东亚，故所受外力压迫较松缓；（2）科学技术不逮今日进步，因而所受威胁亦较小，追步西洋亦易；（3）正当追步西洋之际，适欧战爆发，予日本以发达工商业之最好机缘。凡此较好情势，中国均错过，未得利用。

b. 自今后言之，中国将永久不能如日本之走上近代工商业路；其故：

1. 近代工商业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已走入反资本主义阶段。

2. 近代工商业为私人各自营谋而不相顾的，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趋势；在今日国际间盛行倾销政策下威胁太大，亦无发展余地。

3. 近代工商业路所需要政治条件（政府能安定秩序并保护奖励）在我亦不具有。

或又问：日本之近代式建设不可学，何不为现在式之建设如苏

俄？在技术进步国际威胁最大之今日，言经济建设诚无逾苏俄所走之路；但其所需政治条件乃更大，为我所不具。

在各不同国度内，经济建设之所取径，将一视其政治条件（政治环境）为转移决定，今后中国政治所从出之途适与苏俄相反，而为作始于救济乡村、乡村自救之乡村运动所构成特殊形态之政治，因而中国之经济建设乃必为乡村建设。此政治的理由俟后自详；兹且言其经济的理由。

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今日国际大势（1）技术与经营组织猛进，有所谓产业合理化，生产过剩向外倾销。（2）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趋势日见。（3）着眼于有以自给，农业与工业并重；极力拒守，关税壁垒益严。中国承兹影响，土货出口惨遭排斥；外货入口转见激增，农业工业相率凋落，将来设有产业复兴之机，其势亦断非求市场于外国者。而国内连年以来农村破坏已成普遍现象，以致资金偏集二三大埠，内地悉就涸竭，全国金融滞而不通，产业乃益从而凋落。此时唯一关键要在：

（1）使内地农村能利用外埠过剩资金以恢复生产，增进生产，因而增进一般购买力以促兴民族工业，而后工业乃至一切产业以次可兴。（2）使外埠屯集之资金得进输于内地农村，以冀农产原料之增加而输出，工制品及工具之需要而输入，俾资金环转流通而后全国金融可以活泼流通而不滞。

更分条言之：

a，中国农产有基础，而工业没有；恢复农业生产当较与兴起工业生产为简便迅捷，——例如眼前如何求米麦棉花之有以抵代外货；即最要着，亦最有可能者也。

b, 农业生产所需要件为土地, 在我为现成; 而工业生产所需要件为机器, 适我所缺, 工业后进国例必以农产出口易机器而后工业可兴, 不能先从工业入手也。

c, 农业技术比较许我徐图进步。

d, 在农业技术前进程中, 工业自相缘相引而俱来。如因农业化学而引起之工业, 因农业机械或工程而引起之工业, 因农产制造而引起之工业等。

e, 在农业前进程中, 农民购买力增加, 许多工业乃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

f, 如是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 农业工业叠为推引, 而产业乃日进无疆。

盖中国图兴产业于世界产业技术大进之后, 自己手工业农村破坏之余, 外无市场, 内无资本, 舍从其社会自身辗转为生产力购买力之递增外, 更有何道? 是即所谓必由复兴农村入手者已。

丁 进而言其第四层, 今日中国问题在其数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 而新者未立; 乡建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建设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此为其真意义所在。当知:

(一) 中国社会日趋破坏, 向下沉沦, 在此大势中, 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所得单独解决, 故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 意在为整个社会之建设, 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二) 此社会向下破坏沉沦之所由致, 主要在其内部之矛盾冲突; 而此矛盾冲突则为外界潮流国际竞争所引发。以内部矛盾而社会组织构造崩溃; 以组织构造崩溃而矛盾冲突益烈, 如是辗转无已。于此际也, 若不能把握其矛盾所在而条理之, 转移之, 唯茫然泛然求好求进步, 或求一部分进步, 某方面之好, 乃盲目全无头脑者之所为。乡村建

设初非泛然求社会进步，盖将以转移社会大势，启其向上进步之机，而求有一新组织构造之开展出现。新组织构造有一点萌芽而社会有一分进步；社会进步一分而新社会构造乃益开出；如是辗转无已，而新社会建设成功。

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一时一地之社会必有其所为组织构造者形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是即其社会之秩序也。于此一时一地，循之由之则治，违之离之则乱，是在古人谓曰治道。中国此时盖其社会组织构造根本崩溃，法制礼俗悉被否认，夙昔治道已失，而任何一秩序建立不成之时也。处此局中者，或牵制牴牾，有力而莫能施，或纷纭扰攘，力皆唐捐；或矛盾冲突，用力愈勤而受害愈大；总之，各方面或各人其力不相顺益而相防碍，所成不抵所毁其进不逮其退。外国侵略虽为患，而所患不在外国侵略；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民穷财尽虽可忧，而所忧不在民穷财尽；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生息长养不难日起有功也。识得问题所在，则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谈。

（三）欲明乡村建设所以重建新组织构造，开出新治道之理，且先言中国旧社会之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

（甲）在昔西洋以个人直接教会，今以个人直接国家。尤以近世来个人主义盛行，遂形成一个人本位的社会，既不胜其弊，乃翻转来企图改造成一社会本位的社会。旧日中国社会于此二者皆无所似，乃若以伦理为本位者。人生必有其相关系之人，此即天伦；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此即伦理。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

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谊所在，义务生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近世之西洋人反是，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试从社会经济政治三方面征之：

1. 社会方面——于人生各种关系中，家乃其天然基本关系，故又为根本所重，谓人必亲其所亲也。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其悲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依以为慰，是所谓亲也。人生之美满非他，即此家庭关系之无缺憾；反之，人生之大不幸非他，亦即于此种关系有缺憾。鰥寡孤独人生之最苦，谓曰无告，疾苦穷难不得就所亲而诉之也。此其情盖与西洋风气不孤而孤之（亲子异居有父母而如无父母），不独而独之（有子女而如无子女），不期于相守而期与相离，又乐为婚姻关系之不固定者，迥异矣。由是而家庭与宗族在中国人生上占极重要位置，乃至亲戚乡党亦为所重。习俗又以家庭骨肉之谊准推于其他，如师徒东伙邻右社会上一切朋友同侪，或比于父子之关系，或比于兄弟之关系，情义益以重。举凡社会习俗国家法律，持以与西洋较，在我莫不寓有人与人相与之情者，在彼恒出以人与人相对之势。社会秩序所为维持，在彼殆必恃乎法律，在我则敬重于礼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力；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

2. 经济方面——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

族间有分财之义务；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讷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在。西洋则夫妇异财，其他无论。在西洋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亦非社会本位的，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

3. 政治方面——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又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以视西洋近代之自由主义的宪法，在政治上又见出其个人本位与国家相对待者又适不同。

(乙)在昔西洋社会以贵族与农奴阶级对立；今以资本家与劳工阶级对立。中国社会于此二者亦无所似。若称西洋为阶级对立的社会，则中国殆可云职业分立的社会。所谓阶级对立者，以其社会中生产工具，生产工作，分属于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不任生产工作（贵族、资本家）；一部分人为役于生产工作而不能自有其生产工具（农奴、劳工）；遂成彼此对立之势。所谓职业分立之社会不然，生产工具无为一部分人所垄断之形势，殆人人得而有之，以自行其生产，一一各为生业，分途并进，对立之势不成。其所以致此者有三：

1. 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2. 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
3. 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

由前二因而土地之垄断如封建社会者不成；由后二因而工业资本之垄断如资本社会者不成。经济上无垄断，则政权之垄



断亦不能有。此即官吏贵族分开两事，而以考试制度取官吏之制也。政权之相对的公开，许人人得有机会参预其事，乃更以减免经济上之垄断趋势，而稳固此职业社会焉。

（丙）此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二者，又交相为用，和互相成。例如经济上之伦理本位大足以减杀经济上之自由竞争而分其集中之势；消极不使趋于阶级对立，即是积极助成职业分立。同时此职业分立的小农小工小商，恰好以家庭经营为宜，使其夫妇父子兄弟益感生活上相依为命之情，而巩固其伦理。又职业分立各有前途可求，富贵贫贱升沉无定，由是有家世门祚观念，或追念祖先，或期望儿孙，使人倍笃于伦理而益勤于其业。（未完）

录自《乡村建设论文集》（三版），83—92页，

1936年2月25日，乡村书店。

《乡村建设》旬刊，2卷22、23期合刊，

1933年3月11日。

《村治》，3卷5期，1933年8月1日。

## 乡村建设是什么？

“乡村建设”一词现在已很流行；但其内容意义如何，则人多有望文生义，不免误解者。最显著的例，如在《教育与民众》4卷8期上张宗麟先生所提出的七个问题。他问到：“在今日的中国是否需要乡村建设？去年大熟，农民依旧没吃，……所以乡村建设成功以后，是否于农民有真正利益，倒是一个大疑问。”又问到：“乡村建设究为着什么人？大多数的银行家特派专员注意农村建设。……表面上看来，好象为着农民；实际上好比喂养肥猪，不是为着猪，而是为着吃猪肉的人。”虽末后结论上他还是肯定的赞同乡村建设；却是从他话里面，见出他已经错解了乡村建设。其意若以为乡村建设只是一种农村生产之增加，富力之增加而已。照他的意思讲下去，则遗误何堪设想，不能不提出来一一为申明解答。

一般人对于乡村建设，常容易犯两种误解：一、误解为一乡一邑小范围的事业；二、误解为经济一面的事业。张君的误解差不多就是误解乡村建设为片面的经济事业，同时第一点误解亦连带在内。乡村建设当然包括增加农村的生产与富力的意思；乡村建设当然是建设在乡村。不过，就看成是这样子，实在太狭隘。狭隘本来不能算错，但是如此狭义的乡村建设，为事理上所不可通的，也是事实上不可能的，因此便不能不说为错误。

我们要知道，整个中国社会现在日趋破坏，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所得单独解决。局部的乡村建设如何可能！即如破坏乡村的力量很多，而以眼前中国的政治为最大破坏力。但是政治的影响又是哪一处局部的乡村所能逃的呢？假设因为中国政权分裂的方便，或有局部的地方，其政治情况较好，但又如何能够逃得出那无远弗届，无微不至的经济影响呢？譬如邹平一县，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后，在政治上所受不良影响当然可以减少；但是，丝业恐慌，棉花价低，粮食跌价等等影响，是遮拦不住的。所以凡以为乡村建设是小范围的事，是从局部来解决问题者，都是错的。同样道理，片面的从任何一方面求乡村建设，亦为不可能。生产增加，不单是经济技术一面的事，乃与经济上各种问题皆有不可离的关系。富力增加，亦不单是经济一面的事，乃与社会各种问题皆有不可离的关系。所以乡村建设天然包含着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否则乡村建设即为不可能。那种事理所不容有的说法，当然是错的。粗略言之，与生产技术进步，最有关系者，是农民合作组织之发达，而合作组织之发达，天然有农民教育程度增高、农民势力强大等等事实包含在内。事实上农民且将成为中国之主人翁，如何会成为张先生所说的被宰割的肥猪呢。我可以断定地说，这只猪或者他将饿死而不能肥；但是他如果能肥的时候，亦一定是他变成人的时候。此其所以然，一面是有一般的理由，一面是有今日中国特殊的理由。若看清今日中国社会的情势，认明今日中国问题的性质，就可以知道它必定如此。

我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乡村建设理论”，曾经分浅深四层来说：

一、乡村建设运动起于中国乡村的破坏，即是救济乡村运

动。

二、进一层言之，起于中国乡村受政治的影响，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

三、乡村建设运动是应乎积极建设之要求，为我民族社会的新建设运动。

四、进一层言之，今日中国问题在其数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欲谈建设，应从建设一新组织构造谈起；乡村建设运动实为从新建设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之运动。

乡村建设真意义实在第四层。我曾有几句话说明此意，引录于次：

“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一时一地之社会必有其所为组织构造者，形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是即其社会秩序也。于此一时一地，循之由之则治，违之离之则乱，是在古人谓曰治道。中国此时盖其社会组织构造根本崩溃，法制礼俗悉被否认，夙昔治道已失，而任何一秩序建立不成之时也。处此局中者，或牵掣牴牾，有力而莫能施；或纷纭扰攘，力皆唐捐；或矛盾冲突，用力愈勤而损害愈大。总之，各方面或各人，其力不相顺益而相妨碍，所成不抵所毁，其进不逮其退。外国侵略虽为患，而所患不在外国侵略；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民穷财尽虽可忧，而所忧不在民穷财尽；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生息长养不难日起有功也。识得问题所在，则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谈！”

既然是建设范围在整个社会，而不止于乡村，何为而名之曰乡村建设？要解决的问题既于社会各种问题无所不包，何为而名之曰乡村运动？此有三点可说：

一、此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从乡村入手；

二、此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赖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

三、此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的完成，在实现政治重心经济重心都植在乡村的一个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

关于此意，我曾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旨趣书》上说过几句话：

“我们要认清我们的题目，握定我们的纲领。题目便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其纲领则在如何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乡村是个小单位社会，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皆天然要造端于此的；一切果从这里建造起来，便大致不差。恰好乡村经济建设要走“合作”的路，那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组织，由是而政治亦自形成为民主的。那么，所谓富与权操于人人，更于是确立。现在所急的，是如何遵着这原则以培起乡村经济力量、乡村政治力量；这培起乡村力量的工夫，谓之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起乡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质；而作用显现要在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质，促进组织者，都是我们要作的。然力量非可由外铄；乡村建设之事，虽政府可以作，社会团体可以作，必皆以本地人自作为归”。

昨天看见报上行政院汪院长的谈话，有“政府深切感觉中

国最急要之事无逾建设；建设中最急要者，尤当以农村复兴为中心”等语。其大体意思自是很对。可是我们要借此申明一句话：中国现在南北东西上下大小的政府，其自身皆为直接破坏乡村的力量。这并非政府愿意如此实在它已陷于铁一般的形势中，避免不得。乡村建设的事，不但不能靠它，并且以它作个引导都不行。乡村建设天然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要靠知识分子来引导，要靠乡村自身为主力。政府最贤明的政策，是间接的与这种运动以种种的方便，而助成其事，却不是政府包揽负责来作。——此固为社会形势所不许，事实上无论如何不会有的。社会一般人如只以此期望政府，便是增加乡村的破坏。政府如果真这样负责直接来作，便增添政治的纷扰并且扰乱社会。我们祝望政府当局有此自觉，而善用他的力量！

——22年7月7日

录自《乡村建设论文集》（第一集），71—75页，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1934年11月再版本。

《乡村建设》旬刊，2卷30期，1933年5月21日。

##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县政建设实验区 邹平县实验计划(摘录)

1933年7月研究院划定邹平与菏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邹平的实验计划全文约四万余字。其目录如下：

绪言

计划大纲

一、关于县行政组织、自治组织及社会改进机关之计划

甲项——关于县行政机关之计划

乙项——关于下级自治组织之计划

丙项——社会改进机关之设置

二、关于改组警卫团及充实民众武力之计划

三、关于诉讼事件之计划

四、关于省税收县乡财政之计划

五、关于设置金融机关之计划

六、关于教育之改进计划

七、关于农林畜牧水利道路工艺之计划

八、关于合作社之进行计划

1934年著者之《乡村建设论文集》仅收此计划之“一”中甲、乙、丙三项的部分条目，其余部分均略去。

现亦照此摘录如后。

——编者

(上略)

(五) 查现行法令，以区公所为县之下级佐治机关；区以下之乡镇公所，亦均受上级政府委任而执行国家省县之行政事务；所有此等行政组织，参照本计划大纲乙项计划各条之规定一律废除之。

(六) 向来由区公所办理之事务，参照本计划乙项计划所计划的乡，又丙项计划所设立之乡学各办法，由县政府委任各该乡学之常务学董一人，为该乡之乡理事，负其责任；于必要时，并得增委其他学董为助理员，以协助之。在乡学尚未组织就绪之地方，其原有之乡镇长，仍应负责；其责任之解除，应候县政府之训令。

(七) 向来由乡镇公所办理之行政事务，参照本计划大纲乙项计划所计划之村，又丙项计划所设立之村学各办法，由县政府委任各该村学之常务学董一人，为该村之村理事，负其责任；于必要时，得增委其他学董为助理员，以协助之。在前项所称之村学，未及成立之村庄，依惯例，以庄长负其责任。

(八) 乡理事、村理事、乡助理员、村助理员，任期各一年。村理事、乡助理员、村助理员，均为无给职；乡理事薪给，由县政府所发各该乡学之补助金内支出之。

(九) 乡理事，村理事，为办理文书会计等事，得委嘱各该乡学或村学之职员学生等为之兼理；其办公各费，均归各该乡学或村学一并开支。

其他参照乙项计划丙项计划之规定。

乙项——关于下级自治组织之计划



(一) 查本县自民国二十年，依照中央暨本省现行地方自治各法规，为地方自治之筹备进行，于下级自治，已粗具表面组织。现除尚未进行事项，不必进行外，所有划编之 7 个区，157 乡镇，应一律废止之；其各区乡镇公所，监察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应一律撤消之；惟已编成之各间邻，得归入新区划之组织，除有必要，勿庸变更。

(二) 县以下之自治组织，定为乡、村、间、邻，四级。按照本县户口、自然地势、社会习惯等情形，除城区外，划分为十四乡，冠以第一、第二等次序；其区划如下：

第一乡 原第二区韩家坊、碑楼庄、韦家庄等村庄属之，以韩家坊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二乡 原第二区青阳店、董家庄、西阿陀第村庄属之；以青阳店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三乡 以第二区三官庙、石家庄、上下娄等村庄属之；以三官庙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四乡，原第三区南谿庄、见埠庄、柳泉庄等村庄属之；以南谿庄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五乡 原第三区黄山前、七里铺、东范庄等村庄属之；以黄山前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六乡 原第四区小店、崔家庄、言礼庄等村庄属之；以小店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七乡 原第四区韩家店、尚家庄、马庄等村庄属之；以韩家店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八乡 原第五区明家集、兰芝里、许家道口等村庄属之；以明家集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九乡 原第五区辛梁镇、田家、大碾等村庄属之；以

辛梁镇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十乡 原第五区崖镇、孙家庄、刘聚桥等村庄属之；以崖镇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十一乡 原第六区王伍庄、孙家镇、霍家坡等村庄属之；以王伍庄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十二乡 原第六区辉里庄、党里庄、东郭庄等村庄属之；以辉里庄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十三乡 原第七区前后石门、杏行、东南四庄等村庄属之，以石门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第十四乡 原第七区花沟、榆林庄、龙虎庄等村庄属之；以花沟为乡学所在地，其四界另定之。

(三) 乡以下为村；村之区划及命名，以从其旧贯为原则，而重新厘定之。

(四) 乡村各自治区划确定后，现在且不成立其正式自治组织。所有各该乡村自治事务，参照本计划大纲丙项社会改进机关之实验计划，以各该乡学村学因应机宜试为进行之；——期于从事实上逐渐发展其地方团体生活，养成其公民组织能力，而后其自治组织，自然形成出现，国家乃从而正式承认之，著为法规。

前项所称乡村自治事务，以乡学村学试为进行，系用教育方法，指导人民自治，属于社会改进之范围，详见丙项计划中，一切应参照其规定。

#### 丙项——社会改进机关之设置

(一) 本实验计划既集中力量推进社会之工作，则自县政府以次固悉为社会改进之机关。于此期间，以所有改进事项之繁，则不能不分门别类，各置机关，有其横的组织；又以县面积之

大，户口之多，则不能不划若干大区，更分若干小区，各置机关，上有统属，下有责成，而有其纵的组织。除上级横的组织之机关，属于县行政组织，详见甲项计划外。其纵的组织之下级机关，即因乙项计划中所划编的乡村若干大小区域，而分别设置之，是即乡学村学；是此项机关之设置，既因其地方原有之社会情势，又即以其地方社会中人为组织主体，居于推进社会之功——特称为社会改进机关。

兹制定本实验区设立乡学村学办法 23 条；所有新划之乡村各区，应即准以此项办法设置其乡学村学。

## 邹平实验县区设立乡学村学办法

### 一、总则

(一) 本实验区为推进社会，促成自治，以教育的设施为中心，于乡设乡学，于村设村学。

(二) 乡学村学，以各该区域之全社会民众为教育对象，而施其教育。

(三) 乡学村学，以各该学董会，于县政府之监督指导下，主持办理之。学董会之组织，另订之。

(四) 乡学村学，由各该学董会，依该区民众群情所归，推举齿德并茂者一人，经县政府礼聘为各该学学长。学长主持教育，为各该区民众之师长，不负事务责任。

(五) 乡学村学之经费，以由地方自筹为原则；但县政府得酌量补助之。其补助办法，另定之。

(六) 乡学村学之一切设备，为地方公有，应开放于一般民众而享用之；其管理规则，由各该学董会自订定之。凡各地方

原有之体育场、图书馆等，均应分别归并于乡学村学中而统一管理之。

## 二、村学

(七) 本实验县区各村，为改进其一村之社会，促成其一村之自治，依法组织村学学董会，推举村学学长后，得成立各该村之村学。

(八) 凡初成立之村学，在一年以内，其教员之一人或二人，以县政府之介绍而学董会聘任之，其薪给由县库支出之；一年期满后，应由其地方自行聘任，自行供给之。

(九) 村学受县政府及乡学之指导辅助，视其力之所及，义事之所宜，进行下列工作：

甲、酌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等，施以其生活必须之教育，期于本村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现社会并从而改造现社会之生活能力。

乙、相机倡导本村所需之社会改良运动（如禁缠足、戒早婚等），兴办本村所需要之各项社会改进事业（如合作社等），期于一村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增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

(十) 村学为行其教学应有之分部、分班、分组等编制，办法另定之。凡村学成立之村，其原有之一切教育设施，如小学校、民众学校等，应分别归入前项编制中，以统属于村学。

(十一) 村学学长为一村之师长；于村中子弟有不肖者，应加督教，勿使陷入咎戾；于邻里有不睦者，应加调解，勿使成讼。

(十二) 村自治事务，经村学之倡导，以村理事负责执行；而村学学长立于监督地位。

(十三) 村理事办理政府委任事项及本村自治事务，除应随时在村学报告于村众外，每月应有总报告一次。

### 三、乡学

(十四) 本实验区各乡为改进一乡之社会，促成其一乡之自治，依法组织乡学学董会，推举乡学学长后，得成立各该乡之乡学。

(十五) 凡初成立之乡学，在一年以内，其教员之一人或二人，以县政府之介绍而学董会聘任之，其薪给由县库支出之；一年期满，应由其地方自行聘任，自行供给之。

(十六) 县政府于乡学，得派辅导员辅导其进行。

(十七) 乡学受县政府之指导辅助，视其力之所及，又事之所宜，进行下列工作：

甲、酌设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等。——办理本乡所需要而所属各村学独立所不办之教育。

乙、相机倡导本乡所需要之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兴办本乡所需要之各项社会建设事业。

(十八) 乡学对于所属各村学之一切进行，应指导辅助之。

(十九) 乡学为行其教学应有之分部、分班、分组等编制，办法另定之。凡乡学成立之乡，其原有之一切教育设施，除应编归村学者不计外，如高级小学、民众学校高级部等，应分别归入前项编制中，以统属于乡学。

(二十) 乡学学长为一乡之师长：于乡中子弟有不肖者，应加督教，勿使陷入咎戾；于乡党有不睦者，应加调解，勿使成讼。

(二十一) 乡自治事务，经乡学之倡导，以乡理事负责执行；而乡学学长立于监督地位。

(二十二) 乡理事办理政府委任事项，及本乡自治事务，除应随时召集所属各村理事，在乡学会会议进行外，并应每月举行例会一次。

#### 四、附则

(二十三) 乡学村学之设立，以政府办法，地方乐于接受；地方自动，政府善为接引为原则；无事强迫进行。除乡学因关系地方行政较多须于本实验区工作开始后三个月内一律成立，以应行政之需要外；其村学应逐渐推广设立，不定期限。

(下略)

《乡村建设论文集》，102—108页，

1934年8月，乡村书店。

## 县政建设实验区实验计划绪言<sup>〔1〕</sup>

依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所通过之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三十条，又其相关各案如“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等，综其实验工作应包括下列三大项——

（甲）自县以下之地方行政改革实验：此包括行政制度之改革，及各项行政之讲求刷新，未举办者如何次第举办等。

（乙）自县以下之地方自治推行实验：此包括各级地方自治之推行，以迄县自治之完成。

（丙）县境内之社会改进实验：此包括产业振兴，经济进展，民智开发，风俗改善等。

此三大项亦可视为上中下三层次。虽三者互为关联，在工作中似难划然必其先后之第；然大体言之，殆必自下而上然后可。即必自社会改进入手，以次及于自治推行，行政改革也。盖非社会有相当进步，则地方自治之需要不见，能力不备；强为编制组织，徒托空言，弊害转滋。即地方自治以为言，亦必先自下级始，而后乃得完成县自治。正以其需要之见与能力之备，又待渐进也。自治渐次有成，而后行政改革乃可渐次就理。盖一切地方行政无不在行政机关与地方民众双方之交涉间。自来

---

〔1〕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于1932年召开，次年7月邹平菏泽两县被划定为县政建设实验县，故此计划草拟时间应在1933年上半年。——编者

县署积弊之深，莫能革除者，不尽在行政机关一面之过，其民众一面正有以使之然尔。弊病之构成既由双方，则其革除亦非一面所能为功。必待自治稍见头绪，上下两面夹攻，始得彻通隔阂，胥吏豪绅之为奸于中者乃无所遁逃。行政改革之有所待，例多如此。又则各项新政之举办，特如土地行政之类，其调查、清丈、登记等事，非待官民之间信孚情洽，且自治组织略具，亦难实行。凡此皆必自下而上之说也。

然欲推进社会，在实验县区言之，所以为推进之具者固又明明在行政机关。如是则不能不先讲求一最有效的推进社会之行政组织。于是乃又自下转而之上。盖事本如环，不得执其一端求之也。（原稿未完）

《乡村建设论文集》（第一集），95—97页，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1934年11月再版本。



##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sup>〔1〕</sup>

### 一 本院成立之缘起及与 有关联之各团体

本院以二十年3月筹备，6月成立，迄兹两年矣。溯其由来，河南村治学院是其前身。先是山东王君鸿一，河南彭君禹廷等以求治必于乡村之说倡导于世，爰于十八年1月，创刊北平《村治》月刊，是年冬创立河南村治学院。村治学院在十九年十月因故停办。事闻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公向方深以为惜，电招同人来鲁议重举其事。同人以村治一词不如乡村建设之通俗易懂，又以豫院偏于训练人才，缺乏研究之意，乃易名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时院长彭君方在本县镇平地方办理自卫自治事宜，未遑来鲁，梁君仲华代任其事。豫院停办后，有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之组织，努力于乡村工作。会址设汲县，豫北同学咸集焉。彭君办理镇平自卫，屏障豫南，豫南同学多归之。今彭君虽物故，而地方人士赓续其事，萧规曹随，一如其在。凡此在气脉上皆与本院有连带关系者也。

〔1〕 1933年7月14日在全国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上的报告。

## 二 本院宗旨所在及时时工作目的

同人等感于频年丧乱，深以求治为急。顾中国今日之乱，系由近百年来，遭遇另一种不同文化，陷入于一全新环境中，所以引发其自身传统文化之一大激变。夙昔社会之组织构造，节节崩溃，如破竹，如剥笋，已至于最后；此时而言求治，断非仓卒涂饰所可为功；非从根底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适用之一种组织构造不可。千年旧物，既不可规复，而所谓近代云现代云者，亦各有其所从来之历史，亦岂容摹取？是以求治诚急，而治终不可获。所谓村治或乡村建设云者，意在新组织构造必于乡村中养其端倪，植其萌芽。使吸取今世进步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得以发荣滋长。而此一段生机所由回转出来，则又全靠社会形势演变时天然必有之一回转；一则以政治属性的破坏之益烈，迫得乡村不能不自救；同时，以经济属性的破坏之益烈，迫得社会不能不救济乡村；而夙为四五十年来维新变法运动两度革命运动领导力量之知识分子，终亦必悔其一向不落实的见地，知所以自辟其立国之途径者方方面面逗合其机，盖不远矣。前《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又本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一文始终以中国社会求新组织为言，俱经先后刊布求正于世，兹不录。而同人所为乡村工作者，其旨即在于是。

本院现时工作本于前旨，着眼于三点：

(甲) 研究实验中国乡村社会现在所切需且其所能有之组织方式。

(乙) 启发乡村自救意识。

(丙) 倡导知识分子回乡运动

### 三 过去两年工作大概

二十年6月本院开办，迄现在止，前后两年间所有工作可分四项：

(甲) 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曾受高等教育之本省籍学生30人，又外省前后来附学者10余人；为两年研究，今已结业，多半留本院及实验区服务。

(乙)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第一届招收旧济南道属27县中等程度之学生280余人，又前后收附学生20余人，于二十一年6月结业各回本县地方服务；第二届招收鲁西鲁南41县中等程度之学生280余人，又收外来附学生40余人，现分派邹平、菏泽两县地方实习，将于本年10月结业。

(丙) 邹平实验区工作，先图地方人士及一般农民之融洽，次试办乡农学校，启发乡村自动改进之意识，并实施农业改进合作运动等，其详具见本院出版之《乡农学校专号农业改进实施报告》，请参看。

(丁) 二十一年第一届训练部学生结业后回县服务，由省政府通令其各本县，每县划定一区，由该生等试办民众学校（即乡农学校）并得担任其区长职务；在院内成立乡村服务指导处，派员分赴各县巡回指导。各县民校成立先后不齐，大体言之，将届周年，统计27县共77处，内计高级部60班，普通班87班，总共147班，学生人数5280人。各校经费其自筹部分多寡不等，难以计算，其由县补助部分，全年总数42480元。

#### 四 过去工作之检讨

过去工作之检讨，殊令同人自惭之至，仍分四项言之：

(甲) 研究部之成绩，以本院专门学术之教员颇形缺乏，殊嫌空疏。

(乙) 训练部成绩，前后结业约七百人，为数非少，但为期只有一年，于服务精神之陶铸，技术能力之养成，除极少数外(约千分之二)，实觉难言。

(丙) 邹平之实验工作成绩亦甚有限，此半由同人人少事繁，又能力薄弱，亦半由有所限制：

1. 无实验权 限于中央及本省地方一切法令不能自由实验。

2. 无实验费 除第二年呈准之民众学校补助金 3600 元外，别无实验费。

(丁) 邹平以外之 26 县工作，除其地方原有较好基础之莱芜等县外，成绩也不佳，此一面固由服务同学能力不足，而本院未能予以种种接济，所关实大。所谓未能源源接济者：

1. 教学方法社会活动之继续指导；
2. 各项教材之继续编定，充分供给；
3. 农业推广，合作指导，农民贷款之切实举办。

总结言之，本院两年工作所感之困难，出于本身之缺欠者多，出于外面障碍者少；同人大部分精力耗于研究、训练两部学生之学业上，而此两部七百余之学生，果能为益于乡村足以偿其取给于乡村者否？正不敢自信；吾人日言乡村建设，其不落于破坏乡村者儿希！言念及此，不寒而栗。从自恕自宽言之，

或者于前所称启发乡村自救意识，倡导知识分子回乡运动两目的不无所就乎。

## 五 本院今后所致力之工作

同人精力直接用于乡村者不过十之三；但今后之一、二年间当直接致力于乡村建设工作。山东省政府按照第二届内政会议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划定邹平、菏泽两县，在本院指导下，进行实验工作。以本院前副院长孙君则让任菏泽县长，以前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王君怡珂任邹平县长，除第二届训练部学生二百余人分派两县实习外，本院教职员及研究部第一届新结业同学亦多分在两县服务。实验工作菏泽已自六月开始，邹平亦于本月着手。实验计划两县有相同处有不相同处，大致邹平注意于乡村组织之实验（请参看邹平实验计划摘录小册），而菏泽则于地方自卫及训练民众等事，甚为着重。

《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31-38页，

1934年，中华书局。

## 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二十二年二月教育部邀集各地民众教育专家，于部内会议推行民众教育方案。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上之地位，为当时讨论问题之一。部拟办法，不外两条：

- 一，将社会教育加入现行学制系统；
- 二，于学校系统外另定一平行之社会教育系统。

愚以提倡乡村建设运动，于某一意义上亦得说为民众教育，因亦被邀与会。众讨论及此，愚未发言。主席朱君家骅征问意见云何，愚答所见适在此两条办法以外；既非于现行学制中为社会教育讨一地位，亦非另订一平行系统；乃以社会教育为本而建树一系统，今之学校转在此系统中，求得其地位也。众颇不以愚言为非，即席推定钮惕生、高践四、陈礼江、孟宪承及愚共五人为起草员，而诸君更以执笔之责属愚。今草案既成，爰纪其原委如此。

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梁漱溟

本案为“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之制定，系基于如次之三根本见地：

## 一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分

俗常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对称，大抵谓：

(甲) 学校教育为教育之中心设施或正统：指小学校、中学校，专门学校，大学校等。

(乙) 社会教育为片面的补充的设施，非正规教育：指民众教育馆、民众茶园、通俗讲演所、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公共影戏场、识字夜班、民众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函授学校等。

然试一究问其可得而为分别之据者果何在？卒乃不易得。

(子) 学校教育有一定数目之受教育者，有一定课程之进行；而社会教育（如图书馆、讲演所等），每每无之。此所谓学校教育即学校式教育；所谓社会教育，即社会式教育。然此于函授学校、职业补习学校、民众学校已不然，况此两方式绝鲜有何意义，可以演绎为划分两种教育之真据者。

(丑) 学校教育以一定课程施之于受教育者，其教育者之积极主动意味多；且其所照顾恒在校内（迨扩充于校外一般社会，即被指为社会教育）。若社会教育则每每仅有一种设备供人自己利用或领略；其范围恒泛及一般，而无所限。然此于学校式之社会教育（例如民众学校）已不然，而况学校教育应否囿于学校内，殆尤不必然也。

(寅) 学校教育前后衔接，可成相连贯之一系统；而社会教育但见其为零碎补充的，无有系统。此亦不然。学校教育中之每一个学校教育原多自成一事，非必以此为彼之预备，相连为一事者；而社会教育亦非必不可成系统；——如今之苏俄教育

制度是。

(卯) 学校教育有年龄限制，且所施教偏于社会未成熟分子。而社会教育恒无年龄限制，且施教所及偏乎成人；故“社会教育”与“民众教育”、“成人教育”等词有时相通或混同。然学校教育非无成人（例如大学校研究院），社会教育非无儿童（例如儿童图书馆等）。况人生受教育期间，是否应集中于其前小半段，正不无可商；以年龄之所偏，判分两种教育，亦难为论据。

总之，两种教育之分判初无学理真据，即于形式上亦复有时难辨。然则何为而有此对称之两种教育见于今之世耶？曰，今之学校教育，一传统教育也；今之社会教育，一新兴教育运动也。正唯传统学校教育有所不足，或且日益形见其缺短，乃有今之所谓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或成人教育）起为补救；此固近今史实之所昭示矣。于此，一以见今日学校教育之不完不妥；一以见今日社会教育亦为一时的措施；两者各不足为准理当事人的真教育。真教育行且见其为两者之融和归一；而吾侪今日乃适于此教育的过渡时代也。如何实现此完整合理的一个教育系统，正今日吾侪所有事。

## 二 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

教育于人类，所以必要而且可能，盖最足征见于人类自儿童达于成年之期特长，为其他动物所莫得比。自鱼类以迄于人类之脊椎动物，其儿童期之长短，实征兆其远于本能，趋于智慧者为如何，而与后天学习资性大小为正比例也。人类社会所特意施行之教育，自昔皆置于未成熟之阶段，自非无由。然人



类天具之学习力固不限于此未成熟期，殆且亘乎终身焉。桑戴克为“成人与学习”之研究，谓“年龄实在对于学习之成功失败是一件小的因素：能力、兴趣、精力和时间乃是重要原因。”——此实一重要根本见地。其假定以一万小时学习时间，五分之四用于六岁至十四岁，而其余五分之一作成一百小时、二百小时之分段，散落用于十四岁至三十五岁；或且为未来教育改造设计之所资，未可知也。吾人试一审今日社会趋势，将见教育时间放散而延长，有事实所不得不然者：

(一) 现代生活日益繁复，人生所需要学习者，随以倍增，卒非集中童年一期所得尽学，由此而教育延及成年之趋势，日见重迫。

(二) 社会生活既繁密复杂，而儿童较远于社会生活，未及参加，在此种学习上以缺少直接经验，效率转低，或至于不可能，势必延至成年而后可。又唯需要为能启学习之机；而唯成人乃感需要。借令集中此种学习于童年，亦徒费精力与时间，势必待成年需要，卒又以成人教育行之。

(三) 以现代文化进步社会变迁之速，若学习于早，俟后过时即不适用；其势非时时不断以学之不可。

今后社会之渐归于社会本位的组织，大势昭然。如是则不能不倚重多数个人，各为社会生活之有力的参加，而教育于是乃成大问题——如何能为最经济而有效的教育设施，以满足此社会需要？吾信其必为依桑戴克以及诸家所为成人学习之研究，而统盘筹划以建立一个教育系统是已。今之有社会教育、民众教育、成人教育，纷然发达于学制系统之外，极见其不经济者，正以未能从头统盘筹划之故耳。

### 三 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

吾人今日盖适于人类文化之转变期，亦即社会改造之过渡时代。此就吾民族文化、吾民族社会言之，盖尤为亲切的真——民族文化数千年相传至此将为一大转变，历史上久不变之社会组织结构，至此将为一大改造。设施教育于此日，实宜有一反省：社会之有教育果何为乎？教育如何乃为尽其对于社会之功用？

以理言之，教育之在社会，其功用为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使教育果得尽其功，则社会宜无革命，以随时修缮，逐步改进，行其无所事也。然人类社会卒不免于暴力革命，此盖以从来教育之在社会，不居领导地位而处于被役使地位之故。从来支配人类社会者为政权，或曰国家。历史上之政权或国家虽有许多高下不等之形式，而语其内容始终不外一武力统治之局。其较进步的政治形式固武力渐隐渐抑，理性渐显渐扬；然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端在武力，而非以理性。由是社会改造——社会秩序推翻与新建——乃亦不能不出于暴力。故从来社会进步虽无不赖于教育（狭义及广义），而教育卒不能改造社会也。

盖人类虽为理性的动物，而理性之在人——无论个体生命或社会生命——乃以渐次而开发者。人类社会之组织构造，自今以前概非理性的产物——概非自觉地安排设施，而具有甚强之盲目性、机械性。暴力革命即是社会问题之机械的解决，正从社会之机械的构造（武力统治）而来，虽欲回避有时而不能。然每经一度改造，必经一层自觉，亦即较进于理性；最后社会中人将易其彼此不相顾不相谋而为相顾相谋，必达于自觉地安

排设施而后已。于此际也，或于暴力革命前为宣传运动组织运动，或于暴力革命后为完成社会改造之种种工作（如今苏俄之所为），盖莫不有教育在焉。更直捷言之，盖莫不为一种教育（如苏俄在经济建设上的五年计划实可认为是一种教育）。由是而论，徒教育固未足以改造社会，而社会改造于其前后卒又不能不仰赖于教育以竟其功。

前问：教育如何乃为尽其对于社会之功用？于是得分别答之如次：

（一）平时要在能为社会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二）变时（改造时期）要在能减少暴力至可能最小限度于其前，能完成改造达可能最大限度于其后。

此所云改造前之教育，大抵出于当时社会秩序下设施者少，而自然演变于秩序外者多，可以存而不论。所最当致意者，厥为旧秩序推翻后，将以完成社会改造之教育，宜应如何设施之问题。大要言之，其异于平时之教育设施者殆有下列诸根本点：

第一，社会改造期之教育宜着重于成人，与平时教育之着重在社会未成熟分子者异。盖平时教育先求绵续文化而不使断，然后因之以求进步。故如何使社会未成熟分子（儿童及少年）得如其已成熟分子（其父及兄）之能参加社会生活为第一目的。同时既成文化之改进的讲求，亦即寓于其教育设施中。至于大多数成人，其生活能力已具，殆无复再加教育之亟亟必要。既成文化之进一步的创造工夫虽不可少，然非对一般成人设施教育之谓矣。社会改造期不然。此时整个社会生活正企图转进于一新方式，大多数成人虽届成年，而对于此新生活方式所需之习惯能力则方为未成熟者，势非经教育不可。既成文化（旧生活

方式)将要改革,意不期其绵续而宁期其断除,对于社会未成熟分子之教育虽不可少,而正有难于着力者。仍其旧而教育之既所不可,而新社会生活未辟,又无以教之;其必附于社会改造的成人教育以行乎!

第二,社会改造期的教育宜着眼于一般社会,与平时教育每囿于少数个人者异。此其故有二:一则平时教育主于使少数未成熟的个人能适于其社会环境;而社会改造期则要在使社会环境改从吾人之所求。凡一般人之风气习惯,社会间之组织关系,正为除旧布新努力之所在。此风气习惯组织关系明非个人之事,明非少数人之事;则其教育设施不着眼于一般社会将奚为乎?再在社会改造之所求,靡不在社会多数分子之由被动地位转于主动,分子间之关系由疏而入密,则其教育设施之趋向普及多数,正有不待言者。故社会一度改造,必为教育机会的一步开放焉。

第三,社会改造期的教育宜就其人所在环境行之,与平时恒设为特殊环境以超于现实大社会环境外者异。所谓特殊环境指学校言;学校之设,在避去复杂纷乱许多无用乃至有害的刺激,而集中精力以求学习上修养上之经济有效。此为平时之教育设施所必须,但在社会改造期则必以社会式教育为主,即参用学校式,亦必变通之。盖社会改造期的教育既着重在生产大众,而于此生产大众万不能使之脱离生产行程而教育之也。此其一。又此期教育既要在风气习惯组织关系之改进,当然从实地之社会问题着手。个人之长进既在社会进步之中,却不能使个人离开环境得到长进,再为社会之长进。例如地方团体意识之养成,农民合作组织能力之训练,一种生产技术之发达,早婚缠足等陋俗之戒除,必无离开实地问题,别设为环境以行其

教育之理也。此其二。

设施教育于兹社会改造时期，必须理会以上三根本点。非然者，必无从尽其应负荷之任务，必失其教育之功用，而不免转为社会病。

为中国而设计，更应切实认识今日中国之问题为如何。中国近两千年来但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社会组织结构历久不变，文化已入盘旋不进状态，苟任其历史之自演固将无今日之社会问题。乃近百年来世界交通，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合流，固有文化不足以应付新环境，夙昔适用之社会组织构造遽见崩溃。凡今日政治改造经济改造乃至种种改造之要求，盖悉受外围世界历史所推演，而非从其民族历史演来；为国际形势所引发，而非其社会内部自发的。此义认清，则下列两点皆其中应有之义，必须提醒不可忘者。

(一) 在一般之例，社会改造盖为历史演进之自然；当其革命爆发，为旧秩序之推翻之时，必其社会之新机构已孕育相当成熟。事类蝉之蜕壳，故其新社会之建设也不难。今日中国乃非其例。旧秩序以遭外来理想之否认，与激于民族自救之急切心理，骤被推翻，而新社会之机构初未有若何历史的孕育，青黄不接，则如何完成其社会改造，得一新社会建设出现，乃至艰巨矣。前既言之，完成社会改造的工程即教育。在前例中，所需之完成改造的工程不大，且有需要不甚著见者，或竟不假若何教育设施。而今日中国所需完成改造的工程——教育——乃特大；非特有设施，将必无从完成其改造。

(二) 中国固有文化既千余年盘旋不进，而西洋自近代以迄于现代则进步如飞，中国受此威胁乃不得不为其自身文化之改造。所谓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自一面言之，其义实即如何企及

现代文明之问题。社会改造本为无前例创进，而中国社会改造运动每落于一种模仿，其故正坐此。虽事有不可模仿者，然当融取现代文明以求自身文化之长进则无疑义。此融取而长进的工夫固明明为一巨大之教育工程，则势且必特有其教育设施而后可。

基于以上之根本见地，及对中国问题之认识，而制定本案；本案全文，包括三部分如次：

### 甲 社会本位的教育设施之原则

一，教育设施包涵社会生活之基本教育、各项人才之培养训练、学术问题之研究实验等一切而言。其间得随宜运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各种方式，而无分所谓社会教育、学校教育。

二，教育设施应厘定其教育对象之区域；以社会区域之大小统属，别其等级，著为系统，各负其区域内之教育责任。

三，教育设施区域应视自然的及社会的形势条件等为厘定标准；但亦以符同于国家行政区域地方自治区域为便。今假定即以现行国家行政区域地方自治区域为教育设施之区域，则应有国学、省学、县学、区学、乡镇学之五级。都市地方以人口密集交通方便，除分置坊学外，不更分区域；坊学以上即为市学，无多等级。隶于省政府之市，其市学视同县学及区学；隶于行政院之市，其市学视同省学，县学及区学（按现在同级之行政区域，每每大小悬殊，又犬牙相错，而不定合于自然的社会的形势条件。地方自治之区乡镇各区划尤多不合适之点，有待纠正；此特假定以示例而已）。

四，各级教育设施在其区域内应为统一的规划与管理；但非必集中于一地点。

五，各级学府应负其区域内之一切教育责任；但下级学府力所不办者，其责任归属于上级。例乡力所不办者归区，区力所不办者归县，如是类推。

六，上级学府应辅导下级之进行，下级学府应受上级之指导。各级学府间于上有统属，于下有责成，期下为有统制有计划的进行。

七，各级教育自成片段，除其中一部分为升学计外，非必求其衔接连贯。

八，各级教育设施各有其偏重不同之点。例如上级之国学偏重学术研究，下级之乡学重在基本教育，中级之省学县学等主于人才训练是。

九，最下一级之教育因各地方情形悬殊，程度势难齐一，且办理得法则势将随社会进步而程度逐渐提高，亦不必设为一定之标准程度。

十，在特别荒苦之地方，其教育设施应受国家之补助。于全国各地教育势难齐一之中仍应为齐一之企图。其补助应以最下一级之教育为主、为先，依次及于上级。

十一，国家行政中教育行政之部分，仍然于各级学府外，独立设置其机关。于中央称教育部，于省称教育厅，于县称教育局或县署某科如今制。各级学府但为教育机关及学术机关，除教育技术上之指导暨各种教育设计事项，得与教育行政机关合组委员会办理外，凡属教育行政事宜，应尽量划归教育行政机关管理之。

十二，县以下之各级学府除教员外，其办学人员以本地人担任为原则，并期其与各该地方自治团体融合为一体（今邹平正作此实验）。

十三，在各级教育之各项编制中，其入学年龄、修业期限、课程标准等，应由各级学府自行拟订后，经上级学府及教育行政机关指导其同级学府会商决定之。

十四，各级教育之各项设施均应取实验态度。以各级学府自行负责实验，而国家行政机关立于监督考核奖励纠正地位，以求实验之得有积极结果。

十五，自区以上各级学府，招收学生皆以入学试验为准，不问其毕业资格。

十六，凡两乡可以联合举办之某项教育设施，即不必归入区学；凡两区可以联合举办之某项教育设施，即不必归于县学。以上各级视此类推。

十七，国家为训练特种人才（如军事、外交、司法等），得于此教育系统外，特设学校行之。又国有或地方有之特种事业如水利工程、铁道、邮局等，亦得于其事业机关附设其特种学校。

十八，国学为国有，各级学府为各该地方公有，于此统制的计划的教育设施系统中应无私立学校。但私人兴学，其志可嘉；其有教育上之抱负者更宜予以实验机会，旧日私立学校经向教育行政机关及相当之某级学府请求为计划上之接洽为编制上之归并后，亦得许其以原负责办学人负责办理之。如国家或地方认为有收归公家办理之必要时得随时收办。以后有捐资兴学者例亦仿此。

十九，依本案施行后，将使现在许多县立小学，归入区学或乡学；许多省立中学师范等校，皆归入县学；许多国立大学，皆归入省学。其经费预算原操于上级政府者，仍无妨由上级政府支配之，而改以奖励补助之意用之于下级学府。



二十，本案之施行，当从一县或数县实验入手，渐渐推广以至于全国；不取乎国家立法公布，普遍施行于一朝。

### 乙 社会本位的教育设施（附系统图）

乡学资借于上级学府之辅导，视其力之所及，又事之所宜，进行下列工作：

（甲）酌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等，施以其生活必需之教育，期于本乡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现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

（乙）相机倡导本乡所需要之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如禁缠足、戒早婚等），兴办本乡所需要之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如合作社等），期于一乡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增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

乡学在职能上以基本教育为主。在程度上为当地社会及国家力所能举之最低级教育。在编制上酌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等；旧制之小学校、民众学校等，应分别归入上项编制中（小学即儿童部，民众学校即成人部），在设备上酌设大会堂、图书馆、体育场、音乐堂等。在方式上兼用社会教育及学校教育两方式。

区学资借于上级学府之辅导，视其力之所及，又事之所宜，进行下列工作：

（甲）酌设升学预备职业训练部等，办理本区所需要而所属各乡学独力所不办之教育。

（乙）相机倡导本区所需要之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兴办本区所需要之各项社会建设事业，期于一区之生活逐渐改善，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

区学在职能上以基本教育之高级及技术训练之预备段为

主。在程度上为当地社会所办乡学教育之高一级教育。在编制上酌设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等；凡旧制之高级小学、高级民众学校、职业补习学校等，应分别归入前项编制中。在设备上酌设大会堂、图书馆、医院等为乡学更进一步的设备。在方式上兼用社会教育及学校教育两种方式。

县学资借于上级学府之辅导，视其力之所及，又事之所宜，进行下列工作：

（甲）酌设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自由研究部、乡村师范部等，办理本县所需要而所属各区独力所不办之教育。

（乙）研究并指导所属各区乡之社会改良运动及社会建设事业，促成本县之自治，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

县学在职能上以技术训练人才教育为主。在程度上为当地社会所办区学之高一级教育。在编制上酌设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自由研究部、乡村师范部等。自由研究部指导有学术兴趣者之自由研究。乡村师范部则训练区学、乡学教员。旧制之中学职业师范等学校，应分别归入前项编制中。在设备上酌设科学实验室、农场、工厂、大会堂、图书馆等，为区学进一步的设备。在方式上以学校教育为主，兼用社会教育方式。

市学（隶于省政府之市）视同县学兼括区学。市内分置坊学；坊学视同乡学。

省学资借于上级学府同级学府与下级学府之协助，视其力之所及，又事之所宜，进行下列工作：

（甲）酌设农工商医等科，举办所属各县学独力所不办之专业训练，为本省养成其建设所需人才；兼为本省人士供给专科研究上之设施与导师，以发展其不同之天才。

(乙) 负责研究本省地方上自然的及社会的各项问题，供给当地政府及社会以解决各问题之方案设计等，并指导所属各下级学府社会工作之进行。

省学在职能上以专门技术教育及实际问题研究为主。在程度上为高等教育。在编制上视学术门类暨本省需要分科；所有旧制之专门学校大学校高中各科应分别归入上项编制中。在设备上酌设图书馆、各科实验室、研究室、农场、工厂等。在方式上以学校教育为主，兼用社会教育方式。

市学（隶于行政院之市）视同省学兼括县学及区学。市内分置坊学；坊学视同乡学。

国学联络国际学术机关或团体，资借于国内下级学府之协助，进行下列工作：

(甲) 酌设文理法工农医等科，养成学术人才，为各科纯学术的研究，以期有所发明；兼为国人供给学术研究上之各种便利，以完成其天才发展。

(乙) 从各科学术研究上着意于中国固有学术之整理，固有文化之阐明，以期增进民族价值之自觉，一期为世界未来文化之贡献。

(丙) 负责研究国内自然的及社会的各项问题，供给政府及社会以解决各问题之方案设计等，并指导下级学府社会工作之进行。

国学在职能上以学术研究为主，在程度上为最高之教育。在编制上视学术门类分科，旧制之大学应归入上项编制中。在设备上应有一切学术上应有之设备。在方式上以学校教育为主，兼用社会教育方式。

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图

国 学	省 学	县 学	区 学	乡 学
		市(隶省政府之市)学		坊学
	市(隶行政院之市)学			坊学

### 丙 关于本案之说明

1. 自一面言之，本案盖即以学校教育而特别注重教育推广工作，勿拘守于校门以内者。特如所谓“学校应为地方社会之中心，教员应以社会之指导者自任”之义，尤为本案意趣所在。

2. 自另一面言之，本案盖即以农村改进试验区，民众教育馆等机关统理学校教育者；或即以民众学校与小学校统合办理者。以社会改进、民众教育之大任，遽付小学教师兼理，虽不无可疑，然并合办理自较经济，又在方针计划上必须一贯，则无可疑也。

3. 中国三四十年来，学校教育之大弊在离开社会，以致妨碍社会于无穷，当世人士类能道之。本案盖所以矫正此弊者；抑扭转此错误方向之最彻底的办法无逾本案。

4. 三四十年来办教育者继续扩充多办学校而不知其所谓，

学生更为无目的之入学与升学，有如资本主义之盲目的生产然，一批一批毕业之不已。此无目的（或忘其所谓）之弊，本案盖最能予以矫正。

5. 过去教育偏于以读书为学，或偏于知识技能之一边，而不能照顾及吾人整个生活。如本案能实施，当能矫正此弊。

6. 中国此时不应视成人教育或社会教育为临时补充枝节应付之事，而应认为教育上主要工作。本案最能实现此旨，矫正过去之错误。

7. 中国各地方社会情形不一，而教育法令设施等一切，顾不免整齐划一，缺乏自然适应之妙，本案最能矫正此弊，而实现出一种因地制宜之活教育。

8. 过去教育缺乏统筹计划，几于各级教育自为谋，各地方自为谋，各科各项自为谋，乃至各学校自为谋而均不相谋。以致畸形发展，偏枯不均，重叠多费，其弊不可胜言。国联教育考察团所作《中国教育之改进》单就全国学校分布之问题，指摘论列，已甚严切（见原书第八章）。本案盖最具有矫正此弊之机能。时下谈经济问题者，好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说；假取为例，则此殆可谓为一种统制教育计划教育乎。

9. 在今日小学教育问题中，除其本身应为种种改良外，如何谋小学教育之普及实为最大问题。闻教育行政当局已筹拟有简易小学、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大纲（教育部拟）、小学扩充部（山东教育厅拟）等办法，于正式教育外谋补救。在本案中则此等办法早为应有之义，亦无所谓正式非正式也。

10. “中国今日之小学经费与中学经费迥不相侔；与高等学校经费相差尤甚。在教育上有组织之国家，小学教育绝未有处于如是不利之地位者”（见《中国教育之改进》第二编，第一

章)。民国十九年全国第二届教育会议即主扩充横的教育，整理纵的教育，其意甚是。本案精神即着重在基本教育（民众教育与小学教育），一矫往弊也。

11. 世人有见于教育之无用，受教育者几乎转为社会之赘碍物，于是乃倡为职业教育生产教育等说以救之。用意诚是而所见未的。盖此问题不尽在教育；一半在教育，一半在社会。今日中国社会虽有专门技术人才亦无所用，或难得其用。是故教育本身固应改造，社会问题亦必须解决。不先求社会为生产的社会，而徒求教育为生产的教育，其事固不可得。本案以社会运动纳于教育系统中，直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自一面言之，为教育本身的改造；自另一面言之，即正所以改造社会。以教育促社会于生产，还以社会促教育于生产；自来言生产教育者，未或能见及此也。

12. 以农业教育言之，今日首在为中国开出其自有的新农业；新农业有一分，乃有一分新农业教育可言。但此一分新农业即一分之新农业社会；词面不同，内容全为一事。抑农业教育之目的固在求一新农业社会之出现。即从此目的以为言，亦莫要于养成新农民。日本之农业教育设施，其优富绝不后于丹麦，而目的之所成就者则远不逮。论者指为注意农学而忽于农民之过，其故可思矣。本案所谓乡学资借于上级学府进行其教育工作云云者，用意即在上级学府以其研究实验之所得，交下级学府推广于社会，俾社会教育之内容得以充实，而学术亦得其应用之正道。同时省学、国学经下级学府从社会上实地采得问题与材料以为研究，乃有真正之学术产生出来。如是上下往复相通，而农业技术与农业社会乃相偕日进于无疆。其他一切例此，农业不过其一例。

13. 关于职业教育，本案有两要点。其一着重对农民、工人、商人等作教育工夫，增进其职业上的能力乃至各种能力，期于养成新农民、新工人、新商人等；而不着重办职业学校，养成农业学生、工业学生、商业学生等。职业教育家有谓将来必以补习教育为职业教育之重镇者（江问渔先生有此语），可谓得之。推进农民则农业自兴起，提挈工人则人自竞于为工人而无待督劝。此为提倡职业教育或生产教育之唯一要径。

14. 其他一要点即在职业训练中必须打破一切非必要的学校形式而无所拘。例如入学资格、修业年限、课程标准、师资限制等，均应随宜设施，而后职业训练乃有可施；此理人多已言之。

15. 学问以自己求得为真；自来名家每出于学校教育之外。故由公家供给图书及实验设备而奖励好学者之自修，实为教育设施之要图。抑今后求学术普得享受，亦非如此不可也。本案自县学以上即著供给设备自由研究之文，其意在此。

16. 本案既力求切合社会实际情形，于课程于年限均少一定标准限制，则学生程度自难齐一（实则现在齐一制度下已不能齐一），故各上级学府招收学生，只能以入学试验为准，而不问毕业资格。抑照此施行后，以前学校为学生制造无谓之程度、无实之资格之弊，亦可扫除矣。

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录自《梁漱溟教育文集》，97—116页，

1987年8月，江苏教育出版社。

《乡村建设论文集》，141—160页，

1936年2月（三版），乡村书店。

《乡村建设》，3卷5期，

1933年9月11日。

## 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特殊困难<sup>〔1〕</sup>

经济问题各国不同，今所谈者，为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无论在谁（资本主义者，乃至共产主义者）都承认技术如何进步，产业如何开发的重要；但若美国则问题即不在此，而在失业问题、物价等问题矣。

大家关心中国问题者，都知道经济问题的重要，都急切要求中国生产技术进步、产业开发。但每有不照顾自己所处地位环境，而徒言经济建设，作为种种计划者，真是笑话！

与经济建设第一有关系者为政治；我们不想到我们的政治环境，便说中国宜如何如何作经济建设是不行的。经济建设或须直接靠政治力量行之，或则亦要相当的政治环境为条件。无论前者后者，我们总括称之为经济建设的政治条件。不想到政治的条件固不行；有人于政治条件随自己主观而要求，不顾到其是否可能亦不行。

大概技术进步，产业开发的先例，总不出两条路向：

（一）个人营利自由竞争的路向，近代西洋社会即走此路，而亦日本所摹仿成功者。

（二）社会本位统制的计划的路向；苏俄即其一例。

---

〔1〕 1933年8月24日于青岛之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届年会上的讲话。王静如笔记。



此二路向，颇觉相反；但实际上，亦不过相对的各有所偏，非绝对的不同。在前一路向所需政治条件，是国家法律有效，社会秩序安定，乃至政府能为奖励、保护等等。后一路向所需政治条件更高，即必须一强有力的政府，并且清明的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总持经济建设之事。

以上所述两个先例的路向中，比较我们似宜于后者。这不但是因为我们产业落后的国家要走计划的统制的路，才经济捷便，合于“迎头赶上去”的一句话；更要紧的是因为外围环境不许可我们走前一路向。此刻国际竞争激烈之极，不但俄国是以整个国家对内统制、对外竞争，即其他自由主义的国家亦以经济上技术与经营之进步，政治上之倾向保护政策，而莫不以其整个国家作成国际竞争之一力量；如果我们走前一路向，即不啻以我们零星散碎的私人资本与国际的强大力量竞争，安有容我们立足的余地。所以，不是我们国内合起为一力量最好，乃是外围环境不容我们力量分散。我们产业落后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上力量本已单弱，若分散了岂不更单弱？所以从大势上看，我们唯有走后一路向，殆无疑问。

但从政治一面看则如何？二三十年扰攘不宁，国家法律总是无效、社会秩序几时可得安定，今后仍无把握。更高的政治条件益不可望。是则经济建设上对于政治所非要不可者，而政治乃决不能满足其要求，此真困难矣！我所说的“特殊困难”，即指政治问题而言。非经济问题有办法，中国无办法；但非政治有办法，则经济无办法。我请大家注意政治问题。但大家勿以为我暗中倾向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或共产党的做法。以我看这两条路都是错误的。对于政治问题作何打算，亦同经济问题一样，要照顾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地位。与政治第一有关系者

为社会，即一切的政治局面无不有其社会背景；从中国社会的分析推断之，恰好不能产生任何方式的法西斯式或共产式或其他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天地间无偶然的事，二十余年来的政象皆有其来历，或理由。在短时期内我虽不能分析给大家听，但可以此结论贡献给大家。中国经济建设非要求这样的政治条件不可，而中国的社会恰好不允许有这样的政治，此即所谓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特殊困难。

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此特殊困难，但非谓此困难果不可以解决耳。能以关切经济问题者，进而研究政治问题，更从而分析中国社会，为整个社会问题之研究；往复追寻，不惜扩大范围，我相信是能发现一条解决途径的。

录自《乡村建设论文集》第一集，44—47页，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1934年11月。

《乡村建设》旬刊，3卷7期，

1933年10月1日。

## 为编制《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 致庄泽宣等六先生的公开信<sup>〔1〕</sup>

二十二年夏间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曾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为讨论中心。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案则有四起不同的草案，先印布给到会同人，以为讨论资料。大会讨论之后，为以下之决议：

1. 社会教育应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为要旨。
2. 四组原案，各地同志可于实施时，按照当地情形酌量采用之。
3. 理事会应组织“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编制委员会”，根据四组原案，及特别类中有关之提案，并广征意见，编制方案，提出下届年会讨论。

[说明]本社此次大会，同人虽于本案所包各项具体问题，尚未得意见归一，但一致认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实今后社会教育之根本要旨。

过去一切革新运动，所以未见成功者，盖以过去一切，始终无外一种上层运动，而与下层民众无与。今后必须使大多数民众觉醒，献其心身，而后建设可期，民族复兴可

---

〔1〕六先生即庄泽宣、江问渔、高阳、孟宪承、雷沛鸿、晏阳初六位。此文收入《乡村建设论文集》时，标题为《一封公开信》。——编者

致。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固在乡村，此其一。

中国旧日社会之组织结构，讫于今日，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俱悬而未决。所谓革新运动之中心工作，实应为解决各种问题，创建吾民族社会新组织结构之工作。而凡此问题之解决，新组织结构之建设，必肇端于乡村，此其二。

总前后两义言之，民族复兴端赖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端在以乡村建设为内容，夫然后可以完成其复兴民族之功。

大会毕会后，理事会即据决议案第三条推定庄泽宣、江问渔、高阳、孟宪承、雷沛鸿、梁漱溟六社员，并函请晏阳初先生共七人为委员，组织“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编制委员会”，而指定漱溟主持进行。今春漱溟患病，复经理事会第七次会议指定高阳、孟宪承二君协助进行。同时理事会有决议，第三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办法”为讨论中心。比者漱病大体已愈，高、孟两先生督促进行，以应年会需要。顾七委员散处南北，各负职责，聚会面商殆不可能。即用通信方法，往返千里，亦甚需时日。眼前距年会不过两月，能否圆满交卷，良未敢知。今先由漱溟提出下列意见，分函同受委托之诸君，征求教答，为初步之会商。

对于编制“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方案”漱所见如次：

一、吾人编制此方案之先，必须问明，实行此方案者为谁？或为谁而编制？为政府乎？为本社乎？假使不确定实行之主力为谁，则此方案无从编制。

二、不但实施之主力必须确定，更且必须确知实施之对象

(意指中国乡村乃至全个社会)为何如?例如人口情形为何如?土地情形为何如?其他经济情形为何如?一切的一切,若不确知,此方案亦无从编制。

三、吾人在前列第二问题上,固无确实材料,可为编制方案之凭藉,即进行调查,亦大不易得!以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迨调查有得之时,或已剧变不同也。

四、吾人在前列第一问题上,未承大会及理事会之明白指示,据漱个人推测,或为政府乎?但不免又有几个疑难点:现在有稳定而统一之政府乎?假令不稳定不统一又何能负荷此使命?而瞻望前途,正未敢知稳定统一之把握果何在。若曰姑假定其有望而编制方案;则此方案乃悬一大可疑之假定于前,而民族复兴与否,亦在不可知之数矣。岂非笑话!再则于政府力量有疑问之外,尚有政府意志是否在此之问题。假令有稳定统一之政府,而无意于乡村建设,则奈何?且天下事主观意志每每不足恃。政府未必有意为苛捐杂税,而苛捐杂税卒不止;政府未必无意为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之功卒不见。故吾人不但需要一稳定统一的力量,而且须要此力量在客观上必出于乡村建设之一途。——此如何可得?

五、若以方案为本社而编制,或为一般有志乡村建设之团体机关等而编制,则疑问更多!如此东一处西一处零散的工作,果足以完成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乎?假定联络进行而不零散,则对政府为如何态度?分开两不相干断不可能;不相合必相冲突。相合自无问题,但方案恐将赖政府以施行,又无所谓为社会团体而编制的方案。相冲突而我们失败,则乡村建设复谁去谈。相冲突而我们胜利,则取而代之,我们即是政府,亦无所谓为社会团体而编制的方案。故推论结果:复兴民族之乡村建设,必

有赖于政权；而方案之编制，不能不以“稳定统一的，客观上必出于乡村建设一途的政府”为前提。如是，又归回到前面的问题——此如何可得？

六、以上皆为根据理事会委任编制“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方案”一题所有之分析推论。实则从漱个人之所认识，中国自近百年世界交通以来，即入于文化转变期，社会改造期，而同时人类文化亦届大转变期，其他民族社会问题同将改造，国际国内形势，步步演变，重重扰动；此时欲一面按定一乡村建设之主力，一面把握一实施建设之对象，更保留一从容之时间以事建设，实为错误观念，理不可得。但中国社会本一乡村社会，中国文化本一乡村文化，从其转变改造之前半期言之，固必为乡村崩坏；而后半期新局面之转现出来，由种种缘故，复必然为乡村建设。我所谓乡村建设者盖指此。此殆为历史进程之出于天者，非可制订方案而人为设施之也（此第一层意思）。然历史原是人的历史，何人非天，何天非人。吾人果能从过去历史之认识，而有以观测乎未来，则又未尝不可从而推进历史之车轮，以实现其所必有之命运。于如何推进如何实现之中，亦未尝不可有所谓方案者（此第二层意思）。但此类方案以客观事实之分析推究为主，而主观之安排从之。其第一个方案，又必为如何产生“一个能为乡村建设的力量”之方案，而非实施乡村建设之方案（此为第三层意思）。

七、“一个能为乡村建设的力量”，意谓自乡村建设之发起以迄完成，彻始彻终，一个能动的力量。此力量从广泛言之，应即为吾民族。以乡村建设为吾民族历史前途之一转变；能转变者即吾民族。但严切言之，则发动主动在全民族社会中必更有所在，不可侷侷。吾人要须确实认识吾民族前途命运之必归于

乡村建设，又分析推究得其原始能动的力量之所在，而后知前所问如何可得之“稳定统一必出乡村建设之一途之政府”乃不过此力量一段表现，而所必可得者。如是因其形势之固然，而为之安排规划，俾此力量果得产生，果得表现。——此所谓第一个方案也。若此方案不可得，则乡村建设具体实施方案不必作。必此方案成立，而后如何实施建设乃有可言。

八、从上理由，漱谨向我编委会同人提议：本社第三届年会，讨论“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具体实施方案”一题时，应先从客观形势上讨论是否将有一“乡村建设之能动的力量”之产生；果有此形势再从而安排一促其产生之方案，至于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当在此方案之后，不妨留待下届年会讨论之。是否有当，乞赐教答为幸！

录自《乡村建设论文集》，66—70页

1934年11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

《乡村建设》，3卷29期，

1934年6月10日。

##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sup>〔1〕</sup>

中国社会教育社于1933年春在南京召开理事会，通过以钮永键提出之“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为二届年会（1933年8月）讨论中心后，曾决定分为五组，均以此题各起草一提案。以下为著者（第一组召集人）起草之提案。其余四组提案从略。——编者

### 甲 民族复兴问题

- （一）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之不振，是文化上之失败。
- （二）文化上之失败，由于不能适应世界大交通后之新环境。
- （三）五六十年以来，时时变化，以求适应，但无积极成功，只是本身文化之崩溃。
- （四）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
- （五）所以民族复兴问题即文化重新建造问题。

### 乙 民族复兴之途径

- （一）文化建造即社会组织结构之建造。
- （二）中国新社会组织结构必肇端于农村。
- （三）所谓乡村建设，乃从乡村中寻求解决中国政治问题、

---

〔1〕此提案刊载于《教育与民众》时曾以《民族复兴之问题与途径及乡村建设之要点》为题。



经济问题及其它一切社会问题之端倪。此端倪之寻得，即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发现。

(四) 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发现在农村不过是一苗芽，此苗芽之苗长以至成长，都靠引进新的生产技术、生产组织，乃至一切科学文明。

(五) 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开展，以迄完成，即文化建造成功，亦即民族复兴。

### 丙 乡村建设要点

(一) 乡村建设运动之到来为必然的：

1. 以民族自救运动屡次无功，乃有此最后觉悟。
2. 以乡村破坏日亟，乃有今日之救济乡村运动及乡村自救运动。

(二) 乡村建设之目前工作，要在能为乡村发现一最简易之组织。其必要条件：

1. 由此组织而外间最易灌输新知识、新方法，或供给各种资料于乡村。
2. 由此组织而乡村内部最易引起多数人之力量，以渐形成一团体。

(三) 同时，更要使国内得相当安定，开出机会以容乡村建设之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使国内得相当安定的力量。换言之，此机会必赖自己开出。

录自《乡村建设论文集》52—53页

1936年2月25日，乡村书店。

《教育与民众》，5卷1期，

1933年9月28日。

## 建设与崩溃

——为乡村建设问题答庄、崔、古三先生

此次社会教育社年会“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广州社员庄泽宣、崔载阳、古棣三先生所为第四组提案，开口即云：“现在谈不到建设，更谈不到复兴”，几于不承认原拟题目。余虽非原拟题目之人，但向来持论如此，故敢将所见作答，还质三先生。

原第四组提案共计条文十项。其第一项云：“现在谈不到建设，更谈不到复兴”，余先不置辩。但请读者及三先生注意看其第二项：“目前只希望能防止乡村更大的崩溃”。余欲请问所谓防止崩溃者其事究在谁？或三先生究期望于谁？第三项：“要如此第一先决条件是减轻乡民的担负”；使乡民担负减轻者其力量又在何许？第四项：“一切的苛捐杂税必须彻底铲除”，此铲除的力量又靠谁？此下一项一项余皆欲以此为问，但不复一一列举。如三先生只是模模糊糊怀此意见抱此希望，初不能必定乡村崩溃之得防止乃至苛捐杂税之得铲除，更不能言其防止或铲除的力量在谁或将由何出，则三先生其与乡下人之希望老天爷一旦使天下太平者何异？有知识有眼光的学者谅不出此。换言之，吾人必须料见此防止崩溃的力量前途正要开展而非在不可知之数始可以言希望。且也吾人身在问题中，言希望决非徒言焉而已，必将力求之，若徒言希望防止乡村崩溃而顾坐以待之，

则正不必多此一言。如三先生承认此两层，则以吾所见此能防止乡村崩溃的力量，即眼前正在开展的乡村建设潮流，更无其他，吾人正当同从事于此项社会运动以力求乡村崩溃果得防止而必不能坐视。如此则三先生与我现在乃非谈到乡村建设不可，抑且非大谈而特谈不可。如三先生不承认此结论，则所抱希望果何在？所从事者又为何项运动？请有以语我来。

三先生所谓现在谈不到建设之意，余本相当承认，上列层层之言，非好与三先生辩。余意实在指出乡村崩溃不会自然停止，而全有待于一个正面积积极建设的力量之产生，乡村崩溃之得防止不过其消极一面的结果，吾人当寻出动力所在，则结果自得，吾人只能从积极一面用力，而消极一面自得。三先生认为现在谈不到建设而顾希望防止崩溃，不知果有一个防止崩溃的力量则此力量便可积极建设，何谓可以谈防止崩溃而独不可以谈积极建设耶？此力量若不发生，乡村建设固谈不到，防止崩溃又宁能谈到耶？此力量而果发生，即是中国社会一段真生机，其必为新社会之建设也无疑；是正面的，决非徒为防止崩溃之负面的力量，要知一切负面的力量不过都是正面力量的负面而已。

不但建设与崩溃防止得靠一个力量；并且我们不能想象这工作有一先一后的两个，象是崩溃截然止住，而建设崭然开始。当崩溃最剧烈之时正即建设萌动最力之时。建设开始，崩溃仍进行不已；要建设到八成乃不见崩溃之迹。深切言之，崩溃之初即伏有建设之机；建设完成，崩溃乃止。大抵是一消一长，此消则彼长，彼长则此消，一步一步转变推动而新局面出现。从此义言之，不独分成两截来说者非是；抑乡村更大的崩溃正为乡村建设的一种必要。这话未知三先生及读者诸君能承认

否？

但原案第五项主张要停止一切“建设”与“新政”，则余深表同意者。盖余虽倡谈乡村建设，顾不主张以乡村建设作国家一种行政，由今之政府负责进行之。于此有两点必须请读者大家特别注意者：

- 一、余一向认乡村建设运动为一种社会运动，是从历史演到今日应运而生的。
- 二、中国此刻尚未得成一国家组织，建国运动尚待完成；抑中国此刻所深痛而苦闷者亦即此政治问题也。今之政府其本身正在问题中，将为被解决的对象，固绝非能解决的动力，则乡村建设绝不能假其力以行可知。

余意中国的转机全在前项社会运动扩大至最大限度，而政府的权力随之减缩，或变易其性质，故如原案第六项“县以上的政治机关都要与民休息，把积极的施政变成消极的监察”，亦余所深表同意者。凡余所表同意者（原案三至六项），余皆用力求之。求之之方即在扩大上项社会运动。自七项以迄第十项大体上余亦多同意。但余嫌其似对政府说话者，事实上乃非上项社会运动真起来后谈不到也。

余最后正告三先生及读者：吾人愿解决社会问题当先发见解决此问题的动力何在（此解决问题的动力例随其问题而自然有所规定），料见此问题的前途将必得解决（此固可察可测者），而以自己投身其中，求此动力之扩大，循夫其应走的途径与步骤而前进，则问题自有解决之一日。不能如是，而空谈一些意见，怀抱一些希望，或对政府说话，或作些请愿式的政论抑又何益？所有十项意见余于后九项皆可同意，但以改变第一项不谈乡村建设为努力谈乡村建设为条件。否则，如三先生今所谈

者，余乃正以为不必谈也。

22年9月9日

录自《乡村建设论文集》（第一集），64—67页，

1934年11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

《乡村建设》旬刊，3卷6期，

1933年9月21日。

## 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sup>〔1〕</sup>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象和尚到庙里去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 my 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作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内。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的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出家，在内心并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这是最冤枉最无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象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常常念着一件事，常常象要解决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似的。（我在廿岁

---

〔1〕此讲话转引自朱秉国所写《邹平漫纪》（《山东民众教育半月刊》，5卷6期，1934年8月）一文。据朱文说，讲话由李鼎记录，未经著者过目。——编者

时曾经想出家,后来没有;可是到现在还常常觉着出家的味道。)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末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 就邹平土地状况复许仕廉函

仕廉仁兄先生大鉴：

顷奉惠书，诵悉种切。兹就弟等所见，一一陈复于次——

一、邹平百亩（二百四十步）以上之地主极少，唯城北极远之乡，地势洼下，土质沙碱，人口略稀，间有数百亩之农家。其距城较近，及西南山麓之村，每户平均不过三十亩；家有二三十亩地，即称小康。

二、此间大家族，或数世同居者极少；父子分家，乃平常事。故每家人丁，六七口者居多；以是每人分配，平均不过二三亩。其在城南一带之地与周村距离较近，则人烟更密，平均每家不过十亩，每人不过一二亩。

三、邹平地税，分上、中、下、荒、湖五等；其中有漕米者，有无漕米者。而随粮带征之地方附税为财政厅所核准者，年各不同。其各乡各村为公事摊敛之数，则数目无定，名称不同，村民随时议决，随时敛集，县府无案可稽。故仅将县地方正附税捐另纸列表寄上。

四、邹平寻常壮年户主一名，子女二三人，妻一，父母俱存，如此通力合作，每一壮年农主，自耕不过十七八亩，然有此亦可贍养其全家矣。

五、邹平农家副业，极为发达。近城者多种菜，多季卖给他县者甚夥。城南宜桑，每季赴周村卖茧约十五元上下；城西



北产棉花；在前清时明家集布销北平甚多。以上三项，近数年来，萎顿不堪，故农村经济极现枯竭。此外关于手工业者为“箍炉子”即锯补磁器匠；每年往日本者不下两千人，所获甚丰。又西乡铁匠，每三人一组，车一，炉一及其他工具，往往赴口外作工，于农家经济多所裨益。又邹平人穿之鞋多在集上购之，妇女之首帕、布匹亦多系农户自织；而纺车逐渐不用，所用棉纱均购自商贩。

六、关于邹平农村人口土地分配实况，近因办理庄仓合作社，殊多精密之调查。兹择抄五个乡村所呈报告，另行同税额表寄上。此比较为具体而确实者，亦可代表一般也。

专此奉复，即请  
台安，并希赐教为盼！

弟梁漱溟、王柄程、徐树人顿复

廿三年一月三日

附：                    许仕廉先生来函

漱溟、柄程、树人吾兄大鉴：

现中央正在讨论土地政策，然理论自理论，经验自经验也。拟以邹平实验县及邹平调查所得事实，与兄等个人所见为参考。对下列问题尤为重要——

一 每人土地分配之最高限额？每户限额？

以上答询，乞以事实为主！弟诚知兄等极忙，可否在万忙中，在一星期左右将材料寄下？余容面谢！此请道安！

弟许制仕廉谨上 廿二年十二月廿七日。

《乡村建设》(旬刊)，3卷18、19期合刊，

1934年3月11日。

## 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sup>〔1〕</sup>

去年夏天7月半的时候，在邹平曾经有过一次盛会，会的名称原叫做“乡村建设讨论会”后来又改为“乡村工作讨论会”。由那个会里，复产生了一个“乡村建设学会”。这一个集会，本来应该全是做乡村建设工作的人，可是参与此会的，反以教育机关为多。如定县平教促进会，无锡教育学院，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类此的教育团体，来的很多很多。这是一个事实。同年8月间，济南也有过一次盛会，即“全国社会教育社年会”。这本应是教育团体的集会，然而我们乡村建设研究院亦被邀参加，并且在这一个大会里，竟以乡村建设作讨论的题目。这也是一个事实。由这两个事实，可以看出现在的社会教育与我们的乡村建设是怎样的不分。

我们在此地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未标出改造教育的题目，可是一般中国人，甚而至于外国人，都把我们的研究院看成了改造中国教育的机关。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霍金，到中国来考察教育，竟认我们的研究院为一个改造教育的机关。美国的新教育家罗格，亦是这样的说法。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庄泽宣先生到欧洲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时，他把邹平讲了很长的一段，当作中国的新教育运动，这都是事实。

---

〔1〕1934年1月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演，郝心静记录。

又如民国21年冬，南京政府开内政会议，很注意地方自治问题，当时被邀参加的有我们邹平，也有定县与无锡，22年2月教育部讨论民众教育的会议，有定县与无锡，而我也被邀参加。这都很可以证明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目前在事实上已被人看做一家。具体点说，就是社会教育团体，被当作地方自治——或者说乡村建设——机关，地方自治机关，亦被当作社会教育团体。我当初本来不愿承认在此地是办教育，而今日事实上又不容不承认是办教育。事实不必多讲，现在我们说说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合流。

让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合流的是中国社会问题。申言之，让教育往乡村里跑的是中国的社会问题，让地方自治往教育上跑的也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大家都是被社会问题所拘管。再者大家是中国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在社会上作一件事情，不往前作则已，要往前作，必有一种方向或路线的探求，有此探求，则不容不归到乡村，办教育的往前进，天然的要转到农村，我们正面解决社会问题的乡村建设者，由于方法的探求，也一定要归到教育。邹平的乡村建设，从前以“乡农学校”作推进的机关，现在我们下层的乡村组织，为“村学”、“乡学”。大家一听就可知道是一种教育机关。总之，我们为方法的探求不得不归到教育，教育家为方向的探求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宜乎其有此合流也。

大家如果参加去年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一定有一个大的启发，让我们明白现在四面八方，都将归落到一处，这一处，就是乡村建设。当初他们未打算如此，与我一样，也不料到如此。参加那次大会的，华洋义赈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团体。这一个团体起源于民国十七年华北水灾之后，其后灾患频仍，他们即继

续工作至今。当他们初办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与其灾后赈济，不如做预防灾害的工作，于是提倡掘井、造林等事之外，更贷款与农民、举办信用合作，以调剂农村金融，诸如此类，岂不全是乡村建设？后来他们又开了一个赈灾的创例，即所谓“农赈”是也。他们的办法，是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名之为“互助社”，把款项贷给他们，利息甚低，使灾户恢复其农业。二十年度，长江一带大水，他们在江西安徽各地，放出一百几十万元，至二十一年即收回到七八成之多。他们又选择信用好的继续贷款，使组织合作社，而图有利于农业。章元善先生在《皖赣农赈》文章里，谓皖赣之民因祸得福，亦非无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办来办去，完全走上了乡村建设的路子。

定县平教会创办人晏阳初先生，欧战时他正在法国留学，因为看到参加欧战的华工，有识字的需要，所以就教给他们认字，马上得了很大的效果，所以他发愿回国作识字运动，固未尝念及乡村建设者，后来发现了识字不是农民的需要，如使识字成为农民的需要，则应改进其整个的生活，故有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同时划分了若干实验区域，实地工作，已整个的归到乡村建设。又如黄任之先生，开头是在上海办职业教育，后来才改兼于农业教育。同时农民是不能离开乡村而跑到学校里受教育的，所以想办农业教育，也只得下乡，谁知现在又在提倡种种的乡村建设，这都是当初所不及料的。总之，你不在社会上干事情则已，否则干来干去，终会干到此地。其他象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本来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的团体，是一个纯粹作学术研究的机关，可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不得不以中国社会为研究的对象，同时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又不得不以乡村为

研究的对象，所以划清河镇为实验区，试验他们研究的结果，这样一来，亦变成了做乡村建设工作的机关。我们可以看出从事于学术研究，亦归根于此。再如河南村治学院，其成立的动机，又是一个来头：河南那个地方，兵灾匪患，连年不绝，把河南的乡村，破坏到不堪！河南村治学院虽为谋地方自卫而设，然而不得不及于乡村建设。河南办自卫最有名的镇平，其动机又是一样，然亦归根到乡村建设。仔细分析起来，谋救人的要到乡村，谋自救的也要到乡村，从从容容作学术研究的归到乡村，急急忙忙救死不遑的也须归到乡村，东西南北都归到一块。那一次乡村建设讨论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明白了完全是天叫我们如此，谁也逃不出去！天早规定了救中国要从乡村建设着手，谁也逃不出去！

说到教育，我在《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里曾说明中国教育应当如何改造，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要归到乡村建设。我们以下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教育？教育是干什么的？

什么是教育？统同是教育。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在家庭里做活也是教育，朋友中相得的地方是教育，街上人的谈话，亦莫不是教育，教育本来是很宽泛的东西。至于教育的功用，不外为“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换句话说就是“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人类不能不有生活，有生活就不能不有社会，有社会就不能不有教育，教育是很天然的。无论作广义的解释或狭义的解释，都不外“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这个定义（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教育的功用，就是如此。如果教育能尽其功用，论理说社会上不应当再有暴力革命，因为社会出了毛病，教育即可随时修缮改正，固

不待激起暴力革命而使社会扰攘纷乱也！人类社会所以有革命，就因为教育不居于领导地位。在人类的历史上，社会的构造上，支配社会的是政权，是国家；而政权与国家者，又有其背后的武力作后盾，教育不过是站在被役使的地位而已！换句话说，政权即武力，武力即政权，看表面政治可居于第一位，但其里面仍有经济作背景，教育或理性，仅居于第三位，无能为也，故仍不免暴力革命！

人类历史上的社会，是机械的构造，是物理学的构造，不是理性的安排，事实上也不容人作理性的安排；即让你作理性的安排，亦万不能跳出政治制度的条件而巧作安排。因为社会本是一机械的构造，要推翻此构造，基本上还须一种机械的力量，此机械的力量，即所谓暴力革命是也。如西洋社会的阶级对立，原是一种机械的推演，断非教育所可解决者。社会的根本改造，教育担当不了，则非至机械的解决不止，虽然，机械解决的前后，仍靠教育。革命的前半段没有教育，则无从培植革命力量，后半段没有教育则革命不能完成。社会一切的进步固不能不有赖于教育——广义的教育——也！苏俄首次的五年计划成功，如社会上原无电汽化的农业，现在有了，原没有那许多的合作社，现在有了，总之，俄国政府一切设施，从另一方面看完全是教育。

我们中国社会目前所需要的是什么教育呢？照我的分析，中国社会现在是革命期中；可是，我们的革命，与其他的革命不同。其他的革命（或者说是人家的革命）大半是社会内部问题的爆发，而中国的革命是外部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内部自发的革命纯乎是机械性的。中国的革命是由于少数最先接触外国的人，引发了改革社会的思想，这就是所谓从先知先觉者

来谋社会的改造，非某一部分人因被压迫而硬往上冲的革命可比。这就是离机械性远，离理性近的一种征象。中国的革命完全是知识分子包办，又不是内部问题的爆裂而是外部所引发者；中国革命的完成，以中国社会能达到此刻世界其他国家社会问题所要求满足的地方为止。天然的中国革命的完成，不止是自己社会问题的解决，以中国问题即世界问题也。在中国的革命里边，机械的解决不是绝对的必要；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改造，从在上的人去作社会改造，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社会的革命，可以由理性来解决的！

中国虽已用过暴力革命，可是旧秩序被推翻，新秩序尚待建立，建立新秩序也就是革命。这个时候正是一个亟需要教育的时候，除了机械的构造必以机械力推翻以外，中国的此时，正好似一块空白，专等着教育来填补。

二三十年来，我们所过的日子统统是一个破坏的日子，是一个崩溃的日子。自从我们与西洋文化接触，受其包围，受其压迫，使我们不得不想法子应付此环境，所以一味的摹仿人家，图变换自己。换句话说，就是拿人家的法子来应付人家。可是，每一次的摹仿都没有学出什么，变成什么；不惟没有积极的成功，而一度的变化自己，正是一度的加深的破坏自己。现在已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起不可！这一个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与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者不同。在平常的时候可以重在儿童教育，加速使社会中未成熟的分子使之成熟，好让他们来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在中国的此刻已非平常的时期，应着



重成人教育，应以全力办民众教育，办社会教育，因为我们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我们的此刻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变期，正是除旧布新的时候。所谓除旧，旧是在成人的身上，除旧则必对成人下工夫；所谓布新，尤须对成人而言，比如改良农业，或作农业推广，你不对成年的农人作教育的工夫，又能如何呢？所以要创造文化，故施行成人教育，施行成人教育即所谓创造文化，即所谓乡村建设，即所谓社会教育。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是一而二，二而一者。

现在很有些人提倡施行农业教育于未成年的儿童。不知在农业教育未推广到成人以前，绝不能推行到未成熟的分子，因为你没有许多榜样给他。比如说做父亲的尚未能改良农业，他的儿子，一个很小的孩子，究如何去改良农业？所以想把社会文化安排停当，在中国的今日，即应着重成人教育。再者，此刻中国乡里的成人在年龄上算得成人，若对新的生活方式来说则尚未成人，犹等于儿童，当然需要教育，总之，你不想改造中国文化则已，否则非要注重成人教育不可！

成人教育施行的办法：一方面须要民众教育，一方面须要构造一特殊环境——置受教育者于其地而教育之。此刻的中国已不能用学校式的教育，而应以社会式的教育为主体；抽乡民而置之于学校，亦事实所不许。事实上非在其原来的环境里头，教以农业改良，教以乡村自治不可。

综上所述，此刻的中国，天然的要著重民众教育，或说社会教育。此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即乡村建设。中国的民众多在乡村，故民众教育即乡村民众教育。中国是乡村社会，故社会教育即乡村社会教育。此种教育是很活的，很实际的教育，此

教育即乡村建设。

录自《梁漱溟教育论文集》，187—195页，

1945年6月，开明书店。

《梁漱溟教育文集》，242—249页，

1987年8月，江苏教育出版社。

《乡村建设》（旬刊），4卷，9期，

1934年10月21日。

## 村学乡学释义<sup>〔1〕</sup>

今天，拿我们邹平的乡学村学替大家略为解释。因今有两位朋友来院参观，照例应当说明我们的工作；再则讲习会同人到此多日，不知乡学村学的情形，心里未免很闷。本来乡学村学是我们研究的最后结果，预备到日后再讲；今既有上述的两种原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说明一下。

我们要知道中国此刻所缺乏的，与近代社会或现代社会比较，不外有两大缺乏：一大缺乏是团体组织；一大缺乏是科学技术；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缺乏。可是在这两大问题里头，我们还是要从团体组织入手；因为团体组织是人的本身的事情；人是主，科学是工具。从团体组织入手，才能引进科学技术。所以我们第一句话要弄明白的。就是只有这两大缺乏，不能马虎；第二句话要说明的就是要弥补这两大缺乏，须先从团体组织入手。我们用很多的话，说明过乡村运动的动机，是从我们想培养中国人的新政治习惯来的；这个习惯，就是团体生活的习惯，也就是进步的团体生活习惯。所谓进步的团体生活习惯，即团体中的多数份子不是被动的，都是为有力的参加者。我们所要求者即在此，这些天来，屡次同大家说中国人有两大精神是非常优越的。这两大精神，一个是伦理主义，一个是人生向上。中

〔1〕1934年2月1日讲于邹平，郝心静记录，未经作者寓目。

国人的长处，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发明，除此没有。这个话是有所对而言的，比较后才可知道。所谓伦理主义，非个人主义，非社会主义。所谓人生向上，非如近代西洋人的一个满足欲望的人生，单是看见了本身权利、现实幸福，而是着重奋发向上。此理甚多，不能细讲。

我们这些日子，都是讲中西精神不合，非得有一个沟通不可。这个沟通不单是理论的，并且要在事实上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这一事实，就是新社会的组织构造。如果在根本处——中西人的精神——找不出一个妥贴点来，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便为无根，一切的制度便完全建立不起。中国旧的社会组织构造破坏，一定要有个新的组织构造出来；新的组织构造，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根——中西精神沟通后所表现出来的事实。

昨天对大家讲中国将有一个新的组织构造出现，这个新的组织构造，就是这个——村学、乡学。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一句话：乡学、村学就是乡村组织；第二句话：这一个组织，能够没有一点缺憾的容纳了西洋近代进步团体生活的精神。这一组织，是进步的团体组织，同时与西洋近代的政治制度，团体组织又不一样。在这一个组织构造里，一方面是采取了进步的团体组织精神，同时尽量的、完全无缺憾的是从容纳中国的两大长处——伦理主义、人生向上——而来的；此即所谓具体的调和，或名之为具体调和的方案。大家可以去看我们成立的村学、乡学，他表面虽是一个团体；大家如果留心看的时候，可以知道这个团体为的是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此即发挥人生向上的意思，与西洋近代的欲望政治完全不同，与把团体看成一个办事的、满足欲望的、解决问题的完全不同。此乃把解决问题包容在人生向上里边。如果说是为的自治问题，则又落

到西洋的政治制度；这一转移之间，大不相同。我们这个团体里边的制度构造，是采取个人尊重团体、团体尊重个人、少数人尊重多数人、多数人尊重少数人；此即伦理主义。伦理主义的要点，就是尊重对方，仿佛没有自己，与个人本位从自己出发的恰好相反，西洋人对于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的争论，在中国人的伦理本位里可以完全得到解决。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这两句话都不通，应当是甲尊重乙，乙尊重甲；不能只说你应尊重我，我不尊重你；团体应当尊重个人，个人也应当尊重团体。我们的这个安排，与西洋的那个牵掣均衡的原理恰好相反。这个安排，是从伦理主义来的，那个牵掣均衡虽与中国伦理冲突，但中国的伦理却可以代替牵掣均衡。而且可以看出这团体中的多数分子是怎样从被动入于主动而作有力的参加。

我们组织的乡村，为什么要这样来组织？为什么用这题目来组织？因这个题目固然要把中国固有的人生向上精神含融进去，可是还不只这一个意思，我们是有好多道理都非此不成！今试略举几点：

我们先说中国此刻组织乡村不能用“自治”为题目——自治的意思，是含着乡下人自己作主，自己打算，自己决定，自己出主意。但这事情，是与我们本来的意思，本来的要求相冲突相矛盾的！我们当然不是不愿意乡下人自治，我们是说我们此刻正是要推动乡村，正在谋乡村的改进，简直的说，我们正在要改造乡村。实是因中国社会与现代世界的文明相距很远，尤其是内地乡村与其相距更远，我们诚有促进他赶快进步的必要。但须问如何才能使他自动？岂不知他如能自求进步，他早已能办合作社，能使农业改良，能够革除一切陋习，能够如何如何，完全用不着我们了。正因他不能如此，要待多数人的自动自觉，

则许多积重难返的陋习都不能改。不要说他不会自觉，不会多数表决，即能，亦不免走入于反的方向。如以自治为题目来组织乡村，就是挡住了乡村的前进。此其所以不能自治者，即因其没有团体生活的习惯。所谓自治的“自”，是指地方团体而言，中国人根本没有形成团体，所以谈不到“自”更谈不到“治”。因是我们不能以“自治”为题目，应当以“向上学好求进步”为题目。因为拿着“求进步”作题目，所以不用“乡公所”“村公所”，而用“村学”“乡学”之名，便含有教育的意义。用教育的方式来组织乡村，有极大的好处；如同人不想吃饭，你给他开了胃口，让他很愿意接受外面的东西一样。若以自治为题目，则不啻挡住他的胃口。并且以求进步为题目，外面的新知识新方法随时可以使他接受。总之，你要启发其向上之机才行！况且“自治”须经国家的许可，不是你也办自治，我也办自治，大家谁都可办自治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自治作题目。

我们再说：更不可以以“自卫”为题目。除非不得已时，不能用“自卫”为题目来组织乡村。如果以武装自卫为题目，又违背了我们的意思。我们的要求是要中国人养成进步的团体生活习惯，多数份子站在主动的地位，对团体作有力的参加；而武装团体的组织，则是军事意味的，天然要多数服从。为应付外面，只要一个指挥官，尊重一人的指挥，这个对外性、随时性、非常性太大，与我们要求进步的团体组织不合。换句话说，恰好不能够养成新的政治习惯。况其他的流弊、危险尚不只此。所以除非迫不得已，万不应如是。我们以乡学、村学组织乡村，把自卫含进去，这个没有毛病、没有流弊、没有危险。如果一上手就是自卫，一定不行！再申说一句：我们要自治，开始不能以自治为题目。乡下人能成功一个团体组织时，用团体的组

织办团体事情，就是自治。并且天然的把自卫也包含进去。如以自治或自卫为题目，则皆狭隘而不适用。

还有一个题目，就是合作社。合作社也可以组织乡村，但太偏经济一面。最宽的题目是自治，既有毛病；题目与自治同宽，而又最没有毛病的就是“向上学好求进步”，——具体点说就是乡学、村学。这一个题目不但没有流弊，并且要发挥中国人固有精神，使其胃口开张，接受新的知识、新的精神的。所以为此刻的中国乡村社会着想，不能再好过这个。

村学、乡学中有学长、学董、理事，众人为学众，外面请教员，这一个安排意思很多。比如学长，让其居于超然地位；团体中实际负责的领袖，安在理事身上，这一套机关的运行，其理至细。现在没有长时间讲，暂时少说。

名曰村学者，以之组织乡村，除教员外全是本地人。其负责领袖如学长等，不是经团体组织而产生，是我们代为安排的。——从这方面看不是自治；从都是本地人那方面看又近于自治。这个是自治的预备，我们以之渐引入于自治。所谓“视力之所及，又事之所宜”；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是活动的，非刻板的、非强迫的意思。强迫、刻板、不活动，全违反教育的意思。它——村学、乡学——的办法，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可以全设，亦可以设两部，也可以多设几部——如耆年部、幼稚部或其他——几部可以全设，也可以单设某一部或两部；先设某一部，以后再酌设另一部或两部都无不可。其工作可分甲乙两项；甲项工作，在给与范围里各份子以生活能力的教育；乙项工作，是相机作社会改良运动或社会建设事业。其目的在使乡村进步以后，更辅助大社会之进步。这两项就是平常地方自治中的自治事宜；我们把地方自治的这些事，放在有教育的意

义里来作，则工作进展一点，就是自治成功了一点。

现在中国人一般的只看见科学技术重要，而很少注意到组织。即或注意到组织问题，不是偏于西洋近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团体组织，就是只看见俄国、意大利——团体力量强，团体份子力量弱——的团体组织。上面两种组织恰都与中国人的冲突很大，不相容，无法建立起来。很少有人注意组织，更少有人注意从头全新的组织。所谓全新的组织，即人类此刻没有的，——中国过去没有，西洋近代也没有的。中国如不有一个全新的组织，中国就会没有办法。中国与西洋的文化距离太远，唯因其太远，所以规定了一旦接触的时候，应当产生一全新的社会组织，——人类组织。中国人眼前的使命是创造，决不只是图眼前的苟活，大家能存在过日子就行，实是天然规定了中国人的使命是创造！关于团体组织，大概如此。我们转过来再说第二层。

大家都看重中国科学技术的缺乏。因为看重，所以大家都十分热心的去做，拼命的从外往里搬东西——科学技术——填补；可惜做的法子太笨。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社会是活的、是有机的，只能长，只能进步，不是添东西就可以行的。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要紧的是启发其生长之机。仿佛一种萌芽，要将其生机开出，必须培养它，输送给以种种养料，让其吸收、生长，万不能揠苗助长。刚才我们说必须从团体组织入手，其意即小的范围能有点组织，如同把死的东西改成活的；尤其是我们这样的组织——乡学、村学——是人的组织，含有教育的意味，更是不同。我常把这组织，比作一会吃奶的婴孩，你常给他以补养品，这婴孩就能长起来；长得大，吃得多；吃得更多，长得更大，非这样不能望其有进步。换言之，非有这种组



织，没法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我们——中国人——此刻注意的是需要有一进步的多数人能够作有力参加的团体组织，要紧的是有这样一个安排；这安排或可叫做一个构造、一个社会。这安排是怎样呢？就是一方面顶能够送进东西去，一方面顶能够吸收东西的。比如村学、乡学的组织，若不设法使其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则村学、乡学顶多不过同现在学校一样。所以要紧的是必须与外面造成一种关系，这关系的开展亦即科学技术的开展。科学技术不能进步则村学、乡学不能开展为一大社会。中国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就靠这开展才能出来，如桃仁杏仁长成一棵大树一样。总之，这一安排的组织，非引入进步的科学技术不能开展；欲使之开展则不能不吸收新的科学技术。输送、吸收，在现在中国的社会都是必要；没法子有这个输送、吸收，这一安排组织便难进步。我们说到这一面时，还是须举例说明。比如山西村政，初办理时的动机本是要建设一模范省，含有推进社会的意思。他们推进的方法，必有一个安排；这安排就是后来村政的一套东西。最初山西并无所谓村政，他是叫作六政；现虽记不清是那六政，其内容大概是三项属于消极的改革的，三项是比较积极的提倡的。他们对于禁烟、禁缠足以及进行造林种树等项，原是很认真的在向前作。但是行不动，其原因就因为安排不够。当时山西当局——阎锡山——是督军兼省长，虽然颇有力量，其办法亦不外是下命令、出告示。无奈这些都无效，统统办不动。后来觉到须有新的安排才行，于是想依照军队，有总司令、师长、旅长、团、营、连、排长等一贯的组织一样，在县政机关以下，添上区、乡、镇、闾、邻的组织，由上层责成下层，如同总司令命令作到节节相制。所谓六政者，这才行开（原来的六政考核处，后来始改为村政处）。

这个安排是个推进社会的安排。用这办法也可说颇见效验。办理的成绩，当以禁烟为最佳；其他如种棉等事，亦比较很见成效。这统是得力于此种安排。但后来山西村政终归完全失败了；其失败原因可说他是纯由上用力往下推，而不明白社会是非靠自力自动不行的一点。他力只能用以引发自力，不能完全依靠；如果完全依靠他力，结果必归失败。

我们村学、乡学的组织安排也用他力；可是只用他力以引发自力，此与山西村政只用他力而不知引发自力者不同。我们的这个安排，顶重要的工具就是乡学、村学教员；这个教员是我们赖以推进社会工夫的先锋，几像是插进小孩口中吃奶用的奶头，来输送滋养品的。从村学往上有种种安排：村学是第一步，以上有乡学、有县政府、有研究院。研究院好比后方的大本营，村学教员可说是前线的战士，乡学与县政府司中间联络的作用。研究院仿佛是从后方供给前线士兵以饷弹，也可以说是将种种滋补品送到前方，由村学教员再输到农民身上。但是研究院或有时不能供给到十足，因是研究院必要再和各方学术机关联络，请他们予以补充。关于这一点，在《村学乡学须知》上有。（参看收入本卷之《须知》的“教员辅导员须知”一节中“乙项工作”一段。——（编者）

这全是为要启发其吸收外面知识方法之机。以前的法令统是用强制的力量，而不是用教育的力量。要知社会的进步，必定用教育的力量以引发其自力，不能用政治的力量，专靠他力求解决。这是第一个毛病。再者上边想出的法子尽管是好法子，可是用不上；比如下命令造林或组织合作社等事，不要说下面不奉行，即奉行亦不是真奉行。假若所用的法子，是从上边的知识头脑与下边的实际经验合起来的法子，才可以行得通。但

是上边的人并不知道下面的情形，未尝与下面的人磋商，故虽有法子而不真切实际，亦用不上去。这是第二个毛病。我们村学的教员的作用，在《村学乡学须知》上有：

“教员的責任要在使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于问题研究方法供给上成一连锁循环关系。本来在社会改进机关的系统内，上级机关（如县政府研究院）对于下级机关（村学、乡学）具有两项作用：一为最高方针之指导，一为后方材料方法之供给。但欲使此后方机关得尽其功，还须教员善于利用。例如后方有农场苗圃（属县政府第四科或研究院）其棉种树苗等待村学、乡学来采用；但教育如不能启发农民棉种改良的要求，鼓舞起造林运动，则推广不出去。又如在地方有防疫的必要，在医药机关亦备有防疫方法；但教员若从中耽误，便可致地方瘟疫大起，而好方法亦失其利用。总之一切的材料，或较专门的知识方法等，在教员自己断不能具备，但他如能善于利用后方供给机关，则凡后方所有者悉等于他自己所有，效用岂不伟大。”

我们的村学、乡学是一个常驻的社会改进机关。常驻的好处有两种：其一，比如对于农业改进的事情，政府每每都好临时派人到下面进行，不致枝枝节节，派人太多，太不经济；其二，政府方面临时派人，到下面去作推行改进农业等事，一时与农民不易接头，农民平常不曾听说过，突然临时令其去干些新奇事件，农民每是不肯相信。并且临时派人责成农民遵办，一定更望急切成功农民尤易误会，甚或发生冲突。例如浙江建设厅为推行蚕种改良，临时派员下乡劝导，致被农民殴打，即其显例。我们的村学教员开始对于农民是提引问题，商讨办法，而后鼓舞实行，自然可免此弊。纵不能马上实行，亦决不至与农

民冲突。

现在归结来说：乡学、村学就恰比一座桥梁，外面的世界与内地的乡村借此可以往来相通。希望最后一天，能使外界与乡村成功一水平线。这桥梁的安排是必要，以之输送种种滋养品，及种种改进乡村的知识方法。我们现在除了极力注意一个进步的团体组织之外，同时要另外有这样一个安排，即以我们研究院作媒介，与外界一切可以帮助我们的机关相沟通，把好的知识方法，由上输下；下面所有的困难问题，能以由下送上，得到解答。再补充一句话：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辗转推进，不惟使中国社会进步，并可补西洋人的缺欠。

《乡村建设》旬刊，3卷25、26期合刊，

1934年5月11日。

## 村学乡学须知

### 绪 言

邹平自实验计划施行后，已将从前之区公所乡镇公所等机关取消，而代以村学、乡学。但村学、乡学在这里不仅是个机关，并且是个团体。它包括学长、学董、理事、教员以及一村中或一乡中男妇老少人众等而言。所以说个“村学须知”，便是一村全体各分子须知的了；说个“乡学须知”，便是一乡全体各分子须知的了。

村学是乡学的基础；乡学是村学的上层。一个人必须先知道如何作村学的一分子，方能进一层去知道乡学的事。所以我们将村学列在前，乡学列在后。

为什么要编写这许多须知呢？这有两层原故。一层因为这村学、乡学是件新事，大家尚不甚明白，所以必须给大家说明说明。二层因为这村学、乡学意在组织乡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规定其组织间的分际关系，而想养成一种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之上。所以实验计划中设立村学、乡学办法的各条文，其意都很含蓄，且颇富弹性。须待离开立法口吻，另从教育立场，详为指引点透，而后一般人知所循由，新礼俗习惯庶几得以养成。这是编写村学、乡学须知的真必要所在。

此编计分四部分如次：

一、学众须知 学众即村中或乡中一切人等。我们以一村之众为村学学生，以一乡之众为乡学学生，所以称“学众”。狭义则指一般民众；广义则学长、学董亦均在內；好比国家的大总统，一面仍属国民一分子也。他们每个人应当知道如何作村学或乡学的一分子；合起来才成一个健全的团体。

二、学长须知 此兼指村学学长乡学学长而言。学长品德最尊，怎样才是为学长之道，各人更不可忽。

三、学董须知 学董兼指村学的乡学的常务学董理事及其他各学董而言。各人都要知道怎样尽其所以为学董者。理事尤其要知道怎样尽其理事之职。

四、教员辅导员须知 教员兼指村学教员、乡学教员而言。辅导员虽不算乡学组织内的人，但与村学、乡学关系密切，故亦并叙于此。

## 学 众 须 知

我们先要知道村学是个团体，乡学是个更大的团体，自己是在团体中的一个人。邻里乡党本来相依，古人所说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便是。我们现在更进一步，要使父老兄弟阡村的人结团体，成立村学；全乡的人结团体，成立乡学。

结这个团体干什么呢？为的是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一家兄弟同居，弟弟要强，哥哥不正经干是不行的。夫妇俩过日子，这个好好的过，那个不好好过是不行的。阡村的人大家不齐心，没有能办好的事。不但一人不好，连累一家；一家不好，

连累一村；并且村里情形不好，影响一家；家里的情形不好，影响到一个人自身。要一人好，还须要一家好，要一家好，还须要一村好才行。因此我们闾乡的人要联结起来，共谋一切改良的事，大家振作，合力整顿。

中国古有“吕氏乡约”。后来常说“乡约地保”的“乡约”，其制即本于吕氏。原古人所为乡约，即一乡之人彼此相约共勉于为善，其相约事共分四大项：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所谓“德业相劝”大意便是互勉于修身齐家之事；所谓“过失相规”则如戒烟酒，戒赌博，戒游惰，戒斗殴等俱在其中；所谓“礼俗相交”便是乡党之间要有长幼之序，相亲相敬之礼；所谓“患难相恤”便包含防盗，防火，防疫，恤贫，恤孤等等。总其用意，正和我们现在要成立村学、乡学的意思相仿。亦可以说我们正是要师法古人。

但今日世界不同于古，我们于师法古人相勉为善之外，还须注意求进步。大概年纪大的人都看见现在事事不同从前了，什么事都变了。自前清光绪年间就闹着变法维新，至辛亥革命为一大变，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又为一大变。他如四五十年来风气习俗之改异，日用器物之趋新，更说之不尽。为什么这样变呢？这都为西洋文明有许多处比我们高强，比较下来我们处处落后。大势所迫，不由不变。中国人随着外国人变，乡下人随着城里人变，一直变了这些年。然而天下事到了不由自主，没有不糟的；盲目随人没有不受害的。事到而今，乡下人受的伤害，中国人受的伤害，亦就不小了！岂可再这样下去呢！现在要紧的就是乡下人自己来讲求进步，莫再不由自主；中国人自己讲求进步，不要随着外国人跑。在我们讲求进步的时候，西洋正好供我们最好的参考样子。因此我们说：结团体干什么呢？为的

是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求进步！求进步！我们所以不成立村公所、乡公所而成立村学、乡学，其意盖在此。

村学是为一村求进步的；就以闾村算一个学堂，父老中有品有学的为学长，为人明白会办事的为学董，领着众人一齐讲求讲求；还恐自家人知识不足，更请位教员先生来指教我们一切。——这便是村学的组织。有些事不是一村办得了的，必须邻近多少村庄（亦就是一乡）联合起来才行。这时候就需要品学资望更高的人出头领导，多请两位教员来指教。——这便是乡学的组织。村学之于乡学作譬喻说，好比小家庭之于大家族。村学有不明白的事可以请教乡学，乡学可以请教县政府，县政府请教研究院。我们要合全县的人共同讲求进步，而研究院立于帮忙指导地位。

待讲求之事甚多，而总不外改革旧的与提倡新的两类事情。改革旧的，例如禁缠足、戒早婚等等，而要紧莫过整顿村风。提倡新的，例如农业改良、造林、修路、卫生等等，而要紧莫过组织合作社。但无论办什么事，改革旧的亦好，提倡新的亦好，都还有根本要紧的一层事：大家知道如何作村学（或乡学）的一分子。所有要改革要提倡的各事，现在且都慢讲，先讲这根本要紧的一层。

如何作村学的一分子？

第一，要知道以团体为重——村学是个团体，我们各人是团体中的一个人。团体事靠我们各人；我们各人还要靠团体。若一个人只图自便，不热心团体的事，团体散了，累及众人，还害自己。

第二，开会必到，事事要从心里过一遍——公众集会，众人到，我必到。凡关本村之事或开会宣布的话，都要在自家心



里想一想。知道不清的事要勤问。

第三，有何意见即对众说出——我们既关心团体的事，自然就要有一些意见主张，应即说出请大众参酌。凡事经过讨论才得妥当，各出己见，实不可少。有话便说，不必畏怯。

第四，尊重多数，舍己从人——自己意见虽要说出，但不可固执己见。凡众意所归，应即顺从。不要太过争执，致碍公事进行。

第五，更须顾全少数，彼此迁就——有时少数人的意思亦不可抹杀。若以多数强压少数，虽一时屈从，终久不甘服。总以两方彼此牵就，商量出一个各都同意的办法为好。团体之内，和气为贵；倚强凌弱断乎不可。

第六，要知道应为团体服劳——村中公事，人人皆应服劳。轮到谁身上，谁要认真去干。公众推举更是光荣的事，必当竭尽心力，勿负众人期望倚托之意。不应辞拒，更不可受任之后随便敷衍塞责。

第七，好人要勇于负责，出头作事——从前所谓好人，只是自己不作坏事就完了。现在的好人要能主张公道，要热心办事，要干涉坏人，除去旧日不管闲事不多说话的习惯。以前好人只顾自全，不愿出头，以致坏人胆大横行，闾村无不受害。其实无论哪里，好人总比坏人多；好人联合，正气申张，坏人自然退缩，亦就没有不好的人了。

第八，遵规约，守秩序——村中共同议订的规约，必须人人照办；有一人不照办，则规约为之破坏，实为团体之贼。我们必尽先遵守规约，并且劝邻右共守。要知维持规约，非独学长、学董之责，实人人之责也。

第九，要知敬长睦邻——村父老兄弟之间果真亲爱和睦，

则必自然而然彼此见出长幼之序来。以其敬长慈幼之情，透露于见面称呼声音笑貌之间，不期而长幼之序已明也。翻过来说，能敬长则长幼之序即明；长幼之序既明，亲情睦谊便寓于其中。非和睦众人不能使公事进行顺利，非敬长无以和睦众人，故敬长为要。

第十，要知道尊敬学长——村学之中自以学长为最尊；不尊学长，何以为村学？学长为一村之师长。吾人果有恳切向上学好之诚心则自然要尊师。抑非尊师亦无以提起阍村人众向上学好之精神，故尊师为要。

第十一，要接受学长的训饬——学长以其在父老的地位言，众人大都为其子弟；子弟应听亲长的话。更以学长居师位而言，众人都算学生；学生应听师长的话。凡学长对村中众人或哪一个人有训饬教戒的话，众人或哪一人皆应接受。

第十二，要知道信任理事——理事为我们一村办事的人；既要他为我们办事，便当信任他，不可存挑剔反对之意。他办事若有疏忽错失应原谅他。他一个人太忙，凡可以帮他忙的即帮他一点；凡可以替他省事之处即替他省事。

第十三，要知道爱惜理事——何谓爱惜理事？就是要监督他，“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监督他，勿使他陷于不义，正为爱人之道。凡有劝谏的话，无妨以友谊进一言。不过要避免正面冲突，最好有话对学长先说，由学长转告他。

第十四，要知推村学之义于乡学——我们为村学学众同时亦便是乡学学众。村学是小团体；乡学是大团体。村学学长是我们师长；乡学学长是又高一层的师长。村理事是我们一村办事的人；乡理事是全乡办事的人。凡上面所叙一层一层道理，不独为村学而说，在乡学亦应如此。在村在乡原是一理，可以推

知。

## 学长须知

学长亦为村学（或乡学）的一人，凡学众须知之事，学长都应知道；此外还须明白他如何作学长之道。如何是作学长之道？

第一，要知自爱自重——学长是经学董会公同推举而县政府礼聘的，于一村之中（或一乡之中）为最尊。人家都尊敬我，我亟须自爱自重。只有自爱自重的人可以让人家尊敬。若不知自爱自重，人家本来尊敬的，亦要渐渐看不上了。应知身为一村师长，处处要为人众作表率。要谦恭，要谨慎，要公平办事，要宽厚待人，最不要与人争闲气。要如下面所说的尽为学长之职。

第二，要抚爱后生，调和大众——村中众人皆在子弟学生之列，应加抚爱。村中人为公事常有两方意见不和者，调和之责全在学长。人与人不和之事均所难免，独不许学长与人和。必须自己与人没有不和的，才能调和众人。

第三，于村中子弟有不肖者应加督教——学长是要领导众人学好的。凡不学好的人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留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触犯刑罪，则闾村之不幸矣。

第四，于邻里有不睦者应加调解——邻里街坊本为旦晚照顾彼此相依之人，犹家有兄弟，身有手足。些小嫌隙亟应消泯。若兴讼到官，结怨益深，不但耗财败家，后此子孙亦难共处。乡村不祥之事莫大于此。同村之人均宜劝戒，而调解之责，尤在

学长。学长必须抱定两个主意：一是主张公道，偏私不讲理之人必折之以正义；一是化凶怨为祥和，总期村内自了，不必到官。但学长倒非必定要亲自奔走双方；可先由村中明白能了事之人劝解调处，到八九成学长再出面。

第五，要监督理事而调护之——理事为村中（或乡中）办公事的人。大凡公众的事，公众没法都去办，必得交托一人负责掌理。在此公众与负责人之间，很容易有问题争执，或发生流弊，所以遇到公事，大之一国，小之一家，总都不易办好。一面是一人难满众人意；众人每每不晓得局中负责人的难处，而责望太过，挑剔太多。一面是事权在手很容易措置失当，或滥用职权横行霸道，或借公营私。此时为学长的须要监督理事勿使生出弊病；同时还要调护他，勿使众人肆行攻击。怎样监督他呢？例如看他有骄横之处就背地忠告他；看他有阴私之处就赶紧规戒他。怎样调护他呢？事先忠告规戒，不让他闹出乱子来，就是调护他。要默察众人之意，而时常转告之，就是调护他。众人要说的话，先都由学长代为说到，自不致激出众人的话来。如果有人反对他，要设法替他解释，而劝阻反对者。总不要众人与他发生正面冲突。到必不可调停之时，即劝理事辞职，或速谒见县长报告，以便撤换。

第六，要明白以上的意思而自处于超然地位——总括以上的意思来说，就是要学长超居众人之上，好来监督众人，调和众人。所以他自己不可再负责作事；作事就不免惹人反对，落入问题争执之中，再无人可以出来调和转圜。村学、乡学办法上规定：“学长为一村师长，主持教育，不负事务责任。”又说，“村自治事务经村学倡导，由村理事负责执行，而学长立于监督地位。”其意皆在此。

第七，乡学学长义同于上，其所照顾更在一乡——乡学学长与村学学长同一意义；不过他所照顾的范围更大。他为一乡之师长，教导一乡之众，监督一乡之众，调和一乡学众。他要常与各村学长会面，了解各村情形，帮助各村学长。凡各村不能了结的事，就要到乡学学长面前了。

### 学董须知

学董不但为学众之一，且为乡村领袖，于村学、乡学应多负责任。除学众须知者之外，其更须知注意之事约如下：

第一，劝学众入学——一村之众皆为村学学生；但一般人多不明此意，或不热心入学。各学董为办学之人（乡学、村学办法第三条：乡学、村学以各该学董会于县政府监督指导下主持办理之），第一责任即为劝导大家入学。所谓入学，包有三种：一，送学龄儿童入儿童部（即小学）；二，成年者入成人部，如办有妇女部，亦即劝妇女入学；三，有事集会，无事聚谈，大家都要来。——此末一种，实更重要。

第二，注意开会，用心讨论——学董会应按照暂行规程，有应付讨论之事就要开会；开会时并应用心讨论。因为事情原规定是几位学董合起来负责，若事情只有一两个人知道，一两个人决定，是不行的。凡该开会不开会，该讨论不讨论，即为学董不尽职。

第三，凡经决议，即倡导实行——凡经学董会决议通过实行之事，各学董应首先倡导实行。村中众人向来看领袖行事；领袖果先实行，则事情自然好办。

第四，领先尊敬学长——学长应须尊敬，前已言之。各学

董尤应首先尊敬学长，以为众人倡率。

第五，协助理事办事——学董会即是村学（或乡学）的一个办事机关。虽其中一人经县政府委任为理事，算个办事人，其实各学董亦要一样帮同办事。理事忙不过来，可以从学董中再添一位助理。即没有助理名义的，亦应遇事协助，不分彼此。

以上为各学董须知之事；其为常务学董兼理事者，更须知下列各事：

第六，遇事公开讨论，以求多得人了解与赞助——无论县政府交办事件，或乡学议办事件，或本村照例举办事件，均应提出学董会公开讨论；并应于村学向村众报告，以征众人意见。这样可有两种好处：一是事经讨论，则办法自比较妥当；一是多得人了解，多得人赞助，进行上顺利。凡真想求公事办好的理事，必然如此作。

第七，希望大众监督公事——办公事的人，要希望大家查考监督，不要以旁人监督察问为不便。我们心地光明，人家愈督察才愈了解。自己一个人总不免有照顾不周疏忽错失之处；大家监察才是帮助我们耳目心思所不及。一个有权力的人，总容易用权力太过；有旁人监督我，正是免我作事过了头。我替村中（或乡中）作出些事业成绩来，不如为村中（或乡中）留下这好规矩，好榜样，后来办公事的永不出毛病。

第八，要接受学长的规戒——照乡学、村学办法的规定，学长是正监督理事的人。学长有忠告或规戒的话，应当接受服从。照现在各处地方自治，对于乡镇长都有监察委员会监察他；我们不设监察委员会，但其事则交给学长了。

第九，要礼待教员——教员是村学（或乡学）聘请来，指教我们众人的。而理事是村中办事人，好比东家一样，必须礼

待先生。并要使众人亦知尊敬先生。

第十，要代表乡村对县政府说话——理事虽是县政府委任的人，但原是地方上人，为地方办事的，所以要代表乡村说话。在县政府委任他之意，亦非单为县政府跑腿，而实是意在与乡村接头好办事。

第十一，要善将县政府意思转达于众——凡县政府要举办的事，理事应将其意思善为转达说明，以免乡下人误会。这是理事对县政府应尽的责任。如理事本人对这件事有不赞成的意见，可在县地方会议上陈述，或面见县长陈述，不宜勾结乡下人与县政府为难。

第十二，要与其他各学董和衷共济——一个人办不了事，必仰仗大家帮忙。所以理事要能将各学董意见融归一致才好。如看出谁对谁有意见，必设法化除。学董会开会，或村众集会，讨论事情不宜用表决方式，致显有一边胜利，一边失败的样子。理事身为主席，最好将各方意见调和接近，算是全体同意的样子。

### 教员辅导员须知

教员与辅导员地位本来不同，教员是村学或乡学聘请的先生，而辅导员则是代表县政府下乡村去的。但他们亦有相同之点：他们多半是外来的人（不是本村或本乡的人）；他们多半是在研究院受过训练或讲习的；他们较为明白村学、乡学这套办法，而负有推行这制度的使命。村学、乡学实是一新制度，不但乡下人不懂得怎样一回事，即学长、学董一时亦尚不能就明白透彻。因条文上说的很灵活，施行起来很易歧误，单看条文是不够的。此时全赖教员、辅导员为之讲解指点，纠正错误，引

入轨道。即如这本《村学乡学须知》，亦就是预备教员、辅导员讲给乡村人众听的。教员、辅导员关系如此重大，欲尽其职，须注意下列几个根本意义，并其内涵各点。

第一，村学、乡学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职责亦即是广义的教育工夫——村学、乡学的教育，本以闾村人众为教育对象，要在推进社会为主，而亦将通常学校教育归包在内。故教员责任不以教书为足，且不以能教校内学生为足。1. 应时常与村众接头，作随意之亲切谈话，随地尽其教育工夫。2. 应注重实际社会活动，向着一个预定目标进行（此目标或为村学公议要进行之一项社会改良运动，或一项社会建设事业，或教员自己心中想作之事亦可）。3. 更要紧的是吸引闾村人众喜于来村学内聚谈。如能将村学作成村众有事无事相聚会的地方，此教员即算有头一步的成功。

第二，村学、乡学的工作尽可能的作，不勉强着非如何不可——村学、乡学办法上规定工作，明有“视力之所及又事之所宜”字样，又有“酌设成人部……”，“相机倡导……”等字样，可见是尽可能的作，不勉强着非如何不可。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可以全设，亦可以设两部，还可以多设出几部（如耆老部、幼稚部或其他）。社会改良运动、社会建设事业更是活动的，可以办这件，亦可以办那件，可以多办，可以少办。如此岂不太无凭准？有凭准的，凭准全在机会；机会全在自己去寻，或自己去造。

兹就甲乙两项工作分言之如次：

甲项工作 照乡学、村学办法所规定之甲项工作，系指村学（或乡学）对社会各个分子之学校式教育工作而言。此项工作本以成人为主，但以种种之因袭势力将必先成立儿童部（即



小学)。其次则成人部夜班，这不难成立，尤其是在冬日农暇之时。此项夜班或先从讲故事及各种谈话入手，渐次乃及于识字等课程。信仰既立之后，则妇女部亦可成立。如于某项生产技术（如蚕业、棉业等）有训练农民之处，则农忙时亦正可有一种临时讲习课业之进行。例如养蚕时为蚕业讲习，种棉时为棉业讲习之类。所谓寻机会者以农民闲暇不一，需要不一，待寻而得之也。所谓造机会者以农民之兴趣与需要有待于引发，农民对我们之信仰有待于养成也。

乙项工作 照乡学、村学办法所规定之乙项工作，系指村学（或乡学）对其社会所行之社会式教育工作而言，其内容则社会改良运动及社会建设事业两大类，不过社会改良运动与社会建设事业有时亦待学校式教育而后完成。例如卫生节育等知识方法须于成人部、妇女部传习之；又如合作社之簿记，某项工艺之技术须于成人部特设一种训练班或讲习班等类是。此时孰为甲项工作孰为乙项工作即难强分。两项工作连锁如环，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适当运用，乃村学活动之准则。此教员、辅导员所宜知者。此乙项工作实为村学、乡学之主要工作。其因时因地而异其宜亦最大，在进行上尤有待事机之成熟。例如传染病流行时则卫生运动即宜乘机进行，有匪患地方则地方自卫组织正好着手。农工生产事业尤从自然地理、自然节候的关系而各异其提倡改良之所宜。但所谓事机成熟非必指问题之刺激（如染疫、匪患），而尤在解决问题的主力之发动。居今日之中国，问题之刺激早已不胜其繁重；所以不见事业之兴举与问题之解决者实以解决问题的主力未能发动之故。此解决问题的主力之发动即在村学（或乡学）教员利用村学（或乡学）为村众及领袖聚会之所，而继续作下列工夫：1. 提引问题。村众及

村中领袖既常在村学聚会闲谈，则势必谈到其自身当下所感受之种种困苦问题。盖今日天灾人祸，国际的经济压迫，国内的政治压迫，固无不加于乡村人之身；而在乡村人则尚缺乏一种起来想办法之自觉。此由问题太大，乡村人知识短浅，无从了解而发见其解决之道，更且是散漫单弱，无从逗合为一大力量以求解决。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心里苦闷，各自在家里为难叹气。今使其彼此聚合，将必互道其苦，相向而叹气。如匪患、兵祸、天旱、时疫、粮贱、捐重、烟赌等盛行，见面时最易谈到，谈到自然就要想办法，由此或许会发生大作用。如其乡村人不往问题上谈，则教员应作提引工夫，启发其同受问题压迫之感觉，与如何协力以求解决之意识。

2. 商讨办法。问题既经提引出来，自随之要商讨办法。办法之得有，大抵必赖三个条件：（1）大众齐心协力；（2）教员之知识头脑；（3）本地人之实际经验。所谓商讨办法，意在商得大家同意，更在以教员之知识头脑与本地人之实际经验交换而切磋。许多事所以不能办，都为乡村人零散不齐心合作；只要齐心合作就有办法。许多事所以不能办或办不好，都为上层知识分子所出的办法不切合实际，而乡村当地人又缺乏知识头脑。双方不接头，始终没办法；双方接头切磋，好办法才得产生。所以商讨是极重要工夫。

3. 鼓舞实行。办法有了，有时乡下人以缺乏兴致而不能实行，又或以缺乏勇气不能实行。因为许多事情是眼前不能见出好处的，尤其是有大好处的愈不在眼前得见。而乡下人则所见太近，对于未来的事每不发生兴致。又许多事情要办不无冒险性，而乡下人过于谨慎胆小。此时为教员者即非加以鼓舞工夫不可。所有上述提引问题、商讨办法、鼓舞实行，这三项实为意义至深、关系极大之教育。非寻常所说公民教育生计教育所得比。所教育

者不独在一般农民，兼及其领袖。果有成效，整个乡村社会可以活起来，是即解决问题的主力之发动，为村学（或乡学）教员最大最后之成功。解决问题的主力发动一分，便是事机成熟一分，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即有一分之可进行。事机若未到，强作不来。又事情各不同，此事机会已熟，而彼事或不然。所以说乙项工作作多作少，或彼或此，全凭机会，而机会则在自造。

但欲作上面三项工夫还须看事作事。1. 问题太难，眼前无法解决者，不必提引。若为讲说，使其先认识问题，自未尝不可。2. 问题非急迫，事业亦不大，而不难举行，确可有效果者，亦当亟为提引。3. 在商讨办法鼓舞实行之时，为慎重起见，应常请示上级指导机关。4. 善于为此工夫者不在促动于一时，而在涵养酝酿其动机于平日。

第三，本县整个行政系统悉已教育机关化，应知以教育力量代行政力量——邹平实验计划上说：本实验计划既集中力量于推进社会，则自县政府以次悉为社会改进机关。社会改进即是教育。不过此教育机关化的县行政系统，愈到下级（如村学）愈成为教育机关，愈到上级（如县政府）愈不能不带行政机关性质而已。愈到下级即愈近社会而直接民众，愈应当多用教育工夫而不用行政手段。凡下列几点皆为教员、辅导员所应留意者：1. 村学虽象是代替从前的乡公所，乡学虽象是代替从前的区公所；但村学乡学本身实是教育机关，并非地方自治组织兼下级行政机关者。不过内容隐寓有自治组织之意，至多是自治组织的一种预备，不是正式自治组织。又不过以其中的一个办事人（常务学董）接受上级行政机关委办事项，至多这个人算行政人员，而并非这机关（村学、乡学）是行政机关。此

等处不可混淆。2. 辅导员虽代表县政府，象是个行政人员；但与其说为行政人员，宁说为教育人员。因“辅导”原即是教育工夫。譬如乡学学长、学董、理事、教员，及这一乡所属村学学长、学董、理事、教员等俱在其辅导之列。但他对于这些学长、学董固无权可以命令他们如何如何。他们本各有专职，第恐其于新制度的意义不清楚，未得所以尽其职之道，故设辅导员以辅导工夫导其入轨合辙。辅导员所得为者亦不过劝告指正而已。3. 辅导员须是政府与社会，又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中间的联介而沟通的人。辅导员应代表县政府，常以县政府的意思传达于地方，此固不必说。同时地方上的情形和公共意见亦应由他转达于县政府。他要能作到：自政府看他是最能了解地方情形的人；自地方看他是最能通悉政府办法的人。更好的是他能主持公道维护大局：有时为地方对政府说话，以救正政府之失；有时为政府对地方说话，以安抚民众之心。教员虽不同辅导员负一样责任，然亦应同具此态度。4. 教员的责任要在使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于问题研究方法供给上成一连锁循环关系。本来在社会改进机关的系统内，上级机关（如县政府研究院）对于下级机关（村学、乡学）具有两项作用：一为最高方针之指导，一为后方材料方法之供给。但欲使此后方机关得尽其功，还须教员善于利用。例如后方有农场苗圃（属县政府第四科或研究院），其棉种、树苗等有待村学、乡学来采用，但教员若不能启发农民棉种改良的要求，鼓舞起造林运动，则推广不出去。又如在地方有防疫的必要，在医药机关亦备有防疫方法，但教员若从中耽误，便可致地方瘟疫大起，而好方法亦失其利用。总之，一切的材料，或较专门的知识方法等，在教员自己断不能具备。但他如能善于利用后方供给机关，则凡后方所有者悉等于他自己所

有，效用岂不伟大，所以教员遇有疑问，或自己办不了的事，应当请教上级机关，向后方讨取办法。教员若能不断以地方种种问题需要向上级请示索求，则上级机关自不能不为种种问题之研究，以为种种方法之供应（研究院所办不了的还可请教外面更高学术机关）。如是则在学术研究上自有切实进步，不断地向前。社会既得到满足，学术亦因以进步；学术进步，社会更得到满足；此连锁循环作用之开展，其关键全在教员也。辅导员虽不同教员负一样的责任，但亦具有差不多的关系。

第四，村学、乡学应处处着眼为地方自治团体之完成——原所为设立村学、乡学之意，即在促成自治。是以村学之组织隐然即一村之自治组织；村学之工作（尤其是乙项社会改良运动社会建设事业的工作）实即一村之自治工作。乡学之组织隐然即一乡之自治组织；乡学之工作实即一乡之自治工作。其缺然未备者则此地方社会尚未凝成一体，发生其团体作用。故其中担负公职之人员如学长、学董、理事等，皆非出于团体作用所产生，而为政府聘请遴选委任。组织上虽隐寓自治之意，但能否如其组织以运用去，以实现其自治工作，尚未知也。为教员、辅导员者（尤其是辅导员）亟应向此处用力作工夫，俾其渐得形成一自治体。在村学乡学组织之初所当注意者：1. 村学为乡学基础，应先成立村学，后成立乡学。但事实上又不能候村学全行成立再成乡学。则一面成立两三处村学，一面即为乡学之成立，较为得宜。2. 村学学长、学董、理事人选须就全村人物慎为安排。大抵学长宜老成厚重之士，理事宜年力富强、头脑清楚之人，各学董都具有信用资望。乡学除当然学董外亦须遴选安排。凡此遴选安排之事其权在县政府，但必须辅导员先能代为用心访求考虑。总期此种人选安排发表后，翕然得众人

之心，虽不出于他们自己推举，亦同他们（有熟练的组织能力以后）所要推选的一样。如此则必能使散漫的村众凝合一体，渐渐发生团体作用。否则，一有不得其人之处，众心不能翕合，或领袖彼此间不能合作，是未合先分，离自治希望愈远。

在村学、乡学组织成立以后，辅导员负辅导之责，应随时注意学长、学董、理事以及村众等的行动态度合于村学、乡学办法所规定否？合于本编须知所说他们各自应尽之义否？尤其应当注意的是：1. 村理事能遇事与各学董商洽否？他所经手办理事项能随时在村学向村众报告否？每月一次总报告曾实行否？2. 乡学学董会如法开会否？乡理事办事能与各学董和衷共济否？众人对他感想如何？3. 学长能以向上学好之意勉励众人，振作大家精神否？能调和众人使彼此融洽否？能自处于超然地位，不与理事争权否？能一面劝众人信任理事，一面自己监督理事否？4. 村众能知注意公事热心开会否？知尊敬学长否？遇有不满意理事之时，知诉于学长，而不与理事冲突否？

凡以上各点为教员者亦同应注意。不过他与辅导员不同处，他对学众要多负责任，而关于学长、学董、理事者则不妨让辅导员去负责。因他本来是教育民众的。但辅导员住乡学时多，对于各村学学长、学董、理事或不如各该村学教员熟悉，难免照顾不到，应托村学教员代为留心，帮同辅导。又辅导员对村学、乡学教员尽职否，亦应留心考察而辅导之。

录自《乡村建设论文集》，109—129页。

1936年2月增订版，乡村书店。

《乡村建设》旬刊，3卷16期。

1934年2月1日。

## 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 成功的时候

作者附言：《大公报》自本年（二十三年）起有“星期论文”之设，征社外人为文。这件事如果办理得法，倒是很有意义的。从我们自己说，则是得一个对时局发言的方便。时局在我们从事乡村工作者的意识中，无一刻放松过。当然对于一个个问题都有一些意见在。但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对一时的时局上用力，不在眼前争短长，所以少发表。然而从历史演下来的时势，乡村问题不已迫到眼前来，成为眼前大问题吗？我们的工作对时局，时局对我们的工作，将一天一天密近，而为直接关系。我们的意见亦逐渐要表示了。因此，我们很乐于应征。所说的话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并可以代表我们一帮朋友。所惜我们的见解主张是有系统的，而这里文章只能以两千字为度，恐难说得条畅清楚。望读者原谅，更能参看我们的出版物或其他鄙著便好！

最近立法院将宪法草案公表，征求批评意见，仿佛再经一定程序便将有宪法成功。按理说，正在建设新国家的中国人，对于这组织国家的根本大法，应当如何注意，如何热心讨论。然

而今之宪法草案似乎并没有得到他所应有的际遇。没知识谈这问题的人不算，凡知识足以谈这问题的人，大约未必有千分之一来用心于此。这或者有种种关系，例如：一，以国际形势紧张严重，人心不遑及此。二，以这部宪章似为当政的一部分国民党所包办，凡异党异派一切怀挟异见者遂不愿置喙。乃至其他等等。但这似乎都不足为真的理由。这里面的真消息，我们以为是中国此刻还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

从我们的见地，认为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制宪不是眼前急务。制出来，其不过与过去几度制宪同其命运。诚然，自清廷倒后，国家组织即入于临时状态，到而今二十几年还在这临时状态中过日子，真是难受得很。谁不盼望早点结束。无奈历史演下来的命运不能由人。中国以其固有文化之特殊，社会构造历久而不变，抑且已到了自己不能再有什么变化的地步。及至近百年东西交通，人类历史汇合一流，此老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乃迭起变化不能自己，以求其适应。顾每一度变化均不见有何积极成功，只是他自身更深一度的崩溃解体。至于今日，殆犹未知其所届。其所以然，则以中国西洋在文化上之不同是根本的，其距离之度至大故也。不穷追至于最后，不能为新的缔造。吾人正丁此崩溃解体之末运，新构造的端倪将见未见之时。一切较理想的较永固的法律制度，均去眼前事实太远，安敷不上。所谓宪法大抵为一新政治构造之表见。政治构造依于社会构造为其一层一面。果其有宪法之成功也，则是中国新社会之构造，已大体形成。现在如何配说这个？

我们可以随便拈出几点意思来说说，以见这问题的尚远。

一，制宪不能不从理想要求着笔。此理想要求大抵为外面



世界潮流所开出来的，而非从固有历史演出；但意识上虽可猛进，社会事实的进步却难。而况外面世界所给他的刺激是使他破坏，很少是帮他长进。所以此老社会（尤其占十分之九的乡村）除了残破之外，还同从前没有什么变。一本乎外，一本乎内；一则文章不厌其美，一则事实不堪其陋。二者太不相侔！象这样缺乏事实根据的宪法会成功吗？如此制宪是大可不必的。须知中国今日所苦在任何法律制度之无效，而非在那法制的不合适。不合适可以制新的。若无效则更制新的还是无效。制之何益？其所以无效，都因为意识要求与社会事实之不侔。或有人问：降要求以从事实则如何？答：此固不可能。果如是，则亦非宪法。

二，人类生活靠习惯。无论小事大事，无论在个人或群体，一切无不靠习惯者（因为人类生活方式要从后天学习，与动物从本能者异）。一种法律制度虽出于意识之制作，要莫不有与之相应的习惯为之先。否则，是运用不来的。但中国今日与新制度相应之新习惯在那里？我们实在看不出一点头绪来！尤其要知道的，自昔中国人的生活更特别依重社会礼俗。因为他没有具统制力的宗教，而本乎人情以为教化。化民成俗，深不易改。他政治的构造松缓无力，人民仿佛只有社会生活，而没有国家生活。社会秩序存于礼俗，自尔维持，若无假乎上面的法律。今后的趋势，照我们眼光见地看来，将必为新礼俗之创造。一切经济的政治的组织构造要于礼俗表著之，确定之，而不是以法律替换过礼俗。中国将来亦许会有一部宪法，但必待这新礼俗养成后才行。所以这件事是很慢的，前途尚远。

三，或有人问：我们制出宪法来，再本着宪法去培养习惯，力求实践，不更方便吗？答：不行。此刻没有宪法可以制出。宪

法这样东西，按理说应当出于全国人一致的意思要求，得全国人一致的拥护才算。但事实上，人类历史自今以前大约还不曾有过这样一部宪法。因为近代国家依然是阶级统治，其所有政治构造依然是机械性的构造。其所谓一致，盖犹托于理想，其理性还没十分当家。便如苏俄之新例，亦何尝不为阶级统治、机械构造。不过一个是东风压倒西风，一个是西风压倒东风，不同罢了。我们初不想以高过近代现代的例望中国。中国此刻倘能有一优越有力的意思要求，可以托名全国一致，亦就可以演成一种政治构造，产出一部宪法来。无奈，这亦作不到。因为：

（一）从中国社会过去之散漫，今日之纷乱，无法可以形成一部分优越的机械性势力。因此，亦就无法产生一优越有力的意思要求，压倒其他。

（二）从中国固有思想与西洋思想之矛盾冲突，西洋近代思想与最近思潮之矛盾冲突，使得中国人迷乱纷歧，无法可以构成一部分优越的理性势力。因此亦就无法产生一优越有力的意思要求，压倒其他。

此二者更互为因果影响，使得中国人真成了“人各一心”；彼此心肝痛痒都到不了一处，意见理解很难相通。其形势之分散，心理之乖舛，盖古今所不可一遵。虽国遭大难，曾不能稍好。丁文江先生叹息中国人没有公共信仰。其实何敢谈信仰。且问他有没有共同的问题，公共的要求！？于此时而言制宪，制出来又有什么相干？还不同某先生作了一篇文章，某会议发了篇宣言一样吗？

于是我们本不敢以高过近代现代之例望中国者，由历史命运所决定乃非为此创例不可。即是：他以不得形成阶级统治机械性构造之故，乃反逼到全国一致理性构造路上来。不到中国

人转到共同的问题上来，构成差不多一致的意思要求的时候，产不出宪法。试想这不就难了吗！这不就远了吗！

末了，结束我们的话。制宪非急务，果有心乎制宪，且先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我们乡村建设运动所为的是：

（一）求中国社会的真实进步，平均发展，俾与建国的理想要求相接近。不望高山说高话，且从平地向上爬。

（二）从事实问题探求经济上政治上的新路向，即是养成新生活习惯，新礼俗，以建立中国新社会的组织构造。

（三）迎着历史命运走，推着历史车轮转，转到中国人一个差不多共同问题上来，从而条理出其差不多一致的意思要求，产生一部真宪法。

《乡村建设论文集》第一集，47—52页，

1934年11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

《大公报》（天津），

1939年4月22日。

## 邹平乡村建设一般<sup>〔1〕</sup>

主席，在座各位同学：刚才主席介绍的话，推奖太过，愧不敢当！今天预备讲的话，想把我们工作的大概情形介绍给大家；先略述事实及经过，再讲理论一方面的话。

兄弟同我的一般朋友——所谓朋友，是指国内各地与我往来的乡教同志——在民国16年以后（放宽一点说，还要在前两年）。16年起，兄弟在广东，17年以后回到北方来。比较具体一点的事业是河南村治学院。村治学院在17年筹备，18年成立，惟今已结束——在19年便已结束。20年春，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乡建问题。其实在山东的工作的大体方式及其意义上是和村治学院差不多的，不过在筹备乡建院时，觉得用“乡村建设”四字比“村治”二字妥当一点。因“村治”二字是生强硬造出来的；而且“乡村建设”四字是现成名词，目前四字运用起来，已很普通，很流行了。乡建院自20年春筹备，至秋季成立，到今已有三年多光景。

我们过去的工作，多着重于人材的训练及问题的研究，所以乡建院两年来很象一个学校。所不同者，培养出来的人是做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的人。最近这一年来，工作才不同了一点，

---

〔1〕1934年5月3日著者在徐州的一次公开讲演。记录者为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陈增善，据称未及请著者过目。标题为《教育新路》编者所加。

院里没有学生，不做培养人才的工作，从去年7月起，我们的主要工作在两个县里。山东省政府划定二县给乡建院做实验区。因此我们的工作偏重于地方实际工作方面。这是比较的说法。

现在与大家说明的是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形。二县，一是邹平，离济南沿胶济线，向北不远，在山东中部；又一是在山东西部，即曹州府首县菏泽。这二县在行政上完全属于乡建院。民20年，在乡建院成立时，即划定邹平为乡建实验区，惟在乡村建设上有许多事，不能做实验工夫，所以这一年不能算是乡建院，只能算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这是一个不同。怎么讲呢？从前邹平虽为乡建实验区，可是不能照自己的主意去做，现在却有机会去做了；比如办合作社，原本须要依照实业部颁布的法令，现在却不必了。现在政府许可我们依照自己研究所得的方案办法去办，如关于地方自治、乡村自治，也可包括在我们县政建设之内，不一定要遵照中央的法令。现在有这样一个人机会，让我们去实验；从名词上也可以看出前后的不同，县政建设实验区比乡村建设实验区范围要大一点。

县政建设实验区里的工作包括三大项：

第一，县以下地方行政改革的实验工作。县政府为一行政机关；今日中国县政府究竟怎样办才好？比如县政府的组织应该怎么样？应该如何分科？人员的分配应该怎样？司法究由县政府兼理的好还是不兼理的好？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研究和实验。这在邹平菏泽便自己有一个方案，种种新的行政都可依自己所立的方案去试办实验，跟其它县分是不同的。

第二，县以下地方自治研究推行的实验工作。普通县以下有区，区以下有乡；乡有乡公所，区有区公所；各地从乡自治到县自治的完成，便是全国地方自治的完成。这是国民政府规

定的地方自治建设的一个程序。究竟怎样推行，才能完成，这是我们第二项工作。这工作也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案去做，但必以县行政完成为期。

第三，社会改进工作；就是狭义的乡村建设工作。社会的改进工作，从经济上、文化上求社会的改造，使之进步。这第三项工作很重要，是第二项工作的根本。做了社会的改进工作后，第二项地方自治的推行工作才容易做。如社会改进工作没有办好，社会没有进步，地方自治便不能成功。社会改进工作为地方自治推行的条件。社会改进工作与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很相仿佛，或者就是一回事。

我们的实验区——邹平、菏泽二县里就是做这三项工作。这是一个粗略的概述。

邹平是一个比较小的县，有16万人口，三四百村庄。就地方情形说，不算苦，家家都有地。有地的约占百分之九十几。可是大地主很少，没有有地二百亩以上的人家。这里说的亩是指“大亩”，每一“大亩”约当三亩；故所谓二百亩，即相当于六百亩。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即是乡村组织之试验。粗略说来，便是将从前所划分的七区取消，按地理、习俗等，将全县划分为14乡。乡以下为自然村庄。原来有三百户五百户的都为一个小村庄；过少的把它改并。过去的闾邻长编制还没有废掉。不过区、镇、乡、各公所及区长乡长取消后，将怎样组织呢？我们便这样办〔法〕：村设村学，乡设乡学。这村学乡学，一方面看去，象是个学校，因为有学长、学董会、教员、学生；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地方社会的组织，因学长、学董即为该地方社会的办事人，学生即为全村的男女老少。这样，以全村做成一个学校，我们有一个名词说明它，即“社会学校化”。村学的用意

和作用，有八个字，便是“改进社会，促成自治”。全村父老子弟共谋全村的进步，共谋全村的改善，故说“改进社会”；学董是办事人，学长是领导者，学生大家一起来办事，故说“促成自治”。这八个字是我们的口号、目标。

村学做些什么事呢？

（甲）在县政府与乡学指导协助之下，酌量在村中设成人部、儿童部、妇女部，仿佛学校教育。儿童部相当于小学。所谓酌量，即根据财力而定；若三部不够而财力有余，可设五部，即再加老年部、幼稚部。总之，村学对于全村各个分子都担负教育的工作。

（乙）在县政府同乡学指导以下，相机进行社会改良运动，如禁烟、禁赌、放足、节欲等。此外并相机办理社会建设事业，如筑路、造林、组织合作社等。这些都是村学应当做的事。

而（乙）项工作所不同于（甲）项的，〔是〕（甲）项好象对各个分子做工作，（乙）项是对社会全体设施的事业。但两者都是教育工作。

同时，仔细看时，村学也便是自治机关，因（乙）项中做的便是地方自治工作。自治工作内容不外乎此。我们不过将自治工作放在教育中去进行就是。

村学上面有乡学，包括三十几个村庄。乡学比村学高一级；村学里的儿童部似同国民小学，而在乡学中便相当于高级小学或完全小学。因为这在村学中是办不了的，归入了乡学，合三十余个村庄，在人才上、经费上都足以办理。乡学工作大体上是和村学一样的，凡村学办不了的事，都可归入乡学去办。

县政府对学董会，给它一个委任。学董会接受了县政府的委任，去办乡学。我国普通区长原也是受县政府的委任去办事的。

乡学学董会中有一人很象是区长。村学学董会中有一个人很象是乡镇长。所不同的，上面还有学长；学董会是团体而非个人，以此来代替从前的区镇公所。粗略来讲，邹平一年以来的试验工作就是这样。有许多工作，如农业改良及合作社等，都是赖村学乡学来推行的。举例来说，比如邹平北有数乡，在从前是第六第七区，现在则为第十一、十二、十三乡；这几乡原来是产棉的，可是因为棉种不好，近来棉产量及质地都已减退。我们对此即作棉种改良运动，以我们农场育种所得结果，供乡学村学去推广于农民，农民所收棉花，复由合作社运销。又如造林，我们也教乡学村学去办。再如放足，再如禁烟赌以及婚葬等事之节约运动等，也都是乡学村学应做的工作。有时由县政府发动，有时由乡学村学发动，惟乡学村学在办理时，都须受县政府的指导。由村、乡、县以至研究院，都是有纵的一贯的系统的。

此种组织，行来不满一年，讲成效也很不容易讲，不过社会改良及建设等事一直在做。如改良棉种运动已做了二年。在推广美棉的第一年，只有四千斤棉种，至收成时已有三万多斤。去年——便是第二年，竟有三十多万斤棉种。各合作社的职员，都派人到乡学去受训练。从去冬到今春，共办了合作训练四处。预计今年的收成，籽棉可收三百万斤，棉衣可收一百万斤。上海纱厂及银行界很重视这棉产，愿意协助我们。这是前途有希望的工作。

邹平比较无大匪患，邻县章邱就有，不过也不是绝对无问题。去冬曾办自卫训练，是集中训练：每25家出一人，全县共一千多人，分二次训练，即五百人训练一次，由我们院里教官去教他。结果还好，来受训练的都是“有身价”的农民，不识字很少。他们多半是自己来的，并非雇人来代受训练。雇人



来代的只占百分之一。训练后分头回乡去，一乡有一队；全县十四乡共有十四队，该乡的治安就由该队维持。从前邹平每区都养有常备团士五十至七十多人，由地方负担给养，可是有种种不好的流弊，如勾通甚至包庇匪类等情事。现在已统统把它解散，由乡队替它。队长多由高小毕业生充任，常住在乡队里，其余队员都在家里。这样，一方面可减轻地方上的负担，一方面没有流弊。邹平的大概情形便是这样。

在菏泽这一面，去年黄灾很重，论理我们工作应该很受打击，因为半数村庄都被淹没；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得了黄灾的好处。

菏泽全县有二十乡，每乡设一乡农学校。办乡农学校的以委任去的为主，不象邹平，是由地方上的人充任的。又在菏泽仍以行政力量去推进，每一乡农学校施行乡村自卫军事训练，同时使他受四个月的民众教育。将民众教育与军事训练合在一起施行，规定民众在一定年龄，即须受军事与教育的训练。现在每一处训练五六十人，全县廿处，同时训练一千多人。现在已训练到第三批。去年黄河决口，防水工作如筑堤等，都是由乡农学校率领那五六十农民去做的。水灾以后的救济，也以乡农学校为救济机关，如调查水灾的损失，对被灾的救护，也以乡农学校为救济机关；如调查水灾的损失，对被灾的救护，都靠那五六十个训练的农民做的。因此救灾工作都较他县办得要有条理。到菏泽放赈的人，心里觉得痛快，因为他们都已知道把赈应该放到那里去。

刚才说，我们的工作得了黄灾的帮助。怎么讲呢？首先，黄灾让我们做工作的人与乡民发生了很好的感情。平时去办乡校，他们不一定欢迎，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这工作对他们没有什么好

处。在大水灾中，他们看见我们乡校的先生与同学，昼夜不息在水中来回奔走做救济工作；大水来时，都以性命来拚。人到患难时，易生感情。经过了这次救灾工作以后，不论作什么工作都很顺利。

不但如此。灾后各方来放赈，必须做调查工作。调查这工作，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是很困难的。此次灾后去做调查工作，很好做，因为他们知道调查后，非加税而是放赈。再者，灾后也很便于组织农民。有十几亩地的人家，因放赈放不到他，我们乃介绍中国银行及民生银行来放农赈，从而可使农民组织互助社。现在中国银行、民生银行放款有放三万的，有放五万的不等。这是水灾给予我们的一个机会，在平时是得不到的。去年放的农赈，都要在今年还钱的；我们预算起来，今年麦子卖出，麦价必贱，故我们特组织农业仓库，办理运销合作，提高粮价，使农民少吃一点亏。

再有一件事，屋子坍倒了，灾民太多，收容不了。一部分过分老的老人，及一部分年纪太小的小孩，都不能收容。我们特地收容十岁到十五岁的孤苦无人照顾的灾童，共一千多。给他们喝粥，使他们受教育，叫他们住在乡校。去年我去看，有一乡有二百灾童，很整齐；第一，年龄很整齐，第二衣服很整齐。衣服是上海巡警穿旧了的用不到的制服，由上海方面赈济来的；给他们穿了，好象一群小警察。吃饭时大家在一起，蹲在地上。饭前饭后都唱歌。这觉得都很整齐很好。这里有一点意义：假使他们不受到水灾，不成灾童，大概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受灾而受到教育，而且从小能受这样的教育，在这一方面，水灾给了我们工作上一个帮助，同时使这些儿童对于他将来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此次刘匪(指刘桂棠——善)窜扰的地方很大,在苏鲁边界扰乱得更利害;但不敢入曹州,在曹州西边绕了一个圈儿便走了。如果他们真的进曹州来,也挡不住;可是他们若来时,在菏泽可以调集三千多农民武装起来自卫防守;他们对于这三千多农民的武力,犯不上自找麻烦。由此也可见农民能自卫的好处。

以上是乡建院工作的大概情形。我这里讲的,偏重于乡村组织及自治工作,关于县政府的改革一方面,因为诸位兴趣少些,不再报告。

总之,中国一切事情都在改变中。在改变中就应该做实验工作。不必把各种事情都做得整齐划一。如地方自治组织,这时尚不应该说那样对那样好;应该在实验中探求。这是我们设立乡建院的根本意思。我们想探求出一个方向,开辟一条新路,同时想推动乡村社会向那新方向前进,使农民不识字的识字,无组织的组织,不生产的生产;从地方社会的改进,到地方自治,到县行政,以及到整个社会制度都有办法。这样,基础打好,国家才能建设。

我和几个朋友,原做的是社会运动,或可说社会改良运动,或也可说是社会改造运动。不过政府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探求一个新方向。这种新社会运动,可说是一种社会教育。因为是一种教育,故在邹平的工作每被人看作是一种教育工作。人家往往把定县与邹平相提并论。其实从动机上讲是不同的;邹平工作的动机不在教育。现在邹平的工作才转到了教育上来——这原是从“乡村自治”转过来的。

## 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sup>〔1〕</sup>

余于前日晚莅临此间，但对于此间之怀想则已甚久。忆民国十七年秋践四先生出长此间时，晤谈沪上，曾邀约余于渠就职之日，前来演讲；余亦应允，其后为事所牵，未克如愿。屈指迄今，忽忽已阅五年。此番来此，目见学院之较前扩张进步，又为践四先生一人始终其事，既为学院本身不胜其钦慰，亦且为友朋个人欢乐无既也。上月内践四先生去邹平参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余许于最近期间来此领教；虽此来匆匆，不能多留，今日即须赴南京，在京留一两日即须北上。对于此间各实验实习机关与事业，皆不及一一详细参观；与诸同学诸先生亦不能有长时间之谈话，私衷之感怅怅与歉然也。所幸7月初旬，仍当再来，届时或者可多留若干时日，从容盘桓。顷承践四先生之命，为诸同学一述余心目中对于民众教育之一要点。

今日讲题为《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在座诸同学或已知余在山东办理乡村建设研究院。既知余所从事者为乡村建设运动，余更希望诸同学能深知乡村建设运动之做法即为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余心目中以为民众教育之所以能救中国，乃是从余自己说起。日

---

〔1〕1934年5月31日在无锡江苏教育学院讲演。朱秉国记录，未经著者审阅。

昨曾与诸先生谈及，余于任何专门学问，专门功夫，皆未尝研究，皆未曾做过，特以中国问题重重迫我，使我不能不思量，不考虑，不发愁，而欲求其解决之方法。因之乃参考各方意见，留心他人见解，最后我得一结论。我之所以认为民众教育可以救中国者，实属从研究中国问题得来，非从研究民众教育得来。民众教育乃办法，中国有问题乃事实，从方法入手以求吻合问题，此实不可能；其顺序当从问题入手，归纳一方法，则此方法当不期而切合问题。余今日所欲申述者，即从中国问题的研究而归入于民众教育；关于此点，余当以极简短之意见贡献于诸同学。以下请先论中国问题。

中国有何种问题？问题又何在？此实为一般人所争讼而不得有解决者。各有其说，各有所见，同一世间有各派各家之不同，过去数十年内又有此一时与彼一时之互异。如二十年前之辛亥革命（1911年），此乃民族革命问题，但此问题又似政治问题而为一般人所公认者。其后民国十五年之北伐，似又稍异于辛亥革命，因北伐一方面含有浓厚之经济改革色彩，一方面又有民族对外抵抗之意味（如打倒帝国主义）。从前者看，为经济问题，从后者看，又为民族革命问题。因是中国问题至少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民族对外问题等。前两问题似属对内者言，后一问题为对外而言。此点于“三民主义”中亦可看出。民生，民权，民族，乃经济、政治、民族对外，三问题也。一般人所讨论之中国问题，大抵不出乎此。且在每一时期中时常有畸轻畸重之势，很少有人视之为一个问题。兹以时间关系，余不能详细说明各派各时期所着重者为某一问题，余仅为诸同学述余之意见如何。余以为视中国问题为此三问题，似是而实非也。中国问题不能如此解释。余先应提醒诸同学者，即此三问题或三

种革命，同时具在，在其他国家中不能找着，且亦无其事。申言之：余亟望诸同学认清此种看法是有错误，不对的。至于并时而欲解决此三问题，尤属不可能。故余只视之“似乎是”而已矣。

先就政治问题言之。政治问题即是要求政治革命而又形成民族革命的问题。以余观之，中国无此问题。中国问题之由来——民族革命之发动——非中国社会内部爆发的，乃由外界引发的。关于此点，欲知其详，势非三五日不能毕述，因须从中国历史上推论中国内部社会革命之所由发生也。但吾人可闭目思之，中国如不与西洋及西方文化有接触，而仍闭关自守，即使时至清末，或者有如明之抗元之事实发生，决不致有中山先生之革命运动。换言之，中国人民如仍属过其自给生活，其结果则反复演示一治一乱之现象而已矣；决不会有武昌之起义也。因此之故，民族革命非本身问题；与其曰政治问题，不若曰文化问题；良以由文化之接触，文化之比较而引起中国人民政治上文化上之要求也。吾人目见西洋人之自由平等，多数人之政治，发生极大之羡慕，从而启发中国人之新理想，推翻皇帝之制度；余故曰中国问题之爆发，非内部的，与其谓之为政治问题，毋宁谓之为文化问题。

更就民族对外抵抗问题言之。中国民族受外族之压迫、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此系事实，亦属问题。但以余之解释，犹未到民族革命之分际也。此一问题，看似复杂，实颇简单。何以言之？使中国而为印度、为朝鲜，民族革命是也；无问题可言，极清楚，极明白，我为革命者，英日为革命之对象。二者之间应有民族革命；民族革命之爆发，决不能避免。但中国实非印度，非朝鲜，其分际尚不及；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中

国，不外借助于不平等条约；即是在经济方面，握有统治权，亦属间接的凭借不平等条约。如今日中国与各帝国主义者通告废约，各帝国主义者不允许，于是兵火相见，——是乃中英战争、中日战争、中……战争，是乃国际战争，岂得谓之为革命哉？所以然者，即分际不到之故也。印度之于英国，朝鲜之于日本，为民族革命，非国际战争，事实昭彰，无可讳言。在中国，实不如是。不观夫民国十七年夏日本之出兵占据山东，去年之占据东三省，迄今犹未退兵乎？我国政府当局之所以回避，所以不抵抗，平时高唤打倒帝国主义，而遇到帝国主义反不去打，反不求抵抗，即由于有外交之后路可走。使并此后路而无之，非打不可，非拼不能；则言中国有民族革命是也。故今日中国能与外国讲外交，即未到民族革命之分际。不宁惟是，吾人省量省量自己，如不先将自己造成一强有力者而后对外战争，事势亦皆难操胜利。因之则用力之点又须转移，目的在对外，而功夫仍在内。就兵力说，非一朝一夕所可练成，必有充分的多方的预备；而在财政方面尤属重要，不能忽视。财政方面无相当办法，迨勤于练兵，亦无济于事。此点在过去固如是也，而在今日则更甚。由此更可知事虽对外，但仍须先作对内之准备功夫。——有此可犹豫时间，亦即分际不到之一明证也。因之此一问题仍属文化问题，非民族革命问题。

余论至此，更愿以极显明之一例证为同学告。中国经济之成为问题，无法对外，实为无可掩饰之事实。今日吾人最感受痛苦者，非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政策乎？当十五年北伐，党军克服武汉之后，帝国主义者群相震撼，手足无措，推原其故，实由于党军在广东时曾有香港罢工之事实。省港断绝交通，不相往来，帝国主义者卒未如何。繁荣之香港顿形衰落，几于不可

收拾。其时国民党尚在容共时期，外人之视国民革命，即共产革命。故十五年秋季党军莅武汉，十六年春季，不论西洋人日本人皆纷纷退却，望风而靡。航船停航，工厂停工，银行休业，洋行关门；由此以言，则帝国主义者已停止其侵略行为而吾人之目的亦已达矣。殊不知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国人乃一无办法，工人失业，商贾无市，交通不便，行旅维艰，火油不能应给，夜间几入于黑暗世界，汉冶萍煤矿不能运到，一切实业亦将停滞，无法进展。兵工厂因是不能制造子弹枪炮，继续北伐，几成问题。于是乃有工人与政府交涉，政府与各国领事交涉之事发生，此不啻仍请帝国主义者行使其经济侵略政策也。吾人当知所以造成此种结果者，实由于我国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已甚久，譬之一吸鸦片烟者，积年累月，中毒已深，一日绝之，事必不易。鸦片烟为害之大，诚哉是也。但戒鸦片烟之方法，不专在于断绝其供给，尤赖于培养吸鸦片烟者之身心。以此之故，吾人不难推而言之，民族对外抵抗问题，培养自己，在文化方面用功夫，实为一重要关键。亦即不到分际，则此问题不能成为问题；其成问题者，仍与前两问题无异，皆在于文化之补充与培养，非仅限于民族革命而已也。

总之，余以为在中国即或有民族对外问题，而做功夫则仍在自己，仍在内部文化方面。开发产业，促进文化，方能解决对外问题。至于中国内部应有经济政治之改造，其事亦极显明，但此项问题，亦属从外引发而来，非中国内部爆发所由生也。所以从外引发又含有三重意义：第一感受外力之压迫，外人之欺侮，乃引起整顿家务之动机，如清末之推翻皇室，即其例也。盖皇室不推翻，于整顿家务颇多妨碍，不易进行。第二从外来之文化启发吾人之理想发生改革政治经济之思念。第三中国今日



之社会非复已往之社会；近八十年来中国与海外交通，东西文化接触，于是中国之社会发生变化，其情形不能同于已往，实际地变化而转入于世界之漩涡中，使社会发生许多问题，而为世界问题之一部分。如中国社会中渐渐有资本主义之现象发生，亦即此故。惟其如是，中国问题既为从外引发而来，则问题之解决即在于补充文化，做改造文化的功夫，舍此则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明乎此吾人当可知今日一般人所论之革命，皆已错误。未能认清以上三问题之似是而非，不知以上三问题实皆为一文化问题也。

民国十二年时之共产党，十五年时之国民党，皆以为民族革命之进行须资产阶级作动力，农工出力；不如此，则经济无从出，革命不能成功，力量薄弱，声势不能浩大。即如国民党改组派之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其用意亦复如此。殊不知中国问题之所在为文化问题，此种动力皆非也。最可怪者，其他各国之社会革命，如中世纪之农奴解放运动，日本苏俄之农工政策，莫不如此，而中国社会问题之解决乃不在此。中国内地农民百分之八十不识文字，知识极浅，如欲以农民为革命动力，势必复辟运动之发生。如欲与农民讲共产主义，或则谈虎色变，或则茫然不解，亦不能终于成功。因此种种，余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之动力，应详加分析，仔细寻找动力之所在，而后启发之。吾人当帮助动力之发展，不能期待动力之救我。余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之动力，在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两者构成一大力量而后始可解决中国问题。兹再为诸同学一申论之：

吾人当知中国之有问题，即在与西洋文化接触之后，所有民族自救运动，整顿家务方法，其发动有二不相同之形式。第一知识分子之领导（尤其是借助外面的知识者）；如历来之宪政

运动皆是也。辛亥革命之成功，多属日本留学生之力。其时留学日本极多，回国后从事陆军者，将黄龙旗变为五色旗，此为武人的革命；文人的革命，不做清廷官吏而做省议员，即已了事。十五年北伐又多为留俄学生所主动。再追溯民元前之变法维新运动，亦由于曾纪泽使英回国后之倡议。又如孙中山先生所以倡导革命者，亦因孙先生生于广东，久居澳门，往来海外，不时与外人接触之故。如孙先生为甘肃新疆之人，未出乡里一步，决不会有革命思想。同时革命的策源地所以为广东而不为内外蒙古青海者，亦即此故耳。第二内地无知农民之发动：如清同光年间之教案，光绪二十六年之义和团事件，皆因内地农民不堪外人之侵扰而发动。近年来河南河北等地之红枪会、黄沙光，四川之神兵，亦无非感受军阀之压迫而出此；虽其形式不同——借老祖孙悟空等人相号召——而其本旨则与知识分子初无二致。余为数十年来中国问题之所以不能有解决，即由于此两种动力，上下不通声气，头脑与身体分而为二。知识分子做外国的梦，做上层的梦；农民做自己的梦，做下层的梦。始终背道而驰，各不相谋，欲求吻合同归之一日，岂不戛戛乎难哉？使此二种动力构成一个力量，上下互通声气，头脑与身体合而为一，则中国问题之解决，亦颇容易。知识分子领导革命有两大弊端，在所难免。其一为虚见：只有良好的理想，缺乏真实的认识，搔不到痒处，握不着关键。谈革命则革命不能到家，谈建设则建设不能到地；偶有所悟，惘思为之，而其实有关国计民生与否，则未之计也。其二为背叛民众；知识分子之所以背叛民众因其入手方法，即已走错。使民众离开乡村，抛下锄头而去打倒帝国主义；诚恐帝国主义未能打倒，而农民自身已成为饿殍矣。吾人当知农民决不能离开乡村，乡村即农民，

农民即乡村；吾人如使二者分开，则背叛民众为必然之结果而无法避免，其遗害卒将不堪收拾。至于农民革命之方式，亦属事不可行；盖开倒车之为害，昭彰在人耳目，无待赘言也。

余认为如果知识分子肯下乡与农民结合，去甘肃陕西等地留学，不去外国留学；在知识分子自身，可以纠正许多虚见，在农民方面得了知识分子之帮助，不啻添了耳目口舌，颇有生气，当可免于死气沉沉，了无生趣。今日乡村农民之痛苦，城市人民恒未知其万一；而乡村人民虽有口舌，究之高吭呼号，声闻不远，非赖笔之为文以求众目共见不可。使知识分子亲历民间，深知农民之疾劳，写为文章，昭告世人，然后再进一步为农民谋改进之方法。如利用水塘，经营养鱼，开辟荒山，从事造林；此非已使民众具备头脑乎？民众既具有头脑，耳目口舌，又已齐备，则中国问题之解决，何难之有？余恒以为欲求中国问题之解决，应先知问题之灼点所在。余认为中国问题之灼点，即在知识分子与农民。知识分子之革命，须由乡村农民做起；良以农民为潜伏之最大力量，此种力量一经发动，则任何问题不期而可有办法。中国问题所应下的功夫，在文化之培养与建造，或者有一日不能免于内部爆发与推翻旧秩序之事实；但就目下言之，实无旧秩序可以推翻，惟有从正面培养文化，补充文化，建造文化。而建造新秩序之问题，乃培养的问题。如民主政治为社会的一种秩序，但民主政治之实现，厥为先使多数人具备民主政治之常识，了解民主政治之意义而后此种秩序方可造成。知识分子为文化所寄托，负有培养、补充、建造文化之责任，此实无可旁贷者也。民众教育系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互通声气之一办法。余以为知识分子领导农民，建设乡村厥为取道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在乡村建设上做工夫，则民众教育必落空；乡

村建设不取径于民众教育，则一切无办法。今日吾人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所办事业，如领导民众造林、养鱼、改良农业等，皆为新事业，而非民间所固有者，亦皆属民众教育之功课。再如民间固有之陋旧积习，如缠足、吃鸦片烟等，亦为吾人所亟宜设法改革者。余以为民众教育工作不外固定的与流动的两种：固定的如教育民众读书识字，在使民众获有一工具耳；流动的则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匪患正深之地而对民众讲休闲教育，必无益于实事也。总之，吾人今日所从事之工作，从目的说为乡村建设，从方法说系民众教育。此种工作全属在文化建造上做工夫，其结果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无问题可言。至于如何从现在做起而达到最后之希望，余已有一个办法；特今日时间有限，不能毕述当俟诸异日也。（参看《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村学乡学须知》，及《村学乡学释义》等篇）。

##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最近工作概述

我们因为外面很多朋友想知道我们工作的大概，所以写这篇东西，来介绍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机关（本院）成立到今三年有余，现在所述限于最近一年来的工作，过去两年工作和我们的理论主张，暂此不谈。

我们院内原有三重要部分：一，乡村建设研究部；二，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三，乡村建设实验区。最近这一年度，同人力量集中于实验工作，所有研究部训练部工作暂停，原有学生均已结业服务，新生延至本年七月再招。因此，现在所述说的主要就是实验区工作。实验区在这一年里，有和以前不同的两点变动：

一、适用内政部呈奉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颁布之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将原实验区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区，乡村建设实验工作即包含在内。

二、于原实验区邹平以县外，添划菏泽县，共为两县。

所谓县政建设实验区，照我们的分析，其实验工作应包括下列三大项：

（甲）自县以下之地方行政改革实验：此包括行政制度之改革，及各项行政之讲求刷新，未举办者如何次第举办等。

（乙）自县以下之地方自治推行实验：此包括下级地方自治

之推行，以迄县自治之完成。

(丙)县境内之社会改进实验：此包括产业振兴，经济进展，民智开发，风俗改善等。

这样就大过原来乡村建设的范围——乡村建设普通说来不过那(乙)(丙)两项。事权上也就扩大：

一、实验区内各县政府直接受本院指挥监督，县长由院向省府荐委，县长以下各项行政人员以院令委任。

二、实验区内县政府以次各行政机关，得本研究实验态度加以改组或扩充，不必与他县同。即地方自治组织，亦得根据本院研究所得而变更之，以从事于一种实验。

三、实验区一切工作计划，经呈奉省政府核准备案后，即照案进行，所有通行各县之各项法令，如有与此项计划有窒碍时，得不受其拘束。

因此，邹平、菏泽两县其行政制度，自治组织都已变更了。而邹平、菏泽两县复以地方情形之殊，所改变的又不相同，现在正进行两种的实验，详见两县实验计划书，此不及述。但大体方向都是要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而正式自治组织均暂不成立。邹平将原有区公所乡、镇公所废掉，而别设乡学、村学，意在以教育工夫引进自治。菏泽则废区划乡后，各设乡农学校，正在藉行政力量作教育工夫。此其大较也。关于经费一项，两县在这一年里，比照从前都没有增加。即是一切税收应解交省库的还照解，而费用应从省库请领的亦照领，同时对本县地方更没有增加一钱的负担。如此实验工作，并无实验费；好比一家人过日子，原来每月用一百元，还是用一百元，不过如何支配不同罢了。一年经验下来，感觉窘苦不堪，要作事非添人添钱不可。今已商得省府同意，从下年度起(本年7月后)，将应解

省库的留下百分三十自用，以前应领的款即不再领，可以稍为宽裕。这亦算是一种实验。大概将来非节缩中央政费，以益地方不可，非节缩省政费，以益各县不可。如其不然，莫谈建设；谈建设只有向苛捐杂税路上跑！

两县工作比较见成绩的各举其一事。在邹平是棉业改良推广及其运销合作组织。在菏泽是训练农民，使为乡村自卫的办法。菏泽自民国以来，遭过六次黄河水灾，每当水灾后，无不土匪蜂起。去年遭大水后，地方人士又想起匪乱的恐怖，但竟以各乡校自卫训练班的维持，幸得平安，其效已见。本年刘匪桂堂由河南窜扰鲁西，各县无不受其蹂躏，但他围着菏泽转了一圈，竟不入菏泽境内，独得保全（只有一处乡校，因为那乡孤悬在曹县境内，阵亡三人）。这是他看见菏泽有办法，不愿自寻麻烦，实非抵抗之力。然而乡村自卫之当讲求，固于此可见。邹平于作过棉种改良工夫后，所产棉花足可纺四十二支以上细纱之用。去年经送上海商品检验局检定及申新纱厂试验，评为“具纺织上所需优良纤维之要性，等级在灵宾花上，为国产之最优者”。去年产量还不大，今年更以去年收获之二十万余斤种子推广至棉田四万余亩，约计可收花衣一百六十余万斤。今年种子可有二百多万斤，明年邹平已经种不了，须要向邻县推广。参加合作的棉农，去年不出乎四十几个庄的居民，今年已达二百一十八村庄（邹平全县不满四百村庄）。棉花运销合作社南北各省最近倡办的不少，但多半靠大轧花厂集棉花的一种控制，并非由农民合作的组织，与湖南津市、陕西永乐园等处所施行的亦不一样。详见《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第二届报告书》，此不及叙。

此外尚有两部分事亦均可算本院工作的一项：一即若干县

分民众教育，乡村教育的辅导工作；一即利津、沾化一带地方垦殖事业的准备工作。前者因为有本院训练毕业学生回到本县办民众学校，民教实验区等，所以院内有乡村服务指导处之设。去年将这些民校归并教育厅所管一系统内，由厅院协同指导。今年厅中又将小学教育改造的实验与民教实验合为一事来进行，成立乡村教育辅导委员会，本院也参预其事。后者因为黄河下游入海处有荒田若干万顷，省政府有意要我们办理垦殖建设，于去年委我们的教员接充滨蒲利沾棣垦丈局局长及利沾两县县长，并以我们毕业学生前往训练民众自卫，先谋地方之治安，为垦殖事业之准备。今年正在计划垦殖，将来亦许可以为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和集体农场的实验。

这一年的工作约如上述。从下月起，下年度开始，研究部训练部均招考新生，并于菏泽添设分院一处，划一部分新生在分院训练。研究部这次提高程度（限大学专门毕业），减少名额（限十八名），优给津贴（每月二十五元），意在收罗有专门学识的人才，研究各项实际问题，好供给各项实验工作的方针方法。例如垦区的土地问题，便需要一个方针，县政实验区则眼前需要整理土地的技术方法等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非常之多，盼望学识有相当基础，对于各项实际问题有研究兴趣者，来这里大家从实地上探讨，亦许可得些门路。

录自《拓荒》2卷4、5期合刊，

108—110页，1934年8月。

《大公报》，1934年6月17日。



## 精神陶炼要旨<sup>〔1〕</sup>

“精神陶炼”这一科，原来的名字是“乡村服务人员之精神陶炼”，在讲明有志服务乡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者——应行具有的精神。乡村建设是什么？要在乡村建设理论里去讲。大家将来知道了乡村建设是什么，则服务乡村所需要的精神是什么，当更易知道；同时对于精神陶炼的意义亦更易明白。我们服务乡村所需要的精神是什么，底下先简略的加以说明，话虽然很简单，可是很重要，大家要留意一点！

我们“乡村服务人员之精神陶炼”一科目，就是要启发大家的深心大愿。我们能有深心大愿，才没有俗见俗肠。比如看见财利浮名都心热，无关轻重的成败毁誉都顾虑，这完全是世俗的心理。我们的乡村建设是一个很大很远的工程。我们要有深心大愿，方可负荷此任。大家如果为俗见俗肠所扰，则没有力量担负此远大的工程。明末王船山先生顶痛心“俗”。他曾说过一句话，非常深切动人。他说“恶莫大于俗。”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的一句话。俗见俗肠是非洗刷干净不可；而要洗刷俗见俗肠，必在深心大愿出来的时候。深心大愿出来，俗见俗肠自然脱落。深心大愿是什么呢？现在不往深处讲，我可以用极浅的话来告诉大

---

〔1〕1934年7月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讲演，郝心静笔记。

家：深心大愿就是要你有真问题，不要有假问题，要有大问题，不要有小问题。如果我们发现有真问题、大问题，此即深心大愿出来的时候。什么是小问题？就是俗见俗肠。昨天陈主任（亚三）曾说：“关于起居享用方面不要注意；在这些地方不要有问题，那些都是小问题。”我们也可以说：有小问题者为小人，有大问题者为大人。真问题是活泼有力，隐然藏于中而莫能去；如时有时无，忽起忽落，那就是假问题。有真问题时，就接近深心大愿了。

什么是深心？深心即悲悯。普通说：“悲天悯人。”当社会上多数人都在痛苦灾难之时，容易发生怜悯之心，这当然也是悲悯；不过悲悯亦还有更深的意义。换句话说，更深的悲悯，并非对灾难而发。这种悲悯，不一定看见灾难才有，而是无时不可以没有的。这一种悲悯，自己亦在其中，斯乃一根本的悲悯，斯乃一对于人生的悲悯。这种根本的悲悯，包含刚才所说的对灾难而发的悲悯。如果我们有更深更根本的悲悯，则更易有对灾难而发的悲悯。这一个深心，是从对人生的反省而发出的。如果我们只是一天一天的活着，笔直机械的活着，不会发出人生之感，——人生之感是从反回头看人生时，所发生的一个更深的慨叹，一个更深的悲悯。此必须从对人生的反省而来，平常不容易有。什么是大愿？大愿即深心；有深心始有一种大的志愿力。这一种大的志愿力是从深心而来。这一种大愿，是无所不包的大愿。照我所了解，大概佛是一个有大愿心的人。中国的古人（儒家），多半勉人立志，勉人立志就是勉人发大愿心。如张子：“民胞物与”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很

〔1〕语出张载：《西铭》（原属《正蒙·乾坤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编者。

能够代表儒家教人发愿的精神。如果我们不发愿、不立志，我们的乡村建设亦即无从讲起。这一种愿力，超越个体生命；仿佛有一个大的生命，能够感觉个体生命问题以上的问题。能够超过个体生命而有一个大的生命，从这个地方就见出来是“人”，“人”就是这么个样子。如果大家要问我怎样是“人”？我的回答：人就是感觉问题顶敏锐、顶快、顶多、顶大，——无所不感觉。这样就是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即在此。是甜、是苦、是痛、是痒、是合适、是不合适，他感觉得非常之快，并且他的感觉无所不到；所以他的问题特别多、特别大。动物虽然亦苦，然而苦不过人；人如果觉得苦，那才是真苦啊！人要是快乐，那才是真快乐啊！这些都是动物不会有的。其感觉特别多、特别大、特别深刻、特别敏锐者谓为“人”，“人”亦即“仁”也。“人”“仁”这两个字是相联的，其义亦相通。所以古人常说这么一句话：“人者仁也。”人类与物类的不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去找，——必从此处寻找方可发见其不同之点。物类没有这么多、这么大、这么深的问题；可以说我们所有的感觉它都没有。物类与人类之不同在此，俗人与超俗人之分别亦在此。俗人（前之所谓有俗见俗肠者）问题少、问题小、问题浅；他的感觉迟钝，感觉不够，亦即其“仁”之不够也。我们并不是想作一个超过常人的人，并不想与众不同；可是不愿意作一个不够的人，而愿意努力圆足人类所具之可能性。圆足人类之可能，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亦为人不可少的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说：深心大愿是从人类之可能中自然要有的。我在前边曾这样讲：人之所以能发挥深心大愿，是要有真问题，不是有假问题；是要有大问题，不是有小问题。从真问题、大问题中乃能引发深心大愿。人是有活泼的力量可以感觉若许问题

的；人类与物类的不同，俗人与超俗人的不同均在此处。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以为我们一定要做个超俗人，我们并不敢存此心。原来真问题、大问题，以及深心大愿，都是从人类的可能性来的，我们只是要圆足那个可能性而已；不是非要做一个超俗的人不可。如果没有真问题、大问题，那是我们的不够、我们的缺欠、我们的不行。希望大家能够体会此意。人类既是感觉顶敏锐，是甜、是苦、是痛、是痒、是合适、是不合适，他感觉得顶快顶大；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留心，应当让我们的感觉敏锐深刻，快而且大。我们应当知道什么是甜、什么是苦、什么是痛、什么是痒。我们要把此感觉深切著明，自然可以发深心大愿，自然可以担负乡村工作；这就是精神陶炼的意义。末了我要大家自己问自己一句，你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都找我们的问题，我们可以每人写一个字条放在书桌前面，常常自省！精神陶炼这一科，固然也可以讲，同时尤应注意个人的生活及个人的精神。关于这个事情，本来是替大家请了几位班主任来帮助大家。聘请班主任的时候，院内同人很细心，很费斟酌来替大家安排。现在担任班主任的几位先生，多半同我相处很久，我很了解他们。在我个人，代大家请班主任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大家既相信我而来此就学，我希望大家对各位班主任，都有实在的信心。昨天在纪念周上我说希望大家以极大的虚心接受本院的规矩及嘱咐大家的话。这个意思很要紧；如果大家有深心大愿，有一个很恳切的意思到此地来，我相信大家有极大的虚心。以我知道各位同学有很多在社会上作过多年事情的。作过多年事情而又来此求学，这意思就不平常，就不俗；有这么一个心愿，当然能够虚心。所以我很相信大家能以极大的虚心来接受本院的规矩以及嘱咐各位的话。如能够这样；

于大家必有很大的好处。我们所请到的几位班主任，以他们的学问、经验，也许不特别高、不特别丰富；可是我相信在精神陶炼上一定可以帮助大家。这几位班主任，我对于他们的“志气”有一种承认，对他们很有一种恭敬的心，所以请他们在精神上来帮助大家。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注意；能相信我的话，来接受并且信从这些班主任的指导。以他们的谦虚，一定可以引起各位同学的谦虚；以他们的勤劳周到，一定让同学亦能够那样的勤劳周到；而且让大家可以感觉到他们是真有一种亲热的意思来帮助大家。

精神陶炼的大意，已经对大家说明，就是要启发我们每个人的志气愿力。于此让我们联想到丹麦的教育。丹麦教育特别的地方，在《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一文中，我曾经有所论列，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现在略说为什么由我们的精神的陶炼而联想到“丹麦的教育”。

我们说“丹麦教育”，是指着距今已七八十年复兴丹麦的那一种有名的民众教育而言。这种教育甚特殊；起初未曾注意到它的特色，后来才明白。我在《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那篇文章中说：我们作乡村运动，听到丹麦是农业国家，所以注意丹麦；我们作乡村运动注意合作，而丹麦以合作著名，所以注意丹麦。“丹麦教育”，我猜想着它大概是提倡改良农业合作的；后来我仔细考察，才发见我们的猜想是错了。农业改良，合作组织，诚然是复兴丹麦的方法，并且丹麦的复兴是很得力于这种方法；可是事实上“丹麦教育”在最初不是这样的。起初的“丹麦教育”离此尚远，绝不是一个偏乎实际应用的，而倒是一个非实用的。我在《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一文上曾提出两点申论之。我说很奇怪的，它的教育是非实用的，非职

业的训练，非养成技术人才的训练；现在有人好说“生产教育”，那末，最初的“丹麦的教育”恰可名为“非生产的教育”。它又不是一种讲书本子的教育，几乎可以说它不是教人念书；它那种教育，恰在技能训练与书本教育以外。那末，它究竟是什么教育呢？在头脑粗浅的人，实想象不到。它那种教育很难说，仿佛是一种“人生的教育”；或“精神的教育”（这两个名词很不通，但此外更无其他较好的名词以名之，故只好用它），很近乎我们精神陶炼的意思。

“丹麦教育”的创始者，是几个富于宗教精神的人；他们本人的人格非常有力气、非常伟大。他们自己说他们的教育是“人感人的教育”。它这种教育的长处，就是从有活力的人来感发旁人的活力。它并未教给人许多技能，更非教人念死书，结果让丹麦的民众活起来了。这种教育，很靠重办教育的人；教师的本身必须有活力才行。“丹麦教育”创始人的人格，实在令人佩服；而其教育制度亦的确能帮助丹麦，让丹麦民众活起来。关于丹麦教育制度我觉得有好几点应当提出来说的。其一：它所收的学生多半是青年，不收过小的（它对年龄的限制，大概是十八岁以上）；因为太小的人尚无经验，对于人生尚未尝着什么，他还不会有问题，所以对他不好作工夫。同时年龄过大的，精力渐将衰败不行。最好的是尝到人生滋味的人，工夫就好作得多。大概在青年时代（二十余岁的人）将成熟而未成熟的人，内力都很充足，其身体、智慧、头脑，都正在发育。这个时候正是每一个人的英雄时代，他有的是感情、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志气。若能给以人生的教育，那是很好的。其二：丹麦的民众学校是私立的，办学校的人是志愿的、自动的，非受官府的派遣而来。因其富于自动，所以有活力，所以能引起他人的自

动，所以富于一种生命的力量。其三：不惟办学的人是志愿的，求学的人也是志愿的。小孩子的读书常常是被动的；十八岁的人，他不来则已，来就是他自己要来。况且他们的学校中，资格、文凭、学位、职业、手艺全没有；既非被动，又无所希图，所以他的入学完全是志愿的。这种教育，两面富于自动性，所以有一种活的意味。丹麦的民众学校，学生肄业的期限虽短；然在此三五个月当中，即可学会寻常学童三、五年所学不完的课程。其四：私立学校，政府补助它而不干涉它（它也拒绝政府的干涉）；因为没有干涉，所以机械性少，所以不被动、不刻板。它的一切功课、办法、规矩，亦不必整齐划一；不整齐划一机械性就少，机械性少就最富活力。“丹麦教育”的创始人物与其制度合起来，完全可以做到让丹麦的民众活起来，所以结果其国内农业合作最发达；虽然“丹麦教育”并不讲究这些，可是丹麦的农业合作之兴盛全靠这个教育。“丹麦教育”的创始者，现在已被大家公认为丹麦农业合作的功臣；此即因其复活了丹麦民众，复活了丹麦社会。人活了之后，自然会找路子；如根本的地方没有生机（人不能自动），给他方法、技术，他也不能用。知识、方法、技术，都是工具，人活起来之后，自然会找工具、会找方法。所以看着“丹麦教育”是非实用的，可是后来完全变成了实用的。我们中国的教育，自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大家就是着重实用；如果找出当初废科举的理论，则可知原来就是讲求实学，讲求致用。中国开头感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即行注重实用，注重职业训练，注重养成专门人才；凡此皆是注重西洋科学技术的缘故。后来又有人提倡“职业教育”，组织“职业教育社”；现在虽没有生产教育社，但已有人倡言“生产教育”。在我想这都用不着。因为开头的时候，我们已经如此做

过，用不着现在来说。自兴办学校以来，从来没有人说不是办讲求实用的教育，可是结果与丹麦相反，完全成了非实用的教育；所以我们由“丹麦教育”不禁联想到我们的教育。这一个对照，非常值得注意。可是讲求“职业教育”、“生产教育”的人，都没有对照过；如果来一个对照，则很可以反省反省，很可以有个觉悟。这个问题就在“丹麦教育”不是从职业入手，不是从生产入手，而结果成了职业的、生产的。其原因还是我们刚才说的，知识技能是工具，工具是靠人运用。“丹麦教育”不从工具入手而从运用工具的人入手，使人先活起来。在人未活以前（即其精神尚衰颓而未振发的时候），你把工具摆到他面前，他也不会用。中国教育之失败，我敢说就是失败在讲求实用。关于丹麦教育的话不再多说，最好大家参考讲丹麦教育的书同我写的《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那篇文章。

此时此刻是“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民族”精神最颓败的时候，与丹麦同样的非先把中国人活起来，大家没有办法。如果中国人还是死气沉沉，无丝毫活力，则什么也不要讲，不必讲！中国乡村中人，差不多都是受许多迷信与习惯所支配的。他们有意识的选择很少，只凭迷信与习惯，此即所谓缺乏活力，此即所谓死板不动。可是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就是直接同乡村的迷信、习惯去冲突。许多教育家、维新家、革命家、改良家，都做错了许多事情；其冲突的结果，于事无益，他绝没有复活了乡村的民众。有许多冲突（近几十年来），其结果虽然动摇了乡下人的迷信与习惯；然而动摇的结果，让他徬徨、苦闷、心里无主、意兴消沉，比从前更死，更无活气！这个时候，我们非先给他解决精神上的问题不可。我们要替他从苦闷中找到出路，从徬徨中找到方针，从意兴消沉中仿佛叫他有了兴趣，



从他不知将往哪里去的时候能够让他看见一点前途、生出一点希望。总之，第一要想法子让乡下人活起来，不但使他脱离了迷信与习惯，并且使他脱离了徬徨及苦闷；必如此，农业方可改良，合作社方可组织。否则，一个没有精神的人干什么也干不好！一个颓败死板的民族，想让他农业改良、组织合作，实万不可能！至于如何让乡下人活起来，将来自有许多讲究，而根本的一点是做乡村工作的人自己先要活起来。如果做乡村工作的人本身无勇气、无力量、无大志愿、无坚毅精神，则什么事也不必作、不能作！我从丹麦教育联想起来我们精神陶炼的意义，就在要复活我们每一个人，打破我们每一个人的徬徨与苦闷！

关于让乡下人活起来的意思，我在《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一文中曾经详细论述过。因为在乡农学校里边有精神陶炼的课程；安排此一课程的目的，就在救济乡村精神的破产，让乡下人活起来。所谓精神的破产，即指着一切旧的风尚、规矩、观念，都由动摇而摧毁，新的风尚规矩此刻尚未建立；所以就成了精神的破产。此中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文化传播之日久，文化愈老，机械性愈大；一方面因为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照例多保守、多定驻、多死板，不象工商业社会一样。这样死板机械的社会，卷入了新的世界潮流，遂起了剧烈的变化。几十年前，从沿江、沿海输入许多新的生活习惯，使中国社会先从上层政治变动，影响到社会其他方面。几十年来不断的剧烈变化，最后乃影响到乡村。因为上层强迫乡村变化，乡村就不得不变化了。它对于这种激烈的变化，心中虽然感觉不适合；但不能明白其中意义，所以心中无主，同时没有判断力，又不敢去否认这种变化。大概乡间五十岁以上的人，多数的心里说不出

的窘闷痛苦；因为传统的好习惯、好风尚都被破坏，他很觉不合适。在三十几岁的人虽不觉得窘闷之苦，但心里也是无主，而成了一种顽皮的样子。我们要知道，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其价值判断，是非好歹；可是现在的乡村社会就失掉了它的价值判断，所以乡下人整天在苦闷无主之中。再则：近数十年来的天灾人祸太厉害，——本来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之中总要遇到几件不幸的事情；可是不幸的事情如果连着来，那一个人就受不了。社会亦然，如果接连遇到许多不幸的事情，它的精神也就要消沉下去。乡村中人现在既无乐生之心，进取的念头更谈不到。有此两面——价值判断失掉，天灾人祸频来——所以乡村中人死板沉寂而无气力。这个时候，你若要乡村中人进取，则非先使他活起来不可。如何使他活起来呢？一面须恢复他的安定，使之有自信力。此必乡学教员先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已经失去的合理观念恢复起来，把传统的观念变为自觉的观念；让他安定，让他看见前途，从我们的指点让他认识一点进取的方向。再则在人生实际问题上来给他点明，使看见前边的道路，他才能有乐生之心、进取之念。所以我们要先安定他，然后再给他开出路子。有了活人，其他事业才可以说得上。我们作乡村工作的人，必须对于人生实际问题有一个认识、判断、解决。比如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如何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自己先有一点见地，然后才能给乡村中人开路子；所以我们训练部的功课有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在“丹麦教育”只收十八岁以上的人，就是因为年龄稍大才有人生经验，才能彼此讨论人生实际问题。除了人生问题的讨论之外，尚有音乐、历史的讲求，也是让丹麦活起来的一个有力的因子。我们的精神陶炼，含有三方面：即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

讨论，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刚才所讲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即其中之一；前边所谓深心大愿，即修养方法与合理的人生态度的根本。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也很重要；由此我们又想到丹麦教育。兹仍以丹麦教育与我们的精神陶炼相比较：丹麦民族的复兴，靠丹麦民族活起来；中国民族的复兴，也要靠中国民族活起来；丹麦民族复兴靠丹麦教育、丹麦精神陶炼；中国民族复兴也要靠中国教育、中国精神陶炼。话虽是这样讲，可是事情的大小很不相同。中国的民族复兴，问题太大，事情太难，与丹麦的民族复兴简直不能相比。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都是丹麦民族所未遇到的。丹麦民族复兴，是前八十年的事情。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时代丹麦未遇着；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剧变，是一很特别的时代。此刻，不单中国社会已失其价值判断，即全世界全人类从来所有的价值判断此刻也都在动摇变化；所以这个时代，思想顶纷纭，最富于批评，充满了怀疑。这个特别的时代，丹麦未遇着。人类到现在太能批评，太能怀疑了，一切固有的文化都在动摇之中；欲在此时建立一个新文化，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中国此刻欲谋民族精神的复兴，较丹麦是困难得多，简直不能相比！丹麦民族是因为被德人战败而颓丧灰心，格龙维出而谋丹麦民族的复活，遂创始了丹麦教育。他的问题小得多。且丹麦人的精神原来是宗教的，格龙维等很得力于此；他们是以宗教的精神来苏醒丹麦民族。他们视人生问题的批评讨论虽很重要，可是音乐、诗歌、文学、历史也很重要；这些科目都带有宗教的意味，都含有感情奋发的意味。而感情奋发就大可以复兴了丹麦；中国则完全不能那样！中国此刻讲精神陶炼，诗歌、音乐、文学的帮助固很必要；可是恐怕要多重人生问题的讨论，多用思维，多用脑筋才行，——

不是一个精神的奋发即能解决中国人的苦闷。中国人的苦闷，从音乐、诗歌、文学、宗教来解决是不够的，必须从人生问题的讨论始有解决希望，这完全因为此刻正是一个怀疑批评的时代，意见分歧的时代，理智作用兴起的时代，非用理智不能够对付，单靠感情的兴奋恐怕冲不过去。此时非从彻底的批评怀疑，不能转出一个彻底的非批评怀疑的精神，不能用不批评、不怀疑的精神，而希图挡住批评怀疑的潮流。假定中国民族精神如丹麦民族之靠宗教，则中国民族将永无复活之望；因为那个样子必不能打破我们的难关。丹麦的宗教，是比较浅的生命；若遇到大的困难，它就不能动了。丹麦民族假使遇到象今天中国这样大的难关，它一定就完了！不过中国民族的精神却不是那样的，中国民族精神是人本的、是现世的；中国虽无科学，而其精神接近科学，远于宗教，而合于思维。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中国人精神之所在，即是“人类的理性”。大家慢慢体会参究，可以了然理性之为物。此处所谓理性，虽然不就等于理智，可是包含了理智，或者说最接近于理智；所以中国虽无科学，而其精神却很接近科学，——诚以科学即理智之产物也；所以中国民族精神与科学完全不相冲突。我们所谓“合理的人生态度”之“合理”二字，亦即“合于思维”之谓。在丹麦则不然，它必须多靠音乐、诗歌以启发人的感情，启发人的志气。如果要让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的感情振作起来，那就非讲理不可！中国此刻虽然遭遇这么大的难关——人类剧变时代，怀疑批评时代，——精神因而动摇摧毁，可是动摇摧毁不到它的深处，以其植基于理性之上，而理性力量特别深厚，则完全不怕批评与怀疑。除了中国以外，任何民族，——尤其是受宗教的孕育，借宗教的精神以自立的民族，都冲不出这个难关；惟只中国人可

以冲得过去，因为他接近理性，不怕批评与怀疑啊！如果大家留心看我的书，就可以看见我常常说：除非中国文化完全没有价值，如果其有价值，则他对人类的贡献只有一点——就是对人类的认识。只有中国人反回头来认识了人类是怎样一回事；将来不敢说，此刻其他洲土对此尚无认识。中国文化的可贵即在此。中国古人最先认识了人类，就从这一点上开出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之与众不同即在此。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在其具有理性；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了人类的理性，发挥了人类的理性，所以中国民族虽遇今日之难关而无碍。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都是人；能够认识人类的这种精神（理性），是始终不会被打倒的。只要人类存在，中国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为人类之所从来即由于此（理性），中国人能把握住这个（理性），当然可以站得住。丹麦民族的复兴，胜过了它的难关，是因它的问题小；而中国问题虽大，因其精神合于思维，亦足以通得过现在的难关而复兴。以上略将中国历史文化加以分析。大家应当注意“分析”这两个字，只能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用，而不能用于丹麦。丹麦人固可借其过去的历史而复兴；民众学校只讲它过去历史的光荣，历史人物的伟大，丹麦民众即可活起来。我们中国的复兴则不能全靠这个；恐怕要靠一点分析，用思维的眼光，找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从这一种自觉（对自己的认识）里，方可以看出现在及未来中国社会所应走的路。对历史文化的分析，很要紧的是认识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找出它的特点，而求得今后我们应走之道。这在我们的精神陶炼上是必要的，而在丹麦即非必要矣。

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这在丹麦即是如此，丹麦的老根是它

的旧宗教精神。它发新芽的“发”，是靠它的教育，它的新芽是指它从民众教育生长出来的新社会。丹麦农业与合作的发达，完全是从这个新萌芽生长出来的。中国亦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自一面说，老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念头，以为中国民族已经衰老了，照普通生物的例，衰老以下跟着就是死亡。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人，皆不免有此恐惧、有此观念。中国民族的衰老是不容否认的，但其是否有返老还童之可能，或者是一直下去就死亡，这很成问题。此问题甚大，必须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才配讨论这个问题。近些年来，一般研究文化史的学者，以及许多思想不同的讨论文化问题的书籍，都讨论到文化衰老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在那本书中，从头至尾都是说民族文化同生物一样，有其少年时代、壮年时代，以及衰老灭亡时代。他列了一个表，把世界著名的有文化的民族全罗列于内，并指明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少年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壮年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衰老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灭亡时代。他把每一个民族都拿这种眼光来看，最后又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可逃此例，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其第二度的文化创造，第二度的壮年时代。这样说来，则问题很严重！中国是不是就会灭亡呢？抑尚能返老还童呢？如果中国民族真能返老还童，真能够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那真是开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纪录。这个问题很不易说，我想粗略地说几句：我的话虽简单，而意思却有根据。在我想，民族

衰老这句话不要顺口说去，我们应当分析何谓衰老？其衰老在何处？一个民族社会，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个体与群体的生命不同。群体生命是由许多个体生命构成，个体生命既有其死生灭亡，则群体生命的构成原很显然的是常常更换，常常新鲜。诚如是，则所谓民族衰老的话怎么讲呢？似乎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自一面说是不能比的；然而自另一面说则也能比。如果让我回答“民族衰老何所指”这个问题，则可说所谓衰老非指其构成乃指其机构而言。一切文物制度组织结构，自一面说愈用愈熟，可是愈熟则机械性愈大；愈成为习惯，则愈失其意识适应的力量。个体生命的衰老亦复如是。个体生命有其机构，社会（群体）生命亦有其机构。所谓衰老，乃指其用得日子太久，机械性太大，适应环境的力量太小，至此则这一套家伙非换不可；所谓死亡，就是指这套家伙已不能用了。个体之死亡，民族之灭亡，莫不如是。说到这里都还是说社会生命可看成个体生命。底下要转过来说：个体生命的机构是先天的，社会生命的机构是后天的。一切文化制度是后来想出的方法，非如五脏六腑之与生俱来。文化是后天的安排，故不能比与生俱来的那套家伙，到不能用的时候就一点没有办法，就非换过不可。民族文化、社会生命因为是后天的产物，所以能够改，能够创造翻新，不是绝没有办法，而如个体生命之绝不可移易也。我说这些话，好象是大胆地回答了那个问题：民族文化衰老之后可有第二度的创新，有第二度的生命，非如个体生命之由衰老即至于死

所换过的生命里头，尚复有不是新的地方在；这个不是新的地方，是从老根复活的东西。这个东西自一面说很细微，很抽象，很不易捉摸，而自另一面说却非常实在，非常明白，绝不虚缈。这个不容否认又不易捉摸的东西，即所谓民族精神。只有民族精神是当初的原样；除此之外，那一套家伙都换过了，所以谓之“民族复活”。

在我们乡村服务人员之精神陶炼这门功课中，要向大家讲的、要指给大家认识的，就是民族精神。所谓历史文化的分析，就是指点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民族精神）；所谓合理的人生态度，是讲中国古人的人生态度，也还是民族精神；乃至讲修养的方法，也是源于古人，资借于民族精神。更明白地说，我们之所谓中国古人，就指着孔子的这个学派，或者说孔子就是代表。在精神陶炼里大概要讲许多古人的道理，要在古人所创造的学问中有所探求，来帮助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对大家说：从我们老根上发新芽的比喻上，我竭力表示只能是一个新的东西，没有法子是一个传统的因袭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多半是机械的习惯的，都不能用。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必须是一个新生的、复活的、创造的、慢慢找回来的。兹就三方面来说这个道理：

中国近几十年来文化的破坏崩溃，是一步一步的，也可以说中国人唾弃他的旧东西，是一步一步，步步往深处去，差不多到最后要唾弃完它，此乃无可奈何者！而且这是一个事实，不能论其好坏。这一个事实愈来愈到家，愈唾弃得干净愈不客气，必得到唾弃完的时候，他才能再找回来。如果留心体会分析这几十年的事情，则可知中国人是如何的一步一步在唾弃旧的了。唾弃到最后，将慢慢找回来而另开一新局面。它必非传统的，乃



为再生的；所谓“找”即重新认识与再生之意。重新认识之后，愈来愈看得清楚，愈清楚愈加发挥，终至发挥成一新的生命。此一新的生命，自一面说非传统的，系再生的、复活的；自一面说，生命是旧的生命，不过家伙换了一套，机构为之一新而已。

再举印度的复兴为例以讲明此意。印度之复兴与否现在虽还很难讲；印度以那么多的阶级，那么多的种族，种族之间且有不好的感情，同时又有那么复杂的宗教信仰；但是印度的民族运动实在很光荣、很伟大。印度本来被英国统治得厉害，而甘地所领导的这种民族运动差不多折服了统治它的英国人。我说这个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印度的种族阶级宗教虽多，而其运动能统一，在大体上说它各方面的隔阂都能化除。再则说英国虽然统治了印度，而印度赖甘地的领导，发生了很大的力量，简直让英国人不能不屈服，这个民族运动够多么厉害！虽然印度民族复兴的话现在很难讲，可是印度人已经算是活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一个被宰割的民族能有此伟大壮烈的运动真正了不起！它这种运动，其民族可谓由死而活。此处我们要注意：它也是慢慢重新找回来的而不是传统的。最清楚的让我明白这一点，是在看《甘地自传》的时候。我们看《甘地自传》，或看其他关于记载甘地的事情的文字的时候，如果我们留意，则可看出他作学生的时候，曾经唾弃过他的宗教，曾经表示反抗脱离他的宗教，后来他对他们古人的精神才慢慢地一步步地去接近。甘地在开头并不带多少印度古人的精神，他是愈来愈往印度古人的精神里走。他起初为表示离开旧的东西，曾经故意买肉吃、买酒喝（印度宗教不准人吃酒肉）。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经极力学作英国的绅士（Gentleman）。他作律师的时候，才开始反抗英国。无论从形式上说，从精神上说，他开始并不是

宗教家，并没有传统的思想，甚且与印度的旧精神全不相近；到后来他才一点点的找回来，一点点的重新认识。逼着他认识印度古人精神的是一个实际问题——印度对英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压在他身上，使他不能躲闪，并不是他事先带有某种色彩，被色彩染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他本来是一个极活泼的极有力量的人，隐隐的不自觉的有印度古人的精神在。我们要知道，只要是一个活泼有力的人，对问题必有其生命的表示；甘地既有实际问题逼迫他，所以让他一步进一步的发挥印度古人的精神来做他应付英国人的压迫与统治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不合作”、“无抵抗”（这两个名词都不好，不足以表示印度古人的精神）。这个运动是一新发明，而其精神确是印度古人的，不过经甘地发见之后以新的作法演之而已。他以印度古人的精神，在这么一个问题上发挥，成功为这么一个事实。他那种精神，就是所谓印度的宗教精神。他这种民族运动表现其民族精神愈来愈彻底，愈来愈让人钦佩，愈来愈让英国人折服。如果是一个传统的宗教，大概是不行的；如果甘地一上来就是一个合格的宗教家，这个人大概也就没有多大用处，恐怕绝不会做出这么一个惊人的民族运动。这是前边所说老根发新芽很好的一个例。

中国将来也是要慢慢找回他古人的精神，也许现在还没有开始找，因为现在差不多还是一个唾弃的时代。中国民族精神将来慢慢找回来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再生的，是一个重新认识的，而不是因袭的、传统的。我看《甘地自传》之所以特别有领悟，因为我本身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都较晚；有很多人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上认定我好谈“东方文化”、“东方精神”；其实不然，我对东方文化，中国民族精神当初也是唾弃的，后来才慢慢找回来。现在没有多余时间对大家详细讲；兹

粗略地说三层：

第一层：从我自己十四、五岁会用心思起，二、三十年中思想有很多的变迁。我常把那许多变迁分做三期：第一期是很浅薄的“实用主义”，很接近西洋人的思想。后来从这种思想转变到“出世思想”，这种思想很接近印度佛家，我在这上边曾经用了好几年的工夫，那时候出世之心甚切。这两期与中国人的精神俱相差极远，最末才转到中国的儒家思想。至于中间转变的关节，我无暇详述。总之，可以看出我不是一上来就是中国式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平清华大学研究院作短期讲学，开始的时候梁任公先生介绍我讲给同学听，他称赞我家学渊源。我当时即赶紧声明说：“任公先生这个话不对，我老老实实不是这个样子。我先父不是一个怎样大学问的人，我并且一点也没有接受他的学问。”我现在想起来还痛心，先父临死的那几年，我们父子间的思想很有许多隔阂，我的意思他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不了解。我有一篇《思亲记》（见本全集卷一——编者），很清楚很详细的说过这件事情。《答张廷健先生书》（见本卷）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因为张先生写信给我，他的意思不大满意我用“民族精神”这句话，他觉得这句话太空洞浮泛，大而无当，不着实际，很足以误人。我回答他一封信，正好是刚才所讲的意思。我在那信上说：“幸好我这个人是个呆笨认真的一个人；你便让我空空洞洞不着实，我都不会。我不抓住实际问题的争论点，便不会用思，不会说话。请先生注意，我非守旧之人。我因呆笨认真之故，常常陷于苦思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幸免传统的影响，因袭的势力。‘民族精神’这句话，在我脑筋里本没有；‘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我本是厌听的。我皆以发现实际问题争点，碰到钉子以后，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受的。”

十几年前，我就因这样的愚笨不能早悟达，使我先父伤心，弃我而去（当我十五六岁时，很得先父欢心。民初国会开，我还相信国会制度，先父则已觉西洋法治的不对，我当时很不服，是以父子间常起辩论）。我于十四年所作《思亲记》上说：“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悟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我引这段话，是想说明我思想的转变，也是先唾弃中国旧有的东西，后来才慢慢找回。“民族精神”这四个字，在讲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尚未发见，到后来才有所认识。这种发见，我觉得与甘地很相同。甘地是有民族间的问题压在他身上，而在我身上也压了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政治问题。我在政治问题上用心，才慢慢找出中国民族精神；我要解决很实在的、很具体的政治问题，才慢慢地发见了中国民族精神。这也同甘地一样，因为他身上有一个大的问题压着，而慢慢地认取了印度古人的精神。

前面是说明我自己对于中国民族精神的认识，是费了很多力气才慢慢找回来的；起初并不认识，经过很多年，经过很多实际问题上的寻求然后才认识。大家都知道我有一本东西叫做《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所谓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面是说中国人所作的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觉悟，——从头数到最后，才有这样的一个觉悟；这是渐次的一

个转弯。所谓“最后觉悟”，或者现在还没成功为中国民族的最后觉悟；但在我是一个最后的觉悟。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民族的一分子，仿佛我是最先觉悟到此，慢慢地才可以普遍此最后觉悟。在我想，全中华民族自救运动的方向至此已转变到最后。比如在曾国藩、李鸿章时代，讲富国强兵，讲洋务，也是一种自救运动。我们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最后的方向；此乡村建设是一个含有极充分、极强烈的民族自觉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普通人观念中的那回事。普通人观念中的乡村建设，固然也是乡村建设；然而缺乏民族自觉的成分。所谓“民族自觉”，就是使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精神。现在本院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就充分的含有民族自觉的意思。充分的含有民族自觉的意思的乡村运动，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转变到最后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慢慢找回来的，最初的时候心里没有这个念头。开始的时候是离开它固有的精神来作自救运动，且以为不如是即不能自救；但是这样自救不成功。于是再度的离开而想办法；仍不成功，再离开去找办法；愈离愈远，及至离到最远的时候，乃反逼回去。正是非反逼，回不去；非到那一头，显不出这一头；非白显不出黑来；非彻底的极端的反中国精神，逼不出真正的中国精神来。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现在已至最后，已经反逼成中国人开始往回找，开始往回自觉。最先曾、李时代起始离开，现在又起始回去。当初是非离开不行，就是那时候的变法维新错误，亦非错误不行。事实上非转一个大弯、绕一个大圈不行！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变法维新，至两次革命，每一度的寻求办法都没有对；可是这个错是必不可免，必不可少。因为社会没有先见之明，只有碰了钉子再说。先见之明，在个人容或有，大社会是

不会有的。大社会为众人所构成，差不多是一个盲目的，所以错误必不可免；只有一步步的错，从“错”里再找出来“对”。民族社会是如此，我个人也是如此。我当初没有这个觉悟，也可以说因为我很笨而不能有先见，直到末了才有这个觉悟。现在到了末了，我回想以前犯了许多错误，但冤枉不冤枉呢？我自己觉得不冤枉。并且几乎可以说：我们先要走冤枉路才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老实一点，不要太聪明！我们笨一点也好，不要很快的就转变，不要很快的就接受！比如我说“民族精神”，你们不要很快的就接受。我是费了一回事，你们也要再费一回事；由费事而认识出来的才是真认识。说到这里，我想讲一段意思证明我们无妨费事，不费事的我们还不欢迎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讨论追求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完全要放空洞、不存成见，凡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无不接受，至于合不合中国民族精神我都不管，就是不合，我也毫无疑问，因为我就是要解决中国目前严重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中国问题，即不合于中国民族精神我也接受。心里务必放空洞，没有成见。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经过是这样。我当初并不认识中国民族精神，完全没有任何成见，刺激我的最初是中国政治问题，后来又变成广义的中国社会问题。我因为要解决中国问题，乃从此毫无成见中发现了中国民族精神。这样的发现就对了！我相信如果大家对中国问题虚心以求解决之道，保你不会走歧路，不会发现一个不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办法。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去找办法，一点不自欺自满，把不好的办法都淘汰了，那末你最后的办法才一定会合乎中国民族精神。你追求到最后的时候，一定可以如此。本来很多有学问的西洋人对中国文化的长处、中国民族精神的优点，多少有些鉴赏与

认识。英国的罗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讲数理的，也高兴讨论社会问题。他到中国来过，对中国文化特别称赏。他曾经说：“中国今日所起之问题，可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区别。三者互有连带关系，不能为单独之讨论。惟余个人，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以文化上之问题为最重要；苟此能解决，则凡所以达此目的之政治或经济制度，无论何种，余皆愿承认而不悔。”

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如能不被损伤，凡可以维持其文化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俱愿承认而不悔。他唯一的信念即在保持中国文化；为保持文化，什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行，可是不要为解决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而牺牲了中国文化。这个意思与我不同。我告诉大家不要有成见，我们就拿眼前的问题来求解决；或者说我们只看见政治经济两个问题，凡可以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无论什么制度，即反乎中国民族精神，我只承认而不悔。我起初是如此，后来慢慢地找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确是中国的，绝不曾反乎中国民族精神。所以我批评罗素不应先怀成见，使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没法子讨论。照我自己的经过，只要不存成见，是自然可以找出来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九八页我曾说：“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现在极其破烂的中国社会里，虽然几乎找不出中国的固有文化，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此破烂的中国社会中也含了不少的中国文化。它这个破烂法，就与众不同。它这个破烂法，含有很大的巧妙；让西洋人、日本人想有这个破烂法也不可得。这个破烂法只能我们有；而且解决这个破烂的办法，必须与其所以破烂者相关系。换句话说：它必须是中国的一套，一定不会离开中国社会的事实及民族精神而得到一个

办法。在政治上、经济上如果有办法，那一定是合乎中国文化的，所以文化问题不必别作研究。这就是刚才的话：我们不必太聪明，就是这样很笨的去寻求，自然会找回来的。我们多费点事来讨论中国社会问题，认真来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则自然得到乡村建设的方向。得到这个方向。跟着再过细去想，则不难发现中国民族精神。这个道理，就是由浅入深，从用显体（体是本身，用是方法）。从找办法自然可以发见其本体——民族精神；一超直入地去找寻本体，怕不容易发见其价值。我常常自己喜欢我自己笨，庆幸我自己笨。如果当初我太聪明了，也许我有先见之明，可以很早的看见屡次政治改革的不对；那末这个我就与社会变迁的历程相远了。中国社会经过若干变化才到这一步，我如一下子就看到，则我与社会相离者远；离得远就没有办法。社会无先见，是一个笨的；我也笨，所以与社会很近。凡社会变迁的经过，我都有其经过；我经过几次变迁之后，稍微能比社会早一步，看得出我们的前途，所以转回头来对大家说话，就是因为我统统尝到了。把我尝到的对大家说，大家才会懂；否则你尽管有先见之明，你说的大家不懂，岂不是无用！惟因我笨，所以能启发大家。比如现在中国事实的推演，使大家注意到乡村建设，我们从乡村建设指明民族精神则可，因为大家已寻求到这里了；如果丢开乡村建设一超直入地讲民族精神，则一定没人理会。上边的话都是说早了不行。底下再说不早又不行。老不早岂不是至死不悟！当然要早点才好。因为想法子早，所以为大家讲精神陶炼。不然的话，就要等到大家碰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再讲精神陶炼；那样又未免太晚，我们还是曲突徙薪的好。这两面意思都要明白：前边是说早了不行，早了不切实；后边又说我们不能不早明白一点。在我是



想叫大家早觉悟，所以早向大家说；可是大家要笨一点，在大家不明白的时候就作为不明白，不要很快的就承认中国民族精神。很快的承认，就等于不承认；惟能不求早明白，而后可以得到真明白。

我们讲精神陶炼，包括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这三部分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也都要讲到；在那时候去讲，大概会更切实一点。我现在要求大家虚心听各位班主任讲精神陶炼，就是要帮助大家早一点明白，早一点认识中国民族精神，早一点锻炼自己的精神，好为中国社会服务。我想我是可以向大家作这个要求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早明白的人而现在要让大家早明白，这个可以。随便早明白的人就不配作这个要求。笨的过程没有经过，就拿古人的精神对大家讲，即令大家接受，那是传统的。先生没经过这个转变，就随便的传给学生；这个很近于传统的往下传，这个顶不中用。所以我不愿意落到传统的往下传，而要求大家多费点事，再由我来帮助启发，庶可不至于耽误大家。

所谓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乃至历史文化的分析，三者皆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核心。指出中国文化的特别处（长处短处），从而领会其民族精神，这是历史文化分析的意义。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是正面的讲明民族精神。人生实际问题的解决，是指点如何应用民族精神。中国民族精神，照我的认识，就在“人类的理性”。我常说：除非中国人几千年都白活了，除非中国人没有贡献，否则就是他首先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我的意思：中国民族精神彻头彻尾都是理性的发挥。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了人类，而现代学术界对于人类仍无认识！间或有认识的，亦未能在现代学术界占一地位，加

以发挥。现代学术界中的心理学家，对人类都无认识。心理学是什么学问呢？就是讲人的学问，不是单讲感觉、意识、本能、情绪的。虽然心理学是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可是现代心理学界对人类无有认识。世界的心理学，我知其大概，对人类心理都无认识。我觉得有两个人尚有认识，但他没有从科学的心理学上表达出来，在心理学上占一地位。据我所知道的，罗素对人类有点认识。他虽然也讲心理学，可是他在心理学界没有地位。泰戈尔对人类有认识；可是他又不能说，因为他是文学家，不能用科学表达其意见。本来心理学界应当先认识人类；惜乎心理学界至今尚无认识。中国古人对人类已有认识，惜乎尚无人去用科学方法为之表达。此即讲精神陶炼之大困难！人类心理在今犹属疑问，人类活动的法则是如何，心理学家都没有找清楚；而我们的根据又在人类心理——理性——所以比较难讲。虽然如此，可是我在人类心理学上用过工夫，可以给大家讲。讲乡村建设理论时有一部分是讲人类心理；因为我是从人类心理来讲明人类社会的。可惜没有多时间，如果让我单讲人类心理，大概讲一年半也不算多。我告诉大家：我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过，即不能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告诉大家，也总要指给大家一条路，让大家承认中国古人对人类有认识；这是在我的研究上可以保证的。关于中国古人所发见的人类理性，我能指给大家看，并不是拿一个纷纭无定的哲学议论来领导大家。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不是这样：

前几个月，我看见一篇叫做《性教育的先决问题》的文章（载4月30日《大公报》副刊“明日之教育”栏）。作者是袁敦礼先生。袁先生是国内知名的体育家。他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清楚，很透亮，很明白，简直无疵可指。其大意是说：“性教育，

今已至困难时代。你不能把性教育视为性卫生；单从生理卫生上来讲性教育，是不够的。从前还有许多事实可以从卫生方面去讲明性教育；现在医学方法较前进步了，它无所怕，所以你讲性教育已不能从生理卫生的观点说话，必须找到性教育的社会根据。有社会的标准与理想，方可指点青年，让他谨慎。所以讲性教育的时候，没有理想的标准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即无从讲起；故必于自然科学之外找社会科学的根据。”其所谓先决条件者指此。可是说到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的标准，简直没有人敢说。本来不同的社会之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就没有一致过，从来没有标准。越是观察民族社会，越会虚心，越没法讲性教育。袁先生的意思是要求先解决社会标准、社会理想（即确定婚姻制度与家庭制度），再来谈性教育。我想告诉他：你的话都对，别的谈性教育的人也许尚未见到；可是你错了！你错在想从社会科学来解决社会标准、社会理想，从社会科学来确定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这个问题诚然是社会科学中之一部，然非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与心理学中找出根据，便无从确定。他

还须从自然科学上、生物学上找；社会在“人”，除“人”之外无社会，你不从生物学、心理学上发见人类心理的真相，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够确立社会理想与社会标准。我常常说：我们想认识人类，还得从人类在生物界的地位上去认识，不能抛开生物学的见地来认识人类。虽然人类在生物中是超群出众的，然而究竟还是生物，所以非从生物界中认识了人类，便无从确立社会制度。此问题之核心，在人类心理；而人类心理的表现则在中国民族精神，所以民族精神是我们讲精神陶炼的核心。

录自《梁漱溟教育论文集》，64—95页，

1945年6月，开明书店。

《乡村建设》旬刊，4卷7、8期合刊，

1934年10月11日。

## 研究“乡村建设”的途径<sup>〔1〕</sup>

在安排这一门功课——乡村建设理论——怎样给大家讲的时候，原预备先出许多问题来问大家，这样可以刺激大家用心思，可以引发大家对这种学问的兴趣和注意。我起先预备如此，后来觉得太费事，恐怕我没有时间照顾。现在打算找几个同学随便问他，在问他的时间，请各〔位〕注意想一想他回答的对不对。再者，我所讲解的，比较牵就研究部一点，训练部同学有不甚了然者，可向该班班主任请教。我现在先发几个问题：

大家既然来本院求学，对乡村建设虽不能很清楚，但必有相当的了解，否则一定不能到此地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问：

乡村建设是什么？你为什么相信乡村建设？乡村建设能行得通吗？

乡村建设大概是件很好的事情，大家一定都有几分相信，如果以上边的三个问题问他的时候，往往又很难答得出来，尤其是末一个问题，最难答复。刚才潘同学说：“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能够下乡，则乡村建设可以走得通”。此话亦不尽然。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乡村日趋破坏，农民生计日益窘蹙，乡下人正在苦上加苦，如能让一向过惯优厚生活的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的

---

〔1〕1934年7月对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学生讲演，郝心静记。

生活不一定都优厚，而比起乡下人来总算优厚一点)，到乡间去随着农民过窘苦的日子，是不是办得到呢？要乡下人多出点钱来供养知识分子是不是可能呢？这都是问题。

我记得《独立评论》上曾经有人发表过一篇文章，说知识分子不能够下乡。还有许多朋友也告诉我知识分子下乡是如何困难。他说：我虽然愿意到乡村去，可是乡村不能养活我。乡下人本来就没有饭吃，再添上许多要吃好饭的先生，岂不更是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不注意；此问题不能解决，则乡村建设是行不通的！再则，目前做乡村工作的，多半是从教育入手（如定县、无锡等），我们开头虽不是从教育入手，而今亦偏于教育。可知乡村建设很近乎一种教育。而教育这种事是否能在经济穷促的社会里发达扩展呢？也许有人说：我们的教育是生产教育，“生产教育”正可以救济农村的崩溃。但“生产教育”不过是一个名词，是一句空话，如何去做呢？“生产教育”在今日为不可能也很有有些人说啦。仿佛广东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出过《生产教育专号》，古棣先生曾批评生产教育的如何走不通，话说了好多。还有一次在《大公报》副刊“明日之教育”上有人发表了一篇《生产教育果能行得通吗？》皆可参考。

“生产教育”，“经济建设”，大家都爱说这些名词。斯亦问题之逼迫，刺激得大家不能不注意这些地方。可是“经济建设”最要紧的是它的政治条件、政治环境；“经济建设”的是否可能，全视其政治条件、政治环境而定。谈中国的经济建设的要看它所需要的政治条件有没有。关于这个问题，我去年曾在青岛“经济学年会”上有一简短的演讲，名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困难》。我说：“中国要行经济建设，无论是十八九

世纪资本主义的路（自由竞争），或是走现代统治经济、计划经济的路，均须有其政治条件。有如此的政治条件，才有如此的经济建设。仿佛后者所需要的政治条件更加困难。从世界大势来说，从我们四围的环境来说，中国必须走后一条路，可是走后一条路的政治条件我们是绝不可得。这就是一个特殊的困难！”

我们不能被好的名词所骗（如“生产教育”，“经济建设”），更不能自己骗自己。在没有想通以前，我们不能作。根本看不清前途，你就开始迈步，是将往何处去呢？这是不能不问的。我的意思是说，眼前的困难不能不看见，不想通透不能去做。请大家不要随便相信乡村建设；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大家必须知其难，而后注意研究之，才可以认识乡村建设。

我讲乡村建设，不是在乡村建设的本身上说它如何如何好，我是先对大的根本的问题有认识，有解决的办法，才来讲乡村建设。在大的根本的问题不能解决以前，不能枝枝节节的提出主张。还有许多问题；大家都应当考虑。比如有人说：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没有解除，不能行乡村建设（其所谓社会内部的矛盾，就是说中国现在有封建势力、军阀势力在压迫农民）。这话也对。又有人说：土地问题不解决，则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不解决，复何贵乎乡村建设（此亦所谓社会内部之矛盾）？这个问题也是要考虑的。大概社会内部的矛盾不解除，一方面是不能建设，一方面是建设出来也是矛盾的。还有人说：在这种国际竞争的严重压迫之下，帝国主义不打倒，仍是免不了农村崩溃，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还有人说：国际大战不久将到来，乡村建设虽好，无奈太慢；那么 1936 年之大战，如何应

付呢？如果对这许多问题都没有考虑过，而冒昧以谈乡村建设，岂不糊涂吗？！现在除了以为乡村建设行不通的人以外，尚有根本否认乡村建设的。他们因为是富于阶级感觉的人，所以诽谤乡村建设为小资产阶级改良派理想；我们究竟是不是如此呢？大家都应当感觉到问题重重，而多用心思，多加追求。

前边提出许多问题来刺激大家；引大家用心思。摆在眼前的许多困难问题未解决之前，大家不要随便相信乡村建设，不要随便说乡村建设。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此刻都在问题中，我们的问题又非常复杂，各方面纠缠、扰混、牵连，分不开。所谓各方面者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方面面的牵连纠缠。我们所背负的问题是方方面面勾锁连环的。所以无法作片面的解决。除非没有办法，除非乡村建设不成为办法，如果有办法，一定不是解决片面的问题，因为问题就不是片面的。如果乡村建设成为办法，这个办法就得要包办一切；事实上不包办不行，不是我们要包办。这并非一个夸大的理想，因为问题是方方面面，勾锁连环，不容分开，不容抽出哪一部分来单作解决也。一方面不能作片面的解决，同时再说一句话：除非没有办法，有则不是局部的、部分的、小范围的。因为整个的中国问题已是连锁在世界问题的一环，我们当然无法逃避中国问题、世界问题，而为一乡一邑想办法。很有人误会乡村建设是替一乡一邑想办法，这是笑话！一乡一邑实不能逃出大局而自谋出路；天下绝没有这样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中国问题的解决，一不是片面的，二不是局部的；除非没有办法，有则不能不包办中国问题。大家如能领会此意，即可见出许多人的错误：中国此刻有人单要解决政治问题，也有人单要解决教育问题或其他问题，且从而提出改革方案，这都是不对的！有人



自以为对经济建设有办法，这也是笑话！即令他可以拟出经济建设计划来，也是枉然，因为他没有顾政治那一面。许多人都是假定有一个健全政府来实行其计划，而不自知其前边的一套假定都是空的。如果不能知道中国政治问题将要如何解决，就不要谈中国经济建设计划，或教育制度的树立。中国政治问题之下尚有很大的问号，你先弄了一片假定，岂不是无用！不但没有想通政治问题的解决是不对；不顾经济问题而空想政治问题的解决，也是同样糊涂！满以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即可以国家的力量来统治全国的经济，作种种的经济建设，这完全是空想！谁对中国经济问题没有看出将要如何解决的时候，他一定不能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没想通这一面，而只顾那一面，是绝对不行的；非四通八达不算真通！并不是我们想包办各个问题，事实上非各方面想通之后产生不出办法来。真办法就是要包办一切的！因为各个问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社会内的，乃至国际间的问题，都在勾锁连环着，没法子劈开来解决。我们既然遇到这么一个纠缠最广的问题，只好不怕问题的扩展，只好以非常的勇气，追求无已；从政治而辗转引起经济，则研究经济。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非如此勇气不能研究中国问题。

如此说来，问题这么复杂纠缠；我们不断的追求下去，岂不太无边涯，什么时候才能找出头绪呢？岂不要望洋兴叹吗？我说不然！我们得要在宽的复杂的里边寻求要领，找到了要领，事情就好办一些。这个要领是什么？在什么地方？要领之所在，在政治问题。虽然民族社会内部的问题为国际问题勾锁连环，而内部问题总先于外边的问题；所以内部问题应置之于前，外边的问题应放在后面。这个意思就是说：必须内部问题有办法，才

好进而求国际问题的解决，必先“尽其在我”才行。知此即首须着眼政治问题。换句话说：解决内部问题的办法之进行，必先解决政治问题。有些人很容易犯一个错误。他说：中国所有的问题。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要解决中国问题非先解决国际问题不可。这话也对。可是在内部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如何解决国际问题呢？这种说法，谓之为分析问题则可，谓之为解决问题则不能。办法必须在本身上找；内部有办法，而后国际问题才能解决。至于本身的办法，则政治问题当先。固然我们说非想通了经济问题如何去解决，不能谈政治问题；可是我们如果有办法去做的时候，必然是政治问题当先。虽然什么样的社会反映出什么样的政治，政治不是社会的根本；可是着手进行去做的时候，非以政治问题当先不可。比如我们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文化问题，虽然不但是求其进步，也许另有别的问题在内；可是大体上说离不了进步的问题。然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必须在政治问题底下；在政治问题无相当的解决之前，进步实无从讲起。大概谁能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谁也就能解决中国的其他问题，谁就算是有办法的人。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开头不要怕问题扩展；尤应知问题的要领在政治，而先在政治问题上用心；追求到旁的问题的时候，总要回到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解决的途径如何去寻求呢？如何去研究呢？我们对于政治问题，千万记住：不要自己先提出一个什么办法，不要先对某种政治制度有成见，以为某种制度最合适，某种制度最有效率，这种念头千万不要有！比如看到“民主政治”很合道理，或者看着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办法顶痛快，那个好那个坏你都不要想他。本来就没有那一个办法是好的，没有那一个

办法是坏的；也许那一个办法都是好的，那一个办法都是坏的（都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再则，不要单从我们此刻的大势所需要的处所去想，你不要肯定中国在政治上非如何如何不可，不要单从“要求”一方面去想，如果从“要求”一方面着想，而单顺从其“要求”来想办法，这也是错误的！你以为如何渴切需要，你正不可从此渴切的需要上想办法。有人羡慕某种政治制度好（如羡慕意国、德国或英国、俄国）固然是错误；就是你无论怎样的看清楚了中国的政治需要，而从其需要上想办法，想途径，想制度，这个都要不得！这就好象你口渴了也不要想水喝。即令前面有蜜，你也不要想它是不是甜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说你口渴了也不要想水喝。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先从要求方面去用心，要先看看摆在眼前的事实能够有什么。差不多一件事情至少要从两方面看：一是主观的要求，一是客观的事实。我们宜重在客观的事实能够有什么，不要斤斤于主观的要求什么。我们研究中国政治问题，须从中国政治问题能够有什么可能的解决处着眼。不要单从片面的“要”上去想，必须多从“能有什么”，有什么“可能”的地方来看。天下事“要求”的不一定是“可能”的。你虽然想水喝，而奈无水何！这一层意思，我用一句话结束：我们应当把主观的强烈的要求平下来（也不要忘记），而去看看周围，看看摆在面前的事实，看看社会的形势，能够形成什么样子的政治构造；能够形成什么样子的政治构造，我们就接受什么样子的政治构造。好象仅有这样的木料砖瓦，只能盖一个这么样的房子一样。社会形势要演成什么样子的政治构造，事实上你非接受不可，你不愿意接受也不成！总之，我们要从客观的形势来找政治问题解决的途径，不要单从主观的要求来作解决政治问题的梦。

如何观察如何了解社会形势呢？这个必须根据历史。要先看清楚中国旧日的社会构造，加以分析；再来看近百年来受外面影响而变化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看清楚其演变之步骤，则可知中国的社会形势；由此亦即可料度未来的社会。能料度中国社会的前途，则不难找出政治问题解决的途径。

《乡村建设》旬刊，4卷15期，

1934年12月21日。

## 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

中国社会教育社将于本月 17 日在开封举行其第三届年会。我写此文，一则为对该社此次集会表示欢迎，一则为一般读者作一点介绍。

民众教育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新潮流。这种运动已有七八年的历史，一天一天正在扩大，而旧有的学校教育同时亦呼喊着要接近社会以改进社会，像是响应这潮流一致同趋的样子。通常都将民众教育归属于社会教育范围，而认后一倾向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融合。中国社会教育社就是应着这个潮流产生的，不过两三年间便有近千数的社员，差不多各省市社教工作人员都参加。他算得国内几个较大学术团体之一，虽不如其他学术团体年历之深，但或更有声势，因他一面又近似一个社会运动的团体。

我现在想要说的是：这种社会教育运动与我们乡村建设运动有汇合的趋势。这可以事实来证明。例如该社上届年会曾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为讨论中心，经大会讨论后，且有社会教育应以乡村建设为要旨，及成立“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编制委员会”提供方案，准备下届年会讨论之决议。所以此次开封之会即将以此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为讨论中心题目。又如定县平教工作为社会教育之先进，原初作识字运动，今则完全是乡村建设。去年夏间在邹平开的乡村工作讨论会，来参加的以教

育机关或团体为最多，定县平教会、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无锡江苏教育学院，皆其主要分子。平常常来邹平参观乡村建设的人亦以教育界为多，所谓社会教育将汇归乡村建设于此可征。

不但社会教育将汇归于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之所归趋，亦终不能外乎社会教育。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本不是从教育工作转变来的，其来历为乡村自治运动、乡村自卫运动、农民运动等之扩充变化。我们的同志原都不是教育家，或夙有志于教育者。忆民国十九年夏间，我们率领河南村治学院学生到北平参观旅行，有一次在公园招待席上李云亭先生（蒸）演说，说我们的村治运动自他看来便是民众教育。李先生本是民众教育家，当时正努力民众教育，我颇以为他的话是一种交际上的辞令。四五年来乃渐渐认识他的话是当真的。我们原初虽不想办教育，但往前探求我们的途径，到今日来已不觉走上社会教育一条路。试看我们推进乡村建设的机关，同时亦即为乡村组织的“乡农学校”、“乡学”、“村学”，不是个例证么。好像两道河流，上游不是一个源头，而下游则彼此汇合为一流了。因此，内政部召开第二届内政会议研讨地方自治问题，一面固邀我们去参酌意见，而同时亦邀上定县和无锡的工作同人。教育部成立民众教育委员会，定县无锡两处同人自都被邀参加，而亦邀请我们。诸如此类的事甚多。盖在旁人早已一例看待，不加分别了。

这二者汇合一流已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可无须多说。寻其所以然，盖皆为中国社会问题所规定，有不期然而然者。中国近百年来以世界交通，固有文化不足以应付新环境，其政治改造经济改造乃至种种改造之要求，盖悉受外围世界历史所推演，而非从其民族历史演来；为国际关系所引发，而非其社会内部自发的。在一般之例，社会改造本为历史演进之自然，当其革

命爆发，为旧秩序之推翻之时，必其社会之新机构已孕育相当成熟，好像蝉的蜕壳一样，其新社会之建设也不难。今日中国恰不如此。旧秩序有遭外来理想之否认，与激于民族自救之急切心理，骤被推翻，而新社会之机构初未有若何历史的孕育，所以怎样完成革命，使得有一新社会出现，便为一极艰巨之工程。此工程从其方法言之，便须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之所以必要，就在这里。我们可分三点言之：

一、照平常说，教育是为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所以如何使社会未成熟分子（儿童及少年）得如其已成熟分子（其父若兄）之能参加于社会生活为第一目的。至于大多数成人其生活能力已具，殆无再加教育之亟亟必要。但中国此时整个社会生活正企图转进于一新方式，大多数成人虽届成年，而对于此新生活方式所需之习惯能力则方为未成熟者，势非经教育不可。——此种教育即社会教育。

二、照平常说，教育是要使少数未成熟的个人能适于其社会环境，但中国此时则要在使社会环境改从吾人革命的要求。凡一人之风气习惯，社会间之组织关系，正为除旧布新努力之所在。此风气习惯组织关系非个人之事，明非少数人之事，则其教育设施即不能不着眼于全社会。再革命的要求没有不是要社会多数分子由被动地位转入主动，分子间的关系由疏而入于密者，则其教育设施即不能不趋向普及大众——此种教育即社会教育。

三、照平常说，办教育大都要设为特殊环境以超于现实大社会环境外，好避去纷复的刺激，而集中精力以求学习上修养上之经济有效。——这便是学校制度。但中国此时的教育宜就其人所在环境行之，即必以社会式教育为主。因为此时的教育

既着重在生产大众，而于此生产大众万不能使之脱离生产行程而教育之。此其一。又，此时教育既要在风气习惯组织关系之改进，当然要从实地社会问题着手，个人之长进即在社会进步之中，即不能使个人离开环境得到长进，再为社会之长进。例如地方自治团体意识之养成，农民合作组织能力之训练，一种生产技术之发达，早婚缠足等陋俗之戒除，必无离开实地问题别设为环境以行其教育之理。此其二。——此种教育即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所以成一有力的潮流以涌现于中国教育界，我想是从这里来的。教育界之趋向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之趋向乡村建设，正为他们渐渐看清他们必须负担的大工程——建设新社会，完成革命的工程。而我们呢，起初倒认清了这目标——所谓乡村自治、乡村建设，其意义正是社会新机构，生活新方式——而没认清这方法——社会教育，直待动手作起来，方始认清自己所作所为原无非社会教育，而且往前作时将更非清楚明刻地取径于教育不可。所谓乡村建设社会教育的合流为中国社会问题所规定，大致便是如此。

中国社会问题是如何一个问题原早摆在那里，只怕人不认识，解决这问题将必取怎样的途径亦差不多是定了的，只怕人不去走。然而人是活的，自然会用心追求；不怕他有一天不寻到问题上来，问题逼他不得不往前干；转弯抹角，不怕他有一天不摸上路。——这是我末后的一点感想。然而吃紧的就在用心追求，往前干啊！

天津《大公报》，

1934年8月12日。

《教育与民众》，6卷1期，

1934年9月28日。



## 我的一段心事<sup>〔1〕</sup>

在乡服务诸君！邹平自去年7月划为乡村建设实验区，取得实验权，已一年有余。现届新年度开始，村学乡学改组完毕，我们应检视过去的错误及确定今后的方针。今天召集大家（辅导员乡理事）来此开会，就是这个意思。第一，应明了村学、乡学要往哪里去；第二，许多具体问题，亦得经过商讨，才好动手去作。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关于我们工作的根本地方——方针确定与指点。其余具体问题，经过各位主管科长报告后，然后按序进行商讨。

我有一段心事希望大家能够明了！这段心事积在心里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我刚才坐在办公室里回忆已往的情怀及我所以来邹平的动机。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来邹平的一段心事吗？我来邹平不为别的，就是探求如何改造中国的政治，如何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很热心时事，留意政治；对于当时的政治很不满意，具有顶急切极强烈的政治改革要求。那时，我很羡慕西洋政治制度，恨不马上见其出现于中国社会。本来当时中国政治上有不同的两派：一是康梁所领

---

〔1〕这是著者1934年8月13日晨对乡学辅导员、乡理事的讲话，记录者为公竹川，以《村学乡学的由来》为题，首次刊出于《乡村建设》（旬刊）。后作为附录收入《乡村建设论文集》时，又改题为《我的一段心事》。在收入《梁漱溟教育文录》时，则以《关于乡学村学的讲演》为题。——编者

导的立宪派，一是孙黄所领导的革命派。他们在国内不能立足，流亡日本；彼此之间常有争论，立宪派办有《新民丛报》，革命派办有《民报》，两派时有互相攻讦文字发表。有人将双方不同意见的文字汇集成书，名《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是我那时最爱读的一部书。我常常拿着那本书看，几于无时或离，日间则携着走，夜间则枕之睡，其对于政治趣味的浓厚可以想见。我于此二派之中是倾向立宪论，大家向满清政府请愿开国会，我特向学校请假参加；咨政院成立后，每逢开会，我亦跑去旁听。及至辛亥革命成功，国会正式成立，我更是常常去旁听的。我刚才不是说我倾向立宪派吗？可是后来因为清廷无立宪诚意，许多人都很失望，许多倾向立宪派的人都转变成革命派，我亦如此，加入革命党闹手枪炸弹的把戏。那时以为革命成功，政治改革的希望可以实现，不意等到满清推倒，革命成功，国会成立，政治改革的希望反倒越来越远了！国会自己捣乱不说，后竟被袁世凯解散，从前热烈的希望，变成了幻灭的痛苦！一般人都恨袁世凯解散国会，北洋军阀破坏约法；而我则以为国会的被解散，约法的被破坏，其病不在袁世凯个人或少数北洋军阀，而多数民众没有那样的政治习惯，因而不会运用那样的政治制度。我那时在心里很清楚新政治制度不是搭一空架子所能够建立起来的，问题焦点系在“习惯”。不要说中国多数人对于新政治制度尚不明了，就是已经完全明了，亦未必就会运用建立，因缺乏在事实上熟练进行的习惯故也。比如一个人对于自行车机件的构造与配合在道理上可以很明白，可是假如他素无练习，必不会骑。由此可知道理容易明白，而事情实不容易作，习惯尤其难以养成。政治改革的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

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了。因为我有如此的认识，所以如何培养新政治习惯一问题就在我心里常常盘旋思索，后来就觉悟到“乡村自治”的必要了。这道理很容易明白：我们所谓新政治习惯，无非就是团体生活的习惯，而团体生活习惯的养成天然须从小范围着手去练习——即从乡村小范围的地方团体自治入手。除非我们没有改革政治的真心诚意，如果真要去改革政治，那就不能怕迂远而必须从切近处小范围的乡村自治起手以培养中国的新政治习惯了。

我心目中所谓新政治习惯可分两方面去说：一面是对于团体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一面是对于团体公共事务的活动力。“乡村自治”一面可以培养人对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一面可以培养人对公共事务的活动力。我们培养新政治习惯如一上来即从国家起手，则国家面积太大，人口太多，距离太远，不在眼前，注意很不容易集中，注意力就无从培养了。如从乡村小范围起手，则范围内公共的事情摆在眼前，刺激切近，痛痒相关，休戚与共，注意力就容易引发培养。注意力引发之际，好恶迎拒是非利害赞成反对种种情意必随之而生；凡此种种情意，最好能够推送表达出去，最好能够在实际活动上表现出来，则活动力之培养就又成为必要。注意力唤醒之后，如不继之以行动使其见诸事实，则一定会枯萎无用的。而活动呢，亦天然须在乡村小范围内才容易引发培养；范围大，虽活动很不容易发生反应，无反应则活动的意趣就要减煞，活动力就不易养成。多数中国人对于国事漠不关心，原因未尝不在这里。我们如从乡村小范围起手，则大家的活动易送出去，送出去就易有反应，互相刺激，互相反应，乡村社会就可以活起来；如此，活动力就容易培养成功了。如果在乡村小范围内尚不能引发大家的活动力，大家

尚不乐于活动，则国家大事尚有什么希望呢？所以要培养中国的新政治习惯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

关于新政治习惯的培养训练一问题，现在再分三层去说：

**（一）村学、乡学意在培养新政治习惯** 我们邹平村学、乡学的安排就是要由此训练乡下人对于团体生活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我们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而变为村学、乡学，并不是不要自治组织，却正要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我们把邹平旧日的七区划为十四乡，意思就在使他范围小一点，注意力容易达到，活动力容易养成。于此大家应注意村学、乡学不仅是个机关，并且是个团体；村学是合全村人成一团体，乡学是合全乡人成一团体；有团体才能自治，没有团体无从自治。普通所谓地方自治实应称为地方团体自治，及其成功，亦可名为地方自治团体，而要在有团体意识共同活动，才算自治。如无共同活动团体意识，不但不能自治，并且不成其为团体了。所以我们村学应当注意的是定期召集全体民众谈话报告，引起他们对团体公共事务的注意；再进而有所倡导进行，使大家活动起来，当然更好。而乡学则须着重学董会，乡学学董会如能健全作好，则乡学亦就可算一好的团体了。现在总结一句：村学、乡学的目标就在培养新政治习惯，启发大家的注意力与活动力，让多数人从被动地位转到主动地位，从散漫消极变为积极团结。这个意思大家都已明白，不必多说；可是实地作起来就真不容易。地方自治在中国倡议进行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即在邹平，听说在清末民初亦曾办什么自治训练所，事实上到底没有成功。不但邹平没有成功，全国任何地方都未成功，一直到现在仍在嚷嚷提倡之中，可见这件事业的确不易进行，难于成功！我们村学、乡学的组织如能发生作用，乡村真正活起来，则对于中

国地方自治问题的解决，不啻发明了一把锁钥，找着了他的诀窍，岂不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业吗？！几十年来没有作出头绪的事情而由我们有所成功，岂不是一件很值得去作很有意义与价值的事业吗？！我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作乡村建设实验，什么时候才算成功呢？直捷了当的说，就是村学、乡学真正发生组织作用，乡村多数人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均行启发，新政治习惯培养成功，而完成县自治，研究院实验县的大功就算告成。

**二、培养新政治习惯必须合乎旧伦理精神** 当我们注意培养新政治习惯时，必须认取应合中国的旧伦理精神，而不能采用西洋组织政党，竞争选举，三权对立的办法，这些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在民国十年以前，尚未见到此处；从是以后，方始彻底觉悟。西洋自中世纪以来即无时不在竞争抗斗之中，时时唱武戏，而中国人则从来就只会唱文戏，不会唱武戏。西洋历史实在是一部反抗斗争史，他的政治制度是反抗斗争出来的，而其维持运用亦仍靠反抗斗争，牵制均衡。这一套制度引入中国只有使中国社会更散更乱，绝不会产生更好的秩序。中国社会秩序本来是从礼让产生的，现在引入了恰相反背的竞争武戏，失掉了原来的礼，矛盾冲突而无秩序，那里会不更散更乱呢！西洋与中国实在不是枝枝节节的不同而是根本的相异，西洋是个人本位出发，中国是从伦理本位出发。如西洋人请客，自己坐主位，客人坐两边，他是以自己为主体的；而中国人则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以对方为重。西洋权利观念即从个人本位而来，他是主张自己的一份，讲地方自治则每一公民就有自己应得的一份。中国是伦理本位社会，是从义务观念出发，义务观念就把人与人连串到一起。在中国如从权利观念出发，那就只有更加散漫，纷争百出，而无合到一块之理。义务观念是以对方为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密切联锁起来。西洋最近的法学思想亦由权利观念变为义务观念，喜欢讲社会联带关系。风气为之一变。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必须义务观念放在前边，始可合作进行。此意与中国伦理观念很相符合。中国伦理是情谊出发，故不以自己为中心，而以对方为重；如以自己为中心，就不合伦理的意思。伦理以对方为重，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作到联锁密切融合无间的地步。个人以团体——乡村——为重，团体以个人为重，发挥伦理义务观念，可以把我们的村学、乡学创造建设成功。中国从前有五伦之说，我们现在可以再添一伦，就是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彼此互为尊重，互有义务是也。人类生活，大家如都以对方为重，的确可以增进社会联带关系；社会联带关系，的确可以愈来愈密！所以人与人各以对方为重的伦理义务观念是中国社会顶优越的心理习惯，极应继续发挥光大，开创正常合理的人类社会。

现在从我们眼前脚下的事实来对上边所说的意思加以阐明：如我编的《村学乡学须知》就是指明大家应有应尽的义务。良以从义务说话能够打动中国人的深心，而从权利说话则刺激不动的；此因义务观念在中国原来就有，而权利观念则为他一向所无。所以我们现在要使中国人团结到一块，就得从义务观念出发说话；如系权利观念则恰好使中国人往分散里去。再则《村学乡学须知》不是许多法律条文，却近乎一种道德上勉励的话。因为伦理是从情谊出发，原来就是属于道德的；他是在人类自己心里原来就有的，而不是从法律外力加上去的。从法律外力加上去，大家互相争持权利，所以是武的（西洋人只会唱武戏）；从自己心里情谊出发，大家互以对方为重，所以是文的（中国人只会唱文戏）。中国义务观念实是礼而非法。如《村学

乡学须知》中；学众须知第四条是尊重多数，舍己从人，而第五条则是更须顾全少数，彼此牵就，这完全是从伦理情谊以对方为重出发——是道德的勗勉，而非法律的说话。法律是死板的、固定的、强制的（如几分之几出席，过半数通过生效），而我们刚才所引的二条须知是活的，富有情味的，互相照顾的，所以是道德的。在法律上，这二条必会扞格不入，成为疑问；而在道德上则很园通。

我们现在总结一句：中国人只能走伦理情谊的路，尤其乡村非如此不可。于此大家应当注意：我们村学、乡学一不提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如提四权，则乡村先自捣乱，非往分散里去不可。固然乡村不能没有罢免的事，但不能由村民大会投票去作。那是太硬太辣的办法，太违反人类温和礼文深细醇厚的心理，粗野之至！数千年陶育于礼文谦敬的中国人，那里能走这样的路，采用这种办法！再则我们村学、乡学一切不从法律说话而从伦理情谊出发，所有粗硬的办法在中国社会皆不能用。三则我们村学、乡学不唱对台戏，如旧日的乡镇公所一边有乡长，一边有监察委员会，那就是唱对台戏。在我们村学、乡学组织中负事务责任的村理事与乡理事，固亦应受人民的监督；但必须避免直接正面的冲突。如何避免呢？我们于此转了一个弯，增设了一个学长，站在超然地位，不负事务责任。让他来尽监督教训的责任——监督作用转移在学长身上。大家如不满意理事，则可以告诉学长，由学长转告理事，就避去正面的冲突了。如学众须知第十三条即说此意：

“要知道爱惜理事——何谓爱惜理事？就是要监督他。

‘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监督他，勿使他陷于不义，正为爱人之道。凡有劝谏的话，无妨以友谊进一言。不

过要避免正面冲突，最好有话对学长先说，由学长转告他。”学长是一村一乡之师，超居众人之上，对于大家的是非曲直，自能主张公道，理事对其监督教训自亦乐于接受，——乡村政治的运用，其妙完全在此。我们即把中国向年来高硕德表率群伦的伦理教化思想，装在村学、乡学组织里，积极发挥去。而乡村事务责任则由年轻有力精明强干的人去负担；由学长在上面监督他，凡事均有调和缓冲余地，正面冲突自可避免。西洋民主政治自有他的长处，以我们旧伦理精神吸收运用他民治的特别色彩，而将他对抗粗硬的一面免去，则我们的新政治习惯自可养成；不然任什么都说不上，就只有自乱了！

**三、今日乡村组织必须是一教学组织** 我们看见整个中国眼前正在要求进步，中国在某些地方的确比西洋落后，真应当极求进步，尤其在内地乡村应求进步更是毫无疑问的事。要让乡村进步那就得接受外面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知识方法；绝不能深闭固拒。内地乡村必须先开胃口，肯于接受新方法，才好进步。如乡村欲在经济上求进步，那就得改良农业，输入新种子，组织合作社，这些都须接受外面的新方法才能进行有效。我们为乡村接受新方法起见，所以有村学、乡学的组织安排——其意义即在这样的组织可以提振乡下人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心理。恰好中国一向就有此长处，很富于向上心，一切尊师、重道、敬长、尚贤都是这种心理的表现。这是中国社会最好的一种风气。从此可以开出大家求进步的意思。当你提引乡下人的向上心时，我相信他们能够了解接受。大家于此应当注意：“求进步”必须放在“向上学好”的心理之下去作，如单单说求进步，则打不动乡下人的心，最根本的是提振乡下人学好振作向上的志气，把不好的风气驱除整顿起来，才好求进步。我们废



掉乡镇公所而成立村学、乡学，用意即在此处。如一上来就成立自治组织，偏乎自主自决之意，则挡住了向上学好求进步，他将不能谦虚接受外面的方法与领导。我们乡下人现在还不够谈自治呀！必须先开胃口，虚心接受外面的指导，仿佛胃里空虚想吃东西一样，然后再设法输送滋养品（即新知识技术等）给他，他自然长进。社会进步，乃有自治可成功。

总上三层，可以把村学、乡学的目标意义与内容精神，概括明了。中国新政治制度的建立，新政治习惯的养成，必有资于此，殆无疑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大业，其将肇始于此而达于完成乎！

我来邹平不为别的，完全是为这件事。我拟定了这个方案，须大家一齐努力推行实验，所以大家就是我的伙计！我的这实验成功不成功全靠大家了。邹平自去年划为实验县，我只给大家一个方向，没有工夫亲自照顾，毛病缺陷，随在皆是。恰值实验区主任王柄程先生因事请假，故我亲自参加工作，改组村学、乡学。我们大家如能一齐向前努力，这件事亦许会成功的！完了。

录自《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232—240页，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1935年。

《乡村建设》旬刊，4卷3期，

1934年8月21日。

《乡村建设论文集》，203—211页，

1936年2月，乡村书店。

## 村学乡学之具体办法<sup>〔1〕</sup>

在乡服务诸君：昨天早晨我同大家所谈的是比较根本的意思，没有说到具体问题。在这两天的会谈里，关于具体问题已经有不少的讨论；现在把我的意思亦简略地讲几句，算作一个最后的总结。我的话讲完，我们的会即告结束。

本年6月本县曾开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工作人员如乡学、村学教员辅导员，均行出席，乡理事亦有参加的；合研究院及县政府出席人数共有六七十人之多。从那个会上我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已往工作上的错误与缺陷。这可分三点去说：

一、前方材料方法太不够。在前方工作的人——乡学、村学教员——于材料、方法、技术，太缺乏，太不够用；这完全是由于后方——县政府、研究院——供给不足的缘故。不久以前，有一位定县工作的朋友来此参观，他对我说：“我对你们邹平一面很佩服，一面很不满；佩服的是你们村学、乡学组织，安排很合适，而不满的则是方法太欠讲究，如在方法上加以补充注意，那就更臻完善了”。这个批评是很对的。在定县与无锡他们办民众教育就有很丰富的材料与方法，对于工作进行上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有一位乡学教员马粹夫先生在上次乡村工作讨

---

〔1〕1934年8月14日对邹平实验县政府召集之乡理事乡学辅导员的谈话，李激笔记。曾以《关于村学乡学的讲演二》为题收入《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编者

论会上也说过我们缺欠艺术的方法的话。其实我们所缺乏的岂止艺术的方法，其他方面都嫌不足。大家要晓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方法事情才能作好。过去前方材料、方法的所以不够，一面是训练部训练诸同学时〔有〕缺欠，一面即在后方——乡学是村学的后方，县政府是乡学的后方，研究院又是县政府的后方——对于这方面的供给太少用力，太少注意。

二、县政府用力过火。在过去县政府不但倡导进行了许多事情——如放足、造林、庄仓会……且进行上均是督促强制的，乡学、村学不得不落于被动机械的地位。这违反我们实验的原意。我的意思除了办理自卫之外，其他任何事皆不用强制力。

三、组织欠灵活。此可分二面来讲：（甲）乡学缺乏中心。在乡学组织上说学长是一乡领袖，仿佛是中心；可是乡理事负责事务责任，一切事情由他办，仿佛亦是中心；而辅导员是代表县政府，可以辅导一切，力量更大，亦象是中心。这样一来，中心就没有了。大家要知道组织必有中心，其他始有系属，才易发生组织作用。过去仿佛谁都可以作主，谁亦不能作主，中心不清楚，力量不好用，组织当然要欠灵活了。（乙）村学被忽视。原来的组织安排是以村学为主（村学是基础），乡学为上层；而过去一年则重乡学，忽视了村学，成功一种本末颠倒上重下轻的局面。加之村学学董会组织不健全不合法，组织且不完全，灵活与否更谈不到。除掉上边所讲甲乙二层之外，在乡工作人员（辅导员、乡学教员、村学教员），彼此之间缺乏联络照顾，组织就尤欠灵活了。

过去一年我们工作上的缺欠本来很多，原不止此三层；不过大致可以如此概括。现在我们要救正已往的错误，必须确定今后的办法了。这亦可以分三点去说：

一、充实后方。就我而言，最要紧的工作莫过于充实后方。现为供给前方材料与方法计，已成立实验县区设计委员会，内分教育、建设、合作、经济、行政五组，就这些问题作切实的研究。研究有得即可输送供给于前方。如教育组即可供给前方以教学方法及教材；建设组对于造林可加以指导——乡间如有植树的需要，应由乡学或村学自己相机倡导，最好由学董会开会商议决定步骤，而后由建设组供给植树的方法与材料。其他合作与经济亦都如此，都在材料与方法上作研究工夫。而这一切事的倡导进行全由乡学、村学去作，县政府绝不强制，绝不发动，只供给前方以材料与方法而已。我想着如此合适，不知在事实上如何，亦只有靠事实去证明了。

二、县政府不直接用力。县政府固然希望乡村积极活动，进行建设，却不能直接用力。直接用力是最笨的办法，所以县政府以后只作预备工作，一切事听乡学、村学自动的去干；我不下命令强制进行，我只作一“缓”字工夫。大概我缓，乡村或者可以动，我一急则乡村就非被动的跟着我走不可，那就成了机械的，将会一步不走。大家要知道缓字工夫很难作，我要咬定牙根去作。活动不活动在大家，大家就是不动，我亦不急！不过在县政府方面对一切应提倡的事情，虽只作预备工夫而不直接用力，以便留给乡村自动的去进行，可是我对治安问题及不良份子的取缔却要积极用力去作。凡县境内不务正业贩卖毒品吸食毒品窝藏土匪的不良份子，统同的抓起来，送入成人教育特别班。这样，我作除暴安良的工夫，而你们在乡村积极活动，我们的实验工作庶可理出一点头绪来。

三、乡学中心是乡理事。现在确定乡学中心是乡理事。辅导员固然可以无所不辅导，可是主要的是辅导乡理事，亦可以

说辅导员是乡理事的辅导员。同时，学长亦可说是乡理事的学长，学长不一定是乡理事的下属，却要以他为中心。这样，无论前后左右都系属于乡理事，乡学的中心就确定了。

新办法新方针一经确定，那么，辅导员的工作自然不同于前。从前县政府出了许多题目要乡学村学去作，乡理事不动，辅导员一着急，遂忙着去跑，与乡理事差不多。现在新方针确定，情势与从前自然不同，不致再蹈前辙；可是辅导员在他自己的工作亦应自觉地认识清楚与从前不同的所在。兹就村学、乡学分别说明辅导员应行注意之点：

一、村学。在本年度辅导员应以辅导村学为其第一主要工作。大家要知道村学是基础，是本；乡学是上层，是末。如培养新政治习惯从乡学起手则不容易，顶多把乡学学董会弄好而已。这固然是一好成绩，但他浮在上边，不踏实地，形势稍生变化，成绩即归乌有。反之，如从村学起手去培养新政治习惯，则基础建筑在多数人身上，若有成绩，不啻生了根，是稳固不拔的。现在村学很少，非大加扩充推广不可；扩充村学，就得靠辅导员用力了。现在一般乡下人对于村学很不明白，不欢迎；要想成立村学，须凭辅导员寻找机会，预先酝酿，酝酿成熟，再行正式着手。辅导员如果看见某一村庄可以成立村学，最好先到该村物色心地明白正派要好的人，抓住他，亲近他，与他作朋友，打动他的心肝，使他鼓动村内人众的心气，作事先的酝酿预备。更要使他明白村学是衔接上面的系统：村学成立一则可以提振大家向上学好的心志，整顿村内不良的风气，慢慢走上自治的途径；再则可以得到种种好处，如外面的新方法、新技术、新知识都可经由村学介绍进来，此一村庄社会自然会往进步里去。总之要想向上学好求进步非成立村学不可。假定某

一村庄有一百户人家，经过你（指辅导员，下仿此）多时的酝酿，及你村内朋友的鼓动，对于村学一事只要有六七十家有相当的明白愿意，那你就可以进行成立。于此有应注意的三点：第一，谁当村学学董，你自己平时就应注意，心里先须有个数，然后在无意中与村中人谈话时，征询他们的意见，看谁合适，在大体上有个决定，这是事先的接洽。第二，村学学董会应按手续组织，在过去常不按手续办理，很有缺欠，极不合适，以后非注意矫正不可。辅导员酝酿工夫到了上边所说的那一步时就算成熟；此时可以报告县政府，派人协同召集村民大会，把预先定好的学董提出征求大家的同意，不必举手投票表决，只要无异议就行，这是一个手续。可是这个手续很要紧，必须合乎手续，然后学董会的作用才能发生，大家的精神才可发挥出来。诸如社会改良事业——戒早婚、劝放足……及社会建设事业——合作、造林……皆由村学学董会去发动进行，是再真切实在不过！如由乡学去作，就间接而差一点了；由县政府去作，则更间接，更要不得。但当乡村工作发生障碍须我下命令时，我亦可以下命令帮助的。还是〔有〕辅导员在一乡之内无所不辅导，实不能定驻一处，欲谋村学组织之健全，势非与村学教员有密切的联络不可。教员常住村中，对于村内情形及各种活动，能够深悉底蕴，自可补助辅导员之所不及；同时，就教员说，孤居一村，自感寂寞，亦极须辅导员之安慰往来，以解积闷。在过去村学教员们遇放假即退到城里，此固无妨，但如先行退到乡学岂不更好？村学教员退到乡学，在短期间内可与辅导员作事情的商洽，学问的研究，经验的交换，如此更易发生亲近密切的友谊。总之，无论从事情上说，或从情感上说，辅导员与教员实是很亲切的兄弟伙计，彼此能够时时联络安慰就好了。

二、乡学。辅导员的第二工作才是乡学，对乡学亦不是事事都管，最要紧的是注意学董会，使其组织健全并发生组织作用。学董会的形式是否完全？开会的次数及出席的人数是多少？开会时有否精神？均系应行注意之点。要紧的是开会不要白开，总要想法子让他有精神有作用才好啊！

现在总起来说：在村学、乡学未成立之前，辅导员负酝酿安排之责任，及其成立之后即应尽辅导之责。我在《村学乡学须知》对此曾详为指点，辅导员诸君均应深予注意：

“在村学乡学组织成立以后，辅导员负辅导之责，应随时注意学长学董理事以及村众等的行动态度合于乡学村学办法所规定否？合于本编须知所说他们各自应尽之义否？尤其应当注意的是：1. 村理事遇事与各学董商洽否？他所经手办理事项能随时在村学向村众报告否？每月一次总报告曾实行否？2. 乡学学董如法开会否？乡理事办事能与各学董和衷共济否？众人对他感想如何？3. 学长能以向上学好之意勉励众人，振作大家精神否？能调和众人使彼此融洽否？能自处于超然地位，不与理事争权否？能一面劝众人信任理事，一面自己监督理事否？4. 村众能知注意公事热心开会否？知尊敬学长否？遇有不满意理事之时，知诉于学长而不与理事冲突否？”

末了，我想起杨效春先生在乡村工作讨论会曾说：“辅导员最上等的是让乡村组织发生作用与力量，运用组织的力量而不用他自己的力量；其次是引导旁人用力量；最下等的是自己动手脚去干了。”这种上下三层的分法很有意思。固然，辅导员自己干较比不干总要好些，可是他不引导旁人用力或组织发生作用，只落得自己去干，的确是最不行的！大约，辅导工夫入

手在引导旁人用力量，慢慢活动运筹，培养训练，最后发生组织的力量。今后辅导员的考核，即以乡学、村学是否发生组织作用为准，乡村组织机关发生作用就算尽了辅导员的职责，实不在他自己能作许多事。在过去即因乡理事趋于保守，省钱为贵，而不积极作事；辅导员着急起来，遂动手动脚地自己去干。本年度，很多位有能力的人参加工作，担任乡理事，大体上说较诸旧任健全。今后的趋势亦许会变化，不象以前的保守；乡理事能够积极作事，辅导员自然不用着急动手了。大家于此应当注意：“省钱固然很好，但作事更要紧”！“〔保〕守固然不好，但亦不宜进行太猛”！我对乡村情形不很清楚，所以最后以这种来回照顾的赠奉诸君，诸君其善自体会，斟酌乡村实际情况，相机进行才合适啊！

《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241—247页，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1935年。

《乡村建设》（旬刊），4卷4期，

1934年9月1日。



## 孔子学说之重光

今天开孔子诞辰纪念会，按中央规定的典礼节目，有孔子学说一项，现在由我来讲。

我常同大家说：中国近百年来遭遇一种不同的西洋文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打击，让我们历久不变的文化发生变化，显出动摇。大家又都知道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关系，所以中国文化受打击，发生动摇，当然亦就是孔子学说的受打击发生动摇。此时孔子之被怀疑，是应有的现象，是不可少的事情。大概是应当这样子，不怀疑不行；只有在怀疑之后，重新认识，重新找回来才行。我曾告大家说中国民族精神，必须在唾弃脱失之后，再慢慢重新认识，重新找回来；他必不能是传统的传下来！因为传统已全无用处。可是重新认识，重新找回，很不容易！不能仍然敷衍旧说。几时是孔子学说重光的时候，我们不敢说。在眼前很明白的还是一个晦塞的时候，怀疑的空气仍然浓厚。

我曾经努力这个工作——即对于孔子学说的重新认识，把晦暗的孔子重新发扬光大，重新透露其真面目。这个工作，依我所见，大概需要两面工夫。一面是心理学的工夫，从现代科学路子，研究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这样追求上去，对人类心理有一个认识；认识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发挥孔子的思想。如无这面工夫，则孔子思想得不到发挥。因为孔

子学说原是从他对人类心理的一种认识而来。孔子认识了人，才讲出许多关于人的道理。他说了许多话都是关于人事的，或人类行为的；那些话，如果里面有道理，一定包含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是他一切话与一切道理的最后根据。所以心理学的研究是重新认识孔子学说，重新发挥孔子思想，顶必要的一面工夫。还有一面，是对于中国的古籍，或关于孔子的书，要有方法的作一番整理工夫。我们现在无法再与孔子见面，所可凭藉参考的，除了传下来的古籍，更有何物？所以要想重新认识孔子，古籍的整理工夫，亦是很必要的。可是从来想发挥孔子思想学说的人很多，似乎都欠方法，很容易落于从其主观的演绎，拿孔子的一句话、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去讲明发挥孔子的思想，而没能够有方法的来发现孔子的真面目。仿佛前人大都有此缺欠。所以孔子学说的发挥解释可以千百其途径；一个人有一个说法，一百人有一百个说法，一千人有一千个说法。同是孔子的一句话，我可以这样讲，你可以那样讲。讲孔子学说的人越多，孔子的真意思越寻不出。为什么越讲越分歧，越讲越晦暗呢？就在没有方法。自孔子以后，到现在很多年代，代代都有想讲明孔子学说的人，都自以为是遵奉孔子学说的人。可是遵奉的人越多，越加分歧，讲明的人越多，越加晦暗。今后如果仍然如此下去，岂不更没办法！所以我们现在要想讲明孔子，不能重蹈前辙，必须有方法的去清理一遍才行。当我们作这个工夫，不要忙着往高深处讲，宁可有一个粗浅的意思；如果粗浅的意思而是确定的、明了的、不可摇移的，大家公认的，就要胜过含混疑似两可难定的高深之见！从粗浅起手，步步踏实向前走，不定准的话不说，说了便确定无疑；如此踏实确定地走向深处，庶可清理出一点头绪来，发

现孔子的真面目。现在总起来说：大概必须得有这两面：一面作认识人类心理的心理学工夫，一面作有方法的清理古籍的工夫，然后才能对孔子学说重新认识。

今天所要讲的是偏于后一面，即从粗浅的地方脚踏实地的来确定孔子是怎么回事。现在所讲的仍是好多年前——民国十二年——在北京大学讲过的。当我们研究孔子思想学说，首先应问孔子毕生致力研究的到底是一种什么学问？虽然大家都知道孔子的学问很多，许多人称赞孔子博学多能，当然是事实；可是他一定不单是博学多能。他的真正长处不一定在博、在多，假定孔子有一百样才能，一百样学问，那么，现有一百个专家亦不能及得孔子么？恐怕孔子有他一个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为他种种学问的根本。我们如此追问下去，就发现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不是现在所有的学问。虽然现代世界学术很发达，大学专门的科学很繁多，可是统同没有孔子研究的那一门学问，并且给他安不上一个名词来。很显而易见的，孔子研究的学问，不是物理化学或植物动物——不是自然科学；恐怕不单不是自然科学，并且亦非社会科学。孔子学说固亦包含类属社会科学的政治教育乃至其他种种的道理，但孔子毕生真正致力并不在此。也许有人要说孔子学问是哲学，我说孔子学说不单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且亦不是哲学。哲学一名词本非中国所固有，是从西洋外来的；如果哲学内容是象西洋所讲的那样子，则孔子学说可以断定亦非哲学。例如西洋哲学中有所谓唯心论，唯物论，一元论，二元论，人生观，宇宙观，本体论，认识论，机械论，目的论，……孔子学说全然不是这一套复杂细密分析系统的理论玩艺。如此看来，孔子学说很难安上一个名词；在事实上所有世界的专门大学很难找到有这样的

学科。那么，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我们要想明白孔子，这一条很有关系，很可帮助我们知道他。但这些话的内容是什么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什么学呢？话很浑括，很难明白。“三十而立”，立字怎样讲呢？很不好讲，“四十而不惑”，不惑的究竟是什么？对什么不惑？不惑两字仿佛会讲，大概就是不糊涂吧！但其内容究竟是什么，则非吾人所可得知。“五十而知天命”。什么是天命？什么是知天命？亦不好乱猜。”六十而耳顺”，耳顺是一种什么境界？更不可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字面说似乎好讲，可是事实上更不好懂，因这是他学问造诣的顶点，是从志学……耳顺等等而来，对于那些我们尚且不懂，如何能懂得他七十岁时的进境呢？所以我们不愿随便去讲古人的话，不愿往深奥高明里去探求。我们只注意这些话是孔子自己诉说他自己学问的进境与次第，至其内容如何，我们不愿乱猜。在前人亦许就要讲了，什么是不惑，什么是知天命，什么是耳顺，什么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前人都可有一个解释给你。而我们则暂且留着不讲，先从粗浅处来看。这些话所讲的大概不是物理学、化学，乃至政治学、教育学吧？甚至亦不是哲学吧？哲学不象是这样。这些怎能是哲学呢？他仿佛是说他自己，——说他自己的生活的，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十五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照我所体会，他

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而不是要自己不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没办法。比如他说“不惑”、“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内容固然不好懂，可是我们隐约看出，到那时候，他的心里当很通达，自己很有办法，自己不跟自己打架。平常人都是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管不了自己，自己拿自己没办法。而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生活很顺适，自己对自己很有办法。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不是随便乱猜或妄说的。孔子毕生致力就在让他自己生活顺适通达，嘹亮清楚；平常人都跟自己闹别扭，孔子则完全没有。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遍找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他安上。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学”。这种自己学，虽然现代世界学术很发达，可是还没有。这就是我们从《论语》上得到关于孔子学说的一点消息。现在再举《论语》一章可以帮助明白这个意思。“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孔子最好最心爱的学生是颜回，而颜回最大的本领最值得孔子夸奖赞叹的就在“不迁怒，不贰过”。究竟“不迁怒，不贰过”如何讲，我们不懂，暂且不去讲明；但可以知道的一定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哲学。从这二句话，又可证实上面发现

的学生。譬如木匠的好学生就是会作木工活的。裁缝的好学生就是最会缝衣服的。而孔子的好学生，没有旁的本领，是“不迁怒，不贰过”，则老师的学问是什么，亦可从而知之了。现在结束这面的话：我们要想讲明古人的学问必须注意方法，不能随便往高深处讲。说句笑话，我不是孔子颜子；即使是孔子颜子，我才四十二岁，如何能知道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呢！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粗浅易见的地方来确定孔子的学问是什么。虽属粗浅，可是明白确定；明白确定，就了不得！比方孔子学问很古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说来说去都是说“他自己”；我们确定孔子学问是如此。意思虽很粗浅，可是很明白，很确定，可以为大家承认，毫无疑问，无可再假。我们如果这样一步踏实一步，一步确定一步，慢慢走向高明深远处，则孔子的真面目亦可被我们清理出来重新认识。

这是关于整理古籍方法一面的话；底下转回来讲孔子的学问。

孔子的学问是最大的学问，最根本的学问。——明白他自己，对他自己有办法，是最大最根本的学问，我们想认识人类，人是怎么回事，一定要从认识自己入手。凡对自己心理无所体认的人，一定不能体认旁人的心理；因为体认旁人心理无非以我度他，了解旁人必须先了解自己。我随便举一个例，如吃辣子，看见旁人张咀作态，我就明白那是感觉辣的表现；我何以能知道？就在我曾经有过那样的经验，从我自己的经验可以推度旁人。不然，我对旁人的心理就无法知道。所以要想认识人类必须从认识自己入手；只有深彻地了解自己，才能了解人类。而了解人类则是很了不起的学问；因社会上反来复去无非人事，而学问呢，亦多关人事。如历史、政治、教育、经济、军事，都

是研究人事的学问。所以明白了人，不啻明白了一切学问；明白了人类心理，能作的事就太多了。他可以办教育，开工厂，干政治，可以当军事官，带兵，因这些无非是人事啊！可是孔子学问之大远不在此，虽然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是一切学问知识的最后根据，不过这仍为一种知识学问，孔子的伟大尚不在此。

孔子学说的真价值，就在他自己对自己有办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亦就是自己不跟自己打架，自己不跟自己闹别扭。所谓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其实尚是我们解释他的话，在他自己无所谓有办法无办法，只是他的生命很圆满，他自己的生活会很顺适而已！此即孔子学说真价值所在。申言之，所有办法皆从了解来，因为一切学问都包含两面：一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了解，一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有办法；而办法则从了解来。办法是偏乎应用一面，了解是纯粹研究的工夫。如果对于人类心理有认识有办法，那一定是从深彻的了解个人自己起；了解自己与对自己有办法，是丝毫离不开的。如对自己没办法即不能对自己有了解，对自己无了解亦不会对自己有办法。反之，有一点了解即有一点办法，有一点办法亦有一点了解。愈了解自己便愈对自己有办法，愈对自己有办法便愈了解自己；所以办法与了解是一回事的两面，即了解即办法，完全离不开。这是一种最亲切最有用的学问。

现在的西洋人，我敢断定，将要失败。我更说一句话，现在的西洋人要失败在中国人面前。“为什么？”大家一定会诧异发问。就是因为西洋人对什么都了解都有办法：天上的电，地下的矿，山上的草木无不了解；上穷天际，下极地层，都有办

法。西洋人对一切都考查研究过，一切都明白都有办法。可是他就差了一点，少回来了解他自己，体认他自己，所以对自己没有办法。西洋人诚然发达了许多学术，不过对自己尚没有顶亲切而有用的学问。他对物的问题算有解决，而对自己则无办法。这就是我说西洋人非失败不可的原因。中国人占一个便宜，即他一向受孔子的启发与领导，曾在了解自己的学问上用过心。我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有几句话与刚才说的意思相关系，大家可以用心去想：

“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1〕

西洋人至近代以来，学术虽很发达，可是都系智慧向外用的结果。所谓智慧为役于生命，即系智慧单单成立了生命的工具。中国最高学问与印度的最高学问，是让智慧回到自己生命，使生命成立了智慧的生命。而普通人的智慧都向外用，生命仍是蠢生命。智慧回头用在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有办法，此时生命不是蠢生命而是智慧的生命。西洋人虽然会造飞机，上升天空；可是他的生命是蠢的，所以制造无数飞机放炸弹，自己毁灭他自己，自己对自己没办法。自己对自己没办法，则其他办法都不是真办法。中国人对其他办法——征服自然一方面很不够，而回头认识他自己，了解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亦没作到好处；作到好处的只有少数圣贤，这是中国人今天失败的原因。可是西洋人对于人类根本地方，少所了解，少有办法，所

---

〔1〕见本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一文，第二节第二段。——编者



以我断定他亦要失败。等到西洋人失败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坠绪从新接续，慢慢再发挥光大。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

《乡村建设》旬刊，4卷5期，

1934年9月16日。

## 邹平县卫生院开幕式上的讲词<sup>〔1〕</sup>

今天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医院兼山东邹平县政府建设实验区卫生院开幕的一日。我现在把筹备经过情形报告一下。最近工作情形及计划，请李大夫报告。

本院（指乡村建设研究院——编者注）自二十年成立以来，先是从乡村自治自卫下手，不是从社会教育下手，所以对于公共卫生没有注意到。直到近一年来才和南京卫生署及齐鲁大学合作，把这个机关成立。

青岛大学以邹平为公共卫生实验区，他们的学生将来即在此实习公共卫生行政；在本院借齐鲁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所。医院的经常费除本院负担一大部分外，由齐鲁大学、邹平县政府各负担一部分，共计每月一千七百余元。开办费四千八百余元，由本院呈请省政府拨发的。

李大夫（玉仁）从前在吴淞从事公共卫生有年，经验学识都很丰富。这一次是南京卫生署介绍来的，薪俸也是在南京卫生署支取。

如此说来，可见这机关是本院、齐鲁大学及南京卫生署、邹平实验区联合组织的了。

今天省政府本来派第三科科长参加。齐鲁大学校长及医学

---

〔1〕1934年9月21日讲演，由《乡村建设》旬刊摘录。篇名为编者所加。

系主任石大夫，本想来参加，因最近在南京参加热带病学会未能来，另派一位张大夫参加。张大夫与省政府第三科科长闻已到周村，想搭汽车来邹平；因天下雨，路上的泥很多，不能来，即转回去了。所以今天不能出席。

这个机关成立了，院内同人同学及邹平人民，生命上都得到了保障；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想有了各位大夫及护士的努力，热心服务，前途定是很光明的。

《乡村建设》旬刊，4卷7、8期合刊，

1934年10月11日。

## 乡村青年的训练问题<sup>〔1〕</sup>

### ——乡学工作的入手方针

这次召集乡学教员开会，是我的发动。动机可说有两方面：一面是上次开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时候，没有正式邀请乡学教员参加，即使有乡学教员，也是本院同学居多；另一面是前天我和八乡乡学教员郭鸿绪谈话，他说乡学教员有无处用力之苦，在乡学里是消磨岁月。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象八乡乡学教员孟宪蕴，马佩之二位，在我们同学中的学识上，都算不错的，而竟如此——竟有无处用力，消磨岁月之苦，其他乡学的情形，当可推想到他的问题严重程度是怎么样！这是我召集本会的第二个动机，这次我们要讨论的是乡学问题；村学问题留待后谈。

关于乡学问题，听说昨天杨（效春）先生同大家讨论了一些，所讨论的题目也很扼要。他说，现在成立了十三所乡学，无异加多了高级小学，这些高级小学将来怎样办亦很成问题，如何办才可以使高级小学毕业生不至于象已往的样子——在家做事能力不够，升学更加重家庭的困难与社会的危机——而能开出一个按我们乡学的意思所形成的一种教育？这个问题很扼要，里边包括很多的问题。因为从我们的乡学来说，自非单办一高

〔1〕1934年9月29日对乡学教员的讲演，李志纯记。

级小学。我们看实验计划，其中关于乡学工作的规定，有甲乙两项。从他的甲项工作来说，包括有从前民众学校的高级部（民校组织的普通部在村学办；高级部在乡学办）。但非有乙项工作，则乡学的任务，不能说完全。乙项工作所包括者，如何让学董会能够开会，能够发生一点新的意思、新的方面，而使一乡的社会得以改进，这都是乡学教员以及辅导员的工作。大家都得知道，于学校教育之外，还要顾及社会。我们的乡学是拿普通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起来的；所以它只办高级小学是不够的。

这里要大家注意的是：我们的乡学对象，是整个乡村社会里面的人。他包括有老年人，成年人，青年人，和儿童等。所以我们乡学的办法，一面很象南方的乡村改进会，一面又象定县的平民学校。南方的乡村改进会；注重乡村领袖的联络；定县的平教会则注意青年农民——竭力帮助他们组织同学会。我们的乡学办法，是着眼在乡村领袖而兼及一般乡村的男女老幼大众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组织似乎比较普及，不单顾及领袖，也不忽略一般农民。其中有小的学生，也有大的学生，举凡男女老幼都照顾到，都是学众。这与照顾一部分，遗漏一部分的办法不相同。

本来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只抓住一部分人做工夫，叫他们动起来，而遗漏其他一部分，是最容易出毛病的。譬如普通学校里面，有时先生在学校里告诉他的学生说：“你要讲卫生：（1）不要吃腐败的东西，（2）不穿污秽的衣服；（3）要吃养分多而易消化的食品，（4）……”。假如学生们都实心接受了，然而他一回到家里，就要和这个非卫生的势力（指家庭）相冲突，被攻击而失败。结果学校里对于卫生尽管说的天花乱坠，而

一出校门，便行之不通！这是忽略了大社会啊！忽略了社会的整个性！

记得民国二十年我在北平讲邹平的乡农学校，就说到：“乡农学校不仅是个机关，而且是个团体，乡农学校的对象，不单是个别的或部分的农民，而是包括着一乡中之男女老幼人等的。”当时在座的有一个美国东部的教育家，叫做罗格。他听完了之后说：“这样就对了。如果你只抓住一部分人，那就作不通。因为社会原本不是一部分人的社会，教育不能单单的只照顾一部分人。”所以乡学教员，不单要对学校以内的学生用工夫，也当对学董会做工夫。第一是让他们能开会，大家能到齐，肯商量，精神上合作，第二是发动他们改造社会的新意思。如单教学生——教育小学生——就失掉了原来的用意。乡学教员应当认清我们是应该如此的。

可是我承认“如何改造高级小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来应就整个的问题设想，但我认为这问题应当讨论。为什么呢？比如乡学教员想说话人家躲开，有力无处用，社会活动无法干，做不动。我想再对大家说：“你虽然不能做社会活动，就是你单办这高小，就要你好好地办，力求也有很大的用处！”你怎么可以说有力无处用呢？固然单单改造高小，决不是成为一完善之乡学，可是我现在让一步，不责备学长学董及社会活动做工夫，退回来只教你注意改造乡学高小的问题。——底下的话大家一听仿佛和前面所说的话相反；其实不然，你非明白正反两面的意思不可。如果大家常看我的书或听我的讲演，就知道我很爱说这个话。只看一面是不通的；这不是说他不懂道理，而只是懂了一面的道理。

底下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原来就应当对这部分高小

的学生——仿佛高小而非原来的高小——做工夫的，亦即对经过了初级小学的学生做工夫。这一般学生论年龄说还不到成人，但间或也有十八九岁的。因为乡下高小学生，年龄通常比都市的为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对十二岁以上二十岁以内的（现在乡学学生差不多如此年龄）作工夫。因为我们虽说要想推进社会，改进社会，实在说来社会是很难改的，尤其是中国这样老的农业社会。因为他是非常保守的，不活泼的，传统性很强固的，老文化相沿很久的。老文化相沿越久，越发不容易改，越发离活动和改进远。现在我自己虽然未在乡村工作，可是我从旁人的话中也得到一个分寸。听说乡村工作，当你提引乡村问题时（如说现在的日子不如从前的好过，现在乡村治安远不如前，乡村风气较以前败坏，盗匪众多，毒品流行，一般人不如从前的好，好人不及从前的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遇见乡村中人开头就得说这个。这不是手段，本来这是很实在的话），据说其中年纪大的，很能了解我们的话而被我们打动。如系五十以上而没有学会鬼滑的诚实人，我们的话诚有足〔触〕动他的深处者，因他曾过过从前的太平日子，从前的风气也没有这样败坏，他对往常有个影子，而对现在则很不好过。从前多么好，现在多么糟；你不点醒，他还是在麻木，你一点醒，他不觉就有叹惜之情随之而生。更好一点的，有心肝的人，则不仅叹息。本来他心中就隐有苦闷，你这样点透他的苦闷，就很容易为我们所动。我们在邹平、菏泽两县工作的人，常说不要穿时髦的衣服，不要留头发，服装不要离乡下人很远。说的道理也很实在，也不离乡下人太远。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年纪大的大概很容易了解，很容易起同情；这仿佛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得到年长的同情，大概在别处也许得不到，我们邹平、菏泽

能得到)，让他们帮助我们作事，可是同时大概会慢慢发现这个是不行的。这也不是我直接得到的，而是从别人的话中理会到的。这些老者虽很容易引起他同情你——你去整顿村风，他愿意帮助你——可是他太缺乏一个新方向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所怀抱的理想，他不认识，他很容易梦想再有从前那样的一个太平世界；很想仍象以前那样关门过日子。而我们的新方向中含有多动的意思，不象从前的安静无为。多动与他的习惯不相合，他是习于太平无为的，所以想谋社会改进往前去做，他就不容易了解。他顶多同情你所点出的问题，若你想去整顿振作，向新方向去活动，他就以为多事，而与你合不来。所以归终你就



有话说，你有话最好对这部分人说，他最容易接受。在这部分人里最容易找信徒。我没有特别研究青年心理学。粗略的说，大概在此时期，正是心理与生理发育得很显著，将要达到完全的时候。我常爱说，每一个人，他一辈子中总有他的一个英雄时代，此时代即十至二十岁的前后。在此期中，比在此前后都有勇气，有丰富的感情，有强毅活泼的力量；此即为英雄，英雄就是这样。正是在这时候，他的力量正好用。

我且说几句话，请大家反省反省自己。自己想你心里到底有主张有意见（或者简称为主见）没有？你如果有的话，那么你这主见与现社会冲突否？即对现社会有无问题？对现状下的社会承认，抑与现状有所不合呢？如果对现状都无问题，就是无主见。你这人就是无思想，无见解，没理想，没要求。你这人就不行。如果这样叫你去打动别人的心，去找信徒，一定不成，因你无所言。如果你有主见，看见许多现状都很不合适，你有理想要求改造社会，你心里有这东西，你就顶好传给他们。我们且不讲问题，先举例来说。比如早婚问题，男的十一二就结婚，女人年龄很大。我们如果有心，一定感觉不好，必反对他，一定有主见在心，认这事很不合适。把这意思传给乡学十二到二十的学生，教他自己拒绝早婚，这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这是一个例，实在社会上应当改的地方很多。我且再说一件事。我有一位在中国多年的外国朋友叫卫西琴先生——现在改名卫中，这人很有意思。我想起他对我说的一个笑话。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诉说他一生的历史经过。他说：他在中学时候喜读文学书，在文学中很有启发。当他想入大学的时候，他想：“我入什么科合适？”他觉得什么科都想学，但什么科都不想入，什么科他都不满意。他正当青年时期，热气顶大，又很有才，当然就

有很多的理想要求(人生的,或社会的)。从其真挚的理想要求,他眼里看到的社会通通不对,通通要改造,因此他说:“顶好大学设有‘世界通通不对科’,那我一定入这科!”他这话很有意思。他对这人生社会通通不满。论起来社会上的事,实在是机械的,呆板性很大。人类社会虽可说在不断的进步中,但进得很慢,就活泼的生命说应当不满这现状。现在浅见的人爱与现状冲突。其实冲突是没用的,要是你不承认他,不了解他,决不能有办法;办法都是在了解和承认之后才有的。但前半的不满足和理想要求是不能少的。所以就现在说,如果同学中有理想,有要求,有主见,有了解,对学生就有工夫可作。很有许多道理告诉他们,并可发动他们的热气,而使他们改造社会。大约往前去几年,必以他们为发动力,才可以有所发动,那么怎能不对他们做工夫呢?!你如有道理就当对他们说。你的所有关于农村问题,改进社会的理想,应对乡学学生以菩萨的心肠,用整个的生命对他们作工夫。譬如我们说吾人深苦中国社会之散漫,唯一用心在组织中国人,那么我们让青年去组织是很好的。你和他谈,他很容易听,他也容易去做,他有勇气有兴趣去做,他容易采积极的态度(非如五十以上的人之消极)。这正是养成好习惯的时候。我想乡学教员对自己学生下功夫,并让乡学学生对乡学以外也许念过书的青年,也把他连串起来成一个组织。常常涵养其新的进取之气,而让他们有组织训练,以服务于社会,而非与社会相冲突。如能做到这个地步,那在乡学就是很大的一种成功。旁的没有做,只做成了这个就很了不起。刚才对大家说,从前的民众学校高级部,就是除现在乡学高级小学外,还有成人部也是乡学应当注意的。这不但要成一个什么班,更当把这三十以内二十多一点的一般人引入乡学,而给他一种组织,

给他一种教育，这就是很好的乡学中的高级部。

在乡村运动上注意青年、少年，许多地方的人都这样做。刚才我所说的原非新的意思，不过因为我们一向注意普遍，故不特别提出来。如定县就干脆抓住一部分，他在此亦很有见识。可是必须注意两面，抓住一部，而其他的部分也完全不漏。我最喜好把两面说透。可是入手处恐怕不能不从一部分人入手，因为旁的地方不好用力的缘故。南方也有如此做的，如镇江黄圩的乡村改进会，就作过这功夫。把当地青年合起来在一起读书，引起其向上好学的心，仿佛就叫做读书会。大家合起来购书，分组看书，改进会干事帮忙他们。从读书会，有此题目，组织成功，再订出信条若干条。其中有属消极方面的，有属积极方面的，大概是勉励自己，约束自己，仿佛是以趋向人生新方向并服务社会为依归。以此信条自己约束自己，很给这小组织一种精神。他们这小团体做了好多服务社会的事，引起四周围看重他们。越看重他们，他们就更有精神。这样引起乡中不少的观感，而他们自己又能彼此相勉励，相夹持。这都是很好的例子。昨天得到江问渔先生一封信。江先生是职业教育社的总干事。职教社原是提倡职业教育，其近年来的新方向为农村改进工作。今年7月在南昌开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时，曾拟定一个问题，为该社工作的中心。此问题即“乡村改进方面的青年训练”。他们社内同人，正在研究此问题。江的信内说：“教社拟对此问题求一解决之途”。这信的话正和我们今日谈话有关，意思相同，所以拿给大家看。由此看来乡村工作中少年、青年人的确很重要，大家都注意。而我们成天对着些青年、少年人而不知做工夫，那就太不对了。

我的意思：我们乡学教员，于一乡中对青年少年之读书识

字者，要与一〔以〕普遍的注意。你要想引动少年、青年人，他不会不读的，这实在是可能的。他不象年高的人，阅历深，消极滑头。可是我们自己的乡学学生是摆在面前，不可放轻。如何办乡学？或高小如何办？就这个问题说很亲切的方向是不要让高小学生，再作错误的升学想头，再存念书为个人将来升官发财的捷径的思想。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必须扭转他。我间接的听说，乡村里都还充满着从前只图个人上进的观念，以到都市去为荣，以在社会上比人更占面子，过更优的生活为荣，不愿在乡村。我们乡学的教员如果这时心里有道理的话，应扭转他们这种观念。告诉他们单凭识字和靠运用观念来比旁人多占便宜，会取巧拿钱多等等，要看为是可耻的事。我们应告诉他们，我们这社会生活靠谁维持。要以乡村中能吃苦努力使社会受益的人为可贵。运用观念的人有时也可以予社会以好处，有时则只会运用头脑以巧取，图享特别利益，而于社会毫无补益。如都市中大多数的军政学界中人实有不对，很糟糕。中国的社会靠农民支持，他们很可贵。凡是走巧取，取便宜的，都是很可耻的。让他们来取新方向，不以劳力为耻，而以劳动为尚。我们还是需要以劳力生产贡献于社会（我们当然希望多利用科学技术和机器以解除苦力，让社会大家生活普遍地提高）。我们不到都市，我们需要改进乡村，以乡村统治都市。此中含有是非观念。如果这个观念在我们本身上强，必然可以传之于青年。如自己对之尚不明不强，就没法启发他们。他们一定不免要走错误的路，还是免不了错误的升学观念。那么乡学必糟糕。虽然升学并不是坏事（升学学较高的学术亦于社会有好处），但错误的升学观念，则必须校正！我们不是反对升学，不过反对错误的升学观念。

我们的意思，主要的是我们心中有道理，旁人也能接受我们的道理——尤其是青年容易接受——使其心中有了这个道理，能为改进乡村的动力。我们当常就我们所知的问题，提醒他，指点他。消极方面，如要求整顿乡村的颓败风气（如戒烟酒嫖赌等），使之向积极方面进取，和不往都市去而留于乡村。如就邹平而论，顶要紧的，就是种种改良，合作运销，这些都非使乡学学生很早就注意不可。教员本身也要有这个准备。现在各村中之合作社的记帐问题，就得大家学习。有一位朋友说，合作社造端乎开会和记帐二点。能做好这两样，合作社就有办法。记帐要训练。乡学教员如果会，就可以帮助合作社，或训练合作社员或学生去帮助着记帐。这是一个例。其余许多事情，乡学的师生都得共同努力。

我们必须领乡学学生到一个新方向。在此时乡学教员很要紧的是注意自己有本事，有能力。如果心里不清楚可以自己勉励；要教人，必须自己长进。所以乡学教员有力无处用，是不对的。即使不去对外，你也应教你自己；自己不长进不能教人。你应当自己进修。如合作社我们必须注意，应常读社讯（社讯是不定期刊物。第一期有许多事则，第二期也有好些材料）。大家都要注意社讯，明白合作社的办法以后可以转告给乡村中人，或发动他们看社讯。能向这个方向做去，其力量就不小。这时自己也就具有知识教乡学学生。社讯内容都是很实在的。又如县公报也是很实在，也要常看；《乡建》旬刊报纸等常看，都于进修有帮助，很可以于指导乡学村学有些帮助。再说我们本来很注意社会活动，可是如果我们对乡学学生能教好，这就是开始做社会活动很好的根基。因为要做社会活动，必须他们看重你，相信你才行。他不看重你，敬重你，看你只是混饭吃。你

去做社会活动是不成的。开头一上来不能做社会活动，我们又没有长一副魁伟的相貌，不能使人一见面就倾心。所以除了对此群学生做工夫外别无他法。把他们教好才能引起社会工作；若在此时叹气以为教学生不是社会活动，而抛弃眼前工作，是不对的。现在有两件事，是我们邹平实验区打算进行而与乡学有关系的：

（一）为年底训练第二届联庄会训练员（一千二百人）和第三届同学下乡工作。今年联庄会又要训练新的乡队，这项训练是分在各乡做的，以乡学为训练的机关，我们院里也派人帮助乡学教员工作；可是实在还是属于乡学的事。我们这时从征调起就作工夫，便可以减免上次征调之困难与许多错误。如果能做好也是很好的事。李志纯同学谈到按间摊派不好，那末如何才好，这个由乡理事去做，我们也可以帮助他用心，想个合适的办法。上次还有顾〔雇〕人来代的也不合适。所以从征调起乡学教员就得用心，我们并求乡学教员用心。这是一件事情。

（二）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对庄仓同金融流通处，在最近期间要有一个新方向，努力切实去做。上年虽未亏本，但亦未真做到帮助乡村金融的活动。现在留严敬斋先生在这里指导去做，惟一的方向即为流通乡村金融。我们要以全副精神来做这工夫。以后要零碎借给乡村中真正的生产的农友，户头要他多，钱数不怕少。以前成百出借，以后十块一块都行。这样是很麻烦的事，但不这样做不行。这必得乡村中人接头，才能了解贷款人的信用。这在金融流通外，都有要求乡学教员帮忙之处。更进一层我们要以乡学为中心，去发达他，以乡学为中心去活动。也许成立一乡村金融流通放款处。此处又预备各乡学发行证券，慢慢将商人私家出的钞票收回。这项证券以庄仓合作社为担保。现

在一乡二乡已印好，但未曾发。譬如有五千元粮食，就可出票五千元。这票子预备按多少成数给入仓的人；可是不一定给他，那个人如果不需要还可以代存。假如五千元以半数给入仓的人去用，而在此数中有一部分人不需用，便可放在乡保管委员会存着，其余二千五百元亦存着，这样假使凑足三千元，即以此款放给乡村真有信用之农民。但必先根据信用合作社来贷。此款即属乡学保管借贷，乡学为其指导机关，乡学负信用合作指导及金融流通任务。这时就需要乡学教员做工夫，此事仍在计划中，若实现后，乡学教员或者就有事情做。一面有事做，一面亦很有责任。但这事还没有定，不过证券必要发，即此计划不实现，不在乡学做，在城里放款，乡学也有关系，也一定有许多事可做。这是本年需要做的两件事情；而为乡学教员应知道的。其余还有些零碎的话待下再说。以上的话，其主要的意思，是要乡学教员注意自己的学生和在农村中的青少年，自己应有理想，应反省，应自修；果能如此，那么，力量一定无处去用，一定有许多事情做！

《乡村建设》旬刊，4卷12期，

1934年11月21日。

## 与丹麦两教授的谈话<sup>〔1〕</sup>

安：贵院对学生的训练，除读书外，是否注意他们的生活修养？

梁：我们有“精神陶炼”一门，意在培养乡村工作服务人才的良好精神。我们很注意让他们认识中国固有精神。中国固有精神与丹麦的很有相合的地方。中国古人的精神，据我们分析起来，有两个要点：一为伦理——是说人生是相关系的互相担负着义务。在中国，义务观念很发达，个人权利观念很不发达。不过此种义务与法律上的义务不同；此种义务是从情感上来的。譬如父母对子女有情感，亦即有义务。兄弟朋友通统是从情感上而有其义务。在中国一个人的财产，差不多最亲近的人及较远的人，都有享受的份；中国人常常把父子的观念，兄弟的观念推论到家庭以外。如看官吏、看先生作父，把好的朋友看作兄弟等是。这种地方同我们听到的丹麦民众学校与合作社的风气，很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常常感觉到西洋人彼此竞争处太多，友助处太少。现在却在丹麦找到了大家是友助的，而不是竞争的社会。

贝：丹麦不但在个人之间没有竞争，并且农工之间亦没有阶级

---

〔1〕1934年9月丹麦教育家贝尔斯来福、合作专家安得生两教授来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参观，同月26日晚和27日晨著者与他们谈话。谈话记录者为李星三。记录未经谈话者过目。



斗争。即使在政治上各有不同的意见，终久会妥协的；即使在经济上农业上有斗争，亦不会牵掣到政治上去，绝不采政治的方式互相竞争。在民众高等学校里，虽有政治经济上的争论，也没有什么，并不很厉害，因为都感到同是人类的缘故。

梁：我很想知道丹麦情形！在丹麦究竟有无真的无产阶级？有无大的工厂及单单出卖劳动力的人。

贝：丹麦自 1780 年后始有工厂，性质很特殊，因本国无原料，一切原料皆须仰仗别的国家。1870 年后许多青年从农村跑到都市，此时他们一切不带，亦可谓之无产者。我意是说这些工人并非根本无产者，如不到都市去，仍可有产。其所以跑到都市去之原因，即以都市工作时间短，一切工厂无过八小时的。1900 年后工人生活曾一度很坏，现在大都业已改善，虽不敢说在世界为最好，但在欧洲可为最好。自 1900 年后，工人领袖亦想从消费合作社帮助工人。现在批发合作社内有两种成分：一是工人，一是农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其利害虽各不同，但以合作社关系其利害冲突自较前消灭了许多。现在国内失业工人虽有一部分，但失业问题不大严重，不致成为流民；因为他们可到乡间各种工厂参观，并可参与农民生活，各地农民即予以帮助，故不成问题。虽然如此，但亦难免许多困难，因为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问题正多。不过民众高等学校的组织不限于一方面，又以合作社的关系，故许多政治经济上的隔膜消灭了不少，所以阶级界限不很显明。现在且有一新的方法，即是使失业者到民众高等学校来，政府给予津贴，俾不致流离失所，过于困难，同时又可以接受相当的教育。

梁：丹麦政权就大体上说操于谁手？

贝：现在丹麦政权是操于工农之手，因为上下议院是从工农两部分产生出来的。两方代表各有己见那是免不了的。不过遇有大的事件，彼此亦可各自让步，而得到解决，为此丹麦乃真正民治的地方。

梁：依是，丹麦是否从社会立法上便可解决了社会问题？

贝：是的。此乃自然之势，两方各有其利益，亦各要求拥护其利害；但所产生的法律却能顾及双方，可没有畸轻畸重之弊。

梁：那么，我们很庆幸丹麦社会的问题不严重。关于中国民族固有精神的第二点是“人生向上”。人类决不仅安于眼前生活的要求，老停在于一处，还应当继续向上，有一更高价值的要求。中国看国家不止是替人民办事，而是帮助人民更往道德里去，求人生之更高的价值的。中国的古人很有以教化的力量来替代法律的制裁的意向和设施。我很相信此种精神与丹麦相契合。我们要组织合作社，此点与上一点同样重要；如公平、正直、信实，都是顶重要的。不过因为中国文化历史太长，所以中国社会很缺乏活泼有力，而多机械死板——这是指清代末年说的。因为中国精神已沦于死板机械，西洋近代精神（近代精神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权利观念、追求物质的享乐。）进来遂使中国固有精神受到扰乱。现在中国社会情形很不好。中国向无权利观念，因为国家力量弱，法律力量小，在社会上都是人情，并无权利观念。

安：那么，中国判断是非，以什么为准咧？其基础何在？西洋有法即以法作判断根据，中国既无法以何物判断是非呢？

梁：我意是说中国古代，国家与宗教的力量所占成分都很小，并无中国政治好，西洋政治坏的意思。至于中国的是非判断，依儒家意思，是非判断在人心中，即孟子所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中间曾插入民众高等学校及合作等问题的讨论；记录从略。）

梁：丹麦从前曾得到宗教上活泼有力的根，后来宗教渐次衰微之后，宗教失掉势力的问题大不大？格龙维、施洛特当初很富宗教精神，可是现在科学大兴，宗教渐衰，宗教问题在现在丹麦的教育上是如何的情形？

安：丹麦工人高等学校亦有宗教，但偏于社会党的色彩。现在民众高等学校亦有宗教，不过另有意义，与以前不同。方向目的已换过，是在启发学生固有的可能（宗教是在启发人就道德规范）。现在学校的功课已经变化；但人格教育却很重要，不仅只学功课就算完了。学生对先生的人格感化的价值看得很重。各方面的领袖、教授、校长，对学生的生活皆可予以很多的感化。人格的感化是得到美满生活的途径。

（以下9月27日晨谈话）

梁：我们没有招待好，很抱歉。

贝、安：来中国受隆重的接待，承赐如此多的旅费，深为感谢。来中国后，尚未遇到有如此与丹麦相近的地方。在上海看报知道近来中国正在提倡孔子的教化，现在很愿意知道梁先生对此事的意见。有一外国人曾撰一文提到中国儒教之复兴，谓必赖全国人对儒教有了解。

梁：关于此问题，使我不禁想起我与泰戈尔的谈话。前几年同

泰戈尔谈话，亦曾谈及孔子。他很怀疑孔子为什么有这样深厚而大的势力。他看孔子不是宗教，只是许多人事的教训。有许多条目使人在世界上活着应有合适的态度，如朋友有信等是，仿佛象四平八稳的法典。这是泰戈尔氏对孔子的印象。泰戈尔氏以为一个伟大的宗教是在人的生命深处有其根据，可是孔子太注意了人事，太注意外面、太注意人与人的关系，缺乏心理的根据，似乎太偏重四平八稳——中庸之道了。不过越平稳则距离生命深处越远，距离事实越近；太注重事实，太着重人的教训，很容易因时代的变迁而改换。他想不到这样偏于事实的东西在人心的深处既无根据，何能有此大的势力，而且历久不衰，此乃很奇怪的事。我当时回答他说：孔子不是宗教，是对的。不过如看孔子太偏乎外面，太偏乎人事，太偏乎平稳，此很错误。太不正确。总之视孔子太偏乎事实，偏乎人与人的关系固不对，视他太偏乎平稳亦不对。这两点普通人顶容易如此看，但此乃顶不正确。我当时曾讲了两段书〔上的话〕。一引《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此段文字内，可以看到孔子是看到了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对自己生活有办法。普通人最容易误认孔子为看重伦理，看重人与人的关系。如单单看重社会关系、伦理关系，社会一有变迁便发生问题。实则孔子自己只是想对自身生活有办法，自己生命活泼丰富。只看重伦理，那是后来发展的结果。这点恰好纠正了一般人认孔子只看重伦理的第一点误解。关于第二点误解，当时我亦引《论语》中的一段讲给泰戈尔听：“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中

行即中庸的意思。合乎中在孔子认为是不易得；既不易得，便宁愿要狂狷。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很拘谨，但里面认真。两者相反而皆从胸襟出发，虽皆不平稳，但皆是真的。可见孔子宁愿要真而不要无谓的平稳，亦不要平稳而不真。他最痛恨的是“乡愿”；“乡愿”是外面平稳而缺乏里面的真实。外面仿佛是四平八稳，而其实不真，此乃孔子所痛恶的人。此则恰好纠正了一般人对孔子的第二点误解。从上面两点看来，可见孔子虽非宗教，但在人心深处是有其根据的，否则决不会经此长久时代而有如此大的势力。我向泰戈尔氏引证此两段书后，他说他有一种明白。不象一般人的看法，看孔子的书是四平八稳的法典，于此得有新的了解。后来又同泰戈尔氏谈到孔子学说复兴的问题。象后来发达的伦理礼教，不过是许多条目，传之愈久，则愈机械。我们所要复兴的不是这个；这个是必须崩溃的。我们所要复兴的是孔子与人类生命深处（亦可说是人心）有关系的那一点。如果要问孔子学问关系人类生命深处的是什么？此即所谓理性；理性即人类心理顶平静清楚的时候，并且亦是很有情的时候。

《乡村建设》，4卷10、11期合刊，

1934年11月11日。

## 乡村建设旨趣<sup>〔1〕</sup>

现在主席团指定我作一个讲演，我想讲“乡村建设旨趣”这一题。说到旨趣，原来是主观的东西，主观便容易与社会事实相远，容易一个人一个样；此则很不好，我们要免于此病，希望得一个合于社会事实的，而且为我们所共同的旨趣。想要作到此地步，必须避免主观演绎的说话，而从客观上考察认取乡村建设运动是怎样来的？他将往哪里去？于摆在眼前的社会问题里面，寻出多数人不得不然的倾向要求。——这便发见我们共同的旨趣了。

但如此考察分析的来讲乡村建设旨趣，断非一小时可办。即从我六七年来从事这运动，经验体认所得，心里便有无限的话想说。今且以最近的一事为例，那便是去年我们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所开的头次大会。在那三天的会里，我听到各方面的报告再印证到我自己身上，发现了我们到会同人各从不同的动机，不期而然地集于乡村运动一途，好多为始意所不料。例如这里平教会始而不过识字运动，现在却变成整个乡村建设。中华职业教育社始而不过培养职工店伙，现在却已转到各地农村改进。从教育转过来的已有这许多不同的来历。其不从教育来的，如华洋义赈会始而不过赈灾，何曾料到今日成为农村合作

〔1〕 1934年10月10日在定县乡村工作讨论会的讲演。

运动一支主力军！河南村治学院同人其动机是出于乡村自救，与义赈会以救人为事者正反映成趣！我自己是从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烦闷，而想到如何养成大多数人的新政治习惯。乃银行界的朋友，又从经济问题的刺激，而亟谋流通农村金融。四面八方的来到一块，这证明今日乡村运动好像是天安排下的，非出偶然。他有深厚的根据，正在继续开展扩大而未有已。他是从两面来的：一面从中国历史演下来，一面从西洋历史演下来，二者相遇，发生近百年来的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产生数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辗转变化而到最后这一着（乡村运动这一着）。此其故也很容易明白，用简单的两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原为乡村国家，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发育蔚成高度的乡村文明，而近代西洋文明来了，逼着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业路上走。假如走上去也就完了，没有我们的乡村建设了。无奈历史命运不如此；八十年来，除了乡村破坏外没有都市的兴起，只见固有农业衰残而卒不见新工商业之发达。我们今日的苦痛正在此，然而未来的幸运也在此，盖从大势上反逼着我们走一条不同的路，不容我们再随日本之后以模仿西洋。所谓四面八方而来的乡村运动者，正为中国问题原即乡村问题，——愈到后来愈见出是一个乡村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还只有于乡村以求之，——愈到后来愈反逼到此一路；于是举国上下东西南北各方面乃不得不集中于此。

日本赶好模仿西洋成功，中国而今再无此机会（详见拙著《乡村建设理论提纲》）。日本今日亦有所谓乡村问题，第以其为工商业发达都市文明成功下的乡村问题，乃原非中国乡村问题之比。象中国乡村问题所引起的乡村运动，遂为中国独有的情形，而非日本能有的。日本以其政治上经济上的伟大力量，可

以言救济农村，中国则不能。——中国拿什么来救呢？以我们测去中国农村眼前只有加重崩溃。然而日本农村亦止于言救济而已，不能开出伟大的前途。要开前途，还须在他已形成的工业资本主义推翻之后。中国虽不配说救济农村，而以工业资本之畸形未成，且从此再无成功之机会，乡村乃有无限前途可以开出。此即我们所谓乡村建设。对于西洋与日本而言，实为另外一条不同的路。

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这是在中国今后一定的路线，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

昨天于永滋先生曾提出来说：中国现在银行界以商业资本来提倡农民合作，实为各国合作史上未有之特例。诚然为一特例或变例，要知此变例即从工业资本路走不通、农村深度崩溃的中国特殊情形而来。但于先生又虑到都市工商业一旦好转，银行家必要将在农村的投资收回，那农村却受不了。这是一个过虑。我敢断定，中国工业要在农村复兴中兴起，而今之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于都市者，必无好转之望。拥挤充斥于一二大埠的资金，只有返输于农村是一条出路，我却不怕他要收回。

换一句话说，中国兴亡系于中国能否工业化问题。但从世界大势看去，中国的工业化，将必走一条不同的路。他是要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这样创造起来的文明，完全为一新文明。既不是过去中国的乡村文明，亦不是近代西洋的都市文明。其社会重心在乡村——经济的重心、政治的重心，都在乡村而不在都市。重心与中心不同，经济的中心，政治的中心以及文化的中心



心，可以在都市，都市便是这么一个中心点，顾不可以重心寄于都市；以重心寄于都市如今日者，则危而不安，偏而不正。——此近代西洋所以为病态文明也。

中国的工业化在此，新社会文明的创成在此，中国之得救在此。中国之得救，是要以新社会文明的创成而得救的。我们只有向着创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国，此殆为历史命运所决定。没看清大势的人嚷着救济乡村、乡村自救，而不知其为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一著；或知其为最后的民族自救运动，而不知其恰负担着创造新文明的使命。然而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乡村运动的旨趣，毕竟在是。吾人虽不欲以是为旨趣而从事焉，又奚可得？

录自《乡村建设》(旬刊)，4卷14期，

1934年12月11日。

《民间》，1卷12期，

1934年10月25日。

##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 实验县工作报告<sup>〔1〕</sup>

### 一、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起源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系山东省政府所设立。惟同人原来都是从事社会工作和乡村运动的同志及团体，故实际均系受鲁省政府委托。我们的动机有两点：（1）我们多数是乡村出身的人，身受一切痛苦，非自救没有办法，即要农民有自觉，有组织，必须知识分子下乡；（2）现当过渡时代，我们必须创造新的社会，这社会必须从乡村做起。

### 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 邹平县之工作

本院下有两个实验县，一为邹平，一为菏泽。菏泽设有分院。此外有研究部，研究乡建诸种问题，如行政合作等等。研究部多数为大学专门毕业生。各项研究，均有专人负责指导。又有训练部，分班训练乡建工作人才。详细情形，请参阅《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概况》，兹不多说。

---

〔1〕1934年10月，向全国第二次乡村工作讨论会提供的书面报告。

关于邹平实验工作分为三项：(1) 地方行政改革实验工作，即旧政的改革，积弊的剔除和新政的举办；(2) 地方自治实验工作，即由下级自治至县自治的完成；(3) 社会改进实验工作。三者互相关联，相辅而行。但实施步骤不能不略有先后。因第一项的完成，有待第二、三项的进展；而第二项的促进，又有赖于社会改进者甚大。故一、三两项，应先举办。即我们认定县政建设工作，应从改进农村社会入手，而改进农村社会的工作，须利用行政力量去推行，故行政改革、实验工作自必须同时进行。现在邹平县就是依照这个步骤在切实进行。我们的理想是“政”“教”“富”“卫”合一。我们在邹平正在实验着行政机关教育化和教育机关化的理想，用村学代替村公所，用乡学代替区公所；县自治机关的系统，就是县政府——乡学——村学。乡学、村学，一方面是乡村自治机关，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关。关于富的方面，除从事于农产物优良品种之推行工作外，并极力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即其最著者。（参阅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第二届概况报告）。关于自卫方面，除改组团警，成立民团干部训练所，且附设征训队外，并分期训练联庄会，以养成民众武力，使平时足以自卫，一旦国家有事，即可为国军之后盾（参阅邹平乡村自卫实验报告）。

最后邹平实验县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仅有行政权，且有立法权，所以办事比较顺利。

《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177—178页，

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

## 在中国从前历史上有无乡村自治？

在中国从前历史上有无乡村自治？此颇难回答，一面可以说没有，一面亦可以说有。兹先从其没有的一面来讲。何以言没有？因为通常所称“乡村自治”是地方自治下层，而地方自治则是西洋近代政治中的一回事，中国近二三十年摹求西洋近代政治而未得，在从前历史上当然没有。分析言之，西洋所以有地方自治的发生，大抵从下列二条件而来：

- 一、在法律制度上已进为立宪国家；
- 二、在经济生活上已发现近代工业。

立宪国家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及其参与国事的公民权。好象一个团体一样，团体公事必公开于团体内的分子，各得参与作主；而各分子的私事则团体干涉不着。推此义，则一乡一邑之事无关大体者，国家亦应划归其自理。故地方自治，即国家法律视一地方人所构成的团体，犹乎个人有其独立人格，许他由自己意思以其地方之财营治其地方之事之谓也。凡立宪国家必有地方自治；凡非立宪国家皆无地方自治。从前历史上的中国固非立宪国家，自亦不能有地方自治或乡村自治。

然凡事必应乎实际需要，又实际有可能而后成。西洋国家之立宪，地方之自治，盖非其社会在经济上有近代工业发现亦不得成功。经济上有近代工业发现，使得一大社会忽然充壮密实起来。就其分子个人说，则较前有能力，较前有分量；就其

社会关系说，则较前又见开达，又见致密。因为经济进步（包含交通发达）为人们腾出较多闲空，然后知识能力文化程度始增高；然后社会关系可以“天涯若比邻”。而同时经济进步（亦就是在生产上在享用上从散漫零碎变到集中组织），又直接地使人在生活上彼此发生密切连带关系。必如是，在一国乃见其所谓国家者；在一地方乃见其所谓地方团体关系。而此时其分子个人既有能力有分量，乃不得不尊重个人自由，乃不能不行多数政治；而自由之确立，多数政治之实行，亦才有可能。故言地方自治者，盖谓地方团体自治；——所以都称曰“地方自治团体”。经济不进，分子不壮，关系不密（一家一家各自关门过日子），虚云“地方”，难成“团体”，亦就不能行“自治”。从前历史上的中国，在经济上固未进到近代这样，自亦不能有地方自治或乡村自治。

更从另一面来讲，则乡村自治亦可说中国所固有。何以言之？因为地方自治是对国家直接行政或官治说；而在中国，从来历史上国家的作用很少，其社会生活无论幸福的增进乃至治安的维持，都并不靠官治，于乡村尤其是这样；既不靠官治，就可以说为自治。如吕新吾《呻吟语·治道篇》有云：“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兴，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起敝。”自古史书常称道，君相的“无为而治”，太守的“卧治”，盖数千年相传以消极为治，“政简刑清”实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吕先生的话是其代表，正非一人之私言。所以据西洋有眼光的学者观察，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体，而不类一个国家。再就老百姓的生活来看，对于官府自纳钱粮而外，便有他管不着我，我亦不管他之概。虽有时诉讼到官，实则许多皆已在乡里或宗族间自己解决，不得已时才找到官；官的作用亦至此而止。在太平有道之世，更仿佛是国与

民两相忘。其社会秩序殆有出自然，不假他力来维持者。然在欧洲的国家则没有不是靠武力来维持的（语见德国勒耶著《社会进化史》，商务有译本）。故辜汤生先生尝讥西洋社会秩序不靠教会的宗教与僧侣之力（中古），即靠国家的法律与军警之力（近世）。世称印度文明，中国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精神面目各殊。不言精神，且从外面来看，则印度使人惊异者在其宗教之偏畸发达，笼罩一切；西洋最惊人的是其征服自然的科学发明；若中国则其大可异处即此社会秩序自然能维持是。此或者亦可说为“自治”；此自治于乡村尤著见之。许多事情乡村皆自有办法；许多问题乡村皆自能解决；如乡约、保甲、社仓、社学之类，时或出于执政者之倡导，固地方人自己去作。从宗教教会系统而来之教堂与教士，从国家行政系统而来之吏警，均不见于旧日中国的乡村。

中国旧日社会秩序果何由不假他力而自能维持？以必须追究明白。今略从三点言之。

第一点，中国人理性的开发最早，有道德而无宗教，或更深切确切地说：以是非观念易罪福观念。英国罗素曾深叹异中国人没有“罪”的观念，又说在中国“宗教上的怀疑”并不引起其相当的“道德上之怀疑”有如欧洲所习见者。中国人遇事是要讲理的；谚所谓“有理讲倒人”，“什么亦大不过理去”。凡我们之有所不敢为者，自慙于不合理，知其非也；欧洲人则惧于触犯神和宗教教条，认为是一种“罪”。一是诉诸自己理性而主张之；一是以宗教教条替代自己理性而茫昧从他。盖自孔孟之教训，总是指点人回头看自己，在自家本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理性）与自求（意志）。如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君子不安故不为，汝

安则为之”：皆彻底以诉诸自己理性判断为最后准归。发于三千年之前而传诵至今，所以开启人心者至大矣！

为祸于人类社会者有二，就是愚蔽与强暴。此祸至今未已，而于古为烈。本可以说为祸于人者尚有一个自私。但若真不愚蔽，亦无自私，绝不强暴，虽自私亦为祸小。总而言之，自私之所以为祸，离不开愚蔽与强暴。让一步言之：文化既发达如今日，或者自私之为祸烈；古代人类文化未进，则愚蔽与强暴之为祸烈。因此，儒家于中国古代社会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工作，就是想将宗教化为礼，将法律制度化为礼，将政治（包含军事外交）化为礼，乃至人生的一切悉化为礼；而言“礼”，必“本乎人情”，不露形迹地不知不觉地，化除愚蔽，平抑强暴，而开发了理性（理性就是人情，人情就是理性）。因为救济愚暴的，只有理性这样东西；而这样作法较之正面的指点启发，效力尤为宏伟。中国人理性的开发，其功大约在此。

何以见得中国人的理性开启？此于二事可征。例如，本土固有的神祇崇拜，自外传来的各大宗教，在中国殊亦不少；然总有并存不相碍，并行不相悖的样子；乃若宗教战争之横遍欧洲，长亘千年者，曾渺不可得。这就是宗教之为蔽于欧洲人者强且大，而我们不甚蔽于宗教之征。中国人每喜说“宗教虽多，其理则一”的话；此固笼统可笑；然正见其是间接的信教；直接的信理。其所以脱略于宗教之蔽，而有兼容并包之概者，即在是。障蔽少，即是理性启；非理性启，障蔽不能少也。再如我夙以好和平的民族著名于世，此非其远于强暴之征欤！罗素尝有言“世有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则中国人是已。”又云“道德上之品性为中国人所长；……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心气和平”最为可贵，所谓“‘心气和平’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耻于用暴，而极有服善

的勇气与雅量，实在是理性开启之大者。

如此理性开启的人，其社会秩序自尔易得维持。中国旧日社会秩序所以不假他力而自能维持者；当以理性开启为其根本点。

第二点，中国似可说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其社会中人与人彼此各因其情谊而互有其相当之义务。在昔西洋以个人直接教会，今以个人直接国家。尤以近世来个人主义盛行，遂形成一个人本位的社会，既不胜其弊，乃翻转来企图改造为一社会本位的社会。中国旧日社会于此二者皆无所似，乃若以伦理为本位者。人生而必有其相关系之人，此即天伦。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此即伦理。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谊所在，义务生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其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义务关系。习俗又好以天伦骨肉之谊准推于其他，如云“君父臣子”，如云“父母官子民”，如云“师父徒弟”，如云“兄弟之交异姓骨肉”。于国于社会皆家庭化之，情义益以重。凡中国所谓理或礼，皆指此情义而言。中国以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而能维持树立其文化的统一者，盖有其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此精神中心，若在他方社会将必为一大宗教，而我则只此孔子所倡导的伦理而已，其作用之宏伟与恒久，或有过于一大宗教焉。

伦理的人生，使得中国人触处发生对人的问题：如何处夫妇，如何处父母子女，如何处兄弟乃至堂兄弟，如何处婆媳妯娌姑嫂，如何处祖孙伯叔侄子乃至族众，如何处母党妻党亲戚尊卑，如何处邻里乡党长幼，如何处君臣师弟东家伙伴一切朋



友，如是种种。总之，伦理关系罩住了中国人，大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概。如何将此各种关系处得好，实其人生第一问题。事实上训练出来的结果，殆只有“反求诸己”之一道。例如不得于父母者，只有两眼转回来看自家这里由何失爱，而在自家身上用力，结果如何不得期必，唯知尽其在我；此为最确实有效可得父母之爱的方法。其他一切关系，均不出此例。盖关系虽种种不同，事实上所发生问题更复杂万状，然所求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与我心之间相顺。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也。由是“责己”遂为中国人一致承认不可否认之理；“让人”遂为其常行惯践之事。吾旧日社会秩序所以不假他力而自能维持者，于此盖不难得其解矣。

在伦理中，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此固不能取人所恒有之“自己本位主义”而代之。然两种心理一申一抑之间，其为变化固不少矣。类如中国社会虽财产私有，而隐寓一种伦理本位之制，绝非“自顾自”。父母辛勤所以为儿女；儿子既长，又转〔为〕父母。以至兄弟朋友亲戚乡党，准情度力必相顾。大抵在父子夫妇间，及父母在时之兄弟间，恒有共财之义。在族中亦每有共财（义田义庄族产）以为补助教育。（原稿已残，所存止此）〔1〕

《乡村建设论文集》，89--95页，

1934年10月再版本。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

---

〔1〕“原稿已残，所存止此”数字为《乡村建设论文集》（1934年）之编者所加。——编者

## 乡村建设几个当前的问题

说起乡村建设，人都表示赞同，认为一件好事。近来风气益开，不只说说而已，真去干的亦不少了。我想这里有几个当前的问题，是不可不考虑一番的：

(一) 莫言乡村建设，且问乡村之日趋崩溃可能有已止的希望吗？似乎崩溃的趋势，却有把握；而崩溃的已止，转机在哪里，倒不可见呢！

(二) 破坏乡村最有力的，一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是国内不良政治。——这是无待烦言的事实。然如一般乡村建设者之所为，于此究何补？他们果算得针对问题而求解决吗？

以上是从大势上看去，怀疑到乡村建设的可能，实在是严重的问题，须要明白的解答，不容躲闪，不容混过。假设乡村建设是可能的；那么，——

(三) 乡村建设是要建设到哪里去呢？或乡村建设是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古人说得好：“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若非先认定方针，端其趋向，是一步亦不好随便走的。我们今日正值一社会改造时代，不独民族历史固有文化，数千年相传至此将有一大转变；即新兴的西洋近代文明，恐怕亦要改造。今日直可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大转变期，世界到处都闹着社会改造问题，许多歧路摆在面前，问我们走那一条。

我们随手拈举一个例来说罢：

(四) 乡村建设对于工业持何态度？还是想保持淳朴恬静的农业社会呢？还是引进现代的工业文明？若肯定要发达工业又走哪条路呢？自由竞争吗？统制经济吗？抑或其他？不看清了路向，怎么举步呢？

对于上面四个问题，我不想在这篇文里作答，我但想表示三点意思：

(一) 关于方针路向的认定，请千万不要逞主观的理想，哲学的议论。因为这不是尽着我们主观一面选择哪条路，就可以走那条路的。我们如果提出一种主张，不但要合于理想要求，更要紧的是有其客观事实的可能。任何一件事能行不能行，都为其相关系的许多条件所规定；其相关系的各条件自又各有相关系者在。如是，参伍错综，关系重叠而复杂，使其可能的路愈窄。只有我们不注意其关系的各方面，或不熟悉不周知其关系的时候，我们才看得东亦可，西亦可，海阔天空，任我们走。其实是没有这么多的可能的。周围形势所在，早已隐然限定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是从客观可能的机会里实现主观要求，所采取的方针即是将展开的前途。那么客观事实的分析，历史演变的观察，就是顶要用心的所在了。

(二) 乡村建设有无可能，诚然是严重的问题。然天下事常是转变不定的，逼促地只看眼前这一段，每不免为一时情势所蔽。要远从过去推测未来，才能看得通。那么，仍旧是要在客观事实历史演变上用心。

(三) 总而言之，是要有远识定见看清前途才行。今日乡村发达所以喧腾各处，虽大半为乡村破坏日重日急所刺激起来的，然若就以“救济乡村”“复兴农村”为心，那便局促短浅，陷于两种结果：一、太偏乎应付眼前问题，没有根本方针，从事远

大企图；眼前问题既不会应付得了，更将走错了路，失了远大企图。二、系心于眼前之得失成败，容易短气丧气，失望绝望而干不下去。老实说罢：当兹人类社会大改造时代，问题已问到深处，则计划就要计算到远处。有企图便是大企图，没有什么“救济”可言，没有什么“复兴”可言；说救济、说复兴，便是错的。今日乡村已是救济不了。我们现在所向前走的一步一步，其意义原不在当前而在未来。这未来不是空希望，而是看得见拿得稳的前途。

末了，我重复我的话，乡村建设不要当他一件好事，盲目地往前干啊！要考虑这几个当前的问题，看清楚我们的前途，才好干啊！

《乡村建设》旬刊，4卷10、11期合刊，

1934年11月11日

## 咱老百姓得练习着自己作主办事<sup>〔1〕</sup>

昨天给大家讲过一回话。昨天讲的是：现在单在乡下老老实实过日子不够了，现在世界大势一直影响我们，我们不能象以前那样好好的过日子；可是为什么现在日子不好过？……要想过日子不作难，须要合作，讲究新法子。今天再讲一件事，也是拿现在与从前比较，这就是说这些年来不太平，从前过的是太平日子。你们大家要留心事情，知道自民国来，国内常常有内战——中国人跟中国人自己打仗——留心一点〔的〕，大概都可以记得的。南方与北方打，北方与南方打，这里那里，直到现在也没完，二十余年老是打。不过中国地方大，有的地方打，有的地方不打；如山东现在不打了，可是别处还打，山东于民国十九年时还打过一次。还有一件事就是土匪，土匪是叫庄户人顶不能站脚的。山东以前是很多土匪的，如刘桂堂张鸣九之类都在山东。咱们邹平现在是正太平了；可是齐东章邱就不太平，而远处湖南江西还正在打仗呢！这不太平是使庄户人不能老老实实安然过日子的；就是能过日子，而捐项太多，花消太重，不象几十年前交了钱粮就算完事。现在是捐项太重，花消太多，这也可归于不太平的事情里面。因为各省都常要预备打仗、防土匪，不能不买军械军火而多要钱，要了钱也不给老百姓做事。不太平比昨日所讲的还要为难。这

〔1〕 1934年12月对邹平县联庄会壮丁讲话。黄孝方、严寅记录。

是怎样来〔的〕呢？从那儿来〔的〕呢？这也是从世界大势来。让咱过日子不能如从前过日子，不能如从前太平，此不太平差不多可以说打民国来的。现在已是民国二十三四年；民国以来不太平的厉害，从前还不如此。民国是从世界大势来的，从前的时候不是叫民国，是叫大清帝国——帝是皇帝；从前将一国的事情由皇上人家作主，因由皇上人家做主，故不使老百姓操心。他替老百姓治土匪，治贪官；皇帝好大家就可安然过日子。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民国吗？民是人民，是老百姓做主。说民国是说国是人民的，是大家伙的。事情是要大家伙做主，不是由皇上一家作主，是由老百姓自己做主。这话是好话，事也是好事，可就是不容易做到。说老百姓做主，老百姓（庄稼人）啥事都不懂，不识字不明白道理，他自己怎会做主？大事小事要他管，他管得了吗？所以说不容易做到。中国几千年都没有民国的一天。可是外国，从世界大势上说，人家都是成了这样共和国家，共和就是大家共和。人家都慢慢成了共和国家，纵是有皇帝的，但皇帝已不做主了。这个事情本来是这个理——靠人不如靠己，靠皇上不如靠自己，靠官不如靠己。靠人家本来靠不得，什么事都最好能自己做主，自己事自己干。看这事能花多少钱，自己打算就合算，你让官给你打算出主意，没有老百姓合适；因为他是他，不是你，谁的痛痒谁知道，官那能都知你的困难呢？本来是靠人不如靠己。人家外国这种共和办法是好是对，世界大势人家都是如此，我们不这样也不行；人家这样所以心齐，所以国家力量来得大。咱要是自己不管事，老百姓听人家〔的〕，这样国家力量就不大，就没有力量。照现在世界说，也就不能不这样子，也就是得往“民国”的道上走，你想再回去抬出一个皇上来也不行了。现在谁也不服谁，皇帝是出不来了，不能再有这一回事。民国三四年袁世凯想做皇帝没做

成。民国六年张勋保宣统也是没几天就完了，都是几十天工夫不行了。再出皇帝谁也不行了，没有谁服谁了。现在只能往前去，不能往后来，只能想法子往前去做成民国才行，想回去再做帝国是永远也做不到了。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这时只能练习着老百姓可以自己做主，自己会管理自己事情。从前有皇帝做主故没事，现在说老百姓做主，而老百姓不能做主故乱了。乱都是在〔从〕这里来的。老百姓不会做主，就有些人假冒老百姓的牌子，说：我是老百姓代表，我的主义，就是老百姓的主义，这就是“假冒民意”。他说民意就是如此说：“我代表民意，我是为的老百姓，我是替老百姓打算，我办的事就是老百姓的事。”可是你这样说，他也这样说，老百姓始终不能出现；真的民意没有，假的民意就出来了。假民意一出来就乱了。你假我也假，谁都可以假，这不就乱了吗！怎么能不乱呢？要不乱，非得老百姓练习作主照管自己的事不可；这便是说，没有别的道，就只要能够不再靠人。实在现在也无人可靠。现在不能靠皇帝，靠官、靠人，只能靠自己练习作事。可是要做到这一境，却不大容易。第一，咱老百姓就无程度。外国的老百姓程度很高，如英国和丹麦国的老百姓，一百个人挑不出一个不识字的，我们一百个老百姓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家不光识字，并且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都读书明理，会办事，个人心中都有主意。会办事自然行了，假民意自然没有了；这时政府中的官也只能听大家的话，只能替大家办事，不能欺负人，压制人。官欺不了民，是因为大家都明白，有本事，程度高。所以现在咱无别道，也只好把咱老百姓程度一天天〔提〕高起来，不识字求识字，明道理，长知识。光识字，长知识还不行啊！要紧的是会开会，会商量办事。民国就是大家伙做主，这就是开会大家商量办法，结果就是大家做主了。商量定规，说办就办，大家没同意就不

能办；能够这样就行了，就用不着皇上了，所以开会商量很要紧。可是开会商量是不容易，开会人多，说话不乱吵，就不容易。开了会就乱吵，吵成一片，就不能有结果，必有条有理有秩序这才行哩！那么，开会商量就不容易，要是不懂得让人，不懂得平心静气地找一个好办法，开会也是无用。不许个人发脾气闹意见是不容易。人都容易闹意见，彼此不合，不合就不能商量了；非大家都能平心静气和和气气的不动气的慢慢商量，无论如何要找出一个办法来才行。这就得慢慢练。能够识字读书和开会商量，就有希望了，这就行了。不靠别人，自己亦能办事了，自己亦能做主了。邹平设村学乡学的意义，就是如此。先要大家都明白一点道理，再则村学中什么事都要开会商量。村学就是一个团体，大家能在一起商量事。乡学也是如此。暂不谈高远的大事而先商量自己一村一乡的事，慢慢一县的事也就能管了。总之须老百姓有程度、自靠自、不要靠人。现在无人可靠，而又无人作主，那就非乱不可！邹平划为实验县就是在想办法使老百姓长程度，训练联庄会也是要大家长程度，求自己能维持治安。你等到乡下有事时去练兵，兵也许会糟蹋人咧！所以自卫就是管自己不靠人家的意思。实验县就是要老百姓长程度，什么事自己能做主想办法。大家回到各乡后，大家办乡学、村学的事要多注意，常到乡学、村学中去，明白乡学、村学干的是什么事？老百姓有不明白处，你们大家给他们讲一下，使大家都关心它。还有合作社，这几条事能练习做好了，自然可以太平了，自然日子也可以好过了。

《乡村建设》旬刊，4卷16、17期合刊，

1935年2月11日。



## 目前中国小学教育方针之商榷<sup>〔1〕</sup>

这边校长宋先生同主任梁先生和我谈过很多次，他们说实验学校预备努力有所改进，而在改进之前，要先确定方向，确定我们是要往那里改进，所以要我同同人同学讲一讲。不过谈到这种大方向，或原则、目标的话，容易说得很抽象，否则难以说得完密周到；可是愈顾虑完密周到愈容易抽象，不好懂，得不到什么。偏乎具体方面，一点一点的拿出来，固然容易懂，容易抓得住，可是又常常不容易周全完密。所以我现在讲的话就有这种困难。也许年纪小的同学听不懂，可是我没有办法，只好这样来讲。

说到教育，因为我们人类过的是社会生活，天然有交通作用；此交通作用中，有了不知道多少的教育在内。我们日常的生活不知不觉的都是许多教育，这完全是从社会的交通作用来的。不过这种教育，不是我们现在所谈的教育目标。所谓教育目标，是在现社会中所设施的教育；比如我们这个学校，就是一个设施；图书馆也是一个教育设施。——这虽是教育设施，然亦非我们所要谈的教育设施。我们的教育设施是怎样设施？设施了干什么？都不能不先有目标，再从目标去设施。底下就谈谈我们的目标。

教育这回事情，恰好关系两面：一面是个人；一面是社会。所

〔1〕 1934年12月在邹平实验小学校对教职员的讲话。郝心静记。

以我们设施教育，一面要站在社会的立场，为社会而设施；同时社会是从一个一个人来的，我们的教育工夫又不能不用到各个人身上，所以我们的目标天然要顾到两面——兼顾个人与社会，不应当有所偏重。如果单从个人的立场，为个人来定一个教育目标，有时会遗漏了社会、妨碍了社会；单站在社会的立场，为社会而定一个教育目标，有时又会牺牲了个人。所以虽然教育是帮助人来实现他自己，完成他自己的一回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无限的可能，教育本是帮助个人实现他那个可能，完成他那个可能；可是这个时候就不能不照顾到这个人是在此时此地的一个人，是要完成此时此地的社会的一个他，实现此时此地的社会的一个他；不是超现实的。如果要超越现实的去实现他自己，完成他自己，也不是不能作，也不是不能有这么一个实验目标；但是这种教育太离了社会，至少不是我们这个实验学校所应采取的。这个道理，就是前边说的“教育要兼顾个人和社会”。

我们的实验学校，现在注重的是儿童教育。儿童教育就有两个不同的理想：一个是离开现实，超越现实，单从个人来看，专注重实现他自己，完成他自己的。比如这边因为卫生方面仿佛设备有缺欠，想有所改善；这个事情，是一种注意，是一种谨慎，自然愈照顾得周到愈好。如果单就这一面来说，我们在卫生方面的讲求设施，也许会脱离了现社会，超越了现社会。那末，从现社会的立场说，就不能纯拿教育的眼光来设施教育，还得从经济的眼光以设施教育。这不特是没有这些钱的问题，还有这些钱是否应当集中用到这一点上的问题。我们看邹平社会，看中国社会的时候，也许过于讲求设施是不很好的。如果单从个人的立场，为实现他自己，完成他自己来说，也许一个学生就应当要一个先生，甚至得要好几个先生。单从这一个目标来看，单为发展儿童的可

能性,把他创造到一个最高的地步,那末,可以完全脱离了社会的立场,对社会经济、礼俗、制度,一切都不顾。虽然任何社会都有其礼俗制度,价值判断,是非好歹,然而单从个人来定一个目标的时候,这些地方都可以不管它;这不是绝不可以的事。可是我们此刻不能作那个实验的。我们的实验,也是要完成他自己,可是他是在中国社会,邹平社会,邹平城里社会的一个他。这就不能单站在个人的立场而有一个目标,即须兼顾到他所处的社会了。在要实现他自己,完成他自己的时候,而能认清楚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他,不忘记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他,则既不至于妨碍社会,又与他自己有好处,亦即帮助他个人有参加这个社会的能力。单从个人出发是不对的,我们现在不能采用。单从社会立场、为社会而培养个人,使他在这个社会上有用,则个人成了社会的工具,也是不对的。所以两面都要照顾到。

大家如果问我,我们办实验学校的目标应当放在那里?我可以说明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这个社会中来实现他自己,完成他自己。”就是说:我们要实现他自己,完成他自己,可是要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他。目标应当如此定,我在《村学乡学须知》里边,有这么两句话,大意是:村学应酌设成人部、儿童部、妇女部,予村众以生活必需之教育,为的使他们有参加现代社会并从而改进现代社会之生活能力。这同刚才那个话差不多。大概是社会与个人都要照顾的意思。我们现在是在社会问题严重的一个社会中,不是一个平稳的社会,事实上不能不多从社会的立场一点。假使是在一个平稳的社会里边,那末就要多从个人的立场一点。因为平稳的社会,问题是少的,可以多给机会与个人,让他完成自己,创造自己,可是现在不能不多从社会一点,好使他能应付问题,解决问题。刚才说“予以生活必需之教育,为的使他们有参

加现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就是从社会的多一点。

普遍的要求总是要求教育切合社会，尤其因为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离社会太远，妨碍了社会，所以近来这种呼声更高。可是单切合社会是不够的，单能培养一班最适于此社会生活的分子是不够的！如何才对呢？就是不惟能适合此社会的生活，并且能从而改进之。必不可忘记的就是他除了很有参加现社会的能力之外，还要有改进现社会的能力。在任何时候都要这样：一面让他能参加，一面让他能改进。此刻的中国教育更应当着重第二层——能改进社会。比如说使儿童有参加现社会的能力这句话，我们当看中国的现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是过渡期间的社会，是改进中国的社会，是正在改造而未竟功的社会，正是失掉其一定标准而没有标准的时候。所谓现社会者，是一个无定的东西，站不住的东西。如果所谓现社会，不是过渡期的，不是改进中的，而是在平稳状态里有一定的标准的现社会，那末使儿童有参加现社会的能力比较容易，可是现在不是这么一个社会，现在农业技术、社会制度，一切一切都要改进的，我们不能不牵就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参加现社会的话不能不放轻一点，改进现社会的话不能不放重一点。这个时候就很为难了！一面我们正是在一个几十年来教育不切合社会，教出来的人不适宜社会生活的弊病的时候，同时我们又不肯就去求着切合社会、适应社会，还得求一个超现实的，这就顶难啦！换句话说：单让我们注意超现实也容易，单让我们注意切合现在也容易，而这个时候恰好在这个不切合现实，不适宜现实之后，正要矫正这个毛病，而同时又要注意不落于切合现状，这就困难啦！底下分两层往具体的要求、具体的问题上去说：

(1)我们应当去实验、去寻求一种儿童教育,或者说小学教育。这个教育是包含两面:一面是要予儿童以参加现社会最有能力的教育,一面是这个社会的儿童普遍都能享受的教育。我们应当努力于这个发见。换句话说,现在小学教育有两面的缺欠:一面于儿童参加现社会生活上无大帮助,一面是不能让全社会上多数或全数儿童享受。这两面是相联的:如能有一个很有用的教育,那个教育一定也是大家都能享受的。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儿童教育,不一定是儿童或社会(儿童的家庭)拒绝教育,是教育有拒绝儿童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努力发见社会上所有的儿童普遍都能享受的教育;同时他受了教育之后就于他参加现社会生活有帮助,使他在受过教育之后就多会了些什么,多了一点参加现社会生活的能力。如然,则教育不唯不拒绝他,并且能引他来找教育了。所以说这两面是相联的。从这个意思来说的时候,照我的推想(不知道对不对),有打破现教育制度的必要;这种实验也恐怕以在乡村里实验为宜。这个地方(邹平城里)尚不适于做这种实验。此其故,即因我们这里的儿童和邹平多数的儿童不同,他们的家庭不是邹平大多数儿童的家庭。想找出一个普遍的儿童都能享受的教育,恐怕在这里发见不了。

(2)第二层要求,就是要注意我们那个将要来到的社会,正在创造中的文化(现在是过渡期间,所以有一个将要来到的社会,将要来到的文化),让儿童在那个新社会新文化中间是一个有力的分子。前一层是牵就现社会,照顾现社会者多。这一层往新的方面去的多,要超越现实能有一新的趋向。这两个要求,不能有所轻重,都要达到满足才好。从这一层的意思说,不能认识将要来到的社会是如何,正在创造中的新文化是什么,这个儿童教育不好办。虽然那个(将要来到的社会)不就是这个(现社会),

而必须知道那个。因为儿童将是那个社会中的有力分子,这个时候必须预先安排好,预先留下地步,所以对未来要有个认识,知道现在的过渡到那里去。想要明白那个,就得明白我们讲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新社会的创造部分)。我对于实验学校的要求就是这两层。

关于第二层的要求,我底下也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话(不知道对不对)。从这第二层要求,恐怕我们的实验学校不能单实验儿童教育。就是实验儿童教育,也要在社会教育的村学里边来实验,以便与村学的其他方面联络进行。村学有儿童部、妇女部、成人部,还有甲乙两项工作。照我的推论,儿童教育要和那些放在一齐往前作(尤其是乙项工作所包含的社会改良运动,社会建设事业),往前实验,方容易达于第二层的要求;脱离了其他方面,也许不容易达于我们的第二层要求,合乎我们在教育上的主张。

底下再稍微说一说我们在教育上的主张。我们的主张,就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不分,合起来办,并且划一定的社会区域为教育工夫的对象,这就是我们的乡学、村学。在这个主张里头,我们含着一很重要的观察点在内,就是说此刻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过渡期间的社会,正是文化转变、社会改造的时候,所需要的教育天然要重大多数成人;拙著《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就是这个道理。教育在平常的社会中,重要的是“绵续文化”,使文化不至于失传,从“绵续文化”里而“求其进步”,所以天然要着重儿童。这是常态。在现在这个改造期间的社会;大多数的成人对于新方式的生活,如地方自治、合作、新农业;他们都不会的,必须使他们会,才能实现地方自治、合作和新农业,而新文化才能有,所以这个教育工夫不能不多用在成人身上;要他们会了,儿童才好教。假使地方自治、合作、新农业未成为事实,便没法子教儿

童；所以我主张儿童教育要跟着成人教育一起办，在一个大的社会改进工作中来实验儿童教育，否则不容易合我们的第二层要求——让儿童成为将要来到的社会的有力分子，且于创造新的社会的工作上能够参加。

《乡村建设》旬刊，4卷18期，

1935年2月21日。

## 中国合作运动之路向<sup>〔1〕</sup>

此刻中国的合作运动，与西洋工业发达的社会之合作运动不同，这个问题很有些人讨论过。合作，在工业社会中，容易从消费合作做起，消费合作在其合作事业中占一顶大的位置，英国即是如此。而中国农村的合作，恐怕要从生产合作、利用合作做起；大家合起来共同生产，大家合起来利用机械，如利用机械耕种灌溉，以及其他生产手段等。大家讨论的结果，都认为中国农村的合作，恐怕是要以生产合作、利用合作为主为要。再则，工业资本主义国里的合作，顶要紧的一点是“非营利主义”。他们之所以要合作，就是为减少不合算，减少旁人的剥削，其合作的原则上着眼。比如生产合作、利用合作，这里边都有增殖财富的意思。在我们想，中国的产业（包括农业与工业），恐怕有很多是必须用合作社的方式来经营；自然也有不用合作社的方式经营的，但合作社的方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财富的增殖，从社会来看，恐怕要如此才能增殖起来。因为中国第一不能走欧美式的个人资本主义的路；第二不能走俄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路，中国的财富恐怕是靠合作才能增殖起来。而这样增殖起来的财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大家都有享受的机会”。

本来在中国原来的社会（未受西洋影响的社会），其经济既

〔1〕 1934年12月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演。郝心静、李渊庭、侯子温合记。



非个人本位的，亦非社会本位的，他的财产是属于全家的。而家的范围又不定，父母兄弟算一家，全族的人也可以算一家，甚且亲戚朋友凡有伦理关系的皆有共财通财之义，故中国人的财产，与其说是个人的，毋宁说是全家的；与其说是一家的，毋宁说是伦理的。彼此既有伦理情谊的关系，彼此就互相负有义务。你有钱不给亲戚、朋友、同乡用，简直不行。凡是与你有关系的人，你的财产他都有份。在伦理和你有关系，在财产上也就和你有关系。中国自古就有这种风气。现在我们的组织就是发挥伦理情谊，所以有产大家用的风气一定可以倡导起来。不过，从前的老社会，在经济上发挥伦理之义，也许只是增添了许多“族产”，而现在我们的乡村组织往前发挥去，则是增添“公产”，“乡产”、“村产”，不是增添“族产”。总之，从社会关系、伦理情谊之义发挥下去，则个人的生计不会在社会上没有保障。从社会关系，伦理情谊上讲，你虽是老弱残疾也不怕没有人照顾的。因为我们的组织，一面是经济组织，同时也是伦理组织，你与人有伦理关系，则经济生活自有保障。我们从合作经营而增殖的财富，更可以有这种规定：以多量归公，少量归个人；多量归团体，少量归分子。如此则个人生活更易得到社会的保障。

这个事情，在将来的社会组织里（即重心在乡村的组织，或径说乡村组织——原编者案），是不难作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所增殖的财富——赚来的钱，原非为存到腰包里或埋在地下，而是为的供给消费享受，如买米、买布、读书、娱乐等等之用。在将来的组织里，把消费享受方面的事情也以合作方式来作，比如大家赚了钱想培养子弟念书，受教育，那么，我们便可以用共同赚来的钱办教育。从合作增殖的财富办个学校，学校算一乡或一村的，大家上学不必拿学费，并且学校里亦可预备饭给学生吃，乃

至于学生的一切费用均可由公家承管。再如卫生方面,也可用共同增殖的财富设立公共卫生机关。总之,用合作增殖的财利应付共同的需要,可让社会的财富愈来愈多。学校、医院,娱乐场,都算是财产。而这些财产都是公产,此合作经营所得到的财利,也许大家很容易有分开拿回各自家里的心理,因为人类本来具有占有欲。可是他的占有欲亦不过是为消费享受;现在我们既然在消费享受方面的设备也走合作的路,能够满足其需要,那么就容易让合作增殖的财富多量归公了。许多事情都由公共安排,是顶好的结果。

按照以上的办法,结果则公共财产大过了个人财产。现在中国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此刻中国人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没有人是真正有财产的。将来也只有从合作方式才能增殖财富,个人主义的路在中国社会根本走不通!将来中国社会财富的增殖,一定是合作经营积累的,故结果一定公共财产大过个人财产,个人财产不会太大,所谓“富可敌国”的现象,绝不会有。个人财产不大增添,有所增添即以多量归公,所以不会成为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增殖财富的多量归公,一面是增殖财利最好的方法——公积金愈多于实业的经营上愈好,资金越多增殖越易;如果赚钱就分,无论股份公司或实业经营都不会好——一面公共财产大于个人财产也是顶好的结果,因为公共财产大于个人财产,可以让个人财产的你多我少(贫富之分)不再成为问题。有好多问我:“你们走合作社的路,合作社虽然与股份公司不同(股份公司以钱为本,合作社以人为本),而合作社的股金究竟还是有多有少。比如土地的合并经营;有的人有地,有的人没地,有的人地多,有的人地少,合作社是否永远保持这种不平的状态呢?”我的回答说:“不然的!”此其故即因公共财富的增殖越来越大,全社会一

天天的富起来,公共财产会要特别大,那么,个人的你多我少,在新社会中比例就太低了,实在够不上说是一个比例。比如说:你有一两千元,我有二百元,你我之间是十倍之差;可是假使公共财产有二百万,而你的钱并未随之增加,你我的比例仍是那样,那么二百二十之比还成什么比例?你那两千元与二百万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二百万的公共财产,就把你我相差十倍的比较盖过去了。自然关于土地分配问题必须另想办法,绝不是单拿前边所讲的办法就能解决土地不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来非另想办法,作到“耕者有其田”不可!这是应当声明的。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靠政治力量。我们不是忽略这个问题而不谈,我们是看到现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力量。翻过来说:如果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力量,这个问题自然可以想法解决。方法不过是工具,须有主动力量来用。动力具备,不患没有方法;没有动力,方法摆在那里也是无用,它本身是不能进行的。所以我们说:必须政治问题相当解决,土地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这种从合作增殖财富的方法,既不同于西洋式的个人资本主义,亦不同于俄国式的共产主义;据我们看,它比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仿佛还好。怎么好呢?好处在那里?可以分两层来说:

第一,共产主义原产生于工业社会,而农业社会则与工业社会不同。在农业社会中,共产党的办法必须改变才行得通。共产党的办法,一则是产生于工业社会,再则还须是在工业进步到某一个阶段的社会才能行。所谓某一个阶段就是那社会中的生产已经社会化,其工业生产已是社会消费品;表面上虽然象是个人借以赚钱,而实际事实上已是借给社会享用。表面上产业愈进步,生产规模愈大,个人愈能垄断;而骨子里其生产是为社会用的,并且从事生产的人也就是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以这样的生产

已是属于社会的了。不过资本(工厂机械)的所有权在名义上属于个人,而实际上已属于社会;这个时候只把所有权由个人转移到社会,一变换名义即可。可是在农业上不容易有这种情形,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很迟缓的,资本(土地)集中的趋势并不显著(或者说吞并的趋势并不显著),所以不能象工业发达的社会从名义上一转移之间就能共产。在农业社会,还是各行各的生产,各种各的田地,不是推翻法律,转移名义就可共产的。这个时候犹需要作一段励行农业社会化的工夫。此农业之社会化,若在新开荒的地方,很容易把土地收归社会,实行大规模的经营。可是中国乃是一个老的国家,其农民几乎各有一片土地以事生产,其生产技术又不进步,在在离社会化都很远,所以没法子能一转移之间收为公有。假若勉强收归公有,实在无法进行生产哩!以俄国来说,工厂可以马上没收,由国家经营。可是共产政府成立后所宣布之“土地国有”,乃是一句空话;只有大贵族大教堂的土地没收了,农民的土地则未曾没收。政府对零散的土地实在没法子拿过来,拿过来亦没办法。没有行大规模的生产之前,拿过来还是要分开来经营;“国有”的话,仍是空的。它原来是散着的,你既不能整个的拿过来,所以只好还叫它散着。可是你能老让它散着吗?那当然不能。然则如何办法呢?其中最要紧的一着,便是走合作的路以促进农业之社会化了;慢慢地作到象是有一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关,而后才能收归国有,达到共产的目的。

现在俄国农业的经营除个人经营外,有三种方式:一是合作经营,一是集体经营,一是国家经营。最大的是国家直接经营的农场,次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场是个团体,其团体组织亦甚严密;再其次是合作经营,其团体关系已比较松懈。集体经营大概已没

有你一份我一份的意思，而合作经营则仍有那个意思。俄国之农业经营所以有这三种方式的用意，就在促使农民丢开个人经营的方式。他并且运用政治的力量予以极大的压迫，使其放弃个人方式的经营；同时对于国家经营，集体经营则给以极大的方便。他就是这样由个人经营而至合作经营、集体经营、最后到国家经营，慢慢引上来。如所谓农业电汽化，就是想极力让农业成功大规模的生产，从技术上连到一块，让农民到一个不可分的关系，造成非共产不可的形势，才能实行共产。农民的占有欲非常之强，多半不愿意共产，所以必须从外面形势逼迫他，给他造成一个分不开的关系，然后才能共产；否则空空宣布共产，亦属无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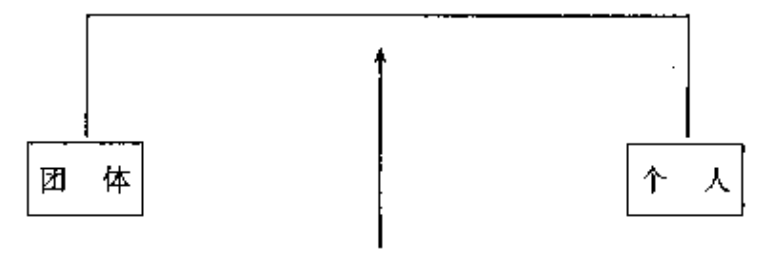
我们看清了这一点，所以认定：假使中国此刻宣布共产，亦只能从“散”往“合”里来领他，到末后方能达于共产。总之，在农业社会里，从形势上看没有一上手即行共产的可能。我们看到的，中国应走的路向（乡村组织），就是由散而合。从这路向说，与共产主义并无不同，他往东，这路向也是往东；他要求社会化，这路向也是要求社会化。因为这路向很显明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与俄国比较只是作法的不同而已。俄国的作法，他虽然也是要农民由散而合，但强制压迫的力量太大太凶！他一面很看清楚社会化没法子一下作成功，而一面又要求非常急切，恨不得马上成功；于是就以强力硬作，简直是让你非合作就不能活。我们所见到的路向与作法比较从容自然，缓和稳当。这并不是我们主观的要求如此，更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找不出一个象俄国那样强硬的力量，霸蛮的去作；所以结果反逼得中国人只能走从容自然之道，让多数乡下人越来越知道合作好而越愿意合作。中国社会大概只能从理性的、自觉的、思维的，自然走向合作之路，而不能生吞活剥的走向共产。可是亦未尝不往共产那个方向上去！在

我们想,这样也许比俄国生吞活剥的共产好吧?!他们那种作法,机械性太大,我们实在不愿意用它!客观的环境也不能用他。也许我们是东方人,是理性主义者,习性上非常之拒绝那种作法,所以要走从容自然的合作之路!

第二,从我们中国的路向,由分散而集合,往前进展去也许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适可而止”。这话怎样讲呢?就是说:我们将来怎样(共产或其他)现在不说,走到那里合适便住在那里。人类往前去,一天一天的要社会化,社会关系一天一天的要增进密切,是没有疑问的。可是,是不是就象共产主义者那样只重团体而抹煞个人呢?他那种主张就对吗?社会关系增进的时候,只重团体不重个人的办法能否行通,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判断,但是在想那样不一定对!俄国人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味地就是霸蛮的作;我们则从容地往前走,到适可而止;到那里为“可”,到那里始“止”。如事实上必须共产才合适,那么我们的路也就非走到那一步不算完;如果“共产”与“抹煞个人”全都不合适,必须一面有个人,一面有社会,那么我们就在离共产甚近的那个地方而止;因为那里“可”,故在那里“止”。这个办法很妙,共产合适就共产,共产不合适就不共产,走到合适的地方自然站住,走到那里不合适一定再走。那么究竟走到那里才算合适呢?这个我们不必想得那么远,将来看事实走到那里罢!大概合适与否只有亲自尝受才可以知道,不便以猜想出之。现在担心将来是偏重个人自由或者偏重团体干涉,都是想得太过。胡石青先生的“普产主义”,就是从这个观点批评共产主义。他主要的意思是:人类对于财产,不止是一种享受的态度,并且藉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如顺此自然之要求,即应把财产分为个人私有,地方公有,以及国有三种;个人自然占得最小,地方则较大,国家最大(从所属上说有

大小之分,从类别上说有适当的区划)。他这话很有道理,与我们的意思也相近。从此大家可以明白,上面所说的增殖财富的方法,确和共产党不同;照这方向往前走虽亦越来越趋向社会化,但将来是否走到共产那一步,是看将来的形势而定的。“可”共产方行共产,“不可”共产就不共产,所以说从这个路向走,有“适可而止”的好处。

这路向虽然含有共产的可能,可是也许不要共产,因为共产是个极端(上面所说的路向是由分而合,由散而集,合与集的极端就是共产主义),不是个平衡。而我们理想的社会,个人与团体则与天平相似:



抬高个人固然不好,抬高团体抹煞个人也是不好,所以我们常觉得共产党有矫枉过正之嫌。《国际译报》(6卷10期)载有《泰戈尔论苏俄》一文,就与我们刚才的话很相接近。他说:共产党抬高团体,抹煞个人,太趋于极端,这乃是对个人主义的反动,并不是常态。这些话很有意思。

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名辞。这个名辞本来不大用它,现在不妨点出来借以略表我们的意思。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算是“合作主义”者。所谓合作主义,也许一人一个讲法。现在把我们的讲法分两层来说:

(1)关于合作,有一种争论,有的人说:合作只是一种方法、

手段、政策,不应成为主义,这话也对。因合作之兴起,乃先有事实,非如共产主义之先有详密的理论以为倡导,而后产生事实。从这一点说,合作就很象一种手段、方法,而不成为主义。

(2)可是也有人说:合作起初虽然只是方法,现在未尝不可以变做主义。因为我们有合作的理论,有合作的理想,一面可把合作看成“手段”,一面也可看成“目的”。这话我很赞成。比如说,从上述的路向,社会将由分而合,由散而集,但不一定走到共产那一步。这就是因为把合作当作理想、目的,而不止看成一种手段、方法。上述的路向是以合作开始,而亦终于合作,因为惟合作可以有个人与团体均衡的结果。固然合作是一种团体组织,不过所谓“合”,所谓“集”,都要有个人,不有个人何由而合?何由而集?所以惟合作一面有社会,一面有个人,两面无所偏废。在一个合作社里,一面大家要求合作,一面团体尊重个人;处处顾到社会,处处顾到个人。合作实最能达到均衡的理想,所以合作成了主义、目的,而非止手段。我之所谓“合作主义”,即指这种个人与团体的均衡而言。我们这种“合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我们就是要一面以合作为方法,一面以合作为理想。我们往前走,合作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手段。这个原故,就是因为只有用合作社的方法可以渡过我们(中国)眼前的困难。渡到那里去?仍渡到合作上。我的意思:合作制度不单是主观的目的、理想,且是此刻中国社会所特别需要,特别适宜的。

合作社在不同的国度里各有其不同的发展路径,与不同的发展样式。大家都知道丹麦是合作社最发达的国家,他的合作社与英国、德国各有不同。中国社会更为特殊,在此特殊的环境中,合作社必然的更有其特殊的发展的样式与路线。中国的合作社将要如何发展?这是我心里蕴藏很久的问题。我有一次与



黄明先生(湖南人,日本留学生,对合作富有研究,现在广西服务,曾来本院参观)谈话,即始终没离中国合作社的特殊问题。我第一问是“合作社是否可以营利”?第二问是“合作社在中国的前途如何”?可惜他都没有给我合适的回答。关于合作社在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国社会究竟有无特别适宜于合作社推行的条件?照我的看法,中国社会很有特别适宜推行合作的条件;合作在中国社会推行起来,不但容易,而且合适。关于这些条件,我现在不能很周到地列举出来,只就要紧的地方说吧。

我们先问:谁顶需要合作?谁顶容易走上合作的路子呢?自然是弱者、散者顶容易走上合作的路子。合作社之所由起,实在是经济压迫下弱者、散者的一种防卫与自救。英国的合作社就是由工人的消费问题做起的,德国是农民做起的。总是弱者、散者才需要合作,才容易走上合作的路。中国是一个顶软弱散漫的社会,所以顶需要合作,顶容易走上合作的路,这是不待言的。再则现在摆在他眼前的也只有合作的路。我们中国社会没有大工业,都是小手工业,农村中也多是小作农,无疑的都是弱者散者;在此国际竞争底下,他没有法子不走合作的路。所以我们从大势上看,一眼即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之需要合作,同时也很容易走上合作的路。还有一点,中国社会是大的农业社会,然其农业制度则是小作农多的小规模生产;大社会而小作农,其所当走的路,天地间就找不到第二个比走合作的路再适宜的了。农业与工业不同,工业能走资本主义的路,农业则不能。在农业社会中,欲求农业技术的进步,无法不走合作的路,这差不多已成定论。此种道理,后边才能细讲。现在只告诉大家:凡是农业社会,就需要走合作的路,不能象工业社会一样可以很爽快地走资本主义的路。

有两种国家与我们不同,他们都不很需要合作,因而合作社

的发达有限。那两种国家？一种是工商业发达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惟其劳工需要合作，乡村的农民需要合作，换言之，只有他社会里边的弱者需要合作。他们的合作，天然是从消费来的，不是从生产来的。他已经发达的工业生产，是从个人自由竞争而来，决不需要合作；所以在走上资本主义的国家，从大势上看他只有工人农民需要合作，故其合作社之发达不能不有限度。虽然也有人想从合作的办法把畸形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转移过来，但不敢必其成功。还有一种国家亦不需要合作，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一种国家同个人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合作之发达均有限度（这是指俄国而说）。他在生产上靠国家资本就有办法，在消费上乃是共产主义者，亦可由国家供给，自然没有人需要合作（这是比较的说）。这两种国家，既不用合作发达生产，又不用合作解决消费。需要促进合作的，只有农业社会的中国。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其产业的开发与技术的进步都有待于一个方法（制度）以完成；乃至分配问题亦需要一种方法（制度）以解决。总之，中国产业的开发，技术的进步，分配的问题的解决，统统有所待。待什么呢？自然，个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都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道路，可是这两条道路中国都不能走，而专有待于合作。从大势上看，中国必然要成一合作国家。黄（明）先生说中国人的性情脾气很适宜于合作，这话亦然亦不尽然。从中国一般人的性情上看，自然有很适宜的地方，如孟子“王何必曰利”一类的话，在书上很多很多，都可以见出中国人不是功利主义者。中国人很少把财产看成是增殖财产的东西（资本），而看成是享用的东西（消费）；西洋人则看财产是资本，希望再生产以扩张资本。中国人对财产一看就归到享用消费上去，此虽嫌缺乏进取的精神，而于人生意义上是很对的，也是合于合作的原

则的。合作主义就是为消费而行生产，资本主义却是盲目的为生产而生产。黄先生说中国人性情忠厚，讲情谊，重和气，很容易合作，这话当然都不错；可是就中国人的性情说，他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团体生活习惯，缺乏组织能力，不会商量办事，所以对于合作也不甚合适。中国人顶爱关门过日子，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中国人顶理想的社会；这就与合作不合了。合作非大家联合不可，而中国人偏不会合，所以从中国人的性情脾气来说，不一定特别适宜于合作的。

上边是说中国人非走合作的路不可的形势，现在再讲中国合作社的特殊——合作社营利不营利的问题。关于此一层，我曾经说过：中国的合作社，也许不和普通合作社发展的历程一样。本来合作的兴起，最初是由英国二十八个工人为解决消费上的吃亏问题而组织消费合作社开始的，而中国大概不从消费合作开头，并且消费合作不是主要的业务。这个原故，乃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在农村中合作大概不能从消费起。中国的农村里边，固然也需要消费合作，可是总比较差一点。关于这个问题，邵履均先生曾为文讨论（载《村治》1期），大家可以参看。大概消费合作社在农村中既不大需要又非常难办，因为农民要消费的东西实在太少，就是有所消费，亦大半是自己生产的。比如吃的粮食是地里收的，穿的衣服是自己织的，住的房子也许是自己盖的，与工业社会的工人完全不同。在工业发达后的社会中，工人吃的用的一切比中国的农人讲究得多。中国农人，消费每能自给，顶多向外边购买些食盐和煤油，但为数至微，少到不能再少。如夏天不点灯就睡觉，平常点灯，灯光亦若有若无。的确在农村中消费合作既不需要亦且不好经营。在农业社会，农人居住是分散的，不象工业社会工人之密集，所以经营消费合作极

不容易。

什么事情都是由于适应需要而来的。比如在英国，他的工业已经起来走上资本主义的路，当然用不着再以合作发展工业了。这时他已没有多少需要合作的事情，只有工人的消费问题需要合作。可是中国现在顶大的问题决不是工人的消费问题，这是很清楚的。此刻中国顶大的问题，极迫切的需要，就是普通所谓“造产”。造产亦即我们讲的“增殖财富”，或“开发产业”、“改进技术”。所以如果合作是应于需要而来的话，那么中国的合作决不是消费合作，一定是生产合作；如我们邹平的棉花运销合作社是。一种方法之被采用，恒因社会需要之不同而异。中国社会与西洋社会的问题不同，需要不同，所以合作社发达的方向也一定不同。我们因为要造产，要增殖财富，于是合作社之在人家虽出于弱者的防卫，而在我们则不得不是进取的要求。合作社当初诚然是少吃亏、不吃亏主义，原非为赚钱而来，并且反对营利，以不营利为其原则；可是中国的合作社开头天然要进一步而含有营利的作用在内。因为中国现在不能只持防守的态度，非积极进取，积极增殖财富不可；仅仅防守是不够的，又何况防守亦无可防守。更明白的说：我们是一面防守，一面还要向前进取；一面不吃亏，一面还要赚一点钱，单止不吃亏是不够的。不过我们在根本上亦绝不能违反“不营利”的原则，否则不成其为合作社了。大概从这路向往前进展去，开头含有营利在内，待合作范围逐渐扩大，末后总要归到为消费而生产（不营利），这是丝毫不能错的。我们的合作，在初时需要一个过渡的阶段，仿佛是从营利过渡到不营利，其在过渡阶段中不能不营利，不能不进取。换句话说，在过渡阶段中的合作社，从某一意义说，也很象一种资本主义，除了借着他人的劳力来营取产业利润一点之外，其他地方（如营

利),与资本主义没什么不同。在我想是要这样。

我曾问黄明先生:“日本的合作社有没有象英国合作社一样亦兼营制造业者”?他说:“有的”。我又问:“制造工人是不是即合作社社员”?他答:“自然是社员更对,不过有时也可以通融一点,亦有非社员的”。我问他那个话,原意并不是要知道日本合作社的情形,我是想明白就黄先生看到的合作社,其中有无以他人劳力来营取产业利润的情形。倘有,那便是资本主义而非合作社了。利润有两种:产业利润与商业利润。比如资本家(工厂主人)借着工人的劳力来完成一种商品卖出,照例都有马克思(思)所说“剩余价值”。他卖出的价钱,大过工人的工资及原料(即大过成本),除工资、原料之外,所余的利润谓之产业利润。至于经营商业的余利,则为商业利润。比如自大工厂中批发货物,而零碎的以较高的价钱卖出,其所得的利润即商业利润。商业利润在过渡期间的中国合作社里边,大概不能不有。申言之:我们(中国)的合作社,商业利润是可以要的,产业利润绝不能要。假如合作社不但营取商业利润并且营取产业利润,这样就是借着旁人的劳力营取利润,不但自己不吃亏,并且进而使人吃亏,以旁人为牺牲,合作社便不成东西了!若单是营取商业利润,恐怕是个必要,无法避免的。所以在合作社里我很注意工人的问题。论理合作社中的薪俸工人都应当是社员,不应当雇用外人。比如很多的纱厂工人成立一个消费合作[社],自己制造面包为自己消费;那么其中烤面包的工人,也只好专烤面包,不能再做纱厂工人。可是这个人必须也是社员才对。我们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轧花工人固然也有不少的社员,可是也有非社员在内,这也是不合适的。雇用社员,不仅给他工资,他自己尚可分得红利;而雇用非社员给我们轧花,则多少含有借他人的劳力以营利的性质。黄先

生说：“这个的通融的办法。现在整个的社会组织是不合理的，全没有法子合理的应付，必须变通办理，你得讨巧且讨巧，但莫讨得太多了”。不过我的意思总要想法子守着原则，到不得已再稍微通融。比如我们的美棉运销合作，不客气的说自然是怎样价钱好怎样卖，可是这个时候就不大顾社会了，假设我们是棉农（生产者），组织了一个棉花运销合作社，自然希望棉价愈高愈好，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这种商业利润，在开头时实不能不有。我们既走增殖财富的路，则不能不从生产上扩大生产资本来再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但必须守住上边的原则，绝不可剥削他人的劳力以求产业利润。中国社会必须如此才能增殖财富，而如此就是营利；但营利的性质要随合作的扩大开展而逐渐减少，逐渐从营利往不营利里去，最后达于为消费而生产。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要求（主观的要求是没有力量的），而是客观事实上的自然趋势，合作事业最初之营取商业利润，是自然的；逐渐达于不营利，最后到为消费而生产，也是自然的；统统是自然的趋势。何以言之呢？从我们所见到的路向慢慢生长，合作的关系开展，范围扩大，方面加多，自然达到为消费以行生产而不图营利用了。

所谓方面加多，就其种类说，包括生产合作、运销合作、消费合作等等。并且不止在农业上合作，可进而及于工业；不止合作种棉，并且合作织布。这样进展前去，合作社员日日加多，地域日日宽广，范围自然扩大，关系自然深密，生产自然不为营利，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说方面多、范围大、关系密，就不营利用了？因为营利出于分别人我，各自为谋，看旁人都不是我，完全拿我作中心来算账，处处是我要赚点钱；及至范围扩大，整个社会联为一体，把人人都看成我，不分彼此，还赚谁的钱呢？所以自然归于不为营利而生产，只为消费而生产了。事实进到没有人

我之分，虽然我是棉农，当然也没有希望棉价愈高愈好的必要。我们现在正作在邹平开办纱厂的梦，预备从种棉花一直到织布，统统由我们合作社经营；可是这个须要范围大，才行。棉花产量少则不能织布，织布而不主要的为自己用亦不能开办纱厂。将来合作范围扩大，开办纱厂主要的是为自己享用，余则推销出卖，换取商业利润。如果合作范围更大之后，就可以为消费而生产，织布全为自己享用而不出卖营利了。所以营利与合作适成反比例；合作的方面愈少，营利的性质愈多，及至合作的方面愈多，范围愈大，就愈不营利。到了大家合而为一，为消费而生产，则根本无利可营。这个路向，一上来很象资本主义，但合作愈高，营利愈低，此长彼消、走来走去，最后资本主义完全消除。

黄明先生有“合作网”的主张，此与我们很不相同。我们说的方面多、范围大，是由下而上，由近而远，自小渐大，自少渐多。他是一起手就布置妥当一个大范围、多方面的合作组织，又是由上而下去作的，如其金库、仓库、公店等，以及所谓三级干线，他把紧要路口察看清楚，就由上而下把合作网（即所谓合作组织系统化）布置起来。与我们由下而上者正好相反。然而天下事相反适以相成。这两面工作都很需要；及至上下对合，则为消费而生产的合作组织告成。黄先生诚然是象他自己所说的：只热心干合作而未深刻考虑别的问题。他要布置合作网是不错的，可是谁来布置呢？事情不是我要如何便能如何，必须将社会情势分析研究明白，找出一个天然能动的力量，而后一切才有办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先决问题；不止合作如此，任何事情都要遇到这个问题的。

中国此刻无论从合作或其他方面说，都需要有一个较高的眼光，或总的脑筋，作一整盘计划，利用我们现有的一点人力财力，才能经济的、科学的、智慧的办理事情，解决问题。所可惜的

我们现在尚没有一个总的脑筋！照普通例子，总的脑筋便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可是中国不是整个的国家，统一政府迄未建造成功，这是我们几十年来最为苦闷的所在；否则一切问题，均不难解决了。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力量，总的脑筋，当然可以自上而下的作。无奈照我的推论，普通人所希望的这个力量，中国一时是不会有；所以我们的作法不得不自下而上；自小而大，自局部而及于全体。

《乡村建设》旬刊，4卷23、24期合刊，

1935年4月21日。



## 邹平工作概谈<sup>〔1〕</sup>

邹校长，各位同学，刚才校长介绍推奖，很不敢当。几年来，兄弟没有来粤，此次来到广州，将来想回广西一行。近几年间，粤桂当局，常常有电催我南来。民国廿年，海滨先生，也有函电敦促来校；但屡屡因事牵缠，总不能成行。这次勉强抽暇来粤，又适值寒假期间，有很多同乡同学，不能合拢聚谈。今天承校长之邀，来校讲话，就把我在山东做乡村建设的经过，分为五点，来和各位谈谈。

第一，工作的动机。关于我们做乡村建设这种工作的动机，可分为同人的动机，和我个人的动机来说明。

1. 同人动机。我们做乡村建设工作的人，本来不少，但大部分是河南山东各处的朋友，他们做这种乡村建设工作的动机，大概由于地方的不安宁，和生活的痛苦，因想另求一种较舒适的生活，这是他们做乡村建设工作的出发点。盖自民国十一年起，直至民国十七八年，这个期间，河南山东等处，兵灾频仍，匪患迭生，社会秩序紊乱不堪。于是乡村中有知识的人，多逃避到北平居住。但后来他们觉得自身虽然逃到城市，而田园物业，仍在乡村，且灾患接踵而来，了无定期，乃憬然于这种逃避的方法，不是彻底的办法，才回到乡村来做自救自卫的工作。

〔1〕1935年1月30日在中山大学的讲演。伍华、李渊庭笔记。

这是一般同人做乡村建设运动最简单的动机。这种乡村建设运动，最初的时期，有河南村治学院，培养村治的人才，负起村治的任务，对于整顿河南的地方事业，颇著成效。他们就本着自救自卫的意思，沿着平汉路线一带地方如河南北部几县，及河南南部镇平县等处，均有朋友在那里努力做乡村建设工作。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个动机。

2. 我个人的动机。兄弟不是居住乡村的人，关于这个乡村建设工作的动机，原不是由乡村自救、自卫出发。因为我本是广西桂林人；但我是生在北京的，由我祖父以至我本身，都没有在乡村居住过，对于乡村没有什么深切的关系，因此我做乡村建设工作的动机，便和他们不同。我十五六岁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其时适在光绪末年，宣统初年，那时国家的命运不好，国难已由那时候开端，不过没有现在这样的严重罢了。由此时起，我就立心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希冀对国家社会有所建树。“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中青年，感觉国难日亟，有大中小学生从事于军事训练。我们在少年的时候，也曾因受国事的影响，做过政治的运动，要求政治的改革。在清末做政治改革的人有两大派：一为梁任公先生所倡导的立宪论；一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革命论。这两派的主张，虽各有不同，但他们的目的，同是要求政治的改造。后来因为大家看透清廷，无诚意实行立宪制度，所以有许多人便由立宪论，改为革命论，积极做政治改革的运动，渴望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来管理中国，才能整理国事。辛亥革命，推倒满清，建立民国，由专制政体改为民主共和，这是我国政治上一种大革变。我以为这种政治改造的要求，可以达到，国家一切事情已有希望，不料事实上竟大谬不然。自民国成立以后，我国虽有民主之名，而离民主之实，却

一天远似一天，到后来，竟由失望而成绝望。有许多人以为国事颯颯，全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三数窃国弄权者破坏政治制度所致，但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恐不是这样的简单。须知袁氏这个人，固不能妨碍我们的政治工作，就是北洋军阀，也不能破坏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政治的紊乱，实在由于西洋的政治不合我国的国情，为我国新政治制度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西洋人有他们的政治背景和风俗习惯，与我们中国的政治背景与风俗习惯不同。明白心理学的人，便知道习惯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行，是由于我国的习惯，不适合于西洋政制所致。故欲推行西洋的新政制，须养成我国的新习惯，使适合于西洋政制才行。但怎样才能养成我国的新习惯？我认为非实行乡村自治，从小范围推广到大范围不可。我个人对于乡村建设的动机，实在发生不出来，我所以有这样的主张，完全是由于我对中国政治的烦闷，认为非有新政治习惯，不能适合西洋政制；但欲培养新习惯，又非实行乡村自治不为功。在民国十六年，在广州政治分会，我曾有开办乡治讲习所的建议。后来我由广州到长江一带及山西等省，考察地方自治的状况，预备回到广州，即着手开办乡治讲习所，嗣因大局陡变，是以不果。年前我对于政治的烦闷，再发生乡村建设的运动。起初的时候，我们系提倡乡村自治，但现在我们何以不用乡村自治的名称，而改用乡村建设呢？因为第一，提倡建设，是我国目前的急切需求；其次，乡村建设比乡村自治的内容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阔；且现在欲养成新风俗习惯，不是片面单做乡村自治所能成功，必须从各方面去统筹兼顾才行。这是我们不用乡村自治，而改用乡村建设的用意。

上头所讲的，便是我们做乡村建设运动的两种动机。

第二，工作的根本意义：我们做乡村建设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起初我们还没有知道。后来做了几年的工作，才认识这种工作的根本意义。我们常常感觉中，目前一切事情都没有办法；但我们的各种事情，为什么没有办法？起初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后来才认识那个主要原因是“文化转变”，那时我们才知道中国目前的内忧外患之所以这样严重，和一切事情之所以没有办法，都是由于在文化转变过渡期中这一个总原因。因为在一百年前，我国尚闭关自守，西洋文化还无法输入中国，那时西洋人有他们的西洋文化，中国人也有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彼此各不相同。近百年来，瀛海禁开，环球毗连，欧风美雨，澎湃东来，西洋文化源源输入，其时中国骤遇向所未见的西洋文化，所以无论风俗习惯，都感觉和西洋不同。新旧文化一旦相遇，自然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趋势。我们的旧环境就变成新环境，但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变化自己，以适应新环境；而仍然不行，乃再变化；再不行，又变化；但变来变去，总是没有办法。这究竟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西洋文化，系从外面压迫而来，所有西洋的文化、科学、制度，虽有很大力量，使中国的旧环境有不断变化，但每经一度的变化，总没有成功；试行一个新制度，只有消极的结果，没有正面的结果。旧的组织遂逐渐崩溃，而新的组织，没有建立，此时国家社会的一切事情，最无办法，我们中国人，也最没有力量来应付新环境。因为本身的旧制度已经崩坏，而新的制度又没有成功，大家彼此相望，无可奈何，这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怎样去创造中国的新制度？我感觉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培养新习惯，才能适应新制度。乡村建设的根本意义，就是开辟建立新组织制度，完成中国社会的改造与革命。

第三，目前工作努力目标：我们目前工作努力的目标，可分两点：

(1) 倡导知识分子下乡的风气。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特例，因为中国的革命是由外部暴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内部自发的革命，是大多数下层民众发动；但由外面暴发的革命，是只由少数上层知识分子作发动。中国的革命是由于外面不同的文化影响，刺激内部的文化发生变化，所以中国是由知识阶级发动革命。但革命的范围，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个国家社会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不是单独做民族革命，也不是单独做民权革命，或民生革命，而是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同时去做。所以我们革命的范围很大，是整个社会的，不是局部的。但我们历次的革命，最先发动的都是知识分子居多。但历次革命通没有结果；大抵因为历次革命，只有上层知识阶级去革命，下层民众没有参加的缘故。就是共产党的革命，号称无产阶级革命，也是由知识分子做主动，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没有结果。这是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单独革命，是不能成功的。知识分子单独去革命固不能成功，就是下层民众单独去革命，也一样不能成功。最显著的例证，就是庚子义和团的发动，和十年来河南山东等处的红枪会，都是由农民发动，但结果做不出什么成绩来。那么我国只有由农民和知识分子合拢起来去革命，中国的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无论知识分子或农民单独去革命，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知识分子要回到农村去，去整理乡村的事情，领导农民去做乡村建设的工作，中国才有希望，革命才能完成。

(2) 研究实验一种合用的乡村组织。乡村建设，重在为中国社会创造一种组织结构，这必要一面须从事研究，一面又须

从事实验，才能辟创简易可行的乡村组织。而这种工作，须由知识分子领导下层民众，大家参加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才能发生力量，乡村组织才能辟造成功。

第四，工作的方法或途径：我们所干的乡村建设，有人说简直是民众教育运动。不过我们干的民众教育，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在北方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就是由教育出发，而我们则是由政治的烦闷，才从事乡村建设，最初不是由教育出发。但许多人竟认我们所办理的是民众教育。例如前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庄泽宣先生，到欧洲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的时候，报告我国的新教育运动，对于我们在邹平所做的乡村建设工作，认为是一种教育改造工作，颇加赞许。又如美国教育家霍金和罗哥来中国考察教育，也视我们所做的乡村工作是教育改革的工作。北方一般人所做的教育运动，是民众教育，我们所做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是民众教育。不过我们所办的乡村建设，是广义的教育，不是狭义的教育。如果我们把教育认为是藉人与人的交通传递作用，而谋个人或社会的向上进步的话，那么，我们所干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就是民众教育，这是无可疑义的事情。

第五，工作的内容和变迁：关于我们工作的内容和变迁，可分三部分来说明：

(1) **乡村建设研究部** 我们招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共同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和实施方案，促进我们的工作。不过这部分所招收的人数很少。

(2)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 在这一部分，我们招收曾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施以相当的训练，使他们负担推进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这部分所招收的人数，较为多些。

(3) **实验区** 我们现在的实验区，是县政建设实验区，但从前的实验区，只是注重乡村工作。自民国廿二年起，我们把实验工作的范围扩大，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其工作内容，包括三种：(甲)关于县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例如一乡的行政长官，究竟设一个县长好呢？还是设两个县长好呢？县长之下设若干科等问题。(2)关于地方自治推进方法。所谓地方自治的推进方法，也是地方自治的制度。大概关于我国地方自治的制度，可不必遵照中央或本省的法令来做。我们可以斟酌地方的特殊情形，辟造适合地方需要的自治制度。(丙)社会改造工作。如所有文化风俗习惯生产种种事项，都在此项工作之内。民国廿一年内政部召集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兄弟和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先生、无锡教育学院高践四先生等，被邀参加此次会议，协助内政部，研究县政建设工作纲领。后来回到邹平县，就根据那个工作纲领定出各种办法，得到政府的许可，于是我们的工作就更自由，推进也更容易。因为想改造地方，改造社会，非本着实验和研究的态度来规定一切计划，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我们邹平县工作的内容，和变迁的大概情形。

刚才兄弟把邹平工作的大略情形讲完，敬望诸位批评指教。

《教育研究》，57期，

1935年。

##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三大问题<sup>〔1〕</sup>

各方面的问题都是实验区本身而发生的，批评实验区的人决不会提出道德问题，说它是善或恶。这种行为大家无疑地指为是善的了。不过有许多人怀疑着，以为这种实验办法是否有效果。让我先说个故事。以前有个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要实验猴子的智慧。他用了一个窄身的玻璃瓶，当猴子的面，把花生和枣从瓶口上放进去；然后交给猴子。猴子接着了玻璃瓶，望着瓶里面的花生和枣急要取出来而不得，就把瓶子乱幌起来了；经过了若干时间，居然把花生和枣幌了出来，它就拿来吃了。如是试验了几次，猴子老是不进步，总要把瓶子乱幌，不期然而然地幌了出来，才得吃到花生。后来那个科学家做给猴子看，先把花生与枣从瓶口放进去，然后把瓶子一倒，即把花生与枣倒了出来。如是教他之后，哪知道猴子还是把瓶子乱幌而不晓得把瓶子倒倾出花生。因此发现猴子的智慧毕竟不如人。不如人的地方，猴子见了花生便心急而无暇考虑取花生的方法。即使人教了它方法，把瓶子倒过来的时候，它还是只看见花生；

---

〔1〕这是1935年1月31日在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的讲话，记录者为周葆儒。听众提出了三个问题：“工业与农业哪个在先；政治与教育哪个有效果；总分哪个力量大。此讲话即针对这三个问题而发。《教育研究》以《漱溟先生的三个答案》为题，首先发表。在经著者校改后，以《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三大问题》为题再次发表于《乡村建设》（旬刊）。——编者



而没有看见倒瓶子的方法。人的智慧所以胜过于猴子，就在搁下目标而环视四周，屏抑主观要求而寻取可能途径。国人感受日本压迫则讲国防，苦于军阀割据则梦想统一，其在要求上着急、目标上注意，正与猴子相去不能以寸。宇宙间无论什么问题，要求解决，必不能在当地本身上着想。同样地，手段方法在此者，其目标用意不必在此，而在远处。讲到目前的实验区本来是没有效果的。国内遍地灾荒，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物价低落，银根紧急；这是整个的政治经济问题，还有什么办法呢？办实验区者不是象会变戏法的，一下子就在此区内变出一个理想的世界来。然一步一步地做去，其效果不在此，而在彼；此则望国人留意者也。以上算是总括的话，下面分说各个问题。

第一先说总与分的问题。所谓总，大概是政府或国家，用统一的计划，整个的力量，来推行乡村建设。所谓分，就是指现在，零零碎碎，东一实验区，西一实验区，办法既不一致，事业又很散漫。二者相较，那个容易见效？照普通说，当然，很明显地，用总的办法，实行统制，容易见效。比如经济上说，非得用总的办法不可。现在世界各国，都有整个的经济组织，而与国际相周旋。如果我们国家仍由私人以营利为目的，而与之竞争，必遭失败无疑。我们是产业落后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上力量本已单弱，现在还不能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力量自然更单弱。故从经济上立论，必须把中国组合成一个。把中国组合成一个，有谁不愿意呢？可是现在有可能性吗？不但现在没有可能性，如此下去，以后也没有可能性。因为其中有特殊困难的缘故。二十余年来，全国扰乱不定，政象污浊，都是因旧辙已经破坏，新轨尚未建立。旧辙之被破坏，是出于少数有力分子。孰为有力分子？就是较有头脑较有知识的人，和较有勇气

较爱活动的人。新轨之不能安立，是由于百分之八十多的蚩蚩农工，保守其数千年迷信和习惯，对于新制度不了解，但不明露在意识上的消极的不予承认接受。少数有力分子虽明明为新制度之要求者，而在其意识后背隐暗处同时复为其拒却者。这就是特殊的困难。因此自1911年以后，至今国家的国权尚未建立。这决非偶然的事。目前我们所受一切痛苦，都由此点——国权未建——发生。比如被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我们没有一个总组织来应付；东北失地数千里，因为没有有一个总力量去抵抗；各地连年水旱灾荒，因为没有有一个总脑筋替我们筹划。何为我们的总组织、总力量，总脑筋，不能建立呢？将来是否有建立的一天？这不难推知。我们从历史上看来，有必然的途径。究竟谁来解决建立国权呢？在这里我可说一句话，惟有“乡村运动”。

至于目前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乡村建设办法，当然是无结果；而结果在后面。好文章在后面。许多问题，都要牵涉到经济问题。我于二十二年八月，在青岛中国经济学社开会时曾讲过一段话：“大家关心中国问题者，都知道经济问题的重要，都急切要求中国生产技术进步，产业开发。但每有不照顾自己所处地位环境，而徒言经济建设，作为种种计划者，真是笑话！与经济建设第一有关系者为政治。我们不想到我们的政治环境，便说中国宜如何如何作经济建设是不行的。经济建设或须直接靠政治力量行之，或则亦要相当的政治环境为条件。无论前者后者，我们总括称之为经济建设的政治条件。想不到政治的条件固不行，有人于政治条件随自己主观而要求，不顾到其是否可能亦不行。大概技术进步，产业开发的先例，总不出两条路向：（一）个人营利自由竞争的路向。近代西洋社会即走此路，

而亦日本所摹仿成功者。(二)社会本位统制的计划的路向,苏俄即其一例。此二路向,颇觉相反,但实际上,亦不过相对的各有所偏,非绝对的不同。在前一路向所需政治条件,是国家法律有效,社会秩序安定;乃至政府能为奖励,保护等等。后一路向所需政治条件更高,即必须一强有力的政府,并且清明的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总持经济建设之事。”现在经济问题没有解决,乡村建设不出什么来;因为我们不是幻术家,能够无中生有地立刻拿出一个花样来。那末各处的乡村运动事业,目前一定要赔本;我们不能因为它赔本,就此停止。让它赔本赔下去,我们还要继续工作的。这事比如小孩学习书法,起头一定糟蹋掉许多纸张和笔墨;但是我们不能因小孩糟蹋纸张和笔墨,以为太不经济,就禁止他写字。如果要希望小孩子写字成功,必须使他继续地学习,糟蹋东西是免不掉的。现在的民众教育家就是〔好〕比小孩子一样,正在那里开头学习,难道就要叫他不赔本,而赚钱吗?于此,学习的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是学习,常常能够发现缺点,随时自己修正。凡事一落于国家行政,就是太机械化,不能发现缺点,不能随时修正,而有进步。唯社会运动,较为有学习精神。乡村建设必须是一社会运动,而必不可全靠政治力量来作。假令完全放在教育系统里面来作,比较好些,终不如是社会运动。但所有这些分别,当然不是绝对的说哪个有,哪个没有,只可说宾主之分。

第二是工业与农业问题。工业能引起农业的话也很确。有许多人这样说。如现在中央大学农学院邹君也说工业可以引起农业。就拿棉业来讲吧:现在各纱厂都需要长绒棉,邹平的棉田也很发达。外洋来的棉花较中国出产的棉花价值昂贵,所以各纱厂要购买中国棉花。据某杂志发表:近一二年全国增加棉

田共数百万亩，并且都是种长绒棉的。棉业发达的省份，是山东、湖南、山西等，其原因都是为适应工厂的需要。这是工业引起农业的很好例子。至如说工业在先，农业在后，则未敢赞同。工业最重要的条件是机器。试看工业后进国家，必先以农产物出口，然后换得机器而发展工业。假使我没有农产物出口，哪里得来机器呢？不比农业的要件是土地，土地是现成有的。况且工业竞争比农业竞争更激烈，如甲工厂所用机器较旧，其出品必显而易见地不及乙工厂，而甲工厂立刻不能存在。农业则不然，方法虽有进步与不进步，出品相差则不很远，用途还是很需要的。我国农业有几千年的基础，工业的基础是在哪里呢？至于工业能引起农业，农产亦未尝不能引起工业，如农业化学而引起的工业，因农业机械或工程而引起的工业，因农产制造而引起的工业等。又如在农业前进过程中，农民购买力增加，许多工业乃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

中国决不能象日本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其故有三：（一）近代工商业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已走入反资本主义阶级。（二）近代工商业路为私人各自营谋而不相顾的，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趋势；在今日国际间盛行倾销政策下威力太大，亦无发展余地。（三）近代工商业路所需政治条件（政府能安定秩序，并保护奖励，在我亦不具有。工业所必不可少的是市场，试问我国的市场是在哪里？人家正在夺取我国来做市场。各国自己关税壁垒高筑，不容别国商品踏进一步。即在我们自己国中，也竞争他们不过。如烟卷，国货抽税大，卖得很贵；外国货抽税轻，卖得很便宜。如是烟卷业不得不失败了。又如航业，外国是由政府津贴的，中国是不但不津贴，而且还要阻碍，如当差运兵，滥发免票等。中国工商业衰落有许多原

因。总之要谋立刻振兴，竟无一条路可以作佐证。试看各大学造就的工业人才，结果没有出路。假使现在有人要想亏本，那末可以去从事工业，设立工厂。凡是一种生产，先要看它有没有生机。现在我国每年入超已达五万万，其大部分属于粮食。粮食之输入，虽也因商业问题关系，而最大原因是农业生产低落之故。一旦如果农业发达，至少我们可以达到自给自足之目的。我们被帝国主义者压迫已到最密的程度，比较的还是农业方面好象宽松一些。我们就想在这地方透一口气，转一些生机，求一个反〔翻〕身。

第三是政治与教育问题。用政治的力量，当然比教育力量大，可是目前中国没有总组织，没有一种最高力量，上面已经说过。我们要知道，政治对乡村破坏力也很大。在国内，如灾荒、兵祸、匪乱、苛征等，当然由政治不良所致，外被国际侵略，也是因为政治不振之故。从来所谓政治，无不有剥削在内，无非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者，不利于乡村。旧日中国政治以不扰民为方策，这是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遂演成消极无为之局。一般的政治，大抵为阶级统治。封建阶级统治下之政治，其剥削乡村很厉害，到了资本阶级统治下之政治，其妨碍乡村更凶猛不可当；然而有统一的组织，有法律，有秩序，究竟还能维持、保全。象今日中国的政治，统治力为多个的，无复法律秩序，但有一往不顾之破坏。每个统治力各顾自己，乃绝不稍顾惜乡村，乡村于此，乃纯落于被牺牲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少数知识分子出来创办实验区，当然看不见效果，并且要遭受人之批评。记得去年有一位周调阳君来邹平参观，问我道：“实验区所耗费的钱，究竟所得能偿所失否？我去江南各处参观，听人批评乡村工作人员有蝗虫之讥，这事对否？”我就

回答他说：“假使别处乡村工作人员是蝗虫，那末我们这里的人未见得不是蝗虫。因为我们这里不会比人家好，每年也是要贴钱的。”这话好象问我是不是蝗虫？假使人家批评我是蝗虫，我也只好自己承认蝗虫。因为我们此刻确乎拿不出成绩来，也没有法子使它不赔钱。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总组织没有建立。在总组织没有建立的时候，实验区决不能见效。我在这里又可说一句话，将来总组织可包成功的，实验区将来可包赚钱的。

我们邹平原来并不是教育，是乡村建设实验。自从前年起又在那里实验县政建设。凡一切行政办事都在开始研究。但人家把我们的工作记载出来报告时，总说是教育。教育部召集教育会议时也要我们派代表出席。我们对于这个也不拒绝。人家既认我们是教育，我们也想大概这是教育吧。如果教育拿广义来解释，我们的工作确是教育的工作。不过拿定县、晓庄、及无锡来比，却有不同之处，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教育的。无论如何，用教育方法是很对的。将来实验区成功与否，就要〔看〕能否继续用教育方法。假使一旦实验区行政化了，工作人员公务员化了，那就毫无希望。因为行政机关是太机械化；不能有进步，不比教育界志愿下乡去办实验区，或者由社会运动团体为主动，有组织、有生气的。将来实验区愈办愈多，不问成败，到最后总有大联合的一天，那时总组织、总系统、总脑筋，就会建立起来。我相信各实验区就是为组织总脑筋的前线一战士。于是中国一切问题就可解决了。乡村运动的意义是在全部，不在局部，不在一个实验区。研究中国问题者应该知道，中国问题不在总上求总，而在分上求总。研究政治问题，不能即在政治上求解决，必须在他方面相关条件上求解决。总脑筋之建立必不出自政府，发动力是在社会。所以我们论效果之有无，不能

以目前的所见而定，势力之大小，亦不能以目前的局面而断为将来的局面。

《乡村建设》旬刊，4卷27期，

1935年5月21日。

《教育研究》，57期，

1935年。

## 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sup>〔1〕</sup>

余此次回广西，适值本省将有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之举，余既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爰本所见，指陈其异同关系及个人之希望如次：

（一）国民基础教育之普及，直接对于乡村民众有短期教育之实施，此当然于乡村建设予以一基础条件。

（二）国民基础学校合儿童教育成人教育一并办理，又“以学校为改造社会之中心，尤注重于民团训练与村（街）自治组织及合作运动等之推行”，并规定一基础学校教员除担任学校指导工作外，并须负责推动乡村建设事业”。此于邹平工作颇为相近，亦极见提倡乡村建设之旨。

（三）村基础学校校长以兼任民团后备队队长及村长为原则，又村乡基础学校均须设于村乡公所所在地，或校舍与公所合用，盖根据于所谓“三位一体”之说而来；此于邹平乡村组织亦觉相似，或为推进乡村建设之一助亦未可知。

以上皆就国民基础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相符顺之点言之，至其不同之点亦有可得而言者：

（四）乡村建设运动实为一种农民运动，或造端于农民运动者，要在启发农民自觉，促成农民组织，培起其自身力量，解

〔1〕 1935年2月13日在广西南宁的讲演。



决其自身问题（所不同于过去之农民运动者盖在不分化乡村而视乡村为整个的，不斗争破坏而合作建设，其理别详）。今国民基础教育似未着眼于此。

（五）乡村建设运动必始终保持其社会运动的立场，而不变为国家的或地方的一种行政，乃得完成使命。今国民基础教育以行政力量强迫施行，纯属一种行政，适觉相反。

（六）邹平之村学、乡学实为一村一乡之地方团体，此团体所结合者，盖以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为目标，故命曰村学乡学。所有自治自卫等工作皆齐心求进步中之一事，故自治组织自卫组织皆纳于此村学乡学中，无待别为建立，初无所谓三位，自然成为一体。今广西之三位一体实由牵合而成，且隐然以军事的或自卫的为主而其他二者从之，与邹平以文化的或教育的为主而其他二者从之者异。

以上言不同三点。至余个人之希望亦得约言之：

（七）余愿国民基础教育进程中，注意启发社会力量，务使各地方有心人士出而负担其地方教育及建设事业，庶乎一切工作不至机械化，有名无实，而稍得养成社会真实进步之机。

（八）余愿本省各地方有心人士热心参加国民基础教育工作，于国民基础学校普遍成立之时，得普遍地有一宣达社会痛痒之机关，俾政府之措施不致与社会痛痒隔阂，枉用气力，或发于善意而不得善果。

假使余（吾）人之希望于将来结果上得有几分实现，而不全虚，则今日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之举，正自〔有〕其不可轻视之意义也。

《乡村建设》旬刊，4卷18期，

1935年2月21日。

## 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sup>〔1〕</sup>

### ——中国工业化问题

今天想谈都市与乡村问题。前天潘一尘先生向我说：“胡适之先生来，要我们往都市去；梁先生来，要我们到乡村来。我们究竟该怎样呢？”那天我没有明确答复潘先生。其实问题不是这样子，乡村与都市不是相反的。大概胡先生及他的朋友于此都有一种误会，如《独立评论》载有吴景超先生及胡先生几位的文章，认为我们到乡村来的路子不对。他们几位的思想是感受西洋近代潮流，今日的美国是他们认为很好的世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近代工商业文明，是他们满意憧憬的东西。本来信仰什么主义，憧憬什么世界，含有个人“好尚”问题在内；个人好尚尽可自由。实用不着反对。不过他们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则为主观的梦想。我敢断定是做不到的事。我们如果不徒逞主观的偏见，而从经济问题客观事实上来平心静气研究中国将要有的出路时，可以看出胡先生他们这条路，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同样的，有人希望中国走另外一条路——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亦许国内倾向这条

---

〔1〕1935年2月14日在南宁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之讲演。李渊庭记录，经著者过目。

路的人还要多一点，比较更有势力)，如单从经济问题的立场来看，这条路实有十分的可能与必要；而胡先生他们的路则没有一分可能。无奈因为政治条件的不合，这条路则与胡先生他们的路，在中国同样的不可能。自然胡先生他们的路之不可能，还更进一层——在经济问题本身上即不可能；而后一条路则在政治上不可能。我们的乡村建设乃此二者之外的第三条路。

前年中国经济学社在青岛开第十届年会，我曾讲：《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特殊困难》（见本卷），说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政治条件之不具备，前后二条路都走不通。那时，我只点出问题，没有提出我们的路，希望大家考虑解决。我们的路——第三条路，是历史上的中国社会构造，经过了近百年的转变一定要有的。我们不是主张如此，而是事实将要如此。胡先生所憧憬的路，是由他个人的好尚而来；我们是对中国问题有客观的了解，却非主观的作梦。胡先生总以为我们倡导知识分子到乡村来的风气，是要人吃苦，勉强大家不享舒服；这是违背人性，或人性难堪的事。其实，我们那里是如此！我们实没有这种意思。这真是胡先生的误会。中国社会此时如果有舒服可享，我们何苦不去享受呢？我们倡导知识分子下乡推进乡村建设运动，全然不是从这些意思而来。我并且可以说：“中国民族的能否复兴再起，中国社会的能否繁荣进步，定规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工业化”。胡先生听了，定会觉得奇怪，以为这不是梁先生口里说出来的话罢！

所谓工业化，要在生产技术的进步。此于中国今日社会至为必要，无法否认拒绝。但如何工业化呢？这不能用哲学的口吻立论，须从事实上研究其如何能才行。于此，我们可以说：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我敢说这句话。我们

这话不是从主观要求说的，而是从客观事实研究出来的结论。预先存一些浮浅的思想来看问题，在我们是没有的。我们要知道：中国工业不是没有起来的问题（欧战期间有显著的抬头），而是起来之后又被摧残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此刻不是贫的问题，是不能富的问题，是贫而益贫的问题。你要睁开眼睛来看：中国工业近几年不如前几年，目前更不行！所有华商纱厂、丝厂、火柴业、面粉业……统统被压迫被摧残，呼喊救济，岌岌不可终日。中国银行近年来每年刊行一本报告，很有价值。于全国产业状况，进出口贸易，金融……有一总的调查报告，并有推论；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很好的参考材料。胡先生如果肯把中国银行报告读一遍，亦许不随便讲话了。

我们要谈工业须从两面看：一是资本问题，工业生产之要件是什么？一是市场问题，工业生产之出路在那儿？我们须知中国工业无在国外求市场的可能。我们的纱布、面粉、火柴……能输往国外销售吗？必无此事！这是因为国际间关税壁垒严森，我们的工业制品不但不能出去，并且人家不顾成本的厉行倾销，以我们为尾闾。事实上我们日用品不是统统用洋货吗？所以中国工业，只有在国内求市场了。国内市场是什么？当然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和寄托在农村上面的大小都市。试问现在农村经济破坏，一般购买力低落，工商业如何能单独发达起来？目前中国工业的衰退危岌不易维持，最有力的因子之一是农村破坏（自然不全如此，国际的严重压迫亦是有力的因子）。如不顾这点，而讲发达工业，繁荣都市，只是闭着眼睛说话！

更要知道：现在是中国整个社会向下沉沦，逐渐往崩溃里去。——农村崩溃是第一步，都市破坏是第二步。先前中国奢

侈品的工业还较好，现在亦不行了；天津上海各大都会都很萧条，没有买卖可作。上海银行家为什么注意农村，救济农村，投资农村呢？即全由农村破产，出入口贸易，一齐锐减，都市亦不了，所引起来的。本来金融流通全靠出入口贸易活动，土货由内地运到外埠出口（如华北由天津青岛出口之皮毛、花生米、鸡蛋、牛……西南由广州出口之桐油……），洋货由外埠入口运到内地。土货出去钱进来，洋货进来钱出去；有出有入，金融遂尔流通。这是平等的情形。近年来，内地农村加紧破坏，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农业生产不行，输出锐减；即使丰收，亦受种种障碍，输不出去。土货输出既不行，洋货输入自减低（近两年来的国际贸易无论出入口都大形减少，可为明证）。这样一来，金融那能不停滞起来！银行家那能不着急想办法来救济农村，扶植农村呢！前几年现金集中上海，充斥拥挤，于是信用过度膨胀（以二十一年为最）；而现在上海又发生现金缺乏的恐慌。这是内外交互影响，促使中国经济愈为枯窘。现在要想转移大势，只有从增加生产入手，才有办法。如单从金融货币想法，是不够的。我们现在为什么缺乏白银？这固然由于美国人为抬高银价，收买白银所致，而更要紧的是由于国际贸易的入超。<sup>〔1〕</sup>现在我们想救济入超，只有先从农业着手，工业实来不

---

〔1〕记者案：廿三年中国银行报告论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有云：“中国白银之流出，近因固由美国之购银，而远因仍根于国际支出之超过。……实则近年上海存银之增加，而中国各地输出入不能相抵，不得不以现洋输出相抵；积蓄于上海者不过洋商暂时存贮，藉图投资利益，无异输出国外之准备。故去年报关出口白银共二亿六千万元，而上海洋商银行存底减二亿二千一百万元，天津洋商银行存底减四千一百万元，此二亿六千二百余万元，即二三年来全国各地抵付进口之代价，而入于洋商银行之手。今见有利可图，并谋资本安全起见，一举而运至国外。是白银流出之远因，仍不能不归结于连年入超之差额，彰彰明甚矣。”可作参证。

及啊！

工业与农业有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工业竞争性大，农业则较和缓。我们用土法种地，比较可以立足；而用土法开工厂，是完全不行的。现在中国农业工业虽同受国际的打击压迫，可是农业方面，尚可喘息；而工业则最为紧迫，即因工业竞争性激烈的缘故。再则工业生产的重要条件是资本、机器，适为我们所最缺；而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为土地，这在我们是现成的。我们的目的可以是振兴中国的工业，却要紧的，眼前用力须在农业。在第一是因为工业后进国照例必以农产出口，换回机器，而后工业可兴；第二是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上目前急须喘气，增加农业生产是可能的，马上于工业上想办法实无可能。我们分析中国每年的入口货，农产品实占半数，米、麦、棉、糖、面粉，统统有大量的入口。这些不是我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还让他大量的入口呢？中国一向依为出口大宗的是农产，现在居入口大宗的又是农产；而我们于农业原有很厚的根基，则眼前抵补挽救之道只有在农业上先想办法。讲求丝茶改良以增出口，增加米麦棉……的生产以抵制外货，实是最可能的事。我们于此稍作工夫，即有效果。例如近年大家提倡推广最宜于纺细纱的长绒棉，据蒋迪先先生说：中华棉业统计会估计去年较前年增加棉田四百三十五万三千五百五十六亩，（见《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12期）所产的多半是长绒棉。即以邹平而论，去年共产长绒棉数千包，卖给青岛华兴纱厂，代替美棉却较美棉便宜。大家稍一用力，风气开动，其效立见。中国纱厂的痛苦，是在花贵纱贱，因为纺细纱须用美棉，而美棉很贵，遂有此现象。我们如果再加努力，增加本国长绒棉的生产，即可不用美棉，减少纱厂的痛苦。再如米的输入问题，自增加洋米入

口税之后，已见好转。所以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开发中国产业，不存成见心中空洞的人，定规要从农业入手。农业生产增加，农民购买力增加，工业才可兴起。二十二年中国银行报告，根据事实指明：纱厂面粉厂设在内地者容易立足，设在通商口岸者不好维持。盖一则接近原料生产地及市场（内地农村），一则恰好相反，遂尔如此也。于此，可以证明中国工业完全要靠农村一点。不过这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将来中国是要农业工业结合的，生产辗转递增，——在农业由恢复而前进程中，农民购买力增加，许多工业乃因需要刺激而兴起。中国工业，只有站在非营利的立场，以我们自己的原料劳力来行生产，而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大范围的自给自足），成为一种乡村工业，才能立足。从上边所举内地工厂容易维持这一点，完全证实我们这种理想的可能。（邹平现在正拟作坐于原有棉业合作社之上经营纱厂的实验）

这个问题，非短时间内所可讲明。简言之：中国根干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可是如走近代都市文明资本主义营利的路，片面地发达工商业，农业定规要被摧残，因为农业不是发财的好道，在资本主义之下，农业天然要受抑压而工业畸形发达（这亦是我们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路的缘故）。我们不能象日本已经撞过这一关，工商业起来，可以回头来救济农村，而是不容再破坏农村，再抑压农业。所以此刻我们唯有到乡村来。救济乡村，亦即救济都市；如往都市去，不但于乡村无好处，于都市亦无好处。——路线恰好如此！

《乡村建设》旬刊，4卷28期，

1935年6月1日。

## 促兴农业的办法<sup>〔1〕</sup>

我们在先已讲：从经济上着眼来看，欲解决中国问题，必先发达产业，而中国产业之发达，又非从农业入手不可，那末，我们现在就要讲到促兴农业的办法了。所谓促兴农业，此话怎讲？我们要什么样的一个农业？促兴农业的办法又是怎样？我们可以用两句话回答：第一句话，即是要讲农业上多量的采用人类最进步的知识、技术、器具。换言之，即尽量地利用科学，而利用科学，亦就是在农业上采用工业的方法；不特在技术上，即经营形态，管理方法上，也要采用；将世界上已有的好的办法尽量地采用过来，则农业自可渐进于发展矣。第二句话，就是使农业社会化。我们的目的是要一切事的进步都要做到社会化，农业工业都须如此。唯工业生产地域较小，而农业则需要受大自然的影响，因农业生产多靠天然出产的原料，故须因地制宜。某地如有特殊的天然产物，则因而利用之，令其极力发展，将其产品供给社会。如某地特产棉花，则尽量地作大规模生产，以备社会之用。要利用最进步的种种方法以圆满自然的可能与合适，能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某一块地方能作何用即作何用，不要有人为的阻碍，不要加以限制。要依分业分工的

---

〔1〕此讲话刊出时间为1935年3月。《乡村建设》(旬刊)在刊出“编后记”中说：“不知何时所讲”，但“无疑地是过去几年的讲词”。——编者



精神，而着眼于大处远处以发达特产；不要只顾自利自便以行其小范围的自给自足的生产，要将劳力资本凑到一块，同去生产，将产品供给大家使用；此即所谓社会生产。但是我们在先不是已讲过，农业与工业不同，是不易走到社会化的吗？不错，是如此的。在个人资本主义之下固以土地私有、工资、劳动、营利等关系，根本已使农业不得发达，不易走到社会化，但是如果开出农业路让大家去走，推翻工业资本主义的路而去发展农业，农业发达则亦自然慢慢的走到社会化了。

共产主义者是期望产业的社会化，要从生产已经社会化的国家，更进一步作到分配亦要社会化，将生产的结果为社会所公有公享。但第一步生产如果不能社会化时，则第二步分配亦决难作到社会化。所以他们的第一条件是：先谋生产社会化，这与我们的目的略同，故可参考他们对于农业社会化是持什么办法：

（一）社会主义者对农业社会化的办法。我参考的是《农民问题研究》，这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此书所介绍的都是经济学家的意见，内有恩格斯、列宁、考茨基等对于农业社会化的办法。他们主张虽略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一样的。以恩格斯的意见，在共产党握有政权后的农民政策，应对小农宣言：“我们对于小农第一须把私人的经营和私人的所有，诱导到协同合作方面去。不过要达到这目的，需要做出必要的实例，来给他们看。并且供给他们以社会的援助，决不可施行强制”。这话就可以把许多人的意见和办法包括无余。列宁都不外乎这个意思。故不再赘述。但这是他们的主张。至于农业社会化的实例，我们亦可举出几个来证明参考。

（二）苏俄农业社会化。关于土地问题，列宁原主张完全收

归国有，但以后在实践上行不通，又在宪法第五条上规定“对自耕土地不没收”。这话即等于说：“我虽希望农业社会化但不强行农业社会化。”那末，他既已希望农业社会化，而又不愿强行，其办法究竟如何呢？，曰其办法有三：（1）农业合作社，（2）农业公社，（3）苏维埃政府直接经营地。农业合作社是把许多自耕农劝他们合到一块，土地仍私有而合作耕种，以组成农业合作社。农业公社则又进一步，土地合而为一，永不再分，大家成为一个自治团体。土地为自治团体所公有，由自治团体来经营。现在的苏维埃直接经营地，是政府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或财产，分配给无产农民去耕种，采用新技术，利用新机械，完全用国家力量去经营，以作农民的模范，好似模范农场一样。以上几个办法，皆是举出实例给农民看，让农民认识了协同合作的必要，然后走进第一步的合作社，渐进到第二步的农业公社。但农业公社的弱点，又在不私个人而私团体，故仍须诱导他们再走到第三步为直接经营地，以完成共产党最后的期望。由此看来，共产党所用的是一种软法。试问他们为何不强行农业社会化呢？此乃看重“自然”之故。一切事情皆须依自然的路而进行，如工业上因资本集中，作大规模生产而有社会化的自然趋势；在土地上因土地私有，许多小农各自保守自己小块的土地，自种自吃，永无走向社会化的趋势。换言之：工业走吞并的路、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结果即到达社会化，农业上则大地主不能吞并小地主，谁也不能吞并谁，故非待他自动的愿意合并到一起不可。如果强行要他们合并，而他们并不觉得必要，则势必招致大多数农民的反反对，所以必须先摆上实例给他们看，使他们渐渐觉得协同合作的必要性，则自然就可以合并到一块去。俄国共产党即认识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的办法要农民先走到

农业合作化，再走农业公社化，再更进于直接经营地，到最后的期望是要农业社会化；可是现在还没有作到。现在已经彻底的作到农业社会化的国家，要算丹麦。

（三）农业社会化的丹麦。丹麦的地势本不很好，气候差，土地硗薄，北来的海风更是有害于他们的农作物。故在先他们的产业本以畜牧为主，但因气候关系，畜牧亦不繁盛。例如牧牛、养鸡不能在外面，须在屋内以避寒风之侵袭。俟后他们就利用科学方法征服自然、牧畜乃大为发达，鸡蛋牛肉为其大宗出产，富如美国尚需赖其供给。且以新技术新机械的采用，农业亦发展起来，遂将半岛小国变为极其富庶的国家。比之英国富力犹且过之，这固然是因为他采用新科学，而尤要者乃其协同合作之力量。且因合作结果，不特生产做到社会化，即分配亦做到社会化，此又更进一层。生产既富，分配亦均，此乃真正的人类文明也。丹麦只有一地方堪称都市，其余尽是些农村，即此亦可见其产业发达之平均矣。

由俄国及丹麦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原则：即在工业上生产与分配的问题，可以先后两步来解决；而农业则可以同时解决。此因工业是走吞并的路，小资本渐归消灭，大资本更为偏重的增加，造成畸形社会，此时生产容易社会化，而分配则决难平均。农业是走合作的路，合作社的股东是平等的，加入合作社的社员不论其加入时所入的土地多少，皆一律平等，故以此合作社为根基以发达产业，则生产分配问题可同时解决。

（四）工业国家救济农村的办法。工业国家在极力发展工业之下，农村就要凋落，不能不去管他，所以他们于工业发达之后，即回头去救济他们的农村。他们所用的救济方法是什么？仍不过促进农业的合作耳。

故就大体上说，想要真的发展农业促进农业社会化，则只有此协同合作之一途；现在已无容迟疑。至于我们促兴农业走那条路？——走俄国路？丹麦路？抑工业国家救济农村那条路呢？最好现在且不必计较打算，只有向着协同合作的路走去，走到哪里合适，便在那里好了。

(五) 中国促兴农业的可能性。就中国的情形说，促兴农业很有可能性，这是我的特殊见解。在一般人以为欲谋中国产业之进展，则有一很大的困难，即不平等条约束缚压迫我们，致令我们没有发展产业的余地；故要产业发展，须赖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先能除此束缚才行。而在现在的中国政府又不能作到这一步，虽有废约运动，只是表面虚文，毫无效果。不平等条约不能解除，中国产业亦将永不得发展矣。这只是一般人的浅见。我们认为不平等条约之于工业自然是一莫大困难，但在农业上却因此得到了便利，不平等的条约几乎成了发达农业的保障。此话怎讲？盖因如没有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则我们的工业自然要发达，工业发达则劳力资本集中于都市，农村受到压迫，农业无发展可能，所以说不平等条约成了农业的掩护者。且发达产业最要紧的是要有资本，今因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发达工业的路已被拆断，资本家不得投资工业，所以把钱都屯集到都市。如果我们能开出一条农业路，让他们投资农业，则他们因投资生产事业，所获得的利息，比屯集在都市只以钱生钱的利息要多，那么他们自然乐意投资农业。趁此机会把过剩劳力、现成土地，都用来发展农业，农业即可乘机而兴。我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上关于此理，言之颇详，兹录于下：

“吾以在欧人经济侵略下，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故海通以来，既八十年而企业卒莫兴，几于致我死命；然资本

主义之潮流亦幸以此障蔽，而获免焉。工业资本之畸形既未成，则无事推翻改造之烦，是不为大便宜乎？及今环境压迫，工业图兴之机犹绝不可见，而农业以其竞争比较之不易见也，则较为能逃于此压迫，而吾图兴农业，求免于工业抑压之厄，乃正资其掩护以进行焉。夫我国固无资本可言，其犹有些许资金，则唯在军阀官僚商人买办之手，是皆敲剥于农村而屯之都市租界银行者，其借交易买卖由利以孳利者多有之；至于投资于生产事业，农业工业，盖两无所可。此时大计，唯在因势导之以回返流入农村，集于新款式农业之开发一途。窃尝计之；使吾能一面萃力于农业改良试验，以新式农业介绍于农民；一面训练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设立农民银行，吸收都市资金而转输于农村，则三者连环为用。新式农业非合作而贷款莫举；合作非新式农业之明效与银行贷款之利莫由促进；而银行之出贷也，非有新式农业之介绍莫能必其用于生产之途，非有合作组织莫能必其信用保证。苟所介绍于农民者其效不虚，则新式农业必由是促进，合作组织必由是而促进，银行之吸收而转输必畅遂成功，一转移间，全局皆活，而农业社会化于焉可望。”

我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看法，自己另有一个意思，不与一般人相同。从种种观点上很清楚的知道，不平等条约堵塞了我们发达工业的机会，使我们没法跟着西洋走资本主义路，成功一工业化国家，这是一件很可庆幸的事；并且他同时还作了我们发展农业的保障，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有一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关于这个道理，我们读了上面旨趣书的一段文章，更可亲切的明白了。

自西洋文化侵入中国已数十年之久，中国社会已受其影响而改变了旧政治制〔度〕。社会用品等变化不算不利害。但变则变矣，而只是变其皮毛，并没有根本普遍的改变。其所以能够如此者，即因我们的经济组织未曾改变故也。因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的经济组织不能随西洋而资本主义化、工业化；经济组织既未变，故其变亦只是表面的变化，而非根本的变化也。若经济组织一变，则中国亦将根本大变，若然，则更糟糕了。如中国亦走工业路，随西洋而资本主义化，则工商业的流弊加到自己身上，此一定更甚于西洋。因中国的旧文化已有许多流弊，自己是一个衰老民族，不如西洋人之活泼。西洋走工商业路尚有许多流弊，今姑假定其流弊已达六七成，若中国亦走工商业路，其流弊比西洋还要几倍；以自己固有的毛病再加上外来的流弊，其坏将不堪设想矣；例如上海在世界所有商埠中，未有及其糟糕之甚者。以上是从文化上着眼来说，现在再从经济上着眼来说，则欲谋农村的复兴，非推翻工业资本主义路不可，因工业资本主义路是畸形的社会，足以把开发农村的路子杜绝塞断，让社会上永无发展农业的形势。故欲要农村复兴，必先推翻工业资本主义，让社会上渐渐感觉到开发农业的必要。社会形势已演进到这一步，资本、劳力、技术人材都已渐渐的流布分配到农村，而后农业才发展，农村才能复兴。此时社会的经济组织才是自然的，合理的。所以要想合理，必先推翻不合理的畸形社会。幸中国因有不平等条约的掩护，工业资本主义的畸形社会没能成功，无事推翻改造之烦，农业路亦〔未〕被杜塞，尚有促兴开发之机，此皆为不平等条约之赐也。

我认定生产事业中之能够兴发而有活动气象者，全靠资本之投入而后可。我又认定中国此刻一则有外边的不平等条约的

束缚，一则有内地秩序的不安，故一般资本家都非常胆小，不敢投资于生产事业，即想投资而亦无处可投；所以把钱都存入外国银行，只是钱上生钱，长点小利息。但这卖空买空不甚稳当，故不若投资生产事业，由卖出生产品而得到利润见利多，而且稳当。他们非不敢如此！只以中国工业路已被杜塞，农业路尚未开出，既无生产事业可投其资，故降而以求小利，实不得已也。如果我们能开出一条农业路，则资本家必定高兴向其投资；农业有了资本，则易于开发矣。

(六) 我们促兴农业的办法。关于促兴农业的办法，我曾在河南村治学院讲过一次，现在再把它简略的说说，我们促兴农业的办法有三：

(1) 改良农业试验推广机关；介绍农业上新技术新机械，种种新科学的利用，和经营管理种种新方法的采用，并将此机关有计划有系统的置设到各处。

(2) 乡治讲习所：培养训练指导经营合作的人材。

(3) 农民银行：吸收都市资本转输于农村。

要想让农民采用新技术新机械，是很难的。你即有好的办法，若骤然介绍给他们是不容易接受的。想要他们接受须注意三个要素：甲、心理的要素，乙、资本，丙，合作。想要农民接受介绍给他的办法，必先提醒他们，故心理要素是很重要的。要他采用新技术新机械，必先鼓动起他们要想尝试采用的〔勇〕气来。此工作即须靠乡治讲习所的学生去做，去鼓动农民试用新技术新机械的冲动。再则徒有此试用冲动亦无益于实际，故必有资本以购买新机械。但农业上的事情有非单独所能办者，必靠合作去办方可，必须诱导他们使其都愿意凑到一块去合作，如此农业才能发展。

刻下中国问题是在有地无人耕，人材无处用，资本无处投。若照以上所说的办法而能实现，则土地、人材、资本都有了办法。农业得到进展，农民收获丰富，借贷一定可以按期归还，农民银行才敢贷款给他。当贷款时又由合作社的担保，知道一定用到生产事业上，投资一定可以再收回来，利息亦可收足，故农民银行定能发达，资本家亦可得到较厚利息，自然愿意再投资。如此则吸收了都市屯集着的大宗款项，流到农村，且非资本家直接投资；须由资本家交农民银行，农民银行转交合作社，合作社再转交农民，这样又可得到平均的发展，不致有个人资本主义之出现。农民既有了资本，技术人材又都流布分配到农村，则农业更要大为发展。农业上进一步，合作社亦随着进一步；合作社进一步，农民银行亦随着进一步，三者连环为用，转移之间，全局皆活。

如果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工业也就可以跟着开发出来，因为农业进步则农民富裕，其消费自然增多；且农民购买力一大，已是现成的市场，不必另外去找，故工业即可随之而兴，如农具之制造，农产品之装制等，大家有了需要后，即由合作社联合会设工厂，以应此需要。这不同于西洋工业全以营利为目的，尽作盲目的生产，以致生产过剩，造成恐慌现象。我们的工业是由需要而再生产，且由合作社来办，又不致为个人所垄断。个人资本主义之种种流弊于此皆可免除，实一无上妙法也。

《乡村建设》旬刊，4卷19—21期合刊，

1935年3月21日。



## 广西见闻杂谈<sup>〔1〕</sup>

我原是1月21日离开本院到南方去的，至昨天（3月21日）午后回到院里，整整地两个月。院中同人同学大家都想知道我此次南行的见闻，为节省时间起见，不作个别谈话，所以集大家来此拉杂地谈谈。不过我所谈的也许有误解人家的地方，也许有记不清的地方，如有错误尚祈各方原谅。这是要特地声明的。

在这两个月中整有一个月是在广西，其余一个月耽搁在来往的路途上。所到的重要地点有南京、上海、广州、南宁四处。最主要的是南宁，因为南宁是广西省会，并且我在南宁也比较地住的久。至于梧州，柳州，桂林，武鸣也都走到，不过日子很短。此次到南方是去看看我故乡的情形，因为我原籍是广西，广西常常要我回去做事，但是我不能回去。后来他们说既是广西人，连回来看看都不肯吗？这样的说，我就不得不回去了。原来在广西不预备久留。他们又说，你真的来看看就走吗？连住两天也不可以吗？！这样一来，便耽搁一些时日了。

现在说一说广西情形。广西情形外边都很注意，因为他们很振作地干。从表面上容易看到的广西的好处，就是地方治安

---

〔1〕1935年3月23日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演。罗子为、李激记录，未经作者过目。

好，和交通便利。我听他们说，从前广西俗话说：“广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确广西山是很多，山中有洞，洞中容易藏匪，大概是实在的。清末广西就多匪，那时陆荣廷在广西做提督，后来他反正归附民国。陆氏本是土匪出身，但他执政的时候地方治安的情形据说要比从前好些，及至他倒台之后，十二三年的时候，据说广西非常之乱。可是到了现在，广西的治安，在全国各省中比较是好的。至于交通亦很发达。本来广西山多，交通不大便利；虽有水道，但大半到秋冬之季水线不易通航。现在建筑很多汽车路，真是四通八达。路也建筑得很坚固；土质红硬，上铺小石，所以不大怕落雨，不象山东汽车路，雨一下大就不能开。广西雨水较多。我在广西一月中很少见有北方这样的晴天，但是汽车还是开行不停的。当然有时雨下的太大，山水也会冲坏路，但这不能算是路修得不好。就大体说，广西政府的精神是不错的。比如当我到南宁时，雷厅长李委员出郊外接我，都是穿灰布短制服，仿佛工人一样。广西所有公务人员都著灰布短制服，布鞋；上自总司令，下至汽车夫都是一样。也没有徽章，只在帽花上有点分别。帽色是一律的，公务人员的帽花上有“政”字，学界帽花上有一“学”字，工人有帽花无字。服装虽是小事，也可见出来他们的精神。我在南宁街上很少看见穿洋服的，即有也是外来的；穿绸缎的更少了。绸缎店也有几家，但生意很小。至于政府很节俭，薪俸开支很少，各公务人员的薪俸约相当于山东三分之一，主席、厅长的薪水也都是很薄。此外由一件小事也以看出他们的节俭精神；如汽车在南京各机关就很多，耗费太大，而广西省政府只有汽车八辆。他们是合署办公，只有一个总庶务股；汽车交由总庶务股保管，无论是主席、厅长，抑是其他人员，有公事需

用汽车时，必须向庶务股领用，不能随便占有。这样很省，很可见出其有办法的样子。这虽是小事，亦可想见他们的精神。

广西省政府人员都是很勤劳地埋头的在做事。政府领袖都肯用心。比如他们要我们讲演，有四次是省党部大礼堂，总司令及军政人员都来出席听讲；有时坐着听，有时站着听，似乎对于问题很用心考究。关于教育及经济等问题都用心探讨。大体上说他们是很具有勤苦的精神的。他们这种勤苦精神之所以由来，在我分析，大概不外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广西省份太小太苦的关系，——这里所谓小不是指面积说，乃是指人口而言；比如广西全省只有一千二百多万人口。小而苦，事情就比较好办。俗话说：“家贫出孝子。”广西好象是个小而且穷的家庭，不得不耐苦过日子。再则就是广西几个领袖；广西的领袖即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先生——的确很好，都愿意往好里去做。尤其好的，是他们能够合作。因为合作才能做事，勤苦精神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不和，就不行了。

广西现在正在进行建设，拟有广西建设纲领一篇；他们在建设方面都是根据这纲领去进行。

大家都知道广西现正很努力从事民团的训练。可是我对民团不很清楚，因为我在广西除走路之外，大半天都用在讲演方面。关于民团的印刷品，他们原送了我一些；可惜尚未寄到，无从参考。所以我只能大概的说一说。广西民团与军队简直分不出来；不过民团只训练六个月，完毕之后，仍然回家。此种训练全省都实行，非偏重于某一隅。全省共有八个民团区，每区设有团指挥部，由一指挥官指挥一切，下设参谋政训等处。训练民团的经费，每年约三百万元。还有学生军事训练，据说每年三十多万元。学生军事训练，也很认真；学生军事训练是在

养成民团的领袖人才，所以他们有两个标语：“寓兵于团，寓将于学”。高初中学生军事训练的时期都是六个月，与民团一样都集中在指挥部所在处，总部派军官训练。生活与兵士完全一样。广西兵都是光着脚穿草鞋的；学生亦是如此。至于调动行军也都是如兵一样，背枪荷弹，带着水壶。这种训练在他们名之为军训大队。南宁这一区的军训大队我看了一下，每队约有五百人，至于课程较民团训练要高。除军训大队之外，还有一种干训大队，征集村乡长以及村中领袖集中训练；其目的是在培养民团干部人才。训练后回乡做小学校长、村长及队长。关于干训大队，我曾到武鸣去仔细看了一下。民团指挥部特设有农场、畜牧场，以与干训联络。但这究竟能给与人民多少的好处且不敢说。不过在广西有一很大的家畜保育所，主要工作是制造血清及研究家畜病理，以防瘟疫；因为广西每年有很多牛猪往外输出，如发生瘟疫于民间损失很大，所以引起政府的注意，花二十五万元来办这家畜保育所。我们知道预防畜瘟是很困难的，因为很难使人民相信；至于如何才能使人民相信是很值得注意讲究的。广西能使民团领袖于受训练时注意此事，至少可以有一种宣传作用，由他们去介绍给一般民众，也许于此种工作的进行有所帮助。

广西除了民团训练之外，现在正在进行国民基础教育，也是如民团一样的想普遍的实行。这是一种短期的简易的教育，全省儿童成人都得受此种教育。仿佛记得是这样的规定：八足岁到十足岁须受两年国民基础教育，十足岁至十六足岁受一年教育，十六足岁以上一律受半年教育，从分量上说使之所得知识相等，至于课程是稍有所差别的。省府创办一所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我在广西即住在那院里。我在那里讲演的时候多，计

有十多次，院长系雷宾南厅长自兼，他对这件事非常热心。雷厅长之为人，我很佩服他！他有很大的勇气与耐烦，一天忙到晚，夜以继日，比我在邹平还要忙。早上起得很早，天天都参加研究院的朝会，夜晚睡得很迟，这样固然未必能增进工作效率，并且于精神也不好，但是这种耐劳的精神是很了不得。什么辛苦他都受得了，吃饭也不讲究。人非常的好，他很想完成国民基础教育这种办法。他以为国民基础教育就是乡村建设；如村有村国民基础教育委员会，乡有乡国民基础教育委员会，在各委员会亦很注意社会改进以及农业合作等。在我看国民基础教育只是一种识字教育工作，对于乡村建设之所谓推动社会，组织乡村，恐怕是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我曾向广西当局说，如欲进行国民基础教育必将广西农政与之联锁起来，同时并进才行。黄主席似乎很注意这话。当我向黄主席辞行时，他要我谈谈农业与工业的问题，因而又谈到农政问题；当时他也似乎很觉得是重要，将来进行如何那就不敢说了。现在广西对于农业与合作二者都没有十分作，似乎也没有多大注意，在我认为至少是个缺憾；我希望他们能将农政与国民基础教育连起来才好。

再来谈谈广西经济建设情形。广西很穷苦，他没有建设厅，有一经济建设委员会，下分农林，工商，统计，道路，土地等局以及气象观察所等。经济建设委员会聘请许多专门人才充作委员，薪俸较公务人员为优，其中也有兼任局长或主任等职的。广西农林局开办不久，规模尚小，所以功效尚未可见。听说柳州有一个农业试验所还不错，可以补农林局的不足；可惜我没时间去看。工商局之下设不少机关，如糖厂、酒精厂、机械厂等等。经济建设在我看还是不够。但是他有一个与经济有关系的统计局，办的很不错。他能把广西经济问题切实地表示出来。

如关于生产方面的情形，出口货从生产地方到消费的地方以及中间的经过多少商人以及运输上的过程手段，都有很详细的调查；这于生产改进很有关系。再则对于金融涨落的情形，无论内地外埠每天都有很正确的记录。入口出口情形都可看出来。统计局有调查队到各处去调查。如农村经济调查，土地的度量标准一事，很成问题。起初他们不知道广西田地的大小有很复杂的标准，后来他们发现有二十多个；现在他们已经将很复杂的二十多标准找出其共同的比例了，这于调查时极有帮助。由此可见他们所作的工夫很不差。

关于广西的话现在总结起来说，大概广西要好的心是很有；不过环境很困难。一是经济物质上的困难，即广西的穷苦；一是在经济以外的困难，即政局上的困难很感觉难于应付。至于将来的转移如何，那就不是现在所能知道的了。

《乡村建设》旬刊，4卷25期，

1935年5月1日。

## 广西省之新建设<sup>〔1〕</sup>

各位同仁：兄弟自1月20日向主席请假，回桂林原籍省亲。3月19日返回济南，算来正巧两个月。在济向主席报告之后，主席叫我向大家报告两广的大概。兄弟回广西，说不到是考察，因为兄弟是广西人，广西当局，均以同乡待我。自民国二十年广西政局改变后，李（宗仁）白（崇禧）二先生常有函电致兄弟，约兄弟回省作事，兄弟因种种原因，未得回去，以后又来函电，谓不回去作事，也该回去看看，实在不能再推辞，遂趁阴历过年，比较闲暇，回籍一看。现在蒋委员长，令江西省政府各厅处，组织粤桂考查团，可见各方对于两广，已甚注意。此行亦绝非无意义。总计在广西一个月，现在向大家报告两广情形，亦以广西为主。

先说赴两广之路线：由北方往广西，普通走法，先由海道到上海，再坐海船到香港、广州、换船到梧州，从梧州再坐船到内部各地去。现在广西公路很发达，如不坐船，可由梧州换长途汽车。这是普通的走法。现在航空航线开辟，坐飞机去的人也很多。假如从北平去，乘平粤线飞机，从北平经过郑州，汉口，长沙，广州，再换乘广龙线飞机，从广州到龙州，从龙州可坐船或汽车到广西各地去。兄弟去时，系先到上海，坐船到

〔1〕1935年3月在山东省政府纪念周讲话。

广州，再到梧州，由梧州换乘汽车到南宁。返途系由龙州飞至广州，然后搭船回来。从龙州到广州，坐船或乘车须四天，飞机则只须四五小时。这是由北方去两广的两个走法。

两广占我国版图之西南。一般情形，多有与北方中原不同者，不论地质、土壤、天时、气候，多不相同。简单说就是天暖多雨。兄弟到南宁时，是正月初二日，穿夹衣还觉热，回济来已是深春，仍这般冷。再说雨量之多，兄弟到广西整住了一月，象今天这样光亮无云的天气，只遇见一天。在一月之内，有时见太阳、有时阴云的有七八天，有二十天以上是完全不见太阳。据广西近几十年之统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内，有一百三十天是下雨，就是三天中定有一天下雨；雨量之多，于此可见。因天暖多雨，自然界之景象与北方亦大不相同，长年草木繁荣，绿水青山，景色润秀，比北方干枯景色大不相同，所以民风、社俗亦自两样。

两广相比，亦很有差别。大体上说，广东是富，广西是穷。广东出产既多，与外国接触亦最早。广东比别省更工商业化，在外之华侨最多，亦系最大富源。广东人经商能力最大，我们在各地都可见到广东商人，所以广东很富。广西则不同，在各地很难逢见广西商人，不但如此，即广西本省商业，亦握于广东人之手。广西最重要之商业地在梧州，而梧州商会之主席委员等全是广东人，可见广西人在经商上远不如广东人。物产既少，交通又不便，故在国外经商之华侨亦绝少。最近南洋群岛东印度等地，始渐有广西商人代替广东商之事。前清时广西亦为受协省份，即本省收入不够支配，须受别省协助，其穷苦可知。

现在兄弟单说说广西的情形。兄弟在广西到的地方不多，但重要地方已皆到过。广西有四处最重要；一，南宁，现在的省



会；二，桂林，以前省会，民国二年迁移；三，梧州，入广西的要道；四，柳州，现为建设中心区。除以上四处都到过，另外又到几处小地方看看。所抱愧的是，这次见到的实在很少很浅。在广西一月在内，演讲达三十次以上，到处有人招待，要求讲演，行动不自由，时间被侵占，所以所见的很少很浅，须预先声明的。广西最易看出的有两点，是治安与交通。广西素以多山多匪著名，有句老话，“无地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其匪多由此可见。广西在历史上经过多次大的匪乱，最近的说，一次在光绪末年，政府曾以三年力量平匪乱；一次在民国十一二年到十三四年，当时广西军事领袖陆荣廷势倒时匪乱最烈。太平天国之人物，多系广西人。陆荣廷亦系绿林出身，在广西十几年，一旦势倒，全省皆匪，当时匪乱厉害之极，全省呈混乱状态，以多匪最乱之广西，现在成为国内第一个太平地方，当局之造福地方，功绩确乎不小。治安之好，与交通甚有关系，交通好，治安才易维持，所以交通与治安，有联带关系。

底下我分两点来讲，一，道路，二，民团。全省道路之总管理机关为道路局，属于省政府经济委员会。广西无建设厅，建设事件归经委会办理。经委会下设许多局所。现在全省公路四通八达，有一部份县，全县内亦四通八达，详细数目记不确，但近年所修公路不少，于此可见。广西无深大之河流，仅有可通小船者，春秋水浅时船亦不易行，故只由陆地设法，铁路工程太大，不易修筑，广西全省现尚无一里铁路，故只有开辟公路，通行汽车。广西之建设，可分两个时期，一为民十六七年，黄绍竑伍廷颺当政时，建树甚多；一为民二十以后，李白当政，对建设颇为努力，所修公路，量上可谓不少，质的方面，大体上可谓粗糙，因其用钱不多，复(?)工不大，尤其多无桥梁。广

西多山，河涧亦多，皆未修桥，汽车系用船摆渡，从柳州到桂林，五百余里，渡河七次，时间颇不经济。或以为路既不好，用途亦当不大；不然，山东汽车路，下雨即不能行，广西雨多，却不碍行车，大概广西土硬，又多山石，除大雨冲毁路基外，绝不碍汽车通行。广西公路之土色，亦与本省不同，满山野之青绿中，一条红线，即系公路。所以路虽粗糙，于交通却很便利。再本省汽车路不准大车通行。广西无大车，现政府正提倡造车，并布告可在公路上通行，或者广西路面不怕压，亦与山东情形不同者。

广西之民团，久已闻名，全省壮年，皆须受军训，办理极认真，期限为半年。服装生活与军队一般无二，不论士农工商公务员等，以至厅长主席，凡未受过军训者一律受训。据说四十五岁以上者可免。现广西之教育厅长虽已过四十五，但自愿受训，现正在训练中。全省民团分八区，每区设民团指挥部，每县以县长为司令，全年为训练民团，所费达三百万至四百万，因此广西军队减少，而民众武力增加。他们的口号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广西现有军队十六团，连独立营特种兵等不过十七团，统共人数不满二万，治安防务全靠民团。而训练学生作将来之将才，初中高中学生各受军训半年，训练时不在学校，分别集中于各指挥区，由总司令部派教官教练，生活服装等与军队一样，皆赤足草鞋。在南宁时，适逢防空演习，假设敌机从广州、柳州飞来袭击，南宁加以防御。吾人见武鸣一军训大队之学生，〔赴〕南宁参加，一百二十里远，背全副武装步行，与军队无二，故曰寓将于学。初中时受军训半年，可作下级军官；高中再受半年，更可成为干部。

从训练认真，编制严密，可见出广西情形不是一二人努力，

而是大家一齐动手，勤苦精神，贯彻到底。兄弟到乡下区公所、乡公所、村公所查看，其中编制极佳，一区包括几乡，一乡包括几村，每村有多少人口，多少壮年，已受军训者多少，未受军训者多少，极其清楚。勤苦情形，上下如一，全体官民，一律布服短装，军队系深灰色，其他人员全为浅灰色，上至省府主席，下至勤务工人以及学生教员等，一律无异，其识别则在帽章，从政者有一“政”字，在学者有一“学”字，工人等则无字。广西省府早已合署办公，设有民、财、教三厅及经济委员会，各厅无庶务会计，省府设有总务处，处理各厅事务。未至广西者，或以南宁为一省省会，总有相当繁荣，但事实正相反，南宁全市无一私用汽车，仅省府有公用汽车十辆上下，但不一定为谁用，由庶务处调动，有事向庶务处领用。营业汽车则绝无，洋车只有二辆，故市内交通，除坐公共汽车外只有步行。南宁所见之人几全为灰布短装，着便衣者极少，西装更少；有则系自外省来者。广西政治最高机关为党政军联席会议。种种建设措施，以全部“建设纲领”为根据。其他县治、吏治、自治，办理并不算好。现有之县份，大小有相差十倍以上者。县长多半本县人。尤多军人。

广西之中等教育并不算好，极待改造。现在大批制造初中学生，毕业后缺少出路。现教育当局已觉出此种错误，已拟定改造方法，正在将实行而尚未实行之时。此办法即强制施行国民基础教育，凡八岁以上儿童以及成人，均须受此基础教育，强制普及，期间约系八岁至十岁者为二年，十六岁以下者为一年，十六岁以上及成人为半年，其教材分量完全一样，因其年纪不一，受教育之能力亦不同，而定其时间为二年，一年，半年。现广西之教育当局即正努力于此国民之基础教育之普及，但结果

如何，尚不敢保。余曾向其当局建议，使教育与经济建设沟通，推进一切农政问题，如此合作，或将有好的结果。

广西之经济建设，由经济委员会主持，会以下设各局所，其中以统计局成绩最好，其工作为余所见之别省所不及，此种工作，能补助政府对地方经济情形之认识。现广西各地之出产，其生产方法、量数等，生产者直到消费者，其中运输、贩卖、捐税等等，各种情形，调查均极明白。国内外金融情形，每日均有报告与纪录。农村调查以土地调查为难作，度量标准大小不一，如山东之亩，有七百二，二百四等，广西统治〔计〕局能将全省度量标准调查详尽。广西一省，关于亩的度量共二十一种，有以面积为标准者，有以用种子多少为标准者，有以收成多少为标准者，种种算法，种种名词，均调查清楚，详列比例表，各种标准，都能立时核算清楚，此种工作，可使政府明了地方经济之实际情形，对症下药，得有合理之施設。惟因土壤关系，广西之农业并不好，前途亦难发展。现政府颇注意工业，尤注意开矿，更注意铁矿煤矿，因煤锡矿赚钱较易。国内外之资本家，亦多有向广西政府接洽投资开矿者。

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已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原因有二。一，十九年后，广东安定，至今已六七年，此六七年之安定，于市面之繁荣有大利益处，二，近年在外经商之华侨多有被外人压迫而回国者，遂于国内另谋事业而广东亦因之愈形发达。但广东经济来源，以华侨汇来者占大宗。近年回国者日多，汇钱者减少，故目前广州之繁荣，并非好现象。近年广东当局颇注意工业，建设划有两工业区，第一区在广州之西，名曰西村，有多数工厂，规模均甚大，有一

大洋灰厂，据说每年净利可赚一二百万元，其他种种化学工业，如硫酸、苏打、肥料、造纸等。最近新建一大钢铁厂，正在建筑中。第二区在广州之南，名曰河南，为纺织工业区，丝、麻、棉，各种纺织皆有，且均设备完善，如丝业，从缫丝到织成绸缎之过程，此地全可见到。另外有糖厂数处，规模均不小。西南之政治最高机关为西南政务委员会，两广施設，皆取决于此会。广西之李宗仁即常驻广州，出席此会。广西之经济建设有其建设纲领，广东则有三年计划。据广东军政领袖陈济棠告余，写完此三年计划，大病一场，可见用尽心力。据云此计划之主旨为军政联合改进经济建设，以建设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

据此行所见，两广比较，广东有钱，有钱即易作事，如新建之中山大学校舍，据说为世界之第一大学校，确实极大，余曾坐汽车参观其校舍，在校路上不停的驰一小时余，尚未看完，其大可知。广西为穷苦省份，面积虽不小，而人口不过一千二百万，与广东相比，广西系一人口不多，收入不丰之小家庭，但经营颇为努力，广东系一人口繁多，财产丰富之大家庭，故广东物质上超过广西，而精神上不及广西云。

《山东民众教育》，6卷3期，

1935年4月。

## 欧洲独裁制之趋势与我们 人治的多数政治<sup>〔1〕</sup>

大战以前，民治主义，披靡欧洲，传播世界。近几年来新潮流又起，独裁制度应运产生。若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葡萄牙、犹哥斯拉夫、苏联、土耳其等国，政治上皆有此种趋势；虽其间多有无实效者，然若意大利、苏联、土耳其，则莫不有卓著之成效，且能历悠久之时日而不崩溃，此可见独裁制实系一极有力量之政治制度。

民治主义在欧洲已呈动摇之现象：如英国为民治主义之发源地，而某英报举行经济独裁之测验，征测民意，观其趋向，竟有交五人独裁国权的结果。英人罗素与美人仇林，亦曾公开讨论：若果欧洲经济上起了变化，是否走苏联的路？仇主张“是”，而罗素则持否定论。凡此种种，皆足证明民治制度已成为一个问题，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

不过照我个人的意见，民治制度是不可废除的。现在独裁制度之崛起，只是一时的现象，有许多人赞扬独裁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试看现在独裁制度的国家，都有其背景在；或始终未曾施行过民治，或行而未获实效。前者如苏联、土耳其，后

---

〔1〕此讲话于1935年4月发表在《乡村建设》(旬刊)上，该刊在“编后记”中说，从内容看讲话时间，应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即1931年或1932年。——编者

者〔如〕意、西、葡等国，便是此种情形。

有人测验独裁制度是否从民治转变出来的，其测验之标准数端，即凡是独裁制的国家大半是农业国、天主教国及邮政很少的国家。这种测验似乎很对。大凡是行独裁制的国家多半是民智不开，经济不进步。余族兄曾游世界三周，他尝对我说过：“一入西班牙之境域，其气象与他国完全不同；即走进意大利疆界内，其社会也是污秽不整，远不如英法等国。”这的确很有关系；人民程度不够，知识不开、故不得不行独裁政治也。此其一。

自欧战告终，独裁制如春笋怒发，蓬勃一时，原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无足奇者。盖欧战一停，国内许多问题即随之爆发，尤其是战败的国家，人心惊惶，社会秩序混乱，值此飘零荡漾之际，特别是需要独裁制，——需要一个强有力者来发号施令，主持一切。盖非如此，则不易维持社会之安谧也。比如人生大病，不得不多方求医一样，试看欧洲行独裁制的国家，都是从这种时机造成的；因苏联之有农民叛乱，意大利之有工人暴动，才使列宁与墨索里尼乘机而起。此其二。

在欧洲有许多行民治的国家，本是似是而非的民治，徒增纷扰，鲜受其利。这种不切实情的制度极易使人民生厌，而不得以求适宜的政治；遂走入独裁的制度。如战前之意大利，表面虽是统一的立宪国家，而国内党派纷歧，互相攻击，各惟私利是谋，不顾民众；每届选举之期，狼狈为奸，弊窦丛生，致一般人莫不深恶痛绝。此其三。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独裁之成功，非有特殊之伟大人物执政不能成功。如列宁，史太林、凯末尔、墨索里尼等辈，都是些绝世伟人，其人格之高尚，性情之特别，精力之充足，身体

之硕健，在在皆为常人所不及；这真是令人惊奇而罕见的大英雄。此其四。

以上四端，是欧洲独裁制兴起之缘由，其非治制之正常形态固不待言。现在且让我们来一观多数政治，确是人类进化之结果，正常形态文明之政治也。吾人理想之政治制度是政教合一的制度；而多数政治又是不能放弃的原则。因多数政治即是正常形态，独裁制则是特殊形态，是一时的现象；所以我们推往察来，而主张人治的多数政治。苏联已经承认他自己的办法是一种过渡手段，而非政治常轨。意大利虽无明白表示，但亦出于时势之不得不然，可断言也。

我们知道政教合一与多数政治是不相合的，所以我们的主张是人治的多数政治。多数政治即是法治，我们把两种制度搅合起来，截长补短，便创出人治的多数政治。这似乎是有些冲突；然不使二者一致，则一切问题皆无法解决，我们相信这种制度是能通行的。

多数政治是大家立法，大家共同遵守所立之法。人治的多数政治，则是大家承认一个人，服从一个人。其异点即在乎此。多数政治是法在上，一切的人都站在法之下，法的背后有一个无形的大势力即大众的意志。现在我们把他调和一下；则得到二者之调和融洽的一点。此点为何？就是大家共同遵从一个人。这个办法是与先前的人治不同；以前的人治是不问众人之同意与否，而要征服群众，很明白的是强制的缺乏理性。今日所说的人治不仅是采取群众的意见，同时是理性的政治。这种办法虽是人治，然却是产生于多数群众，能不说是多数政治吗？虽是多数政治，然而群众又在一个人指导之下，能不说是人治吗？

前就欧洲独裁制以说明吾人之主张；彼虽与吾人主张不同，



但有几点却有暗相吻合之处。兹分三点言之如左：

（一）独裁之下设有议会：意、俄、土皆有议会之设置，此即说明无论如何独裁与专权，但终究不离开多数人的主张。不过此种之议会多受一党之箝制，往往失其独立性。如意大利之议会，在法西斯蒂党的指挥之下，分为七种职业代表团体，此七个代表团体，一方受党的审查，同时仍须尽量发挥言论，贡献意见，所以这种独裁制的新例适与吾人理想中的政治制度相吻合，是吾人理想中之政治的影子和导线。

（二）独裁制靠有党的组织：墨索里尼及凯末尔等之所以能握得政权，非只靠武力，而是因为有党的组织在其背后。党是什么？党就是有共同的主义、理想与信仰之结合。一方是富有理想性，一方是极有意识之活动，迥异乎已往之独裁制。但实际上党是尊重领袖的，党内的多数份子均在其领袖指导之下活动。因为党是领袖所造出来的，谁都不能否认，这岂不是人治的倾向吗？所以这一点又与我们的主张相同。既是多数人的意志，又是人治制度，此即两相调和之义也。

（三）独裁制在政治上之举措遵循正义：凡是党的领袖人物皆有其特别高尚的人格、正义与德行，这些都是构成党的成分的。列宁、史太林等之独断，真令人不得不甘心佩服。他有伟大的心愿，是完全为公众谋幸福的。他自处俭约，毫无过分之享受。墨索里尼也是这样为人。这实在叫人无可非议了。最近德国政局之变化，亦有独裁制之趋势；布鲁宁仍继续组阁。说起布鲁宁也是这样一个英雄，他自己没有家室，没有财产，所以拚命向前奋斗，完全没有丝毫私意，而是为社会团体谋福利。他对于反对党，一以正义相抗，不用卑污的手段或是意气用事。凯末尔承认反对党费赛组党，解散国会，以取信国人；其磊落光

明之气，天人共见。所以这种正义与独断，实为维持独裁制存在之重要原因；盖必如此始能取信于人也。人治之重要，多数政治之不可少，如此可见一斑。这是和我们的主张相接近处。

综上所述，可知欧洲近代独裁制是与我们所期望的制度不同。我们所说是人类政治的常轨，是永久的，他们则是临时的，一时之现象。不过他们的制度，可以作我们理想的政治制度的背影与导线，使政教合一及多数政治可以得到一个调和。

《乡村建设》旬刊，4卷22期，

1935年4月1日。

## 政教合一<sup>〔1〕</sup>

政教合一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谈。我现在主张政教合一，但不主张用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思想行为。我们只是看出人类历史要变化，国家亦要变化；以后恐怕没有现在这样的国家。国家自今以前有两特点：

1. 秩序建立于武力之上：国家存在于武力，其权力与形式全靠武力，秩序背后就是武力。《国家论》著者奥本海米尔说：“国家是靠一政治武力剥削的，国家的权力寄存于武力之上。”秩序靠武力维持，中西社会一样，这是我们承认的。

2. 在此秩序之下的生计是各自为谋的：政治虽是说为满足公共欲望的，然生计大体仍是各自为谋。在西洋固是竭力向众人谋生计的路上去以求社会政策发达；但社会生活问题，仍未得到一个妥当的安排，而常在失业生活之危险中。此为西洋近代国家与中国往昔之特点。

将来的国家，一定要有社会的安排。关于以上两点，要完全变化。对于生计或经济问题在社会上要有总的安排，而不是竞争的。其次国家的权力，不是建筑在武力上，而秩序背后并没有武力。所谓政教分不分的问题，即在于此。具有前二点的国家，它的政教是要分开。如用武力来施教是很有危险的，从

---

〔1〕《乡村建设》旬刊注明此讲话记录未经著者过目。

此危险性上，为事实所不许；从生存竞争上，人各自谋生，顾不到更高的文化。极而言之，此种要求，亦不会萌蘖。其故在事实上所不许，及事实上做不到。在西洋是存政而去教，在中国是存教而去政；都是政教分离的。古代中国国家权力是常常收起而不用，而主张政简刑轻；秩序固然靠武力维持，但极力收起而不用。不要政则危险少，故可以施教；亦可以说古代中国很需要教。比如人人各有其应尽之事，谨慎去作，各有其前途，各奔赴其前途，这是很好的景象。且此地之所〔谓〕教决非宗教之教，仍是对大众勉励告诫的事，明清两代都是如此作工夫（如清代之《圣谕广训》）；其所以收起武力，乃因教化之维持，只要自己做自己的事，就是很好的社会，而西洋则大不相同。政教合一在将来一定要实现，既无事实上的不许，亦无事实的不到；只要时机到了，自然就实现。至此时国家虽有干涉与不干涉的事，亦不与今日相同。

政教合一与否既如上述，则将来应有之局面，从各方面去推论，可以想像得到：

普泛的推论：政教的问题，为什么将来世界要趋于合一呢？其关键何在？（即乡村建设理论）人类的知识能力的进步，不但是向高处走，同时要向广处增加；如欧美人科学好，识字的人亦多，而中国则反是。所以人类历史越回溯上去，越是少数人操纵多数人，甚至一二人的智力可以把持一切，这完全是经济的结果。经济者，人类对付自然，从省力的事求省力之谓也；因其省力不得〔不〕费力探求，一步一步的做到省力，更省力。所以经济越进步，人类才越有空闲，越来越省事。所谓用最少的劳力得到最大的效果就是如此。知识的产生是空闲产生的，是经济所给予的。初为少数人的，进步后则成为多数人的。至是，

大家的知识差不多，谁统治谁，确成为麻烦的事。因为从前少数人可以用武力来统治多数人，及至知识增进一步，则不能拿武力统治众人，故最麻烦。自现在以前，一切靠武力。至武力不能统治众人，那时社会秩序靠什么来维持，此刻暂且不讲。经济进步的趋势，很显然的由零碎的不联贯的，越来越联贯，越往组织里走；把从前个人的范围打破，直至共同生活的社会化。以前是各不相谋，各人有各人的意识，欧洲现在就是竭力在做生活社会化的工夫。因为欧洲已往的情形不但不相谋，还要彼此竞争妨害；此特别需要相谋相共的社会意识，此为进于组织，往有机的或意识里求进步，要合起来打算。这是人类经济的趋势。一旦经济的目的达到，则人与人无竞争，那时必发生一极大变化——即人类联合起来，成功一大的团体有机体来对付自然。当人类各自为谋时，生计问题占据其脑，无暇他计；既成为一社会化的团体，则个人都有相当的空闲来作思想的工夫。如此则一整个的脑筋要如何便如何，有了一个总的安排，人心就都有空闲来思索。但是思索什么？则又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要费事筹措如何才能使其心思活动有归着而顺理——便又是一个问题。从此两个问题上看出政教合一之必要，看出社会当给与人类生活一个总的安排，同时人类的心思活动也得到一个总的安排。这意思是说，使其心思活动顺着理性的出路来走。既于其生活方面理出出路来，复于其精神方面理出出路来。此问题与前所谓不以武力统治大家的问题有关系；即公众的秩序，以前是武力的，现在则是靠理性的教育，大概非用教育来代武力不可。

（二）进而言之：人类到现在不容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因生活问题仍在压迫着他们。欧洲的经济虽是进步，而压迫仍不能

免，在中国则为尤然。因此人类不能有更高的要求；换言之，即根本不容易觉察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生活问题非有一个总的解决，则更高的要求是不容易浮现于意识之上。这个更高的要求即是于人生上探讨意义，亦即我怎样生活才算对、才有意义和价值。这个要求乃超生存的更高要求。若是一浮现出来，就不能不要其满足，也像要求饥饿的满足一样。本来个人的或小的团体可以满足，然这都很散碎，而非人类整个的要求。人类整个的要求，是天天往组织化里走。关于人生问题，是从社会方面给人一个帮忙，这就是教。社会如果在这个问题予以帮助，就是由社会来推行这个教。于此看出政教的争点，即在自由问题上；如果承认个人行为是不妨害公众，自家可以任意去行，政教便不容易合一。如美国禁酒问题，许多人反对，以为是个人的自由，无害于国家，是其明证。推此则禁烟亦不能行。这个自由的观念在中国不很清楚，这全是历史上的关系。欧洲以前太抹杀个人的人格，所以后来极力建立自由的疆界，不许社会来干犯。于此可见是消极的目的，是怕社会来妨害其自由；完全是求着不受害而拒绝社会的干涉。反过来说，就是人类不应当更进一步积极的求社会帮助吗？消极是为从压迫出来的，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如果人类历史再进一步，一定要求社会来帮助个人可能的发展。现代法律家曾如此主张：自己应变其主张，从尊重个性起，到社会应顺成每个人可能的发展。换言之，此时之自由，成了活的自由；即为尊重个性而尊重自由，因为恐怕将个性弄成机械才如此，因为从顺成和帮忙人的发展才不算侵害，此意其活。乡村建设理论之第四原则言：“人生最大事情，即是创造自己。社会应帮助人去创造自己，形成一个教育的环境，启发并鼓励个人的前进。”（见再版《乡村建设论文集》）即

指此说。故前所谓教，非古代国家之教，亦不是现在的教育。差不多可以说，为什么要社会？就是第一要社会是为经济的生活，第二要社会为受教育。要社会建立于教育上。现在时间还未到，不过只要求一个有秩序的安定；在安定之下，我们自己求生活，求受教。将来则是由社会来解决生活问题，由社会来帮助求学。不但是个人不怕社会，而一定要求社会予以积极的帮助。这个帮助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还有一个更高的教育上的帮助。此为政教必趋于合一之第一层。

(三) 再进一层来说：关于强制的一层作深一步的考究。现在我们对于社会要求秩序，如果大家不听，则非强制不可。强制有二：一种是直接的强制，用武力来推行；一种是间接的强制，利用人类的意识彼此的利害关系。总之，现在社会，就是让作什么，或不作什么，全是利用人的计较心；秩序即定于此。所以现在的秩序是从计较心来的秩序；很显然是表面的，并不能根本转换人心。这是一个很粗硬的办法。这不是对人的态度，乃是对物的态度。这没有要求人心的同意与同情，只是要求其身体对于社会事业的合理，则不能不成为机械的秩序。这种秩序，在从前用着是适合的，因为以前的人是各自为谋的缘故。若进一步言之，则生活要协同共谋，而人与人之间，需要一种融洽的关系。当各自为谋之时，人与人之关系不甚密切，如个人本位之生活简单即其例也。一有家室则发生人与人之间的融洽问题与关系。其所以融洽的原因，即是同情与同意；若无同情与同意，则不会融洽。是知个人本位，利害分明，永产生不出融洽的制度来。然则融洽之最高点为何，就是《乡村建设理论》中所说的：“与物同体，一体之情。”这完全与个人本位不相容，所以非灭除个人本位，不能有真正的社会秩序。因此而

知以前之法律制裁以求公共秩序的办法是不能用的。这时要怎么办呢？公共秩序靠什么呢？就是公共秩序也许靠条文，大家要顺着条文来做，不是用利害强制的法子去走，是用大家同意同情乐意去作。怎样乃能如此？就是从其性情上培养，使其离开自私的心理，而有一个远大的共同的要求，且最适于生活的心理。这就是一个教育的工夫。使社会形成一个教育的环境，即可使其如此。然而现代普通的教育无此功能。最有效的教育，就是我国的礼乐。礼乐予人以柔软的自然的影响，使人有公共的生活，最好的秩序，而代替了强制的法律；使人有公共的秩序，公共生活，同时也代替了宗教。

礼乐代替宗教，是如何推测出来的？是由人类文化转变的大势所得到的（请参考《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再则留心现时法学家思想之变迁与欧美国家办法之逐渐改变；从此都能见出其改变，统统是往教育上变。其大方向略如前述。欧洲自近代初期起，发挥个人主义、权利思想；现在始为经济上之社会本位的要求，法律思想此刻有剧烈的变化，初为个人本位观念及权利本位观念，现在反过来而为社会本位观念及义务本位观念。以前国家对人取自由主义，现在则变为干涉主义。现代法学家最新颖者只谈个人在社会上有什么义务而不说权利，有经济方面，以前主张自由竞争，现在则由自由主义反转过来而要干涉，成为社会主义。这在欧洲之前后变转，本其极端。这为何近于我们的主张呢？我们所说之教育有根本与权利不同者在；因为我们所说的教，是超物质的要求，是人生义理的要求。此欧洲义务观念能与我们接近的最大原因。现在再来考察国家的刑罚。要废除死刑，亦大有变更；良以死刑最粗野不过，而不合乎教育的意义。国家社会本是帮助人的，杀人则反是，所以死刑废除



已成公论。此外肉刑也是不但不能教育人，且使社会有更恶的反响；所以肉刑、死刑均应废除，完全采用感化主义。从犯罪学上看有两点：一为教育，一为人种改良；以为社会予以不良习惯使之犯罪外，还有其他原因，就是因其气质之不良。前者属于社会学，后者属于优生学。这些转变都趋向于教育。换言之，就是事前教育之，事后仍须教之。于此看出：（一）统统是看重教育；（二）教育由社会来作，有总的安排：两言以蔽之。西洋一切事实的变迁，都与我们的推论相合。所可惜者就是中国民族对于西洋这种曲折未曾经过，而把中间经过的科学工夫忽略了。先前我曾经迷信过欧西之民治主义，后来见其不通，而反转来推求，很清楚地知道政教合一与民治必有所冲突。然更清楚的可由思索中产生新思想。

民治主义与政教合一之冲突已在他处略述。如婢侄合奸案，以中国旧法律是凌迟罪，这是出自伦理观念，含有教的意味而属于道德范围。西洋法律与道德判若两事，不相干涉。这是因为以自由为其民治主义之根本观念，而不谈政教合一；因为自由就不许干涉，而思想上宗教上亦暗示着不许干涉。此为最浅之一点。民治主义与政教合一在办法上有些不好说。但上面已经说过西洋的形势要变，越走越逼成我们的方向，是不成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下边一层！民治主义是抽象的名辞，而政教合一又是理想的东西，都不是实在的物事。但是实际方面，从民治主义来的政治制度，必须大家立法而共同遵守之。这个时候，国家势力的行使是在法律内的，行使的代表者不容他有自己的意思。所以民治国家只有法没有令，有令亦是根据法而来实行法的。此与独裁正相反，而教育的意味亦完全没有。因为教育的意义是说贤者智者来领导众人；民治主义是众人出主意，而贤

智〔者〕也不过是执行众人的主意而已，不容其参加自己的意思。所以是贤者之程度愈高，人数愈少，程度愈甚相差。由此推论，则多数众人出主意而贤者服众，理论上盖甚有缺欠；因为把少数贤者的意见搁起不问，而只从多数，教育的意义便不能含进去，更不会有贤智来领导的意思。凡事皆以方便为前提，不以更高的见解为前提。换言之，是以公共生活方便的眼光来决定，而不是使公共生活有更高深向上的眼光。我们所谓政教合一是本着更高向上的意思，由贤智者出主意，众人来听从。我们所谓教育是隐然有所指，非只是指知识技能的教育而已，是指整个的生命，整个人格说的，因此而知教育更重〔要〕。盖知识技能比较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为大家所共见共晓，如果我们从知识技能方面来说，自然是多数人不如少数专家之知识技能高，而更应当受少数人领导，要听从专家的话。这是在知识技能方面，专家可以用客观的标准，使大家有明白的判断。若从生命方面来说，贤者指示众人如何才对，而众人对之则不如知识技能明了的正确，因为贤者是从他自己的创造体会来的，外面没有正确的标准，可以让大家看见，因之众人判断力少；除非你诚心悦服他，不然他即不能指导你，这时你必须放下你的批评心。对科学可以批评判断，对贤者的领导则不可；换言之，就是他听话的程度必要大的多。这种教育与民治完全不同，而在民治主义是没有办法的。

（四）还有一点，就是从民治主义来的政治制度，没有法抛弃那种“箝制与均衡”的原理。现在三权分立是不合用而须要废止，然箝制与均衡仍为民治主义之重要点。现在西洋多行两权制。即委员制，及中国之五权，均含有箝制与均衡的意义。反之，若政权归一，则民治破产，全无箝制与均衡的意味而成为

独裁。所以民治主义的特点是取决于多数及应用平衡的原则，即政教合一，正相冲突。何以言之？政教合一则权归于一也。比如我信托某人而受教于他，则全无箝制与均衡之意。信托则完全信托，即以师的眼光看对方，不能有批评心与防备心。如只认他是知识技能之师，犹可以批评。如是人格之师，则除诚心受教，此外没有别的话说。故从政教合一则不合于民治主义，从民治主义则不合于政教合一，二者在制度上最难调和。

《乡村建设》旬刊，4卷22期，

1935年4月1日。

## 答湖北政务研究会参观团问<sup>〔1〕</sup>

梁：前次与各位说话，甚为粗略。各位有何赐教，可在此时一谈。

问：在先生谈话中，似对土地问题未多讨论。鄙意以为此乃甚重要之问题；如丹麦亦尽量想法解决土地分配之不均。在邹平，土地分配均匀，恐系一特例。不知先生对此，有何具体意见？对村学、乡学之组织，似非一真正自治团体？

梁：关于第一点——土地问题，这是常谈到的。在谈到此问题时发现一点，即土地问题的解决应有其主动的、能动的力量。我们觉得在未发现此力量或此力量未形成未建立时，则谈土地问题的解决方策，亦属落空！如有此力量时，方策亦不难找。在丹麦、法国、德国等都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扶植无土地的农民有土地，可以供我们参用。故方法不难找，只问主动力量有没有？而此力量何时呢？以我看，要在乡村运动起来以后。因为这个问题大抵是要站在最高团体——国家上说话，用政治力量，国家权力才好解决。但依我们的看法，此力量现还没有。原来的问题，引丹麦为例，意见是很正常的。不过，所谓邹平土地分配情形是一特例，恐非必如此。如河北定县之土地情形与邹平亦相同，但均非有意选择者。大概北方情形都比较

〔1〕此谈话由李竞西记录，未经作者寓目。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

好，自耕农多。至于南方，我不很清楚。土地的分配不均，佃农与地主间问题严重的地方，乡村运动不好做，我们是承认的。——（稍停）——在我们看，至少是在我看，乡村运动主要的意思是想从此运动来形成一个解决中国问题能动的力量。必须有此力量后，许多问题才能够谈到解决的方法。如经济建设，必先有其他能动的力量才能来谈如何建设。土地问题亦是如此。关于此问题，希望诸位先生参看拙作《中国问题之解决》一文（见本卷）。此文中分析了中国问题能动的力量何在，阅后自可略知我对此问题的意思。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可以这样回答：现在的村学、乡学组织，还不成功——正式的自治团体，只差一点，——本来是一要紧点，即负担自治职务者；未由地方团体产生。须至由地方团体作用产生其职务者，始与真正自治团体无异。几时才能成功呢？那就不能肯定的说。在不同的乡村是需要不同的时间来培养的。中国是很缺乏团体组织，所以人民没有组织能力。此时第一是要不妨害其组织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给他一个自治。到他们能自由运用其组织作用的那时候，真正的自治团体自然成功。

问：村学、乡学之组织中有学长一制度，到将来是否仍然保持？

梁：是的！我肯定的答复是的！将来仍然保持学长制度。这是我们所安排的组织与普通制度根本不同之所在。关于此，请参看《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一文（见本卷）。

问：学长似为避免乡人与理事之正面冲突者，但乡人意见由学校转达，恐其中不无添出一层误会的可能。似乡人对于理事有意见，不妨用和平的态度和理事说，到说不通时再由学长转达双方之意。先生以为如何？

梁：啊！即是先生顾虑更到的地方。

问：近来社会上很注意讨论中国适宜会议制或独裁制的问题。在先生《村学乡学须知》书中，谓多数应顾全少数，少数要服从多数；这本来是很好。但在中国现状下，人民程度未成功一水平线，恐完全迁就亦非好办法！故我以为大家讨论可，而决议应由贤智者独裁。

梁：大概此是着眼点的不同。如着重结果多一点，则或可采取一种简便办法，——如以多数为准或独裁——如着眼在培养组织能力，势不能不注意各人，发挥其主动之意。

问：前在定县参观，他们提倡乡人节育。但在医学界上说，现在中国人口减少，当然不是好现象；则与主张节育者发生冲突。我的意思，生育问题国家应有种统制，作有计划的改良、节育。若单提倡减少生产量，似非好办法。先生对此，有何意见？

梁：据我个人想，大概是方法的问题。方法的问题很难；就有好方法，乡人也许不能接受。若问我对此问题在原则上的意见，我仍然赞同节育。

问：先生不同法治而重情谊，在乡间是很好的；但都市或较大的团体，恐有问题？

梁：是的！小团体是多靠情谊，大团体则仍然需要法律。大概靠形势与靠人情是成比例的。

问：关于引进科学技术问题，外人突飞猛进，我们是很难赶得上的，不知有何方法可以提高中国的科学程度？如何能〔与〕外人竞争？

梁：此问题的回答，恐怕与先谈的土地问题差不多。所重要的是先有一能动的主力，至于方案、计划是不会成难问题的。先定方案是不行的，问题是在怎样使社会能用科学技术。在拙

著《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一文（见本卷）中对于此问题稍微提出一点意见，诸位可参看。

问：在曾文正、张文襄时，曾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言，说形而上学，中国所具有，形而下学，中国所缺乏。孙中山主张发挥中国固有文化，迎头赶上西洋科学，但近来汪精卫先生却认为中国变法多年，尚有张文襄时代之见解者，未免时代错误！胡适之先生亦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现在先生之理论，主张复兴故有文化、接受外来科学技术，此与曾、张、孙等之主张是否一样？与汪、胡之论是否冲突？

梁：大概谁说的话都不能与谁完全一样，也许大意相仿佛，但轻重分际之间，总有出入。说到不同，总有不同；说到相同，自然也不能尽异。我很容易的看得出我与张、曾、孙之意为近，与汪、胡之意为远。但也只远近之差罢了。此时，让我想起印度哲人泰戈尔的事来。他到美国时，有个中国留学生名叫冯友兰的——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去见他，叩问泰戈尔对于中国文化的意见，后来用中文发表其谈话结果。冯氏于其案语中，谓泰戈尔之意见与中国老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其实恐怕也很难说就是一样，也许我与泰戈尔又相仿佛，与曾、张、孙相象。但所指者是否有出入，或对于某部分的见解是否一致或竟完全不同，也就不定：不过大体上是相近吧了！

问：邹平现所行者，县下有乡有村，似为三级制。但在行政上——尤其是财政的征收，似不如两级制好？

梁：此本来是一问题。邹平现所试验者确为三级制，但也仅是试验。两级制之利弊若何，个人未曾考虑过，未能作何评判。

（中略）

问：先生之《孔学绎旨》、《人心与人生》二书，其内容可得略闻否？

梁：一时很难说得全。大略是这样：我在民国十年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其中很多讲到儒家的道理，通通是借一点心理学来解释，并且引了些时哲的话。到民国十一年，自己感觉到所讲者不尽合适，后来愈感觉到所有讲儒家部分的话都不妥当，原故即在心理学的错误。故于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三年在北大讲儒家思想时，对此即有很多纠正。讲儒家思想就常讲到心理学的问题，混在一起很不方便，乃将讲儒家思想者分为二部分，一书单讲心理学的问题；一书专讲儒家，绎其旨趣，此即二书之所由来。大概关于《人心与人生》，即借对于现代心理学的讨论批判，如方法、对象、范围等，指出现代心理学的不足、缺欠或错误，由此看出正面的主张，说出我正面的见解。我的见地大多本于儒家，但完全不借用中国古人的名词，古人的话。可是隐约的是在讲中国古人的道理。《孔学绎旨》即专门拿古人的话来讲，有方法的去讲古人的话。因为没有方法，很容易人各一词。如《大学》“格致”，释者何虑百千家，不惟不能明古人之意，古人之意反因之而晦。我们希望有方法的来讲中国古书；方法即在我们去讲古人的话时，要慎重、小心、一步一步往前做。能够确实的得到一点小的，浅的；即是胜过了得到很多很深而不确定的。一步一步确实整理、用心，或许能使古人的意思显露。《孔学绎旨》一书就是这样一个性质；其内容大概限于《论》、《孟》。

问：乡建运动是否依傍政治当局而存在？

梁：决不是的！很多朋友也很担心我们不长久。但是要知我们这些朋友原是做社会运动的。由此社会运动一天天的开展，



达到政府方面，政府才委托我们来做。因为风气一天天的开展，才不限于山东一省。如行政院有“复兴农村委员会”的设立，华北政整会“有农村人材养成所”的开办。根本要紧的是在社会方面是否成一潮流，此乃基础的力量；至于政治负责者一人的好恶是无关系的。在山东办“研究院”，日期长短当然不能保，但关系不在此而在彼，是在看此运动是否有生机。如其有生机，是必要，则此处不办，他处也要办；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如其无生机，则虽中央政府来提倡、来办，也是枉然的事。

(下略)

《乡村建设》旬刊，4卷26期，

1935年5月11日。

## 朝会讲话四则<sup>〔1〕</sup>

### 反 省

大家自己要在自己身上反省：有没有正大的志趣？是不是有时自己找不着自己，忘记自己？陷于狭小，俗气！光阴是不是旷废？自己要注意！个人对自己的事情总要安排一下，——我将怎样用我这一天？或这一月的工夫怎样安排？大家需存一种恐惧，感觉缺欠！

### 孤 独

现在天未明，众人都在梦中，我们已经清醒；众人都在休息，我们已经工作。于此即有先众人而劳作之意。许多人在一块，大众熙熙融融是一种乐；但孤独也是一种乐。孤独似是凄冷中却有超世味。孤独而勤励更有站在高处俯视而奋发迈往之意。这正是担当社会改造的人所应常常存于心里的味道。这味道必在孤独时方能得之，孤独而勤劳时得之。

---

〔1〕四则朝会讲话，讲说时间与记录者均不详。记录未经著者过目。  
——编者

## 愿 力

我深感到我的愿力不够，但愿力亦可培养开发。怎么开发？在当初动念干这个的地方去找，去反问自己为何有此意思？而此意思为何又在彼时真切？这样将原来的真情真愿因反求而开大，当其痛痒侧隐之情发露而深厚之扩充之。正念有力，其他杂念自因之而减少。惟有愿力才有勇气，才有精神，才有真的事业做出来。

《乡村建设》旬刊，4卷27期，封面，

1935年5月21日。

## 灾旱与悲切

从近来天旱，使我想起先父来。先父关心天时旱涝，给我留一很大很深的印象。他看见旱就非常（惨）悲〔切〕，仿佛感觉着痛苦，心上很关切，像他真是以大家苦乐为苦乐。他帮助我不懈怠；即力量有衰退时，心里昏庸时，想起先父便可把这问题解决溶去了。这，无所谓勇气；仿佛是力量之恢复，而不是力量的增加。

《乡村建设》，4卷28期，

1935年6月1日

## 欢送实习同学之赠言<sup>〔1〕</sup>

昨天听到时先生讲的话很切实很好。不过当时说话的时候，同学也许听不清楚。如果放过去，很是可惜；现在我再来讲一讲：

时先生意思是说四个字，——“志愿真诚”四个字。诚然如时先生自己说的：话是很平常，谁都会说；因为大家常说这个话，便几乎没有味道了。可是实在说我们往前作事情，是要靠这个意思。我想是对的！因为我们作的事是一个创新；乡农学校就是创新，不是方方面面有路可走，而是在什么都不定，在探讨摸索创造；此时周围环境很不顺。不顺靠什么能顺呢？那非靠我们里面的劲，——真诚老往前进求的劲，不能通得过去。在创造的时候如无热心毅力，稍一碰钉则将完了。探求新路的时候，必须靠此。紧要关头，志愿真诚才能耐烦，不真诚必是敷衍。创造要耐烦，耐烦才能通得过。在此时代，非如此不可，这是一个意思。

再是我们此刻作事，最大问题是对人问题；对事问题应放在第二。大家下去作事最先遇到的是对人问题，县政府的人或我们研究部同学参加县政府工作，与大家相关系，都会发生人的问题。对人问题，顶要紧的是这一点——真诚。巧滑的人固然让人

---

〔1〕1935年5月，对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赴鲁西实验区实习同学之欢送辞。张虎鸣记录。

没办法，不会被人挑剔，不会与人翻脸，眼前都能过得去，但结果他还是得罪人，大家要讨厌他。如果是真诚，就是有错误，大家也原谅；到底真诚人能对付过去，巧滑人则不能。对人问题既要紧，故真诚为必要；所以对人靠真诚。而对事则靠技术；不过我们眼前技术尚用不上，——所有许多方法，一时用不上。眼前完全是人的问题，故非靠真诚不可。这是第二个意思。

第三我们作乡农学校的事情，如果能作得几分，则必完全靠我们四五个同学的和衷共济。这个意思很显明；如果这几个同学的力量互相牵制，互相妨碍，好象一辆车，一个往东拉，一个往西拉，则一定不行，事情马上不能作，一定闹笑话。可是这四五个人如何能和衷共济？那么必靠志愿真诚；志愿真诚才能把心放在较公的地方；公就是志愿。不然四五个人四五个人心，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彼此的心都不放在较公的地方，则很难相合。所以没有志愿是很难相合的。志愿真诚才能顾全大局。为顾全大局，校长才能照顾尊重其余四个人的意见，其余的四个人也能比较尊重这个作校长的人。这几个人在事情上能遵从校长，校长也能容纳这几个人的意见，此之谓和衷共济。没有志愿，一定有许多小毛病出来，如顺口说闲话等。志愿真诚则毛病可以少露，彼此才能到一块去。四五个人如四下分裂，一定把事弄糟，还不如一个人去作呢！所以我们作事情，最忌的是闹意见，最要紧的是志愿真诚。

时先生昨天的话很是切实，大家不要忽略！大概时先生也许要去鲁西那边，招呼大家，让大家始终有志愿，不忘进修。大概时先生将来可以去。现在大家要走〔了〕，我不再多说。

《乡村建设》旬刊，4卷27期，

1935年5月21日。

## 什么是政教合一？〔1〕

现在讲政教合一问题：我们理想的新社会，政治、教育（教化）是合一的，是相合而不相离的。这一点细讲起来就很费事。政治、教育是我们常说的名词，如果要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教育？很难确定。我们认真来讲，都比我们平常所想象的要宽；宽就不好办，不容易分别了。例如单说教育即可概括我们全部的生活；政治的范围更为广漠；我们弄不清楚什么是什么时候，合一的话就不好讲。再则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二者的解释尤不相同。这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是如此，那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又如彼；这一个社会的教育是如此，那一个社会的教育又如彼；随时随地而有变化，所以政教合一的话很不好讲。

所谓政教合一的教，我们一面想用“教育”，一面又想用“教化”，就可见出这里边有问题来。教育若能包括教化，即可废去教化二字；假使教化能包括教育在内，则我所主张的政教合一亦就是政治与教化合一，而〔非〕政治与教育合一。本来我们理想的教育制度，并不就是政治制度，有人误会我们乡学、村学的办法，往上去有县学，省学，国学；国学学长就等于现在的林主席。有人向我说笑话：“现在国府的林主席倒很象你所

---

〔1〕讲于1935年，李渊庭记录。

安排的学长呢”。其实不然。我们要知道除了下级地方自治有简化的必要，地方团体与教育机关合一之外，往上去没有把政治机关教育机关完全合一的必要与可能。一个机关什么事都管，不一定是对的事情；他不过越到了下级越有简化合一的必要而已。反之，越到上级范围越大，事情繁重，有专门的性质，则又有分化的必要了。大家必须明白我们所谓政教合一是有明确指的，而其所指要紧的有二点：

第一点：人类社会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团体生活就是政治，国家（政治）虽为社会团体生活之一，但非平常的团体生活，而是具有最高权威最有力量的团体生活；它一面能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一面又能予我们的生命以制裁，这样的团体就是国家。这个团体里边的事情即为政治；而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把人生向上这件事情亦由团体来帮助，使人的生命往更智慧更道德更善良里去。换言之，把帮助人生向上的事情亦〔由〕最高有力的团体来作，这就叫作政教合一。普通人生向上的意思是不清楚的，并且从来没有由最高团体帮助来作，将来如果由地方自治团体或国家帮助人生向上便是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是对政教分离而言。政教分离是西洋近代社会的事实。这是由于西洋到近代要树立个人自由，保障个人自由，拒绝团体过强的干涉而来。这种西洋近代潮流对中古说是一个反动。西洋人怕他的国家（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团体）过分的干涉个人，所以消极的要求不干涉。我们从人类文化大势上看，将会转变出一种积极的要求，要求团体帮助人生向上，而非消极的要求不干涉了。等到团体帮助个人往人生向上作工夫的时候，就是政教合一。在我想，这将是世界多数人所要求的，不过现在尚非其时机而已。中国往前去所要走的路，大概一上手就是政教合一——因为一上

手就是乡约。乡约一面是自治，建立将来最有力量的国家团体的人手；一面是走教化的路子，往团体帮助个人向上来作。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乡村，不组织团体则已，如组织团体单从为解决事实问题以满足欲望是不行的，必须从个人要求团体在人生向上的地方帮忙而团体帮助他，才能成功。明白言之：单从自卫、自治、经济等出发来组织团体都不会有真的成功或好的希望；只有从较真的动机，较深的意义，较高的要求，——人生向上，才能养成中国人的团体组织。并且中国人团体生活的成功是自觉的、思维的、理性的来要求组织，不是被胁迫强制所可能；同时，团体秩序的维持，亦不能不靠理性；只有发挥理性才能维持团体，无法借重于机械的力量（武力）。因为中国社会没有机械力量可用；团体之所从来不得不得来自理性，所以非走教化的路不可。若不如此，即不是以启发多数人的理性，不足以维持团体。普通的国家，不是从自觉来，多半由不知不觉所演成；既成之后即靠机械的力量维持。可是中国现在不能如此，而要自觉的思维的走上团体生活，此非理性不可；而启发理性发挥理性的就是教化。明白这个道理，就可明白政教之所以不能分与合一之真义所在了。

第二点：在这样的团体生活中，天然的不以法为最高而以人为最高，因为他从人生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一个动机来的，所以自然要尊尚贤智而不以法为最高，不以多数为最高。不过如果从贤智是多数人所尊尚的地方来讲的时候，亦可说是以多数为最高。贤智是怎样来的呢？就是由于多数人之所尊尚而来，所以尊尚贤智亦即尊重多数。多数人恳切向上，愿意受贤智的领导，这个意思讲出来，方为政教合一。这个意思如何显露呢？即多数人不自尊而尊贤智。法治是政教分离的，以法为最高，不



是政教合一；人治虽然不一定是政教合一，而政教合一的归趣是要推论到人治上去的。

从这二点来看，可以知道我们所谓政教合一的教，不是包括一切教育上的事情而言。政教合一的教是比较严格狭窄的，是指最高团体帮助个人向上这一点来说的，而不是教育的事情完全与政治合到一块的。因为教育行政亦有技术问题在内，不是没有分化的必要。所以政教合一这话不好随便乱讲，普通所说的政教合一都不很对。比如河北博野县预备实行政教合一的办法，拟裁撤区公所而以高小校长兼任区长，这样看政教合一，那就非一塌糊涂不可了！政教各有技术在内，能作校长不一定会作区长，所以该分则分，该合则合，如把什么都弄到一块，那简直是混乱而非合一了！

政教合一之所以合理与可能，是因为人生向上和人的生活完全不能分开。如单照顾生活而不注意人生向上，单照顾吃饭而不照顾饭吃的对与不对，生活与向上完全打成两截，实为不通之论。所以政教分离，单单照顾人的生活，而不问人的生活有无意义，是不对的！单单为谋个人的方便，消极的要求不受团体的干涉，只是一时的反动，亦是不对的；将来社会进步之后，人类会有一更积极的要求，要求团体帮助自己的人生向上，那时人生向上不再是你的事或我的事而是团体大家的事，由社会来帮助策勉，共趋于人生向上之途，这才是政教合的真义啊！

《教育与民众》，6卷9期，

1935年5月28日。

## 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之我见<sup>〔1〕</sup>

诸位先生，主席指定我说话，就讲一点我的意思吧。

十位教授发表了这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那时我正在广西，未能见到。到了广州，朋友们才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我在中山大学讲演，也曾稍为说到。今天要说的也许和在广州的话不完全相同。

现在我详细的看过这篇宣言之后，我想第一先应当来确定“文化”这名词所指的范围如何。宣言上有段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意思是文化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说“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是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包在文化里；所指的范围是很宽广的。但后面有一段说：“这

---

〔1〕 1935年5月，在山东济南座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会上的演话。篇名为编者所加。

时的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这话的意思又把政治、经济和文化分开了，所指的范围是窄狭的。那么同一个宣言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究竟是从哪一个呢？个人的意见，所谓中国文化建设，愿在广义上说，包含着人类生活的一切。第二，宣言虽一再声明中国文化有其特征；不要昧了自己的认识。但其特征为何，则未曾说到。这总觉得有点缺憾！

总之，我们要承认这篇宣言的价值。近百年来，世界交通，中西文化相接触，很明显的我们的文化是失败了！我们只见到我们自己在严重的不断的变化，而见不到影响到外人的是什么？我们的文化过去失败了，现在既已觉悟！无疑的要建设起自己的来。至于文化可以建设与否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去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内里包括新的政治构造，新的经济构造，便是新的中国文化。苏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无论是中国或世界的问题，已经到了问题的深处，可以说过去的文化来到现在都需要改造。问题既已到了这地步，实在不容我们不去建设新的文化了。所以我们对某种文化建设都表同情，同时〔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也是赞成的。

文化不妨说是建设。但新文化之建设一定逃不开它历史的背景。所以从现在说是建设，说到将来，亦无妨说是生长。文化建设既离不开它的历史背景，中国文化的建设，当然以中国历史作背景的，自然地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我看是无问题的。

有人对这篇宣言认为不免有保守的色彩，如胡适之先生等，我以为并不如此。有之，也是很淡，同时我也赞成胡先生的不保守的意思。我过去有篇文章曾说过一段话，是引的罗素的。罗

素到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很爱好，回国之后，常在文字上露出赞叹的调子。他曾说“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都需要新的建造。可是我不愿中国政治经济新的建造中妨碍了、消失了他固有的文化。如果有什么消失或妨碍，那是人类大的损失。我想以不妨碍中国固有文化之下解决她的政治经济问题。”从前有一篇文章也曾说到“罗素的意思和对中国文化的爱好与我相同，但他的话我以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解决政治经济或政治经济之建造时，妨碍固有文化的固不能要。若先有不妨碍中国固有文化的意思作条件，那就难了。我们可以忘记了罗素的话，扫除一切成见，只求眼前政治经济的解决。据我的经验说，当我们求目前问题之解决时，这问题是充分的含着中国历史的背景的。所以解决的方法得切合这问题。当你去解决问题而走上一条路时，那里是同中国固有的文化相合，自然会照顾到历史的。”这话的意思，是表明罗素的态度是保守的。便是保守我不赞成，我是赞成胡先生的态度的。

近百年中，我国受西洋文化的激荡，文化日趋损败，国际的压迫日加严重，直到近数十年来才有自救的运动发生——由维新而革命。在这前后民族自救的运动中我有点感想，觉这些运动都是被动而缺乏自动。我常把过去的民族自救运动从思潮上划分为两期。前期是从最初感受西洋压迫起，那时是羡慕西洋各国，乃讲洋务求富强。至民国初年，则感受了西洋近代的潮流，自救运动的目标在如何使中国成一个近代的国家，这时期从维新和立宪来说，受日本的影响很大。后期是在欧战停止以后，这时民族自救运动的思潮又到了个新的阶段。有力的表现，是十三年国民党的改组，十五年到十七年的北伐完成。这一期思潮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当初的讲求富强相反。前期之所

学者即后期之咀咒者。这种矛盾，就是中国未能自觉；被动的成分太重了。现在似乎走上自觉的路了，一面是中国不能老不自觉，一面是想摹仿西洋已无可摹仿了，所以中国不能不自觉了。十位先生的宣言也许是中华民族自觉的一种表现。这种自觉与自信，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重要条件。保守、我不赞成，但自觉与自信是必要的。

《文化建设》，1卷10期，

1935年7月10日。

## 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sup>〔1〕</sup>

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

中国文化这一句话，如系空空洞洞，毫无内容，我们说它就很不谓，我们必须找到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内容，那我们讲中国文化才有意义。不过这个题目很大，短时期内很难说得透彻，现在仅尽可能的同大家谈谈。

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就是在人类理性的开发早。中国文化的长短与西洋印度的不同全在此点。我尝指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有二：一是中国很早就几乎无宗教，后来亦不发达，宗教在中国文化里实占一不甚重要地位；二是中国在后二千余年中的社会构造没有什么变化，文化盘旋不进。如果大家抓住这两个特点，就可以追求出中国文化的特征，明白我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特征在人类理性的开发早”这句话。

我们就人类文化比较而论，印度过去的文明及西洋近代的文明，对于人类文化皆有很高很大的成就，同样的，中国过去的文明对于人类文化亦有很高很大的成就——这里应当注意的，文明与文化略有不同；许多人往往混用。比较来说：创造

---

〔1〕《乡村建设》旬刊编者按语说：关于此问题，著者于1935年春“曾在中山大学略一提及，由李渊庭记录”，后“又在研究部对同学讲演一次，由曹钟瑜君记录”；现在此文系黎涤玄先生据两次纪录整理而成。

已成之局面谓之文明，多少是具体些，而文化常指抽象的方式。不过这三方的文明各有其特异的色彩：如印度文明的特点是在其宗教畸形的发达。印度宗教的发达超过一切，很可以说印度过去是一宗教的民族。西洋近代文明的特点就在其具有征服自然的优越力与其征服自然的伟大成功。而中国过去文明的特点就是中国社会秩序很象是靠自力而不是靠他力维持。这是中国社会过去一种很大的成就，也就是最特别的地方。事实的确如此。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在过去多靠社会自力而不靠上面力量或外面力量。这在中国人自己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而在西洋人倒觉得很为奇怪。更明白的说，中国社会秩序维持靠自力而不靠他力，就是指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是靠社会礼俗而不靠宗教教会与国家法律。中国社会里边宗教教会与国家法律都无多大势力，而最有力量的实是社会礼俗。其所以如此者就在中国社会组织构造的特殊。从其特殊的构造才有社会自力维持秩序的事情。我们看人类社会直到现在都是一种阶级统治，社会秩序的维持都是一种机械性的维持法，质言之即是靠阶级的武力。要想在人类社会找出离开武力统制而能维持社会秩序的，实在难乎其难。靠武力维持的社会秩序乃是机械的构造，此机械性的构造是不知不觉盲目地演成的。社会秩序不靠阶级统治而能有秩序，本要在人类未来的社会才能有的，而中国过去仿佛近之，此是最使人惊异的地方（注意“仿佛近之”四个字；一说仿佛近之即不是真有也）。不过中国过去做到不要阶级统治之社会秩序，乃以消极得之。中国过去社会秩序的维持认真说来，还不是到未来人类社会才有的社会秩序。

中国社会秩序靠礼俗教化维持是表面的现象，理性开发早才是深刻的所在。礼俗教化（教化并非宗教，亦非教育，却很

近于社会教育)的内容就是理性,所谓自力,其内容亦即是理性。然何谓理性?何谓开发早?一句有一句的意思,不可不加以说明解释。理性就是平静通达而有情,与理智不同。理智是人类生活的工具,有区划抽象打量推理的作用。理智不蕴含情感。理性则是人类生命的本体。生物进化中,脊椎动物自鱼类、鸟类、哺乳类、猿猴类以迄人类,渐次进于理智,渐次远于本能。脊椎动物靠理智作生活,原是一种生活方法的进步,这是指所谓理知或后天创造学习说。可是因为生活方法的进步让人类生命的本质变质。人类之所以超过其他动物者就在理智的优越,复从理智开发出理性来。换言之,生物进化到人类就开出理性来。理性是人类所独有,其异于禽兽者就在此。故理性是包括理智的。人类特别具有抽象的认识力,动物则只有从具体的认识发生行动。此种具体的认识,人类固然有,而其特别处实在于他赋有一种抽象认识力,能于行动发生之前,徘徊考虑。人类此种抽象认识力对于宇宙的道理能有认识,此亦即所谓理性也。宇宙间的道理可分为二个范畴:一是事物之理,简言之谓物理;一是人情之理,简言之谓情理。人类对于此两种道理都有认识的能力。不过人类走的路未免各有所偏。大家如看中外书籍则可以发觉西洋书籍所讲的关于物理者独多,中国典籍所论的则情理特多。中国过去常说:“读书明理”,其理乃指情理而说,非指物理而言也。理智与理性不同,认识物理的能力为理智,而认识情理的则为理性。理智是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能力。人当理智强盛明锐时,感情就被屈压,如普通所说的“头脑冷静”,即是理智作用强而感情不起的现象。反之,如感情激剧浓烈时,理智也被摈弃;如我们发怒、愤恨、悲哀或欢笑等一切感情被动时,就不能再计算数学,分析原质或解



剖形体了。可见理智并不含蕴感情，而理性则以感情为主要成分，所以能认识情理。而理智则只能发现物理。我们人类本来理智优越，可是我们不要单注意它，更要注意的为人类的理性，此实是人类最可宝爱的东西而为动物所没有的。我们从理性可以见出人类生命的特殊来。理性发达是能把愚蔽与暴厉之气消除的。如果人类社会进到了理性的地步，人类的许多惨祸都可免除；所以我们不能不更重视人类的理性。

现在大家也许要问，中国为什么无宗教？这事孔子最有力量。孔子以前或孔子以后的人，大家都努力启发人类理性，使宗教在中国社会无法成功。理性使人往开明通达中去，叫人有自己的判断，宗教则总是使人有所信仰于外，信仰于他。宗教常常要建立一个大家共同信仰的目标，如神、上帝乃至其他种种；而孔子这一派总是让人“反省”、“问自己”、“求诸己”，让人自反于理性，自己把自己的理性拿出来。更明白的说，孔子这一派人让人自信而非信他，把判断标准放在自己理性上，这实是与宗教顶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每一时代或每一社会，对于众人的行为都有他不可少的是非好歹之价值判断的标准而无能例外的。在其他国度，社会这个标准往往从宗教来，以宗教教条或教主的独断意旨来判断人的行为善恶；标准总是放在外边。中国的孔子则不如此，他很早就让中国人对于是非好歹有其自己的价值判断。中国过去宗教法律都不占重要的位置，亦可说拿人类比较而论，道德开发的早而发达，应当说是中国人。我们看中国古代典籍内所说的就很少迷信与神话，世界各国的古代典籍恐怕没有比中国那么开明通达的了。中国社会内普遍传诵的四书，其中的话就非常开明通达，其他古代典籍都不能比的。四书里面的话通通是发达人的理性的，无论什么事情，差

不多都是说：“你想想看如何”？如《论语》宰我问三年丧：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

三年丧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件大事，问题很不小，而孔子仍然将此问题放在各人自己的理性判断上，并不寄于迷信。继孔子而能发挥孔子道理的是孟子。孟子说：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理义之悦我心犹藜藿之悦我口”。

这通通是发挥人类理性的话。儒家的路子就是发挥人类理性的路子。继孟子而发挥孟子道理的是陆象山、王阳明，他们俱是特别要人返于理性，这是很显然可见的。

中国人的确在很早的时候其理性就有相当的开发，中国宗教的不成功、社会的散漫率由于理性开发早的原故。孔子很早就启发中国人的理性，这样就伏下一支散漫的根。他将是非好歹全让各人自己判断，自律而不靠他律，宗教因以不盛。西洋古代宗教特别占势力，以宗教的信仰为众人心理的系属，以教会为社会的中心，这样从宗教而有社会团体生活。中国宗教不盛，所以就让中国散了。中国社会之没有团体生活即从中国没有宗教来。我刚才说任何社会都有其价值判断，如果拿西洋中国过去社会比较而说，西洋社会的价值判断从宗教来，中国社会则从道德来。道德是自律的，宗教是他律的；道德的根本在理性。孔子既然很早地就启发中国人的理性，所以中国特别富于道德而宗教自然不成功，社会也就散漫了。西洋道德与宗教不分，中国人宗教与道德、罪福与是非，分得最为清楚；中国人是非观念非常发达，行为准绳以义理为依归，西洋人则以罪福观念决定行为。在中国人

对于宗教的怀疑，却并不引起道德的怀疑；宋明儒多半是无神论者，而宋明儒以最讲道德者著闻于世。如罗素所说：

“在中国宗教上的怀疑，并不引起其相当的‘道德上的怀疑’有如欧洲所习见者。”

于此可知西洋人对于宗教的怀疑就可引起道德的怀疑的。但必有人说中国岂无宗教，如回教、佛教及后来的耶稣教，乃至其他种种迷信，难道通不算宗教吗？这里我要答复他：拜神拜物的低等迷信行为任何社会都有，中国也不能独免。然而整个系统的宗教信仰，一大规模的宗教行为，国家制度、团体组织的宗教活动，中国有吗？在中国社会里最有势力的并不是宗教而是道理。中国人最喜说，“宗教虽多道理则一”的话；这诚然模糊笼统得好笑。不过从这句话可以见出中国人是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从中国人看，一切宗教都自一个理来。有一位日本学者伍来欣造，他曾在欧洲多年，对于儒家有相当认识，他说我们在中国儒家看到理性的胜利，中国儒家不崇拜神，不崇拜上帝，不崇拜天，不看重君主国家权力或多数人民，而只把理性看得最高。当儒家将上帝、君主或多数（民意）看为最高的时候，那末他一定是理性的代表。儒家主张人应当绝对服从理性，是非好歹、对与不对，均靠自己判断。在儒家什么也大不过“理性”，理性就是“对”。所以他看儒家是理性最高主义者。这个意思我觉得很是对的。

西洋在中世纪时是宗教时代，理性很不发达，只是充满了迷信与固执，文化甚低，粗暴之气甚厉。西洋近代文明虽可说创造到了高的境界，但所发达的仍是理智而非理性；西洋近代科学昌明，征服自然有伟大的成功，皆是理智发达的结果，至于理性却没有随着理智的发达而有相当相应的增展。理智发达，

脱开宗教的固蔽，然理性终未怎样发达，西洋近世纪的文化情势大抵如此。时至今日，西洋的文明已到了很成问题的时代！他的文明里充满矛盾与冲突，阶级与阶级间的对立厉害，国家与国家间的森严壁垒，造成了严重惨酷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现在世界充满了惨祸！这些惨祸是从那里来的呢？这就因为西洋人理智特别发达而理性却没有跟着有相伴相应的启发进展。利用自然的科学发达了，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学术赶不上，因此由自然科学所产的好东西不能造福于人类，反而遗祸于人类。今日人类相杀戮的惨烈与战争的凶残，即由于理性的发达不足，不能统御善用理智科学的结果之故也。上面这些话即现代西洋许多学者，也都承认了的。

人类祸害的由来，除天灾外，就是愚蔽与粗暴了。中国古人创造礼乐，施行教化，就是要让人类愚蔽与粗暴减除；礼乐教化的内容即是理性，所以人类得救一定要靠理性。西洋人征服自然现在不能不算有很大的成功，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不小，这些为中国过去的人及印度古人所干不出来的，不得不令人赞叹。但西洋的科学技术发明不能怎样给人类造幸福，而却增大了人类的斗争，此由于理性发达之不足。从理性的发达，才能让人生命都得到安适，才能使此一社会与彼一社会相安，才能使人與人相安，而自己亦安。可惜西洋人于过去于现在都是理性发达不够；如其够的话，也不至于有这样很悲惨乱糟糟的世界局面了。

中国文化特别的地方皆从人类理性开发早而来；——任何一点皆从此出。我们可分两点来说：一点是中国历史长，幅员广，人口多，屡被征服，屡能复兴；二点是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多靠礼俗，社会组织构造历久不变，文化盘旋不进。现在先

说第一点。我们看世界有独立自创的文化之民族差不多都完了，即存着的亦多不能独立。自古有独立自创的文化而国家尚能独立存在的，世界只有我们中国一国。我们中国文化绵延这么久，国家寿命如此之长，而且不仅如此，文化向外拓展范围亦很广大；其所以能这样的缘故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在人类理性，即是说中国文化的根本在人类生命深处有其根据。她的文化有很丰富的理性，有很深厚的根据，故能大能久；此所谓源远流长，根深叶自茂也。在历史上中国民族有时被异族武力征服，政治一时虽失掉自主，但以文化的优越力，却终能复兴过来。我们中国以其独立自创而富于同化力的文化维持其民族生命，从时间上说，未能打断她的历史。再在空间上说，中国的疆土日开，人口日众，非由于武功，而亦是由于文化。靠武功虽能开疆拓土，但不能久；因以力服人，人家受不了，不久就反动起来。中国之所以能广土众民，乃以其文化的拓展而范围愈来愈大，所谓以德服人也。中国能以文化同化别族，能使被征服者不觉是被征服。别族同中国接触日久，觉得中国文化路子不错，心神契慕，不知不觉就跟着中国走，跟着中国文化走，而却并不起反感，觉得失掉了自己而中国化了；这就是因为中国人先抓住人类生命深处的文化根据，故旁人不能不跟他走，盖旁人亦同为人类也。中国幅员之所以广大，人口之所以众多，非由于强大的武力征服，而是由于优越的文化，由于人类的理性也。再说第二点：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只看见一治一乱的循环而无社会组织根本变革的革命出现，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形著于礼俗，中国社会秩序建立于礼俗之上的原故。人类历史到现在，所有国家都是阶级统治，阶级统治的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一种相对之势，都以镇压或打倒对方为其出路，所用者

皆为强力——武力与暴力，所以阶级社会的变革非用暴力革命不成，非从根推翻与重建社会秩序不成。有些人说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并不怎样错；欧洲的革命就是这么一套。中国历史上何以没有这种革命呢？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特殊，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在社会的伦理关系中，大家以情义相连锁，彼此顾恤求相安，何来革命？在职业分立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眼前找不着障碍他的对方，何用革命？而况中国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礼俗的（每一社会组织构造形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是即其社会秩序），所以中国就用礼俗教化维持社会秩序而不靠强力。找不着革命的对象，就很难革命。中国社会秩序靠一种公认的礼俗而不靠法律，这也不好革命。法律是从外面力量加于众人的，其入人者浅；礼俗则是从社会渐渐演成下去为大众所共认共习，其入人者深。中国社会秩序很少寄于法律，而多寄于礼俗，即是它少靠从外来加于人身上的东西，而多靠与他习而为一的东西。因礼俗入于人者深，故极难动摇变革，而社会秩序就这样自尔（有）秩序了。中国因社会秩序之多寄于礼俗，社会组织构造之形著于礼俗，故中国历史上无革命；没有革命即社会组织没有根本的推翻与改建，故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历久不变。可是中国历史上虽无革命，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则正在革命中。中国历久不变的社会组织现在已经崩溃解体得差不多了。今后必须重新创造它的新社会组织。革命原是改变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故我说中国今日正在革命中。不过中国革命很难完成，这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秩序过去多寄于礼俗少寄于法律的原故。刚才曾说过，礼俗从社会中渐渐自然演成，入人者深；而法律由外面力量加入，入人者浅。法律可以一转移间大改旧观，而

礼俗的改革创造则非一蹴可就。今后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也不会从礼俗转到法律，而要仍旧建筑于礼俗之上。不过所不同者，此乃一新的礼俗而已。这是从中国历史背景规定下来的必然性，实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如此的事。至于中国文化盘旋不进仍由于中国理性开发早而来，此点留在后面再讲。

理性开发早是中国文化特长的原因，而其表征出来的有二点；这两点即是从人类理性发出的。——

**(一) 伦理** 中国旧日社会非个人本位，亦非社会本位，而是伦理本位。中国是集家而成国，看一个人是某家里的人，而不是如西洋社会以前将人看成是教会的人，以后又把人看成是国家的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人与人都在相关系中有其情谊义务而互以对方为重。中国人天伦骨肉之情最笃切，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幼其幼，人与人期于相依而不期于相离。与西洋社会风气比较很不相同。中国人生上极占重要位置的是家庭与宗族，亲戚乡党亦看得很重，其他如师徒东伙朋辈，皆推准以家庭骨肉之谊，比之为兄弟父子的关系。所以中国社会人与人的情义益以重。在西洋，社会习俗国家法律恒出之以人与人相对之势。在中国则莫不寓于人与人相与之情。故中国人之人生趣味很丰厚。此中国文化从理性开发出来在人生上的优特点之一。将来人类惨祸减免，人生平安幸福的享受与最进步的社会组织，一定要建筑在互以对方为重的人生情谊关系上；苟不如此，恐无办法。

**(二) 人生向上** 印度人否认现世——宗教是否认现世的——看人生是不对的，看人生是罪恶的。近世西洋人肯定现世，承认欲望，追求现实幸福。中国人恰好在印度与西洋之间。中国人是肯定人生的，但他不承认将人生放在欲望上面。中国人

非禁欲主义者，不富于宗教禁欲的倾向；然同时对近代西洋人欲望的人生也是不承认，而觉得骇怕的。从中国人看这两边恰好都不是人生，都不是人生的意义价值所在。中国人人生之所求者为“对”为“理”。如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见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这就是他的心事，这就是他的努力之所在。中国古人严义利之辨、理欲之争，就在反对欲望的满足，求人生之合理。中国古人对人类有所认识，其所求在发挥人类向上精神，继续不断的向前扩展人类的可能性，往深处去追求他的理。这种人生向上精神是中国古人及后人所特别努力发挥的。他方似不如此。

伦理与人生向上都从理性来，而理性的内容亦就是伦理与人生向上的精神。人类自己有更高的更大的要求，其对象与欲望是不相同的东西。中国人的特长，就在他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就是以上所说的两点，此外再没有了。

我上面说了这么多的话，仿佛都只是说了中国文化优长的所在。这个我是原无此意的；我只是很客观地将中国文化加以剖析说明，却并无好恶爱憎于其间。可是容易让人有些误会。其实，我并不否认中国文化的短处。现在且让我们说一下中国文化的短处。天下事；长短每每相为伏倚。中国文化的短处即从其长处来。我常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可说这一句话道尽了中国文化的长短。原来人类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人类对自然的问题；一个是人与人的问题。循自然之常理，人类必先完成第一期的文化，即人类对物的问题得有所解决，才开始第二期的文化。中国是人对物的问题尚解决得不够，就向第二期文化——人对人的问题——迈进了。这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理



性开发早了点（此所谓理性开发早是指人类对自然征服或理性开发不相当而言）；盖理性之在人类是渐次开发出来的，无论从个体生命说，社会生命说，都是如此；就个体生命说必须生理发育到一定阶段，理性才能开发出来；就社会生命说，必须生产技术有相当进展，社会经济有相当进步，理性才能开发出来。中国则是社会开发理性的条件尚不够，在一个不应当开发的时候，理性竟然开发出来。换言之，即是无相应的物质基础，而理性早开发出来了。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而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健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之发育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故名之为早熟。而前面所说中国文化到秦以后几陷于一种盘旋不进的状态，其道理也就是这个。

中国文化的短处在社会的散漫，与文化的消极无力，这也是由于理性开发早而来；理性开发而对于自然问题的解决不够，无相副的物质基础，就见得早了。中国的散漫消极都从中国对自然创造的不够而来。此外还有一短处就是中国文化已衰老僵硬化。中国文化的短处，在这一点是更大的。理性开发早的中国文化，原本很少机械性，但因其文化历久不变，传之愈久，就愈往机械僵硬化里、衰老里去，失掉了原有的精神，所以就很难不容易让人发见他里边所蕴藏富于生命意义的理性，最有精彩情趣的地方而加以欣赏。中国文化的硬化，就是被一种天然的选择，把一种本身有意义的事情变成一种手段而用它。兹举孝为例。人子对亲之孝是很可爱的事，很容易使人欣赏，这当然不是手段，其意义即在其本身。但因社会有自然的选择，社会感觉孝之好，社会要使一切人子都老实，使家庭不生问题，于

是孝就被社会选择为手段；于是人人提倡孝，多方奖励孝，排斥不孝，到了硬化机械化的时候，那谁也不敢不孝，孝遂成为维持社会的有效工具。孝之本身的意义价值精神统统失了，孝之理性的生命源泉就涸竭了。五四以后颇有人把孝看为是吃人的礼教；其实当初中国文化里无所谓礼教这东西，弄到后来礼教有些地方相当于宗教；有些地方相当于法律，并较之更有力量与权威，乃是文化僵硬化化的结果。孝即其一显例。本来孝在人类生命里有其根据，换句话说，即在理性上有其根据；因后来被用为手段，故此离开人类生命的本原。本来中国文化最少机械性，因传之太久始如此；待到机械化了，原意遂失。成为非那样不可的机械习惯，就必然的惹人反感。近几十年中国的青年，因受到外面新的刺激、新的启发，苏醒了一点中国新的生命，而对中国老文化嫌厌，由讨嫌厌弃的心理进而破坏它，这也难怪。中国如此之大，长处很不易为人所认识，而文化又到了僵固机械化的境地，仿佛看不出有可爱的地方。故中国近几十年的新觉醒者乃欲脱出本国固有文化的圈而另起炉灶；现代中国的革命也就是这么一种对中国老文化起了反感而来的运动。在我看当初不反恐怕也是不行的。

从近百年的事变看来，中国文化已是失败了，而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社会的散漫消极与文化的衰老无力，对于包围他的新环境缺乏适应的能力。今日中国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即由于它的文化病而来。中国社会的这个崩溃的趋势不到最后是不止的。待到中国文化机械僵硬化了的东西（即中国文化里有形的东西）崩溃解体彻底粉碎之后，那中国文化颠扑不破不可抹煞的真精神——理性，才能自然被人发现。现在中国文化是必须改造，中国必须建设一新的文化。而此所谓建

设中国新文化，也只有重新发挥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神——理性，来改造中国的社会，绝不能离开了理性而别有所创造。

据我的观测，人类前途在最近一定过分发达其理智；理智过分发达而理性无相辅并驾的发达，人类将陷于其自造之惨祸里而莫能拔。从不好处看去，人类或将要灭绝；但我是从好面看，我想不会那样，人类终归要得救。以我的测度是中国人先得救，由中国做人类理性的前驱。使人类得救，中国今后仍须发挥人类理性来建造自己的新社会；当我们中国人努力于这个伟大工作的进程中，可以理性领导人类，使人类得救。此层人将不相信，以为是太夸大、太妄想，其实不然。中国人之所以最先得救而救人类，其理由颇简单：

一是中国人类理性开发早；

二是中国文化自身破绽暴露早。

中国文化的失败先于西洋人的失败；中国文化自成一套，自成一家，而其破绽则最先暴露，——谁最先暴露，谁就最先想办法。中国是理性开发早，而人类的得救还须靠人类的理性。中国实是人类理性的先导者，中国焉不早得救而救人类？如我刚才所说，今后中国人仍须发挥人类的理性，建造其文化，在此工作中，可以使世界一同得救。

说到此地，也许有人问，中国文化果那样优美完满吗？毫无缺漏么？不错，中国文化是有缺漏的。如：

1. 团体组织之缺乏；

2. 科学技术之不足。

中国文化里所缺漏的这两件东西——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而恰是西洋人近代对人类文化所创造所贡献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要吸收西洋文化之长处优点，补充中国文化之短处缺点；我

们要发挥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将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建立在人类理性上，形成人类正常形态的文明。

中国文化是要在方法上理智上补充；西洋文化则要在人类生命的本体上求进步，理性上加补充。人类终须从理性方能得救，此毫无疑问；然许多人看不到此，因此看不出中国文化的价值。

末了，我来说一说我们中国民族自救的觉悟。在我看，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的觉悟，要由两步走到：

第一步，觉悟乡村的重要，从乡村入手想办法。现在中国已正觉悟到此一步。

第二步，觉悟中国民族精神之特殊，中国固有文化之真正价值。我们中国人觉悟到这一步，方是真的民族自觉的时候。觉悟到此一步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民族自救的办法。

《乡村建设》旬刊，4卷25期，

1935年5月1日。

## 办村学的目标<sup>〔1〕</sup>

我现在预备给大家讲的话，也许可以有系统地一直讲下来，也许是没有系统地择要紧的话说给大家。

我认为顶要紧顶要紧的——要大家自己心里有，也更应叫乡下人心里有的意思，就是两点：一点“靠自力”，一点“靠组织”。此即是说乡下人要靠自己，乡下人要联合起来。这两点意思，在辅导员村学教员都要成为信心信念，要有坐卧不离，念念不忘的精神。由我们有这个意思，也要乡下人有此意思；这就是所谓启发农民的自觉。如果他自己的心还茫然地模糊地找不出来问题解决所依靠之点在什么地方——靠谁去解决，仍以靠别人力量为是的话，乡村建设这事就没有办法。我们要叫他们知道这事非靠你自己不行，一切事都必须靠自己力量去做，才可有办法。最好将这类意思的谚语，例如：“人贵自立”“求人不如求己”这些话，讲给他们听，介绍给他们。乡村谚语大都是最精练的话，是许多年许多人的经验编造而保留下来的；他的形式很简单绝不累赘，意义很明白，你一说出，人人都可以了解他，并且可以在口里诵念出来。我愿大家常常选择好的谚语讲给乡下人听，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心里口里都能体会他的

---

〔1〕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讲演，其续篇为《村学的做法》（见本卷）。记录者张虎鸣、黄省敏。

意义而念出来。这是做功夫的一面。还有一面要拿事实指点给他们。无论什么事，隔着一层皮就不行；“隔”就不能亲切实在，就不能发生效用。比如你的痛痒，我不能代你去搔，我的痛痒也不能找旁人去搔；因为各自的痛痒只有自己才感觉得亲切，旁人代搔绝对不会搔得恰到好处。诸如此类，非得多举事实为例，给乡下人讲“非靠自己力量不能解决问题”不可。比如农村自卫问题，可举出自己保卫与雇佣保卫——以作团丁为职业者——比较两者的优劣。以前邹平明家集、青阳店、花沟等处都雇有团丁，只明家集一处养团丁八十余名。这些雇佣的团丁因为不是农民自己，所以他就不能真顾及你，并且可以为害于你。这就是因为他不是你；如果是你自己的话，绝对不会如此。他们不是你，所以不管你的负担重不重，他并且利用这个机关做许多非法的事，他实在与你太相隔了。再往大处去说到政府官吏。论理说，世上没有存心想害人的人，然而结果则成相害，都是因为安排得不合适，都是因为“没有能放到靠大家自己的地步”的原故。你原来的用意，也许就是要靠政府给你想办法；用意在此，而因为他是与你相隔，他另外有一个心，另外有他的立场，虽然他无意害你，结果就仍然是非害你不可。我现在说的话很笨，意思是要大家想，是要大家想通一切事情只有靠自己力量才是办法，人家绝对靠不得。以上从谚语上事实上两面尽量对乡下人讲，使乡下人将靠自己的意思成为信念。但欲乡下人有此信念，必须辅导员、村学教员自己心里先有此信念才行。必须你自己先透彻此意以后，你才能讲，不然讲出也不能动听。如果你有此信念时，最好在这点上，无论遇着大事小事都要反复的指点给乡下人。

再一点就是靠组织。以前在中国谚语中表示靠自力的话恐

大都是属于个人的，属于小范围的；但现在最要紧的便是靠自力与靠组织要连在一起。为什么要靠组织？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再不象从前关门过日子，各自做好人了。几十年以前的中国人都是那样过生活，现在再想象以前那样过生活是不行（为何不行，后面说出）。今天绝对不许你了。这话必须给乡下人详细地讲。

要联合要靠组织这点与才说靠自力一点与中国文化原是不相违背；但不能不说是一个较新的方向。我们心里越是看清楚现在的中国问题，越觉得这是领导乡村农民的一个新方向。这时不独在我们心里应知道这是新方向，我们更应使乡下人都明白这是新方向才行。不明白，方向就不正确；方向不正确，就没有力量。所以非给他们讲“中国种种失败”、“从前可以关门过日子，现在不能再那样”的话不可。我们现在对于乡下人的心理思想要从两方面来着想：一面是要稳定其心理，一面是要开出其新路子。在乡农学校内关于“精神讲话”这一科就是作这工夫的。我在《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一文中曾说过一段话：

“……在我们看现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不止是经济破产，精神方面亦同样破产。这是指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此其所以然：（一）是因我们文化或社会生活的变化太厉害。农业社会照例是保守的，尤其是老文化的中国乡村社会有他传之数千年而不变的道理观念。自近百年来与西洋交通以后，因为受国际竞争的打击，世界潮流的影响，乃不能不变。最近二十余年更激烈急剧的变化，或由上层而达下层，如变法维新革

命等是；或由沿江沿海而达内地，如一切生活习惯等是；而最后的影响都是达于乡村。他们被压迫的随着大家变，却不能了解为何要变，并且亦追赶不上；但又没有拒绝否认的勇气与判断。失去了社会上的价值判断，是非好歹漫无衡准，即有心人亦且窘闷无主。（二）是几十年来天灾人祸连续不断，他们精神上实在支持不了。消沉寡趣，几无乐生之心，况复进取之心？此种心理如不能加以转移开导，替他们开出一条道来，则一切事业都没法进行。这种工夫就是我们的精神讲话。大概起初要先顺着他的心理，以稳定他的意志，将中国旧道理巩固他们的自信力。如此，则我们与农民的心理感情才可以沟通融洽。然后再输入新的知识道理来改革从前不适用的一切，以适应现在的世界。”

真是如此。尤其乡间之有心人及老年人，曾经过以前的好日子又看见现在的世界，他真是一定摇惑苦闷，他们的心中都有很深切的伤感。此时必须在心理上给他一种稳定才行。如何在心理上给他以一种稳定呢？这必须本着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人生向上”与“伦理情谊”，为他们讲明白。这两点为他信念的根本。他们口里也许说不清，而胸中则不容易昧；原是不可抹杀的真理，而一时遭遇外来潮流的摧残抑压，以致摇惑苦闷。我们必须先申达此理，稳定住此种信念，不要陷于没有是非好歹之中。这是一面。就是必须往新方向去领导，那非使他们看见中国人的失败不可。跟他讲中国之失败，这个题目太大；但为中国最眼前的事实，亦不难给乡下人讲。以上的一段话，因为要大家对乡下人不能象从前各自关门过日子，必须讲中国今日之失败；要讲中国之失败，一面必先稳定其心理，一面才可给他以一个新方向。当他心理不稳定时，你不能给他以新方



向。至少两面必须同时做工夫。此为大众所必须注意者。

底下从中国今日之失败这一点来讲。今日中国之失败在两点：（一）在缺乏科学技术，（二）缺乏团体组织。此皆我素常讲过的话。这两点随时随地遇着事情问题都要指点出来给乡下人，让他们深切地觉出来我们所失败者在这地方，然后才可以领导他往靠自力靠组织的这个新方向上来。我前在本县警卫队，因为讲话对象的关系，讲过一个很浅的讲演，他们听着都还能够觉得明白合适。（题为《现在不是从前了》）兹引述于下：

“从前乡下人可以各自关门过日子，你种你的地，我种我的地，谁用不着管谁；现在不行了！从前我们只要不作坏事，正经居家过日子，就算好人。人人正经过日子，不但自己好，天下也就可以太平。现在不行了！”

现在世界不同从前。自打近百年来，东西洋大交通，这世界就变了，——变成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人与人竞争，国与国竞争；武力竞争更加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主、武力竞争还居其次；经济竞争是常恒的；武力竞争不过在一时。这激烈的经济竞争，便是今昔最大不同之点，根本不同之点。我们说现在不能照从前各自关门过日子，就是从这里说的。

怎说不能了？打泰安上莱芜要经过一个范家镇，听说从前这镇上都是造针的（缝纫所用的针），生意很发达，现在这镇上人烟稀少，造针的一个也不见了。为什么如此？就是外国造针的与我们竞争，结果我们不能造了。河北省迁安县乡下从前造纸的最多，现在纸也造不成了。胶东沿海一带，北至利津等处渔户最多，这一两年鱼也打不成了。邹

平从前农家织布的，养蚕的都很多，现在织布的还有几家？养蚕的不也少了吗？这一切皆所谓经济竞争。大概通商以后，外国的工业首先压倒中国的手工业；让你靠手艺吃饭的吃不成。但前些年手工业虽被破坏，农业还可对付。到这两年又进一步压迫到农业上来，种庄稼的收的粮食不能换钱（在南方在北方全是如此）。这不是地亦没法种了么？我们靠什么过日子呢？

外国人何以这样凶呢？其实只不过两点：一点是科学技术，一点是团体组织。何谓科学技术？就是天地间一事一物，他要明白其所以然的理，明白物理就会生巧法。你看汽车火车跑的多快，飞机飞的多高，电话能使相隔千里远的人对面谈话，他这法多巧！诸如此类的巧法，运用于工业农业，运用于交通运输，而我们旧日一切，都是笨手笨脚的，哪里赶得上他这汽机电机的机械力量大？他胜我败，关键在此。何谓团体组织？人多了合起来，亦能象一个人似的敏活，就是有组织，就算一个团体。外国人事事都有团体，团体作用最强者便是国家，而旧日中国人则散漫不过，名为国家直没甚作用。近二三十年来，不但“散”更加上“乱”。这散而且乱的中国人哪里赶得上人家整个国家力量大？他胜我败，关键在此。总而言之，就是他的力量大。

近二十年来科学钻研，技术又有大进于前者，而风会所趋，团体统制亦格外加强，其作用更显，发挥出来的力量，真是太大太大！以简陋拙笨的技术，零散单弱的中国人与他相遇，不是人家不留情，实在是我们无存在余地。在这经济竞争的世界里，要想吃口饭，真没有我们的份。可

怜乡下老百姓，还做各自关门过日子的打算，真是睡在梦中呀！

中国人今日要图生存，就得：

第一、力求改良进步，不可再守着旧法。

第二、大家联合团结，不可再各不相顾。

总而言之；象从前消极不为恶的做好人不行了，必须积极向上求进步学本事；象从前各自关门过日子不行了，必须不要各自打各自的小算盘，而联合起来打一个总算盘。这二者又是相连的，因为科学技术没有简单的，非大家联合起来发挥团体的机能不能采用，例如我们棉业合作社联合会的轧花机，如不是联合起来，一家一户如何能用它？所以联合团体又为采用运用科学技术的根本，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亦自然促进社会关系团体生活。在这竞争压迫之下，中国人非联合起来不能自保，非大家有饭吃，我个人的饭吃不成，非社会有出路，我个人不能有出路。

只有联合，才可自保，才可过日子。联合！联合！联合是第一要事。若问靠谁联合？那就是靠种庄稼的老百姓。第一，中国人就是种庄稼的老百姓多；要中国人联合，那先就数着种庄稼的老百姓了（象英国人要联合就必靠他们的工人，因为他们工人最多）。第二，联合须靠生产者，因为所要应付的问题是经济竞争，靠念书人做官人联合没有用。说到生产者，那在中国又先数着种庄稼的老百姓（工人甚少）。从前只有老百姓求着念书人做官人的时候，而没有念书人做官人求着老百姓的时候；现在不不然了，非靠种庄稼的老百姓起来联合团结求进步，那念书人做官人是一点办法没有的！在乡下老百姓自觉着无关轻重，不算什么，

那知天下大事正是靠他呢！

没有旁的，我们只盼望乡下老百姓要明白，现在不同以前了！”

这段话是补充上面所说：以前能各自关门过日子，现在不能不联合起来过日子。总之，现在只有联合起来才是生路，各自单独去应付环境都是死路。明白这个意思，你可以有很多的话可说，上面我不过说出一个说这话的例。在说这话的时候，心气必须平稳，不要说得太急太骤，不要刺激得太重了，使他有些不安；不安他倒不一定能够跟着你走。你必须心平气和地提示出问题，使得他们暗暗点头才行。至于我们的这个意思，大家必须想得很熟，满脑子满肚子都是这个意思，然后才可以领导乡下人。能够说明这个意思的话很多，全在大家自己用心去想。我在《村学乡学须知》中“学众须知”一段，就是申明“人生互依”的意思。我于举过古人所说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话以后，说一段话：

“结这个团体干什么呢？为的是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一家兄弟同居，弟弟要强，哥哥不正经干是不行的；夫妇俩过日子，这个好好的过，那个不好好的过是不行的。全村人大家都不齐心，没有能办好的事。不但一人不好，连累一家，一家不好，连累一村，并且村里情形不好，影响一家，家里情形不好，影响到一个人自身。要一身好，还须要一家好；要一家好，还须要一村好才行。因此我们全村的人要联合起来，共谋一切改良的事。大家振作，合作整顿”。

我都是在反复地讲明个人与社会这两面的关系。在阐明人生互依的道理，使大家都认识“社会关系”（或称社会连带关

系)。自然越是亲近的人，越与自己有关系；比如自己的女人小孩老人有一个病了，家里的事情就不好办。进一步说，不独自家人互相依靠，即邻里乡党乃至一切人都有连带关系。任何一个人都必与自己周围的人发生关系，或远或近可以直接间接发生关系，绝对不能跳出这个社会圈；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人群而独自生存。这个道理必须使乡下人深切的认识，然后才不至于只从自己片面去设想，而忽略了社会，不顾众人。比如我想要我家里的子弟不赌博，必须先设法消弭乡村中赌风，邻里都赌博，自己子弟殊难禁止，全村赌风尽息，自己子弟自然不赌。所以必须往大范围去设想，必须往社会连带关系上去着眼。这种例子很多，如蝗虫、水利等问题都是如此。所以总要使他们明白不要在小圈圈只替自己想法子；单替自己想法子是不行的。

更进一步说，我们如何想法子呢？就是联合有组织。比如禁烟禁赌等事，必须大家联合起来，运用组织的力量共同去戒除，共同去监督，共同去如何如何才行。这就是从增进社会关系上来解决社会问题，——要认识社会关系才可以不至糊涂，起狭小念头，要增进社会关系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如此从社会的出路中，自然得有个人的出路。这是一个最正常的道理。这个意思大家平常在心里口里都应很熟，一说话就拿出来，才可领导乡下人往组织里去。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一句话。前面所讲关门过日子不行等话，是讲目前中国的特殊问题（说明中国的所以失败及其转机所必由之道）。这后段所讲的认识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关系，则是人类生活正常道理。从“特殊问题”与“正常道理”两方面去输入到乡下人的心里，然后才可促其往团体组织中去。今天所讲

的道理大家必须在心里想得透彻，而后才可以点透乡下人的心。真正在这里能点透乡下人，这个村学才算成功；这一点不成功，一切都不相干。在这时大家应当深思其中的道理，并应当练习说话的技术。

《乡村建设》半月刊，5卷1期，  
1935年8月16日。

## 村学的做法<sup>〔1〕</sup>

以上所说是办村学的目标，非常重要，下面的话是说办村学时的做法。目标不容商量，而做法则可以研究如何为好。我们怎样去做呢？在我想，我们的村学一上来就得采用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做法。我们今天就讲乡约问题，不过在开头我要从旁的话渐渐引到乡约。

我曾讲过，西洋人从很古的时候，就有集团生活之锻炼。他们是不知不觉地走上去的，其机械性很大。而在中国人过去的的生活完全是散漫的。两千年来人民都各不相关的自生自灭，一直到近百年东西洋大交通以后，中国的缺点暴露出来，所以现在才要求组织。这有意识地求组织，就与西洋人大不相同。他如果成功，必富有理性，而为最进步的团体生活；可是我们的组织很难得成功。有意的来做就难。为什么呢？因为必须多数人皆有此自觉而发为要求，此自觉的要求需要相当经济进步和教育工夫才行。除却经济进步教育工夫不说，则其所以维持此组织之道就不大易。因为机械性的团体，其所以维持似假外力，似循乎自然之势而不靠人，而此理性自觉的组织，则正要靠人自己。在一个团体组织中，必须一面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或精

---

〔1〕1935年8月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演，为《办村学的目标》之续篇。张虎鸣、黄孝方笔记。

神)都能够比较安定;一面人与人彼此相与之间都能够弄得很和洽才行。现在此安定与和洽皆须靠多数人自己,所以难了。我们必须求其得以安定和洽之道。

在我们看丹麦的农民,是很富于团体组织的生活,并且此团体组织还很富于理性。如丹麦的合作社很繁密很发达,而此繁密发达的团体生活只是靠着一种良好习惯和每个人很高的精神来维持。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丹麦社会一定有其安定住个人生命及使人与人和洽之道。据我们所知,丹麦社会组织之发达与组织之理性化实完全靠丹麦的一个大教育家格龙维先生所提倡的“宗教化的教育,教育化的宗教”。昨日恰好范云迁同学寄来他译的日本小野武夫著《农村经济论》,其中“村塾教育”一章(著者是日本农学博士),叙说在日本流行的一种农村改良运动。这种村塾教育与我们村学很相近。他们是每一个村塾以教员为中心,来给这一村中十六岁以上的青年和成年以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格的教育,要从人格上给农民以影响,而后发达到农业改良上去。在这本书中他提到一段与我们很有关系的话:

“……丹麦的哈斯略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对日本的教育考察者说:‘诸君!远从日本来,花费许多金钱与宝贵的时间,来作丹麦教育的考察,但若是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任你如何也不能了解基督教教化的丹麦农村。你所了解者无非皮毛而已’。”

此可证明丹麦之“宗教而教育化,教育而宗教化”,在他们的组织中是如何重要。而日本村塾教育者似能于此有认识。他们有一种主张,正在实行:

“村塾以宗教为其背景,是不应非难的。例如以神道为思想背景的村塾,于塾内教室一隅,设神龛,燃灯烛,朝夕



于其前一同端坐默祷，使各自的心与神的灵感相通，霎时间，由现实世界游离，各去我执，净化胸襟。又在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场合，就采用圣经为教科书，每日三餐，捧手祈祷感谢，并为诸生的幸福、祖国的同胞，以及人类的光明祈祷，而与以希望和勇气。又如以佛教——特别是禅宗——为背景的，每日需若干的打坐，端坐默念佛心，如此胸中开拓，存一宽阔清静的世界，修行一种圆满质朴的人格。这都是宗教所赐予的效果。”

“村塾教育和既成教育制度的学校主要不同点，是其教育彻头彻尾为精神的向上，不问其信仰之客体为何，于每朝在塾师领导之下举行礼拜仪式，以为精神教育的方法，是应当推奖的。”

“……于每朝礼拜时，用一种短时间的乐器，以其音调沉静，凝敛塾生的精神，这种行事是不能轻忽的。”

在本书里还有好多的话，我不再去说他。我想说的是“每个人精神上之安慰励勉实为一大必要”的问题。我们要留心看在此刻的中国人：心理上正是不安贴不健全的时候，精神上找不出来一个出路。所以在这时候想要他们成功一个团体组织，怎么能行呢？他们自己心理上不安定；多数人在一处相与之间也一定很难安妥；他自己心理上没力气没出路，多数人在一处相与之间，更没力气更没出路。关于此点我曾说过几句话：

“……在我们看现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不止是经济破产，精神方面亦同样破产。这是指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此其所以然：（一）是因我们文化或社会生活的变化太厉害。农业社会照例是最

保守的，尤其老文化的中国乡村的社会有他传之数千年而不变的道理观念。自近百年来与西洋交通以后，因为受国际竞争的打击，世界潮流的影响，乃不能不变。最近二十余年更激烈急剧的变化，或由上层而达下层，如变法维新革命等是；或由沿江沿海而达内地，如一切生活习惯等是；而最后的影响都是达到乡村。他们被迫的随着大家变，却不能了解为何要变，并且亦追赶不上，但又没有拒绝否认的勇气与判断。失去了社会上的价值判断，是非好歹漫无标准。即有心人亦且窘闷无主。（二）是几十年来天灾人祸连续不断，他们精神上实在支撑不了。消沉寡趣，几无乐生之心，况复进取之心？此种心理如不能加以转移开导，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则一切事业都没法进行。

（《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见本卷）

在现在乡村里常有邪教道门的流行。如无极道、圣贤道、太极道、八卦教等，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多到不可胜数。这都可以证明乡村人精神的苦闷；因为在精神上没有出路，所以乱找出路。在以前毕耀东同学告诉我一个比喻，他说：“现在的中国好象一所大宅子，正门都完全堵塞住了（失其原旧的理想信仰等），在里面住的人欲出不得，苦闷极了，他便要有的跳墙出去，有的钻穴出去。”现在乡下人心理失去稳定，没有什么可以稳定住他的，所以无论什么都可以打动他的心，他跟着盲目地走，甚至倾家荡产而不悔，这实在是现在乡村人精神无主的一个大证明。还有最可怕的一点，就是现在乡下人有看重财利，羡慕权势的心理，比以前的人加重了好多。他不问此财利之如何得到，此威武之是否合理，就是很下流不讲理的势利，他也甚觉艳羨。这也是精神无主所致。精神无主，自然信义之心渐衰，势利之

见日重。又现在乡下人眼光非常之短浅，只看小利，看近利。这如何可行！这样任什么事亦不会成功。这实在是不可救药的致命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正要有更大的创造，如建树合作的经济系统，创造新社会；这样的一个大的创造，看近利如何可行呢？乡村人看近利以为这样可以解决他的生计问题，其实愈不能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乡村人精神上无主，眼前只是对付、敷衍、鬼混。所以我们这时只有想法子如何能使每个人的心理安定下来，每人都能抬起眼来往前看，有开辟创造其前途的勇气。从各自的精神有出路，然后使社会才能往组织里去。眼光短浅，就会让人越来越不能合作；要使社会有组织，就必须每人都不是势利的、短浅的、消沉鬼混的态度才行，必在精神上给他开出道来走才有办法。

我曾说过，丹麦的教育，表面看去很象没有一毫合乎实际，他们的课程只是历史、音乐、文学之类，并没有关于合作的农业的训练，而结果丹麦国家兴盛起来全在此教育。因这种教育，完全以觉醒一般人的精神，培养他们的友爱，启发民族的活气为主，这样把他们就都领导到有高的精神好的习惯中去；于是丹麦的合作与农业就自然而然地发达了。中国最初一办教育，就是讲求实用。从变法维新一直到现在的教育，仍然还是在讲求实用技术，培养实用人才；但结果都无实用之效。这完全因为我们最初办教育的人眼光就短浅，一上来就只看见表面上的实用技术，没有看到根本处，所以结果未能收得实用的好处。

在日本小野武夫所提倡的村塾教育非常重视宗教之作用，并且引丹麦教育家的话来证明他的话。从这里可以想见他的宗教教育的主张，和他们日本人丹麦人精神不安的问题，都是走这一样宗教教育的路来解决的。而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也同样

地有此精神不安问题，我们走什么路去解决呢？我们也能随着走宗教的路子吗？在我想，中国社会想走宗教的路子是不能。前年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先生来邹平参观，很郑重地向我问：“宗教在一般人心中有很大潜力，不应忽视他，你对乡村宗教问题持何见解？”他这话里是认为乡村工作少不得宗教。当时仓猝未及详答，现在可回答说：宗教的路实在不可能。不过是你如果真正是一个宗教信仰者——无论你是信耶信佛信回——你肯走到乡村去作乡村工作，发挥你实在真诚的信仰，我不反对。并且相信一定收很大效果，皆得力于宗教。可是如果你是说宗教有必要，而想利用宗教以解决乡村人精神不安的问题，那绝对不行。因为这样你自己便先假了。利用他，他便成了工具。古人所说的“不诚无物”；将来非归落于大失败不可。你信宗教是可以，你用宗教就不行。至于我，是一个离宗教较远的人，我绝不会用宗教来行乡村工作。我推想任何已成的大宗教，于此刻中国社会都象是不合，没有开展风行之可能。想创新宗教也不行；现在不是机会。所以此刻之中国社会，恐怕很难走上宗教的路。因中国在过去很久就没有宗教，现在假定说需要宗教亦很难得成功。宗教既不成功，我们走什么路呢？在我想差不多需要有一个与宗教作用相等的东西来代它才行。这句话就是指中国原来的儒家而言。儒家不是宗教，可是他具有与宗教差不多相等的作用。中国此刻殆必须走此路；不过此路很难走，比走宗教的路难。

对付多数的乡下人，用宗教比较容易一些，（儒家理性的路，宜于少数人及有知识的人），这是从多数人来讲是如此。更根本地说，是传教师难。在其他宗教中之传教师他自己容易得到一个把柄，有一点受用；他从这点心得，所以传教能传得好。可

是如果作儒家之传教师，因在他自己很不容易得到把柄，得到受用，也就常常传不好。我再三地思维，现在实在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儒家虽难，还只有儒家。因此我们做村学必自乡约上来做。乡约便是标准的儒家路线。

以上的话，是指明今日中国之乡村人在精神方面有问题，一般人的心理都在徬徨、迷离、沉闷无主，完全失掉了凭准。这个问题极重要，我们下乡做工夫，必须首先注意这个问题。虽然我们说过经济问题很重要，可是当他在精神上有问题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是〔会〕使经济有办法的。人只是一团活力，有活力一切事都可做得好。当一般人都失掉了活力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进行？所以在这时作乡村工作，必须对乡下人下一种工夫——我们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名词——“心理建设”工夫。这种心理建设工夫在日本在丹麦都是走宗教的路，而只有我们不能走。这个不能走的道理，粗说很容易，细说就很难。我们中国人很早就走理性的路。理性是开明的、现实的；宗教则不然，它是神秘的、超现实的。象《论语》上“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话，完全是现实的，没有一点宗教的神秘成分在内。中国人一向就是如此，恰巧又赶上今日的宗教正在衰败期（虽然在将来的宗教，我预测着还可以起来），这一个难关很难得通过。假使有少数的宗教信仰者，肯脚踏实地的来到乡村里去作，也或许可以有些成绩；但期望于大多数乡村工作者是不行。我觉得只有发挥中国人固有的精神——即乡约精神。我的意思是我们一下乡差不多就可以和村庄上的读书人、老年人、办事人、以及一般民众谈论这件事情（乡约），仿佛象是给他们一个建议：古时的圣贤这样的做法，我们可以不可以也仿做一下？虽然在古人所订的

乡约中，也许有许多宜于古而不宜于今的地方，也许有很多繁琐的地方。如在乡约的四大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中，每一项下又分出若干的条目，似太繁多，不能完全照样去做。我们是看古人这样的意思很好，很应当振作起来去仿行一下。在事前向他们提议，慢慢酝酿酝酿，提起他的劲来，然后再来成立这个乡约。这个乡约完全是发挥中国人所看重的“人生向上”与“伦理情谊”两点精神。如“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是人生向上精神；“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彼此帮忙照顾的伦理情谊精神。所以乡约无非是人生向上与伦理情谊的表见，完全是开明的、现实的。从这个很可以看得出中国原来有的精神、原来有的道路。但有一点也很应当注意：乡约的开明、通达、现实，固为一个大的好处，不过对于稳定人的心理，维系住人的精神，见效不易，效力也不大。反之，神秘的、超现实的东西，最容易感动人吸引人维系住人的心理（其理可参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论宗教一段）。不过，不易吸引住人的，若真的吸住了，就没有变易；真稳定了，比什么都稳定。乡约这条路，不容易象宗教容易走上；可是宗教虽然容易走上去，但亦容易下来。而乡约这条路，除非走不上；走上就没有错。这是应当留心的一点。

我们怎样才能作到有等于宗教的作用呢？那么，我想就得“在现实里面多少有一点超现实化，于开明通达里面让他有一点神秘化”。所谓超现实，在我们也不能给乡下人以一种迷信，而是要“扩大现实”。比如中国原来敬重祖先、纪念祖先，同时很盼望后代子孙，将眼前狭窄的世界扩大起来，这就是一种扩大现实。我们可以由此处更扩大一点，将纪念一家一姓的祖先，扩大到纪念民族的祖先。这也是时代不同使然；从前因为和外国

民族不接触，所以民族意识不强，而你一家我一姓就分别得清楚。现在到了民族生命危急存亡的大关头，所以就要纪念民族的祖先。即以敬祖先——敬民族的祖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来代替敬神；并且连盼望后代子孙，也同样地扩大到民族的。所谓扩大现实之意就是如此。

所谓于开明通达里面，让他有一点神秘化是如何讲呢？我所说的神秘化，也不是给他添上一点迷信，即想添亦做不到；而是要“感情成分重过于理智成分，具体的感觉多过了抽象的知识”。人类心理就是两面：一面理智，是可以分析的；一面情感，是不可分析的。加重情感成分，就是神秘化了。抬出不可分析的情感，自然就抑下去了理智。真的情感是不可说的，并且也说不上来；当你喜怒哀乐爱恶等情绪起来到了深处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也形容不出来。抽象的概念，是由冷静的分析来的；而我们听见声音、看见颜色、感触实体，这都是具体的感觉，不是由分析来的。我们多用情感与具体感觉，自然就不神秘而自神秘。

但我所谓的多用情感与具体感觉又是指什么说的呢？我是指着礼拜仪式，以及与礼拜仪式相连的音乐这一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具体的感觉，而不是抽象知识。其感情的成分很重，自然你的感觉与感情也容易动，生命就象浑整而有力。有这个浑然一体的意思，就完全对了。照直说，我们恐怕得在村学中设一牌位，将古时的圣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民族祖先的代表名字写在牌位上面，也许只浑写一个“民族祖先”在上面都可。这个牌位如果因村学地方窄狭，没法如在庙堂中一样地安放，也无妨于礼拜时请他出来，不礼拜时仍收起来。这个礼拜不可天天有，一个礼拜一次也好，十

天一次也好。天天有就太频频，频频就不好。在乡约上本有几日要聚会一次行礼的事。大家聚会时少者为长者行礼，长者率少者向孔子行礼；总之大家在一起聚会时必要礼拜。礼拜之为物是于人的生命精神有很好的影响的，因为在礼拜时自然地先有一个“谦卑”的意思。此处最能看通；当我们自己谦卑的时候，正是我们的精神扩大的时候，绝对不是缩小。假使不谦卑，我就是我，这个反倒狭小。比如扩大现实；从一家一姓的祖先，扩大到民族的祖先，没有扩大时即我一家就是我一家，我一姓就是我一姓，象是很合适；将你这一家一姓放在民族观念的范围里面时，象是很小；但其实还是后者扩大了，因为他是把民族也看做了一家一姓，这比只见得自己一家一姓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此民族观念提振起来，也就是自我精神扩大的时候。谦卑不是让自己小，而是让自己大；不是让自己低，而是让自己高。当你谦卑时，正是你自己提高时。我们的精神非扩大提高不可；否则必落于很偏促狭小，很短浅、很近，——此偏促狭小、短浅、近，是顶不安稳的。当你把观念扩大精神遂而提高时，你就不会随着眼前的小事情得失利害而使自己生命有所动摇，许多事相形之下就见小了；因有大于此者，则其小问题有不费力而即可不成问题。所谓谦卑是扩展之机，你越不谦卑则心愈狭小短浅。但谦卑也不是要老是在心里惦搁着，而是自然地要怀着谦卑的意思。这谦卑意思的透露，最好是在礼拜的时候；在礼拜时你的现实扩大，你会马上想起往古祖先的光明磊落的伟大精神，而我们民族现在是如此的没面子，这时自然地心之深处发生出来“敬”意。如其不然每日所想的一定都是些琐碎的眼前的问题，心就浮浅麻痹无所动。所以礼拜最主要意义在能提起人的谦敬，然后才能自丹田中生出大力量来。



“敬”是什么呢？“敬”就是心里没想别的，心里只有一件事。听讲就是听讲，写字就是写字，心归于一处。普通人的心总难归一，心里常是飘忽往来不定，这个顶无力量，顶不能办事，也就是逼促短浅。在宗教里的许多音乐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其第一作用于心理者，就是要你不要去想别的事物，当它“当”的一声的时候，你的心就收拢来；你要再去乱想，它又“当”的一声，这样使你不能想别的事情，渐引心思归于一处，于是心就“敬”了。当你心是一个的时候；你作什么才是真干，干起来才有味。农民做完活，心里无别事，只想吃饭；这时的饭特别香，再在口里咀嚼几下，那就更觉得香甜。你心乱七八糟不专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味，真是食而不知其味。比如你欠人债，吃饭也真觉得不安。在礼拜时心不专，则此礼拜没有味。一切生活都是如此；讲课没有味不如不讲，听课没有味不如不听，种地没有味，不如不种。这样的生活就太无意义了；所以只有在生命集中的底下，生活才出来味道。谦卑恭敬便是提高扩大我们精神之道。这样自然虽非宗教，而就有了等于宗教的作用。所谓提高扩大精神的时候，就是将自己化了的时候。平常人都是思不出乎一身一家，如果扩大提高，就仿佛是自己化了。这样，一定得到两种结果：（一）稳定，（二）和洽。只有把我化了的时候才能如此。不稳定就不能进取，不和洽就组织不起来。所以欲求“个人生命之稳定”与“人与人之间和洽”之道，非自扩大提高精神工夫不可。若这种工夫不做，只就眼前的现实的——“一个瓜，两个枣”的地方去着眼，则精神一定琐碎，在心里只充满了计较打算，于是生命就完全没有了力量。现在的一切都是引人入于计较打算琐碎的道路去，但是这种人生并不感觉愉快。我们常见乡下人可以为邪道外教倾家破产杀

生舍命而不顾，这是为的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平常时终日陷在琐碎的生活里，今天的粮食价低又没人要，明日庄长又要差费等等问题缠得他不好受。而那一些外道外教超逾计较打算，打破琐碎，这样他感觉还有一点味，在这里他可以痛快发泄一下。他的心如果能给他放舒一下，或麻醉一下，这样他上瘾，能勾动他生命的力量，所以他乐于为这些邪门外道去牺牲。

以上所讲的是礼乐的道理。关于礼乐的话大家可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来帮助了解。在任何一个社会皆有其礼乐，不过中国古人所发明的礼乐，最于人类心理有深的体会。近代的西洋宗教的确太衰败，不仅俄国反宗教，即西欧各国家其人民之入教堂礼拜者日益减少，且多有将教堂取消者。可是在我们可以测想到西洋以前的宗教情形。以前的村庄都是以教堂为中心，全村人都必须到教堂中去礼拜、去祈祷，去听讲道理。这些都很好，对于人生精神之提振有很大的影响；别管他讲的是什么道理，也别管他讲的道理之通否，但都能安稳住人心，使每个人的心往下沉。小孩一生要在教堂受洗礼，结婚也在教堂里面举行，人死了也同样地受教堂祈祷安息灵魂之礼。几乎人生大关节即无一不依于宗教。再则他们在一年内有若干的节日举行团体娱乐，也在教堂内。顶有味的就是圣诞节，他们一般人都仿佛象中国过年似的那样快乐。他把整个人的生活都系之于教堂，教堂钟一响，仿佛全乡村的每一个人都会被自己的灵魂叫了一下似的。此时西洋人之离开故乡，其魂梦间最不可忘者，恐怕就是他们的教堂。所以宗教之力量作用于人群者真不小，笼罩了人的一生，他也系住人的整个生活与生命，使人情趋于安定、和乐；因有此安定、和乐，而后才能想着向前求进。

我们如果要想培养起来一个团体组织的话，必先把他的精

神给团聚在一起，要想精神团聚在一起，非树立一个中心地址不可。没有中心地址，就谈不到组织团体；有中心地址然后大家才可常常相会。但大家在一起相聚必须有礼。人多则礼不可少，无礼则乱。若于此时礼拜神佛则为迷信，故礼之最通达最切要者，即为“长幼之序”之礼。可是只有“长幼之序”之礼还不够。为什么呢？比如在乡约中规定每次聚会时，幼者要拜长者，但长者光受拜也不行，每人都必须谦卑；幼者有所尊，长者亦必有所尊，也必礼拜。在以前只拜孔子，在现在我们拜民族祖先，非得礼拜弯下腰去，此谦敬之意透不出来。此谦敬之意透出来，一面可以说是精神向下沉，一面可以说是精神向上扩大。然后个人生命才有力气，社会相与之情才通达而不乱。所以为众人聚会之道，而能维系众人的心灵，必从礼；而在礼之中又必有其精神中心。这时我们既走不上宗教的路，又恰当我们民族衰颓的时候；仿佛子孙坠落，除非不觉悟则已，一觉悟马上会想到我们民族的祖先。我们民族的祖先曾创造光荣的历史，我们民族祖先精神的伟大，绝非如普通民族所可比拟，我们民族祖先也真值得纪念。所以我们敬我们的民族祖先，以民族祖先为精神中心，当为最合理的事；也恐怕非如此不可。大家应深深地想想看。

如我们上面这种做法，大概就与乡约相合。乡约精神本与我们村学精神是一致的，也可说我们村学是发挥乡约精神成功的一种团体组织。乡约开头的意思，和我们的意思也相差不多；在他的发起文上有这样一段话：

“人之所赖以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善恶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不然，则秦越其视，何与于我哉！大患素病于此，且不能勉，愿与乡人共行斯

道。惧德未信，动或取咎。敢举其目，先求同志；苟此为可，愿书其诺！成里仁之美，有望于众君子焉！”

这段话与我们《村学乡学须知》中《学众须知》文一样。我们的话也隐含着发挥他们的意思。我们的主要意思是要大家都知道人生是互依的，——认识人生社会关系，由认识社会从而增进社会关系，渐渐形成一个团体。但此团体活动之目标为何？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个意思与乡约里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意思相仿，在精神上可说是一致的。不过在乡约中还有不够的地方，我们须要略加变通与补充。

此乡约之补充改造有两个要点：一为由消极转为积极，二为由重个人改为着重社会。在乡约中之“德业相勉，过失相规”，仿佛是偏着重于个人之德业。过失，如指责某某有什么不信、不义、不孝、不弟等等，都是从个人方面看。我们现在是从社会方面看，不单看个人向上，也要看社会向上，——在乡约中本来也有社会向上，不过我们更看重些罢了。我们可于德业相勉里面，把风俗改良加进去。个人私德有缺，在一面虽是属于个人的，而实在一面也可以归到社会上去。在中国以前，社会上是非判断有标准，社会上有为大家所公认的礼俗，差不多没有敢违背了这个道的。在现在的中国，已失去了社会判断的标准，许多恶风陋俗趁势滋长。所以我们必须把改革恶陋风俗也加进去。如邹平竟有六岁孩子娶十九岁媳妇的怪事，这真是岂有此理！还有吸食毒品、赌博、缠足等事，都要想法子改掉他。我们是要使一个散漫的村子变为一个好的村学团体，所以必须由着重个人向上而转到社会向上。再则如提倡土货，统制消费，我也打算把他放到德业相劝里面去。这在一面说是经济

上自救自卫的道路，而在另一面更重要者，实在于我们民族精神上之鼓励甚大。

再如“过失相规”，我们不但于有过失时再来规戒，而实在我们应于他未曾犯过失以前，便叫他认识人生社会关系，站在情谊的立场来相勉于人生向上。即在他犯了过失以后亦应善意的帮助他向上学好。而着重点实在是要整个社会的向上。

又如“礼俗相交”，我们在礼堂时要有礼，进来时要平心静气，不要乱说话，心里很郑重，开会时很有礼，这会才可开好，大家才能用心发言。不骂人，不打架，然后事情才会有结果。我们在村庄的里头或外面都应有礼貌。我在《村学乡学须知》中写过一条：

“要知敬长睦邻——一村父老兄弟之间果真亲爱和睦，则必自然而然彼此见出长幼之序来；以其敬长慈幼之情，透露于见面称呼声音笑貌之间，不期而长幼之序已明也。翻过来说，能敬长则长幼之序即明；长幼之序既明，亲情睦谊便寓于其中。非和睦众人不能使公事进行顺利，非敬长无以和睦众人，故敬长为要。”

人与人之间，必须有礼，不过我们的礼。不象古人的礼定得那样繁多。我们除此之外，还打算把娱乐也加上去。凡是娱乐必定是含有多数人的意思。我们在一年的年节当中一定要有大家共同娱乐的机会，并且应当常有；这样可以增加一个团体的人的兴趣，增进彼此的认识和互相间的情感关系。

更如关于“患难相恤”一项，我们要将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经济上种种合作，积极的有所进行。我们不能等有了患难才去顾恤，我们要进一步地来作。比如贫乏问题是中国人大问题，我们就要大家合作生产，合作运销，不要单是消极的周济

贫乏，我们要积极的使其不贫乏。我们要把一切经济上的事情，生产消费以及种种技术进行，都放在合作里面——也就是乡约里面。变水灾的救济为水利的兴办。因火灾的预防，而设救火会、消防队。对于土匪要成立自卫组织，土匪不来我们也应当注意自卫。有疾病要医疗，于疾病未发之前，应提倡公共卫生。婚、丧也可以与储蓄合作相连。孤、弱、残疾，我们可以用团体力量来组织养老慈幼等慈善机关。讼狱诬枉，我们可以很早成立息讼的组织。总之，这一些都离不开“变消极为积极”，“从着重个人转到着重社会”这两点。我们一面也为消极的救，而最着重点则在积极提倡进步的生产技术与种种建设，尽量发挥团体力量，来谋解决种种社会问题。此两点一变，精神面目便大不同，完全变为一件新的事情；然无相违背处，而只是着重之点变一下。比如“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与乡约精神甚相合；但于“齐心”及“求进步”字旁要多加圈，此为与古人不同者。古人有点固守，而我们现在是以求进步为急。因我们种种落后，比外面世界差得远。于此，我们当可发见着重社会的意义。我们的眼光必于看个人以外，谋整个社会的向上，然后社会才有进步。所以，我们做的村学这件事情，实在是新乡约。

不过还有要注意者，如合作、放足、禁烟、禁赌、卫生、济贫等，很多很零碎事情，终日忙碌于这个那可太不行。这样最容易叫人感觉到麻烦疲倦。我们必须将这许多事情能够贯串在一起，叫他虽多而不见其多。不要叫他见出东一件西一件零零碎碎的事，要叫他看见始终在做一件事，这样才可引发人的精神愈来愈透达。我们在心里有这一贯的意思在内，临事时才不至感觉得琐碎枝节，才有力气来做。要想用一个精神来贯串，最

好用极简单的几个字——或一个观念，让他能够反复地咀嚼，越咀嚼越觉得有味，越磨越发光。以这个做中心，一切事情都是从这一点出发，事情虽多而不见其多；如此，他才能深刻清楚而不迷糊。这几个什么字？当然得一个最自然合适的几个字，须适合“能贯串”，“能适应农民心理”，“能通俗化”等条件。在《乡农学校专号》中武绍文先生在《第二区山西办理乡农学校经过自述》一文里面也曾提到这个意思。现在引述出来，为大家作一个参考。

“村治是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一条路子，但无论作何种事业，须在下面有一段精神，这一点真正不可忽略！我们作事求学，不消说须有一段精神才行；而作乡村事业更需要先行引发出乡农们的精神来。这精神是一切的根本原动力，没有精神就没有一切。所谓‘不诚无物’，分毫不错。我们的精神深、长、真到如何地步，事业就可以有如何的成效；不然；终久是空中楼阁。现在我们大家要领导乡农作村治事业，那非先行引出他们的精神来不能有所成就。那么，该上那里引发？有如一盘散沙的无数乡农该如何组织？他们向来就是住在乡村，自生自灭，各行其是，只知有身家，而不知有所谓国家社会，成为一种顽固样子；——我们如果替他们来组织又组织不动，而且替人亦是不能替到底的。我们无权无势的走到乡村，你谈什么，他们都不理你，不起劲；他们有权有势的人走到乡村，村民亦只应付敷衍公事而已；有什么办法？如果要让他们自动地起来组织，那更是引动不起来的。近年来到处都吃土匪的大亏，这是切肤之痛；可是他们很难自动地有组织的共同想办法，而别人又提倡不动。至于要使他们有个大方向的转变，那更

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们已无疑问的知道中国的问题就在乡村，而乡村问题就在要除去顽固之病，使他们感觉到有大家自己团结组织之需要。可是组织不动的事实就摆在眼前。据我个人的浅见，是以为西洋社会的有组织有条理，由民众产生运用政治的这一种精神，是以经济作原动力的。人家的组织条理我们也未尝不羡慕；可是徒徒羡慕，而没有人家的那一种精神（即原动力），是学不上来，拿不动的。乡农除了自己的勤俭糊口之外，简直找不到一个有如西洋人那样的气魄去经营一种重大的事业。因为大家的目的只在糊口；其最高尚的理想，亦不过勤俭出力养老抚幼而已！他这养老抚幼的观念，勤俭力作的精神，固然很能做到；但对于经济上总没有一个真有雄心的大的气势。没有这一种真的雄心，大的气势。则西洋的组织条理实是拿不动的！如此看来，当真要去改变他这一种精神，可能不可能固是问题；应该不应该去改变恐怕还是问题。我觉得应该在我们这个老民族里面的老文化中看一看；因为这个老民族既能在天地之间存在，在当初一定有通达活跃的精神，绝不是死的推不动的。……我以为如果诚心去求，则我们民族活跃的、通达的精神，必被吾人发见；只不过发端与西洋不同而已。因为发端不同，所以向前发挥去也就自然的〔与〕西洋不同了。决不能如他们那样的侵略惨杀暴恶凶狠！中国的文化教我们大家扰乱的如同有了病的一样，大家都麻木了；现在只有去病，以复其当初的元气而已。我所求出的，说来很简单，并不稀奇。我因为在乡间讲孝弟，觉得他们听了很振奋，所以我就求到两个字：一是‘孝’，二是‘义’。



孝是人的天性，极容易发动人。人谁都有父母，所以个个人有此天性。在这天性上动人的精神，是很容易的。可是我所谓的孝，不是愚孝，不是单守身守家规规矩矩过日子的那一种孝，乃是当初文化最通达时的孝。《礼记》云：‘大孝尊视，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论父母于道。……身也者父母之体也；行父母之体，能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亡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父母爱之，喜而弗忌；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此一段话乃随手抄的，文字也并不深；我们都有父母，稍一思量，即可明白，故我不必解释。我们一想到父母要我们作好儿子的意思，真不容易坠落，虽杀身亦不顾惜。这种尊亲不欲辱父母的天性，人人都有。……吾人一切的好事，都可由孝引发出来；所谓‘众教之本曰孝’。……至于那个‘义’字，可拿那些豪侠好义及一般赤心为社会而有廉耻的人点明。因为恐怕大家误会孝即是本着愚父母的意思而行的愚孝，故以此义字再补充一下。

现在中国文化正义已失，人人都有些私意小气，毫无一点正气。我们有好多读书的人，以读了书而不愿有职业，尽想以口舌笔头来占社会上的便宜！须知多一个占便宜的人，社会就多受些亏损。我们大家都想占便宜、都不知耻，真惭愧死了！还说什么社会事业！凡有心人，真可痛哭！……”

在这一段话中，武先生提出“孝义”两个字来。于此之外，有无比这两个更好的两个字，尚有待于研究商讨。我们的意思，一面是用礼乐然后才可以化除了我；一面必须用两个简单的字——或一个简单的观念，以开动人之心窍，引发人的力量。但此两字很难规定。然必为大家告者，即此两个字（无论是两个什么字且不问），倘或在你觉得不亲切的时候——即在你还不能以此两个字来贯串一切的时候，你就不要讲出来。因为一切事必有诸己才行；你心里并不亲切就无诸己，这时讲出不惟不足以感发人，还容易生出毛病。我想每个人如果真是有心的话，大概一定可以有他所体认得最亲切的两个字。此两个字因时代环境的不同，所以也不必相同。如在《孝经》上只提“孝”字，而孔子的话只说“仁”字，孟子则“仁义”并举。于此可以看出因时代环境及各人所认识之不同，其所举出之简单观念亦不一定相同。但就自己方面言，必就自己之认识亲切处去说，有诸己而后始可说诸人。如武先生所举出之“孝义”两字我也不会去说；武先生可以说这两字，别人倒不必同样地用此两字。在我心中比较亲切而能贯串一切道理者即为“理性”。“理性”的观念在我心中最亲切通达；不过这两字能否为乡下人去说，倒很是问题。我姑且提出此点，请大家各人用心思想一想。

还有一层我们不能不一为留意者，就是新方向。此新方向

是指人群社会向前进行之中之新方向而言。新方向之要点就是“尊重个人”与“商量办事”。

先说新方向中之第一句话——“尊重个人”。

“尊重个人”这一个意思是源于法国大革命之“自由、平等、博爱”而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字，的确是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为最能“开动人心”“引发力量”的几个字。我们现在也要提出一个口号，提出一个简单的字来，发动大家的心和力，但就是不容易。假若用孔子的“仁”字，就很难讲得清楚；用“理性”两字就仿佛太抽象化哲学化了；“孝”字虽然明白，但也有缺欠，其缺欠即在新方向不够。新方向为“尊重个人”，而“孝”字于此有欠。中国文化的“人生向上”与“伦理情谊”固好，只是“尊重个人”之意思不够。这就是许多人常批评中国文化的话——说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说中国社会是宗法社会。凡认中国社会为封建为宗法者，皆将中国之礼、中国人之重情谊有所尊敬，都看做是维系封建与宗法的东西。本来封建与宗法之缺欠即在埋没个人。在封建关系中把一切人都规定成为隶属的关系，把人看做不是平等的；宗法亦是叫你有所属，将人属于宗族，而失去其自己独立的人格，所以封建与宗法对于“尊重个人，使每个人有他自己”都太不够，此为其最大缺点。及至西洋近代潮流之起，实为封建社会之一种反动；其重要点，即在此个人的发挥上。长处在他能尊重个人，人人有其自己，自己就是中心；而其短处亦正坐此。所以至最近潮流之兴起，实又为近代潮流之一种反动。中国伦理之道本与此都不同而都不碍。然其缺乏在这一点上的注意，则为不可讳者。传之愈久，其末流不期而变为对于这一点的冲突妨碍。例如“忠”“孝”“贞节”等观念，皆从伦理上以对方为重（君、父、

夫)之意发挥出来的这一方(臣、子、妇)的真实情感。其中固不包含自由平等的意义与精神,但亦不相碍。及至这些观念离开这一方个人的真实感情,而被采用为维持社会的工具,铸成“礼教”,而附以强硬的制裁与奖励,则完全抹杀这一方的人格,而强其为对方之从属,遂与“自由、平等、尊重个人”之理冲突矣。民国七八年之“非孝”、打倒“吃人礼教”,盖从此而来,亦无足怪。总之,“自由平等”在“孝”字中新方向是不大好讲;“孝义”两字或者可以打动中国人的心,但于开新方向不大够。所以选择这两个字很难。于此可分两边说:

一、我们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心里实在,要我们自己精神浑整,浑整就是不要零碎枝节。只要你自己如此,你虽没有一个观念从头到尾的把一切事情贯串起来也不要紧。但是,你必要叫人感觉出你是在干一件事,并且你自己也要清楚自己是在干一件事,你要在不言中来求贯串。

二、新方向中之“尊重个人,商量着办事”,此为我心中最清楚拿得最扼要的两点。但这两句话有些累赘,不如“自由,平等”名词来得简当;若用“自由平等”的话,就与中国社会很不切合。西洋是自封建宗法蜕化出来的,故用“自由、平等、博爱”等名词甚合适,而在中国原来就是讲“博爱”的,即“平等”之意在中国也有。中国并非如“西洋式的封建社会宗法社会”,所以“博爱平等”算不得新方向。自由虽为新方向,但又不切合于中国人之需要。比较切合中国人之需要者,只有用“尊重个人,商量办事”这个新方向。“尊重个人”已把“自由、平等”之意包含进去不少;“商量办事”也是从“自由、平等”来的;此为中国今日之迫切需要者。

在我当初作乡村运动之动机、即在于培养训练中国人之新

政治习惯；于此可参看《自述》及《我的一段心事》两文（见第二卷及本卷），就可以明白我的意思。我在最初注意的就是“尊重个人，商量办事”这两点，最初并未注意到“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礼乐”等问题。“尊重个人，商量办事”这两个名词为我自己所杜撰，不是听来的，而是西洋近代潮流传入中国来了以后，听了“自由、平等”等话，在我心中就变为这两句话。这就是我心中认识的新方向，我们必须容纳发挥此新方向以补救偏弊。

再说新方向的第二句话——“商量办事”：

“商量办事”——或名“组织能力”——也是由“尊重个人”来的；只要有了“尊重个人”，底下自然就有了“商量办事”。“尊重个人就是大家都有一份。大家都有一份，就非商量办事不可；不然，就散了伙。

大概在团体中有两个要点：一是“纪律习惯”，一是“组织能力”。所谓“纪律习惯”是指在人多的时候，而仍然能够有条理有秩序；人多很容易乱了头，乱了头就不行。在人多时候还能敏捷便利，彼此不互相妨碍牵掣，这样就是“纪律习惯”。纪律习惯必须养成一种机械性的习惯——好象身体的习惯一样，大家一到一块就能有这种动作，差不多不用分心去想才行。——用心就不是习惯，象骑脚踏车，一边骑车，一边还能思想，这就算习惯。习惯就是差不多不去用心而能往下做。此种纪律习惯正为中国之缺欠。我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举出几个实例：

“中国人在人多的时候，老是不能有秩序。我常听去过外国的朋友说，西洋人去娱乐场，当买票的时候，一个人随着一个人，挨次购票，很有秩序，不需要警察去维持，而

且能守秩序。这在中国人则多争先恐后，甚至挤死人。还有在外国住久了的中国人，当起初回国时，一到上海，就有一种感觉，感觉特别乱；如脚夫车夫之招揽生意，接夺行李，乱吵乱挤，扰攘非常，这让初回国的华侨看了，无不大为惊疑。——在外国很少有这种现象；除非发生火警或其他事故时，决不会有如此扰乱。再如中国戏园内都是声音庞杂，叫喊喧闹，简直乱得要命。这都足以证明中国人是没有纪律习惯。没有纪律就要妨碍团体生活，一切事都不能进行敏捷便利，必然要你碍我，我碍你，彼此互相妨碍，事情不得顺利进行。纪律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如买票者守秩序，不是用警察的干涉要他去守秩序，而是他知道有秩序有条理才能便利，才能进行得快，无秩序无条理则反倒要慢，一切都耽搁了；所以西洋人无贵无贱，都要守秩序。中国人则喜欢以破坏秩序为荣，用以骄傲于人，这简直是没有办法。团体必须有纪律，无纪律则生活不成。我记得陈公博有一篇文章说：‘大家都说要有铁的纪律，行动要纪律化；但在革命根据地的广州特别市区分部就不常开会，开会亦从没有过总出席。而且省党部或政治上稍占重要地位的党员，一百人当中没有一个在区分部有过登记，一百次开会当中没有一次出席过区分部的会议；最重要的党员，最不注意严守纪律的素养。例如党章上所规定的党员纳费，党员开会，不管如何这亦是一个纪律；但据我所知，有几个重要党员曾去党部购买印花，次次出席小组会议？更有些重要党员，至今并党证而无之。人人都有蔑视纪律的习惯，纪律好象非为我辈而设。’中国无论士农工商，都不守纪律。尤其文人，顶没有纪律习惯；工商界还好些。”

此种纪律习惯必须养成。但如何去养成呢？就是非常过集团生活不可。象邹平的联庄会训练，青年义务教育等等编制，都是含有这个意思。

说到组织能力——即是大家合起来商量办事；此工夫亦只有村学才能做。本来中国人是最缺乏团体生活，最散漫无组织。而西洋人自来就有团体生活，近代且有进步的团体生活；西洋近代长处即在此。进步与不进步的分野在哪里？即不进步的团体生活，多靠纪律习惯；进步的团体的生活，则多数人在团体中居主动地位，对团体事能为有力的参加。中国人没有团体生活，更没有进步的团体生活，所以比较西洋人相差太远。但在此刻我们所求者为进步的团体生活，没有法子去求一个不进步的团体生活。据我所认识差不多历史命运的规定是如此，我们除非没有团体生活，有则为进步的团体生活，即作退一步想也是做不到，必须在各自的自觉下有意识的去求组织。此组织之成功，一定为一进步的团体生活。中国今日明摆着没有一个强力来强制大家成为一个团体，找不着此强力在哪里；如欲成功团体，则必为多数人主动，所以培养组织能力甚为重要。所谓多数人主动，就是如何做团体中一份子的能力。中国所最缺欠者为此。中国人因历来就是关门过日子，他过惯了散慢日子，所以便很容易独行其是，不受牵掣，不和人商量，极容易随自己脾气的高兴，谁也管不了他；这种态度最不适宜于过团体生活。当大家的事情联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多少都受点牵掣，不能处处都随自己的意，非在一起商量办事不可。但商量办事在中国人不会。我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说：

“没有组织能力，不会商量办事，不但无知识人是这样，即大学生也是这样。如‘五四运动’后北京八校的学生自

治会，参加的份子，他说热心很热心，说灰心马上就灰心。一时热心则今天开会，明天开会，非常热心；但是一碰钉子，则马上灰心，一切都不管了。这就是不会商量办事的明证，并且他要做事，则一切事情都得由他做主；若不让他做主，他就要灰心。他不会参加进这个团体，去做团体中的一份子。事情交给他一个人去办，他倒能办；要说大家商量着办，那就不行。中国人要让他参加一个团体，做一份子，出一份子的力量，使力量匀称，各自都不多用力；这个他就做不上来，他不会如此，因其平日无训练故也。听一位作县长多年常与乡下人办事的朋友说：‘让乡下人办事情，切不可与他商量；尤其不可让他们自己商量。一商量就要起争执，便难有一个决断。当初如果不商量，就不许他说话，那么，你要如何办，便可如何办。商量后，容易生出几个不同的意见，你再说话他亦不听，事情就不好办了。’这是真的！当初你若以强力支配他，却非常顺当，事情可以很顺利的进行；所以许多人都说中国人奴性太大。——其实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就没有会商量着办事的习惯，历来乡间人办事都是被动的，从没有与他商量过，都是强要他去办，所以现在你要与他商量着办事，那么就要依从他的意思去办才行；如果不依从他的意思，他宁愿把这一件事情搁下来不办，也不愿意牺牲个人的意见（即现在诸公也是这样；国内各领袖之不能合作，即因各人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都是意气行事）。这也是因为他搁下这件事，还一样可以过日子。所以才能搁下；若西洋人的团体生活，则不容许你搁下，因为搁下了便不能生活。——在一个团体生活中，虽有一个不好的决定，也能进行，胜



过没有决定而搁下。我前次下乡巡回，到好多县去，看各县情形，本县人不能做本县的教育局长；如果是本县人，大家就要捣乱，捣来捣去，必须换上一个外县人，大家才不捣了。这样推论下去，本省人亦将不能做本省教育厅长，中国岂不是也得组织外国政府了吗？”

真的。中国人在团体中支配他，也许很老实听话，要他去发号施令去做主或者也会。为主为奴都会，但就是不会做大家共同商量决定一个主意的一人。不会做一面出主意，同时一面做听话的人。他在团体中感觉心气不舒时，就发脾气，甚或捣乱将此团体搁浅或搅散，他都会干。西洋人绝不如此；他离开了团体就没有活命，他也不敢作此想。团体事不能进行，就等于自己生命不能进行；团体事不能停顿，就象自己生命不能停顿一样。他若主张失败，宁可迁就别人去随别人走；他锻炼就一副耐烦心理，虽不得行其志，也不觉得怎样。中国人的耐烦心理、纪律习惯真是太少了。这种不能商量的态度，如果当真这样下去的话，则中国人永无合作办事之可能，中华民族将来非归于消灭不可。所以我把商量办事看得最重；我心目中的村学即在能培养乡村人在一起商量办事的习惯。此在一起办事习惯就是组织能力；办村学必须这样去作。

大家如果作村学工夫，应从两面注意：

第一，培养其注意力，培养其关切心——开会必到，事事要从心里过一遍。公众集会，众人到，我必到。凡关本村之事或会〔上〕宣布的话，都要在自家心里想一想；知道不清的事要勤问。

第二，培养其活动力——有何意见即对众说出。我们既关切团体的事，自然就要有一些意见主张，应即说出请大家参酌。

凡事经过讨论才妥当，各出己见，实不可少；有话便说，不必畏怯。

以上两项已经够了。底下再说就得说回来了。下面两项算是补充上面的话：

第一，尊重多数，舍己从人——自己意思虽要说出，但不可固执己见；凡众意所归，应即顺从。不要太过固执，致碍公事进行。

第二，要顾全少数，彼此牵就——有时少数人的意见也不可抹杀。若以多数强压少数，虽一时屈从，终久不甘服。总以两方彼此牵就，商量出一个各都同意的办法为好。团体之内，和气为贵，倚强凌弱，断乎不可。

村学之成功，不是要修马路、造洋楼，种种物质建设；而最着意者，即在此种风气之养成。乡人能注意关切公共事情，向前活动，表见组织能力，就算此村学之最大成功。我们必须念念不忘的，想法子让乡下人能靠自力、靠组织。

《乡村建设》半月刊，5卷5期，

1935年10月16日。

##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sup>〔1〕</sup>

在我的夫人故后第三天，我凝敛心神，要写一篇悼亡的文章。因为白话文似较浅露，不如文言能作到深厚沉重的意境，于是就用文言来写。但卒以琐事牵扰，文言又比较费事，现在乃改用白话来写。想先将我和我夫人的感情关系，我夫人的为人，大略叙出，俾开吊时得以分给亲友看。

我夫人姓黄，原名婧媿（听说她故去的大哥给她起的），民国十年与我订婚，我提议改用靖贤两字，就以此为定。她家是北平汉军旗籍人。二十八岁时和我结婚，时为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邹平。得年四十二，跟着我共十四年。我尝为文讲中国伦理之义，有几句话说：“人必亲其所亲。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神形相依以为慰，斯所谓亲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现在靖贤一死，家象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

起初我为倾慕佛家出世的道理，吃斋素，年近三十不娶。民国十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后，始有意室家。友

〔1〕 1935年8月24日作于邹平。

人伍庸伯先生（观淇）问我择妻的条件如何。我回答说：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伍先生面有喜色，说：你真能这样彻底吗？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想介绍的人，倒或者可以当意的。于是他就介绍他夫人的胞妹给我，——就是靖贤。黄氏先世，作过旗籍武职，她的父亲，大哥，三哥故后，又以民国渐不发旗饷，家况甚苦。她没有什么求学的机会，不过粗识几个字。年纪已到二十八，还不曾说定人家。我平素极不喜旗人，当时对伍先生表示怀疑。伍先生说她没有“旗习”，他们亲戚两家合租一小房住，朝夕见面，他十分知道的。我又要求会面，先作朋友再订婚。伍先生说她家里守旧，恐怕作不到。但伍先生见我非会面不愿商量，终究设法介绍我在他家见一次面。她的衣履装饰，极不合时样，气度象个男子，同她的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颜色比姐姐反见老大。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就在这匆匆一面后，我们便订了婚。

这婚订的这样容易，在我自己家里人和一般亲戚，都觉得诧异，而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我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我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先生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先生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

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半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同时我想到，我先父假令在世，一定乐意这事。因为先父的脾气，每喜对于真有点价值可取的人，埋没风尘，众所不识者，特别识拔，扬举出来；他要主张我娶这女子，是可揣想得知的。第三我想到：我们那天会面时，伍先生当下迳直点破见面为的议婚，而他则盼望我们一议而成，马上结婚，实在太唐突了这女子。如果婚姻不成事实，殊觉对不住她。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既婚之后，渐觉得新妇不符合我的希望。她于妯娌姑嫂或其他人之间，仍不免以小事生气，至于气得心痛，不见有越过一般人的宽大气量。而妇女们好时髦装饰的心理，似亦不能完全超越过去，而无所计较。我慢慢觉悟我以前的要求，太涉理想，实是与妇女太少接触，缺乏经验。妇人天然是要心量比较狭窄的，妇人天然是多注意外表的（此理均另详），一例皆然，不能怪那一个。又觉悟择妻只注意其天质一面，不注意后天条件，失之太偏；后天的读书为学，未尝不可扩充心量，变化气质。且如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亦是不应该的，因此在婚后的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大体在她对我先后差不多，总是爱惜照护；在我对她的感情，则好恶升降，多有转变不同；总是在一处，日子多了不免有呕气时，离开一阵又好一些。但一年一年亦趋于稳定。一面由日久我慢慢认识出她为人的长处，一面我亦改正了我自己不对的地方。不想到年纪越大，彼此爱情倒增加起来，在四十岁过后的两三年，是我们夫妇间顶好的时代。

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

个字来说她。见好于人，向人献殷勤，是她最不作的事。于平常人所贪慕的一切，她都很淡；象是没有什么是她想要的东西。在这两点上，我自省都不如她（即我有时不免向人献殷勤，我不免有所贪慕）。说了话便算，打定了主意便不犹疑，遇事情有判断，说什么就干什么，亦是她的长处。她常常讨厌我反复，说了话不算，遇事没有准主意。我真是徘徊顾虑性最大的人。我常常胸中空洞无一定的意思，计虑周至，能看见正反两面的理，左右不同的路，一时倾向于此，一时倾向于彼，诚亦事所不免。这爽利与徘徊，几乎成了我们十几年每次起冲突的症结所在。然而靖贤的爽利，毕竟可爱呀！和刚爽相联的就是正直，少弯曲，坦白，干净，信实与信义等好处；我恒愧不如。

我虽受许多朋友的推崇奖掖，以至许多不曾见面的人或不熟识的人，过分推想我人格如何伟大；但在家里我夫人眼中看我，却并不高。她眼看我似乎是一个有夸大的志愿，而不甚踏实的一个人；虽说有心向善，向善心到底不强。她常常指摘我的毛病，除了上面所说好反复一点外，大概有三点是时常说到的。一点是我说话太狂夸，自视太高，自信太强，她极表示反对。一则认为这是没有理由可以承认的；一则认为这于个人德性是不很好的。一点是我作事待人不真忠厚，不过大体象忠厚罢了。还有一点是我永不认错，碰了钉子仍不回头，执拗不听人话。她指摘我的，都不算冤枉。说我不真忠厚，有时亦能说得我心服。惟有夸大与执拗，我虽无法否认，但无奈这两点似乎是我生命中的要素呢！（我相信这是从我的长处而来的流弊）从她对我的批评态度，见出她读书虽少，而胸中有义理境界；虽是妇人，而气概不凡。尤其是她说我不真忠厚，向善心到底不强两点，使我敬惮。

我们的感情的好转而稳定下来，就在我认识得她的长处，而肯定她的人格价值的时候。以前亦有很要好的时候，但似多从两性相互的需要上来，以及其他的彼此辅助照顾而来的好感；但总有一个使我们不好的因素在，所以总不稳定。这个原因，就是我未发见她的人格价值，意识隐微中有点不满，看见旁的异性有时生羡慕心。她的好处，是天生的，不从学问来；但非有学问的人不能认识她的好处。前些年我尚没有如今的眼光；而初婚几年，男女情欲重，家庭俗务多，种种琐碎的刺激牵忧，又遮蔽我的眼；还有择婚时不注意后天条件的后悔意思，为遮碍不小。及至遮蔽渐去，我自己亦有点长进，对她的人格价值，暗暗点头，感到满足，反而觉得只有她配作我的妻子，不知怎地，从前对她女性的羡慕心，以至好色冲动，仿佛都没有了，心理改归纯正，只有一片好意对她，非常单纯。这时她感觉到我待她和以前不同，曾痛哭过一次（似在民国廿一年或廿二年），责数我以前待她的不对，象是多年积闷，为之一吐。在这里我真是负着非常的愧疚呀！如果她不死，我还可以补赎；她死了，我怎能补赎呢！呜呼！

所以最近两年，是我们最好的时候；也许到了最好的时候，就是要分离的征兆。然而在最好的时候分离我们，我怎能不痛呀！呜呼！天哪！

她这次的死，亦是我对不住她。她从民国十九年冬间，廿年春间，连续两度小产之后，身体亏弱万分，曾表示不要再生，我亦同意，因此有三年多不曾怀孕。不料去年身体渐好，未免大意。我戏言：我们有两个男孩，本已满足；但我更希望得一小女儿，到我年老时侍候我。于是有这次的怀孕。怀孕又是难产，西医说是“前置胎盘”，最不好办的；卒以不救。呜呼！

这不是我害的吗！

除了上面所说歉罪处之外，我最大的愧疚，是以她这样天生的好质地，而十几年间未能领她作一点学养工夫。将日子都空过了！将好质地都白费了！这真是我对不住她之大者！

我转回来想，在天安排我两人的关系上，亦许靖贤是纯粹落在牺牲地位以成全我的吧！她最先成全我的，是到我年近三十才来我家，给我很大的机会为思想上创造努力（不必多，假令早结婚三五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未必能成）。婚后的十四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际，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为社会服务。——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蹋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将有以用我这机会，改变我的生活。所以我今后为社会的努力，任何一分的努力，我将使知交诸友都认识这是出于我靖贤的成全。这或者是我于万分对不住靖贤之中，求得一个补赎的路吗！

24年8月24日

《中央日报》（上海版），

1935年9月21—24日。



##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sup>〔1〕</sup>

各位同人、来宾、同学：

今天是我们研究部第三届、训练部第四届补行开学典礼的日子。我们一般同人，在这里的，以及此刻未在这里面以前担任过这边工作的，如梁仲华先生、王柄程先生等，努力于为社会服务的乡村运动，已是第五年的开头。接纳我们的新朋友新同学，已经到了第三、四届。我们自己很不自量，在这民族垂危的时候，来干民族自救运动。我们不能不找同志，不能不接纳新的朋友新的同学，好开辟我们的生路，打出我们的出路。我对于我们的新朋友新同学都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大家应当很了解，我们的民族是到了怎样的一个危机、一个不成国家〔的时刻〕。更危机的可说是“经济的困难”；就是这几天我同大家讲乡村建设理论，讲到这个问题，我说明了中国经济崩溃到了怎样的地步。这时最显明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要再打个人小算盘，撇开社会的出路，打算自己的出路。在社会不幸中，自己想好机会，是糊涂已极。只有大家为民族求出路才有我们自己的出路。本院的教学工作，是在从“为社会求出路”方面，来领导大家。

---

〔1〕 1935年9月1日上午5时半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新生开学典礼时的讲话。

这次招生，同上届有变通的地方：即在训练部不分省籍，一律自费，另定有奖学金的办法。因不分省籍，外省来学的较前为多。远道来的如云南、广西、湖南、浙江；河南还是近道的。他们来这里与投考别的学校不同，都是专诚来的；大家的此种来意，我都很知道。同时为一律收费，在社会一般经济困难之时，很多同学缴费发生困难，需要大家全力凑垫。这一点我心里也很知道。并愿意大家同学也知道从缴费困难大家凑垫的不容易。在这不容易的求学机会中，不要对不起自己，不要枉费了光阴！我很抱歉于外边要求来学的继续不断，而我们不能容纳！现在还有许多朋友，住在外边不能进院。其余来信要求者尚多，早就谢绝。在我们虽然是很不愿意谢绝外来的朋友，可是事实上一面我们的办法要认真——今年比去年严格了一点——从前住在院外而来听讲的办法都截止，今年把旁听生与正式生一样管理，过同样的生活；所以人满之后便无办法。在此介绍外面朋友到邹平来的同人要谅解，而在已经进来的同学不要看轻自己的机会。大家只要看我所担任的功课，就知道我是以十二分的气力作我的事情。我一周功课在研究部天天有，训练部有三天；每天要讲四点钟，此外还有院里县里的事。

我愿意大家在我们民族垂危的时候，做我们祖先的好子孙，做要强的子孙，不要做不孝的子孙，这才算尽了我们的心。在今天开学典礼中特别讲述这几句恳切的话，嘱咐大家。

《乡村建设》（半月刊），5卷3期，

1935年9月15日。

## 乡村工作中一个待研究 待实验的问题<sup>〔1〕</sup>

——如何使中国人有团体组织

在座同人！各位先生！我们的工作讨论会开过了三天。在历次大会讨论的时候，兄弟都很少发言。本来对各个问题，兄弟都有许多话想说，但一则想多给同人发言的机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同时我所想说的话，都不是几分钟可以完的。现在承主席团之约，要兄弟作一小时的讲演；一小时的时间，还是有限得很，仍苦于不能作有系统的阐述。我的讲题是：“乡村工作中一个待研究待实验的问题”，此即如何使中国人有团体组织？

我常听得高先生（江苏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先生）说，他很注意如何使民众起来组织团体。定县（平教会）四大教育中之公民教育，也是矫正中国人的自私，让他往团体组织里去。兄弟在邹平的工作，如何使民众有团体组织，更是我们所注意之点。现在我想从自私的“私”来说：“私”这个字，很多人说是

---

〔1〕这是著者在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1935年10月10日，江苏无锡）上的讲话。《大公报》“乡村建设”（周刊专栏）刊出时所加按语说，关于此讲话“从前本报已有简要的记载。日前承梁先生将修改过的稿子，从邹平寄来，嘱为刊布。”先此，《教育与民众》（7卷2期）和《宇宙》（3卷8期）也刊出了刘焕林的记录稿，但较为简略，且未经著者修改。故以《大公报》为准。——编者

中国人顶大的毛病。三十年前，兄弟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其中即读到中国人缺乏公德。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听到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没有三个人以上的团体，没有五分钟以上的热气……。前天晏阳初先生讲演，还引了外国人的一句话：“一个中国人是顶聪明的，两个中国人便是顶愚笨的”。《大公报》，亦曾引用张伯苓先生的话，痛论中国人的自私，以为此弊不改，中国无救。这些话我都承认；但是我们应当想一想：中国人的自私是从那里来的呢？难道说从中国人血里带来的么？我不相信有先天的自私性！我们还要反省：自私必是缺乏社会性，而人是社会的动物；如果中国民族当真缺乏社会性，他能够活到今天吗？他的历史能如此悠久吗？他能够疆土日益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吗？这个理讲不通！所以随便说中国人自私，这话很不妥当！中国民族以独创的文化而维持其生命，维持到没有有其他民族能和他比历史；他若自私，早就完了！我一面承认中国人自私，一面否认中国人自私。照我所认识的，中国人的自私是后天的，是从社会结构的影响，让他如此。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培养、锻炼、训练，而成功了。所谓中国人之自私，即心理学上所说刺激反应的那个道理。此要点在社会结构而不在中国人。由其社会结构之特殊让他如此，不是中国人生来如此。

中国社会结构之特征何在？就是平常顺口说的两个字：“散漫”。中国社会和其他社会比较，很容易见出他像是“化整为零”。散漫两字很简单，简单就失于不够，不清楚，容易误会。我底下用两句话作说明：一句是“在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途，而缺乏阶级之分野”。一句是“在中国社会，有伦理生活，而缺乏集团生活”。散漫的内容意义，就是这两句。第一句尚含一点，

即“力避垄断”，也许因为无垄断而无阶级也许因为无阶级而更无垄断。无阶级，无垄断，遂所以成功散漫。第二句话里，也含有一点，就是“力求相安”。由力求相安，也就越往散漫里去。大家千万记住：团体这东西和“竞争”“斗争”最相联；几乎可以说有竞争斗争方有团体，有团体更易引起竞争斗争。于此亦可明白中国人之和平，与其散漫亦是一回事情。

底下我再解释“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途，缺乏阶级之分野”，和“中国人有伦理生活，缺乏集团生活”两句话。我们先从中国人的伦理生活说起：本来以散漫来形容中国社会，也算说着了；可是不要误会，中国人并非如此散散漫漫，他正有很密切的连锁关系在。这个很密切的连锁关系，就是伦理。我没有时间对中国社会构造作过细的分析，我可以用一句话总结来说：就是“以伦理情谊连锁众人，彼此顾恤，互相负责”。中国旧日的社会，确是这个情形。（此刻的中国社会，已非固有，固有的崩溃了。）在从前的中国社会，每一个人都对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负责，如父母，兄弟，亲邻，朋友等等；同时也有样好处，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也对他负责。第一，认识了人生始终在相关系中而生活，在相关系中，彼此又互以对方为重。——此即伦理。无论好的父母，或好的子女，好的亲邻，莫不以对方为重者，其所以然，盖出于“情”；因情而有“义务”。所以在中国社会里，充满了义务观念；伦理关系即义务关系。权利观念，从前不大有，直到现在，你对中国人说什么权利，他还不大入耳。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伦理就是情，就是义务关系，所以我说中国社会是“以伦理情谊连锁众人，彼此顾恤，互相负责”。这样不是散漫。然其散漫者亦在此。曾经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中国社会是否因散漫才有伦理来补救呢？我回答他：否，

中国社会是因为有伦理所以才散漫。伦理是以家庭为中心而向外放射的，即以父母兄弟的关系向外推广；所以推到师生就有所谓师父，徒儿，推到政治就有所谓父母官，子民，统统是这个意思——拿“家”来放大。家庭，在中国人的生活上位置之重要是都知道的，为什么有这种特殊的情形呢？完全从一个问题来的。这个问题，就是“缺乏集团生活”。同时我要指出，说中国人散漫，并不是说中国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集团生活发达后的产物，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所以没有个人主义。集团与个人是两个极端，有团体才反映出来有个人，好像有西而后有东，有左而后有右一样。在无集团生活的社会里，无个人主义，因为他不知道有个人。——没有过强的团体力量，反映不出来个人。家庭生活造端于男女两性，那里能说中国人有家庭生活而西洋人便没有呢？中国家庭所以显得重要即因缺乏在家庭之上的大集团关系。西洋人虽不是没有家庭，可是西洋人家的重要被团体关系掩盖了。团体的对面是个人，家庭位于中间，西洋人趋重两端而中间隐没；中国没有两端，所以特别把家庭显露出来。而家庭骨肉之间，当然要讲情感，讲义务，不能讲法，不能讲纪律（集团生活则非讲法，讲纪律不可），所以中国人特别发达的是义务观念，道德（或曰伦理）观念。由此伦理义务之观念而形成社会秩序。

底下我要从三方面说明中西社会之不同：

一、在政治上，我很容易看出西洋人的集团生活。此因其所处的环境是国家林立，国际竞争激烈，所以人民不能不讲团结，国家不能不讲干涉，这是锻炼西洋人有集团生活的根本。象中国外无国际竞争，内以消极为治的情形，在欧洲是没有的。从前的中国人不似现在的中国人；从前的中国人很享福，百姓是

“一等大百姓”。北方有句话：“交了粮，自在王”，从前的中国人个个都是“王”，与国家彼此不相干涉，自由自在得利害。整个历史上的中国，是“桃花源”啊！

二、在经济上，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干涉的，近世之讲自由竞争即其反动。中国人在经济上也是自己关门过日子，小农小工小商各自经营，零散的很。

三、不惟政治经济两方面是这样，而更根本的：西洋人在宗教上有集团生活，中国人没有。刚才说团体与斗争相联，有斗争才有团体；现在再请大家记住：人类从前几乎有宗教就有团体，有团体就有宗教。有团体而无宗教者盖甚少；在当时，宗教是唯一的团体。

中国在这三方面都缺乏集团生活，所以显露出家庭关系而发达了伦理；所以说中国人不是以伦理补救散漫，乃是有伦理适所以成功散漫。在这里我可以夹带一句话：让中国人没有宗教、没有团体的是孔子（此地没有是非功过的意思，只说事实）。那末，伦理既然把人都连锁起来，互相负责，为什么还说他散漫呢？因为他是消极的有所保障，而非积极的有所进取。必须好多人联起来，向着共同目标积极进行，才算团体。伦理关系只不过在有问题的時候互相帮忙，有消极性而无积极性，非团体，故谓之散漫。因之，中国人没有法子不是身家观念重，没有法子不照顾他的亲戚友邻。于他生活有关系的原来只是这个而已啊！

底下再说职业分立的话：职业分立乃对于“阶级对立”而言。照我的分析，中国很早就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制；同时蒸气机、电机又未发明，于是在经济上就没什么垄断。经济上垄断不成，则政治上垄断亦不

能有。秉政而亲民者，为官吏而非贵族。官吏由考试制度而来，故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谚。故只有士农工商之分途，而无两阶级之对立。富贵贫贱升沉无定，而大致“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其势使社会中人趋于分散而不团结，与阶级对抗使人趋于团结者恰好相反，士人念书作官，固为一身一家之事；其为农为工为商者，亦无非靠一家大小来经营。你一家，我一家，各自奔前程，谁也不管谁。兴发是一身一家，失败也是一身一家，由此辗转复辗转，总不出乎一身一家。诚以和他们生活关系最密切，无超乎身家范围者也。所谓中国人的自私，只是身家观念重，然而不让他重身家重什么呢？这时候中国人除身家观念外，实在没有较大范围可以构成亲切的一个东西。如西洋中古的宗教集团，近世的职业团体，阶级团体，他都没有。复以缺乏国际竞争，及政治上的消极无为，国家亦与他的生活无关，国家观念无从而有。所以便是“天下为公”，什么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他绝对摸不清。从“天上”落下来便是“身家”，从“身家”升上去就是“天下”。这天下为公的“公”，大公啦！公虽真公，可是抓不着，靠不住，用不上！中国的的确确富于世界主义，大同思想，不爱和人家分彼此。比如两人在一块吃茶，倘若各自给钱，怪不好意思！中国人历来不好和人家分彼此，可是今天人家和咱分起彼此来！所谓中国人自私，即落于一个极端——中国人恒落于两极端，说到公未免太大，说到私又失之太狭。西洋人好在有一个圈，他那个圈不大不小，正好培养公德，锻炼团体生活。所谓“公德”须靠即公即私，为公即是为私，公私打成一片才能培养得出，否则无法培养。若公与私是两回事，要人牺牲了自己而为公，那不是常法。公德与急公好义不同，急公好义是个人超凡的侠义行



为，公德则是多数人养成的良好习惯。〔公德，〕中国人是缺乏的，可是急公好义的人则很多。这正因为社会散漫，大家的事无团体负责，所以不能不奖励个人急公好义。我们听《状元谱》那出旧戏，陈伯愚有两句：“为儿女俺也曾朝山拜庙，为儿女俺也曾补路修桥”。路和桥本来是大家的事，搁到现在，应当是建设厅去办，而当初没有这个机关。人们又是“各扫门前雪”，没有地方自治团体，没有国家，找不着人管，不管又不行，怎么办呢？所以如果有人出来办，就认为是一种善行，一种豪举而奖励之。于此很可以见出中国人散漫到如何程度了！西洋人的公德和团体生活的习惯，完全靠他那个不大不小恰到好处范围培养成的。那个范围，关系其生死存亡，你要活着，非靠此范围不可；你要死，亦必须死在这范围里面。所以养得成“公德”或“团体生活”的习惯。但是要明白，西洋人之为公（为国家为团体），不是真公，而是“大范围的自私”！有一个日本人叫做藤泽亲雄，曾任国际联盟秘书多年，他对我说：“西洋人国家观念之强，我在国联里几年可吃透了，从他们的道路，绝对走不上世界和平；于是使我想起我们东方的‘王道’，益增爱慕。”西洋人和今天的日本人，其所谓爱国，都是大范围的自私！中国人自私的范围小一点，所以挨骂；照我说西洋人日本人都该骂，他们不是真公。真公的还是中国人！中国人天下一家，从没有像西洋人日本人那样的狭隘心理。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可以知道过去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散漫、消极、无力了！可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此散漫消极，无力而无之！在过去，社会虽然散漫、消极、无力，总还有其在散漫的社会秩序条理；今天是连那散漫消极无力的社会秩序也没有了！现在的中国是乱七八糟散而且乱。在这散而乱的社会

中顶没有办法：政府与人民大家相蹙叹息而皆莫可奈何！许多人还骂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的热气，真冤枉！天地间热气原来只有五分钟，谁能老是冒热气哪！西洋人，日本人，也是五分钟热气吗，不过当他们热的时候，情绪能送达出去，有其行动表现；中国人则干冒热气而送达不出去。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中国社会散而且乱！中国社会如有其机构，有点条理秩序，人民的情绪可以达之行为，那末，一分钟的热气也还有用处；否则，你热一点钟也是白热！

中国人因为缺乏团体生活，所以把团体的生活所需要的要素就缺乏了。团体生活所需要的要素是什么？一是纪律习惯，一是组织能力。纪律习惯是什么？就是多数人在一块时还能行动敏捷。因其彼此之妨碍减少到最小限度，和一个人一样，故能转动自如，无丝毫牵制。这件事情，在中国很难作到。我们看茶馆戏园之中，或开会场所，每每乱七八糟，嘲（吵）闹拥挤不堪；听说在外国看电影买票，也有次序。必如此，行动才敏捷，问题才解决得快，中国人则不知道这个道理。组织能力是什么？即大家商量着办事，彼此互相承认地位，凡一份子应作的事情都尽其力量，不净支配人，也不净听人家的话。否则不算组织能力。这个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中国人在团体里边，他高起兴来，则急公好义，忘寝废食；一不如意，马上抛开不管。团体事情与其生命无密切关系，所以锻炼不出纪律习惯，组织能力。纪律习惯同组织能力比较，则纪律习惯容易养成，组织能力不易培养，因必在进步的团体生活中才有组织能力。团体生活怎样是进步的，怎样是不进步的呢？在团体生活中多数人被动就是不进步的，多数人主动就是进步的。不进步的团体生活，只可养成纪律习惯而不能养成组织能力，组织能力惟于进

步的团体生活中方得养成。说到中国人自己缺欠之补救培养的话，我愿意提醒大家：中西文化比较，中国所短的不外两样，一是科学技术，一是团体组织，再没有第三样。我们如果把这两样（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有了（有固不易），那是成功最好的文化的时候。关于科学技术的话我们不说，下面单说团体组织。

团体组织这句话，包括了纪律习惯与组织能力。纪律习惯很容易培养，如广西强迫练民团，每人都要当半年兵，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样下来，纪律习惯就可以有一些。不过，这个可不能培养组织能力。组织能力是各个份子对团体皆为自动的有力的参加；仅能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是不够的。那末，如何培养中国人之组织能力？如何让中国人在小的地方社会形成地方组织，在大的国家形成民主政治，或者在经济上形成种种合作，这个真是有待研究有待实验的了。这个问题，说着容易，作去很难。怎么难呢？因为我想有两条路不能走：一是近代西洋民主政治的路。近代西洋人之所谓民治的组织，一人一票，大家平等，开会表决，这种近代的方式，其根本观念是从“个人权利”出发，是“个人本位，权利观念”的组织。法律，国家，都是为此，都是从此出发。这条路是西洋人从他过去（中世纪）的过强的团体干涉力而来的反动，开出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一条路，所以近代思潮所表现的处处不外乎此，而形成了个人本位的社会。个人自由这条路走得太偏了，流弊百出，于是又要求不要太抬高个人，妨碍社会，妨碍团体。所以重新转入第二条路，而再归到讲干涉，讲统治，把从前神圣的自由亦视为不神圣了。共产党，法西斯均是如此。这又是最近潮流，为对于近代潮流的一个反动。我们如果明白西洋各有其背景，则可知那两条路都不是我们所能走的了。何以言之？因为第一条

路对团体可说是个离心的方向；中国人正缺乏团体，若再走离心的方向，不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吗？正苦于难合而故使之分，不是自相矛盾吗？那末，第二条路——最近潮流该合我们的需要了吧？是又不然！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有两个毛病：散漫是其一；第二就是如果有团体的时候，在团体生活中他总是被动的。中国老百姓就是会听话，听话成了毛病。兄弟作过两次短时间的县长，感觉到老百姓很难对付！举办一件事情，你开头的时候如果让他商量，他总是商量不到一块；这时候你再强他如何如何，他一定不高兴。可是一上来就不让他商量，干脆命令他如何如何，他也就俯首贴耳地一句话也没有了。其历史生活如此故也！这个被动的病源若是其深，而要治此病亦非自今日始。几十年来先知先觉牺牲了许多头颅热血，是为的什么？就是反对专制。反对专制，也就是为的治被动那个病。可是今天不叫专制而叫统治，不叫专制而叫专政，以统治专政为美名；前之拼命反对者今则高兴赞成，究竟应该反对还是应该赞成呢？依我说还是该反对！我们要知道：不能治被动的病即不能治散漫的病；不能治散漫的病的也不能治被动的病；能治被动的病的能治散漫的病，能治散漫的病也能治被动的病。我们走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则无补于散漫，走挽（晚）近干涉统治的路则无救于被动；被动与散漫，有一不治则两者齐来。再告诉大家一句话：西洋人的那两条路子，不单是我们走着不合适，并且亦无法走得上去。二三十年来民治的不易成功，是因为缺乏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作过渡，所以不能成功民主国家。自民国十五年至现在，我们所苦的是苦于党的无力，党之所以无力，亦在其缺乏阶级背景。如果有人一面骂中国散漫，一面又挑拨阶级感情，鼓动阶级斗争，那是自相矛盾，都是自己糊涂！同时因为

政治无力，而所谓团体最高主义，所谓什么统治，都无从说。因为如此，所以不能不走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即所谓乡村建设。要用教育工夫，启发农民的自觉，组织乡村，首先在经济上联合自卫，联合生产才行。然而难上难的是西洋近代潮流和最近的潮流我们都不能走。我们究竟走什么路呢？用什么方式来组织民众，推动社会呢？这是我们乡村工作中一个急待研究、急待实验的重大问题。邹平那边虽然有些研究有些实验，第以实验尚无结果，恕不报告！

《大公报》乡村建设周刊，16期，

1936年1月1日。

## 一年来的山东工作<sup>〔1〕</sup>

### 一 引 言

二十四年的双十节，转瞬将到，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又将在无锡开会。照例各乡村工作团体或机关，应将一年来的工作向会上报告，以求教于各方同志。本年开会又限定此项报告必须以书面提出，不要口头报告。因此，这一篇报告的撰写，益不可少。但同人工作，均极忙碌，想到要做的报告时，则为期已迫，只好粗粗略略编述一些，即借《乡村建设》半月刊印布出来。我担任的《一年来的山东工作》一题，算是总括的叙述；由我口说借着编者的笔而记下来，以成此篇。

现在叙述的工作不止邹平一隅，所以题作《山东工作》，但山东的乡村工作，又不止此；例如山东省立民教馆，以及山东教育厅所辖各乡教育实验区，均有很好的乡村工作。所以此篇只好说是我们同人在山东的工作。又因为叙述力求简要之故，凡循着旧有工作而进行的就不说；所说都是新的工作，或对于旧的有所改变之点，而且只能举其大者，琐细的亦不及说。

---

〔1〕 1935年10月10日在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上的书面报告。

## 二 推广县政建设实验区

我们这一年来，新工作之大者，那就是划定鲁西十四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一事。先是鲁西菏泽县，经于二十二年划规本院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分乡设立乡农学校，从训练农民入手，由乡村自卫而推及各项建设，略见成绩。山东省政府因有就菏泽附近十县推广办理之拟议，其后遂有划济宁等十四县为实验区的实现。省府即任本院副院长王绍常先生为实验区长官兼山东第三路民团指挥（全省分五路民团指挥，分负地方防务之责），设区长官公署于济宁，统辖各县。以菏泽县长孙廉泉先生调任公署秘书主任，参赞一切，而以本院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主任陈亚三先生接充菏泽县长，以菏泽为全区的一个中心或领导者。自本年1月1日公署成立以来，不觉已八九个月。起初工作，一面改造各县行政组织，一面分乡普设乡农学校，以本院各届结业同学五百余人分任教职，训练农民（所有公署组织、各县政府组织、乡农学校办法，以及其他改革计划等件，此不及详）。不幸到后来（7月8号）黄河在鄆城开口，全区十四个县被水淹了十县。现在救灾不遑，实验工作已陷于僵窘境地，前途如何，正在筹划中。

## 三 院内工作

其次说到院内工作。院内工作，乡村建设研究部和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均与实验区有相联的关系，第二届研究部同学在本年夏初多分在实验区各县，担任教育指导员，训练部第三届

同学三百余人（本院及分院之合数），除一小部分留邹服务外，其余二百余人均分配于各县乡农学校工作。本年7月应计划如何招收训练第四届训练部事宜。我们想到乡村工作当以本地人为主体的，而现在鲁西十四县服务者多为历届训练鲁南、鲁北、鲁东等处学生，其为本地人者实居少数。因即决定此次招生多招此十四县人，及其邻县的人，并且主张就地训练；于是核减邹平本院预算，扩充菏泽分院规模，使能容纳三百人以上。此为一大改变点。又本院向年训练皆为公费生，限于本省人；外省人均仅为自费附学。今为应合一般需要，邹平本院招生，不再分别省籍，而一律自费；另设奖学金，补助寒苦学生（分院学生亦以自费为原则），此为改变之第二点。又向年训练部肄业期限，例为一年，今改为一年制及二年制两种；高中或师范毕业者训练一年，初中及同等学历者训练二年。此为改变之第三点。此外关于在生活指导上，教学课程上之改变，另篇叙述，此不具说。研究部照上届无大变更。自实验区被灾后，分院之招生及训练事宜，略感困难，然大致尚在竭力进行中。

#### 四 农 事

院内农场的改进，要农场自作报告，才说得清。其中较大一项，而我可以来说的，为本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华洋义赈会山东分会，在济南辛庄成立合办农场。此事经各方倡议很久，直到最近才算成功。缘华洋义赈会山东分会与金陵农学院早有一合办农场在济南齐鲁大学附近。所作小麦等作物育种工夫，已历五年之久，惟地亩有限，不敷完成试验工作之用；适本院经山东省政府拨到辛庄官地六百余亩，完全为一整片断，土壤亦



好，遂有彼此合作之议。在该场迫切需要地亩，而苦无法扩充；本院为重视其育种工作起见，特于上年秋季，无条件将辛庄地亩一部分让与播种，至今夏才将合同签定。此事在本院愿与合作的意义，是为本院在邹平的农场，人才设备，种种不足，地亩扩充，尤感不易，所以不敢谈研究工作，只好作推广工作。领到辛庄大段地亩之后，论地势未尝不可建设农场，但在同一地方，有该场作各项育种工夫在先，即不必重复再作。为山东农业打算，实应帮助该场完成其工作，而以本院乡村服务人员分布之广，正宜引推广为已责。大概到后年即有优良小麦品种向外推广矣。

## 五 卫 生

本县的医院兼邹平县卫生院系于去夏筹备、9月成立。主其事者李玉仁大夫，历任上海高桥、吴淞两乡村卫生实验区副主任，于乡村公共卫生工作富有经验。来邹以后，所规划而实行者，均具有意义；其详可看该院所作报告。近大半年来，新增工作，则有两大要点，一是邹平本地招收中等程度男女学生二十人，分别训练，为将来分乡成立卫生所，担任医疗及卫生工作。一是添设病床，完成医疗设备。盖当初计划，侧重卫生工作，在医疗上则借重周村的复育医院为后盾，自己没有病床设备。后来感觉到在医疗上不树立一点信用，公共卫生工作不易推行，而非自设病床，不能尽医疗之能事也。详见该院报告，此不及叙。

## 六 合 作

邹平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的成立，亦为一件重要的事。邹平的合作运动，始于本院农场之推广棉种，提倡造林，指导养蚕等事。同时县政府第四科原亦有专司合作行政的人员；在二十二年研究部同学陈以静接任其事和农场主任鲁溪兼任第四科长后，院县两处打成一片，工作颇好。但权责亦以此分不清。其后农村金融流通处改组成立，趋重于信用合作社之倡导扶持，于是又多一合作指导机关。同时院中为讲授合作课程及其学术之研究，聘有专家一、二人。就合作之教学而言，必须参加实际工作实地练习；更就其学术之研究而言，亦非从实际问题探求，不能有所创造；而在实际工作上，苟非得有专家为之指点，亦必不能应付得宜；是其有联合沟通之必要甚明。合作委员会即基于此要求而来。其组织系以担任合作教学之专家，及本院农场、县府第四科、农村金融流通处各部分人员，会合一处，融为一个系统。俾在工作上得收统一指挥之效，学术与事业，交得其益。其详细守则及进行状况，该会另有报告，此不多叙。

## 七 邹平实验区

以下再专就邹平实验区工作来说一说，这约有下列几件事情：

### （一）农村金融流通处的改组

以前的流通处，兼办县府征收支付事项，是一县金库的样子，于农村金融之流通，未能十分致力。自改组后，筹定资本，

专意流通农村金融，放款几以农村信用合作为唯一对象；一面仍代理县库，但不办征收。在组织上成立董事会，采用经理制；与前已大不同。关于该处改组后一年来的工作，已有报告书编成出版。此不多叙。

### （二）县政府组织之变更

变更之要点，在一面将原有同属办理财务行政之第二科、第三科合并为一个第三科，一面将公安局裁撤收归县政府内，成立一个新第二科，专司警察及保卫事项。一原来之第二科系办理财政之属于省税省款部分的，而第三科则为本县地方的。在邹平自二十二年已作到统收统支，县府一、二、三、四、五科经费皆有省款支出，（他县三、四、五科由地方款开支）；实以合并为便，公安局裁撤后，其警察与县府所有之政务警察，合组为一行政警察队，隶属第二科。属于第二科的还有一个地方警卫队，算是保卫地方的一种力量，与各乡分队为一个系统。乡队都是过去两年所训练的农民壮丁，自负起乡村警卫之责；警卫队则系由此中抽调数十名，集中城内，再加训练四个月，即以训练期间为服役期间，期满还乡，另行抽调，为此轮流受训服役。详细办法，另有报告。

### （三）举办青年义务训练

在去冬循往例训练农民壮丁时（普通算为联庄会员训练），除大部集中城内训练，曾有一小部分在第十三乡就地训练；同时本院第三届训练部，亦正在下乡实习。很偶然地试行一种青年义务训练，强迫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男丁受教育，以村学教员或村中小学教员为其教员，而各乡队长各村组长，则为军事训练教员；大概气象尚好。因于本年春初，向全县推行；但推行未及两个月，因有挖河工程，致限于停顿。

#### (四) 疏浚杏花沟

杏花沟为东西河道，横亘于邹平中部；自我们民国二十年初到邹平，即闻此中部尤其偏东一带地方，常有水患。其问题在下游宣泻不畅，故重要工程，实在东邻长山县。本年春初省府命令两县征工开挖。两县农民，初以工程浩大，天旱民困，请求延缓；后来调停分两期完工，本年先行开宽，明年再行落深。并承韩主席派兵士一旅帮助，每日平均仍有民夫万人。逾时两月，第一期得告竣工。预备明春再做第二期。此工若完，则邹平水患可减八九，增加生产非小，其详不及述。

#### (五) 举办户口调查实行人事登记

二十三年末，就院县两方人才，组设邹平户口调查设计委员会，于二十四年一月八日，运用在乡实习同学，举行全县大调查。统计结果：普通户 32407 户，铺户 39 户，寺庙户 50 户，共计 32496 户。普通人口 165453 人，厂铺人口 151 人，寺庙人口 131 人，共 165735 人。又寄居人 1588 人。调查完毕即筹办人事登记。于四月一日成立各乡学户籍处，县政府设户籍室。每一乡学户籍处设户籍主任一人，由联庄会员之乡队副兼任；联庄会之村组长兼任户籍员，全县 107 人；以全体联庄会员及甲总编为户籍警；开始工作，着重宣传方面。七月又举办户籍登记。由各家长依照户籍法申请登记。最近已将登记书整理完竣，正开始编造户籍登记簿。此步工作完竣，人事登记乃上轨道；只须随时查察；人口数随时可知。

#### (六) 村学之整顿

邹平之实验工作，主要在乡村组织之实验，是即村学与乡学。村学工作，虽具有如是之位置，但两年来，始终未做到好处。余于本年 6 月自兼县长，其意盖专在整顿村学。将所有村学教员

一律调回,选拔一部分,再加以新毕业同学,集中讲习,然后下乡。同时就全县指定九个乡为先办村学区域,其余暂且缓办。其详情非另为专篇叙述不可。

### (七) 凿井抗旱

自我们初到邹平,即提倡凿井,请有定县李子棠先生担任指导,但以连年丰收,老百姓不感需要,直至本年,自春徂夏,数月不雨,人心焦急,推广凿井,乃得其便。县府原备有凿井贷款六千余元,不敷需用,特又筹拔两万一千余元,一律无息贷出,奖励凿井。计各乡贷款新凿井共 333 眼,非贷款者 702 眼。以后如有旱灾,不无小补。

### (八) 试行导友制共学处以普及义务教育

陶行知先生所提倡之小先生制,去年曾试行于第十二乡。其后又参照定县导生制,于本年 1 月在第十一乡学试验,各村学也遂有仿行者。此事除具有启发学生活泼自动精神及培养其组织能力之优点外,对于解决贫苦失学儿童之教育,贡献甚大。现在已推行于第十二乡及第七乡,即将推行于全县。本年中央为实施义务教育所提倡短期小学,在邹平即将以共学处代之。关于导友制共学处之内容办法及全县实施计划,此不及述。

### (九) 取缔婚姻陋俗

邹平民俗大致尚好,唯男女婚姻,每失其正。其陋俗必须纠正者,一点是男孩子结婚年龄太早,一点是女大于男的年龄太多,一点是女方索聘礼太重,近于买卖婚姻。因根据民法所定男女结婚年龄,及内政部改革婚姻陋俗政令,制定取缔婚姻陋俗办法,呈准省府实行。大约此陋俗之革除,仍靠教育化导功夫为主;不过若无此法令为后盾,则教育亦难施其力。办法原文不录。

### (十) 举办自新习艺所

从前的乡村社会,对于恶人,尚多少有其社会制裁力量;同时行政与司法不分,政府权力无限。由政府来制裁恶人,亦殊容易。近二十年则此社会制裁力与政府制裁力两俱失去,乡间莠民欺负良民,而无可奈何。我们有鉴于此,曾制定一种办法,拘收乡间小偷、赌棍、地痞、毒品犯等,施以特种教育,名曰成人教育特别班,曾于上年呈准省府实行。这与本年7月实行刑法中保安处分之意颇多暗合。最近更将办法改善,规模扩充,戒烟所亦合并在内,改为自新习艺所。别有详细章则,此不具述。

## 八 结 论

此外在院中在县中,一年来兴革之事,不能尽叙(例如乡村建设旬刊改为半月刊之类)。即上面所叙,重要节目,以乡村运动来看,亦都是些支支节节的事,不算什么。我们要知道不于中国大局有影响,即是没有意义的。乡村工作,如果不从社会风气有点真的开动,而单靠政府来办,那就是很少影响的。社会风气的真开动,必在农民的自觉,乡村的组织;而为之先者,要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趋向。我们检讨我们的工作,于此盖多惭愧!

《乡村建设》,5卷4期,

1935年9月30日。

## 《乡村建设》半月刊“邹平 乡师专号”序言<sup>〔1〕</sup>

我于教育向无研究，于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更属门外汉。但我知道中国眼前的小学教育正在问题中，未得解决。在小学教育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师范教育更不知道怎么办。所谓小学教育的问题，我所看到〔的〕是两层：

一、照现在这样的小学教育，实非这大社会所需要的；尤不适合其大部分农村社会的需要。所以其结果，农村儿童不能从这教育里面得到什么长进，会使他们更有效益地参加他们的社会生活。质言之，从我们看，尤其从农村父老看，儿童受了教育亦没有什么好处。

二、照现在这样的小学教育，实非这大社会所能享受的；尤其不是大部分农村社会所能享有的。所以其结果，农村儿童能受到这教育的为数很少，大多数都被遗漏在这教育外边。质言之，这样的小学教育，事实上不能推广普及。

这两层恐怕是相联的一个问题。因此，我看到这问题解决的途径，是要先从大多数农村儿童能享有那一面着想，而发现一个最容易普遍推行的小学教育。——那非将现行制度完全打

---

〔1〕1935年12月《乡村建设》(半月刊)出版了“邹平实验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专号”，刊出多篇该校教师撰写的文章；此文为该专号序言。

破不可。在这样轻而易举，简而易行的教育里面，其效用自然有限。然而我们必须让他们有教育上的效用，——虽是很小的，然而确实是。质言之，从我们看，是有好处的，从农村父老看，也觉得有好处，而愿意送他们的孩子入学，一点亦不为难（注意：要在经济上很合算，才不为难）。

说到这里，要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这样的教育，适合了农村儿童，就与有一些人家的子弟不适合；那应该怎么办？一个是，这样的教育，太俯就大社会，不合乎教育引高文化之本旨；教育上的效用太少，怕容易丧失，终归等于零。一个是，这样的教育必须因地制宜，而中国地方太大，各地情形千差万别，如何能都作到好处，而仍不失为一国的小学教育？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不能解答的。第一，我们要晓得，教育固在引高文化而不是随着他走，然你与社会离绝，又如何能以引他？俯就正为的是要引高。第二，我们要晓得，照普通例子，教育都居于被役使的地位而不居于领导地位。教育制度随着社会制度而决定，正不劳亦不能从根本上作何打算。但中国今日，适逢社会构造崩溃，而需要教育来完成社会改造之际；教育将居于领导地位，正合了“引高文化”那句话。如不以教育机会彻底给与农民，则经济上改造工夫、政治上改造工夫，何从完成？除了成年农民是这社会改造期的教育主要对象外，那就是农村儿童了。第三，说到具体解决办法，那请看我曾发表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农村儿童既要照顾，另一些人家的子弟亦不遗漏；从不多的教育上效用作起，而能不断地提高，虽各地方设施不同，程度亦异，而仍不失为全国整个的一教育制度。所有上面三个问题，均不必虑。

直接了当地说，我相信象《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所



规划的，实是中国教育最近将来所要走的路线。邹平现行的村学、乡学制度，正是根据那规划而作的实验。于此新系统内，小学这名词可以废而不用。村庄里的小学，要并入村学而为其儿童部；集镇上高级的小学，要并入乡学而为其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等。村学儿童部，其入学年龄若何？要不要包含幼儿教育？男女生是分是合？修业期限几年？课程标准怎样？以及教材教法等问题，要视当地情形而定（参看原草案），全国用不着整齐划一。假定在邹平的村学，于年龄上、程度上，有了规定；其大于此的儿童，高一点的教育，便归到上级乡学。村学对那一村中某年龄的儿童教育问题，要整个负责。乡学对那一乡某年龄，某程度的教育问题要负责。宁为多数打算，不为少数着想（少数于此系统内自有其机会出路），必求其有教育上的意义与效用，而不拘于形式。——这是我的理想要求。现在邹平的村学、乡学，只有个空架子，内容尚待充实。我今所用心实验的，是其地方团体自治的促成那一面；至于其中成人部、儿童部，以及其他部分，其他方面，正盼望同人朋友分别担任研究实验。

邹平村学儿童部到底应该怎么办？尚悬着一大“？”号。乡学亦同是这样。这正是邹平乡村师范应担负的实验工作，期望他能如我理想要求的，发见一套实际作到的办法，解决邹平乡村儿童教育问题。近则为华北乡村儿童教育开一条大路，远则为全国儿童教育启示几个原则。若离开此时此地大多数儿童教育问题，不求解决，而另去办一理想的模范的小学，纵有所创造，总于当地社会需要了不相干，因而亦就于今日全国小学教育问题不会有何启发贡献。

邹平乡村师范，自从张宗麟先生来主持以后，正往一新方

---

向迈进。承索赠言，略陈我的意见和希望如右，还望宗麟及同人诸先生指教！

《乡村建设》半月刊，5卷7、8期合刊，  
1935年12月15日。

## 《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序<sup>〔1〕</sup>

许莹涟、李竞西、段继李三同学，编辑《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既成，嘱余为之序。三子尝从余于邹平，致力于乡村建设之研究者一年。于菏泽，于定县，于无锡，于青岛等各地工作，皆尝参观考察。辄以所闻于余者，所得于各地方者，笔之于书。搜罗甚勤，不期而蔚为巨帙。年来乡村工作之风气渐开，往来参观者肩摩踵接，其以考察笔记出版者亦所在多有，实则匆促游观，难于得真；而理论主张辗转传述于口耳之间，尤多失真。今三子所为，余虽未加核定，料亦未能免也。然物之胜劣美恶，本为比较的，今此册视其他考察笔记，材料加丰，甄录或亦较正确，举以饷世，其亦未为不可乎？书中载述余之言论不少，除转载既经公表之文字不计外，其余多为诸生笔记，余未寓目，应由笔者负其责。读者善为考量，或亦不无所取耳。

24年12月 梁漱溟

〔1〕《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上、下），1936年3月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 中国民众的组织问题<sup>〔1〕</sup>

诸位！在讲这个题目之先，兄弟有两点抱歉的话要说：第一是到得很迟，我原定14号乘飞机动身，但是云雾太重，飞到舟山，又折回上海，昨早再起飞，下午才到，因为时间不早，也有点疲倦，未得赶来讲演。这是第一点抱歉的地方。第二点是不曾写个纲领先分送大家，使大家听起来比较要清楚点，因为我说的北方话，或者对广东的朋友，恐怕不能完全明白。这是第二点觉得对不住的地方。

这次讲习会派定我讲《中国民众的组织问题》，想大家早已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就是要讲一年半载都可以。现在我们只有四点半钟，而要在这四个半钟头里，来讲一个这种大题目，就不能不用简略概括的话来说。这个意思，就是只能拿出结论来说，还有许多解释说明的话，恐怕不及说到了。

现在想分下面三步来讲：

（一）绪论，是讲民众组织问题在我们社会教育上之重要；

（二）本论上，是讲：几个关于民众组织或者说为中国求民众组织的几个原理原则；

（三）本论下，是讲几个关〔于〕民众组织或者也可以说为中国求民众组织之几个问题。

---

〔1〕1936年1月16、17日在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社会教育讲习会讲演。

我把本论分原则和问题来讲，是因为原则可以由我们认定，而问题却要费商量，要临时斟酌后才可以去做的。

## 一 绪 论

我自己本来不是学教育的人，对社会教育更不曾讲求过。不过我这几年来对于乡村建设的工作，被教育界和社会教育界的朋友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工作，认我是同行伙计。但是我自己当初并没有当作教育来做，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不是社会教育的工作。因为我起初只是认定去做乡村工作。我先声明对于社会教育我是一个外行，然后我再来讲我这外行对于中国社会教育的看法。我的意思是以为中国此刻是一个文化大转变时期，这一个文化上的大转变，是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中国被新环境包围所影响而生出来的。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做文化上补充改造的工作。照我的认定，此刻我们应当做改造中国的文化和补充中国文化的工夫。这个工夫，我就叫它做社会教育。或者也可以说，我认为中国此刻办社会教育事业的人，应该做这种改造和补充中国的文化的工夫。所以在我看中国社会教育的工作，就是完成中国革命，来改造中国文化，来补充中国文化。

然则我们要做些甚么工夫呢？如果说补充，补充甚么？如果说改造，改造甚么？我的意见，则以为有两点应当做的工夫：就是“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这两点也就是我们固有的文化中所缺乏的，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补充和改造上，应当于此两点注意。

在上面两点中，第一点容易给普通人看到；但是这大家容

易看到的，反不如第二点重要。因为第一点不过是方法或者工具，而第二点乃是运用这方法或工具的主体，当然重要得多。这两点在中国是缺乏的，在西洋却很优长。这个意思，没有时候多讲，我只希望大家自己多去考虑。在我自己感到，中国除上二点之外，没有其他之缺乏，尤以第二点为最重要。所以要做文化改造的工夫，我们要从此去做。我刚才又说过社会教育即是改造文化，所以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也应以上面第二点为最重要。在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知大家看出没有，我以为那不是外患，而是本身的政治机构不健全，或者说得更明白点，就是我们国家没有组织好，没有成一个好的团体或健全的国家。因为中国社会本身没有健全组织，所以外患严重。如果在这团体组织问题我们能成功，也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时候。所以我们更可以明白这第二问题最重要，而我们也应当来用心研究。

以下我再来说明我们中国为什么缺乏团体组织。大家要知道，中国缺乏团体组织，自然是中国的短处，不过不是从短处有短处，而是从长处上有短处——即是说：正因为有一个长处才有一个短处。如果想说明中国文化的长短，很不容易，现在也没有时候详细讲，请大家去看我其他已发表的东西。但我愿意告诉大家，指出来中国和西洋所走的不同的路，这个不同的路，开始就在宗教。在中国是缺乏宗教，至少可以说，象西洋天主教耶稣教那种宗教，我们是没的。这有没有宗教，正象是分水岭，把中国和西洋分开来，各在一边。从有宗教，就有团体，没有宗教，就缺乏团体。人类从今日以后，欲有团体，或者不一定要靠宗教；但在以前，却一定要靠宗教，才有团体，这是真理。也没有时间讲，只可以告诉大家是如此。

中国因缺乏宗教，故中国所走的路，是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路，用我的名词，可以称为理性的路。走这理性的路，就让中国人散漫，西洋走宗教的路，就使西洋人成团体，让中国和西洋的文化不同。宗教自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却是其中最重要之一；并因其他因素，在中国适足以帮助更散漫，在西洋适只以帮助更成团体。譬如中国很早就是农业社会，而这种社会，就天然要散漫而不能有团体的。若在西洋，最初是海上的国家，从海盗才到商业。我们平日说西洋是工业的国家，我们不能说不对，但是要知道西洋近代工业是从商业而来。我想与其说西洋是工业的国家，不如说他们是商业的国家，比较确当些。从游牧与商业，都比较容易结队合群，但是农业就不然。现在却告诉大家中国和西洋走的不同的路，从因素讲，固然很多，从结果讲，最大的特征就是西洋人是集团生活，而我们是散漫的生活。如果大家更想知道西洋人如何成功了这种集团生活，现在时间太短，不能多讲。我常用八个字来说明中国社会成散漫之原因，就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如果大家去看我们在邹平出版的《乡村建设》半月刊，就可以明白这个意义。因为西洋过的是集团生活，又因为它团体力量强，所以从团体反映出有个人。（团体与个人，正如左与右，缺一不可，虽是两件事，但是对照的。）在西洋史中，可以看出西洋社会的演变，通是在这团体对个人或个人对团体一个问题上。从前已经有团体，到了近代，才在团体中把个人抬头；直最近二十年间，又再把团体抬高。西洋最缺乏的家庭生活，最易见的团体和个人。中国人刚刚相反，就只有家。家本来人人都有，西洋人亦不能说没有家，因为人必有两性的生活，跟着有了小孩，就成为家。可是在中国的家庭观念特别重，家族关系特别重。这为什么？正

因为缺乏团体，就反映不出个人，所剩下的，就只有家。在西洋团体力量太强，家的问题就掩盖了，隐没了，而在中国，却只显露出家的一回事。

现在借两件眼前的小事（实在也不是小事）来看中国人的散漫：第一譬如吃饭，西洋人吃的是集团饭，一人一份，即算有今天在座这么多的人，只要有张大餐台就行。若是中国人就不同，因为菜是集成的，只能供给五六个或七八个人吃。所以人数太多，就要分成许多小桌面，各各围起来吃才行。这可称做家庭饭，只有一家几个人来吃最好。西洋人可称做吃团体饭，一方面合起来成为团体，但一方一人一份，仍显出有个人，这与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第二件讲到住屋是一样。中国人住宅一定要有厅（北方称做堂屋），这个厅堂是供祖先和祭神用的，这里面虽含有近宗教的崇拜或信仰，可是终有个“家”的小范围。若是西洋人，就只有为专为睡和吃而安排的住屋，并没有供祭祖先的厅堂，因为他们村落中必有大礼拜堂，虽和我们一家中的厅堂相仿，但是范围就由家扩大成一个团体了。

现在我再指出三点来告诉大家，不过没有时间来详细讲述。凡人的生活上，有三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教、政治和经济。这三方面在西洋无不是“集团”的，而在中国，就无不是散开或“伦理”的。通是以家为出发点，也以家为归宿点。譬如中国的经济，既不是个人本位的，也不是社会本位的。在西洋二三百年来都是个人本位的经济，现在更要求社会本位的经济。若讲到中国的政治，也不过是把国家看做家庭放大的一个东西而已。所以中国没有国家，本来也不是一个国家，就是很多有见识有眼光的西洋学者，都有这种见解。这个东西，也许是高过国家的社会，也许还不如。总而言之，它不是一个国家。——这个



意思也是不能在短时间内详细说明的。

刚才对大家说过，宗教和团体相联，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团体和斗争相联。就是说：从团体易发生斗争，从斗争也易使人有团体。竞争虽和斗争不同，但是也有点相近，所以体育家常借竞争而锻炼人的团体生活，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刚和这相反，老是散漫的，和平的。因为越散漫，就越和平；而越和平，也就越散漫。散漫既与和平相联，斗争又与团体相联，所以中国是个散漫而和平的社会，而西洋是个集团而斗争的社会。以前是如此，今天也还是一样。不过两方面的文化虽说不同，但是并没有高低的分别，只可以说是备有长短。好，现在想大家或者可以明白我刚才说“中国缺乏团体，固为短处，但是短处是长处上来的”这句话的意思了。

现在再告诉大家何以中国今日需要团体生活，答案就是家庭生活不够。以前怎么样，现在无从知道，并且他们也已经过去了。但在近百年来，完全不同，因为今日的世界，已经变了不和平的世界，如果不讲求团体生活，恐怕会过不去。在今日的世界上，由西洋人布满了斗争和竞争，使我们散漫而和平的中国人会不能生存。如果再不结成团体，就会不能自保。中国人原来是和平的，今天还是一样；但是要想求自保，就非有团体不可。所以我刚才说我们眼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外患而是散漫，如果我们的民族社会成功了一个健全的团体，什么都不成问题，外患自然也会没有了。所以如何使我们社会成一健全的团体，实为我们眼前最重要的工作。

刚才我指出现在是一个斗争的世界，尤其在三二百年以来，从西洋人鼓动出来的这些大竞争；而在这些大竞争里面，主要的又是经济竞争。所以我说大家称西洋为工业国家，不如说它是

商业国家或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人此刻受压迫最大，不是日本武力，而是由经济竞争来的压迫，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受到，而且是很大的压迫。西洋人在经济竞争上有一个极优越之点，就是“科学技术”。但是现在不仅有一个优越之点。一个已经令到我们没有办法，现在除了有很进步的经营方法和技术以外，更利用他们第二优越之点“团体组织”来竞争。我们焉有不失败的道理？今日西洋从苏联到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都走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路。所谓统制和计划，即是团体的，他们由国家统制来竞争，即是以集团来竞争，中国人于此全无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国家，也没有团体，由我们的农民或商人，个人直接和他们成一个大单位的国家去竞争，自然只有失败。苏联、日本、英、美各国，无不走统制保护的路，都是整个国家、整个团体，力量非常之大。我们只靠一二商人，和他们国家竞争，那会有办法？所以在中国自然不能经商，也不能耕种。有了生产，也是卖不出去，结果，一切商业、农业、工业，通通被其破坏。所以中国人今日更不得不注重团体组织，尤以在经济上应当联合起来以求自保。譬如农民不论在种稻或养蚕，通通非联合起来不成。如果能够联合成一种合作组织，然后才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用进步的方法去做。此刻中国人非从团体组织，确无从自救，也无从引入科学技术。非有此两点到中国来补充中国的文化，中国就不能自立。

## 二 本论上

上一段属于绪论，是说明中国社会需要团体生活的理由。以下再讲本论上，就是在求组织时，我们应注意的几个原则：

(一) 第一个原则是应该求进步的团体组织。所谓进步是对不进步而言。不进步的团体组织，是指在一个团体中多数分子是被动的。反过来说，如果团体中多数分子通是有主动作用的，才可算做一种进步的组织。所以我们为中国社会求团体组织，就应当求进步的组织。并且不止从主观上有此要求，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说在客观上也一定将如此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今后如果有组织，就一定是进步的。至于何以会这样呢？正因为中国是一个散漫的社会。如果要求组织，一定是要从中国人自觉里求组织。这样，必定是多数人做主动，如是这个组织，就是一种进步的无疑。虽说现在很多人还缺乏此种自觉，需要人去启发，可是我们也只能启发其自觉，很难有其他的办法（其他办法指不经自觉而成团体）。社会教育很重要，它的重要就正在启发中国农民求组织的自觉。因为大家没有自觉，则组织是不能成功。在西洋以前的团体（譬如宗教）并不是由自觉而组织，所以不能算是一种进步的组织。直到近代，才渐走向进步之途，即是说，渐渐变成多数分子为主动；也即所谓民主。在中国就不然，无团体则止，如有则必定是自觉的。这是今日的时代和环境不同，自然令它如此。这个意思也因为时间太短，不能再深谈。

(二) 第二个原则是应该从小范围做起。这点是和第一个原则相联的；要承认了第一个原则，才好讲这第二个。因为一种自觉的进步的组织团体，实不易做到。在从来缺乏这种习惯的中国更难。我们现在不能希望立刻组织成整个之大社会。要先从小范围入手，在小范围里培养和练习，到结果成功一整个中国的组织。请大家注意：这种培养和练习他们的团体生活，即是社会教育。从小范围入手，在中国大概即是乡村。中国本为

乡村的集合体，所以想最后成为整个中国的组织，须应先从乡村入手。

(三) 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应从切近生活的事实来促进组织。这个意思是说组织非空言可以成功的，而要从切近生活的事实来促进。有了一点组织，就能使我们的生活或社会有一点进步；如是，社会更有组织。组织推进社会，社会促进组织（社会就是指生活事实）。总之，必要令组织和事实切近。譬如说养蚕是顺德人生活上之一大事实，我们就可以养蚕来组成合作社，促进生产，使他们生活较有进步。既有进步，科学技术就越多，如是就更进步，跟着也就更有组织。这样，我们就可从养蚕这件事来促进和培养顺德人的组织。总之，组织不能离开事实。所以我们办社会教育，领导民众组织，应当在他们的生活事实上想办法。所谓生活事实，是很多的，一时也举不尽，概括点说，就是生活上一切问题、一切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总应使农民从组织的力量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借着解决问题而成功组织。这是第三个原则。

(四) 第四个原则是要从伦理本位求组织。这点比较难讲；用一点钟来讲，恐怕也不算长，不过今天只能简单点来说。在西洋的团体组织，不外两个本位：一为个人本位，一为团体本位或者叫社会本位。这两种主义在西洋是互为消长。刚才说过西洋人从来是集团生活，而在集团生活里，常常颠倒于个人和团体孰重。在中世纪的时候，团体力量强，团体重要，所以个人在团体中就无地位而被看轻。到了近代，就发生一种反动——对于力量很强的团体的反动——而变成以个人为重，如是要求个人在团体中的自由，即所谓自由主义。从团体里，划出一个疆界——个人的疆界。在这疆界里，团体不能干涉。所以一个

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是个人生活，一方是他参加团体的生活。后面这一种和团体有关系，可以受干涉，但是在个人的私事无妨有（干）他人时，就有个人的自由了。这种就是所谓自由权。这里划分了公私的疆界，抬高了个人在团体中的地位。同时，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公家的事情。譬如参予政治（所谓参政权）。我是一个公民，我在团体中，就可发挥我的主张。这些自由权和参政权，都是从个人主义发达后才有的。这样，个人在团体中的地位抬高，变成团体中多数分子做主动，即是进步的团体组织。这种现象在西洋近代才有，所以西洋近代思潮，就是个人本位或者自由主义的思意（潮）。但是到了最近，又起一种对于个人本位的反动，再主张团体或者社会本位。现在讲统制，个人在团体中的地位变低，时受团体干涉。今日的共产党或法西斯，正是这一种的代表。所以刚才说在西洋这两种主义互相颠倒，低昂不定，总在这两方面反复。若在中国求组织，就不能用西洋那两种本位，而应用伦理本位。为什么不能走那两个本位呢？因为西洋近代的个人本位，是集团生活太强（即是团体干涉太过）的反动。如果我们中国历史也是集团生活太强，我们也可以走这条路。因为天下事不能偏，偏了之后，就应来补偏救弊。一件事情在开始不一定偏，但到末流，常变成偏。所以集团生活太过，就用个人生活来补救。到了个人主义的末流，又趋于偏，如是又起反动而补救。因为我们的历史背景是散漫的，我们从没有集团生活，而个人本位对集团生活是离心的方向；对于我们完全不对，所以西洋近代思潮和中国最不相宜，那么，团体本位，又何以不适用呢？照表面看，在中国很需要团体本位，它对于中国应很适用。然而仔细去研究，这也不对。因为团体本位一定要讲干涉，讲统制，结果使多数人成被动。中

国农民存有两种不好的毛病，一是散漫，一是被动。中国农民，在政治上全是被动的。从来散漫，所以没有团体；即算有个团体，也是一种多数人为被动的团体。这两个毛病是相联的，同时的，如果能够救散漫，必定同时要能治被动；二者异出同流，一个医好了，另一个自然好，不会去一个留一个的。所以我指出第一个原则说：如果中国人有团体，必定是进步的。如此，我们可以知道，团体和个人，不能偏重。不然，就一定会失败。但是西洋两种主义对于中国都不适用，都不能有助于我们中国人。这样，大家定要问：“我们走均衡象天平一样的路吧！”但这也不行。走路是要有方向的：譬如叫你向东，你可向东走；向西也有路走，向南向北，也是一样。如果告诉人走路，既不说向东，又不说向西；又不向南，又不向北，结果是无从走起。走天平的路，也几乎是没有路可走的。现在我们有一个最好的路，也是中国人的老路子，就是伦理本位。现在让我来讲伦理本位。

甚么叫伦理？伦就是伦偶——即是二人彼此相关。换句话说，就是人生必定在相关系中。天地间不会只有一个人的道理，一个人亦是不能活的。人生下来，必有其相关之人，人就在这彼此相关系中而生活。彼此相关系，而互以对方为重，这样就叫做伦理。在相关系中，彼此互相尊重，这个就是伦理。譬如主人和客，主应敬客，客人敬主；父母和子女，父母应以子女为重，这就是慈；子女也应应以父母为重，这就是孝；又兄应友爱，弟应恭敬，即是兄对弟和弟对兄，彼此互相有义务；——这通是所谓伦理。

人类有两种不同心理，就是欲望和感情。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在欲望中，以自己为主；而在感情中，就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两种心理很不相同的。中国之伦理，即从感情来。譬如

父母之爱子女，完全忘记了自己。为小孩做了不少的事，自己并不知道，甚至可以为小孩而牺牲。这通是从感情来。如果在欲望中就不然。欲望是利己的。所以中国的伦理关系，纯是感情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偏重伦理情谊；西洋的近代人所发达的，通是欲望。现在我不想来比较两者间的异点，我只借此来说明我们求组织的一个原则。因为个人本位，团体本位和天平的路，在中国通不可走，所以我主张走伦理本位。但请勿误会，所提出的伦理本位是指家庭本位。我所主张的，是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的一种道理。如果再说明白点，我是团体中一分子，我应以团体为重，而团体对我，也应以为重。或者说：在团体立场，不要以团体为重，应以个人为重；而在个人立场，应当尊重团体，并且互相尊重个人。这样一来，结果自然能平衡。不过这不是走天平的路，因为走天平的路是没有方向的。但是现在我已清清楚楚告诉你一个有方向的路，——即是尊重对方。走这条路，可以发达情谊，可以医治中国人的散漫和被动两个毛病。

因为发挥伦理意思，大家认识了在相关系中，那就不但不能散漫，并且应当求增进关系，在互以对方为重处求增进关系。所以伦理可使人增进关系。每个人都以团体为重，对团体为向心的，则此团体自能合起来而成功，正与那种使人分散对团体为离心的个人主义相反。不过我现在提出这个伦理，比以前的伦理要进步，因为以前只有父子、兄弟、夫妇之伦，而缺乏团体与个人之一伦。所以现在可以加多一伦，成为六个，或者把君臣之伦，改成团体和分子，那么，我们大家多了这一伦，我们的社会，就会不至再散漫了。

同时团体尊重个人而个人地位即抬高，则团体的事，就应

请问大家，征求大家同意，这样一来，又能将被动转自动。同时个人的自由即树立起来。中国想成功一个民主的社会，必定靠团体（或者国家）能尊重每一个人才行。如果团体有尊重个人的义务，然后大家才能从被动改为自动，而这个团体才能算得是个进步的组织，所以我们应根据伦理本位来求组织。

（五）第五个原则为发挥人生向上之精神来组织团体。关于这一点，因为没有时间，我暂时不讲。不过在另一讲题《乡村工作人员修养法》里，可以说说。

### 三 本 论 下

第三段为本论下，是讲关于求民众组织所遇到的几个问题。上面已经说过，原则可以认定，而问题却是要费斟酌的，是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我先讲出我们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一）步骤问题；

（二）指导问题；

（三）目标问题；

（四）成分问题。

现在先讲所谓民众组织的步骤问题。这是指什么呢？因为有人主张先从编制到组织，也有人主张直接就做组织。一个办法是先经过编制做个过渡，一个就不要；究竟是那一个好？这是一个步骤问题。我可举个例来说。譬如广西很重训练民团，就是把民众编制起来，在训练中有编制，在训练后也有编制。所以民团虽说也是一种团体，不过是一个编制的，多数分子是被动的而不是自己主动的一种组织。大家都在一个编制之下，虽有团体性，但不能算是进步的团体。也许将来广西民众经过民



团编制和训练之后，它可以转变成一个进步的团体组织，但现在不曾做到。还有十多年前山西的村政，是很有名的。在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后，中央内政部指导各省自治，就很多摹仿它的地方。这也是编制之一例。它的开始，并不叫村政，而是叫六政。何谓六政呢？就是有三件积极要做的事；三件消极应做的事，合起来六件，称为六政。譬如造林，是一件积极的事，禁烟放足，就是消极应做的事。阎锡山觉得应做这些事，可由省政府发命令到县政府，而县政府再出一布告，结果成为具文而不能实现。阎锡山那时做总司令，他想：在军队中下一命令，什么事都可以做到，何以省政府下命令，又常常无效呢？如是他就仿照军队的办法来编制，于省下设县，县有县长，县下设区，区有区长，区下又有村，村下有闾，闾下有邻，最后的单位就是家。每村每闾每邻，通有村长、闾长、邻长；把全省通按照这样来编制。譬如放足，由省长责成各县长，县长再责成区长，区长又责成村长，村长责成闾长，闾长责成邻长，邻长责成家长。这样有责成，有稽查，事情好办得多。后来把六政的名改为村政。村政最初是一种编制，很想从编制过渡到组织（后来想做到乡村自治）；虽然后来组织没有成功，乃至编制亦失败了，可是原来希望是如此。又如现在各省（广东亦然）之所谓地方自治，通不曾做好，只是一种空头的、假的、无内容的名词，最多也只做了一点编制的工夫。譬如把县以下分成层级，把社会分成区域，县下设些乡镇等名目，这不过是些编制而已。如果真是自治，必定要一个地方社会成功一个团体；不然，一村还有团体，有何自治可言？所谓自治，乃是团体自治；一乡成了团体，一乡自治才成功；一县成了团体，一县自治才算成功。所以自治即是团体，即是组织，而现在各省所做到的，通只做到

编制。编制和组织的不同，就是编制为多数人被动，而组织为多数人自动；编制表示统属关系，而组织表示有自体。现在很多人主张由编制到组织，究竟这个办法好，或是立刻就组织好，很不易讲，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大概其中是利弊互见，即是说，由编制到组织，或者是一个好的方法，也许不是个好的方法。

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是兼采二法的。因为我们有两个实验区，一个就是邹平，这里是直接来做组织而不经编制。第二实验区是菏泽，所走的路径，就是从编制再到组织。所以在步骤上，究以何者为好，实不一定，大概是应因地制宜的。

中国此刻受国际的压迫很严重，因之训练民众是件很重要的事，而训练必需编制，无编制实难训练，所以中国今日很容易走上编制这一条路。不过我们应知道，编制民众和训练民众，只可以养成民众有纪律的习惯。这个习惯正是中国人所缺乏的，而它在团体生活中，又最需要，现在编制能养成民众有这种习惯，当然是一好处。但是我们又要知道，团体生活需具备两个大条件，一个是纪律习惯，还有一个，就是组织能力。二者缺一都是不可的。编制能养成纪律习惯，但是不能养成组织能力。而在一个多数人做主动的进步的团体生活中，要紧的还是每个分子有组织能力。什么叫做组织能力呢？就是大家商量办事情。有两个人做事，就要彼此商量。如果一人作主，大家受支配，这就不是商量。我能做领袖，我能支配大家，虽说这也是一种能力，但不是组织能力。如果单只能听话，肯受人支配，这亦非组织能力。组织能力是做团体分子中每一个分子所必需有的能力，即是不单支配人，我也不单受人支配，这个能力，乃是中国人最缺乏的，是一种最不易养成的。尤其是走编制的路，只能养成纪律习惯，却无从养成组织能力。我说这句话，是要告

诉大家知道编制只能算为过渡，但不能算为组织。

第二问题是指导问题。此刻的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即是农民和工人），实在很需要组织。但他们无此自觉，即算有此自觉，有此要求，他们也不易做成功，所以此时就发生指导问题。

指导的第一步是先启发他们的自觉，使他们要求组织，即是使他们知道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好办事，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第二步是领导他们如何组织。为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组织是需要指导，但这问题是：“谁来指导或者说靠什么力量来指导呢？”普通很容易靠政府的力量来指导民众组织，但这是不十分相宜的。按着道理讲，此刻中国应以党来指导民众，可是事实上党与政府，现在已是分不开的。所以指导民众组织，究竟谁来指导，实在是一个问题而值得来研究。譬如从我们的社会教育机关（好象民众教育馆或民众学校）去领导，也是一个方法，通可拿来实验，比较一下，究竟哪个好些。大体上说，从上面政府的力量，用强制性的力量，推行要快些，不过不很实在而易成为假的。这个意思，即是所用政府强制的力量，容易成为编制而非组织。所以从政府方面去领导，是很不容易成功的。如果用教育的力量，走启发的路，自然要好些。因为民众的被动性比较少，组织也比较能实在。不过教育的力量要慢得多。就是讲到教育，也有两种：一种是官办教育，是直接由政府办的，另一种是社会团体或私人来办的。这也可叫做社会运动。从社会方面自己发动，成一种风气，渐渐开展，成功一种潮流，而不是政府命令的措施，这个力量是好的。譬如党（不拘那一党）本来是从民众运动产生的，如果它自己还没有取得政权，仍在社会一方面的的时候，就可以常站在社会运动立场向

前去做，这总是好的；比较实在的，也比较能启发民众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常说我们办社会教育的人，不要落到一个官办的事情，成一种照例的官样文章。社会教育变成官样文章，那就没有前途了。若能常象一种社会运动，就能够易有进步。然则如何才可以做到这样呢？那就是要办社会教育的人，通从志愿而来，而结合同志去干。大家均从志愿而来，大家就可以成一个组织，然后指导民众组织，自易收实在而良好的效果。关于指导问题，就只说到这里，希望大家随处去留心这问题自动去研究。就是外国，在指导方面，也仍成为问题；用的力量不同，效果也就不同。

以下再说第三和第四问题，即是目标和成分问题。这二者是相关联的。所谓目标问题，即是问：我们组织起来干什么？从什么意思来组织？再换一句话来说：我们选择什么题目好？至于成分问题，就是说：组织哪一种人好？团体内的构成员是哪种人？譬如就年龄来讲，是组织老年人好？抑或青年人好？或者不分年龄来组织好？又如就性别来讲，是组织男子好？抑或女子好？或者不分性别来组织的好？换句话说，是采取宽泛办法好？还是狭窄办法好？这个问题，大概也是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现在让我们来分别说一说。

大概在组织成分上，太宽泛是不很好。所谓太宽泛，就是没分别。譬如年龄性别职业通不分，把老头子和小孩共组织起来，男子和女子同组织起来，商人和农民也不分别的组织起来。这样，内容包括太多，愈觉复杂，也就愈不易组织。大凡组织团体，一面固然是合；但有所合，就有所分，并且也要有所分，而后才易合。刚才所举出年龄和性别的问题，要把几岁大的小孩子组织起来，也可以做到。假如把他们和七八十岁的老头子

与七八岁小孩合起来组织，那就颇不好。所以在年龄上来说，似乎非分不可。男女似亦如此。照这样说，岂不是以分为好吗？实又不然。因为我们原想组织中国社会，如果只组织一部分人或者一种人，自然是不妥当。譬如说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最好组织，领导他们也很容易，并且组织他们，也有很多用处。然而只组织这一部分青年，仍然不对。好象在那办平民教育很有名的定县，办了不少平民学校，入学的人，通是年青人，年纪大的，一概不要。读几个月书就毕业，毕业之后，组织一个同学会。这个平教同学会在定县也是一种组织，正好象日本那种青年团一样。在定县很多事，常靠他来推动；但是就因此惹起社会上很多的反感，以致到现在不得不成停顿状态，而不好再向前去。何以如此？正因为社会是大家的社会，而不是一种人的社会；要社会向前进，需要大家都愿意，都了解，然后才易办。如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学了很多的卫生习惯，但是回到家里，父母兄弟，大家都是不懂卫生的，试问这小孩所学的卫生习惯，那里会不失败？如果定要实行，就非和家人起冲突不可。所以想领导社会，推动社会，不是件容易的事。对全部的人用力，既觉甚难，若抽一部分人，又一不通。即是说，范围太广既不行，范围太窄，也不妥当。再换句话说，对于组织的成分，不分别大概是不能，太分别也是不对。

至于目标也是一样，太广泛既是不行，太狭窄也不妥当。本来选一个特定的目标来组织，常易生效；因为一个特定的目标，比较清楚亲切，所以容易组织，也易发生力量。这件事容易做成功，以后也更好做其他的事。所以特定题目，似乎比较好点。可是特定题目，常缺乏持久性。凡是一个特定的目标，它的意义必很简单，不能完全包括。这就难合我们的意思，因为我们

要把中国散漫的民众，成一组织，那么，一个狭窄目标，自不够用。譬如乡村组织，单从经济上做目标，大家合起来购买，这很易做成功。但是范围太狭，包括太少，欠缺持久性。又如自卫，也是一样。所以这个目标，都不算是好的题目。如果用“地方自治”，这个名目就很大，包括得很多，但是也不是个很好的题目。所以选择题目，安在也是个问题。

关于题目，除了选择广狭之外，还有取积极或消极的意思，也成为问题。有时消极性太多的，如不要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也不很好。前几年国内有一“废止内战大同盟”，我当时就相信它不能成功，就正因为那是一个消极的目标。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积极的目标，然后才有事做，才可以有表现。好象禁烟禁酒，如果在里面加点储蓄的意思，就变成积极性的，或许会要好点。又好象自卫，防土匪，这个题目可算很好，但是也不妥当，因为只包含一个临时对外的性质，成一种武装团体，含有军事意味，所以也不妥当。

然则要用怎样的题目才可算是妥当呢？我以为妥当的题目，应该是一个含有发挥人生向上（个人向上和社会向上）的意义的才好。但是讲到向上，又有广狭之分。譬如组织青年读书团，这是含有向上的意义的，但是它亦有缺点；若改为读书而兼服务，就要好些。如果单是服务，则向上的意思又不够；如果用青年修养或锻炼比较好些，但又只是个人向上，而不能包含整个社会向上。最好不要单看个人，同时应注意社会的改进。如果想求社会的改进，单单组织一部分人也就不够，二者是相联的。大概的结果是这样：目标宽泛，〔成份必宽泛〕；目标狭窄，成份也要狭窄。二者各有好处，所以这也成为一个问题。

我们在邹平，是采用比较宽泛的目标和组织宽泛的成分。我

们组织一乡一村，使一乡成一个团体，一村成一个团体。以一乡一村成一地方团体则一乡一村的人不能再分，大家通包括在内。这地方区域是不大，但里边的人是不再分。因为我们想求一乡一村进步，所以需要把一乡一村的男女老幼全部合起来。不过我们也可以提纲挈领来做，就是多注意成年的农民。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宽泛的，我们把一乡人合起来，大家齐心向上，共同学好，求进步，一切都可包括在内。譬如禁烟、禁赌、储蓄、防匪，通可在这目标底下去做。这个目标〔的〕一个好处，是可多包含；另一好处，是没有不妥当的地方。不过这一种发挥人生向上比较宽泛而不分别的目标，虽说区域不大，事实上也不容易做到。如果成分较窄，目标窄些，或许容易见效。或者我们需要在宽的里头，用窄的来帮助，即是用一部分的组织来帮助，或许要好办点。总之，这是个问题，也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

本来团体组织这件事，是用不着去找目标的。为什么呢？因为天地间的一切事情，通是由有问题而发生。譬如因饥而要找饭吃；饿是问题，吃就是事情。团体组织，也是一种事情，因为〔有〕这种需要，然后自然发生。所以凡有什么需要，就去做什么事情，那里用得着去选择什么目标呢？可是此刻在中国只有比较有眼光的人才能够看到需要组织，而民众自己，却不曾看到，如是就发生指导问题。跟着指导工作而来就发生选择目标的问题。选择目标问题是社会教育里有的。问题虽说费斟酌，总应看当时当地的需要而定，最好是让它能合乎自然。即是说目标和成分的决定，虽是人为的，但总以近乎天然为好。

今天这个题目，本来还有很多话应讲，可是时间不够，只和大家讲得很浅。如果大家想找这方面的材料，就请去看邹平

---

所出版的刊物，现在托广州的儿童书局代售，大家可以在那里买到。

《乡村建设》半月刊，5卷20期，

1936年6月16日。



## 乡村工作人员修养法<sup>〔1〕</sup>

### 一、什么是修养？

我们先要问，什么是修养？修养是一种工夫。什么工夫呢？是认识自己，使自己力量增强的工夫。或许可说，修养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认识。我们自己是活的人，是生命，要认识自己生命，认识人类的生命，而使生命之力量增强。我想这便是叫修养。

大家要注意，这种工夫是对生命而下的工夫，如我们办教育也对生命下工夫，（小学生是活泼的生命），但教育虽然是对生命的工夫，不过是对旁人用的工夫，而修养是对自己下的工夫。

### 二、乡村工作人员为什么要修养？

那末乡村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讲求修养？我们要知道此刻是中国民族衰败的时期，现在乡村的居民是生命力量最弱的时候！最消沉！最苦闷！最机械！死板！沉滞！那末乡村工作或民众教育是什么？是要乡村居民活起来的工夫，好的民众教育是要

---

〔1〕 1936年1月17日在广东全省社会教育讲习会上讲演。陈一记录。

使民众活起来的工作。但离不开工作者自己生命活泼增强。倘我们自己生命不会增强，那乡村工作一定办不好的。我常讲社会教育最重要的是“组织民众”。大家要知道，尤其中国人是自己活着，顺着散漫的生活过去，也许容易，而你要他组织，就是使他生命增强。组织民众是很难；组织是使多数人生命活泼，大家都能得和谐而进行大家的事情，此非常不容易。但如果我们不能对民众在他的生命给他活起来的教育，他便做不到和谐进行。若要他活起来必需我们先活起来。今日每一个人都有很沉重的习惯在我们身上！你有你的习惯，他有他的习惯，许多习惯很难和谐，每个人很不容易使他自己有办法，更不容易使人人有办法。使大家在一起得一和谐而有所进行，这是很难的事情。但如果我们知道民众组织重要，就知道每一民众要由散漫的习惯到组织，是能创造大的和谐，那是很不容易，除非工作者具有最大的精神决不能做到此。

大家也许知道丹麦国的民众教育是最有名的，但普通不留心的不易见丹麦民众教育的真精神。我们知道丹麦农业之成功都得力民众教育而易误解他们的教育是农业技术的教育；其实错的，他并不是如此。我们还知道丹麦合作运动的成功，很多成绩都是从丹麦民众教育而来。那末他们的教育一定是讲授合作的；其实又不然，他们起初对于农业及合作均无训练。如我们现在中国很多人讲生产教育，或职业教育，在丹麦不是如此的；不是生产或职业的教育，也不是读书识字的教育；丹麦的教育实在是一种要丹麦的民族由衰而到复兴！从生命消沉到活起来。他们是如此的教育！农业与合作是后来才讲求的。我发表过一文叫《丹麦教育与我们的教育》（见本卷），其中我指出中国办教育开首便是注意实用的职业的，但是今日中国的教育

最不实用！中国起初办教育便是重视一切如工业、制造等实用生产的东西，可是中国教育结果最不实用！所培养出的学生无用，只会消费不会生产！其缘故在没有增加他们的创造力，不注意根本的生命。人要活的，什么都好办，倘如死的什么都无办法，故最重要的是生命本身！丹麦教育开始未注意实用，而却注意生命，结果他们成功了丹麦教育，要丹麦民众教育者用他自己的人格修养，如丹麦的老教育家格龙维氏（民众高等学校创设人——记者），便有很好的修养，他的弟子办民众教育都有好的人格修养来感动民众，所以在丹麦教育中是“人感人”的教育。不过丹麦教育者自己修养工夫大概是得力于宗教，宗教的气味重。他们差不多是宗教化的教育；也可以说教育的宗教化。宗教在当时（离今八十多年前）的需要，今已变化，宗教气味，减少很多。八十年前的丹麦教育当时很好的是民众教育，的确能使丹麦民众活起来，多半靠宗教。但中国今日不易走宗教的路，无论在个人及教育民众，都是不容易。如果有人对某一宗教，有真的信仰，那便很能得到一点修养，对自己很能培养自己生命，由他去办民众教育也能成功的。不过在他可成功，在我不能成功，因为我从宗教中得不到帮助，因而不能以此助人。我不能讲宗教在中国无用；也许可说有用。但大体上说，中国在民众教育者去为民众设想，走宗教的路大概不易。我此刻无时间多分析，但可说这二句话：（1）因为中国后〔本〕来缺乏宗教的，（2）因为此刻是人类历史到宗教消沉的时代，宗教的难关。所以由此点上可看出走宗教路是大概不容易。刚才举丹麦的例，是要使大家知道办民众教育最重要的是民众精神上有领导，但必需你先要有修养，修养走宗教的路或其他的路则无不可。

### 三、中国乡村民众精神的消沉

下面再讲中国一般乡村民众精神消沉的情形，更可知道要组织民众非从精神上下工夫不可。在乡村中看见农民精神消沉是怎样的情形？据我知道最普遍的是没有进取的心理。此刻农民心里只是混一天是一天的，不知前途如何。此最无力量，最无向上奋发进取之意思。在乡村居民年岁较大的（五六十岁）他们心中最苦闷。他们看见〔过〕一些从前的乡村社会，是良好风气，生活也容易，没有象今日之经济困难。他们见过昔日之太平世界，看了今日太不好的世界，他们受到刺激，他们只是苦闷。此时我们到乡村与老人谈昔日之中国好，他们真难过！我们现在想使他们前进；他们是不肯的！他们看不见前途，无勇气，不能自信！那末年纪轻的人他无看见以前的事情，好像不闷。但他们有一大毛病是太玩〔顽〕皮。他们有时不能感动。他们也无信仰。他们对是非，好坏，应做不应做的标准，心中很模糊。此也不行，无办法，不能做事。要如何可做事？要有何者要则要，不要则不要。他们表不出此意思，故进取也是不够的。此缘故是数十年来使然的。

还有一件情形与此点相连的，就是从前乡村有“公是公非”，或说有正义公道；现在乡村不够了，现在乡村的人很势利，与都市商人一样，此为精神上的大衰败。今日乡村人士，受经济的压迫，完全贪小利、看近利；远大的意思他们没有，此便不行了。贪小利，看近利，是没有出路的。愈贪小利便愈无利，愈怕穷则愈穷，非有勇气、远愿、创造不可。倘你不怕穷，一定不穷。但此刻完全给乡下人困着，这样看小利、近利，无公

道心理，他不配死吗？他是无生命了！这样民族何能复兴？农民如何能组织？你必先要每一个人活起来才能组织。这样办乡村合作社如何能办好？地方自治那里有办法？一定要在农民精神上有办法才可。但你要农民精神有办法，必需你工作者先有办法，你有十分精神，他或许才有五分；你有二分，他连一分也没有。中国此刻在严重局面中，必需有大的创造才能过此难关。可是大的创造需要大的精神，需要生命力格外强。

还有一种情形，广东不知有否。在北方乡村可有一种情形证明农民精神苦闷，就是北方乡村很多迷信的组织，如山东、河南、河北，都有迷信的结合，名目很多。有的叫“无极道”；或“圣贤道”，总之很多很多，有时或许在半夜中集会，拜佛，念经等。此种情形之可看出农民精神上的太苦闷。他们已走了许多别的不通之路，他们精神得不到安慰而由此得一安慰。此种组织可号召许多农民，信仰他；可倾家荡产而仍不悔。这实是精神上无出路，故更可见非从农民精神上领导农民不可！此缘故为什么呢？大概有这样的原因：

(1) 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有很老的文化，很老的社会，如孔子、孟子的书，从很早一直传到现在。但于别的民族决无此老文化，而有他现代文化。在中国老是孔子那一本书，传统太久了，如果说得好，是深刻的信仰，说不好些简直太顽固了。如读书、耕作均有一套老法传了很久，但在这几十年中（说近些从光绪年间起），变化太大了；五年一变，三年又一变，变得农民眼花了。如原来是皇帝，一刻儿变总统，又一刻儿叫主席了。他跟着走，又跟不上去，但又不能不走。信人既不能，而又不自信。这数十年变化太厉害了。原来一不变化的文化，迄今剧变了。

(2) 中国灾祸多——还有中国近数十年来，天灾人祸太多了，任何人无办法。如一家人有一不幸之事，倘有病，失火等不幸事件中有一件，那便精神一定不好，又来一件则更不好，再来、更来、真是要快死了！精神振不起了！此刻中国农民亦即如此，无乐生之心，灾祸太多了。所以在农民精神上有这么的苦闷，你办民众教育工作而对此不能领导，那末一定无办法！但你自己还是苦闷，那你何能领导农民？

#### 四、乡村工作人员修养法

我们最后来谈乡村工作人员的修养法吧。我想乡村工作人员的修养是要：

(1) 要思想上有出路——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对中国眼前的社会问题，民族的前途，人类的前途，都要有眼光去认识了解，才算思想上有路子！思想有路子之时，即是有自信的时候！一切有办法，他知道社会的出路民族的出路何在。他对前途乐观有自信，才能领导农民。

(2) 要发愿——要发深心大愿，即要有大志愿，由大志愿而有大的勇气。发愿为社会民族求出路。如果，你不能发愿，转来转去是自己一个人的问题，无大志愿，那结果不行！结果不能做民众教育。但我们并不是说人不必注意自己生计问题。然我们要知道，很重要的，如果你能为社会服务，社会决不能饿死你。有许多无用青年先求自己出路，结果愈无出路。要占便宜，天下何有许多便宜？苦叫谁吃？最老实的话是为大家服务才有出路，更好的，要忘他自己问题，只有社会民族问题。

(3) 要反省——常常要反省，发愿是动，反省是静，要动

静交养。反省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天所做之事，常要反省一下，我们一天已动念的事而未做，也要反省。批评自己，然后再发愿；有动作，再有反省，再发现，又反省……总之，要“动静交养”！

(4) 有规律生活——还有其他普通易知的，如要有规律的生活，要有日课表，日课表中生活要调匀不偏，工作太多也不好，休息不足也不好，读书多也不好。总之身心各方面要调匀！

## 五、结 语

最末，有一句话很重要。是什么？是要“有以自乐”。工作愈重，做事愈多，如果在工作中不能自乐，那真苦死了！要想培养生命更大的力量，要愈工作愈乐！愈做愈有力！别人看他太苦，但在他很好，很乐，非做到“有以自乐”不可！

《社友通讯》，4卷8期，

1936年2月15日。

《乡村建设》，5卷13期，

1936年3月1日。

## 公 私 辨

——答吴景洲君

吴景洲君在湖北区政训练所有关于公私问题的一篇讲话，转录（有删节）如次：

……在普通一般人的见解，总以为“公”“私”的界限，非常明显，顾了“公”便不能顾“私”，要顾“私”便不能顾“公”，好象“公”与“私”，始终是处于相冲突的地位。（中略）但是我们要过细想想，……“公”与“私”是否相冲突呢？据本人看来，“公”与“私”不但是不相冲突；而且是相互而成的，离开了“公”不能成其为“私”，离开了“私”也不能成其为“公”。……历来所谓“以私害公”、“先公后私”等成语，实在是不合逻辑的。

讲“私”讲到极点，也就是“公”的极点，并且依哲学或物理学的原则，天下的事无一不是圆的。……所以我们从哲学上来讲，便可以充分的证明“公私一体”，或可说“公私一元”……

……现在再拿事实来讲。……你为什么不去爱他人之国，而独爱自己的中华民国？（中略）这样的情形，难道不算“私”吗？难道可以算“公”吗？所以如把“公”“私”分开来说，天下的人都是“私”。说到这里，我的话便可以说回来，“私”的范围扩大起来，就可以说是“公”。比如



我们说为“私”，只为一入，对于一家就是“私”；（中略）扩而大之到一国，对于世界是“私”，而对于本国可算是“公”。所以“公”“私”的界限，是一个比较的说法。……

（中略）

我们做人，总想一生一世立于不败之地，这种观念是不是“私”呢？……但是要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可以回答说，就是要“公”。换句话说，“私”的范围要愈大愈好，……要求个人幸福，必先求家庭的幸福，……。（中略）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清楚“公”“私”是一体的，凡是长于自私的人，一定是要由“公”以达到他的“私”，“公”的范围愈大，“私”的利益愈固。……。

（下略）

后来吴君见到我在乡村工作讨论会无锡年会上的讲演，亦论到公和私的问题，就写信给高践四先生转致我，有所商讨。

在吴君的信来到前，恰好有本院研究部胡永桢、常泰和两同学向我谈到中国人的伦理由近及远是自私心步步扩大。我正指明他们说的不甚对，因亦就便答复吴君。

于此，先提出我的意见，照我说，公私两字是对待的，相映照的，犹“正负”、“是非”、“阴阳”、“缓急”等词。离开正、没有负；从这阴，显那阳；对着公，才说私；这是一定的。故训私为公，或训公为私皆不可。他们本是相反映的两个字，而吴君一定要将私讲成就是公，公原亦是私，嫌我们分别公私者为未能脱俗（见吴信）。其实不是我们要分他，因混而为一则两个字便都消灭不成立，什么话不必说了。人情由近以及远，是关切的扩大，不是自私的扩大。自私之义为不公，苟非不公不

得谓之自私。胡、常二生不从反乎私那个地方来说私，乃滥用自私二字，极有语病。

胡、常二生问：一个人一天忙到晚，忙他自己的生生活，忙他家的生活，不是自私吗？我答，这不是自私，这是自然。饥则求食，渴则求饮，痛痒则搔爬，此自然之要求。苟非他有不顾公的情形，谁能说他自私？还要晓得，自然之要求即是公。公即不分彼此，一体相关。如我头上作痒而我手不去搔爬，以为“那是头的事，不要管他，”则真是自私了！又如母亲看见孩子冷，赶紧给他穿衣服，亦是自然之理，亦是公。反之，母亲不管孩子，如秦越之相视，则真是自私了！私就是妄分彼此，隔阂不通。而通就是公，公就是通。古人说“仁”，就是一体相通的意思。气脉相通，痛痒相关，就是仁。反之，为麻木不仁。公即是仁，私即是不仁。而公私之判，要紧就在通与不通之间，却不以范围大小来定，这一件事情，虽不出乎一身一家，亦可以说公。另一件事情，虽关乎国家之大，亦可以是私；——如因爱国而竟不顾公理者。

吴君的错误，就在以一身一家之事为私，而必地方事、国事才算公，拿范围大小分公私。公私与大小诚然不是没有关系。往大里去总是公，愈小愈是私。然大小亦犹公私一样，必相待相映而成义。不对着那个大，何从说这个小？小不自小，因有大者而后小；大不自大，因有小者而后大。将大小分拆开，各自独立，而固定了说他，世俗间亦有此，然自是一种误用。吴君正是从这里将公私各自成一固定名词，而不觉其随俗误用。

中国人的伦理，由近以及远，自是人情常理。这就是情意关切，气脉相通，通了一层再一层，通了一节再一节。这无所

谓公私之别存于其间。所谓一层一层，亦非划然可分，有一定先后顺序的。若说一定先身而后家，先家而后乡，而后县，而后省，而后国，而后世界，恐怕是个笑话，没有这个事情。关切是一种感情。人在感情中，便忘了自己。从乎感应之自然，那里分析计算这些呢？仁者廓然大公，浑然与物同体，没有许多分别之见。其情无所不到，而轻重缓急自亦不乱。盖从乎生命感应之自然，任天而动，原有分寸，不待后天的分别计较。一切的错误，都从分别来。

吴君之说，以私为公，于通常所谓自私的一切事实仍加排斥，而另以通常所谓大公的事实，易名为私，是名词变换，而其实未私，究竟何取？意者将公收归于私，即所以引私到公乎？吴君似即以引私到公为便，故自谓其说为顺势的说法。此引私到公，自谓顺势的说法，世多有之。十八九世纪的西洋思想，类皆如此；所以说开明的利己心是道德的根源。近些年的中国人，如梁任公、胡适之诸君，喜欢说“小我”，“大我”的话（胡有不朽一文，自述其人生观如此；梁则时常说到，不只一篇文），亦都是这一类意思。“我”这一个字，不过等于“这里”，“此处”之义。为说话方便，不能不分个你我彼此，但并非实物。宇宙一我，并无可区分的一个我。硬区分出一个我，与旁人为对，与物为对，实是毫无根据，全不逻辑的妄见！再从而推广建立一个“大我”，更是妄上加妄。不是领导人明白，而是领导人糊涂！当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不够，精神不振时，才有这许多杂乱而无根的意思出来。——“他呀，我呀，”是许多意思，不是事实。如果他精神振，生命强（心纯气正），有什么问题来，马上应付，时刻在行动中，活泼有力，则他早与天地宇宙浑而为一，什么他我，公私，分别之见都没有。私念固然没有，亦没

有念想到公不公。我们就是应当培厚人的感情，使生命通畅有力，而不应当增加人们的意见分别。愈分别愈让人没有力量；愈分别愈不自然。什么小我大我，利己主义，利他主义？要象这样来讲人生哲学，愈讲愈远，愈讲愈糊涂！只有将人们讲糊涂了完事。

人生就是要自然、活泼、通达、有力！生命自然、活泼、通达、有力，则一切德行都在里头，不用枝枝节节地来讲。与其将公收归于私而引私到公，不如将一切私意（一切分别之见皆私意也）廓然化除，一任真情实感，则凡所作为，无不是公者。质之吴君，以为何如？

至吴君以为“言公必欲其去私”，势如逆水之行舟，此吴君自己之误会。盖吴君指定一身一家之事为私，则去私便是要人不顾身家，此诚悖乎人情之大者。然私固不若吴君之解也。私只是妄分彼此，不顾大局，去私亦不过去此而已，何曾要人不顾身家？充实感情则私自去，如孟子所谓“火之燃，泉之达”夫何有不顺者？

又吴君因我讲辞中，有“西洋人好在有一个圈，他那个圈不大不小，正好培养公德，锻炼团体生活。所谓“公德”须靠即公即私，为公即是私，公私打成一片才能培养得出，否则无法培养。若公与私是两回事，要人牺牲了自己而为公，那不是常法”，一段话，并说“西洋人之为公，只是大范围的自私”谓与吴君说正相近。其实此一段话与吴君相近处，只在随俗以切近者为私，较远者为公那一点。若吴君之公私一元说，则固与西洋之公私不可分的事实不可同语。从西洋社会所有的事实，可以养成公德，从吴君一篇空论，则殊未必能尔。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在中国社会里面如何造成公私合一（离团体即不能

生活)的形势,若公私一元的说法则未见其必要。

《乡村建设》半月刊,5卷13期

1936年3月1日。

## 我在日本参观后的感想<sup>〔1〕</sup>

这次我们到日本参观的动机有二：一、我在国内干乡建工作已有六七年，近来听说日本有它的农村问题，所以有农村经济更生的计划，这与我们的工作很相似，颇可作我们的参考，所以来此到各处去参观访问，这是动机一。二、更有重要的动机，是想了解整个的日本——日本社会内部的问题。这几年来，中日关系更恶化、更纠纷、更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我想在中日纠纷里，日本为何处处站在主动的、积极的地位，而我们中国则处处站在被动的、应付的地位。这是完全由于两个社会内部的不同所致。日本的社会内部是让它可以主动，中国的社会内部是只能让它落于被动，故为观察中日的前途，并为深切了解这个问题起见，特来此参观。此次为时虽短，但比单在书报上看，也许亲切一点，多知道一点。这是动机二。

要谈的话很多，现在却先来说说我这次参观后的感想，从这里也许可以说到国内的消息，说到大家所要提的问题。我在

---

〔1〕 笔者按语：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漱溟氏等五人，于今年4月来日本参观各地农村经济更生工作，5月13日至15日来福冈县，此间九州帝大我同学于14日晚在帝大学生集会所招待梁氏等，席间梁氏讲演“我在日本参观后的感想”，辞意警惕，颇可供今日参加乡村工作挽救民族者之参考，故记录之。惟以时间匆促，此稿未经梁氏过目，文责概由记者负之。寅初笔记。

参观中随时随地所引起的感想很多，归结起来只是一个，就是“证实了我心里面的一个意思”。我心中常有的意思是中国问题——中国社会机构问题。日本与中国几十年来，同受西洋影响，可是往两个不同的路上跑，证实了日本之有进步，是为了它有它的社会机构；中国没有进步也是为了它有它的社会机构。那么什么叫做中、日的社会机构的问题呢？

先说中国的社会机构问题。这意思就是中国弄到这个田地，不是“人”的问题，即不是需要不需要领袖问题，也不是多数分子不健全的问题。近年很有人说，中国所以成了严重悲惨的局面，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愚贫私弱，类乎此种说法的很多。我觉得中国问题不在此。我不能说中国人都比日本人强和富，但这不是第一问题，中国的第一问题乃是社会机构问题。

再说中国之坏，不是外祸所致。资本帝国主义者来东亚之初，中日是同受影响的，但走上不同的命运，从这个意思也就证明了中国问题是在内而不在外。换言之，在中国之社会机构，而不在外祸之来。

我们“人”成怎样一个“人”，实在都受社会机构影响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礼制的，仪俗的，宗教的等等，所谓社会的陶铸。我们不能逃此社会陶铸，因为我们的生活活动都是在社会机构内活动的，社会机构是规定我们的活动，社会机构的力大，我们分子的力小，我们是顺从社会机构而往前走，往前生活的。人都有他的聪明、才能、力气，要有好的社会机构，则分子可以在里边运用生活，为个人生活，为社会生活，容他顺着这社会机构往前进，那么整个社会也依之往前进。中日在西洋影响以后，日本社会机构有一所谓“维新”，得一些改良，可是只有改良，没有破坏崩溃。中国受西洋影响后，即呈破坏

崩溃，所以中国到今天，都是落于社会机构饥荒和困乏中，其间分子是无办法可以顺着前进，所以大家只是徬徨而无法用力。我觉得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用不出气力，不知往那里用力气是好，由是心里发急，但一定要用力，就变成了冲突。现在国内是大家不得正用其力气，而彼此牴牾妨害，大家的力气不能用在生长向上，几十年来都是为了社会机构的破坏和崩溃。

所谓社会机构，就是社会制度、秩序和条理等。社会机构内的人类史，到今天为止，在机构中的“政治”部分要算第一重要。意思是这社会制度、秩序和条理，最有关系来维持的，是一种统制的力量，而这力量的成分占最重要的是武力，虽然统制不全靠武力，也要靠宗教礼俗等，但与统制最有关系的是政俗〔治〕即指武力统制而言。各国的社会机构为什么都各各不同呢？原来此种构造在人类史上有很大的机械性，机械性是对理性而说的。各国在不知觉里，都落于一种构造，这种构造虽可以改良修正，但大体上是很为机械性所樊笼。任何社会机构内部，都由几个不同势力配合而成，不是靠单一的力量，今所谓社会机构要靠统制，这种统制的局面也得由几种力量合成的。在稳定统制下，让社会有秩序，政治有进步，人得有条理的活动，则社会就有进步了。中日之不同即在此。中国几千年的手工业已完全破坏无遗，到现在又是农业着着破坏，而现经济往后退、往下跑，与社会一切的生长有关系的经济一落千丈，一切都不好办，则社会也就不能前进了。日本几十年来，其经济是往上进；所以一般文化也往上进。一个往下退，一个往上进，质言之，全是政治问题。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使社会改良而不破坏，同时以天皇作政治中心，于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而社会稳定，社会一稳定，所以可以很不费力吸收西洋的长



处，而朝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路上走。因为有这样的成功，所以得从容应付国际环境，而慢慢转变它的地位，并且更利用了欧洲大战的好机会，使工商业得越长越大。中国呢？既无法拿满清皇帝作为稳定社会的东西或工具，所以满清一倒，相传的制度既不得改良，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又经破坏而无法稳定，无法稳定即辗转循环，而使社会机构更破坏崩溃了。

武力在统制上是最重要的，但我们中国统制上的武力常在两个以上，形成谁统谁，谁也统不起来。盖国家之要统一，武力只可有一个，可是我国老是有二或二个以上的武力，故要统制而不能，政治也就无办法，随之一面不能应付国际环境，且因此更加重外患，加重侵略；另一面则社会内部之治安没有办法，社会无秩序，农、工、商也都难有办法进步；经济的进步当然也是绝对的不可能，至于其它一切也都无从筹展；而以日本之走上进步幸途，中国之跑上不幸的路，其关键仍在政治问题耳。

再来说明中国辗转破坏的意思。辗转破坏是社会一经失统制、失秩序、失条理后，即成变乱、矛盾和冲突，而无能力对外，此时国内的人就有改造或建立或解决政治问题的要求。大家都有此要求时，则有维新运动、革命运动，或其它社会改造运动起来，岂知都使社会机构比原来更破坏、更崩溃。换言之，即每一度革命的结果，都落于更深的崩溃和破坏，从而再革命，则再事更破坏、更崩溃，真好比裂一缝而二缝，而四分五裂，到深刻化的崩溃，因之更没有应付外患的力量。内部呢？社会无秩序，经济更没有办法，于是大家更着急，更变动，引入更深的崩溃而显无力，此之谓辗转破坏。

中国受西洋影响以来，直到现在，社会只往崩溃里去，已

到了最后阶段，现在正是社会机构到饥荒的极点，新的基础未打，旧的完全破坏。中国过去之政府是建筑在不稳定、不健全的上边，所以我们在今朝参观中，所有的感想，不能不叹服日本社会的进步。的确，中日无论在那方面讲，都有相差三十年的程度。日本的地方行政、自治制度，已经到很细里去，中国是谈不上的。例如日本可以用十三万，或十五万元来建筑乡村小学，我今日参观的小学（记者按此乃指福冈县协山村的小学校）它的大礼堂，是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几年来想造还没有力量造的，也许我们还得过十余年才可以造成。于此可知日本社会结构的安定，一切都成了一套前进着。社会结构走到不可走，方会发生革命，到尚有一隙可乘可走的时候，人们还得要随它走。日本的社会结构到现在已有问题，若议会政治成问题，天皇政权成问题，这是他们刚成问题的时候。大概这个机构，还可用几年。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很大。日本对天皇、神佛，一般的说，比我们的信仰强，象一般的小学校，各教室都供神佛，有教育家在竭力发挥，凡此都可看出社会结构成一点问题时，用这宗教上的工夫来稳定，是有相当的效能的。我这次与长谷川如是闲，伏室高信，侨本传左卫门，小出满二等谈话，（记者按：长谷川氏系著作家，伏室氏系日本评论社编辑，侨本氏系京都帝大农学部教授，小出氏系九州帝大农学部教授），大致都说日本农村虽有问题，资本主义与农业，都市与农村，虽有矛盾的地方，但仍有办法。这一类话，并不是粉饰的话，乃是他们的社会机构，还容他们在此问题内想办法。他们过去的成功与进步，都是靠这个社会机构，所以他们想出来，还可以走一走。照我看中国现在已没有办法可做一点宗教、皇道、或神道等工作，因为宗教已不能稳定。我们的社会，并且也无从做起。

中国今日最使我忧心的就是中国人眼光太高，批评精神发挥很大。自“五四运动”以来，一切都看不上眼，看得上眼的以为那就是最会批评的，这样老批评老不接受，在崩溃无余中还是批评。在中国前途尚无办法时，除走批评亦无它途。在无办法中，大家不容易接受，我接受他，他不同意，各各不能归一，所以不到中国人在要求上相同时，则决没有办法使中国转机的，结果谁也不能克服谁。我们不能为了要统一而降低我们的要求，我们还得走批评的路，也许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要求，因为中国将来所要求的新社会机构，如果合理想，还是不行的。所以大家，尤其是有思想的人，不可废弃我们的理想要求，现在命运虽不好，还得要尽量作理想的梦，经济政治的机构都得往理想往远大里去；只有较远大的目标才能使大家接近，才能使大家有共同方向来共同用力。

从今日往前说，日本是走好运，中国是走恶运。从今天往后说，则将要相反，日本要往恶运走，中国往好运走，此理由很简单。日本社会现在到有问题，并且要到不容易有办法的程度。我们的恶运已使社会机构全部崩溃，所以现在的问题即成怎样去建设新的，旁的枝节问题都没有。这好比日本现在有房子住，中国没有房子住，故中国单叫盖些房子住，而日本则要等破坏后，才能再建新的。申言之，中国要往理性机构的路上走，比旁的国家都近。

农村的问题，中日不同。日本的农村工作是救济（经济更生），在现有的社会机构内想办法，可是那种办法都是很有限，例如精神坚定，农业改进，多角经营，全是往自给自足方面想去稳定、去弥补。这种缓和的救济，在生问题的范围内，或可以有效果，但也不过只止于此，所以日本农村成问题，以这样

来救济是永远不能抬头的。他们的工业非常畸形的发展，农村也是决难占上峰的，除非革命以后。中国农村问题不是救济问题。中国没有主人，谁配来救济呢？日本有国家政府可以假社会机构——教育、经济、自治的机构来救济。中国一样都没有，地方政府和教育界谁都配不上说救济。救济力量是没有，好在防止农村抬头的力量也没有，所以中国农村比较有前途，日本则没有。

日本农村经济更生的工作，虽与我们有相同而可参考之点，但从全盘说，从前途说，是很不相同的。所以我的感想是：使我更明白中国一天能往好处去，那就非解决中国之社会机构问题不可。解决的一条路恰好与普通的、与他国的想法都不同。我认为只有一条新鲜的特别的路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机构问题，因为只有这个问题一解决，才可解决其它的一切。

我所谓特别新鲜的办法，非此刻短时间内可讲了，姑用余暇来对大家说一说。

中国几十年来政治上之无办法刚才已经说过，是缺乏统治力。这统制的权力照理应操于阶级势力或集团势力之手，中国则尚缺少阶级和集团势力，现在要形成此种势力已来不及，也做不到。所以结果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从下面来统上面”。我们要知道，任何国家内部都有矛盾冲突〔的〕不同势力，可是对外是一致的。中国内部的冲突并不比他国剧烈。我们在实际上，分不出有几个不同的势力，表面分裂的表现只是在上而不在下。申言之，过去两广与中央都是上面分裂，底下毫没有深刻的矛盾势力。说句不通的话，中国“政治”除外，则没有不统一。象武汉与中央开战，两地的人还是亲戚朋友，不但在内战时教育会议是统一开，即司法会议也在一起开。他国则不然，

英之爱尔兰与英格兰，美过去之南北开战，都不仅是上面冲突的表现。只有中国一向是以上面不统一，虽然最近这种趋向已渐渐消无。我们可以以社会的统一，来促进政治的不统一。换言之，人家是由上而下，我则主由下而上，此所以新鲜特别，大家或有不信和疑虑，姑如此说以为参考可也。

《中国学生》，2卷，23期，

1936年6月12日。

## 东游观感记略<sup>〔1〕</sup>

我是在上月19日离开邹平，昨天——5月19日——回到邹平，很整齐的一个月。这一个月里面，在日本住了三星期，其余的时间都在来回的路上。

在日本考察乡村工作的情形，不是一两点钟所能说得完的，现在时间来不及，因此只好仿佛出远门一趟回来，将一些新鲜见闻当闲谈一样，向大家说一说。

我想先说走的道路和日本的大概情形。看日本地图上的形势，仿佛一条鱼似的，在那一头是北海道，这一角是台湾，这南北两端我们都没有去，所去的只限于交通最便利，生产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日本当中的一大段。当中这一段中间是一条山，仿佛像是鱼的脊梁骨。我们所去的地方只是在山的这边（山阳），山的那边没有去，所以又只是这一大段的半边。

最先是到长崎，下船去看了一下，又接着上船到神户。在神户登岸，休息一夜；坐火车，一直奔东京。在东京住了近十天，才又望西京大阪这边来。神户、西京、大阪这三个地方离得很近，相去，按中国里说，都不过几十里。神户与大阪，相隔大约六十里，几乎相连在一起。西京与神户也差不多如此。在这三个地方住了四天。又去福冈耽搁了三天。末了到门司上船

〔1〕1936年5月20日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大礼堂讲演。黄省敏笔记。

就回国了。所走的道路地方就是这些。当中曾经到几个县里和町村里去参观，多半是住在大都市，而白天下乡，夜晚回来睡。据说日本的北海道是和日本中部不同，是比较苦的地方。这里原有一种土人，其生活习惯各方面都是比较很特别的。象鱼身的一大段其生活习惯大体说很相同，不过据闻山那边（山阴）与山这边（山阳）的人又比较不同。山阴那边的人生活很苦，和山阳人比较起来；景况差得很远。所以这样的主要原因不在旁的，而在气候。山阴气候冷，山阳气候暖。气候所以不同，是因为海洋暖流寒流的关系。山阳这边是因为打南来的暖流，所以气候就暖；山阴那边完全是受了亚（阿）拉斯加寒流影响的改变。到山阴那边去也不远，都有火车相通。在那边有所谓最苦的东北六县。当时有许多人劝我们去看一下，那里也许和中国内地的苦况差不多。但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去看，所看的都是日本比较好一点的地方。

在日本这些较好的地方，比起中国来实在是相差得太远太远。在这些乡村里我们一点也感觉不出来那是乡村。最进步的许多都市的条件，那里都具备。如在中国大都市才能看见的豪贵汽车，日本乡村中寻常都很容易碰到。于此附带说一下日本的行政区划系统。日本是中央以下就是县。（北海称道，东京称府，与其他四十余县平列。）他们的县就等于我们的省（当然他没有我们的省大）。县政府叫做县厅。县以下原有郡的一级现在已经取消。下面只有乡和村。村有村役场，町有町役场。（役就是公务的意思；“村役场”拿中国话来说，就是“村公所”。）我们去参观村役场合作社及村中小学，只拿人家的建筑来说，我们就不能比。我们研究院当初连买地、建筑、开办费综〔总〕起来，才不过三五万块钱；人家村里的一个小学、就花了十多万

元；我们所花的统算起来，还比不上人家小学建筑的三分之一。他们礼堂的布置很宽阔讲究，在我们看来简直象是和大学校园里的大礼堂一样。我们与人家一对照，大概无论什么地方都觉得有些寒伧。

再则关于国民程度一项，我们更不能与人相比。日本每人都受过六年义务教育。差不多是人人都能看报，人人都能写字。仿佛在中国的一种很劳力的粗工，如在旅馆中伺候人的下女，在电车汽车车站中卖票的车掌（车掌大多数为女的），其报酬都很有有限。但她们都能写信，并且字都能写得很好。这在一般的中国人说，真是比不上。他们现在觉得六年义务教育还不够，想把教育程度再往上提高。现在正实行的一种青年教育——青年学校。这种教育虽不能绝对强迫入学，但统计起来，大概在我们看到的农村中的青年十分之八九是进入了青年学校。这样，就等于是第二期义务教育。

更如合作社，在日本也发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在我们看到的村中，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加入了合作社，没有在合作社外头的农民。在一个村子里，只能有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通通包含信用、购买、贩卖、利用四项业务。所有一切经济生活上的事情，几乎都归合作社来办。农人的农产品共同贩卖，农人的消费品共同购买，生产工具有些共同利用，资金活动合成一体。

农人的生活，都安适、愉快；自然下力还是得下力。我们看见他们的工作也很辛苦勤劳，手也很糙。但大体说来，他们的生活都非我们农民所能及的。

在农业技术上，他们也有很大进步，也很快能够时时进步；凡是一种新研究的成功，农民马上就可采用。这个在我想大概



就不能不归功于农会的组织与农业教育、实业补习教育。

尤其好的，所有的日本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差不多都加入了组织。一村、一町都有一村一町的自治组织。此外还有许多各别的组织，例如青年有青年团，女子有女子青年团或名处女会，成人有户主会，退役军人有在乡军人会等。（因为他是征兵的国家，人人都曾服过兵役，这也就等于受了一次教育。所以每人的能力都比中国人高。）在一家之中的主妇又有全村的主妇会。总之，一村的人都各别有其组织；也有其共同的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交互为用，自然人民的生活就改良进步。

在这里可以说一点关于日本现在流行的全村学校的话。在大阪附近各村，他们都称全村教育；而在福冈则称全村学校，内容则相同。因为一个村里的组织太多，指导的机关亦不相同，如县厅里面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农事，社会教育人员指导各种教育，合作指导机关又指导合作社的活动，这样自然开会很多。但指导合作社机关与指导社会教育的机关不同，此一组织开会与彼一组织开会也许需要同一个人去参加，时间容易冲突。为调整这种矛盾冲突，所以终发生一种全村学校或全村教育的办法。这一种办法要在统一指导乡村中各种组织的活动，鼓舞奖励其活动，使他有教育的意义，表面上就仿佛是邹平的村学了。这是关于全村学校之由来的一种说法。再一个说法，就是为的进行农村经济更生计划而有的一种社会教育工作，如训练农事技术及使各人对自己职业的看重，当然也离不开精神训练，觉得农村经济更生与社会教育有合起来做的必要。这两种说法都很对。领导我们参观的人不是指导农业经济方面的人，就是指导社会教育方面的人。在此处很象中国近些年来乡村建设与民众教育

合流的样子。在我们感觉得日本社会到处都有组织，仿佛是将社会成功了一个严密的网，几乎盛水不漏。

以上是说他们的农村，下面再说一说他们的都市。他们的都市真是繁荣进步。天上、地上、地下、——上中下三层都有电车、火车来回跑。我们坐着汽车正走着，好象打雷一样轰隆轰隆从头上有电车飞过去，同时亦可望见地底下也有几十里路的隧道跑电车。我们在那里真是觉得异常纷杂忙乱。在大阪的时候，恰是市政府规定那一周叫做交通安全周，满街道上到处都贴着交通安全的标语，写了许多警告开车人的话。在这七天的安全周里，头两天就碰伤了六十几个。试想安全周还是这样，不安全更不知要怎样了。地底下走车在车中听来声音非常之大。尤其地底下两边的车对开相错过的时候，声音更大，差不多的乡下佬一到那里就准得迷糊。他的交通便利进步到不能说，在东京的车站上排列着多少站台，停着许多的车，这许多的车你开来，它开往，许多车都在要开！在这里假使没有人领导着，你真会不知道如何是好。

因为交通便利，人家就无妨散开来住，在一个大都市内无论多么远近电车的价钱都是一样的。人家散开来住，所以让大都市就越来越大。据他们说东京市一到夜间是中空的，因为办公的人，上学的人，买卖营业的人，多是住在四郊，早晨来，晚上回去的原故。神户，大阪，西京三个都市差不多都连到一起，六十里路人家不绝，仿佛象一个都市。坐车从神户到大阪我们还以为在同一个都市里。这完全因为交通便利，所以才能够成功那个样子。在东京西京坐的汽车，恐怕任何地方也没有这样便宜，如三五人坐的轿式汽车，在上海雇一天得花二十元，送一次也得一元，用时要打电话到车行叫来，而在东京、西京这

种汽车满街都是，用不到你打电话去招呼，就好象在济南所看见的洋车一样的多。济南洋车你还得和他讲价钱，在东京、西京的汽车，你一招手他就来，来了你就坐上去，无论走多远都是五毛钱，一点也不用多费话，这真是很经济的事情。从交通发达，人口稠密这两点上就可以证明日本国家的富。据说东京人口约近五百万。象上海三百多万，我们觉得已经太多，他比上海又多二百万。

日本所有的这些情形，如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组织的严密等，其实理由都是很简单的，就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六十年来大局完全安定，社会得以一天天往前进步。——只要安定，就可往好里去。进步，进步，几十年来还能不这样么？他们的村长，很多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你一问他们大都是干了二三十年村长了。年年干——一天干一点，这就不得了。社会秩序稳定，大家有轨道可循，仿佛小草小木无阻无碍地往上长，自然可以结成果实，长成大树。中国社会组织构造老是在变，老是在破坏，局面老是不安定，所以就不能有所进步。仿佛一个是向上走，一个是向下走。自然就现在日本所已长成的国家来看，很不合乎理想，你批评他也可以，但无论如何他是“长”了。我们“没有长”。因此我们的乡村问题就与日本的乡村问题不是一回事。人家的农村虽然有问题，但在其大机构中能谋救济，我们则不能有。但日本农村也正是因为有人来救济它，所以就挡住了农村的抬头。

日本农村问题是从1929——1930年才严重的。这时正是世界经济恐慌的时候，因农村问题的严重，军人的着急想找出路，在昭和五年就对中国发生“九一八”事件，昭和六年在国内又发生所谓“五一五”事件——打死内阁总理犬养毅。后来召集

临时议会，就产生了农村更生计划（农村更生计划期限为五年），昭和七年就开始做，到今年恰好是第五年。他们的农村问题都是些什么问题呢？实际是与我们的问题一样，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跌落，而农民消费支出则又不能少，所以农民就感受痛苦了。据说农产品价格有低落到三分之二的，甚至到售去不够运脚的程度，结果，只有让它抛在地里没有人收。在支出方面如租税的负担不能减少，日常生活必需的工业制造品的价格没有低落，或低落得缓，至少也是不能与农产品价格成为正比例的低落。如农产品是供给工业都市用，工业上制造的肥料是供给乡村用，农产品价格低落的大而肥料价格低落得很少，这样，农村就受不了。因此，大家才都着急，而有农村更生计划的产生。日本内阁有一农林省——等于中国实业部——设有农村经济更生部，来主持全国农村经济更生计划。

农林省的经济更生部对于经济更生工作，是一县有一县的计划，一村、一町也都有其极详细明确的计划。各县有各县的经济更生委员会，各村各町有各村各町的经济更生委员会。委员会的组织，有上级行政机关主管人员，有专家技术人员，有本地方自治公务人员负调查及设计的任务。举一村计划来说，在计划的开头是先行精细的调查这一村的人口、土地出产、农民收支、负债情形及一切生活状况；此为基本调查现实状况。下面就是现状批判，由委员会开会讨论，指出问题所在，缺欠所在，某处还有方法可想，或某处还应力求改进等。接着就提出计划办法来。所有这些计划，都不是空言。某事归国家负责，某事归地方负责，某事为农民自身负责，分别订定，照计〔划〕实行。例如为农民整理旧债，即由国家大批拨出款来给农民减轻利息负担，其注意之周密，连厨房厕所如何安排，家具如何购

置，劳力如何使用，一年的劳力如何用，一日的劳力又如何用，钱如何花，都详细地给你规定或指示出来。

从以上来看，可以见出他们的经济更生与全村教育差不多就是一回事。我们所要考察他的也就在这一点。他们的工作和邹平、定县的工作差不多是一样，不过，所不同者，就是他们只是做对农村的救济工作，没有如我们所要创造的理想社会构造这个意思。他只是求眼前经济的复兴，只是求农村生活合理化。就工作说很多相似，就做的成绩说人家做得好得多。所以中国乡村工作，除了目标理想之外，与人家相比，只有惭愧。关于在日本所看到的情形不再多说，下面再说我对日本人的感想及关于国际问题的话。

先说对日本人的感想：（一）我以前未曾到过日本，这次开头先到长崎下船，到街市及山上去玩。这是与日本国头一次见面。在国内时觉得日本是一个外国。等到见面以后，第一个感想，就是觉得不象到了外国。本来日本人长的和中国人很相近，房子构造从外面看也差不多，到处映到眼里都是中国字。山上大概都有庙，庙的建筑更象中国，庙里有碑，碑文上都是中国字，念起来都是顶好的古文。这能算到了外国吗？于此我想起茹春浦先生所说的话，他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外孙子。”真是如此。他当初的确是传受了中国文化。似乎日本人也可以算是中国人的一种。

（二）日本人人都有信仰——日本人有几点长处。第一个容易给我们印象的就是有信仰。就大多数的日本人说，他都有一个信仰。信神、信佛——真信。如陪我们上岸去的轮船茶役第一个庙他进去，第二个庙他不进去。据他说：“我信的神不是那个，所以不方便进去。”从这点可以见他信得真切。如果都信就

等于都不信了。在东京一招手就来的汽车夫的面前或身上都供养或佩带他们所信的神，神与神不同，各人有各人的神，在神的名号之下写“御守”两字，就是保佑之意。

日本乡村到处都有神社，神社前面都有一个牌坊(鸟居)，日本人来往走过都有一个敬礼表示。不单乡下人是如此，村役场里面也供神，在会议厅里面设有神龛。又不单村役场是如此，小学校里也有，大礼堂里也有，无处不有。大概学校里供神不能随便供，他是供开天辟地以来开日本的大神，仿佛是说现在的天皇就是从那里来的。我们参观一个小学校，每一个讲堂都供着神，小学生一进门行一回礼，放学行一回礼。再到大规模的工厂里面也有神社的设备，供着从古代历史传说下来的神。我们参观川崎造船厂，工人约万余人，也要在神前行礼开会。大体说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仿佛无甚信仰外，大多数都是有信仰的。这是一层。再一层就是日本现在的统治阶级教育家等也很注意这问题，颇有制造信仰的样子。原来有信仰，而后人心才可以安定有勇气去生活。日本几十年来政治的稳定实在靠此精神的安定。但现在日本已到了要改造的时期，社会问题已经显见，旧日信仰已经动摇。因信仰动摇你就去造信仰，是不会发生力量的。所以今后日本人的信仰一定是越往减少、动摇中去。就人类说这是个进步，就一时的社会说这是很危险的。日本前途一定要不好。这是极可注意的一点。

(三) 礼貌谦恭——日本人的进退周旋的确谦恭有礼貌。不过，有时过火。公务人员和交通人员更是客气得厉害，我们在火车上看见检票的人一进门就先摘帽鞠躬，嘴里说着“对不起，请先生们都把票拿出来让我拜见一下。”清扫车室的夫役，不时地来清扫烟头瓜子皮，每次进门，也都先鞠躬，说“对不起，我

要将车扫一下，很快地就扫完，绝对不敢妨碍大家。”一进站房，剪票的人就不住的嚷“多谢，多谢！”。一出站房，收票的人又不住的嚷“招待不周！”这真是太和气了。常见西洋人也学日本人鞠躬，大高个子一躬到地，心里老觉得要发笑，仿佛觉得有些怪特别。日本人的谦恭礼貌完全是从小学教育培养出来的，这种精神真可佩服。据说在日本两人争论也是互相责斥“你没有礼貌”的话，仿佛所争的就在此。从这点可见他们对礼貌的重视。

（四）清洁——清洁干净不单是贫富问题，他是处处喜欢干净，他住的地方也让他不能不讲究干净，一进门就得脱鞋，在房子里只能穿不带土的拖鞋；所以就不能不讲究干净。这种好清洁的好习惯就必然要勤。唯有勤才能获得生活上的趣味。

（五）好游览旅行——这点也很让我们惊讶奇怪，到处磕头碰脑都是游览的人。在我想，这与交通发达一定互为因果关系。我们在日本看见火车站或旅馆到处都写着引人游览的广告图画，什么藤萝遍开咧，什么温泉开放咧，什么牡丹盛放咧，……。在交通机关也给你预备得很周到，处处给你以种种方便，所以游览的人特别多。我们有一天到奈良去，——这是日本的一个古迹，游览的人遍山遍野都是。我们看了真是觉得惊奇，不知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喜欢游览，游览的人士都是有组织的，——约占十之七八。小学生、中学生、男学生、女学生都非常整齐可爱。除去学生有组织之外，老头子，老婆子也都有组织，也结成团体到处去参观游览。此外，还有一种人在日本叫做行脚（中国佛家有行脚僧，日本行脚就是指着好游览的人），他们穿着行脚所特有的装束，戴大草帽，穿粗壮的衣服，背着行囊，拄着拐杖，到处去游览。从各方面都可以说明日本

人的好游览！这也实在是他的长处。中国人也很应该去效法他。中国许多人有钱就去抽烟喝酒打牌，不去游览，我想如果中国人把用在无聊的消遣上的钱转用到游览上，一定可以给中国人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心理上可以活泼兴发，在生理上能使身体健康，从这里更增进社会文化，这实在是有益的事。

(六) 勤劳——我们到村役场或小学校等公共机关去，机关不小，用的杂役很少。这与房舍的建筑也很有关系，村役场一进门就是一面大柜台，上面都装着可以活动推拉的玻璃窗，“每一窗户前面写明户籍、征兵、土地、储蓄等等的小牌，村民有事可以直接到窗前去办理，柜台里面就是办公桌，所以用不着传达，当下什么事情都可以马上办完。村公所与合作社常是连在一起，这样当然不用人，即用也不过一两个人就够了。如若有人去参观，当然就忙不过来，这时办公的人都来帮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役场吃饭，饭是我们自己带去的，主人为我们预备了一点茶汤水果，送来的是工友，收家伙却进来一个女子。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谁，及至进去参观，这个女子正在教室指导学生作学〔业〕，并有许多教员同坐在那里和她研究教学法。还有一次也是在乡下参观而没带食物，并且在乡村也买不出来，没有法子，只好请主人替我们代办。他们临时给我们做饭、端饭、伺候的都是他们学校里的女教员。教员都这样做，青年学生更可想而知了。这种好习惯也是我们应该效法的。

最后稍说几句关于国际问题的话来作结束。日本内部矛盾固然严重，但仍可维持一个段落，还不如我们在国内所想象的那样迫急；从对外——对中国、俄国——说，战争也不能很近，因为许多症结使他不肯也不敢轻于一试。就形势说他是得不打且不打，据说他在战争上的准备对付俄国还不够；但天下事也



很难预料，说不定逼到不可开交的地方也就会打起来的。不过，就目前说，似乎还有一点空。这里边有许多话，暂且不说，这仅是结论的话。

《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1期，

1936年8月16日。

## 《欧洲民众教育概观》序言<sup>〔1〕</sup>

董渭川先生于1934年游欧考察民众教育，归来后以所得记出，贡献于国人，使我们未得去参观的人，能藉此增许多见闻，引发一些反省，确是一部佳著。董先生嘱我于读罢后，抒写我的意见。我现在略说一二。

我们看了人家的民众教育之后，一定要想到我们自己底民众教育，尤其容易感想到其间的得失成败问题。那末，我即从这里说起。这问题在董先生原著已经提说到，如他在《欧洲民众教育鸟瞰》结语中说的：“中国底民众教育对于这些年来救亡图存的要求，有了多少裨益，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疑问之所以发生，也可以说效果之所以渺茫，原因有二：一是教育的内容和实际生活不相应，两者之间，脱了关节；二是吾人对于民众教育缺乏信仰，对于这事业下的工夫不够。又如他在《欧洲民众教育所启示于吾人者》，说我们目前的民众教育馆已经成为一种装璜门面可有可无的点缀品，和政治经济各方面不相干；目前的民众学校跟着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只是教人识字读书，别无办法。所有这些批评，自然都是同人家底对照而反省来的。大概谁都要点头承认。不过在我看，董先生底话似乎太偏于中国

---

〔1〕董渭川先生著《欧洲民众教育概观》，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此序言曾以《民众教育路线问题》为题发表于《乡村建设》（1936年8月16日，6卷1期）与《山东民众教育》（7卷5期）。

办民众教育的人自责的意味。像他举出的中国民众教育无成效的两原因，完全置重于主观方面，——不但第二原因信仰不够，是主观的，即第一原因方法不够也还是主观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民众教育无成效作一个客观问题来分析的时候，我想它的原因有大于此者。那就是我常说的中国社会构造崩溃，以致几十年来整个社会向下沉沦，一切事业失败是常情，成功是例外。即如中国工业的失败，不单是营工业者负得了这责任的。营工业者本身固有许多弱点，而究问工业在中国总是失败不见成功之由，明明有大于此者。这一点，我想在董先生也许是看到的。因为他全书中于民众教育必须与政治经济种种方面要密切地扣搭配合，向着一个目标前进，然后才得成功，曾再三致意。从这里，见出他是理会到社会机构问题的。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旧机构崩溃，新机构未成，青黄不接，其表见在外面的，便是二三十年政治上无办法；至如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不相关切逗合，正亦其见征之一。但是大家又不要误会，以为是我们底民众教育必要在有了这一整套机构后，才会有成效。若这样一分别开，不但永没有社会机构形成出现，民众教育的成效也更望不到。依我所了解的，中国今日已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必须从社会机构的一点缔造，得到一点社会进步；从一点的社会进步，而社会机构更缔造了一点。如是社会的进步和新社会机构的形成，辗转循环，向上生长开展才行。从事于这个功夫的，便是我所谓乡村建设，亦可唤作民众教育。我心目中所要求的民众教育是这样；如果民众教育不这样做，（不抓住社会机构问题做工夫）我敢断言必不能有进展成效。

总而言之，中国今日适当其数千年文化一大转变途中，社会机构有待从新建造；这是必须认识清楚，随你谈到任一问题

都不要忘记的。至于此社会新机构如何要从民众教育来建造，其步骤，其目标又如何？那不是这里可以谈的，读者要问，就请留心我一向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主张。

关于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办理不得法，致教育内容与实际生活不相应，两者之间，脱了关节；在我看亦不尽是民众教育家的责任。即以董先生所举乡村的民众教育竟缺乏农业的课程之一例来说罢，要知中国今日正亦是学术上青黄不接的饥荒时代。学术虽说是天下公物，西洋东洋近代现代一切发明创造原皆可为我用。但细说去亦有分别。大抵偏乎纯理的，似无基地域的特殊性；偏乎应用的，便极有地域的特殊性了。自然科学中，以无生物为研究对象的尚少地域的特殊性；以生物为研究对象的，就有其地域性了。至于社会科学，其地域特殊关系更重。因此世界的发明创造虽多，要使它与我们此时此地实际生活发生效用，还得一番融会沟通运化开拓工夫，直不亚于从头创造过。像关于农业的一切学术，关于政治的一切学术，尤为显著。——即中国非有中国的农业学术不可。此中国的农业学术，虽可有取于美国，有取于日本，而差不多仍须一木一石的建筑起来，一分一寸的生长起来，并不现成。乡村民众学校缺乏农业的课程，怕不尽是办学人员不知注意，或不热心的原故；而实是没的可教。因为在民众学校里教农民，一定不能拿学理来教他；要切合实用，则农业上受自然气候土（宜）〔壤〕之影响限制最大；即令自然的条件相合，还要看社会的条件合否，种种困难，说之不尽。但大家又不要误会以为必在中国的农业学术成功了，而后才放在民众学校的课程里。若这样一分别开，不但民众学校的农业课程不知何日得有，而且中国的农业学术亦将难望成功。西洋科学传到东方来，只有在日本算是

扎了根，而能不断的生长进步了；若中国输入科学虽这么多年，好像还是在输入，而并没有扎下根去，向上向四外生长开展。这原故，无非在日本社会其生活已经依靠科学，科学已经渗入生活，而我们则科学与生活还彼此不相联。照我的观察，中国今日必须设法使社会实际生活得着学术研究机关、高等教育机关的指导帮助，而还以实际生活需要刺激一切学术的研究进步。这样，一面是为社会开出生机，一面是为学术开出生机。学术与社会，社会与学术，连锁循环地向前进步，而后其进步乃有可能。这个计划，具见于鄙著《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在此教育系统中，正是以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为主的一种设计，很盼望办民众教育的朋友赐教。

我所感想到而可以略说一二的，就是上面两段意思。末了自己复阅一遍，觉得很抱歉的，在我的话里没有介绍了董先生，倒像介绍了我自己！

25年6月6日梁漱溟。

## 中国社会构造问题<sup>〔1〕</sup>

现在我想要给大家讲的是社会构造问题。要紧的意思可分两点：

- 一、先使大家明白社会构造的重要；
- 二、更进一层使大家认识中国旧社会构造的特殊。

总之，是让大家知道此刻中国最大的问题，为旧社会构造的崩溃与新社会构造的如何建立。

我可以从考察日本说起：我在日本参观共三个礼拜，参观的地方也不多；可是他那经济上、政治上最重要的地方，大略也都看过了。看过之后的感想是什么呢？在我心里只有叹息的话：“日本是进步啊！日本真是进步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有这种叹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五六十年来，顺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路而发展，到现在是真进步了。在这进步的过程中，先由产业的开发，经济的进步，而连带着其他种种的事情也都随着进步了。——因为一切事情都是容易随着经济的进步而进步的；经济进步，则政治、教育、文化等也都跟着进步。五六十年来，日本的进步，是真快，真令人赞叹不置。

---

〔1〕这是1936年夏在山东省立十二校师范女生乡村服务训练处的讲话，由侯子温据部分同学笔记整理而成。整理者在刊出时特加按语说明：“未经梁先生寓目”，“如有遗误，概由编录者负责。”——编者

最令我们赞叹的就是他经济的进步：例如我们看到日本乡村的富力，比我们中国乡村的富力要大几倍或十几倍。在日本一个四五户人家的乡村，其合作社的存款，能到四十多万。有的乡村小学的建筑费，要化到十几万（我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建筑还没有用到这些钱哩）；而这么大的一项款，又都是乡村自己负担。由此便可见出日本的乡村是如何的富足了。再如日本一个较好的县份（如福冈县），在其行政系统的等级上，相当于我国的省，而论其地面和人口，也不过等于我们山东的五六县；可是他每年的支出预算竟到二千八百万，比我们山东全省的岁预算还要多。诸如此类的事情，说之不尽。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教育：在日本，义务教育的期限是六年，他们的国民至少都受到六年的教育，所以不识字的人数很少。现在他们又要把受教育的期限提高，而有所谓青年教育；青年教育就是比六年义务教育又高一级的一种教育，受了六年义务教育之后，再来受这种青年教育。他这种青年教育，虽然不是强迫每一个青年都要入学，但在大的都市里面，十分之八的青年都曾受过这种教育了（其中女性较少，男性占大多数）。换句话说，他这种高于义务教育的青年教育，也快要普及了。因此平均每一个日本人的知识能力，实在是比中国人高得多，他的教育，实在是比中国进步。

以上说了许多话，无非是说日本的进步，令人赞叹！那么，赞叹之余，跟着使我们想起来的的就是中国的不进步，种种的不行！种种的可怜！再跟着想起来的：日本为什么进步？中国为什么不进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含着一个什么问题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的人回答说：“中国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原故。”这话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要知道

日本与中国在从前同样的是受西洋列强压迫的，从前我们与日本同样是东方的各自关门过日子的国家，后来同样的被西洋人撞开了门，同样的受西洋影响，又同样的去学西洋。换句话说，我们与日本同样的是因为受了新环境（东西交通后日本与中国都为新环境所包围）的刺激，而又同样的各有变法维新革命等运动，同样的去学西洋以求应付西洋，而结果日本学成功，走上西洋人的路，国家一天天的进步了；中国却老不能进步，这到底是什么原故呢？若单归咎于外面的力量，恐怕是不对吧？！不正确吧！？中国不进步的原因，若单说是外力的侵略，恐怕是不够吧？！

还有的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为贫、愚、弱、私”；岂不知“贫”“愚”“弱”“私”乃不进步的结果，不进步的现象，并非不进步的原因。这种说法，更回答不了问题。

那么，日本进步，中国不进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照我的解释，这完全是一个社会构造问题，完全是因为日本社会构造与中国社会构造不同的原故。

所谓社会构造，即指一个社会里面，这个人与那个人的关系，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关系，这方面与那方面的关系，方方面面种种的关系而言。或者说一个社会里面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各种制度，即叫社会构造。再换句话说，社会构造就是一个社会的秩序（一个社会里面的人过生活，都要有他的秩序，都要有条有理，社会生活才能进行顺利。譬如我们这个训练处，大家也要有一个生活秩序），一个社会的机构。所谓“社会构造”，“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机构”等等，名词虽不同，实在是一回事。

那么，我们中国的社会构造与日本的社会构造有什么不同



呢？其不同就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他的社会构造虽有变化，但是没有根本改变。他一面维新，一面又尊王复古，所以让他的社会构造得到一个转变改良，而没有中断。社会构造没有中断，社会能有秩序，这是让他所以能进步的根本原因。我们中国呢？中国虽然也有维新革命等运动，可是我们的维新革命运动，不但没有让我们的社会构造得到一个转变改良，反让它日渐崩溃破坏了。社会构造破坏，社会没有秩序，整个大社会日渐向下沉沦，那里还能有进步呢？！在中国，我们看见的只有农工商业的渐趋衰落，让中国的富力一天天的降低下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经济破坏的情形更加严重。照我看来，这都是因为社会构造崩溃，社会没有秩序的原故。

我们要知道经济的发展进步，原来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活的，都要吃饭、穿衣、住房子的；并且一切生活都希望能更安适些，更舒服些。那么，因为希望生活的安适舒服，就得努力向前去干；在努力向前干的时候，就得用心思，由此用心思、向前干，就进步了。（这个用心思、向前干，向前求进步，是不用人勉强的，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进步呢？莫非中国人都睡着了？都不动了吗？不是的。我们中国人也都是要动的，要求进步的。例如我国的工商业者，也都是想着发达。但是结果不但不能发达，反都赔本倒闭了，这是为什么原故呢？这就是因为社会没有秩序。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是离不开社会的，大家是互相不能离开的。但是大家生活在社会中，必须社会有秩序、有条理，大家的生活才能进行顺利；如果没有秩序，没有条理，社会秩序乱了，则大家互相冲突，互相妨碍，谁也不能求进步，大社会也就不能有进步了。

社会构造好象一架大的机器，一架大机器的各个机件如果配合好了，向前转动起来才能进行顺利；如果配合不得当，则马上转动不得。硬要转动它，会把全盘机器弄坏的。简单的机器还好办，越是复杂巧妙的机器越难办，其中有一个小螺旋钉配合不好，全盘大机器便不能动。大家明白了这个比喻，也就可以明白社会构造的重要了。现在我们中国社会，就好象一架没有配合好的机器。中国的每一个人虽然都是活的，都是要动的，都是要求进步的，但这只是许多好的零件，没有配合好，成一盘大的机器，所以谁也动转不得。虽然每一个人都想动，都想好，都想进步；但被社会牵掣着。大家互相牵掣，互相妨碍，社会日渐向下沉沦，那里还会有进步呢？！

大概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内战内乱；因为内战内乱，社会上一切事业都停止了，商人不能安生做买卖，工厂都已关了门，农民也不能好好的种地。而政府里还要加捐派税、拉夫抓车。再加军队的搔扰，炮火的轰炸，让大家受了无数的损失与祸害。——这还都是些直接的祸害，更因社会没有秩序，一切正常事业不能继续进行，而有的人作冒险的事，也就是作不正当的非法的事，反倒可以发财。因此让许多人不安于本分，社会秩序更加紊乱。这虽不是内战直接的祸害，而亦是间接的受内战影响而有的。（内战直接间接为害的例子很多，一时说之不尽，大家可参看《漱溟卅前文录》中《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总之，因为社会没有秩序，一切事情都不能进行，这是让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上所以失败的最有力的原因。

因为内战所以让社会没有秩序，而所以有内战，也可以说正是由于社会没有秩序而来的——内战是社会没有秩序的因，也是社会没有秩序的果。社会没有秩序，没有条理，大家没有

轨辙可循，结果必要自乱。可是因为连年内战，社会没有秩序，社会就不能进步了。试看人家日本，近几十年来，政局是安定的，社会是有秩序的，好象一架好的机器，各个齿轮都按步就班的各自循序前进，一天天的在那里转动，转动了五六十年，那能会没有成绩呢？当然是要进步的。而我们中国因为社会没有秩序，大家互相牵掣，都动转不得；强要动转，便是彼此冲突，互相毁伤。如历次的南北战争，现在的剿共战争等，死了多少人？！化了多少钱？！这不都是中国人自己互相毁伤吗？！如果把那些人和钱，都用在社会的改良进步上，将要有如何的成绩？！可惜中国不但不能如此，反把那些人力和财力都用到自己互相毁伤上了！——的确，中国近几十年来，不但不能进步，反倒是自己毁坏自己，完全是在那里自毁。

以上是说因为内战内乱影响到社会构造的崩溃，是让社会没有秩序的原因；而从内战内乱，也正可以看出社会的没有秩序，正能够看出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其实，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就是没有内战内乱，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中国家庭制度的破坏，家庭里面人与人的关系，现在都渐渐的被破坏了（现在家庭里面父母子女如何相处都无准辙可循）。本来破坏并不要紧，最怕的是旧的被破坏了，而新的又未能建立；旧制度被废弃了，而新办法又不合适；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社会就乱了（社会制度崩溃，社会没有秩序，社会必乱。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人都感觉着手足无措，无一定的准辙可循，彼此最容易起冲突；彼此冲突，社会就乱了）。中国近几十年来，所以扰攘不宁，大家的生活不得安定，就完全是因为这个原故。那么社会制度崩溃，社会没有秩序，大家的生活都不得顺利进行，社会那里还会有进步呢？！

以下我们再来分析社会构造或旧社会秩序靠什么力量来维持？照我们的分析，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大概有两种：

一、强硬性的力量——就是武力的强制。而代表武力的是国家。从来的国家，其维秩序的办法，都是用武力强制，因为武力强制最有效。不过社会进步，文化程度高的国家，其武力多半是隐藏在背后，不大十分显明。

二、软性的力量——就是观念的心理的维系力（如果我们叫那一面为强硬性的力量，这一面便可以叫做软性的力量）。所谓观念的心理的维系力，就是说：大家在互相了解之下，共同信仰之下，来信从一个秩序。如由于教育、宗教或礼俗，都能够使大家信从一个秩序。其中最有力量的，要算是宗教。尤其是在初民社会的时代，人民的知识浅薄，譬不畏死，虽用武力，他也不怕，强硬性的力量，便无大效用，在那个时候，必须利用宗教的迷信心，才可以让他信从一个秩序，才可以让他就范。所以在那个时代，社会秩序的维持，多半是靠宗教的力量。——就是西洋近二三百年的进步，也很多是靠着宗教的力量。再说日本的进步，靠宗教力量的帮助也很大。我这次到日本参观，发见了宗教对日本社会的关系很大，日本人的宗教气味很重，宗教信仰很深。在他们所最信仰崇拜的就是开天辟地的那个大神，而他们认为他们的天皇就是那个大神的后裔，大神的化身。他们的天皇，一半是人，一半是神，所以他们都极信仰崇拜他们的天皇。而天皇是万世一系，代代相传，所以每一代的天皇，都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此外他们还信仰佛教，佛教在日本的势力也很大，并且曾被尊为国教；不过不如神教的势力大。我们在日本参观，到处都看见有神社或神庙，修盖得都非常好，来往行人，过此者都要行礼致敬。在公共机关里，如村役场（等

于我国的村公所——述者注)，乡村小学中，也都设有神龛，供有神像，每逢开会，都要向他行礼。再如一个开汽车的车夫，他的坐位对面，也挂着一个神牌位。由此种种，我们便可见出日本人信仰宗教的气味是如何重，信仰宗教的精神是如何大了。那么，这个样子信仰宗教有什么好处呢？大家要知道，这个关系很大，因为日本人信仰宗教的精神与力量，对于他们社会的好处很大。他们所信仰的神只有一个，在同一的信仰之下，大家的思想统一，按着一个方向去努力，社会便可以有了秩序，便可以安定；社会安定有秩序，每一个人的生活才得安定；人人安心生活，安心从事他各人的工作，努力向前求进步，因而大社会也就随着进步了。所以我们说日本社会秩序之能够维持，社会能够进步，与他们国民的信仰宗教有很大的关系。反观我们中国，中国人的头脑比较复杂些，聪明些，理性比较开通些，已不受宗教迷信的束缚，可是，因此社会也就不易有秩序了。——不能有一个由宗教迷信来维持的社会秩序了。

维持社会秩序的软性的力量，除了宗教以外，其他如教育、礼俗等，也都是很要紧的东西。不过这里不能多说了。

照我们的分析，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就是上述两种：——一、强硬性的力量，二、软性的力量。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比较比较这两种力量，那个的效力大？那个要紧呢？本来这话很难说，不过如果我们比较来说的时候，还是第二种力量的效力大（观念的心理的维系力大）。虽然有许多事情用武力强制，可以有直接影响、效验，可以马上生效；但我们要知道，人类到底是用头脑的动物，用智慧的动物，换句话说，人类究竟是用心眼的，你如果能操纵控制了人心，则不用武力也可以，不能操纵控制人心，单用武力也没有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类

到底是要靠文化过生活的，而人创造了文化，又都要陶铸在文化中（这里所用文化二字含义很宽，社会上一切文物制度法制礼俗等，都包括在内）。文物制度，法制礼俗，是人想出来的（其中就要靠观念作用），而人又都要遵从它。所以这种文物制度、法制礼俗（亦即社会秩序）的维持，要以观念的心理的维系力为大，为对的。

如果我们明白了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以第二种力量的效力为大，——观念的心理的维系力为大，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中国社会构造的崩溃，社会秩序的紊乱，也多半是由于观念心理的不统一而来的。现在我们就讲一讲中国社会构造崩溃，社会秩序紊乱的原因。这可分两点来说：

一、武力的分裂——中国因为武力分裂，政局常常变动不安，武力横行，法律无效，结果便让社会秩序紊乱了（因内战使社会秩序更加紊乱之意前边已说过）。

二、观念心理的不统一——此刻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太纷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太不一致，头绪太多了。因此非让社会紊乱不可。

中国社会构造的崩溃，社会秩序的紊乱，多半是从第二种力量的失效来的，多半是从观念心理的不统一，态度行为的不一致而来。更明白一点说，自从西洋文化过来后，遂引起我们对固有文化的怀疑批评，这便是固有文化动摇的开始，也就是社会构造崩溃的开头。中国文化为什么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便开始动摇破坏了呢？这又是因为中西文化不同的原故。

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有什么不同？其不同处很多：先说西洋近代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伦理道德是冲突的。若单是这两面冲突，还不大要紧，还好办，而现在更困难的是：不但这两

面冲突，最近又进来了第三个——西洋现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反个人主义的团体主义），这样一来，头绪就更乱了，冲突的地方就更多了。下面我们试将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说其大概：

个人主义——大家如果读过西洋史，就可以知道，在西洋历史上有所谓中世纪与近代之分。所谓中世纪，就是指着他那封建社会，宗教势力最盛的时代说。在那个时期，团体干涉个人太厉害，团体干涉个人的力量太大、太强，所以到了近代，便对那种团体过强的干涉起了一个反动，反对封建，反对宗教，反对团体过强的干涉，而要求团体尊重个人，结果就抬高了个人，所谓个人主义，就是从这里来的。个人主义的内容、意义，就是说，现在西洋人已经改变了从前想升天堂的念头，而要在现世求幸福；改变了从前的偏蔽思想，而要求思想解放；改变了从前宗教上盲目的信仰，而要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改变了从前团体对个人的过强干涉，而要求团体尊重个人自由；改变了从前少数人作主，多数人作奴隶的制度，而要求多数人可以作主。……这许多的改变，都是个人主义要有的意义。我们要知道，一部西洋近代史，就是一部个人主义的发达史。所谓资本主义，也就是从这里来的。何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指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说，在经济上个人可以自由竞争，形成资本集中，成功资本家，这便叫做个人资本主义。所谓近代国家，也是从这里来的。何谓近代国家？近代国家就是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说；而民主政治与个人主义是不相离的。再说资本主义的近代国家与向外侵略也是不相离的。尤其是经济上的侵略，是由资本主义而来，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路，为求得原料与市场，非向外侵略不可，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济侵略是工商业发达后必然的结果，一定的道理。——关于个人主义的意义及其影响，就是如此，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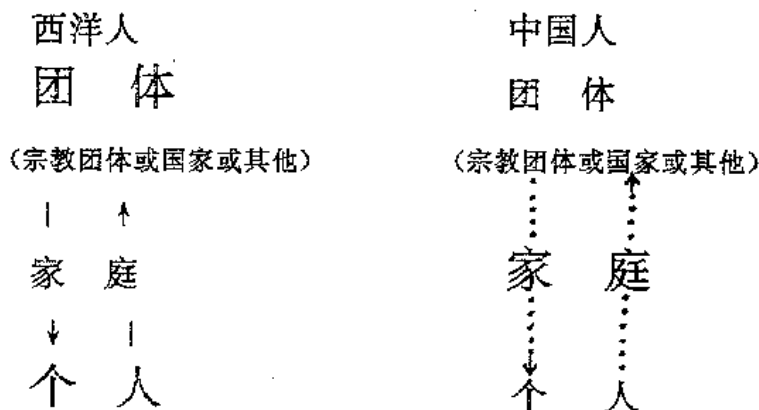
再多说了。

社会主义——因为个人主义走到极端，发生了流弊；个人主义发达的结果，妨碍了社会，所以大家都感觉不合适，都认为不满意，因此便又发生了一个反动，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就是反对个人本位，反对自由竞争的。在社会内不许个人自由竞争，主张绝对统制，一个社会里面，大家必须合作，由整个的社会有计划的来谋大家生活的幸福。在这里，最有力量的一派，要算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在个人主义以后而起来的一个最有力量的潮流。这个潮流，在欧战以前，尚隐藏着没有显露，待欧战将终，便从俄国爆发出来，直到现在，已盛行全世界了。——与共产主义同时产生的，还有法西斯主义。普通说共产主义为左倾，法西斯主义为右倾，本来是不同的。可是，我们要知道，他也有相同之点，就是：他们同是主张团体要大过个人，抬高团体，抑压个人。他们都是主张绝对干涉统制，反对自由放任。所以在反对个人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换句话说，他们同是个人主义的一个反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也都很有他们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与以前的个人主义恰好是相反的，恰好是一反一正，前后是冲突矛盾的。

现在再来看看我们中国这一面呢？他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他所有的就是伦理。在以伦理为重的中国社会中，与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西洋社会最不同的一点，就是缺乏团体。（社会主义固然是看重团体，抬高团体，是有团体的；即个人主义也是有团体的。所谓个人主义是团体里面的个人主义，并非绝对的个人独立，并非离开团体的个人；所以个人主义仍然是有团体，只有中国才真的是缺乏团体）。既没有团体，也就反映不出个人。（因为个人与团体是互相反映的，好比左与



右，没有左即不能有右，有左才能有右，两面是互相对映的。)那么，中国既没有团体，又没有个人，所有的是什么呢？仅有的就是家庭。中国人既没有团体观念，也没有个人观念，最重的就是家庭观念。——本来说到家庭，就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指父母兄弟夫妇子女的关系而言，这是西洋人与中国人相同的，似乎不应单提来说中国人有家庭；不过中国因为缺乏团体与个人，家庭便特别显露出来，而西洋是两极显露（团体特别显露与个人特别显露），家庭便隐盖着，所以说到家庭，便几乎成了中国人所独有的了。换句话说，我们说西洋有团体与个人而无家庭，说中国有家庭而无团体与个人，这并非绝对的话，只是比较言之而已，若认真的说，是不能那样说法的。认真的说，西洋是因为团体与个人太发达了，家庭便被隐盖着；而中国因为团体与个人不发达，家庭便显露出来。其比较若以图示之则如下：



此图示西洋人团体力强大，反映出个人而淹没家庭关系；中国人缺乏团体，亦不见出个人，唯家庭关系显得特重。

中国缺乏团体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没有宗教。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没有宗教的国家。宗教在中国最不占地位，无论那一种宗教在中国总不能占一个地位；而西洋的团体多半是由于

宗教来的，中国没有宗教，所以也就不容易有团体了。中国所以缺乏团体，除了没有宗教的原因外，恐怕与农业生活也很有关系。因为农业生活是不宜于为集团的，而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就不能有集团生活了。——本来人类初期的社会生活，多半是集团的，而中国因为农业开发的特别早，很早就过着农业生活，所以很早就让中国不易有团体了。中国没有集团生活，所有的是家庭生活；而家庭制度对于农业的经营是最合适的。所以这一点，也就促成了中国的家庭制度。

家庭生活与集团生活最不同的是：在集团生活里面是重秩序的。因为有秩序，有纪律，大家的生活才能进行顺利。那么，为维持秩序，就得用法律，不能讲人情。而在家庭生活里面是重感情的，是好讲人情的（家庭生活比较可以随便些，用不着所谓纪律，所以也比较容易讲人情）。在集团生活里面就不行了，集团生活人数多，范围大，要想维持秩序，就不能讲人情，不能让人随便，不得不对个人加以干涉，加以制裁。尤其是在初民社会的时代，对个人要加以严厉的干涉。可是因此就又发生中国人与西洋人对自由要求的不同。西洋因为团体干涉个人太厉害，团体干涉个人的力量太强，所以等到社会进步，人民的知识程度增高以后，对于团体过强的干涉，便容易起反抗，对于那无道理的拘束、压迫，便不愿意再接受了。西洋到了近代就有所谓个人主义，拒绝团体过强的干涉，要求团体尊重个人自由。他这种个人自由的要求，完全是由对团体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的（此意前边已说过）。而我们中国则根本缺乏团体，个人并没有受过团体的过强干涉，所以他对于个人自由也就不感觉需要，对于自由的要求十分冷淡，他听了“个人自由”这句话，实在有点不大懂，并且表示惊讶！他仿佛在说：“人人都要

自由，那还了得吗?! 社会不要乱了吗?!”对于自由，中国人与西洋人所以有此不同，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与西洋一般情形不同的原故；西洋因为有团体过强的干涉，所以反逼出个人自由的要求；中国则根本没有团体，更无所谓团体过强的干涉，所以也就没有个人自由的要求了。

中国既没有团体，也反映不出个人，所有的就是家庭；而从家庭生活在社会上位置的重要，便产生中国的伦理。什么叫伦理？伦理的意思就是说：人生下来便与人发生了关系（至少有父母，再许有兄弟姐妹），一辈子都有他相关系的人，一辈子都在与人相关系中生活。在相关系中便发生了情，由情便有了义，有情有义，便是伦理。伦理的意思就是指一个情谊义务的关系，就是要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照顾，互相负有义务。极而言之，伦理的意思，是要牺牲自己去为对方。例如：什么是最好的父母呢？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的去为子女着想的，便是最好的父母。什么是最好的子女呢？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的去孝顺父母的，便是最好的子女。推而言之，最好的兄弟，最好的姊妹，乃至夫妇、朋友、社会上一切相关系的人，彼此都要有牺牲自己，为对方着想的精神，都要互以对方为重。——中国人就是处处以对方为重；西洋人则是处处以个人为本，以自己为中心。这种不同，大家如果留心去体验，随处都可见到。例如请客，在中国是让客人上坐，主人旁坐相陪；而在西洋则是以主人为中心，客人反倒要坐在主人的两旁。这种例子很多，这里不必多举，大家可以留心去体验。

在尊重对方，以对方为重的里面，含着一种“让”的精神；而西洋的个人本位，以自己为中心，则是一种“争”的精神。“让”与“争”，也是中国与西洋的一个大不同。中国人尚让，西

洋人尚争，这也是自然演成的。因为在中国要紧的是家庭生活，而家庭是由天伦骨肉关系来的，在家庭骨肉之间特别重情感，而人在感情盛的时候，常常是只看见对方而忘了自己，所以他能尊重对方，以对方为重，处处是一种让的精神。西洋人的生活，要紧的靠团体，而团体是由欲望来的（团体就是为的要满足大家的欲望），欲望生活对外是要讲争的。例如团体间的斗争，就是为了要满足大家的大欲望。欲望生活的结果，对外必要竞争。西洋人近二三百年来，所过的就是欲望生活，所以养成他尚竞争，好侵略的精神；中国人几千年来所过的都是伦理生活，所以养成他讲礼让，尚和平的精神。

在中国，从家庭生活的重要而产生了伦理，伦理本来是指家庭骨肉关系说的；可是中国的伦理关系，则不单限于家庭，他是把社会上一切关系都伦理化，把骨肉之情，推而及于社会上一切有关系的人。例如称县长为父母官，称民为子民，称老师为师父，称学生为徒弟……乃至朋友的关系，东伙的关系，一切关系都把它伦理化。这就是想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都拉得更近一些，这就是重情义，讲亲爱的意思。换句话说，中国是想化社会为家庭，化国家为家庭，把各方面的关系都家庭化，这便是中国的风气。这样各方面的关系都家庭化，用伦理的关系连锁了众人，那么，彼此就更不能不讲伦理，不能不以对方为重，不能不照顾对方了。所以伦理的关系，就是从情谊的关系，而更发生了义务的关系。我既对你有情谊，便应对你负义务；你既对我有情谊，亦应对我负义务；互相有情谊，互相负义务，这便是伦理。因此每一个中国人，对于凡与他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负有义务，仿佛四面八方的责任都放在他身上。他对四面八方负义务，同时四面八方对他也负义务。大家都在这种情

谊的义务的相互负责的关系之下连锁起来，这样一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便都有了保障，便不容易饿死了。这与西洋社会的情形，又恰好相反。西洋人是个人本位，自由竞争的路，彼此之间，不讲情谊，不讲义务，在财产上是父子异财，夫妇异财，各人是各人的一份，谁也不得分享。换句话说，在西洋财产是个人的，而中国的财产，则是家庭的，一家的财产，并不是单属于某一个人，所有全家的人都能享用。并且他那个家的范围，讲得又非常宽，凡与他有伦理关系的人，都可以算是他家里的人。亲戚朋友，乡党邻里对于他的财产，仿佛都隐然也有一份。虽然是他的财产，而凡与他有伦理关系的人，都可以去享用。在中国的风气就是如此，认为这是应当的。如其不然，我有力量了，而对于各方面不去照顾，不负责任，那是要受人指责的，是不成的。中国有句俗语：“富的有三家穷亲戚便不富；穷的有三家富亲戚便不穷。”由此便可见出中国人在经济生活上，是有很大的连锁性。在中国财产共有，经济生活互相保障，这有好处，也有不好处；有优点，也有弊病。其最大的弊病，就是容易养成人的依赖性。而其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可以免除，人类的惨剧可以减少，资本主义的祸害可以不发生于中国。在中国，因为财产共有，经济生活的互相保障，便是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过，资本主义就是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才能成功资本主义。而中国既然是经济生活互相保障，财产为大家所共有，那么，财产不易集中；财产不能集中，怎会成功资本主义呢？中国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不过，很带有共产的意思而已。

现在我们把以上所讲的话作个结束：以上我们是为说明中国社会构造崩溃，社会秩序紊乱的原因，而说到中国社会秩序

所以紊乱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武力的分裂，武力上的头绪太多太乱；二、是因为观念的心理的不统一，思想上的头绪太多太乱。而思想上的头绪所以太多太乱，是因为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不同。关于中西文化的不同，以上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与我们不同的西洋文化，给我们什么影响？又怎样让我国的思想就纷歧紊乱了呢？

所谓思想纷歧，思想上的头绪太多太乱，意思就是说，近几十年来，自从西洋的近代个人主义传进来以后，在中国也就有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等的要求；可是这与中国固有的伦理道理是不合的（这里我只说它不合，并不批评谁对谁不对），彼此是冲突的。后来这种风气好象是渐渐的盛行了，但终未能把旧风气压倒，终没见出最后的胜利。虽然自辛亥革命以后，表面上我们已经是个民主共和国了，而实际上并未能真正作到。那么，在这个西洋近代风气在中国还没有成功的时候，接着又进来了一个最近代的或曰现代的西洋风气，——反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潮还没有成功，又进来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潮。所以在思想上头绪就太多了，太乱了，以致让中国人的思想老不得归一，老不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思潮。而因此便让中国没有了办法，社会秩序便没有法子维持了。

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都于我们中国不合适。因为西洋的近代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产生，都各有它的历史背景，都是从他的社会历史演出来的。而中国的社会历史，根本与西洋不同，所以强要去摹仿他，便多矛盾冲突，便于中国不合了。不但与中国的伦理道理不合，尤其是不合我们现在的要求。试申言之：

一、个人主义于中国不合——前边我们说过，西洋近代的

个人主义是从反抗团体的过强干涉而来的。在西洋过去团体干涉个人太厉害了，所以到了近代，便起了一个反动，拒绝团体过强的干涉，要求个人自由，因而就产生了个人主义。可知个人主义是有它的历史背景，是有它的来由的。换句话说，在西洋过去团体干涉个人太强，是走极端了，于是就有一个人主义来救正，以求团体与个人的平衡。那么，我们看中国历史上过去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中国过去的情形是与西洋不同的，既没有团体的过强干涉，所以也就用不着个人主义来救正。“中国社会太散漫”，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既然是病在散漫，就应当救之以合，若再仿行个人主义，走分争对立的路，岂不是让他更散，更不能有秩序了吗？！个人主义在西洋是有他的需要，而在中国则不但无此需要，并且与我们现在的要求相反，所以我们说它于中国不合。

二、社会主义于中国不合——西洋现代的社会主义，也自有它的历史背景，有它的来由。在西洋近二三百年来，个人主义发达的太过了，以致妨碍了社会；个人主义走到极端，发生了流弊；所以就又有社会主义来救正，用社会主义对以往的偏弊作个调剂，仍然求着团体与个人的平衡。可是，我们中国大多数人原来都居于被动的地位，现在我们应当想法子使他由被动转为主动，若反仿行社会主义，抬高团体，抑压个人，岂不是让他更落于被动？！更增加了他的被动性吗？！这那能与我们的要求相合呢？所以不但近代的个人主义于我们不合，即此现代的社会主义，亦于我们不合，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法西斯，都于我们不合适。

总之，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于中国的需要，现在我们讲求团体组织，其组织之道，必须于二者之外，另外去

求，寻求第三条路来走。

讲到这里，我们拿西洋与中国对照一下，即可见出：西洋彻头彻尾是集团生活；而中国因为缺乏宗教，又因为农业开发的早，便让中国社会落于散漫，不能有团体，不能有组织了。不能有团体组织，所有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只是家庭，只看重家族亲戚的观念，看重乡党邻里的关系，而无国家观念，团体观念。至此大家也就可以认识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了。——开头我们是提出两点意思：一、社会构造的重要；二、中国旧有社会构造的特殊。讲到这里，大家就可以认识中国旧社会构造的特殊了。

总之，中国因为缺乏宗教，农业开发的早，家庭观念重……种种原因，就减煞了团体性，象是在西洋那种最有力的三个团体性，中国都不能有。在西洋最有力的三个团体性，都是什么呢？

一、宗教的团体性——西洋的宗教很有团体性，因为有宗教，对于他的影响很大，对于他结合团体有很大的帮助（由宗教便养成了他的团体生活）。又他们各个宗教团体之间，彼此分别的很清楚，对抗很厉害，因此更让他的团体坚固。而中国根本缺宗教，所以也就没有这种宗教的团体了。

二、阶级的团体性——在西洋，阶级间的分化对抗也很厉害，例如封建时代贵族与农奴之争，现在劳工与资本家之争，彼此对垒很严。因为阶级间的对立抗争，让他一个阶级以内的团结更要严密，更要成一个团体。所以说西洋的阶级也很有团体性。而中国社会，又根本分不出阶级（只有家族观念，而无阶级观念）所以也就没有由阶级而来的团体了。

三、国家的团体性——西洋的国家，更是有团体性的一个



大团体。在国家里面，虽然有各个势力的分立（如阶级的分立，政党的分立，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分立等等），不能完全一致；可是在对外的时候，是能一致的。因为国家观念重，便减煞了他政治上的纷歧，能让不同的力量合成一个，成功一个大的团体（国家）。而中国人只看重家庭，没有国家观念，因而也就不能成功一个真正有团体性的国家。

中国因为缺乏上述三种团体性，我们可以说是中国成功与失败的最有关系的一点原因——中国的失败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的成功也是因为这一点。这话怎么讲呢？我们先讲失败的一面：

人类在竞争的时候，有团体的才可以胜利，没有团体的则必定失败，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而我们中国没有团体，所以就失败了。团体与竞争，又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有团体，则容易有竞争；而因为竞争，则更让他要有团体。团体与竞争，辗转循环，互为因果。这个道理也很明显，大家可以去体验。试想：集团的心理是不易平定的，是最易冲动的；因为易于冲动，对外便易于冲突斗争；因为斗争，更感到团结〔体〕的必要。例如西洋近一二百年来的历史，就是因为有团体而有斗争，因为斗争而更有团体。中国则正与他相反，中国三四千年来的历史，都是过的散漫生活，而因为散漫，故讲和平；因为和平，则更散漫。——在散漫的生活中，一个人的心理容易平静；在平静的时候，容易自思其错；自思其错，则对外无争；无争，也就不需要团结而更散漫了。那么，以这样一个和平散漫的国家，处在今日竞争剧烈的世界，你想那能不失败呢？西洋学斗争学习了一二千年，中国却讲和平讲了三四千年，这两种国家相遇之后，我们失败是当然的，是无足为奇的。

现在再讲“中国的成功，也是因为没有团体”那一面的道理：所谓中国的成功，是指什么说呢？就是指中国历史的长久，国土的广大说。我们要知道，一个民族以他自己独创的文化，来维持他民族的生命，能象中国这样长久的，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象印度、犹太的文化历史，虽然也很久，可是现在他们都已不能算是一个独立国家了。只有中国能以自己独创的文化，维持民族生命到三四千年之久，现在虽然被称为半殖民地，可是仍得算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历史所以能这样长久，国土这样广大，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这就是因为没有团体，文化程度高，而才有大的成功。中国从来不以武力胜人，不以武力欺凌弱小，他所以能居于一个老大哥地位，并不是靠武力；国土的广大，并不是靠武力得来。那么，中国既不是靠武力，他的广大的国土是怎样开拓的呢？本来按普通的例子说，是最有武力的国家，才能开拓疆土；不过我们要知道，只靠武力征服人，常常是不行的，例如亚力山大、拿破仑、成吉思汗等英雄，用武力征服了那么些的领土，而终久是保不住，终久是要失败，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因为“人”这种东西，到底不是单用武力就可以让他屈服的。武力固然可以开拓疆土，暂时让那一个地方的人屈服了；但是，那只是表面上的屈服，日后仍然是要翻身的。所以要想让人真正心服，则非靠文化的力量不可，靠自己高程度的文化去同化他族。——如果你自己文化程度高了，则文化程度低的民族自然跟着你走。中国的国土大，人口多，就是靠文化而有的成功。中国虽然没有武力，可是他的文化统一的力量很大，能让别的民族不知不觉的就跟着他走，就化而为一了。中国向来是抱着世界大同主义，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以对于四邻小国，并不去欺凌他，并且要常常的扶助

他，——中国向来就是自己站在一个老大哥的地位，把四邻小国都当做弟弟，当做小孩来看待，与他不分彼此，常常去扶助他。中国以这样宽厚博大的态度对待邻国，所以他们（四邻小国）并不感觉妨碍，都肯按时朝贡，不起什么反抗，都愿意跟着中国走（这才是真正的心服）。

再说到中国民族寿命，文化历史的长久，也是靠文化而有成功。论起来，中国这个国家，武力不强，是不能够维持民族生命文化历史到这样长久的，而竟然能够这样，也完全是靠文化的力量。中国也曾经两度被外族征服，但赖文化的力量，历史终未中断。例如满洲人虽用武力征服了中国，可是他仍得用中国的文化来治中国，因此便让中国的文化，仍得延续下去。不但如此，并且末了连征服者他自己也就变成中国人了，慢慢的让他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是曾经用武力征服人的，自己也慢慢的同化于中国了。换句话说，外族虽然用武力征服了我们，可是，我们却用文化征服了他们，同化了他们，让他们与我们合而为一。所以中国文化能够延续不断，能够维持得这样长久，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文化高的关系。——因为文化高，让用武力征服我们的外族没有办法，非用我们的文化不可，非同化于我们不可。

那么，所谓中国文化高，怎么讲呢？中国文化为什么能这样优越有效用呢？这有两点原因：

一、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它是以儒家的道理为根本精神。宗教是强人信他（信教条），而儒家的道理则是让人自信，让人各自信你自己心里的道理，如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认为道理就在各人身上，无假外求，所以他只要启发你本来有的理性，尊重你自己就够了。那么，这

样我们虽说是信从儒家，跟儒家走，也就等于信从自己，跟着自己走了。——不过儒家虽不强人信从，可是他正能让人信从，他越不强求着统一大家，而越能让大家归到一块来。这是因为儒家所讲的道理，所指示给人的道理，是最合乎理性，最合乎人类心理要求的。所以人人都愿意信从他。而以这样的儒家道理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所以也最合乎理性，最合乎人类心理的要求。所以它能延续得久，传播得广，无论那一个民族，遇见了这种文化，都安之若素，都感觉着非常合适。——这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同化外族，所以优越有效的最要紧的一点原因。

二、中国文化是非团体的——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中国是缺乏团体的，中国向来是不划小范围的，不和西洋一样，团体与团体之间此疆彼界，分割的很清楚。中国人向来是视天下为一家，与人不分彼此，没有狭隘的爱国主义，没有排外性，所以他容易与人合一（西洋因为有团体排外性，对外抗争性，便不易与人合一）；而因此就让中国的疆土日渐扩大，人口日渐加多，民族生命文化历史延续不断了。

本来在今日竞争剧烈的世界上，是须要有团体的，而人类社会最初的团体，都是由宗教来的（宗教与团体，二者很相连，其意前边已说过），西洋则有宗教而亦有了团体，中国则二者皆无，所以相遇之后，就非吃亏不可，非失败不可。不过，现在中国固然是失败了，可是不要忘了从前也曾有过很大的成功，并且要知道，今日的失败，正是从过去的成功来的。俗话说：“飞得高，跌得重”，现在中国的情形，正是如此。现在中国所以跌得重，就是由于过去飞得高而来的。但是普通一般人见识短，只看见中国现在的失败，为之着急；而不知道这个失败，正是由过去的成功而来。尤其要知道的是：中国文化的优点：和平、宽

厚、对人存好意、不狭小、不排外、没有成见……等等，这都是合乎理性，合乎人类心理要求的。这是我们固有文化的长处，也正是西洋人与日本人的缺短，将来他们是要来学我们的。

我们要知道，今日世界上演出了许多大的惨剧，都是由缺乏理性，缺乏中国文化的长处而来。例如今日充满世界的两大斗争：一、民族斗争，二、阶级斗争，彼此利用科学，利用飞机、大炮、毒瓦斯来惨杀人类，这样的结果，将要完全的毁灭了人类，毁灭了文化，毁灭了大世界。那么，人类如何才能得救呢？如果要想得救，那只有发挥理性，发挥中国文化的长处。发挥中国文化的长处，才可以免除今日世界上的惨剧。所以人类历史再往前走，是要采取中国文化的长处，是要归到中国这条路上来的。假使我们不单在眼前来看，能向后看得清楚一点，则我们相信中国现在虽然失败了，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气，人类的得救，正要靠我们，靠我们发挥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发挥人类的理性，以拯救人类。

我常常感觉我自己在中国人里面是最不悲观的，照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虽然一时令人悲痛，但不必悲观，我认清楚了将来的人类，是不能不采取中国人的长处，不能不采取中国人的精神，人类最后的胜利，是要归于理性，是要归于我们的。

最后我希望大家要放大眼光来看，要往远处去看，不必悲观，不必叹气！

《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3期，

1936年9月16日。

《梁漱溟先生讲演录》，

1936年9月印。

## 非常时期小学教师的责任<sup>〔1〕</sup>

各位同仁：这次召集大家来开讲习会，宋科长以前和我谈过，并要我同大家讲几句话，但是以前没有时间来，今天才有机会和各位见面。我们讲习会已经办过好几次，每次举办的時候我心中就有点动，或说有一个感想，就是觉着不好意思的。在假期中大家应当休息休息，或照料点家事，叫大家来参加讲习受训练，好像太劳烦各位。在我自己是不喜欢被动，因为我不喜这些，如有人叫我动，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那么我替各位想，仿佛忽然来受拘束，很不自由，心里也或者不痛快。我固然不知各位心里究竟如何，可是我揣想各位来受训练，也许感觉不是味道。每次召集大家来讲习，我心里就这样动；可是同时我对讲习会也很赞成，我也这样主张，仿佛就得这样办。所谓就得这样办，里边包含着不少的意思，比如各位本身的缺欠，应当补充，教学法的不够，应当充实，学校教育的应当改进，各种事情的急待推进，让我们不能不这样办。尤其是现在局势太不好，问题太严重，我们没有法子混过去，没有法子不用心对付，没有法子不卖一点力气度过这难关！国际情形的严重，我想大家是不言而喻的。国际情势的压迫真是不了！不要说东四省的情形不堪言状，就是此刻的河北一带，远不及山东这样，那

〔1〕对邹平小学教师训话。石立年记，本文刊出时未经著者过目。

地方所受的灾害蹂躏，老百姓没法子生活，已经到了每个人的身上，现在这种情形虽然没到我们山东，要知总离我们不远！

关于大局的情形本来是时刻变化的，因为消息不灵通，所以我们知道的不十分准确。据我所知道的大概日本方面，在很短期内十分之十还不愿动兵，而现在也还未到真用兵的时候。就中国现在说，无论中央当局、华北当局，都不会有大的屈服，受他们宰割的。现在从表面上看来，中日的问题是很紧张的，可是我们知道他的底细，眼前也没有什么；也许说不定眼前要有变化，可是纵然有变化也不至于有多大的变化。中国现在非到他真动大兵的时候，是说不到屈服的。动大兵这种情形在最近是不会有；如再过一年二年不敢说。到大战爆发的时候，地方上一定不安静，那时候大家都得负起责来，如怎样不让老百姓自乱，怎样不让地方上有土匪，不要有汉奸等，都是我们的责任。此刻日本国内，天天嚷着“到了非常时期”，其实咱们才是非常时期咧！灾难虽然还没到我们的身上，可是我们不得不准备，不能不趁着空作这该作的事情。在这时候每人心里应当有个味道，就是每人心里当有个忧虑的意思，也就是要有个责任心，这个意思不要忘掉。我们在乡间比一般农民算是有知识，多懂得点事，那么我们就得多负一点责任。同仁回乡去，应当随时随地对大家谈现在的情势，叫大家懂得明白将来世界与国家的关系，各人心里有点分数。大概也就是说我所说的将来战争爆发的那种残酷蹂躏情形虽然还没有来到眼前，可是不远咧！总不出这两年！我们召集讲习会劳烦大家，是有很多不得已。那么，我想各位是会体会到这个意思的。

人要紧的是要有心，人若没有心那就没有意思了！怎样叫有心呢？就是知道痛痒，知道好过不好过。现在我们每人都应

---

当有这个味道，这味道老放在心上念念不忘，这就是有心的人。

《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6期，  
1936年11月1日。



## 论方法兼谈理智与理性<sup>〔1〕</sup>

### 一 论方法

我对辩证法初时没有深的研究。我分析中国历史社会所用的方法，人家看有点象辩证法而如此告诉我。我看看也有点象，但我所用的只是我自己的方法。

辩证法天然含客观性，非唯心的。心物问题，在社会学里面与在哲学里面不同。讲历史学号称唯物辩证法的不定是哲学上的唯物论。我分析历史社会的说法与纯粹哲学无关（有人以为我的乡村建设理论背后有我的哲学为根据，这是一种皮相的看法），只就历史事实来说明事实，那个说法说得通就怎么样说，没有怀着唯心唯物的成见，只想找出比较正确的解释。如受自然的影响大，我就本着这样解释，看去好象是唯物的。但单用这个解释不够，而发见更正确更深刻的解释，则对此我解释并不加以排斥，而亦无所谓唯心；就一贯思想说，包纳了物的关系而不偏乎唯物。

讲历史社会与讲纯粹哲学不同：纯粹哲学所追求的是本体，在本体论上有唯心唯物之争；历史社会只讲明其关系，相关系

---

〔1〕1936年8月讲，涂家瑛记。《乡村建设》刊出时题为《几个问题的讨论》，本题为全集编者所加。

的心物两面，不能抹杀任何一面，只看那面居于主要而有所侧重耳。历史唯物论非真唯物论，不过侧重唯物论而已。

在不同问题中，其所侧重之点不同。这个问题从经济方面去解释最妥当，而在那个问题则不必如此。事实上有的受经济的影响密切，有的受经济的影响疏远，前者自以从经济上来解释为是，后者就不能这样了。

## 二 理智与理性

人类与动物不同之点，在人类有理智作用而动物则没有。理智是人类用以求生活的方法，人类从理智才开出理性来，理性乃是结果。

理性是生命的本身，是体；理智是求生活的工具，是用。但是很奇怪的，是先有用而后有体。

人类与动物比较：动物是自私的，它看得近，它时时是当下。人类则恰好与之相反。动物时时是看当下，因为它缺乏想象与记忆，动物没有真的记忆，动物的记忆只是一种习惯，这习惯是由它的行动所成功的。柏格森分记忆为真假两种，以动物的记忆属于假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才是属于真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所以是真的，因为他有想象，有想象才有观念，这是人类心理超过动物心理的大关键。人类有记忆与想象，才能有策划，从新的策划才有创造。所以人类的创造是从记忆想象来的。记忆，想象，策划，就是超脱开了当下，这是人类长处之所在。

动物通通是自私，或说它完全无自私，因为它无自私的问题。人类有自私的问题，正因为他有不自私。拿人类与动物比较，其特点就在无自私。比如人当他作了不公平的事，他自

己知道，其良心不容自昧；又如当他理曲而强辩时，未尝不知自己之非；这足以证明他心中有个不自私，这就是理性。理性是大公无我的，理性中无自私。

《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1期，  
1936年8月16日。

## 我们当前的民族问题<sup>〔1〕</sup>

按我们开会的程序，本来报告与讲演是分开的，因为这两个项目都由我担任，所以联起来讲这个话。现在我所要说的有三点：一是纪念孔子；二是孔子的学说道理——本身的内容；三是眼前我们的民族问题。头一点，因为关于孔子的纪念，这些年来仿佛经过许多曲折，从纪念到不纪念，从不纪念再到纪念，在来回变动中可见不是没有问题，所以关于这一点似乎应当说一说。在说这一点的时候，就牵涉到孔子的本身，和他的学说、思想、道理是怎样？其价值又如何？所以有说第二点的必要。为什么说第三点呢？因为摆在我们眼前的有民族衰败，民族危亡的问题，在谈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都不能不联想到这一层，所以要讲第三点。把三点合起来，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题目。

头一点——对于孔子的尊崇纪念，在中国过去是一直两千年不变的事情，民国以来，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因为受西洋思潮的影响，大家对于孔子的尊崇纪念，有不同的意思发生。因为信念有动摇，所以前些年（民初）讨论宪法问题的时候，曾经有人主张要明文规定对孔子的尊崇纪念，同时亦有人反对这种主张，而主张对孔子不尊崇、不纪念，当时有很激烈的争论。

---

〔1〕1936年9月28日在孔子诞辰纪念会上之讲演辞。郝心静笔记，未经作者寓目。

那是头一次革命以后，及至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关于孔子的祀典，曾经明令撤废。对他的尊崇纪念，不过是近两年的事情。近两年因为尊崇孔子，又把他的后裔封作奉祀官，以永远奉祀先师。这都是最近所有的对孔子尊崇纪念的变动曲折。在这些经过的事实中，完全表现出来中国民族对于他从来的固有的文化的怀疑。而这个怀疑，在历史过程里边是不可免的。因为近百年来世界，对中国人说是一个太新鲜太特殊的环境，让他目眩五色，穷于应付，感觉十分为难。由于遭遇很大的不幸，所以很容易让他对固有的文化怀疑、反对，对孔子对儒家怀疑反对，这是不可少的现象。然则从道理上讲，到底纪念孔子有无意义？有无必要？是否值得我们长久纪念呢？这个意思亦就是说：孔子的学说、主张、思想、道理、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大的势力，在过去那个时候的社会有其贡献，有其价值，固无疑问，不然的话，从前的人也会不要他。可是现在想要问的就是他对今日的社会、未来的社会有无贡献，有无价值呢？如果有，则值得我们永久尊崇纪念；否则，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这个问题既不易回答，亦不是短时间三言两句话可论定的。不过，我多少可以说一点。这时候就牵涉到第二点——孔子〔学说〕的内容。

第二点——孔子学说本身的内容是怎么一回事呢！于人类现在、未来的价值如何？在我的认识，以孔子的思想道理，假设让我给他起个名辞的时候，我就说他是一个“中国的理性主义”。（我常常说理性两个字，同学都常常听到，这时候需要大家回想，才能帮助了解。）所谓理性主义，是一个不神秘，不超绝，而是容我们来推理的。孔子的精神、学说，是可以用“理性主义”以名之的，确实一点也不神秘，不超绝，真是很新鲜

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说新鲜特别呢？因为在那么一个古代的时候，人类的头脑思想都不容易开发，所有的文化没有不靠宗教来发皇；而中国就有孔子的与宗教相反的精神。我们翻开古代的经典，无论是回教的，佛教的，基督教的，没有比中国的经典那样子开明通达而少神话，少迷信的，这是顶特殊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孔子，无疑地他是超宗教、非宗教、反宗教的。他从来不大谈人死以后的事情，宗教则皆谈人死以后和一些鬼神的事，并且否定现世人生。如基督教、佛教、都以现世人生为人生的堕落，只有死了以后升入天堂，才算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孔子与此相反，他总是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对于神秘鬼怪亦都一概不谈，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这一个要点，可以见出孔子的非宗教、反宗教了。还有一点：他把最高的价值放在现世人生中，而不把最高的价值置诸超绝的地位。宗教则不然，它是把人与神看为截然两事；神者高不可攀，凡人无法作到，此即所谓超绝，即所谓宗教的态度。至于孔子所最尊崇的，所视为有最高价值的，恰好是人生，所以说“尧舜与人同”——尧舜是儒家最理想的人物，看着是最高的了；可是他说和平常的人一样，几乎每人皆可以为尧舜。如果是宗教，那一定把尧舜说成一个超绝的、高不可攀的。而孔子则告诉给人，最高的价值在现世人生，最可崇拜宝贵的是现世人生，这是很鲜明地非宗教的态度。大概，假定说孔子有一个成功，对人类有一个贡献，那不是别的，就是对人类的认识，认识了人是怎么一回事。除孔子以外，直到现在，许多东西洋贤哲都还对人类没有认识，说不明白。这个对人类价值的认识，是孔子特殊的贡献，其伟大处就是从这里成功的。因其有认识人类伟大的成功，所以假使人类不灭，人类

还有前途，在我看没有法子逃得开离得开从孔子那里所给与的帮助、启发。我常常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就是说人类还不应当有那样的文化的时候他就先有了。这个早熟的中国文化，亦即指孔子的理性主义。

上述一切，都是想说明关于孔子的尊崇纪念没有时间的限制，不是随时代的过去而过去的。他的理性主义，开明通达的道理，本不是在过去时代中所应有的东西，而竟然有了；他不但在过去时代有，并且要永远有。因为孔子没有旁的，只是要人反省、推理，让人往开明通达里去；“开明通达”，还有一天可以不要的吗？！理性主义没有过去现在的分别，人类如果有前途，一定是理性的开发，故孔子不随时代而过去。因为他的道理是人类的道理，他的成功是对人类的认识，其唯一推崇的即人类的价值。人类如何逃得开孔子？所以我相信将来的人类，对孔子的纪念、对孔子的学问所发生的兴趣，一定还要远过于今日；今日还未算多发生兴趣呢，至于象现在对孔子的尊崇纪念，由国家来恢复祀典，仿佛在政府方面极力提倡，这种事我觉得不一定是合适，至少于孔子的尊崇纪念没有什么大关系，没有大帮助，不能够就算是对孔子的尊崇纪念。因为孔子是理性主义，他所要的是道理，所拒绝的是强硬势力，道理与势力是不相容的。由政府提倡尊孔，就是用强硬的势力来提倡道理。可是道理究竟是道理，不能和强硬的势力合在一块，有势力提倡道理，则道理往往变成虚假的了。势力、道理、金钱是三样东西，道理不能与势力合，亦不能与金钱合，合则道理不成为道理而成为虚伪了。道理是“善”，善是我们所要求的，可是和势力、金钱渗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伪善。本来金钱和势力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好，为什么一提到人就不喜欢呢？就是因为以

它来左右人影响人是不应当的。从理性的精神最怕有假，金钱、势力不可怕，而是怕从金钱或势力上有了假。比如由政府来规定公务员读经尊孔，就是造作虚伪了。所以我觉得尊孔不必假势力以行，不必借政府提倡。政府要提倡也可以，然须在社会已经形成一个风气的时候，政府再来作，即没有什么不可，社会上犹不成风气，政府便这样作，就会玩成虚假了。这一层是从孔子的理性主义来的；理性主义拒绝这种提倡，和别的宗教不同。

第三点——当前的民族问题。现在我们的民族有一个顶不好的命运，也可以说是人家太欺负我们。可是光说人家欺负我们，这句话太不够，我们的命运如果由人家欺负不欺负而定，岂不糟糕！可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不好的命运呢？这无疑的是由于我们本身的衰败，才受人压迫。底下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民族复兴，从新创作；而在衰败与创作之间，有一最大的关键，我们不可不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衰败在那里？从那里创作起呢？其关键就在怎么样让中国人起劲，并且让这种劲成为一个劲。不起劲固然没有办法，始终要衰败；可是光发动劲，而四万万人有四万万个劲也不行啊！还需要把劲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力量才有用处啊！现在最糟糕的就是中国人大半都失掉了他的劲，而有劲的又合不来，就是这一个问题。在我看什么话也不用说，什么问题都不成问题，只要大家都有劲，劲是一个的，自然能解决问题。大家没有劲，或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还是办不了事。可是要发动中国人的劲，并且把劲归到一块去，这个事情在中国比在其他的民族难于作到，难得多！为什么中国人难得起劲？难得合起来为一个劲呢？此与孔子很有关系，亦几乎可以说（没有丝毫过分归罪于孔子的意思，我确很看清楚了这一点）：中国人的不起劲，劲之不能合一，由孔子一手造成。



你如果真知道其他民族的性格和自己民族的性格的时候，即可以明白。中国民族的性格，有一个特点，就是“缓慢”，慢就容易不起劲。而这个慢是从那里来的呢？实在是从理性主义来。理性主义是让人多想一想，不让人粗暴、鲁莽、冲动，因为冲动是最容易不合理的。想是什么？想就是慢；怎么样不慢？不想就不慢。孔子老是让人多想一想，所以脾气都慢了。中国民族最缺乏冲动性，老是不大着急，其他民族都是冲动性很强。比如象德国，欧战后失败到那么利害，所受的压迫枷锁、简直让他不能翻身，比中国人现在所受的利害得多；可是德国人在希忒拉〔特勒〕领导之下，又翻过来了，简直成了一个强国，谁都怕他。为什么他有这样大的劲呢？即因德国人冲动性很强，而希忒拉〔特勒〕能把德国人的冲动性领起来，大家和他一齐冲，旁人就不能不怕。中国人则适得其反。这是一层。还有一层，中国人也可以有劲，既非死人岂能完全没劲？可是中国人的劲来得细，也可以说他的劲很特别，都在里头来。更成为问题的，就是他的劲不容易合到一块。缓慢已经不足以应付环境，再合不到一块，更没有用处。其所以不起劲和劲合不到一块的，都是理性主义的关系。他老是让人想一想，老是尊重你个人的意思，要你自己反省，自己判断，所以有那么一个结果。可是这种态度，正与宗教相反。宗教让人跟着他走，孔子则让人各自判断，自省自主，因之，很难把许多的自主都不偏不歪的归到一条线上。别的民族最容易跟着领袖走，最容易有集团行动，中国人则最不容易如此。这个散也是从理性主义来的。一个慢，一个散，如果说是两个病，那末这病已深入中国人的膏肓，到了现在的时候，即将不治，所以应付不了他的环境。照我这个话，仿佛就应当埋怨孔子，不应当再纪念他了；然则不然！在底下我

告诉大家一句千真万真的话，这句话就是：想要中国人起劲，想要把中国人的劲合成一个，非让现在的中国人拐弯抹角，转来转去，转到对孔子的道理有认识的时候不行，非得转回去都没有办法！此刻中国人在意识上无统一之点，是最大的困难。而这个统一点一定要在孔子这个地方才找得到。现在都还未转到这个地方，所以合不来。等到孔子的道理贯通了每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心都通了，所有的不同的人都得了一个同，一切问题都可消逝，什么事都有办法！大家要明白，短处跟着长处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散和慢如果是中国的短处的时候，那末，这个短处也是从中国的长处来的。中国今日之所以失败，失败的所以如此利害，就是因为过去的成功太大。过去的成功既那么大，今日的失败亦必然地这么大，所谓“飞得高，跌得重”。大家不要光看短处，短处背后尚有他的长处。要知道，一个民族的复兴，没有旁的法子，只有竭力发挥他固有的长处，否则非自趋灭亡不可。要紧的是对自己的民族有认识，由认识而发挥自己的长处，才可以得救。短处不是取消所能矫正的，你发挥你的长处，自然弥补了你的短处。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弥补我们散、慢两个短处，就得要尽量发挥我们的长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成功由于孔子，今日的失败由于孔子，而将来的再成功还得从这里来，反正出不了这个圈。因为这个圈太大了，是全人类的范围。现在我结束我的话：中国民族的复兴，诚然是要发挥他固有的长处，而固有的长处在那里？千真万真地要从孔子那里找，没有法子急，没有法子快！同时再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人就得起中国劲，中国人不能起外国劲；中国人不会起外国劲；有些中国人想要起外国劲，是起不来的。

《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4期，1936年10月1日。

## 对于人类女性的认识<sup>〔1〕</sup>

我告诉大家一句话：人类最要紧的一样东西，——不但人类，也可以说是一切生物最要紧的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知觉痛痒”。普通我们说“有生命”，说“活东西”，活东西之所以为活东西，就是因为他有知觉痛痒；如果没有知觉痛痒，便不能叫做活东西，便不能算是有生命的了。这样说法，好象是很容易明白；但是实在有很多人（不只是现在的人，就是历史上也有很多人是如此）都已离开了他的亲切的知觉痛痒，都已失去了他的亲切的知觉痛痒，都已找不回来他的亲切的知觉痛痒。这实在是因为人类生命中隐藏着一个大的矛盾，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情。

以上这个话，大家听了也许不容易懂，现在我先从这一面的话来说。一个生物的知觉痛痒的大小高低，也就是显示他生命的大小高低，显示他在生物进化上程度的大小高低。例如人类的知觉痛痒比任何生物都来得高，来得大，来得快，来得强，来得远，来得深，来得厚，来得宽，这就是因为人类的生命，特别高大，他在生物进化上已登峰造极。以此例推，则高等动物比低等动物的知觉痛痒来的高大，低等动物又比植物的知觉痛

---

〔1〕1936年在山东省立十二校师范女生乡村服务训练处的讲话。侯子温据听讲人记录整理而成，曾经著者阅订。

痒来得高大，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毫无疑问的。那么，如此说来，人类最可宝贵的，就是他那高大的知觉痛痒了。翻过来说，一个人的知觉痛痒如果不够，不及人类应有的程度，那他也就不能算是一个人了。

现在再回来讲。所谓人类生命中隐藏着一个大的矛盾。这话是指什么说呢？这就是说：在知觉痛痒高的人类，同时让他也顶容易离开了他的知觉痛痒，顶容易有离开了他的知觉痛痒的机会。换句话说，容易离开知觉痛痒，与知觉痛痒的高大是相因而来的。人类在生物界中，一面他的知觉痛痒比一切生物都高，一面他也顶容易离开了他的知觉痛痒，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类生命中隐藏着一个大矛盾。——这个话，大家听了或者还不能十分明白，只好以下我再慢慢的解释，现在我且重复的说一句：人类最大的问题，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把他的知觉痛痒弄错乱了，弄麻痹了，这是最悲惨，最可怜的，所以大家切不要丧失了自己的亲切的知觉痛痒。

在这里为免除大家的误会，为使大家容易了解，对于“知觉痛痒”一词，还须要更明显的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知觉痛痒，并不是指肉体上的知觉痛痒——如某处受伤破了，或某处被蚊虫咬了一口……种种的痛痒，我们所说的不是指的这些，而是一种隐喻的话，是指超肉体的知觉痛痒说。因为只有低等动物的痛痒，才单限于肉体皮肤上（皮肤上因受某种刺激而起痛痒），人类的知觉痛痒则已高过肉体的，高过皮肤的。我们所说的知觉痛痒，是指感觉问题说。换句话说，那个最亲切的地方，心里最难过，最关心，最注意，最不能放松的那个地方，才是我们所说的知觉痛痒。

亲切的知觉痛痒，是我们人类的根本。我们最好的时候，也

就是我们的知觉痛痒最清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最有力量的时候。但是，可怜呀！很多人的知觉痛痒都不清楚了！都已丧失了！都弄麻痹错乱了！生命都没有力量了！因此他也就不能判断事情，不能办理事情，更不能去发挥他的创造力量。虽然有的时候，从表面上看他好像也很有力量，但那都是假力量。——没有亲切的知觉痛痒，不是从亲切的知觉痛痒来的都是假力量。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这就是因为，在我看，现在关于妇女生活，女子教育，妇女的种种问题，都是不合适的，都是不自然的；在我的感觉中，仿佛都是刺耳刺目刺心的。——当然让我刺耳刺目刺心的，不只是妇女问题，现在人类社会上，到处都是让人刺耳刺目刺心的事情；不过，讲到妇女问题，也是让我刺耳刺目刺心的。现在关于妇女问题，有许多主张、理论和办法，在我看来，都是从知觉痛痒的错乱来的，都是我所反对的。——我这个反对，好像是不能不反对，因为在我看，那许多主张、理论和办法都是与我的亲切的知觉痛痒不相合的；从我的亲切的知觉痛痒来看，那许多主张、理论和办法，都是让我刺耳刺目刺心的。所以我不能不反对。

我常常看见有一句批评人的话：“言不由衷”。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的确，有许多人都是如此。一个人说了一大篇话，都不是他真想说的，都是“言不由衷”的。换句话说，他所说的话，都不是从他那亲切痛痒的地方说出来的。不但说话有“言不由衷”，就是我们的行动、做事，如果不顾到我们的亲切痛痒，离开了亲切的知觉痛痒，也都算是“言不由衷”。翻过来说，我们说话、做事，如果能“言由衷发”，所说的话都是自己心中真正想要说的，一字一句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想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就做什么，说话做事都有根据，有渊源，都是从亲切的

知觉痛痒来的；如果能这样说话做事，那么，大概都是对的，有价值的，有力量的，可以让人听了见了点头，可以从你生命力的动（说话做事都是从亲切的知觉痛痒来，便是生命力的动——原编者注），也打动了他的心，让他动。——这就是通常说的：能感动别人。可是，如果“言不由衷”，那真是冤枉了我们的为人，真是可惜可怜！所以我开头就向大家说：我们不要弄错了我们的知觉痛痒，不要失掉了我们的知觉痛痒，我们要把亲切的知觉痛痒找回来。不然我们如果失掉了亲切的知觉痛痒，那便会成了一个傻子，一个疯子，一个不健全的人，那是最可怜的！

那么，你们每一个人都想一想，你最亲切的知觉痛痒是什么？你最亲切关心的是什么？在你心里最占位置的是什么呢？本来最亲切关心的问题是各不相同的，即一个人所关心的问题，也不一定是固定的；但总有比较关心的事。现在我就是要你们各自想想你最亲切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我们不是专来找那关心的问题，不是专来找那关心的事情，而是要找那亲切的知觉痛痒。不过，这个亲切的知觉痛痒是不好找的，必须从最关切的问题上来找，好象温书一样，借着所关心的问题，把那亲切的知觉痛痒温回来。

但是，如果要问：我们的知觉痛痒为什么会亡失了呢？为什么会离开了呢？我们的要求为什么会不对了呢？我们的知觉痛痒为什么会错乱了呢？——痛痒是这里，而偏要说是在那里，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前边所说的“人类生命中隐藏着一个大的矛盾”的原故。前边我们已经把这句话，约略的讲过了，现在再把它来详细的解释解释。所谓“人类生命中隐藏着一个大的矛盾”就是说：一面人类在生物进化上，程度比一切生物都高，他的知觉痛痒比一切生物都来得宽大深厚；而另一面他

也顶容易离开了他的知觉痛痒。这就是所说的大矛盾。可是，如果再追问，为什么知觉痛痒的程度宽大了，就顶容易离开呢？这是因为人类的知觉痛痒程度特别高大，范围特别宽广了。则他的变化也特别多；程度高大，范围宽广了之后，它里面便隐藏了一个多方面的可能性，活动不定性。而因为多方面可能，活动不定，所以就顶容易错乱，顶容易离开；错乱的机会，离开的机会，就特别多了。反之，我们看低等动物，倒很保险，决不会离开了他的知觉痛痒。

大家如果留心看我发表过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有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见本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第10节，第5段。）这句话很要紧，如果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明白了人类；人类最可宝贵的，就在他具有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从人类往下说，各种生物差不多就都没有什么错误可言了。——高等动物还可以说是有错误，而低等动物就没有错误可言；再说到植物，则更无所谓错误了。如草木就是呆板的在那里生长，说不上有什么错误不错误。越到自然，越含有机械性大，也就越没有错误可言。翻过来说，越容易错误的也就越远于机械性。人类之所以特别容易错误，就是因为他的自由活动性特别大。

人类的错误，若细分起来，可为两种：一是知识上的错误，二是感情上的或行动上的错误（普通叫做道德上的错误）。这两种错误是相关的。现在我们举感情上的错误的例来说；譬如从感情上说，我要爱我的弟弟，如果不爱，就算错误。再如父母爱子女，也是从情感来的，从情感上说，父母是应爱子女的，可是有的父母竟不爱他的子女，这便是一种错误。而这种错误，只

有人类才会有；其他动物是不会有这种感情上的错误的。例如大狗爱小狗，大鸡爱小鸡，照例是如此，不会错误的。这就是因为他的程度低，根本没有错误的可言；所以我们对于生物，可以从他错误的多少，来判断他程度的高低，人类最容易错误，所以他的程度也最高。这话说来很奇怪，好像是矛盾，其实并不奇怪，本不矛盾；正是因为他的程度高，知觉痛痒比一切生物都来得大，来得宽，有多方面可能，活动不定，所以才容易错误了。而这个最容易错误，也就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了。——不过，这里大家不要误会，我们说最容易错误为人类最可宝贵的，意思并不是说错误为可贵，而是说人类有一副最容易错误的才能为可贵，是说他不甘于错误，而要求一个“对”为可贵。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错，怎样才能求得一个对呢？那就要保持着我们的亲切的知觉痛痒，不要丧失了我们的亲切的知觉痛痒。因为如前边所说，从亲切的知觉痛痒而来的说话做事，大概是不会错误的，是对的。但是，可怜呀！有很多人都已失掉了他的知觉痛痒，都已失掉了他的宝贝，失掉了他的心，失掉了他的精神；以至变成了疯子，变成了傻子，这是多么可怜啊！

知觉痛痒的错乱，说话做事的错误，有的是由个人来的，责任是在自己；而更多是由社会来的，因为大家都错误，也让自己跟着错误，这种错是难由自己负责的。例如中国妇女缠足，为求好看而残害自己的身体，这就是由于知觉痛痒的错乱而来的，这是一种错误，但这种错误，能让妇女个人负责吗？！不能，这是社会的责任。妇女缠足，不是妇女个人的错，而是社会的错。——这不过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其他错乱的事情还多得很。总之，在我们看来，现在女子的生活，很多是象缠足的例子一样，都离开了她的亲切的知觉痛痒，走入错乱，以致摧残



了她的生命，破坏了她的生命，而陷于不正常，不自然，这都不对的。所以对于现在女子的生活如果让我说我心里的感情，让我以我心里的感情来说话，那么，我将要连着说几个：“不对呀！不对呀！不对呀！”——这个意思，还是前边我们说过的，现在关于妇女生活、妇女教育、妇女的一切问题，有许多主张、理论和办法，而这些主张、理论和办法，在我的判断中，都认为是不合适的，不对的，都是使我刺耳刺目刺心的。

如果从我现在的心情来说，对于女子生活，我应当尽我一生的力量去调整它，纠正它，我应当纠正那一切的错误（妇女生活的种种错误）。不过，在我心里还有更大的、更深刻的、更亲切的痛痒——就是整个的社会大改造问题，文化大转变问题，民族自救问题；因为我有这更大的问题，所以我的力量就得向那方面去用，不能单用到这方面（妇女问题）来了。现在我只能把我的意见说给大家，希望有心的人去作，尤其是希望女同胞，希望女同学去努力！

妇女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中或说是文化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它是跟着社会大改造，文化大转变的问题而来的。“社会大改造，文化大转变”，现在世界各国差不多都要遇到这个问题；人类历史走到现在，差不多是到了一个要大转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现在也正好碰在这个当口上，所以我们也要有社会大改造，文化大转变的问题。而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正是完成这个社会改造工作的，所以我们对于社会问题之一的妇女问题，也是我们所考虑的。不过，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平常没有谈过，现在就把它来给各位谈谈。

我也承认妇女问题是一个问题，在社会上妇女的地位，妇女的生活，有改善的必要。不过，从妇女问题的发生，妇女生

活要求改善的风气来得太猛了，因而就有了许多不合适，不妥当的地方。例如一般人常常拿女子与男子作比较，要女子与男子一样，在社会上，女子的地位，女子的生活等，都要与男子相同，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是不对的；这是因为要求太猛而有的疏忽，是缺乏考虑，没有审察而有的错误。

过去历史上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例如我们现在要求妇女生活改善，正是要反对过去），可是，虽然不一定全对，也有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我们看了过去历史上的事情，也能帮助我们现在的思想。那么，我们看过去历史上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呢？过去妇女在社会上是从来不占重要地位的；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来看，大体上都是如此的。妇女在政治上不占重要位置，在军事上不占重要位置，在经济上也不占重要位置（在经济上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中，女子都不算重要）。——不过，这个说法，是说的的大体，就世界各国一致的情形来看，大概是如此的。而这里面也不免偶有例外，不免有特殊的例子；因为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里面，常常有极端不同的风俗习惯。例如有的社会是女子常在家里，男子常在外边；而有的社会却是男子常在家里，女子常在外边。在后一种社会里，在生产上，男子反不及女子出力多。类似这样的例，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总之，因为人类是有无限变化与可能的动物，所以在不同的文化里，常有极端不同的风俗习惯。但是，这究竟是特殊的例外，就大体上看；女子在社会上多半是不占重要地位，总可以看得出来的。

可是现在或者有人要提出这么一个反面的问题说：“女子所以在政治上、军事上与经济上没有地位，是由于男子的压迫与阻碍。”这是一个很粗浅的问题。在我想，不见得就是这么回事，

到处的男子偏能压迫女子，那有这么巧的事？！她所以在政治上，军事上与经济上没有地位，恐怕是另有原故，换句话说，她有自身的弱点，才有男子的压迫。就让我们承认男子压迫女子是事实，那么，也必定有它的道理。——天地间的事情，只要是存在的，就有它的道理，就有它的来历，都是合乎自然的。不过，有的是不能合乎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的要求是主观的，自然的事实不见得都能与我们的主观要求相合。

从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就可以见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现在我们就把人类在自然中所占的地位来分析一下，——从人类生命，人类心理来看，把人类在自然中所占的地位分析一下。这个说起来很多，一时说不尽，现在我只能简单的给大家讲讲。大家要知道，人类是唯一能代表宇宙大生命创造不已的精神的，在生物进化上，其他生物都沿途停顿下，盘旋不进。例如植物进化到植物那个地方，就盘旋不进；动物中的节足动物，脊椎动物中的鱼类，鸟类，哺乳类，猿猴类等等，都是各自进化到它那个地方就停顿下了。生物界中，除了人类以外，都已不能代表宇宙大生命创造不已的精神，都已落到刻板文章中，返来复去，老是那个样，没有变化，没有创造了，只有人类尚能代表宇宙大生命创造不已的精神。前边我们说：“人类有无限的变化与可能”，“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有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这两句话很可以供我们参考，很值得我们思索，这都是说明人类是富有创造性的。因为只有人类能代表宇宙大生命创造不已的精神，所以人类就成了宇宙的中心，作了宇宙大自然的主宰。本来在大自然中，一切东西都有变化的可能，不过，变化的可能性大小不同。生物比无生物的变化可能性大，高等生物又比低等生物的变化可能性大，而人类的变化可能性最大，

他的力量最大，所以他就成了大自然的主宰。

我们很可以把人的一条生命，看成是一个力量；而男性与女性，恰好是不相同的两个力量。——我们若从大自然上，从生物学上来认识女性，就可以知道男性与女性，恰好是不相同的两个力量。这话怎么讲呢？因为就生命来讲，单是一个男性，或单是一个女性，好象都不是一个完全的生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必须男女合起来，才算是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在生物学上有所谓雌雄同体与雌雄异体之说，在进化较差的生物中，有的是雌雄两性同体的。雌雄异体，两性分开，是个进步，是进步了以后才分的；原来是不分，是一体上见两性的。你如果知道他原来是两性一体，那么，就可以知道他现在分开了，一定都不是完全的。虽然双方都含着另一面——这一面包含有那一面，那一面也包含有这一面；男性包含有女性，女性也包含有男性；但终究是不够，必须男女合起来，才算是整个的完全的人。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意思，不要忘记男女原来是一个人而分开了，所以每一面都不是完整的。因为不是完整的，所以也正好是不同的（如果是同的，便是整个的，无须两面合起来才算整个的了），这一面正好是不同于那一面，男性与女性，正好是不相同的两个力量。

我们用阴阳二字，来代表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很合适。——大家不要觉着阴阳这两个字太旧，其实它的意义并不旧，它只是表示不同的两面。现在学术界谈的最热闹，最有兴趣的，就是这个阴阳不同的问题。现在虽然有的是不用阴阳这两个字，可是他所谈的意义，与从前的意义（阴阳二字所含的意义），仍然是没有两样。我虽然不爱谈学问，可是我知道现在学术界谈得最热闹的，就是这个问题；并且越是在科学发达的地方，对于

这个问题研究得越深刻。总之，阴阳二字，正好代表女性与男性的不同。

男性与女性既然是不同，所以就不应当去求同；如果强要去求同，那便是反乎自然，背乎自然，就是一个主观上的错误。

我也承认妇女问题，在现社会中是一个问题。妇女生活须要改善，妇女须要解放；但怎样改善？解放到那里去？是很待研究的。

大概在生物界中，每个生物，每个生命，本来都是完全的，囫圇的；可是，如果把他们放在一块来比较着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是各有所偏的——这个偏于这一面，那个偏于那一面，都不是均衡的，圆满的。这仍然是前边我们所说的那个意思——男女不同的意思。男性与女性，也好像动物与植物一样，都各有他不同的偏向。本来在最初的时候，动物与植物是没有分别的，后来进化了，动物与植物才渐渐的分开。再说雌性与雄性之分，也是后来的事情。可是原来虽不分，而在初分的时候，就各自代表一个偏向，向着他那偏的方向去发展了。各自顺着他那偏向去发展，才能够完成他自己；所以我们对于男性与女性这两个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发展，不应当强使他相同。本来不同的，而强求着相同，是错误的；把宇宙间本来不同的，硬要他向相同的方向去发展，这是最不合乎客观事实的大错误。

普通有许多心理学家，常常来作男女以及儿童的智力测验、心理测验等，作出许多统计比较，想从这种测验比较里，求得男女智力上心理上的异同。其实这是求不出来什么结果的。这种方法，不是一定不可用，但根本不会有什么重大发现；甚且〔会〕发生错误的推论。因为前边我们不是说过吗，“每个生物，

虽然都是囫圇的，但若比较着来看的时候，则各有所偏，都是一个偏向，都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如果不看他那个偏，不理睬他那个不同，而硬要叫他同，叫他向相同的方向去发挥，去发展，这虽然也是可能的（例如要男子勉强像女子，或要女子勉强像男子也都是可能的），但是错误的，不对的。在生物界中，各种生物，通统是各自代表一个偏向。——动物中的某一种某一类，植物中的某一种某一类，通统是各自代表一个偏向。如果能顺着他那个偏向去发挥，去发展，才是进步的，否则便是往退步的路上走，那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是背乎自然的。所以我们要避免那种背乎自然的错误。不但要避免了那种错误，更进一步说，我们既然知道了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男性与女性是各有所偏，各自向着他那个不同的偏向去发展才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应当拿自然天赋的可能性——也就是通常所说“才”（包含身心）去圆满的发挥发展，使它没有缺憾。

讲到这里，我想叫大家再回头看前边所说的话。前边我曾说过：宇宙大生命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是创造不已的，是不断的向上翻新的；而在生物界中，只有人类尚能代表宇宙大生命创造不已的精神，所以人类也最富于创造性，不断的向上翻新。又说：人类有无限的变化与可能，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有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就在他不甘于错误而要求一个对。从他这个不甘于错误而要求一个对，从他有无限的变化与可能，所以他不断的改良自己，不断的向上翻新，创造不已。那么，在人类中的男性应往哪条路上去创造？女性应往那条路上去创造呢？换句话说，男性应干什么？女性应干什么呢？这个，天已经给规定好了，安排好了，怎样规定安排的呢？就是：男子是直接的创造，女子是间接的创造。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男

子的使命是创造，女子的使命则是创造那创造的根本——就是创造人。仿佛在自然的（天的）安排里面，说人（这里所用人字，与普通用法不同，不是指人物之分的人，而是指能代表宇宙大生命创造不已的精神之意思——原编者注）就是指男子说，女子则是人的根本，人的母亲，她不能直接作人的事情，而是作创造人的事情；自然的安排，恰好是如此。

人类和其他动物比较，和一切生物比较，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生命已由身体里解放出来（生命从身体里解放出来多少，也就是他的智慧的多少）。一切生物差不多都被限制于身体，其智慧的役用，都被限于生存问题上，他的才能只能够维持他的生存，不能超过生存问题而另有所创造了。人类则能超过了生存问题，他的智慧除了维持生存问题的需要外，尚能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向上翻新。

有个生物学家曾经这样说过：人类和其他动物，都好象猴子被铁链拴着，任你怎样跳跃，也不能跳出那铁链一定的限度。而人类恰好象一个有力的猴子，猛然一跳，把铁链扯断了。铁链的长短度，比喻生存问题的范围。人类最初也和其他的猴子一样，待到进化之后，遂扯断了铁链，脱掉了生存问题的束缚，可以任意的跳跃了。他这个话即是以上我们所说的：“人类的生命已从身体里解放出来，不受生存问题的限制”之意。总之，人类之所以富于创造性，所以有无限的变化与可能，以及其感情的深厚，脑筋的复杂，一切种种，说不尽的人类的特长，都是从这里来的，都是从这个大解放来的。所以我们说人类和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最大的特点，就在他的生命已从身体里解放出来。

“人类最大的特点，是生命从身体里解放出来”，我们从这

句话来看男子、女子与小孩三种人的不同，就可以知道：男子是最能超脱身体的限制；女子是受身体的限制最大，小孩的生命则与他的身体是囿囿一致的。这是三种人不同的地方。那么，所谓女子受身体的限制最大，是指什么说呢？就是说，当女子到了相当的年龄，已不被称为小孩，而被称为女子的时候，她的问题就发生了，问题就来了——这就是说她已经开始有月经了。有月经的开始，就是她受限制于身体的开始。月经这件事情，对于她的影响很大。月经正来时，总有三天的不自在。月经以前以后的好几天，亦都要受影响。在这个时候，她的感情、思考，都受身体变化的影响而亦发生变化。等到有了两性关系，怀了孕之后，更要被困于身体了。一直到生了小孩，乳养小孩，仍然时时要继续受身体的限制。及至妇女不能生养小孩，那也就是一个女性到了生命衰老的时候了，人生不行的时候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女性的任务是什么？女性的使命是什么了吗？！而另一方面也就证明女性是不能作直接创造工作的了。——因为直接的创造，须要生命能超脱身体的限制，而女子是受限制于身体的，所以她不能作直接的创造，只能作间接的创造；这也就是以上我们所说的：女子不能直接作人的事情，她是作创造人的事情。她的创造，是创造人，创造“创造的根本”。

人类社会到现在，虽然比过去是进步了，可是离人类应有的社会还很远。因为就现在的社会制度来看，尚没有能给每个人一个创造的机会；最显著的就是机械的呆板的来用人的劳力——用人身体的气力。机械的呆板的来用他的气力，是最不能够让他发挥他的创造性的，社会不给人一个各自发挥创造性的机会是不对的。同时男子的创造应走什么方向？女子的创造应



走什么方向？更是没有认识清楚，因而就发生了许多可笑的可惨的错误的东西。男女的力量，都没能向正当的方向去发挥，人类的力量没能够尽量的适当的去发展，这都是现在社会的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的社会，离人类应有的社会尚远得很。

可是，我们知道了过去的不对，而要向对的地方去走，也是很不容易的。关于现在妇女的种种错误（要向不对的方向去发展），也是没有办法的，在妇女解放要求过猛的现在，也是不得不然的。不过，我们既然知道不对了，总要想法子改正，虽然不容易，我们也得去努力。那么，我们怎样去改正？怎样是往对的方向发展呢？那就是以上我们所说的：女子不能负直接创造的责任，她只能作间接的创造，去创造人。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女子唯一的责任就是生育吗？”我将答曰：“是的，对的，女子的责任就是这样！”不过，大家不要把这个看得这样简单，以为不用心，不研究，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其实女子要完成这种任务，是很不容易的。女子要完成她这个任务——创造人，必先创造自己，在创造人类后代之前，先要创造自己（因为必须自己好，才能生育好子女，才能真能完成了她的任务）；而创造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女子要想真能完成她的任务，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总结以上的意思来说：人类的特别处，就在他的聪明智慧。而男子是将他的聪明智慧用在身体以外的各方面——如学问与事功；女子则用在身体本身上。——这不只是求身体的健康与美（自然健康与美也包含在内），主要的是发挥她的聪明智慧在她身体上，冀成功一个高等的身体，又优美又聪明又伟大的身体。这是我们理想的女性。不过这与现在社会事实也许离得太远。那么，我就再说两句比较能切近大家的话：一、要

理会女性与男性的不同，不要勉强求同，违反自然。二、不要离开了自己的那个亲切的知觉痛痒，要找回来自己的那个亲切的知觉痛痒；自己说话作事，都要从亲切的知觉痛痒出发。要真的是从亲切的知觉痛痒而来的要求（真的是要求这样说，要求这样作），那么，你的说话作事，就大致合于女子本性，合于自然了。

《梁漱溟先生讲演录》，

1936年9月

## 帮助大家讨论问题作一准备<sup>〔1〕</sup>

### ——指点给大家讨论问题时应有的一个眼光

我今天所讲的话，是想帮助大家讨论问题作一准备，指点给大家讨论问题时应有的一个眼光。大家从乡下实习回来，带来了许多问题，将要讨论，在讨论时候，不能不需要一个眼光，我愿意在这种地方帮助大家。我这个眼光，是经过锻练而来的，并非是主观的理想。本来一个人注意到那里，总是时时刻刻地注视那里，我的话也就是从我的注意点而来，不知大家能体会到不能。我所最注意的是社会秩序、社会构造，我始终着意于此。现在我也许换一个说法来说，但含意仍旧也。

就我所认识的，中国唯一的大问题，我叫作“文化失调”。“文化”在这个地方，即指社会构造、社会秩序而言。社会构造、社会秩序，实在就是文化的骨干。中国近百年来的问题，即由于中西两个不同的文化接触后，遂引生中国文化的变化而来的。西洋近代的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相遇之后，让中国文化一变再变，不能自己，直到现在尚在变中，还没有变完。所谓文化失调，就是指这个变化犹未得结果而言，所有的中国问题都在这里。那么，两方文化见面为什么就引起咱们的变化呢？这

---

〔1〕在山东省立十二校师范女生乡村服务训练处的讲话。郝心静记录，未经著者寓目。

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呢？此则很容易看得出是因为我们的失败而引起一般人的着急，于是要求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于是决定了我们不幸的命运。我们的这个失败，无法否认，从失败乃引起改造变化，亦是显明之事理，无待说明。我所要说的，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变化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认识这个变动之所自。这个变动，自然是因为以前的中国被外国打了好多败仗，外交、政治、着着失败，引起大家的恐慌、害怕、着急，自己才要求变法维新，举办新政，以至革命。可是其中还有一个很好的伟大的动机，即新理想的追求。我相信中国的维新、革命，以及各种运动里面，都有不少的人是从这一个动机来的。因为外来的文化启发了我们对于人生、社会的许多新的理想，让我们这爱讲理的中国人（中国人原富于讲理的精神，勇于服善的精神，而喜欢奔赴理想），对新的理想发生了追求的活动。这种追求，不但是中国变化的动机之一，而且是顶有力的一个动机。虽然本着这个动机的人也许不是多数，理解的人也许不普遍，可是尽管人少，表面看象是力量不大，而其实这个力量是挡不住的。因为追求理想是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有根的东西，最是没法挡住他的。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前途，是不达于理想不止”。当初那一动是从这儿动起，则非得一个结果，满足了其当初的要求，他才能老实，不然的时候，他总不肯罢手。因此，我又常常说“社会改造”。大概必须从社会改造来达到民族自救；单说“民族自救”，忽略了社会改造，忽略了理想的追求是不行的。民族自救是很粗浅的要求，仅仅是要求民族不亡，不过等于一个没落的家庭要求复兴一样，希望不大。不知假使我们放弃了很高的理想，放弃了社会改造而单讲民族复兴、民族自救，是不够的，亦不会成功的。

如果我们更进一层的来看中国社会的变动之所由起，则又可看出这个变动是从我们固有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有缺欠，不完美，所以才引动了我们对自己固有的传统的文化、思想、观念，有一种厌弃、反抗的心理。这个话与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刚才说中国社会的变动是从对新的理想追求而来，其实那个新的追求，是从对旧的文化的不满意才有的。这个不满意，并不是误会；我们固有的文化实在有缺欠。懂得这个意思，则可帮助明白现在所要讲的人生理想了。不过，如果我们单讲人生理想则未免太抽象，恐怕大家不容易明白，并且话也许说得很长，多费时间；所以不如换一个方法：讲人生理想从实际问题讲起。

实际问题是什么？就是大家所说的，据你们在乡下调查，妇女问题当中以婆媳不和、妇女居寡者为多，这都很具体。从这居寡的多，可以看出与早婚有关系，又可以看出与中国人看重有后有关系。可是居寡的人再嫁好不好？怕没有后的念头正当吗？我此刻就想从这些实在问题上指点起，让大家明白所谓中国固有的人生理想者，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现在不想很具体的替你们解答问题，这些都留着给大家自己去谈，我只帮助大家一个眼光。

我告诉大家：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从人生理想那个地方就冲突不合（在这里我找补几句话：中西文化相遇，中国为什么一变再变，变之不已？即因中西文化的距离太远，相隔的度数太大，所以难于调和，引起中国文化失调的期间长久。什么叫做距离大呢？就是说他的不同是一个深刻的不同，从人生理想就不同；如果只是文物制度的不同，倒是距离近了）。现在我指点这个地方让大家看；所谓人生理想的冲突不合；是一个大

的问题，包括了那些零碎而具体的问题。中西人生理想之不同，大家也许可以想象一些。——我们此地所说的西洋，是指的西洋近代。在他的历史上，近代是另一个样子，近代的前后都不相同。中国这一面，则两千年相传，大致地是一种人生理想，除了目下从外来的不算以外。这是我应当提醒大家，让大家注意的。说到西洋近代以前的中古，那是纯粹的宗教时代，彼时人生理想完全宗教化，从宗教而来。最可注意的就是他否认现世人生，绝对禁欲主义，以为活着即是一种堕落，一种罪恶，生前必须绝对禁欲，死了才能回到天堂。近代的人生理想不然，恰好是中古人生理想的反动，不但承认现世人生，并且追求现世幸福；不但不禁欲，并且承认欲望是个必要，是个天然的；欲望就是人生，人生就是欲望。从禁欲转到欲望本位，这是近代的色彩，近代的风气。可是这不过说了近代色彩的一面一点，尚未完全。还有什么呢？最可注意的就是在中古的时候他有集团生活，对个人干涉过强，于是近代就来了一个反动，此即个人主义的抬头。个人主义的内涵，并不像一般中国人把西洋名辞滥用误解的那个样子，一提个人主义，即视为是自私自利。其实个人主义是一种正大的主张，一种很有道理的理论，就是对待团体主义、社会主义而言，和哲学上有所谓唯心、唯物一样。个人主义的见解，简单说是这样的：“团体是干什么的？它不过是个体的集合；其目的亦无非为的个人；无个人何有团体？更岂可以团体而抹煞个人？所以应当抬高个人在团体中的地位，看重团体中的各份子”。这就是个人主义。又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几乎异名同实，都是拒绝团体的过分干涉，而主张个人自由。个人自由的要求，与欲望本位正好相联。因为他看人生就是许多欲望的满足，人生的意趣就在有现实幸福，所以妨碍了他的自由

的时候,当然不能答应。妨碍自由就是妨碍了欲望、妨碍了人生,故对自由问题坚不让步,而极力要求现世幸福,要求欲望满足,这是相因而来的。

底下接着要说的,就是和自由相关的平等的意思。在西洋,所谓平等,系指个人在团体中大家地位平等,在国家法律上大家地位平等。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对照比较才容易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意思要求,都是从反面来的;没有反面不会形成一个很清楚的要求。西洋人以前不平等,所以他有平等的要求。同样的,也是他以前不自由,所以才有自由的要求。过去的西洋,真是把人看成两种,有的算人,有的就不算人。比如中古时候的农奴,中古以前的奴隶,都很清楚地没有自由,别人拿他不当人待,当做货物。他必须脱离了农村,跑到都市经过一年以上,才算是自由民,或曰市民。市民与农奴即恰好不同,市民是有自由的,所以又叫作自由市民。市民又与公民不同,市民虽然都有自由,可是不见得都是公民,必须经过国家正式承认,确实认为你是团体的一份子了,你才算得上是公民。他们的这种不平等很清楚,所以后来也就发生很清楚的自由平等的要求,以尊重个人自由,大家一律平等,享受现世幸福,为其近代的人生理想。他这一种人生理想很可注意,因为西洋中古时候的人生理想,不是正面文章,而是准备文章,近代的人生理想才是正面的文章。至于此后最近的人生理想,可以说也不是正面,只不过是近代的一篇修正的文章。中古、近代、最近、这三个段落,要以中段为主,所以谈到人生理想,便不容我们不注意他的近代。

西洋近代人生理想与中国人生理想有什么冲突不合呢?类乎前边我们提出来的婆媳不和、居寡再嫁等问题。大家也许可以隐约地感觉到在这些上面西洋人的一个态度。比如婆媳之间,

他们平时分开过日子，既不相关属，当然也就不似中国的情形，作媳妇的一面仿佛太没有自己，若为婆婆之所有一样。媳妇太像婆婆之所有，即与个人本位完全相反，西洋人不能承认。这些地方都是个人本位的表现。再如居寡的问题，中国人或者偏于不再嫁，西洋人则或视再嫁为当然的。这些地方又和所谓追求现世幸福，欲望本位相关。在这两个例上，恰好表现了西洋的两个理想要求。这不过是举例而言，其余大家可以推想。一切都无非是这个问题——西洋人个人本位，拥护欲望。在任何地方看中西不同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西洋人为什么这样主张？其背后无非是这两点：个人本位，欲望本位，着重个人现世幸福。这两点在西洋人生理想上顶重要，大家务须体会！

下面再说中国的一面，中国为什么和西洋冲突？他（中国）根据一个什么道理？在这里我们要分开说，道理是一件事，而真正冲突最大的还不是道理的问题。道理的冲突尚小，真正冲突是最大的社会事实，落到事实上比在理想上的冲突严重激烈，不可躲闪。我们要找清中西冲突之点，一面要从道理上找，一面更要把道理以外所有的事实的冲突看清楚，找清楚。所以我们分开来讲，先讲道理的冲突，后讲事实的冲突。现在就试为说明中国所根据的道理——人生理想。

中国所根据的道理有两点（也可以说是一点，我们为讲解方便，故分而为二）头一点：中国恰好和西洋人错开了，西洋中古人的理想他（中国人）没有，近代的人生理想他也没有，他所有的正是西洋中古与近代之间的那一个，和中古近代都恰好不相当。西洋中古所有的人生理想，是一种宗教的，禁欲的，对现世否定的；而中国是缺乏宗教的民族——代表中国文化，作文化中心的是儒家，即孔子所代表的。可是孔子永不说死后，亦



不语怪力乱神。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和宗教恰好不同。我们所以说他与西洋中古不相当的，便是因为他不禁欲，不否定现世。至于西洋近代呢？又是个人本位，欲望本位。欲望本位则承认现世，追求现世幸福。本来在承认现世人生这一点和儒家很相近，可是说到欲望，说到追求现世幸福，就很不相同。怎样看出来呢？最清楚的是你看他所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话，这与追求现世幸福太相反了！追求现世幸福就是要吃好的，穿好的，满足欲望，过幸福生活。而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这个意思，和西洋实在太不合！可是我们如果追问中国人，不要现世幸福是什么呢？而他眼睛里所看的，确有重于现世幸福者。他有一个更强的要求，更高的理想，超过了“过幸福生活”，因之就把这一点看轻了；并不是不要，并不是禁欲主义。整个的中国人的风气，没有禁欲的意思，不过他看见了一个较现世幸福更高贵的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就是他好像看见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一个合理的地方，而要求人生的合理，要求人生的意义。因为他发现了这个，所以不甘心只落于吃饭穿衣而已。他想圆满了人生的意义，达于合理的人生，于是有所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他以为不吃饱也要向明道理的人请教，请人家把自己的为人行事指点一下，好让自己的行为更正，更对，更合理。大概中国所发达的就是在西洋不甚发达的是非观念。是非观念即对不对，常常有人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所恃以责备人的也就是仗着这个。不过有时候一个人也反回来批评自己，虽然说人家不对的时候多。批评自己，即所谓自讼。不拘是责人的或自讼的，都是是非问题，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这不是什么稀罕的，过日子也断不了常说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就

在我们平常也断不了说。从此可以看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要求合理。关于这一个要求为什么我们相同呢？因为，是非的判断，合理的要求，出于人类的理性。人类有理性，才有是非的判断，合理的要求，理性与宗教相反，宗教让人有所信——信他，理性则让人信自己。宗教常有许多规矩定出来让人遵守，这许多规矩（教戒）都有独断性的，无可分辩的，不能追问其所以然。儒家则不然，他启发人的理性，让你自己有一个判断；他相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你不必有所信，信自己好了。此中要紧的是让你自觉，启发你自己赋有的理性。理性一启发出来，一切就有办法了。是非的观念，合理的要求，其所以在西洋不发达的，即因中古的时候被宗教挡住，让人信神，信天地，发达了罪福的观念，没有发达是非观念。至于近代，又发达了法律；法律也是强制性的，从外边给人一个标准，让人依法作事，不许超出一步。这都不是把标准放在你自己身上，让你自己去想。标准在自己的，只有中国的儒家。中国的儒家是一个讲理的精神，什么事都得讲理，理对了即高过一切，谁都要降服于理。俗所谓“有理讲倒人”是也。例如在《论语》里边有这么一件事，孔子的弟子宰我问孔子一个“三年丧”的问题。三年丧，就是父母死了的时候，既〔即〕须穿三年孝，并且还有许多规矩要守。宰我怀疑三年的时间太长，不大合适，以问孔子。孔子答曰：父母死了，所以要穿三年孝，还要守许多规矩的，是因为不如此心里不安。原文是“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他的弟子非常说老实话，回答说：“也可以”。孔子又说：“汝安则为之；君子不安，故不为也。”这个完全可以看出儒家老是让你反省，让你自己在心里找标准，完全信任人。宗教即最不信任人。儒家认为人都有理性，理性就是最高的标准。

在中国文化中充满了这样一个风气：不怕得罪于神，就怕不合理；所以大家都极力要求合理，处处要求心安理得。他们好像最富于理性的自觉，而心安理得就是他的人生理想，别的都不大重要。这个地方即是与西洋“中古”“近代”错开的地方，正落到中间，和中古、近代都没有恰好相对相当。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个字眼来代表刚才所说的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就是“人生向上”四个字。

第二点，中国人喜欢追求新理想。追求新理想就是人生向上的意思，所以他看着对，即努力奔赴。这个地方和西洋近代的人生理想正是冲突的。近代西洋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现世幸福；中国这一面则看轻现世幸福而要求合理，所以就不一致了。试再举例言之。按中国老风气，有一句旧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说妇女不应当再嫁，饿死也得守节，这是中国道理。在西洋便须翻过来，应当是“失节事小，饿死事大”。其轻重大不相同——这里并不是有意讨论男女两性的关系或贞节问题，不过是举例要大家明白我的话。总之，我们处处可以见出在西洋仿佛是个人本位，自己为主；而在中国则仿佛有种伦理的观念，即“尊重对方”。所谓尊重对方，就是说：于相互的关系中，那方面以这方面为主，这方面以那方面为主。比如主客之间，主人以客人为重，客人以主人为主，师生、朋友、夫妇……之间，一皆相互以对方为重。这个尊重对方，与个人本位，自己为主恰好不同。很显明的，从个人本位出发则权利的观念多，从尊重对方的意思出发则义务的观念多。大概这两方面都各有来历。近代西洋人之所以形成其个人本位，自己为主的，那因其中古的时候团体过强，压迫干涉过重，一下子翻过来就成了个人本位。个人本位初乃对待团体而言，后来因个人地位的抬高，自

然加强了自己为主的意思。至于欲望本位，则又是从禁欲而来的一个反动。中国这一方面的来历，恰好因为集团生活的阙如，让他反映不出来个人，所以团体与个人两个极端在中国都不清楚，只有居于中间的家庭、家族，格外显露。家庭的关系是感情的，骨肉之间以感情为主；非如团体之靠法纪以维持。而在感情中，则常常只见对方，忘了自己；在欲望中，则只见自己不见对方。欲望和感情虽然同是人所常有的，可是两个是冲突的，不相容的。从家庭骨肉间的恩情产生了义务观念——这个义务观念不是和权利观念相对待的。在西洋，权利同义务正为对待，比如你欠我钱，你就有还债的义务，我就有讨债的权利。象这一种的义务观念，是硬性的，非怎样不可，从对方课于我者。中国的所谓义务，是自己认识的，不是对方硬向我要的。比如我对我的兄弟要负照顾的责任，对朋友要负帮忙的责任，完全有从恩义而来，是自愿的，是软性的，在意味上很不相同。再如，西洋相互间的关系都是硬性的，夫妇的关系是硬性的，国家对国民的关系，双方也都是硬性的。夫妇之间有相互的权利义务，国家国民之间也有各自的权利义务。如国民的选举权，国家即非付与公民不可，公民则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但选举的事情，近来又于解释成义务的，所以有强迫投票，不投票就加以强制，（可是中国不然！在中国，权利是人家承认的，对方让给我的；义务则是自己认识的，比如我们是朋友，我应当帮你忙，这是我自己承认的，你可以化我的钱，这个权利是我送给你的，同西洋正好反过来，一个是硬性的，一个是软性的。中国人所有的应尽之义都从自己来认识，自己给自己的一种责任。这个很不相同，万不可把中国人所说的义务和西洋人所说的义务混为一谈。上边是说中西来历的不同，底下再看他们的冲突

不合。

所谓中西人生态度的冲突不合，其不合之点，即一个是以自己为主，一个是尊重对方。其问题就在：一个人生理想在现世幸福、欲望本位，一个是高过了这一点而为追求人生之合理——人生向上。一个以自己为主，一个以对方为重，所有的问题无非从这两点来。大家尽量去想，没有哪个问题可以例外。现在我们总结来说：以自己为主的一定看重欲望，以对方为重的一定看重情理。能替朋友打算才是〔做〕朋友的道理，中国人判断某人的对不对，完全从这里出发。大概在人生向上，大家要求人生的合理之中即包括了义务和情理。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讨论一个问题或批评某人是非的时候，本乎情理，亦即源于人生向上。也可以说，中国人所讲的理，一种是对自己要求向上要强，服从公理，一种是从我对别人的关系而引起来自己对自己有所要求。在理论上，抽象的道理上不再多说，底下讲中西人生理想落到事实上而发生的更大的冲突。

中西人生理想在事实上的冲突很大，很严重激烈。不过，我们已经离中国社会很远（乡下的老年人或者较近），所以感觉得不大清楚，如果让一个老的中国社会里边的纯乎其纯的中国人看见一个西洋的人生，他一定很惊骇害怕。其冲突之因缘，可以分两点来说：

一、中国历史太长，文化因袭相传太久，所以发生一种变化，而忘了当初的意思，成为照例的文章。天下事很多是如此的。人类社会的文物制度，相传既久，即容易失了本意，只留下一形式，这个形式就是纯粹机械性的东西。再深刻透彻地说：在生命的现象里头，常常有把他生命的一部分机械化的必要，几乎是故意的把生命的一部分化为死板的，而抽出了他的

自觉性。比如小孩在不大会走路的时候，走起路来一定很用心用力，这是有自觉性，及至很会走路了，则心思不用到走路上亦可以走路，这就是已经机械化了。可是此种机械化是很必要，必如此才能腾出空来用旁的心。再如骑脚踏车，一学的时候有自觉性，学熟之后也就是机械化了，亦惟有机械化才能腾出心来往更高的阶段用。小孩由会走到会跑，学脚踏车由会骑到能玩许多把戏，就是入于更高的阶段。我们生命的维持，如循环、消化、呼吸、排泄诸事，我们都不必用心的，就是因为都变为机械化了，倘若我们在那些上边都得用心的时候，就不会讲话了，没有空讲话了。心没有许多、腾出空来才能说话同照顾别的事呀！所以生命的一部分机械化是个必要。个体生命如是，社会生命亦如是——需要把一部分生命机械化。大概许多在社会上有用的合适的制度礼俗都机械化，使变为刻板的、有强固性的习惯，常常是个必要。可是结果从这里得到好处也得到坏处。不用心就能作若干事，固然方便，然而强固以后则积重难返，最大的困难即失去了当初的用意而成为一件件多余的事情。在中国社会，有许多当初本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后来因为成为机械的，亦就是失去意义。比如“孝”同“贞”两个问题；亲子间的孝，夫妇间的贞，本来无可非议的，可是西洋的新思潮启发了中国人的新人生理想以后，这两点几乎成了大家争论的焦点。“孝”的意思，即根据以父母为重来的，从儿子这面说，孝是绝对的义务，几乎没有范围，无穷无尽，因为人生向上原来就是无穷尽的！不过，孝这件事，到了后来慢慢地成为一种很硬固的教条规矩，有很强的机械性，在社会上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微触犯，否则施以极严厉的压迫制裁。就是因为日子久了，把当初的意思忘记，只留下形式。并且还因为生

命有机械化的必要，一定在硬固之后在社会上才方便，所以后来不用有意的孝，孝就成为不得不然的了。其故即由于走孝的这个路很合适，大家少许多闲气，一些家庭父子间的冲突都免了，可以解决若干问题；若干争斗麻烦。这时候孝就变做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贞”也是如此，因为这样有许多事很顺利，简单，方便。我们要注意的是：孝与贞当初本身有其意义，及至机械化、手段化、方法化之后，意义乃失去。孝本是子女对其父母自发的亲切的行为，贞本是妇人对其丈夫自发的亲切的行为，而后来把自发的亲切的自觉性抽去了，社会上对于贞、孝又极力保留奖励，以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于是乃日趋于机械化、硬固化、手段化。那末，一旦和一个不同的人生理想、人生态度相遇，冲突即大。如果贞、孝还是个人的一种亲切行为的时候，一定不会和西洋的人生理想太冲突，甚且二者很容易相容。因为既不机械硬固，则是活动的，可以变化的。到了硬化以后，单讲道理已经冲突不合，落到事实上当然其冲突不合者更大，成了严重的问题。就中国说，即因此冲突而感受很大的痛苦。社会是很不易变化的，其变化时常常是破坏崩溃而找不着一个准道。现在的中国就是只看见许多的破坏与崩溃。想要把原来的那个意义精神容纳进去，把新的理想也容纳进去，而另外找出一个新的路子，简直是不可能。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机械化，强固化，和坚硬的东西一样，碰它的时候它就是破碎，没有旁的办法。因其本身是生命的机械部份而非生命，不是活的，所以不能吸收外来的思想、道理，以致一经冲突本身即只有崩溃不已。

二、这一点可以稍分开来说。在西洋近代以前，当中古的时候，通常名之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有一个特征，就是人同人的隶属关系。如中国的儿媳好象为婆婆之所有，女人好象为

男人之所有，儿子是父母之所有，臣是君王之所有；一个人没有他自己，都可以叫做隶属关系。一个人有他自己，是近代来的一个新发明，近代以前没有这回事。此问题在西洋前后的变动很清楚。对于中国社会，照我的认识判断，和一般人不同。一般人虽亦无定论，而大都好把中国旧日的社会说做封建社会、宗法社会；这是他没有发现中国社会的特殊。旧日的中国社会，不应当叫作封建，更不是宗法，不过，那一种近乎封建，近乎宗法的情形、痕迹，确是有的。此即指人与人的隶属关系。而致此之由，就因为中国社会缺乏集团生活，所以引不起来个人的建立。西洋人因为有集团生活，所以终于能建立起来个人的人格，很清楚地打破隶属关系。中国从前隶属关系不清楚，故无从很清楚地打破，从而建立个人。这就是落到事实上冲突的第二点。

一二两点合起来，是让西洋的新理想进来以后，中国社会之所以起一种剧烈冲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两点，而单是一个人生理想的冲突，则冲突不大。现在的问题是理想的冲突并不清楚，而事实上的冲突很大，让人十分为难，感觉不好办。这个缘故，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事实习惯之中不能超脱，如超开习惯而认识其最后的道理，则亦不甚困难。

下面我们再说一说中国社会的问题。照我的分析，中国不是封建社会，可是有封建的痕迹，就是因为中国社会中虽有隶属的关系而不甚清楚。至于中古的西洋，则当真是封建社会，他有很清楚的隶属关系在。中国的这个不清楚，很容易招致反感，所以有人骂礼教为吃人的东西，而视同洪水猛兽。同时又因为从来没有很清楚地建立个人，很象一个不进步的社会，更引起人的不满，尤其一般有生命力的青年，反感至深。然而反感只



是反感，中国社会到底不是封建社会，我们不能以其相象即以为是，犹之乎他不姓张不能就是姓李，不是这个不能就是那个。再如中国社会与西洋社会不是顺着一条路线演进的，不是人家进步快我们进步慢，而是我们根本落于一个盘旋不进的状态，另外走了一个很特殊的路线，不能和西洋比。竟有许多人拿西洋进步的标准来方喻中国，那是错误又错误的事情！即以中国社会的一种隶属关系而论，如果不是和西洋见面，会永远存在。中国社会假定不和世界交通，会始终在旧道上徘徊。至于西洋的所谓自由平等，种种科学发明，在中国不是还没出现，是永远不会出现。倘若单是进步慢，那末，迟早总会进到这一步，则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我常常说，假定中国不和西洋交通，清朝倒了，不过再出一朱洪武，不会有孙中山出来。其他政治经济机构等等，一切都不会改变。如果中国真是封建社会，那也很好办，顺其自然，一定可进于资本主义社会，进于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从中国至今犹未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可反证出旧日的中国非封建社会了。比如自由平等的问题，中山先生说过：以前的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这个话虽然是故意翻案，可是很有道理。也就是我所说的隶属关系在中国没有很清楚地存在，但亦未根本废除。所以可以说中国人没有自由，也可以说中国人自由太多。平等的问题也是如此，都极含糊不清的。因为他这个社会是特殊的，根本是另外一回事。假定说有黑白两种东西，他既不属黑亦不属白；有人看着象白就说他是白，有人看着象黑就说他是黑，这都错了。而说他是白不白不黑吗？那也不对！他根本就是不能纳入于一个寻常范畴的。大概最惹青年反感的在此。和近代西洋潮流冲突的亦在此。不过，这时候可以说尚未发生正面冲突，尚未拿中国的理同外

国的理较量讨论，只仅仅在事实上有了冲突，仅仅是中国社会本身的情力与新思潮的冲突。这时候我们对于那已经机械化的教训，对失去亲切的自发的意味的缺乏生命的许多信念道理，想维持也维持不住。只有一个道路可以维持，就是复活——自发的亲切的有意义的去维持，庶可不至动摇。因为机械化即等于死了，除非让他更生的时候他可以存在。可是，让他更生，顶要紧的是有真情，比如作子女的对父母有真的感情起来，其孝无问题，否则徒靠空的形式，是万万站不住的。在这里我可以引用中国古书上的“文”“质”两个字；“文”即礼文，即许多礼节形式，“质”即真情，即真的感情。比如居丧的时候，哀泣之情为质，披麻带孝就是文。大概“文”这一面，大体上说将来都不易存在，许多礼文都要破坏，破坏之后才能激发出、显露出较实在的感情。实在的感情露出来，即所谓复活，更生。感情的复活，更生，是有生命的，毫无疑问地可以存在。但恐怕由质还要慢慢到文里去，而有许多表示、规矩产生。总之，机械化的东西无法存在，这是一。再则，中国的那个近乎封建社会的痕迹——隶属关系，恐怕要从很清楚地建立个人以补足此种缺欠。这里所说的隶属关系，是指种种事情说。如儿子对父母的伦理关系，本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并非隶属关系，不过很像隶属关系而已。可是这个很象，即需要注意矫正，方得为建立个人。总之，中国社会的机械化，和近乎封建痕迹这两点，都必须矫正。也可以说这两点正是我们的缺欠，所以引起一般人的反感，而对固有的文化革命。同时我们要知道，矫正那许多近乎隶属的关系，只是消极一面，积极方面就是建立个人，就是我所说的“让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而不属于任何人。”这是我们应当注意和采取的方向，丝毫没有疑问。然而在建立个人

的时候，还有两点要小心谨慎，不可忽略的。兹分言之：

一、象西洋近代社会，个人主义抬头，很象能建立个人了，不过，他处处露出来一个对抗的形势。在西洋，其个人的建立，是走的抗争的路子；及至个人建立以后，即表现一个对立的形势，就是我常说的一句话：“在中国社会里，常常见出人与人的相与之情；而在西洋社会中，则常常见出人与人的相对之势”。从西洋人的好打官司，即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待、对等、相对的样子，人与人的关系常常是硬性的意味，这个地方是我们应当谨慎的。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建立个人，虽是没有疑问的，但不应当步西洋后尘，而演成相对之势。如果为建立个人而演成相对之势，这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太伤心的事情。比如我们矫正儿子象是隶属于其父母的关系，而让他有他自己，可是在这个地方若造成儿子与父母的对抗，成为一种很硬的对待的时候，那是让中国作父母的太伤心的事，也是让整个中国社会太伤心的事！因为中国社会不能接受这样的办法，所以应当谨慎，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毁伤我们的感情。

二、我们应当知道，西洋近代的潮流已经和最近的潮流不相合了。照最近潮流的说法，近代所讲的那个理是不对的，所以最近的潮流抬出义务观念，撤回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本来是建立个人，而建立个人即建立个人权利，可是照最近的西洋思潮，对个人权利走上了否定的理论。此即从个人主义、权利观念所发生的流弊而有的一个觉悟，由反省得来的。在这个反省里头，一面取消了、打破了十八世纪的天赋人权思想，更深刻地认识了各个人在社会里面的连带关系，而形成一个新的思潮，同时更竭力发挥义务观念，把人在社会上作事看成是应当的。新的法学都是发挥义务观念；主张个人权利，实在是一个

过去的事情了。我们在这一点上也应当谨慎。如果只注意建立个人，依旧发挥十八九世纪的个人权利思想，——比如妇女界还要发挥女权，便是旧的近代思想。最近的乃是社会思想。而就社会说，当然着重个人在社会上的义务；从个人出发，当然开口便是个人权利。如过去把财产自由看成是神圣的事情，现在大概许多思想家都看成是社会公有的了，个人所有的只是对社会的义务，而无所谓绝对权利。有的国家在法律上都作两面的规定：个人有权利亦有义务，就选举说，你有选举的权利，可是选举也是你的义务，非尽不可的。总之，抬高个人当然以权利作出发点，发挥社会思想即当然以义务作出发点。现在的思潮，正是社会本位主义。所谓社会本位主义，就是对个人本位主义的一个修正，我们对修正的这个意思不得不注意，否则成为一个未经修正，未经锻炼的很糙的道理了。所以建立个人虽然没有错，可是我们应当谨慎，不要造成相对之势，不要发挥权利观念；要照顾最近的思潮——不是抹煞个人，而是要个人认识在社会里的义务。若再盲目地发挥个人权利观念，就铸成大错了！同时我们还要知道，如果按照西洋近代潮流的时候，颇有和中国固有的道理冲突的形势；而按照最近的思潮，则适可得其调融。什么缘故呢？即因都认识天地间尚有高过个人的；知于个人之外另有所重。上面两段话是说我们的缺点和我们应当采取的方向。底下再讲一段话，给我们应当采取的第二个方向作为补充。

西洋最近的潮流和我们固有的文化对照，可以看出我们有缺点应当矫正补充，此即指生活的社会化一点。西洋最近一切倾向于社会化，而中国原来散漫，只发挥了个人自己的那一面，而未发挥社会的那一面——群性。这是中国的缺点。引起来中

国革命，中国变动的，本来除了西洋的近代潮流就是最近的潮流；质其所以能引起变动之故，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有缺欠，所以有人不顾生死奔赴于其新的理想。如共产主义，亦即是要求经济生活（财产）的社会化。而所谓“生活的社会化”，——不单是经济一面——是现代世界上有力的一个潮流，也是打动了中国的一个怒涛。大概我们非采取这个新的方向（生活社会化）不可，否则无从矫正过去各自关门过日子，不相闻问，没有发挥人类的社会性的那一点。申言之，我们说建立个人的时候，即对于西洋近代潮流批评的选择的接受，而不是全盘接受，依样葫芦。还有，当我们说现在应当趋向于生活社会化的时候，也同样地是对西洋最近潮流批评的接受，选择的接受，修正的接受。批评修正之点何在？就是：西洋最近的思潮是对近代思潮的反动，而近代思潮和最近思潮是趋向不同的两个极端。在西洋，因为已经走到那个极端，进无可进，才又返到这个极端；好比太往东了才又掉过来往西，这是有意义的。我们既素来缺乏近代思潮，即缺乏最近思潮的背景，所以不能够走西洋的路子以达于生活社会化。我们所要走所能走的路子，是交互尊重之道，从社会说尊重个人，从个人说则尊重社会。当尊重个人的时候，即建立个人的一天；当尊重社会的一天，亦即趋向于社会化的时候。我讲村学、乡学，曾经很发挥这个意思：在中国社会，团体的成功，应当靠两面——个人尊重团体，团体尊重个人，不可偏废。个人尊重团体，发挥对社会的义务，即成功团体，成功社会化的时候。团体尊重个人，承认并赋予其自由参政的机会，即建立个人的时候。大概建立个人，和生活社会化，这两个新的方向，要同时并进。象这样从交互尊重而趋向的社会化，就是对最近潮流的修正。交互尊重亦即中国

---

伦理的意思。盖以中国伦理的意思为主而融会采取西洋思潮的精华，发扬光大，方可得问题解决之正。

《梁漱溟先生讲演录》，

1936年9月。

## 二十五年国庆纪念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国庆日。这日子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很深刻的很大的转变。我们的历史，到近百年来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那就是因为世界大交通，让我们这老的文化国家，从来在文化上优胜独尊的，遇着一个不同的，新鲜的，也是很高的文化的西洋人在这时候到东方来，两下里相逢以后，我们即被包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受到种种刺激压迫，不能不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至少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到今天犹变之未已，今后还在要完成这个转变。可是这一个大的转变中间，以二十五年前（西历1911年）的今天为最深刻的转捩关键，所谓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比如就“国庆”这两字说，大概在古书里历史上找不出来。从前的中国没有这句话；勉强说有的时候，也不过是指皇帝个人的生日。国庆这个观念，实在是于国际的环境中由旁的国家而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国家，才对国家之可庆祝的事情发生纪念的意思。从前中国缺乏国际环境，因为不知有别的国家，所以也就不知道有自己的国家，仿佛是忘了有国家这回事。自西洋剧烈的国际竞争包围了中国，才唤醒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于是乎有国庆。

第一个国庆的纪念日，我曾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参加过，那是袁（世凯）总统的时代，民国的头一年。那时候北京当真是

庆祝得很热烈，因为许多革命的党人同志，他们作了多年的运动，好容易才有成功，从这里完成了共和的建立，当然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历载奔走流血所换来的结果。当时北京尚没有多少能开大会的地方，仅有琉璃厂比较可以容纳较多的人，所以就在那里举行。那时候人之多，之拥挤，在我真是头一次看见。差不多人到那里就被夹住，完全不能动，妇女小孩很多被夹得哭出来。——自然一面是因为中国人不会开会，一面也因为人太多，故紊乱拥挤到不能形容。虽在深秋，大家都穿着夹衣，而以人多且须用力撑持，所以人人皆挥汗如雨。那时候许多革命纪念品的陈列，革命先进的讲演，分了好几个地方。那一天的大会，袁总统自己没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和所有阁员，其他军政长官都到了。还有许多游艺。许多庙会上所有的玩耍、买卖，也都应有尽有。可是，我想就是那一个庆祝大会，或许还没有外国人对他们的国庆纪念得疯狂热烈。在人家，每人（男女老幼）都有很清楚的国家观念，中国人则一时不容易谈到；所以在那个时候只有热心奔走革命，曾经对民国用过一分心力的人，其庆祝纪念真是高兴热烈，余者则懵懵然看热闹而已！从第一次的国庆，到现在不知不觉已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让我们民族的命运更象是艰难困苦沉沦危险；可是也许就在这艰难困苦中，更锻炼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虽然我们不愿意要狭隘的国家观念，很小气的自尊心理，一味排斥旁的国家；然而究竟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还是应当有的。

我们真没想到民国到了二十五年还是这个样子！我记得辛亥年（革命军武昌起义的那一年），我正十九岁，那时我也是跟着许多革命前辈在那里跑的一人。我参加革命工作虽然很晚，但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常常从上海、日本有许多报纸杂志寄



给我们，已经是精神上相往来了，不过没参加工作。我参加工作，是在武昌起义之后。那时候实在还是小孩子。我们的工作，一面好象很凶，玩手枪炸弹的把戏；同时亦儿戏得很，并不知其中的轻重关系，拿手枪和拿小刀玩耍一样。记得当时我们的秘密机关在东单牌楼二道街，<sup>〔1〕</sup>为了避免清廷的注意，于是我到昌平州运了大批的煤油灯罩，前边开铺子，后边就是机关。象这一种的事，现在想起来如在眼前。在那个时候以前，就国内说立宪运动潮流较高；国外（如在日本）则革命情绪较浓。当立宪运动鼎盛（盛）的时候，各省都有代表到京，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的年限。——原来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九年，全国的舆论以为九年的时间太远，最好缩短为二年或三年。要求的结果，清廷答应了缩短为五年，大家还是觉得远，以为五年以后才能立宪，政治上才能有办法，岂不太迟了。真没想到达到真正立宪的程度，虽五年九年亦不算长，谁知至二十五年之今日还是这个局面呢！那时候如果有人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有办法；绝无人相信。可见在社会里对社会的前途能有先见，真不是容易事！当时一般的意识情绪都集中到政治改造上，经济的改造差不多没人注意，整个的社会问题更意识不到；而现在由二十五年的历史慢慢领着我们走，成功了一件事情，就是对问题的认识比从前进步了。大家从政治问题注意到经济问题，乃至整个的文化问题，社会改造；这是在一切没有成功里面的一个顶重要的成功。没有对问题的认识，则没办法能有大的成功（所谓大的成功即指旧社会改造，新社会建立而言）。今天可纪念的就是慢慢地我们认识了问题，在二十五年艰难困苦的经过

〔1〕据著者晚年谈话，此秘密机关所在地为北京东单二条。——编者

中，象是指点告诉我们新中国的缔造是不容易；是很费事的。大家要知道，越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越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如果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则一定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中国历史的转变，没有法子不是一个大的转弯；中国的社会改造没有法子不是一个大的工作，没有法子小就。倘使立宪运动成功了，或革命共和一举成功了，那都算是小就；这许多的磨难就是指示给我们前途是伟大的，不能甘于小就，应当创造我们最理想的社会。好，在今天国庆的日子，我们祝望我们民族前途的伟大！

（郝心静记）

《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5期，

1936年10月16日。

## 中日农村运动的异同及今后 中国乡村建设之动向

讲到乡村建设，简直如一部廿四史有无从读起之慨，兹姑从最近赴日参观说起。此次同行者五六人，曾至东京、大阪、神户各地参观，昼间到乡村去，傍晚回住所，所到之处，大都粗略参观一下，难有心得，不过随时心中有所感想。所感想到的就是：中国农村和日本农村情形不同，中国的农村运动与日本的农村运动亦相迥异。也许枝枝节节方面或某一桩事有相同之点，例如我们提倡农业改良，提倡合作运动；他们也是如此。我们在求农村的进步，技术的改进，都是借教育的力量来推动；而在日本，努力乡村教育的人，说想使社会教育与农村运动互相联系，不相分离，这情形，在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当我们到乡村去时，领导者或为农村运动人员，或为社会教育人员，也可以证明这两方面是相同的。

就一点一滴看，固多相同之处，若就整个的立场而论，中日农村运动完全是两事。这在国内时作如是想，到日本后，更证明了这种判断是对的。何以言之？日本农村运动工作，在大体上说，是有整个的头脑，作整个的规划，由国家行政机构为主干，如农林省设有农村经济更生部，就是农村运动之总计划机关。考日本注意农村运动，可说只有五年的历史，即昭和六年“五·一五”犬养毅被刺事件发生后，召集临时国会，产生

日本农村经济更生计划，才设立这个农村经济更生部于中央政府，足见日本对于农村运动，是由国家决定计划，并由政府来执行的。不特农村经济更生部如此，即帝国农会亦复如此，也是由中央一直到乡村，成了一个农民组织的系统。关于农村经济更生计划，帝国农会亦是参加的。不但帝国农会在农村经济更生上占重要地位，即全国合作社的中央机关亦占中心地位，日本有所谓“产业组合中央会”，规模很大，还有中央金库，为信用合作的金融机关，有资金三万元，其中一万五千元由国家拨给，一万五千元是合作社供给的。这种中心机关，都各有下层的细胞组织，成为一个系统。此外尚有全国购买联合会、全国贩卖联合会等，也是如此。总之，每一中枢机关，无论技术的改进，合作组织的推行，莫不有自上而下的负责机关，形成整个系统，在经济方面、教育方面，都配合得很好。若从组织与修养上说，在乡村中有青年团、处女会、户主会、在乡军人会、主妇会等各色各样的组织，全乡男女老幼，都分别加入各项组织，而此种组织，也由下而上各成一个系统。这些团体组织的意义，都在求社会向上努力，求进步，其中尤以青年团为最有力量。指导这些团体活动的机关，为社会教育机关，故在日本有所谓全村学校，还有全国普遍的农村学校，也是属于社会教育之内的。这些学校团体对于青年之训练，分精神、军事、职业三种，其于日本社会的推动力非常伟大，因无论小学或曾在高小毕业的青年，十之八九加入青年团，它以种种方便去帮助青年求更深的教育。上面推行机关的组织即属完备，下面又有大力为后盾，工作自然不难收效。又如地方自治，亦在农村经济更生的机构上有了重要的位置。自然，日本不受政府指挥管辖，而自愿替社会服务的社会团体并非没有，如国民高等学校，

系受丹麦的影响，组织者为有基督教信仰的；又有传布中国思想的，如农工学校，以《孟子》《论语》为中心，一如畴昔中国的书院，在社会上也颇有相当地位。可是在大体上说，社会各团体都是由国家领导进行。

返观我国，没有整个的系统，纯粹站在社会立场上的亦居少数，除平民教育促进会不直接受政府管辖外，其余办理农村建设工作者，皆仗政府之力，或成为政府机关者，受政府的经济帮助，即山东亦不能例外。江苏教育学院、四川教育学院，以及各地民众教育实验学校，都是政府办的。但这些〔靠〕政府机关经费来做的，并不是一体的，以致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从皮相的看，这显然是没有整个的规划，亦即中日农村运动的不同点在于一为有整个的系统，一为无整个的系统。若作更进一步的观察，在于下层的不同，根本的不同。日本乡村工作在救济农村，而我之乡村工作在建设农村，简言之，日本为补救弥缝工作。良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六十年间，时在进步中，已由东方农业国进而为近代工业国，其事实之表现，随处可见，世人无不赞叹其进步的迅速，仅仅五六十年的历史，居然养成新的国家。它的农村问题之成为问题而须救济，为比较后来之事，七八年前始为最厉害的时代。因为日本整个社会进步到极点，社会机构发达到饱和程度，问题才发生。不过，日本的问题不是政府的问题，因为它还可运用其政治经济机构，想法补救弥缝，且可以学术研究与经验，供〔贡〕献乡村以作种种之改良，如遇不足时，随时可以添补、修改，不必另起炉灶。中国则不然，绝无救济之可言。盖中国尚无良好的政治机构，农村问题由谁来解决？即使中央有力量，亦没有如上面所述的整个办法。大家借政府的力量，便形成形形色色的现象，若以一省而言，力

量更属有限。况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教育或银行投资所能解决，近来常见银行举办农村放款，效力很微。最近农本局的设立，每年经费六百万，若分配偌大的农村，为数太少，实属无济于事。我国社会头绪散乱，其原因由于近百年的历史，至少六七十年的历史，与日本不同。日本社会感受西洋刺激，尤其是政治机构有转变改良，使社会机构有相当的稳定，社会能继续不断的进步，六七十年实为进步的历史，姑无论其为资本主义的进步，不是理想的那么好。本来，我国亦很望转变改良，让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可是恰好相反，不但没有转变改良，反形成了破坏崩溃，直至现在尚在崩溃中，说得和缓点，正在变化中。在这大转变的过程中，也有新花样变出来，可是并非平稳的向前进，这是历史的不同点。可见中国农村问题，是在崩溃到了最后关头所发生的，与日本大不相同。所以中国对农村问题的使命与任务，不在救济，而在重新建设，要另起炉灶，从头建设新社会；日本对农村问题只可救济，而不配谈建设，若重新建设，便须推翻现有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

日本因救济乡村的力量很大，亦即阻止乡村的抬头，乡村得了救济的机会，便越压在底下。中国既无救的力量，亦即不能阻碍乡村的抬头，故对于建设新中国社会是可能的。新中国社会的建设是怎样的呢？我以为是：（一）从乡村做起；（二）以乡村农民为主体；（三）将来的新社会是以乡村为本位的社会。

详细的说：（一）旧中国社会本是以乡村为基础，一切文化制度，都是为乡村的。近百年来感受西洋文化的包围而起变化，社会起了变化，即乡村起变化，趋于崩溃破坏。国人对于乡村崩溃的注意，仅是近一二年的事，大家感觉痛苦，才呼吁救济，这是一个生机、转机，亦是旧社会崩溃后的萌芽。明白的说，近

百年来西洋人到东方来，其目的在通商，此种通商就是经济竞争。中国的社会恰好没有象日本一样的走入工业化的道途，而手工业也被破坏，遗下的仅有农业。中国社会直到现在还靠农业，农民以汗血换得起码的生活资料；但是近年来全国人民所赖以生存的农业亦告失败，农产品的输出逐渐减少，使全国人民都大受影响。所以当前应走之路，只有复兴农业，以求增加出口，减少人口。中国以农立国，而输入的农产品却占绝大的数字，这种外来的压迫加在我们身上的问题，即为经济问题。以农村起首，其意即在于此，其转变与步骤，亦应以此起首。

(二) 第二个问题是随第一个问题而来。中国生产者只有农民，余如近代工业与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上所处地位都很微；且农民人数众多，在消费上亦居第一位。中国受国际经济的压迫之下，小规模的生产，是无法生存，非联合大众谋经济自保不可。谁是联合的主体？那当然是农民了。我们既非生产者，又为数无几，只好站在帮忙地位，说得好听点，在旁领导他们，如经费的补助，工作上的指示，总要把〔帮〕农民抬头。这便是必须以农民为主体或主力来完成新中国建设的理由。

(三) 新中国建设之前途，乡村与都市是互相沟通的、配合的，不是矛盾的，工业与农业是结合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发达的国家，乡村和都市是矛盾的，工业有压迫农业之势，工业与农业是分离的，工业之进步不是以农业为基础。中国将来很自然的不是如此，因此就不象西洋现在社会中心（包含政治经济）都寄托在都市上，而是普遍安放在乡村，不是集中于一点，此即乡村为本位之意。重心集中于一点是畸形的，很危险的，而普遍安放则较为安全。其不同的所在，为过去西洋社会的工业发达，从商业发达脱变而来，中国工业是从农业而来，两者虽

都走上工业化之路，而成因不同，所以新中国建设是以乡村为本位的社会。

， 新中国建设所包含者，已如上述，不过它不是枝枝节节，零零碎碎，彼此不相谋所能解决，该有总的脑筋，总的规划，实地去做。做的时候不妨因地制宜，但不能因不一致而不相为谋。如何使不相为谋达到总的规划，这是值得研究的。

《浙江建设月刊》，10卷4期，

1936年10月。



## 我们对时局的态度<sup>〔1〕</sup>

同仁！同学！因为大局自前几天很严重，所以觉得有和大家谈一谈的必要。据今天所得到的消息，蒋鼎文自西安带回关于蒋公的信，仿佛象是有转圜的可能，如果这个信能成为事实的话，当然是很好的。今天的话大略可以分做五段来说：

### 一 对时局问题略为说明

在此刻国内，约有这样两种不同的主张：一面是在野的，在社会一面的。属于这一派的——尤其是青年，大概都是思想比较急进，感情比较激昂，主张对日马上发动战争，希望将绥蒙战事扩大来作；跟着这个意思来的，就是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包含共产党）大联合；再跟着各党派大联合这个意思来的，就是要求政权有一种开放。大要说来，他们这一派的主张不外乎这三点。和我在上海南京接谈过的沈钧儒、章乃器诸先生都是奔走于此事甚力者；至于实力派就是张学良、杨虎诚等人。张、杨等他们都是和红军方面有过直接文件往还的，在红军方面好象也是很表示来开诚合作。据说是经过第三国际的核准，有很重要的两条改变：一条是说如果中国政权能够公开，在共产党

〔1〕 1936年12月19日讲演。黄省敏记录。

愿意退为一个普通的政党，在政治轨道内从事活动，不再走暴动的路；再一条是说如果中国成立一个抗日的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愿受节制、指挥。在前几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个领袖被捕，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奔走这件事情的缘故。虽然他们声明没有一点反对现当局的意思，但态度总与政府不一致，政府对他们自然也不放心，所以终有这被捕的事情。还有在政府中人态度也不大一致，也有比较接近在野的人。

在政府一面，自以蒋公为主，他的态度是比较稳重，虽然他也很积极地援助绥蒙战事，但他没有要扩大战争之意；虽然他在外交态度上也很强硬；至于联共开放政权就更不好谈。因此：在野和政府两方面，就有了相当的距离，意见不能相通。

## 二 对于时局的推测

就我的眼光所看到的，可有以下几点意思：

一、对日战争不会因此可以早一点发动起来。就日本说他还没有预备真打仗；并且他如果现在要真的压迫中国，恐怕倒是促成了张杨等一派主张的胜利，让他们这一派的形势转好，这个恐怕不是日本人愿意的。他不打中国人，则外面关系缓和，内争不免就利害。他如果对中国加紧，则中国内部必益趋团结，所以他（日本）非冷静不可。再就中国方面说，中国内部关系在不曾得到一个调协时自然不能求着和日本打仗。

二、国内大约亦不致有大战事起来。先说张杨一面，在张杨等这一方面的主张，本来是要全国各党各派大联合，只对外而不对内。这样，他自然不打。至于中央方面依我推测，也不会怎样打。因为，究竟各地方当局的真态度是什么，现在大家

仍然都在猜疑中，这样，怕受牵掣。当然在中央也想到惹翻了，逼急了，也是很没有好处。再则象蒋公这样在军事上很决断，很敏捷，很硬干的人，没有了。所以我推测没有大的战争发生。但如今天所得到能以转圜的消息，我却怀疑他未免言之过早。

三、剿共不易进行。这次事变以后，就形势上看，剿共事情恐怕就要停止下来。

四、政局或有变化。从对外军事说，统帅非蒋公莫属。不过在事变后，政局或现政权许要有一点变化，至于将来变化到怎样地步，现在尚不敢说。

五、山东前途平稳。就现在山东形势看，往前去无论哪一方面——国内或国际的——都是平稳无事。大概韩公态度就我所知者，是以全力求山东地方上之平安无事，无论土匪或旁的妄作主张的人的动作，他都要很严厉的制裁，不让他们发动，使外人有所藉口。

### 三 我们与一般人有一种不同或距离

我们是和现在一般人很有一种距离的。这个缘故，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向深切地关心国家民族的问题，从很逻辑地分析而产生我们理论见地，本此理论见地而有一种继续不断的努力。我们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的工作，所以和受时局的刺激影响而有一种兴奋者，是必然的不同。现在很多人都因为时局严重情势而兴奋，跑到绥远去劳军，去服务，但在平时却并没有在问题上努力。我们不然，我们不是等到时局严重表面化的时候才注意，所以，我们对眼前时局不格外去兴奋，这不是我们的不积极，不是我们对时局的淡漠，无心肝。我们正是沉着应

付。因此，这种态度上的距离，是无法避免的。

#### 四 我们的根本见地

我们为什么有以上所说的态度呢？就是从〔自〕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就我的认识，现在的时局，固然由国际的侵略压迫所致；但也是因为我们本身的不健全。两面都有。当然他越压迫，我们越不好办；也是我们不行，他才更来压迫。但问题虽然是由两面来的，而头一步则只能在本身上下工夫，没有法子先去对外。譬如现在时局这两面的主张，姑且说是一偏于急于对外，一偏于积极地准备来培养自己。我们意思是不拘对外的抗战或对内的建设准备，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作工夫的主动的力量。谁来对外？谁来做这些建设的事情？你得靠人！现在中国人是落于散乱无力的情形之下。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怎样让中国人的力量（我常说每人都是活的，死人都不在这里了。既是活人，就都有他的一份力量）如何能活泼而协调。活泼与协调，协调与活泼，这是一切的一切的前提！你干什么都需要这个。力量不协调，你往东走，他往西去，好象推车子一样。你这，他那，结果这车子就不动了。所以协调是很要紧。因为一个社会是多数人，不是一个人，力量不集中、不协调是不行。活泼与协调是相联的，我们现在所苦的，也是社会关系的不协调，也是人的不活泼。必须协调一点，才能活泼一点；活泼一点，更能协调一点。不活泼就是沉滞。中国现在就是错杂、散乱、沉滞。其来源甚久。如何调整这个社会关系，慢慢再从这里培养、开展、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的社会，这是我们所要求的，这种工作就是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就是从调整社会关

系入手，而达于新社会关系之建立。我曾说“调整社会关系，重建中国文化，”这两句话是可以包括了我们的全部理论的。民族复兴是要在此新社会的建立，而新社会之建立，又非从调整此旧社会关系入手不可。我们是从头到尾都在看重社会关系。但此社会关系的调整却是慢的事，天然是一个慢工夫，这里头没有快法子，可以急切的得到一个结果的。——天然是很细密的事，而不是很粗的事。我们在从事于这调整社会关系的时候，才可以将社会中彼此的互相妨碍、互不协调减低到最小程度，彼此的互相顺益才能让他一点一点地达到最高程度。本着这个方向去做，就可以从现在这个破碎、凌乱、疲困不堪的情势中，一直进达于理想社会。所以我们始终在此——调整社会关系上——做工夫，这工夫是没有法子求急效的。

眼前国际问题，诚然是很急迫，我们也没有法子不应付这个问题。如其问题果真来到了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不能再问此工夫做到那一步，亦必须起来应付。不过如果时局还能够允许我们为社会自己谋协调活泼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将来在应付国际问题上将更好些的一个机会！能够做到那里，就做到那里，做一分是一分，于应付急迫问题上就可更好一分。

我们现在工作，也有一点改变，这也就是因为问题逼来不能不应付的意思。这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指现在山东普遍推行“行政改革”和“民众训练”这两件事。我在南方他们有许多人同我谈，都希望我们少做精细的研究的实验工作，只捡一两样可以推广的工作大规模推广。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不过，我们看调整社会关系的最根本工夫，我们要培养中国社会自身力量，一面用，一面养，从养中来用，也就是从用中来养，所谓工夫精细，就是指此。如果急用、重用，则不得其养。所

谓急用、重用，是指急忙发动国际战争。国际战争发动后，虽然中国人也很可以因此得到一个磨练，可是确实不能够培养、调整其中错乱的关系！因它太是临时对外性质，不是正常的。你必须先会过正常的生活，然后才能过不正常的生活；不然，一定是不行。

## 五 对时局的态度

我们对时局的态度，分析言之，有五点：

一、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对时局态度，应守的原则：第一个就是置重于根本工作，——即调整社会关系的工作——民族复兴在此求，不能求之于临时对外工作！临时工作只是不可避免的，不得不应付，而不是最要紧最根本有多深意义的工作！

二、中国民族自身的统一性，是我们最切的要求，无论对内对外都是要求中国社会越统一越好，尤其对外自身不统一更不行。凡是能够达到统一要求的，我们绝对不放过。如果在某一点上我们不能得到全国一致精神的时候，我们只有从多数、从大势去走。这就是我们要求统一，在统一不可得时，以服从多数当统一，别无办法。我们只有跟大势走，我们不标奇立异，不拿出新鲜主张。怎么样能够维持中国统一性，是我们所要守的原则。

三、抗日战争应急，应缓，其标准根据第二条决定；全国人都主张急，我们就急，主张缓，我们就缓，一致不可得时，就从多数大势走，急缓都好。我们看急缓似乎都没有很大的出入，因为民族复兴不能于此求。

四、就是现在有一般人——尤其是共产党——主张全国各

党各派大联合，说到大联合这是我们所最赞成的。这于社会关系的协调，是相合不相背的。不过，我们有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各党派大联合恐怕联合不好。说到联合就应当放弃其原来党派的立场来联合。以党来联合，则其联合便很有限，就很不容易联合。尤其对共产党，希望他根本放弃其斗争的态度，否则恐怕没有人肯放心放胆来和他联合。说联合就必须彻底，彻底才能联合成功，不彻底则绝难有成功的可能。所以我希望中国人大联合，不说各党派大联合，不然，是联合不成功的。

五、我们主张各党派放弃其立场，赞成各党派自己解散。无论共产党，国民党，我们觉得在社会上原都没有多大根据，实在是不必要。在现在讲全国大联合的时候，最好打通一切，化除此小圈圈才行。国民党也不必再维持现在的局面，而要将政权公开。我想这应当是好的。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原则而已，至具体办法我们仍未想到。

我们为民族、为国家努力决不敢后人，从来就不敢后人！如果有人看我们不够起劲的，那么，在我们自己的解说，就是：我们不能象旁人在没有事的时候就忘记了，直到有事时才干着急；我们是处平时处变时都一样地根据预定计划向着一定目标继续不断的在努力！

《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10期，

1937年1月1日。

## 为西安事变致张学良电

西安张汉卿先生大鉴：

联合抗敌，未始不可邀国人同情，但舍蒋公谁足以当统帅之任者？文日之事，大拂人心。万望早护蒋公回京，得以从容商决大计，国家幸甚！如或不然，前途祸变，未知所届，愿先生熟省毋忽。梁漱溟养。

录自《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10期，

1937年1月1日。

《山东民国日报》，1936年12月24日。



## 追悼王柄程先生<sup>〔1〕</sup>

诸位同仁、同学：在这个追悼会上我可以把柄程先生的过去简略事迹和我们纪念他的意义向大家说一说。

柄程先生在本院本县前后的时间都很久，同仁、同学多半都和他认识，不认识的只有少数新来的人。因为如此，当然对于柄程先生的为人，一定都很有印象，用不着细说。同时我对柄程先生从前的事情知道的也不甚多，对他的立身行事有许多不能说得很详细的地方。

我所知道于柄程先生者，是其“志气”最强，此点很能令我佩服。“志气”是我们乡村运动里面的一个顶重要条件。我常说，如果我们乡村运动缺乏了两个条件，就不成其为乡村运动：第一个条件就是志气，第二个条件就是团体组织；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则我们与其他机关的公务人员当一项差使而生活不一样吗？乡运前途还能有什么开展，还能有什么成功？！这两点真是乡村运动的生命，舍此则将无价值，无前途，无生命！柄程先生在头一个条件上我深切的知道他很够。柄程先生对于乡村运动的认识不算深刻，可是他很真挚。我同他的认识，是在十八年我从广东回到北平，那时河南村治学院正在筹备期间，他从河南到北平来访我，这是我们相识的开始。后来我就愿意参

---

〔1〕1936年12月28日上午10时在追悼会上讲。黄省敏记。

加河南工作，而到开封帮助筹备，那时所有的聚会商量都是在柄程先生所主持的教育款产处里面，参加谈话的人也不多，除我和柄程先生外只有梁仲华先生，彭禹廷先生。我们的谈话是常作竟夜之谈的，在此深夜谈话中，使我认识了柄程先生，知道他干乡村工作完全从志愿出发。

他那时是担任河南教育款产处处长的职务，教育款产处是河南全省教育经费独立的经征与支配的机关。以前教育经费是由省府来拨发，教育界争过来自己经营，成立教育款产处自行征收支配。但教育款产在最初划出独立的时候，办的很不好，所收的数目，比原来由省府财政厅所收的数目，还差得很多。因此，那时河南的教育经费就没有法子发足数，甚至教员都立折子每次五元十元的支取，几乎不能维持，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教育款产处是采取委员制，委员制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负责，大家都不负责，不惟不能维持局面，反而形成瓜分之局，每个委员都推荐人去做各县经征员，河南有一百多县，这自然就形成一个争权争利的纠纷情势，那里能办得好！柄程先生最初也被推为委员之一，但他拒绝了，就是因他看清了这一点，觉得没有人去负专责，事情就没有法子做。这样凑付〔合〕了两年，大家都觉得不如仍然交还给省政府，在这时候于是就有友人劝柄程先生出来担负这件事情。柄程先生当时就表示，如果要他来做，做就要负责，必须废除委员制。所以后来就取消了委员制，由一处长负责。自从他负责以后，情势马上就转过来。以前教育经费征收最少的时候，只到二十多万，后来他经征最高额几达二百万。在这时候他经营甚苦，心里常常动念，就是：“如此为教育界服务，但此种教育究竟有什么意义？”他怀疑现在的教育，因而怀疑他自己的工作，最后得一决定，就是如果

不能办一种自己心里承认，合乎自己理想的教育，就不要再作这个仅仅是为大家筹钱吃饭的工作了，村治学院的动议就生于此。我以前曾说过，河南、山东的乡村工作与定县无锡晓庄均不同，不是由教育转过来的，而是由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逼出来的，若从柄程先生创办村治学院这一点动机来说也可说是由教育转过来的。在那时候我听他说他念头的转动最有意义，最为亲切。

不过，如实说来，河南、山东的乡村运动不是由教育转过来的话，仍是真的。河南的乡村工作确出于乡村自卫乡村自救。柄程先生他就是发动乡村自卫乡村自救之意最早的一个人，似在民国十年光景他写了一篇《国民武装论》，这篇文章实在写的很好，文字非常生动；见解也很真确。其内容主张就是要乡下人武装起来防匪防兵解决军阀问题。他不但写这文章，而他所致力，也就在此。在民国十三年，国民二军（陕军）等在河南驻防，河南地方所受的茶毒骚扰非常之大，这给他一种很大的刺激，发动他从事乡村自卫工作的意念。开头所作的差不多是一种比较开明的红枪会，后来感觉到失败了，他知道乡村人民知识不够，武装起来容易盲动，是很危险的。由这里他才转回来从训练学生交纳朋友来重新做这个工作。从这一点上才有河南村治学院的产生。所以说我们是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逼出来的话，仍是真的。

柄程先生本来是学财政的，曾经译过一本《货币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被选在大学丛书里面。后来因为他用心考求自卫问题，将中国古代兵制以及近代举办团练的成法，更加以后来外国兵制，而有《农村自卫研究》一书之作。在这本书里他不但对组织上训练上用心，并且在乡村保卫的工程上、器械

上也都非常用心，后来在河南村治学院以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都曾讲过这一门功课。

从以上这些事实里都可证明柄程先生的意念真挚，都可认识他真是从志愿出发来做此乡村工作的。如果我们追叙这些年来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有此局面，柄程先生实在是其中的一个最有力的分子！因河南村治学院的成立，大部分都是靠着，尤其是经费一项完全是由他筹划的，有了河南局面而后方才有山东的局面。如果往前去乡村运动能开大能扩展，柄程先生要算是当时最有功的，他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人！

后来柄程先生到邹平这两年，做事非常勤苦，所费许多心血，如办理自卫训练，举办成年教育，挖河等，都为大家所亲见者，我不再一一地去说他。

关于他个人的立身行事，大概据我所知者，为其早年非常穷苦。他曾于十七岁时一度入陆军小学，仿佛当去的时候是拿一条秋裤换了八百文才考进去的，其贫苦可见一斑。在十八岁时（1911年）就从开封跑去武汉革命，这段话他自己也说过，当时那种热诚激昂的小孩子气，和我小时也相差不多。后来南军战败了，而他这一部分人还没有名义番号竟出来维持市面秩序。革命成功后回河南，在路途中看见乡村所受的扰害，心里很有感触，革命军也不能不破坏乡村，以后不愿再从事破坏工作。后来他就去北平太仆寺街法政学校去读书，以写字卖文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住在一个会馆里面，天天煮一点稀粥来吃。可是在学校中他却成绩很好，是以第一名毕业的。当时有两位很出风头的同学，都和他很好，一个是高元（对国乐有研究），一个是吴统续，在法政学校办的一个刊物上常写文章，就被当时的交通当局收去用，报酬都很高，两个人都介绍他去，他偏不干。毕

业后回到家里，没有事情做，那两个人又把他找到北平去做事，他仍不干。他在家里是以手工业——作弹棉花工人——来维持生活，穿着短袄，拿着棉花在街上卖，从这点可以见出他的“不求人”，“有所不为”的意思很强。后来他在乡下作一名小学教员，薪水也不过十几二十元，当时和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李象三。李先生被聘为河南法政学校教员，因为他很看重柄程先生便和他掉换工作；李先生说：“我没有家室之累，不需要收入甚多，你家庭负担太重，我俩交换好了。”柄程先生就是这样才到高等教育界去任事。如李先生这样人真很难得，也因为柄程先生才能有这样好朋友。由此，后来才到河南大学任法学院院长，教育款产处处长。如这些，柄程先生都有许多令人不可及处。

至于他的才干，他所表见的成绩，都是很好的，邹平如果不是他，现在也许不会做到这样。很没想到他仅以四十三岁的年龄而我们的事业仍未成功十分之一的时候故去，这真是令人如何的痛惜！

《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11期合刊，

1937年3月1日。

## 谈儿童心理<sup>〔1〕</sup>

我对儿童心理，自觉有点了解，此颇得助于两人。一是卫西琴先生，他帮助我对于儿童与妇女的心理的了解很大，此处暂不说。一是陶行知先生。陶先生提倡小先生制，在上海办“山海工学团”。所谓“山海工学团”者，山海是地名——山，是宝山县；海，是上海——工，是工作；学，是求学；团，是组织；在组织中工作、求学；此三件事为人生不可少。

在工学团中实行小先生制。上年我到上海，顺便去参观。工学团设在宝山县的乡下，有一中心机关，另外分出去的机关有五六处，距离六七里，或七八里不等。我们先到中心区参观，随后又到分的机关去参观，当时请一人领导前往，行至半途，领路者因事要回去，恰好碰着一个小孩子，年纪不过十来岁，就招呼他来领导我们。这孩子面黄手黑，情形可怜，似乎父母不双全而无人照顾的样子，他领着我们走时，一位同路的朋友与他谈话，觉得这小孩的头脑很明白。参观后还是他领导我们回来。在回来的时候陶先生才想起问他贵姓。他答应姓张名耀祖。陶先生听了很惊诧，又问道：“在《生活教育》上有篇署名张耀祖的文章，是不是就是你投的？”小孩子答道：“是的。”我们也很诧异便问陶先生那篇文章是讲的什么？陶先生说：“内容是叙

〔1〕 朝会上一次讲话的记录，时间与记录者均不详。

述他作小先生的经过，先是教他的妹妹，后来又教他的邻居，写的很清楚明白，我连一个字没有改给他登出来了。”

当时同行的人很多，都很有兴味的在讨论这个问题。陶先生又说：“往往大人写几千字的文章，虽无错字，或不通之处，但无趣味无价值。小孩写的很短，许有错字或不通处，但颇有意思，因为他是真的。”

我也发表我的意见。我说我对儿童的观察，发现他的优点与缺点。其缺点在后天的经验习惯不够，与继续的忍耐力、注意力不够。经验习惯的不够，是因年龄尚小，忍耐力、注意力的不够，是因为兴趣太多太强。儿童完全靠兴趣，而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容易掉换，所以忍耐力与注意力不够。除此两点外，儿童无有缺欠。至于他的优点，根本胜过成人，当他对付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以整个的真的生命力量去对付。此即中国古人所谓“诚”。然则在大人则容易心中有牵掣，用心很杂，不免敷衍，而小孩不然，要干就干，不会敷衍作假，他比较顺他的冲动集中他的生命力，这是他根本的优胜点。如果我们拿一件事情交给他做，他感兴趣而接受时，他可拿他整个生命力量去对付，很少失败，凡他力所能胜的他都可作得好。卫西琴先生说：对小孩要能信任他，要给他以相当的责任，就是给他一个够量的刺激，他很少疏失，凡应当照顾的他都可照顾到。这话很对。

儿童还有第二个优点。在成人有了经验习惯，因头脑未受着高明的教育，往往弄乱了。儿童则尚未有机会来搅乱他的头脑，所以较大人少糊涂，这也是他优长的一点。平常大人作文章，一定要学什么套头，说些不相干的话，这就是弄糊涂了。小孩子不会作文章，只是老老实实说话，本着他经过的先后重轻

摆出来，一点枝叶没有，这就是好文章。大人用心复杂，一面在作文章，一面又在想要见好于人。小孩子不杂用心，纯是真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一哭一笑，也都有意味，有价值，而能感人很深。最不好是作假与敷衍，譬如常常有许多人向长官上条陈。作的很长，而都是空话，因他是假的，所以没有亲切的真内容，看后只有丢掉了。儿童则没有这成本大套的敷衍，因他根本就不会。

说到这点，我们就要注意教育怎样才能帮助人明白而不至使人糊涂。一般的教育——家庭社会都算在内——往往把儿童毁伤，把儿童教糊涂了。我所看到之张耀祖，非这孩子特别优越，许多别的孩子与他都差不多。这孩子的好，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陶先生给以适当的刺激，教他作小先生，要他写自己的经过；一是他少受后天的损毁。这两个原因是发挥他的能力的来源，并不是他个人能力有什么特别的优越。

《乡村建设》，6卷10期，

1937年1月1日。



## 怎样阅读《乡村建设理论》<sup>〔1〕</sup>

我们在早晨抽出这么一点时间，讲一下乡村建设运动。现在我先拿印出来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读法，给大家说两句。

乡村建设理论，我觉得很有系统，处处都照应得很周密。无论那一处，扣合得都很紧。所以看要从头到尾，才能透彻地了解，抽出来割裂来看，却不容易。虽然如此，还有一个办法，也许对于看的人更好一点：就是把握着重要的问题，大的问题。如果这样看的时候，也许容易让读者易于了解。

所谓大的问题，就是下面的四个问题：

一、对于旧社会的分析认识——这句话是我全书的根据，以后的发挥都根源于此，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关于这点意思，大概集中在《乡村建设理论》23页至75页。

二、中国三十年的政治问题——三十年来，大局总是纷扰不宁。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并且找出解决的途径。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很多，最有关系的是4页至5页；75页至136页；308页至367页，以及书后的附录。上面的这些，可以说都是讨论政治问题的。如果单抽这些页码，单求了解上面的问题，很容易增进了解，比看全书仿佛还要灵便。

三、经济建设要走的方针与路线——这个问题是许多问题

---

〔1〕1937年4月28日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演。吕公器记录。

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往前去，就是经济建设。它的方针与路线，在全书很占重要的部分，11页至16页，367页至441页，这两段都是讲中国的经济建设的。

四、乡村组织问题——我们常说拿乡村的组织作为新社会的缔造。如何缔造新社会的讨论，大概有这么几段话：104页至136页，这段话自表面上看不出是讲乡村组织及新社会如何缔造，可是这段话，正是讲新社会缔造的根本。这段话的意思，是讲中国人与西洋人的不同。这个问题就暗示出新的缔造，一定得在中西如何沟通的一点上，不能屈了我们的精神（过去的一些运动的失败，即是屈了我们的精神，）也能容纳人家的精神。136页至308页的一段话，是正面讲如何组织乡村；442页至454页，是讲新社会乃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这几段话，也可以把它连贯起来看，因为都是关于新社会如何缔造的问题。

全书的意义，都可以归到上面的四大问题。如果能这样的把握着重要的问题，分开来看，也许可以较容易了解。不过也不能太呆板，这样分得太严也不对，因为问题与问题是相关的。比如讲如何缔造新社会，则你必要了解旧社会；问题都是一个扣一个的。尤其扣得紧〔的〕，便是政治与经济。像上面的四大问题中的第二问题与第三问题是扣得很紧，第一问题与第四问题，也是扣得很紧。关于经济建设的一些话，在讲政治问题中间也都说到的。假定你看政治问题的话，接着要看经济问题的部分，接着还要看全书；要互相参照的看，才能更亲切地了解。

关于如何读《乡村建设理论》，我说到这里为止。

《乡村建设》半月刊，6卷19期，

1937年6月16日。

## 乡村建设与合作<sup>〔1〕</sup>

诸位先生、同学：

贵院与合作学院是研究合作从事合作事业的，而我对合作是很少研究，是外行，所以此刻只好从乡村建设讲起。但为讲话便利，要分五层来讲：

第一层：中国此时代的自觉和认识

我们要认识中国今日是一个什么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就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上的大变动所造成的大变局。我们中国本来有特创的文化，一直到现在，尚且保持，民族生命仍是继续繁衍，其他民族没有绵续到如是长久的。其他民族总是半途消沉了，但我们则不然。而且过去我们的文化是一度优越过人的，他族虽用武力征服我们，但我总可以使彼等同化从我。朝鲜、安南、暹罗以及蒙古、北方满族，都是要读中国书，写中国字——可是近百年来，世界大交通，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相接触，我们起了极大的变动，也就是到了大变局的时代；我们反去读外国书，写外国文，讲外国道理。几千年优胜的文化，与西洋人相见面，而我们就失败了。中国文化见败于西洋，在缺少新科学和新技术，中国固有文化便动摇，社会也因而动摇，以

---

〔1〕1937年5月26日，赴四川途中，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合作学院讲演。孔凡定笔记，未经作者寓目。

至崩溃，这是无待言的。中国的文化是不能用，没有用，不够用了。那末今后如何？

### 第二层：文化再造才有民族复兴

随着文化崩溃，社会动摇，而民族也随之覆亡，这是一方面的结果。否则，必定随着文化再造而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而有文化再造，这是一件事的两面，实是一个理。中国民族复兴就在此中求！中国文化再造亦在此中求！

如果有人问我中国的文化再造和民族复兴是如何着手呢？且等我下面讲。

### 第三层：新技术和团体生活并进

因为中国文化的短处，是缺乏科学和没有新技术，那么，要提高我们文化，就得要努力科学和增进生产技术，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我想尚有更要紧之点，那就是团体生活。不象从前大家关门过日子，各顾自己，要运用团体生活，组织团体来代替我们个人的生活。恐怕中国定要这个样。这两个改造，我想已够。把这两个要素容纳在我们文化里面，新文化就成立。而两个要素，恐怕又是相连，这因为科学是要有组织的运用，就有采用到团体组织的地方，我们要求的也就是用团体组织来运用科学。这或许就要同西洋人不一样。西洋人用科学是为个人营利，个人发财，个人与个人的自由竞争，但现在中国则不能照此利用走通这条路。过去和现在西洋人的好的科学，好的生产技术，好象是尽了帮助个人的忙，多造个人利益（虽然社会也有些好处，）而中国不能以这样方式利用新科学新技术了，须要有团体的组织。团体的组织愈发达，愈坚固，利用新科学新技术的效用愈大，而当真的帮了大多数人的忙，大家享利益。

#### 第四层：要翻身在工业，而凭藉以翻身的是农业

中国将来的新文化，一定要用科学，一定要用团体组织来运用科学，但何以见得中国与西洋有不同？则进一步说，因为中国文化必萌芽于乡村。如果新的文化要萌芽在乡村，一定是要用团体的组织来做基础，新的文化的团体组织恐怕是要从乡村入手；新的文化的缔造、萌芽，也要从乡村起手，出发。其理由：

（一）我们要从散漫到组织，而中国人大多是在乡村，所以乡村无组织，中国也就无组织。

（二）中国的大社会，好像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最注重是家。但我们若从家起手，自未免太小太窄；从国起手，恐怕也是太大，太渺茫；不大不小为入手的一个单位，就是乡村。

（三）中国目前犹是以农业来支撑的社会，如日本工商业很发达，就全人口说，一半就在都市，乡村与都市有相当的冲突；英国是七成人口在都市，所以都说不起乡村二字，而中国到今日止，可以说全国都是乡村，乡村可以包括都市，全部是取用在乡村，靠乡村。所以我们要求进步，必须求乡村进步，而这进步才会平均不偏颇。

（四）末了一点更重要，就是中国经济愈坏，社会越崩溃，我们要文化再造民族复兴，则必须要中国经济好转，而这经济不是别的，恐怕就是农业经济的转机。因为我们受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结果，我们要翻身固在工业，但又不可能直接从工业起与他们竞争，所以凭藉翻身的是农业，第一步就要农业的好转。如果要求农业的好转，就要从组织乡村入手。第四层的意思在解释第三层。乡村组织深一层的理论与实际，请看我写的

《乡村建设理论》，此处不能多讲。

#### 第五层：改造乡村经济的路子在合作

我讲第三层，是说西洋人是把科学为个人营利的路，但我们从乡村组织入手，只有团体组织有一分，新技术才有一分，或者就可说是从乡村合作入手。

中国文化的缔造，民族的复兴在乡村，那末乡村人民就必须合作，共负艰巨。因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逼得我们没有法子去生存，也即非实行合作，必遭灭亡。人家竞争力量太庞大，我们真是在生产方面不合作便不能生产，消费方面不合作，便不能生活，再不能各自为谋，而应相谋。反之，如用西洋老路子，则各人营利的结果，中国农业必将更坏更难堪！决没有复兴好转的日子。因中国农业在乡村，而乡村经济改造的路子，就在合作。

刚才我不是讲过翻身在工业，凭藉翻身的是农业吗？这就是用农业来提供工业的需要，和发生工业的需要（如农业技术用到各种机器）。我们用工夫在农业，农业好转，农民也就增大了购买力，工业需要扩大起来，这时农业和工业也就相继地走上了合作，而合作也就代替了工业的组织。为什么要如此？因为中国人已被迫得没有了从事个人营利，个人自由竞争的余地！

上面的话，就是说用农业来引发工业，而西洋人却是走商业引发工业的路子，但商业来引发工业的路子，我们不能走了。西洋人的工业，是建筑在外面的，取人家的原料制造工业品；将来中国的工业是建筑在自身上面，用自己的原料制造。所以用商业来引发工业是走向那一边，以农业来引发工业，是走向这一边。乡村建设的科学基础，是农业引发工业，组织乡村，大

家合作，造大家的利益，决不能走那西洋人为个人营利和自由竞争的路子。

《乡村运动周刊》，10期，

1937年6月7日。

## 乡村建设运动纲领讲述<sup>〔1〕</sup>

我所讲的，正是我写的一个东西——乡村建设运动纲领。那就是把我们乡村建设运动想要干的是些什么？（我们的主张、目标与作法）很明白地一条一条地提出来。在乡村建设运动纲领里，一上来就是要谈政治与经济，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什么表示。

**第一条纲领** 底下，差不多是按照我写乡村建设运动纲领的顺序来讲。在这里头，一上来是说乡村建设运动是要完成近百年来世界大交通所引起的中国老社会的剧烈的变化，而给他找一个结局，找一个着落。那么用另外的一个名词说，就是要完成乡村建设运动的任务，缔造出一个新的社会。这是纲领的头一条。

这里头包含了几层的意思（我只是点明里面的几层意思，很详细的我不讲）：

一、就是表明了我们的运动，在外人看象是枝枝节节的改良运动，而实在不是。他是要完成“革命，实在是抱着远大的理想而作根本上改造。”

二、所谓完成革命，就是指从世界大交通所引起的老社会的大变化。中国原来的秩序，从根本上被推翻。所谓根本上就是指最后的地方（如精神、观念、信仰、风气、好尚等）。

---

〔1〕 1937年5月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讲演。黎曼笔记。



也许和最后的地方最有关系的是经济，可是，经济被推翻了。这都是大的革命，最深的革命，是牵连最广的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指这个剧烈的变化说。

三、这个变化就不能终止，非到一个结局不能终止。仿佛石头自山上往下滚，非落地不终止，即是说非调和非均衡则不止。所谓调和与均衡，即是新社会的出现。这个意思，不要说我们不想改良，就是想改良也不行。所谓改良，就是维持现状；想维持现状是作不到的。

四、不但中国本身的变化非找一个结局不可，即是世界、人类，也到了一个特别的阶段。人类的历史，到了一个大的转变期，到了大改造的时候。中国在这个世界里头，如果要改良，则更是作不到。即是你没有远大的心胸，也非逼着你有远大的理想不可。所有这上面的意思，都包含在这里头。（这些意思在书上的那一页，我没查，等查了以后，再指出。〔1〕）

**第二条纲领** 第二条纲领是乡村建设的进行是如何。在消极的一面，是反对一切民族社会内的斗争的破坏行动，这种破坏行动非反对不可。重要的就是反对共产党，也可以是说以前的共产党，因为现在的共产党已表明不作对内的斗争；然而究竟真相是不是这样，底细我们还不能明白。不管是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只要唱斗争的理论，就是对中国社会没有认识。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意思，简单的说，有下面这几层：

一、中国的革命，不是通常的革命。通常的革命是自下往上，而中国的革命是自上往下。这很奇怪，而中国就恰巧是这

---

〔1〕见本全集第二卷《乡村建设理论》中“乡村建设由何而起”一节之（丁）部。——编者

样的革命。所谓上，就是指着政治上经济上的机会较好占着优越地位的人；政治上经济上的机会不好的人，就是下。通常的革命，是机会不好的人来革机会好的人的命，而中国是自上往下革。因为中国革命是自外引发的剧烈的变化，而不是社会内部的爆发革命。

按照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顺着中国历史，他是没有革命，革命之所以起，是自外引起的。说的更明白一点，中国革命完全是留学生在那里领导，即不是留学生，而也是留学生的徒弟。因此他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民族自救；不是单纯解决政治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而是文化改造。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这是我们的题目，故不需要斗争，不需要破坏。这个话也是相对的，只是说需要破坏的是比较的少。

上面的意思里面还包含了一点意思：就是中国社会的散漫，在那第一个大问题里头的分析认识，就是分析中国社会的散漫。先就假定中国社会是散漫，是散漫而就不能讲斗争。因为斗争是集团性，只有集团才有斗争的力量；不是集团，便不好斗争。中国社会是散漫，此疆彼界很少，打不起来，不好斗。

中国社会缺少分化，故在历史上缺少革命。虽然外面引起来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而中国的散漫，则无法讲斗争，因为斗不出结果。我们并不是爱好和平，怕斗争，而是因为斗争不出结果来。

二、更其要紧的，是旧秩序破坏，已经推翻了。（象辛亥革命，十五年的北伐，十七年的北伐完成，）旧秩序已破坏，则斗争更无从斗争。所谓斗争，就是破坏障碍；所谓障碍，就是秩序。现在中国的旧秩序已推翻了，则破坏即无所施。（这也〔是〕相对的说法，并不是说旧秩序完全推翻了。）中国现在是

无秩序，而不是有不平等的秩序，或者说没有秩序大过了不平等秩序。

三、我们这可以让一步说，旧秩序还有他的势力，然而这旧秩序势力之所以有，乃是因为没有新的替代他。换一句话说：在没有新的以前，非有他不可！比如：民主是新的，有了民主，自然旧的方法不用，然而还没有民主，则专制独裁的势力，当然还有残留。你想要旧的方法不存留，而不要自去掉的地方去掉，而要自培养的建设方面。如果要破坏、斗争，则社会不能向前进，新的秩序，将永远建立不起。

所有这些意思，都包含在第二条纲领里。

**第三条纲领** 底下再讲第三条纲领：

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在消极的一面，而是在积极进行的一面。我们积极进行的是什么呢？就是进行的建设。不过这里的建设，得加下面的两句话，即是解除外面的缚束。（所谓外面的缚束，即是指着国际的压迫，如不平等条约，限制了我们的。）并且调整内部的关系，要在这两面底下逐渐地往前进行。建设一定在这两面底下逐渐的建设。这两面是互为因果，就是解除了一点缚束，才能建设一点，建设一点就有一点的力量，有了力量才更好解除缚束，而更多建设一点。我们无法一步登天。

我们乡村运动的完全名称：“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它是求平均发展的一种普及建设运动。因为要普及，所以加上了乡村两个字。乡村是需要特别建设，因为西洋人的建设，多偏重都市文明，自历史上看，多半是这样子。因为它有所偏，即是不普及的。普遍的进步——非点出乡村二字不可。乡村是表示普遍，对于普遍与平均的建设运动，必须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达到预期的目标，完成新的建造。所谓乡村运动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来分析第三条纲领。

一、外面的束缚，诚然是我们进行建设的障碍，必须解除外界的束缚，我们才能从事建设。可是难说先后。不能说先建设，而后解除外界的束缚，亦不能说，先解除外界的束缚，而后再建设。很有些人象是偏重于一面，在许多杂志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对的。凡是这样说话的人，只是说话而已，他拿不出办法来。在乡村建设理论里，有好几段是讲这个意思。最先讲到的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之路》。

在那篇文章里是分析帝国主义与军阀，都不是正确的革命对象。关于军阀不是革命的对象，我们暂且不说，我们先说帝国主义为什么不是革命对象：那就是因为中国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和各国都有国际关系，还没有到印度、朝鲜、台湾、琉球的地步。如果我们要是印度、朝鲜、台湾、琉球的话，则我们当然以帝国主义为我们的革命对象。现在我们解除束缚的反抗，这不是革命，而是国际战争。要是国际战争，则就有交涉，就有抵抗，如汪精卫先生所说：“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比如一家有个门，不走前门，还有后门可走。从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指出最勇于反帝国主义的北伐，他见了帝国主义非回避不可，如民国十七年时日本占据济南，北伐军就得暂时回避。这个缘故就是因为他还有后门可走，他知道拼是拼不出结果，因为在武力的较量上，我们不如帝国主义。民国十六年在武汉，我们表示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帝国主义却把经济侵略收回。轮船不开了，工厂停闭了，洋行也关门了，与外人有关系的矿业也歇了业。这是帝国主义退却，理应好了，可是不然。轮船停航则洋货不能进口，日用品即告缺乏，尤其是没有煤油，武汉

三镇即成黑暗世界；工厂停闭则工人失业，无法安插，无外货进口则海关无税收；无煤矿则车不能开。这时的革命军就马上要崩溃。这就是证明，我们虽然要抵抗外界的束缚，而还得建设，抵抗与建设难分先后。因为这样的原故，所以我们就逐渐地解除束缚，不能一步登天。关于这点意思讲得最清楚的是《乡村建设理论》第19页。我们可用19页的话归结我们的意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了个人的不健全。从四万万个人一个个来看，未尝不是活人，可是毋乃社会是个半死的社会，这个叫做社会麻痹瘫痪症。失去了一个民族社会所应有的机能，本身无力量，故受压迫；要本身有力量，对外才能解除束缚，所以我们说是逐渐地。这办法在底下。我们是不说空话，我们不发感情的高论。

二、有些人只是忙着建设，而不注重调整内部的关系。现在的政府，我们就感着是这样。在现在差不多有一派思想是这样，他们不主张乡村建设，而主张发达工商业。这样主张的人和政府很接近。政府无方针，是最大的病。有这种不对方针思想的接近政府，使政府来盲目的建设，这都是不注意调整内部的关系。我们是非常注意，一边调整内部关系，一边建设，等到内部关系稍为调整，建设亦可开始进行；建设好，则内部关系当更为调整。象接近政府这一派人，不但不能调整内部关系，而且还使内部关系益趋紊乱，这样子就是制造未来的斗争。我们反对的两种人——一种是讲斗争的人；一种是制造斗争的人。我们反对现在的斗争，也反对未来的斗争。所以我们第三条纲领：在逐渐地解除外界的束缚调整内部关系之下，而来进行建设。这样是可能的，是最好的。

三、这只有两句话：中国是以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这话的意思，是一面进行建设，一面达到平等。这个平等，是从进步里得到，不是从破坏与斗争中得到。关于这句话，这书上可以参考的地方很多，无法一条条来引。

四、乡村建设是普及运动，有方针有计划的向前进行，达预期的目标，以完成我们的建设，这话是表示零碎、各不相谋的乡村建设运动（如划邹平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这不是我们的意思。他是要在大的方针之下来作，然而现在我们的作法就不对吗？不！这是个开头，是创造一种风气。真的乡村建设，是普及发展、平均发展，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意思在此书讲的很多，尤其是经济部分，非在大计划下不可。

**第四条纲领** 现在讲第四条纲领；是接着第三条所说。

如此则必须政治问题得一个相当的解决才行；也就是说，能形成一种动力来担负你的工作。比如，解除外界束缚，则谁来解除？靠谁来解除？这必须有个能动的力量；无此则都是空话。第四条纲领：要紧的是相当的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形成一种力量，好来进行建设。

一、不解决政治问题不行——政治问题是什么？这个可以看《乡村建设理论》第9页“乡村自救”的一段里讲的很明白：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能政治，或“政治的没有”。里头的意思，大家可以自己看。还有后面讲中国问题之解决，比如319页，也是说明中国政治问题在那里；还有22页及18页都讲的有这些话。

总起来说：中国自受外面的影响（世界大交通）以后，开头诚然是外面的力量大，可是不能忽略的，还有里面的力量

(如社会内部的冲突、矛盾、崩溃)；如果只有外力，而我们内部的力量还有，则你也可以阻住外面的力量，然而我们内部的力量却崩溃无有，后来且转成内部的问题，故政权分裂（如广东代表南方的一面，北洋军阀代表北方的一面），无论那一面所感觉关切的是另〔一〕面的力量，外力还是其次。这就是问题自外转向内。内部问题最亲切，他们要冲突，则更破坏，更崩溃，更向下沉沦。开头是外面的力量，后来是自己毁自己，这比外来的力量要来〔得〕厉害。

想要中国社会好转，很明白地就是先调整内部关系，让中国社会本身能形成一个力量；自己不自毁，并且还能应付环境，这就是好转。中国的转机就在这里。这是后面的话，我们此刻先不说。我们最迫切的要求是大局的稳定与统一，内部无问题则方好应付环境；不向下沉沦而向上好转。这稳定与统一，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如此则逐渐解除外界的束缚才好进行，有了一点力量才好建设，都是辗转循环互为因果。所以非解决政治问题不可。

二、普通人是多要求而少办法，或者有办法是侥幸心。一问谁去实行，则他便要拙口乍舌，这个话是最无用。真正是要作事情的人，不单有要求，而且有方法；不单有方法，而且自现在立脚起往前形成动力，担负工作，实行方法。动力非自我形成不可，有了动力不患无方法，有方法却不必有动力。第四点里头是要我们形成动力。

三、有人以为现在不好谈政治问题，一则是现在的情形比较缓和，大局很倾向于稳定统一；一则是此刻我们正应当一致对外，如果谈政治问题，似乎又生枝节。这个我们可以回答：头一层说无妨谈。旁人谈也可以说生枝节，我们乡村运动者则是

无妨的。为什么？从上面的理论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我们一面认定要稳定要统一，反对破坏斗争，同时政权属谁都可以，（在乡村建设理论第314页讲的很明白）政权属谁都一样。因为在中国社会分不出彼我，所以政权在中国属谁都不成问题。我们再三地分析出来，乡村建设运动者不能要政权，这是很明白的。因为一要政权，则我们就为政权所支配，而不能站在社会方面左右政府。我们不反对现政府、现政权，于现政府毫无妨碍，引不出内部枝节问题，故无妨碍。

再说有谈的必要。如果照我们这样政治性的活动，其结果有二：一可以增厚现政府的力量，一可以给现政府以方针。增厚政府力量是必要的，因为更好增进内部关系，才好建设。尤其要紧的是第二，给它一个方针，因为有个方针，它不是盲目的建设，否则是临于不好的前途。这二点是政治问题的必要。

更实在说，目前的稳定是太不牢固，并不是从根本上往真的统一里去，虽统一而未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中国政治问题要得真解决，非走我们的路不可。

现在声明以上二点：一是无妨，一是必要。这是第四条纲领。

**第五条纲领** 此政治问题之解决，要靠多数人在经济上有力的要求所形成之一大势力。此一大势力透过了政治，就是能实行的动力。乡村建设运动所以能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正为其具如此条件。这一条纲领很需要解释。这些话还是很抽象，底下讲政治问题的时候，可以说得明白一点。

中国有一句话：“道不虚行”。我可以借此句话说：“政权不虚立”。一定要靠一个大的势力，它才能稳，才能久。它要给这个大的社会当家，它得有实在的势力在后面支持着。这个大势



力是什么呢？它有好几种成分：类乎是兵力也不可少。政权的分裂即是武力的分裂，无武力即当不了家，然而单要武力也绝对不行，武力犹之一把刀，光有刀是不行。第二个条件：中国这几十年来，看着支配大局的力量好象是武力，实际上还是文人而不是武力，还是种种不同的思想潮流所影响。比如在清末有立宪思想有革命思想，末了革命思想占优势，武力即为革命所用。袁世凯称帝，拥袁的大有人在，可是转瞬之间都转到反袁的旗帜下面来。武力是工具，不一定给谁用，能用武力的都是一时一时不同的潮流，能为潮流之主的，还是文人，有脑筋的人。单是兵力成功不了势力，还要有思想学说，否则此势力还不成。

综以上的话，光是有道理不成，光是有枪杆也不成，然而把道理与枪杆合起来就成了吗？还不成。中国过去的毛病就在这里。因为没有很亲切很实在的要求，顶多有空泛的广漠的好意思。类乎是救国，救国这个话很空泛；类乎反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这话是空泛是广漠，不亲切，只能算是好意思，不是从非常必要的地方发出来的要求。这个好意思是人人要有，可以有，而不是从生活发生亲切。一切的政权是真正能站得住，得到多数人的拥护，抓住多数人的要求（如希特拉之所以能在德国站得住，便是他抓住了多数人的要求）。你不合乎多数人的要求，用力用道理都不行；要想成真正势力来支持政权，哪种人是社会中最不可少的人？那便是农工商。他们都是于生产有帮助的，社会靠他们顶要紧；看着是文人的花样很巧，枪杆的力量很厉害，可是他们都无根，有根的是农工商。如果势力不坐在农工商上面，势力便无根。这个多数人是指着中国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靠资产阶级。这里的多数是指着农民，乃至

农民以外的人。它是个要求，是个经济的要求，或含着经济性。这个要求最亲切最落实。那许多好意思，不是不亲切，便是不落实。这个要求有力量，拿这个要求作后盾，则就实在了。否则飘空不稳当没准。如十五年十六年的国民党则为反资本主义，而后来则变了。它以前反资本主义就不亲切，因为它不是工人，而且自己还往资本主义道上走。单是寄托武力与文人方面的政权，不会久，不会有准方向。我们现在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个势力可以成为大的势力，因为它有内容，它有一个要求，它是合于多数人，它是综合多数人的要求。它有方针。照中国社会的形势，它只能间接地操纵政权，而不能直接。此点以后讲到。政权一定归到这个地方，政权方有力量、有方针，不会盲目来建设，向脑子里来建设，这就是我们将才所说的增厚政府力量，给政府以南针。

上面所讲到的，是说过去的太空泛，过去的政权太是文人与武人的结合，那里面没有亲切的要求，而只有空泛广漠的好意思。这空泛广漠的好意思，人人得而有之，人人得而赞成之。唯其如此，所以无人亲切地拥护它，就是文人自己，以所说的不亲切，没有准方向，自己也很容易变。这样的政权无法巩固，无法有力量，无法不盲目地作事情。这样的政权，它容易分裂：因为是空的，没有跟社会最要紧的一部分人（农工商）发生亲切的关系，得到这一部分人支持。勉强说，南京政府也可以得到一点支持，然而它不是社会最要紧的一部分人，而是上海的商人，如银行家、资本家的支持。这个是危险的，是走向错误的路上去，是走到歧路上去。现在它是有这么一点，虽然有此一点（与商人的关系），可是很不好，很不妙。

乡村运动之所以能解决问题，正因其具如此（农工商）条

件。这可分二层来说：

一、乡村建设运动包含多数人的经济要求在内，我们分两点说：

(一) 乡村运动是很多不同的来历而来的。(这个在《乡村建设理论》里的 346 页、356 页及附录第 12 页，都讲到这些意思。) 这是个事实：在民国二十二年的时候，在邹平开第一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时候，在那个会议席上，我在那时听各机关团体的工作报告，当时我发生了很活泼的感情的感想：“真奇怪！很多不同思想的人，从四面八方都来了。”如河南的是从乡村自救来的；华洋义赈会，是从赈灾救人，本不会到乡村工作这条道，而转来转去也转到乡村来；定县的平教会，本为识字运动，却转到农民生计，又转到乡村工作上来；象无锡的工作、晓庄师范的工作，他们最初本是教育团体，而到末了也转到乡村工作来；中华职业教育社，开了很多职业学校，造就了一些工业及商业上的人材，以后也转到乡村工作，而叫做农村改进。这是十年来的事实。许多不同的人，许多不同的来历，都归到乡村工作。其他的更多：比如卫生家，亦归到这里；办银行，亦愿作乡村贷款；燕京大学以一学术机关，亦要找一区域作试验，也到乡村工作上来。诸如此类很多。这个仿佛都寻到了根，找到了家。乡村工作是中国人东忙西跑，到末了找到家的工作，是叶落归根的工作，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联合果能抓住多数人的要求。他不空泛，虽然他还不免有点代理人的嫌疑，犹之方才说的“好意思”，他们都是代理人。乡村建设运动也不免有代理人的嫌疑，比如我哪里是乡下人？我和他们究竟还是不很亲切。但究竟不同，其原因就是我们找到根上来了。因为中国社会是自外引发，先变的是知识分子，他变了再领导其他的人变，

故代理人是中国社会革命不可免的情形。比较这些代理人，我想乡村工作代理人还好一点，因为找的是接近乡村农民本人的人，而再转到农民本人身上，也就是越来越可以寻到真的农民、真的多数农民他们所有的亲切的真实的的要求。乡村工作开头是寻根，以下的工作是条达多数人亲切的要求，这时乡村运动是很实在，因为有多数人的亲切要求在里面。只有乡村运动有此希望，只有乡村运动能作到。中国现在所苦者为乡民的亲切痛痒没有条达出来，他们只有在心里抑郁烦闷，而无法说出来，即出来也不是一条道，在这里非要知识分子条达不可。底下我们可以再解释这个意思。

(二) 我们亲眼看见乡村运动的扩大与开展，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单靠我们倡导，还不知要等到那一年。正在着急的时候，忽然来了——农村崩溃（农村崩溃在二十年以后，最著在二十二年以后）。大家注意乡村，热心乡村工作，实在是由于农村崩溃而发于救济，这样增加了我们的力量。我们真没想到而它们来了。我心里最清楚，我没预备忽然它会来这么快。这不是因为我倡导，而是自农村崩溃牵动了每一个人，大家都痛了。自这一事实可以见出来乡村运动是很实在；这里含着多数的亲切要求，与以前救国运动不同，不广漠不空泛而来得真切实在。上面这两点事实都是证明乡村运动是多数人的经济要求。

二、不单是多数人的要求，而且有方针，或者我们给他条达一个方针。乡村运动是知识分子作前锋，他的任务就是条理农民的要求，作成一个很有一贯的主张，办法的要求，这就很影响政治。这就是说：乡村运动对中国经济建设有认定的一个方针路线。乡村运动之为乡村运动完全在这一点，若无此，则无所谓乡村运动，那是模模糊糊求中国好、社会好，是不行的。

这是我们为乡村工作而条达出来的。等条达到之后，虽然不出于乡人的脑筋，可是亲切落实（这个详《乡村建设理论》之 71 页以后所讲的）。

《乡村运动周刊》，6—9 期，1937 年 5 月 10 日、  
17 日、24 日和 31 日。

## 略述乡村建设运动要旨<sup>〔1〕</sup>

兄弟很久就想到四川来。四川虽未到过，朋友却很不少，所以很久就想来。这次来，并承很多朋友到机场相迎，实在不敢当，趁此致谢。

今天市府约我到此讲演。今天要谈的，还是我们在国内提倡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什么？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一个运动。

中国在近百年因为和世界大交通，所以就让这个老的国家陷入新的环境之内，被动的环境包围，受新的刺激，继续不断的变化。因为老的文化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不能不变。中国两次革命，无非都是中国人想变化以适应新环境。不过在多次的变法、维新、革命之后，都未达到完成民族命运向上的道路。民族仍在不幸的命运中，向下沉沦，始终没有完成民族自救，民族向上；在这时，就发生了乡村运动。

乡村运动，说远是在民国十年，最清楚是在民国十五年，开展还是在北伐完成以后。民国十五年的北伐，在民族自救运动，有很大的力量；乡村运动就是跟着这时起来的，而开展却是北伐完成以后。这就是说，在北伐以后，还不能看见民族自救运动的好转；这时乡村运动能够格外开展，不啻就是要来完成历

---

〔1〕 1937年6月4日在重庆青年会对中等学生演讲。

来所未完成的民族自救工作。所有前此的维新、革命诸运动，在历史上说，却是不得不有的，但都好象没有完成民族自救，没有完成革命乡村运动，就是完成这个民族自救，完成这个革命的工作。它是民族的最后觉悟，它是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一幕。这是第一层话。

如大家要问，乡村运动它想完成的，与它主张的究竟是什么？从消极方面说，它反对中国民族社会内部的一切斗争、破坏，更反对任何名义的一切国内的战争与破坏。

为什么反对？有两点：

第一点，因为我们看，中国革命，不是中国自发的革命。普通社会的革命，都是从社会内部爆发，而中国革命却是自外引发，这个话细说很长，本来中国历史上没有革命，只有一治一乱的循环。

倘若没有世界大交通，清朝皇帝也许会倒，但起来的也许又是一个明太祖，而不会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孙中山先生所领导是近代式的革命，无论是1911，或者1927的革命，都不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如明太祖一类的改朝换代。这种自外引发的革命，即表示其由于阶级与阶级间所引起的问题小，而由于民族与民族间问题则大。整个中国是一个民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阶级革命就需要内部斗争破坏才能完成。因为是自外引发的革命，就不需要内部斗争。要向外斗争吗？这也不多〔够〕。真正的需要，可以确切的说，只是中国本身的进步。中国本身进步，才能得到国际平等，才能达到中国民族自救的地步。内外都不需要斗争，需要的是进步，是新的建设，因为中国革命是自外引发的。

第二点，因为乡村运动起于两度革命之后，北伐之后。如

果中国革命还需要推翻破坏社会秩序的话，就大体说已经过去了。中国在北伐以前，都是社会秩序缺乏，法律无效而不是有一个不平等的秩序。如果是秩序缺乏，就须要作秩序建造工夫。中国不是秩序不平等的问题，而是秩序建造的问题。所以两度革命之后，更需要秩序建造，而不是斗争的革命。

这是说明我们消极一面的主张。

再说我们积极主张的一面。可以说我们所标的建设二字，便是我们积极主张。但我们所需要的建设，是革命的建设；我们反对盲目的建设，没有方针的建设。

我们的方针呢？很简单，就是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我们要从乡村进步去繁荣都市，反对从商业的路子繁荣都市，反对离开乡村繁荣都市。

这时我们需要明白西洋社会，乃至日本社会，他们所走的路线，恰是与我们相反的那个路子。大家知道英国是工业最先发达的国家，但英国工业不是建筑在自己社会上的，英国工厂的开门关门，开工停工，完全看他东方的市场、中国市场的销路如何而定。他的工业，不建筑在他本国社会上，而建筑在国外殖民地。他从国外取原料找市场。他的工业离开乡村，不由农村引起来，不从乡村繁荣，而靠外面的殖民地。日本人学西洋也是这个样子。

走这个路子，离开农业，发展工业，离开乡村，发展都市，结果都市畸形发展。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都市与农村矛盾，日本军人与农人一边，政党与财阀资本家一边……也是矛盾，这些矛盾，就是因为都市离开乡村才发生起来的。

我们所需求的，是农业引发工业，农业起来的时候，工业随之起来。农业技术的进步，化学品机械，农产制造，需要工



业。更其在生产提高之后，农民购买力也抬头，也需要工业。这两面对工业的需要，自然会刺激起工业的发达，这就是对。因为这样，农业工业可以扣合，而这起来的工业是为中国而有的工业，不是要到外国去找原料找市场的工业。我们要从乡村的进步去发展都市，因为都市就是社会的中心点。在散漫的大社会中，当然需要中心点，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都市的发达自乡村来，就是自然；都市为末，乡村为本，这是合乎本末先后的顺序。

英国人有百分之二十在乡村，有百分之八十在都市，这很不对；因为他们专门靠工商业吸收外国的膏血来养自己，是不对的。这种工业是为营利而生产的。我们要完成的中国新经济，是非营利的经济，是社会化的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这要从农业引发，自然完成中国民族的经济建设。

我们的正面主张，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这个工业是最近代的工业。非有高度工业不能提高中国文化，可是要用工夫在农业上，不能起手于商业。工业要走统筹计划的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商业道路。

末了，点明我们的主张。

我们认定须要以建设完成中国革命，从进步达于平等，不是从破坏达到的。

这是头一层话。

再说，我们的正面主张。我们之所以要讲乡村建设，是要求中国之普遍进步，平均发展。中国农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内地最不进步，我们一定要求平均进步发展，如不求这个，我们将不知道要领导中国到什么地方去？领导中国革命要从最不重要的地方下手，从最不进步的社会下手，否则，就是酝酿

最不必有的革命。

如从此主张，将完成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同于西洋社会，也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中国老的社会。这时将开出一个新文化，创造出一个理想的新社会。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主张。

《四川教育》，7、8期合刊，

1937年8月。

## 中国今日需要哪一种教育？<sup>〔1〕</sup>

兄弟以前很想到四川来，因为在四川也有我很多的熟朋友。今天有机会到这里同我们的青年朋友见面，说说我想说的话，这是为我很愿意作的事情。近几年我在山东正在实验一种新的教育，很想同大家谈谈我们中国所需要的新教育，因此，今天的讲题便定为是“中国今日需要那一种教育？”讲完以后，末了再说到我们在山东的工作。

中国今日需要的是那一种教育？关于这个问题以往有人曾经回答过，说现在中国需要的是生产教育。这个答案我们不能说他不对，但是我想只是在学校内讲过生产教育，恐怕是不行。中国的教育办得不好，〔有〕许多事实；办得不能够生产，不能够应用，或许也是事实。不过一说到生产不生产，在我看，不完全要由教育方面负责；问题不完全在教育，恐怕至少还有一半在社会。比如中国的工业起不来，起来一点而又衰落下去，这个问题就不在教育之生产不生产了。如像在欧战期间，我们的工业曾有起色，曾有兴起的趋势，但是大战一停，不久就随着衰落下去了。最显著的还是在最近几年，从民国二十年一直到二十四年，这几年间，在北方看到天津济南一带的工厂纷纷倒闭关门。就是我们原有的生产——农业，破产的趋势也成为显

---

〔1〕 1937年6月9日在成都省党部礼堂对师范生讲演。肖仲泉速记。

著的事实。我们试问在这样不生产的社会内，我们就是培养了生产技术人才，有没有他们的出路？工厂在那里关门，训练的技术人才又让他们往哪里去呢？在目前中国恐怕不是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若真的是技术人才缺乏，那倒好办，在学校里培养一批一批的技术人才也就行了，然而目前的问题决不是这样单纯。工业的衰败，农业的破业，其问题所在恐怕还有更大于此者，它的问题实在于社会——这里所说的社会，是包括政治、经济在内——决不是单在学校内讲生产教育可以行的。如果我们再问目前我们需要的是哪种教育，也许有人要回答，现在我们是国难的期间，我们需要的是国难教育。这话当然是对的。但如果国难的教育只是在学校内讲，恐怕还是不够，怕没有好大的用处，不论学校里的学生数量是有多么多，品质是如何，只是对着学校内的学生讲，如何能行？我们对于时下所流行的生产教育、国难教育的论调很觉得不够。然则中国究竟需要哪一种教育呢？下面我提出这种教育的三要点来说，这样的教育就是我们所主张的教育，所实验的教育。

第一，我们认为今日所需的教育，是社会教育，而不是学校教育，应是以成年民众为主要对象的教育。至于社会内未成年的青年以及儿童，当然也是需要教育的，可是不如成年人教育来得重要。

第二，在中国，今日我们应当拿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合起来作。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果要成立一个教育机关，或是叫他一个学校也罢，他是要负着这一个社会区域内的教育责任的，这一社会区域内的成年男女以及青年儿童都是他教育的对象，至于用学校的方式，或社会的方式，都不成问题。在我们看学校式也好，社会式也好，只要需要哪种方式就用哪种方式，哪样

适宜就一定用哪样去作。这一个教育机关，是同时要作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这两种工作的。

第三，我们今日办教育，是应当将他同国家其他一切的行政，与地方自治合起来作；不要分离的作，政治还是政治，教育还是教育，经济还〔是〕经济。我们一定要拿教育推进经济，将经济来作教育的内容，拿行政来帮助教育，同时自然也要教育帮助行政，这样合起来，打成一片的去作。

下面再说到我们的理由。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什么地位？这点我们先就国内来说，在我们民族社会内说，恰好是革命后需要完成革命，就是说需要完成社会的改造，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的话。中国旧的社会已经推翻，新的社会之建设还差的很远，如何完成这社会改造，实是我们当前的问题。丁兹社会改造期间，我们的教育应当是特别的。

其次我们从国际关系去认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时代，即所谓在国难期间。在国难期间应当有国难期间的教育；国难期间的教育，也应当是特别的。换句话说，刚才我们说的三点主张，是从这里来的。因为在社会改造期间，所需要的是刚才说的那三点，在国难期间也是需要刚才所说的那三点。底下我们来解释社会改造期间，为什么要用刚才说的那个主张。

第一，社会改造期间跟平时社会不同。社会改造期间所需要的教育，跟平时教育也不同；平时社会的教育主于绵续文化，将这个社会里面关于人生生活的标准与方法，从现代往后代传递，不使文化断落，并且就在文化绵续中，去求其进步。所以在平时社会的教育，就是注重儿童的教育、青年人的训练，此辈青年与儿童不单在年龄上说他没有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社会

生活还不习惯，还没有像他们的父兄有整个社会生活的能力，所以平时社会的教育是以社会未成熟的分子为对象，使其有参加社会生活之能力。而在社会改造期间的教育，则不然，他是要以成人为对象。因为此时整个社会生活正企图转进于一种新的形态，大多数的成人在年龄上虽已届成年，而对于新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习惯以及能力则皆未成熟，势非经过教育不可。所以在社会改造期间与社会平时的教育，是有二点可比较的：

1. 在社会改造期间，他不需要绵续文化，而恰恰相反，正是想废弃了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所谓除旧布新就是这个意思。创造新文化，必要在多数成年人身上作功夫，比如农业，假定说成年农民对于新的农业不会，也就是说新的农业还没有成事实，这个时候试问我们怎样来讲新的农业教育？我们只是在学校里面去教学生教儿童，又拿什么去教他们？因为新的农业还没有实例，必须先有新的农业，然后才有新的农业教育；创造新农业的时候，一定要着成年人作工夫。比如说经济要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制度。例如组织合作社，便是新经济制度里最要紧的一件事，成年人不会组织合作社，难道有方法能叫儿童会组织合作社吗？比如说政治，要建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是需要多数人都能做良好的公民，可是在成年人还不会做一个公民的时候，又如何能叫儿童去做公民？单在学校内教儿童，则社会改造的完成，新文化的建造，恐怕是遥遥无期吧！所以在社会改造期间的教育，一定是民众教育，社会教育，至于未成熟的分子固然也要教育，然而还不是这个期间主要的对象。

2. 平时教育只是对少数人的教育，可是在社会改造期间教育是对多数人的，对一般社会的，否则便没法子完成社会的改造。

3. 平时教育大概是学校教育。所谓学校教育怎样讲呢？受教育的人是从社会里面抽出来进到这学校的特别环境，一面减少或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刺激或坏的刺激，而集中许多必需的给他，如此则受教育的人是从原来社会生活中抽出来到了学校的环境，这已经是离开了他的生活，变化很大。也许平时教育是需要这样的办，而在社会改造期间的教育，则不能这样的办。必就着农民的现状而求农业的改良，不能使农民离开现社会而入学校去求改进农业，合作社地方自治也都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学到的。这就是社会改造期间与平时教育不同的三点。所以在社会改造期，正好需要这种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或者是学校教育同这个合起来作，所以我们主张的第一点，应当以社会教育为主，学校教育为副。

第二，造成一种新的教育制度，这种新教育制度，以每一个社会区域的学府对其区域内的一切教育负全责，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计划，主张废了现在的小学，中学，大学，师范等学校，而按一个新的教育系统，将全国分成若干区域，最小的或者叫作村，其次是乡，是县，是省，是国，共分五个阶层；在村叫村学，在乡叫乡学，在县叫县学，在省叫省学，在国叫国学。村学是一个教育机关，兼做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对其一村的教育负全责，在村学所不能办的教育，如像完全小学则由乡学来办，乡学不能办的则由县学来办，县学不能办的则由省学去办，省学不能办的则由国学去办，这样在社会里所有的人，他们的教育问题都有了负责的机关。因此有专门为他们负责的教育机关，自然在社会里许多的问题亦可由学术研究而解决了。

第三，国家行政、地方自治与教育，都应该融和起来。比

如治安问题是行政方面的事情，可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需要教育去养成农民的自卫力量。比如说禁毒也是行政方面的事，若是单靠行政的力量，毒是禁不完的，一定要使大家有种自觉，然后可以禁绝。所以行政问题需要教育来辅助其力量，教育上许多的事情也要行政来帮助。比如我们要训练民众，没有行政的力量帮助，便不能顺利的去进行。刚才所说的几点，这不但是教育，而且也是生产。就是经济问题，也非融成一片做不可，要立个样子通统融和起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合起来。国家行政地方自治合起来，这样才能完成社会的改造。

刚才说过，国难教育若只是在学校内讲，恐怕不会有成绩。现在所谓的国难可分成两种：1. 我们遭受国际武力的压迫，2. 我们遭受国际经济的压迫。

我们要应付国难就是要应付这种国难。不论是应付哪一种国难，若果只靠我们现在学校学生的力量决不够的。如像我们去对付武力的压迫吧，就是目前有二百万的兵力，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于此而外尚有无限的兵力才行，那就是要靠农民才能达到我们自卫抗敌的目的。再则要应付经济上的压迫，就需要组织农民，才能促进生产，才能统制消费，使农民皆加入合作社的系统，每一农民皆成为经济上的斗士。这决不是学校的教育所能做到的，因此在社会改造期间，在国难期间，这个事情大概可以叫做教育，其实也就是经济，也就是政治。

现在再说说关于我们在山东工作的话。在山东关于乡村建设的工作，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拿教育同地方自治合起来作，一种是拿教育同下级地方行政合起来做。在邹平所实验的村学、乡学是属于前者，后者则实行的办法就是乡农学校，将来备推进为村农学校。现在后一种办法在山东已由十四县推行



---

于七十余县，在明年的3月，全省都可以推行这种办法。这倒是最近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形。

《四川教育》，第7、8期合刊，  
1937年8月。

## 中国人的长处与短处<sup>〔1〕</sup>

厅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兄弟很愿意同我们青年朋友谈话。今天觉得很抱歉的，就是大家站着来听。好在今天天气不算热，诸位的辛苦或许少一点。今天要讲题目就是“中国人的长处与短处。”

近百年来，我们的民族，遭遇了一种不幸的命运，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民族还是在危难中，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证明了我们不能适应环境，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失败。这中间中国人定有许多短处，所以才有这样失败，这是常常听见人家说到的。我们承认中国人是有许多的短处，不过中国人的短处是从那里来的？我们相信短处是从长处来的，中国人的短处为诸位所看到的，其实都是正从他的长处来的；中国人今天的失败，都是从他过去的成功而来的。中国人的短处正是由他的长处而来的，那许多长处将来是可以救活我们的老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的。这些话也许有人相信不及，现在我愿意先从短处来说到长处，希望大家在听后都能有一个自觉！希望全中国的人也都能有一个自觉！

我们自己的短处长处在那里？如何纠正我们的短处，而发挥我们的长处？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说，在这许多长处短处里

---

〔1〕1937年6月10日在成都省党部对高中学生讲演。肖仲泉速记。

面，今天特别举出好多人常说中国人的“自私”来讨论讨论。在今日国际严重压迫之下，民族正在危难的时候，顶需要国家意识及团体行动。而中国人此皆甚缺乏，不很讲究，可是身家观念倒很强，如此对照起来显得中国人格外的自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相当的承认，事实上也不好加以否认。记得我在三十年前，年纪很小的时候，读到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在那里面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缺乏公德，私德极讲求。当时我不大懂那话。我想“公德”“私德”是两回事吗？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公德呢？而从事实上看来，中国人似乎的确缺乏公德，中国人自私心重。自私是怎样一回事呢？大家都知道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的生活是跟社会不能分离的，离开了社会就不能生活，自私便是跟社会分离开了，是反社会的。假若中国民族真的有这样一个大的缺陷，那中国还能在天地间存在吗？然而中华民族不但能够活到今天，并且居然能成了这样广土众民的国家，民族生命不但没有消灭而且还延续维持了四千多年的历史。他自己独特的文化，维持住他的民族的生命这样几千年，一直到现在，这不能不说是为他独有的成功。这种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若果说中国人真是象刚才说的那样自私，是反社会的，我就不能想象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伟大成功，民族的生命独特的文化维持这么久，那他老早就应灭亡了。由这点看来，我不相信中国人是自私。而一般人常常骂中国人“自私”！“自私”！难道是中国人血里带来自私，难道是先天的吗？我不相信中国人会先天的格外的自私。我相信如果说自私，那么中国人自私，外国人也自私。一定说中国人格外的自私，这是从那里来的？这问题需要研究讨论。到底中国人自私不自私？自私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是值得我们大家研究的。不过这个问题的

解答，恐非短时间所能做到，就是再讲三次五次十次八次都是讲不完。现在我只简单的说一说，将我们研究的结果告诉大家。

从一面说，中国人的自私是由他特殊的社会构造里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的社会不同。中国人的自私是从他特殊的社会构造里训练成功的。假定我们暂时承认中国人自私，这种自私就是从社会训练出来的，养成这样一个自私。那么这还是一个习惯问题，而不是先天的问题。中国的社会怎样的跟外国不同？这个问题很大，一时不容易说明。我研究的结果，可以用两句话说明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一）叫做伦理本位。（二）就是职业分立；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有职业而无阶级。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的话。在中国有职业而缺乏阶级，阶级对立的形势没有成功，中国社会里的职业是分立的，所谓七十二行不是对立的。在中国旧日的社会差不多让中国人在经济上，政治上，乃至受教育的机会上，几乎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中国固有社会差不多都是这样。为什么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呢？因为还没进步到工业社会，只有农业，还是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土地自由买卖，遗产均分，兼之蒸汽机未发明，小规模的生产工具，人人能有，于是在经济上造成了一个均等。说到读书，人人能念，并可以从考试制度进入仕途，造成中国人在政治上的机会均等。总而言之，政治上，经济上，与受教育的机会上，在中国过去的社会都缺乏垄断，而各有前途可求，富贵贫贱升沉无定。在这个的社会里，没有阶级与集团，因之没有集团生活，而散漫消极，各奔前程，就造成了刚才所说的自私。

其次再讲伦理本位。中国人是缺乏个人与团体这两个极端，不但没有这两个极端，而且对这两点的观念也是不大清楚。中

国人不但对国家观念不清楚，即个人意识也不清楚。中国人既没有团体，也没有个人，他们有的只是一个家。家庭、家族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了极重的地位，有极深的关系，因为中国人把家庭、家族看得非常之重，所以在生活的方式中，只知道有自己与家庭，与外国人的生活完全不同。这种家的观念，不但是在家庭、家族盛行，并且将这种观念推之其他，例如：师生，东伙，邻右，社会上一切朋友侪辈，皆比之父兄的关系，或兄弟的关系。在中国旧社会里，无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上的社会关系，都让他家庭化伦理化，一切相关的人，彼此皆有应尽之义。在这个伦理本位社会里，不单是师生如父子，即每个人对于四面八方的关系都是这样，大家彼此都要负责，就是说对于父母负责，对于叔伯负责，对于舅舅负责，对于子女负责，对兄妹负责，对血统有关系的人都要负责，对妻要负责，对妻党也要负责，而且对朋友也得负责，我今天没有钱，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或是我的学生，便要给我钱帮助我的生活。所以每个中国人要对四面八方有关系的人负责，四面八方也要对他负责，每个中国人对每个中国人都是互相负责，彼此皆有应尽的情谊。如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以及夫妇亲戚朋友，这个并不是空话，是在事实上表现的。这样伦理关系在经济上有特别的表现，在中国没有个人财产，财产都是家庭的，父子、夫妇、兄弟、孙祖都共财，族有族产，家族亲戚朋友都有分财通财之义。可是外国则不然，外国人的财产是个人的，他们不但父子兄弟异财，夫妇也异财。不如中国一切相关的人，随其亲疏厚薄，都有其自然应尽之义。中国的伦理关系，就是情谊关系，也就是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有句俗语：“有上三家穷亲戚，就不能算富，有上三家富亲戚就

不能算贫。”如有两个熟人同在饭馆里吃饭各自开钱，是绝没有的事，多半是大家争着开钱，意思就是说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在钱财上不分彼此，因为是这样的中国人，天然形成相互的负责，互相顾恤；生活上就有无形的保障。所以说到中国社会的组织，职业分立，伦理本位八个字算说尽了。职业分立就是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伦理本位就是一切相关的人，皆有其情谊而互以对方为重，在生活上大家互相保障，互相负责。那么，象方才所说的伦理本位的意思，若是大家连锁起来，便会很容易救济中国社会的散漫了吗？有些外国朋友曾经同我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问我中国的伦理可以救济中国的散漫吗？我说不是，中国社会散漫倒是从伦理来的，中国人缺乏公德，都是从伦理来的。再进一步研究，伦理本位是从哪里来的？方才说过，中国人的家庭关系较外国人来得特别重，中国人人都有家，难道外国人没有家吗？不是的。外国人怎会没有家呢？不过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在社会里较之外国人显得特别重罢了。这个原因，主要的是由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而来。因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也没有集团生活的反动，因之也缺乏个人的观念。中国人总是身家观念重，家庭的关系格外看重，而集团与个人才显得很轻。比如说吃饭，中国人是几个人共同吃一桌菜，而外国人吃饭虽然也是在一桌，但菜却是每个人各自分一份，由这里也可以说外国人吃的是团体饭和个人饭，中国人吃的是家庭饭。由吃饭的法子，就完全表现出了中国人是家庭的不是团体的，可是也没有个人。不但是吃饭如此，就是住房子也是如此。中国人住房子总是以一家为单位，西洋人差不多是以村落为单位。他们的村落里有一座教堂，中国人则大半聚族而居，村中有一姓或几姓的祠堂，每一家庭都有供奉祖先

牌位的厅堂。从这吃饭住房子看来，中国人充分表现家庭观念，西洋人则表现团体与个人观念。关于这一类的情形，话是说不完的，现在只是指出要点来告诉大家，就是刚才说的，西洋人很早就有集团生活。其集团生活乃是从宗教演成的，宗教就是西洋人集团生活的开始，西洋人集团生活的锻炼就是由于宗教。中国则缺乏宗教，或者说很早就没有了宗教，社会构造很为特殊，前面所说的“职业分立，伦理本位”八个字，便是中国社会的写实，因此，中国人就很缺乏团体生活。西洋人在中古时代就过的集团生活，那时不但宗教的权力很大，就是经济上也不是放任主义，而是干涉主义的基尔特社会制度。但是人民在集团生活中感到团体的干涉力过强，抹杀个人太甚，很觉不合适，于是发生反动，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行到近代，又发生很多流弊，于是思潮上又有一个反动，集团主义的空气复高唱入云，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严格的集团主义，都是团体高于个人的。这样看来，西洋人自中世纪到现代，都是在集团主义个人主义里头兜圈子。中国人过去过的是伦理生活，在历史上并没有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潮，也没有个人为重，抑团体为重的问题。中国人生活的单位就是家庭，是介于集团生活与个人生活两极端的中间。因之中国人的身家观念很强，他心目中最关切的，莫过于他的家庭或有伦理关系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就不感到亲切，所以就缺乏公德。处处看起来，都似乎觉得中国人自私。他的根源是从中国社会的散漫来的。其实中国人并不自私。中国人只是身家观念重，一身一家的念头重，而非自私。怎么他的身家观念这样的重呢？因为他的生活，靠家庭靠自己，并不靠什么团体，从何引起他的团体观念呢？他的生活又不靠国家，又何从养成他的国家观念

呢？没有这样的事实，又从哪里生出观念来？中国人的生活就是靠家庭及其伦理关系的人。过去的中国人可以关门过日子，读书中状元，用不着团体。某人发了财，是他自己的努力，不是团体给他发的财，读书中状元也都是个人的事情。他的生活与团体不发生关系，怎能勉强造成他的团体观念呢？民国几十年以来的社会组织，都是消极散漫惯了，国家不管人民，人民也不问国家的事情。而且这个国家太大，看不见边际，对于国家的观念因之也就模糊。而在欧洲则小国林立，国际竞争剧烈，国家对外竞争要靠人民，人民也靠国家保护，是以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就亲切。中国地域太大，文化又高于周围的民族，几千年来没有国际竞争，国家与人民不生密切关系，他的生活上最亲切的只是一身一家，其余有关系的则是亲戚朋友，乡党邻里。不象外国人有宗教，职业，阶级，民族种种集团。西洋人离开了团体和国家就不能生活；团体国家与自己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团体国家观念就强，热心于团体国家的事情，从此锻炼出许多公德。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上公就是私，私就是公，公私打成一片，为自己就是为公，为公就是为自己，这样公私打成一片，才能锻炼培养成公德。公德是一切团体所需要的好习惯，要个人对团体的生活有良好的习惯，一定要团体生活联合成为一回事。如果公是公，私是私，要他舍私为公，这是难办到的，不能责之众人的。舍私为公，是一种豪情侠义，这种豪情侠义在中国社会里倒是常有的。我们中国人虽然缺乏公德，但是急公好义的人却是常有的，不过急公好义与公德是两回事，急公好义就是刚才说的为公而牺牲他自己，这是一种超凡的举动。这种超凡的举动，在散漫的社会才有的，因为大家只知道有身家而不知道有公众，对于公益事情就由豪情侠义、急公好义的人



来作。大家知道京剧里面有一出剧叫状元谱，是说陈伯琦没有儿子要为善修铺路，他说：“我也曾为儿女朝山拜庙，我也曾为儿女补路修桥。”这个修桥补路的事情，就是急公好义，就是一种善举。本来修桥补路这一类事情在今天是建设厅的事情，不过那时候，这些事情没人管理而成为急公好义人的善举了。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散漫，显出中国社会没有团体，不能运用团体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有一个普通人容易犯的错误观念，常说中国人自私，中国重个人主义，这些话是不对的。个人主义是在集团生活发达后才有的，是集团主义的反动，他主张尊重个人，发展个人，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主张，并不象随便乱说的个人主义自私，一般中国人对个人主义误解误用了。在中国个人主义是不会产生的，因为中国人没有集团生活。中国人亦不见得就自私，不但不自私，而且大公无私莫过于中国人。上面说过中国人他是身家观念重，可是也时有很广大的观念，那就是中国人常谈的天下。中国念书的人开口天下闭口天下，常以天下为公，四海一家为他的理想。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的。不过天下这个话太大了，这个观念太空了，天下是无边的太宽了，于他的生活不能亲切，于他生活最亲切的只有身家。中国人一大就大到天下，一小就小到身家，而介乎中间的团体是没有的，对于国家观念是不清楚的。而外国人与我们恰恰相反，外国人对于家庭观念不强，有的只是集团观念，对于团体意识个人意识非常清楚，却没有天下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对他是很淡漠的。外国人有的是不大不小的团体观念，过的是不大不小的国家和集团生活。他们处处为国家和集团利益打算，其所谓公就是大范围的自私。西洋人最不好的，就是他可

以为他的国家和团体不讲理，违背公理的来抹杀是非。团体的情感很狭隘，有的是团体的自私心。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真是天下为公。集团生活很容易发生斗争，而斗争又加强集团的力量，团体与斗争，斗争与团体一定是相连的。凡是一个斗争发生，就不容易消灭。要能应付这个斗争，这就要加强团体的力量。团体的组织力加强，团体的干涉力加强，完全是由于斗争来的；没有斗争团体非散不可。斗争造成团体，团体造成斗争，西洋人就是如此。不独是西洋人，凡是外国人过的都是团体生活。而中国人过的生活是散漫而和平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太好了，而是外国人听不懂的。一句什么话？是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不讲理便遭大家的鄙视，这个话太好了。从这个话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大公无私，看出中国人离心力发达。这个话真是要散漫的中国人才能够讲得出来；有宗教集团，职业集团，以及其他很多的阶级集团的国家的人，不能够说出这个话。因为一到团体，便不能讲这一个“理”字；个人的感情原来能够讲理，而团体的情绪，总是冲动，总是没有理性的。个人有理性，团体缺乏理性。“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两句话在外国是说不通的。大家不相信这个话，因为现在世界明明白白是有理倒寸步难行，“九·一八”事件中国有理，日本没有理，而中国到了国际联盟却寸步难行。日本不讲理他的武力可以走遍天下。今日真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我们中国人相信有理走遍天下，愿意这样干，大家的心理都承认，如果没有理，就该输就该吃亏，中国人所要的是“理”。说到这里就知道中国人反对自私，没有自私，中国人是最公平的。在道理上中国人是最公平的，而事实表现的却似乎自私，这是那里来的？这是身家观念重来的。中国的社会构造：

一面养成身家观念重，一面养成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精神。西洋人那个社会，则是一面构成团体生活，一面养成个人主义。身家观念重，是中国人的短处，可是天下为公四海一家这个观念，却是中国人的长处；这类观念是西洋人所没有的，所不发达的。

现在讲的时间已经是很长了，想来结束几句。我的结论，就是说中国原来的社会构造很特殊，大家平常所说的中国人自私，就是从其社会构造的特殊而来的。中国社会构造特殊的特征，就是我们平常爱说的散漫。中国人的散漫，的的确确是中国社会构造特殊的特征。所谓散漫是怎样讲呢？他是无所分亦无所合；就是不十分“分”，亦不十分“合”，分得清楚合得清楚不叫散漫。中国社会所以散漫，就是分也不分清楚，合也不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就缺乏团体观念和国家观念，而富有天下观念，富有大公无私的心理。这是老的中国社会如此，从今天往前去，不能不变，不能不走上团体的道路。但是中国人往前走团体生活的路，却不能用机械力硬造，要硬造必有那机械力才行。中国人的团体生活是要由散漫走上去的，是要由自私走上去的。西洋人虽然有团体生活，虽然很早就有团体，但他是从不知不觉演成的。中国人是要由自觉的到团体生活，这个由自觉造成的团体生活，是不妨碍他的天下观念，是不妨碍他四海一家的精神的。中国人的团体生活往前去，要发挥他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观念，并且要发扬他“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精神；可是同时要增强他的团体生活，运用组织来提高他的团体生活，这是我们看到中国一定要走上这一路线。不错！往前去的中国就从散漫到组织。可是从何处入手呢？据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要从乡村入手。因为中国人缺乏个人生活，同时缺乏团体生活，他所有的就是家。中国国家可说是集家而成一乡，集

乡而成县，集县而成省，集省而成国。中国这个散漫的国家，一定要求组织，但我们求组织，如果从家入手，那就太小，从国入手又太大，事实上不能一步登天，所以要从乡村入手。先求乡村有组织，人民有乡村的组织生活，一步一步的做到国家的组织生活。这个组织一定要自觉的去求才可以成功。这是个自觉的组织，是世界上所没有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他的组织不是自觉的。中国今日从乡村完成这个组织，完成中国的大社会组织。等到中国完成了这种自觉的理性的国家组织，他就可以领导全世界，领导全人类。只有中国人就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才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以中国人大公无私四海为家的精神，就能够稳定世界的和平，就能够为人类谋福利，否则象西洋人日本人那样的横暴强霸，是永远没有和平日子的希望。他们的团体自私心很重，他们的爱国心，就是他们团体的自私心。他们的团体自私心太重太强，就必定引起斗争。斗争是人类前途和平的大障碍，要求人类前途和平，就非打破这种团体自私心不可。打破这个自私心，只有中国人才有资格。时间很久，我们就止于此罢。

《四川教育》，7、8期合刊，

1937年8月。

## 中国经济建设的路线<sup>〔1〕</sup>

曾院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兄弟在山东同曾院长差不多算同事。以后曾院长到这里来，我们常常念他，最近接到曾院长的通知，邀到这里来向各位同学讲话，感觉非常高兴。因为近年来我们所做的工作与农业界很有相关连的地方，所以看见农业界的朋友，好象看见自己的亲人一样。此次兄弟初来四川，各方应酬颇多，所以向诸位先生诸位同学谈话的时间便很少了。今天预备要同大家研究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建设的路线”。这个题目，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谈完的，至少要谈四次、五次才能得到一个较清楚的解答；现在没有这些时间，只好提纲挈领的利用一二点钟的时间说一个大概。

第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着两层意思：一层可说是主观的选择。我们为了不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误入歧途，所以便必须有选择路线的必要，比如西洋许多的文明国家，因为工商业发达的结果走上资本主义的路子，在他们社会内部便形成了劳资阶级的矛盾同都市与农村的矛盾，因为矛盾的结果，便造成民族间的斗争，这是误入歧途的明证。我们中国呢？自从推翻旧社会以后，要想完成一个理想的平等的社会，不愿意社会内部有矛盾，因此我们事先必须认清目标，

---

〔1〕 1937年6月10日在四川大学农学院讲演。肖仲泉速记。

选定路线。这是主观一层的意思。二层意思是我们看到中国近年来自上而下大家都热心生产事业，天天在喊生产建设、生产教育，可是虽然大家都在努力从事生产的工作，而我们的生产，却反而一天一天降低，这是目前事实。因此我们感觉喊这种口号的人，是太无味。中国人哪个不知道须要生产？谁不愿意生产？是农人不愿意生产吗？工人不愿意生产吗？商人不愿意生产吗？都不会的，大家都愿意生产，大家都努力生产。可是我国的生产偏偏一天一天的落后，最显著的是民国二十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五六年当中，不但农村濒于破产，整个的工商业也随着一齐倒塌下来。由此我们便可知道，空努力是没有用的，必须先有一个眼光，认识清楚这个事实，寻出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线来才可以行。就好比用钥匙开锁，必须先要看清锁孔，匙是如何转动才行。近年来大家努力生产，而生产反倒降低，就是我们事先没有认清路线，只是一味瞎干所致。所以现在我们要努力生产建设，便先要有个方针路线才可以行。这是第二层客观的意思。

第二，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来答复，就是我们认定中国经济建设的路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同时我们反对的是从商业来发展工业的路子。我们知道，现在的生产，必须要用现代的技术，决不能再靠手工与体力。我们一定要利用种种物理的动力，用机器来生产。这种进步的生产技术，就是所谓工业化。中国一定要工业化，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就是在要走那一条路达到工业化。我们所认定的要从农业引发工业，反对那从商业来发达工业的路子。说到这里，恐怕有人会说我们是重农主义者。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并且我们觉得如果去讨论重农重工的问题，完全是一种

冤枉的讨论，不应当有的讨论，我们决不想去参加这个讨论。为什么说是冤枉的讨论呢？可以从两方面去说明：

一方面假定我们国家真是有力量，可以通盘筹划我们的经济建设如何进行，这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路子，仿佛很可以容我们用主观的意思要选择我们的目标。可是当我们实地做起计划来，却绝对不能有主观的爱憎与轻重的，须按着一定的步骤与程序，根据事实去决定供求需给的关系，是从一定的数目字来决定，完全是一种死板的事情，何能容你高兴这样或不高兴那样呢？再进一层来说，如果在这个最理想的路子，所谓计划经济里，应当对于农业多用一点力，仿佛重农，对工业多用一点力，仿佛重工，你就从而称之为重农或重工，又何尝是那一回事呢？

另一方面，我们再反过来说，假如我们的国家没有力量，不能通盘筹划我们的经济建设，那个时候，差不多要随着事实推移而往前进展，当然更说不上重农或重工了，因此我们要从农业引发工业。绝没有含着提倡重农主义的意思，乃是我们从事实的分析，观察所得的结论。

目前的中国可以说几乎没有经济建设可讲，因为中国的经济完全落于被支配的地位。我们国家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与侵略，是太过于重了，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就被卷入经济竞争的漩涡，结果因为竞争失败而沦于被支配的地位，不容自己有作主的余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经济建设，只好随着事实的推移了。随着事实的推移，也只有从农业引发工业，才是一条生路。这是很客观的分析。底下我们说明这个理由。

我们现在来说从事实的推移怎样必然要走上从农业以引发工业这条路呢？这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就是政治的理由，一

方面是经济的理由。关于政治方面的理由，我们没有时间来说明，今天只就经济方面的理由来讲。我们可以分几层来说：

第一是在国际经济剧烈的竞争当中，中国各方面是普遍的遭受着经济的压迫与侵略，可是比较的说，中国农业较之工业所受的压迫，是要松缓一些，眼前客观的大势即是如此。这里面所包含的理由很多，比如许多先进的工业国家，在剧烈的经济竞争中，最利害的要算工业，不在农业。农业既然所受的压迫较缓，这就是告诉我们要从农业谋翻身。我们要挣扎出去，这个地方比较是一个机会，因为在这国际大势严重压迫之下，我们是落于被动的地位，不能不随着事实的推移，所以从农业入手确是我们谋生存的大道。我们现在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说，就是近几年来银行界对于农村的放款大量的增加，我们更可以明了大家都在农业方面去求出路了。本来要营利发财，工业方面比较的容易，农业一面受自然的影响很大，天旱不行，水多不行，虫害也不行。一面所出的产品又须随着一定的气候季节，然后才能成熟，这个最不能够适应市场的需要。不能适应市场如何能营利发财？如果为营利而生产，是绝不会走上农业的道路的。可是今天中国的银行界却偏偏向农村里面大量的投资。如果中国能象欧战期间那几年，银行界是没有在农村放款的。欧战的时候，正当中国工业抬头的机会；中国的工业只有那两年好一点。日本的工业更是在欧战的时候大发达，那时国际经济竞争松缓，工业就好起来，所以当时银行界所有的资本统统投资到工业上去了。可是到了后来，欧战告终，国际经济竞争又趋剧烈，中国所受到的压迫又加严重，银行界便不敢投资到工业上去了，生产这个路子开不动，投资到工业上去干不上两年便关门了，谁愿意去冒险呢？逼到没有办法，只有作投机的生



意，如买卖公债地皮等的活动。投机生意是不正当的路子，对社会上最不好的。工业方面因受压迫太甚，开不出路来，同时银行界的存款，又是不能不生利的，于是不能不反逼到农业上来，这是因为农业受压迫比工业松缓。我们要想翻身，只有在这个地方找出路，这是头一层的话。

第二，我们再就本身来说，目前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与侵略，就整个中国社会来说，那一方面我们最不能忍受？受了压迫最感痛苦呢？这无疑义的还是农业。农业实在是与中国全体社会的关系太大，痛痒太切，因为中国的农村，现在还是中国的命根，旁的地方，要是受限制，受压迫固然不好受，要是在这个命根上都成了问题，那就是我们顶受不了的时候。虽然我们也要求达到工业化，去找到一个新的吃饭的道路，可是现在新的吃饭的道路还没有得到以前，旧有的手工业又濒于破产的时候，末后所剩下的就只是农业。大家吃的靠农业，我们念书的人，知识分子吃的都是农民的血汗。整个支持中国大社会的也就是农业，自然再遭受不起压迫与摧残了。这里我们必须了解，农业的问题，绝不仅是农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人的问题。中国的都市不象西洋，西洋的都市是生产之地，中国的都市是消耗的场所，工商业是附属于农村的，如果中国的农业破坏，根本就摇动，就要牵动到每一个中国人。所以自民国二十年后，全国上下一致的都在喊农村经济崩溃，要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同时这种呼声，并不出于农民，而是出于都市里面的知识分子。大家再留心去观察，就知道最先喊农村破产，复兴农村的人，乃是上海的金融界银行家，因为他们利害关系，完全在农村，所以他们对于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最清楚。上海是中国经济的总枢纽，各银行的总行大都设在上海，各地都设

有分行支行，形成了一个网似的，分行支行随时有营业报告到总行，所以上海的银行界对于农业工业的盛衰，知道最先最清楚。如果我们想要明白中国的工业或农业的情形，只要去翻阅银行界的营业报告，便可一目了然。中国现在所有一切的事业都是靠农业，所以农村衰落的情形，银行界是知道最早，看得最清楚，也最着急。因为一切的生产与消耗都靠农村，中国没有旁的生产，是靠农产品出口，所以每到农产成熟之时，南方的茶丝，北方的豆麦，便要运往海外出售。这个时候就是商人与银行界最活动也最忙碌的时候，商人跑到农村收买，银行界则忙于汇兑。在这个时候，就是把农村的出产运出来，金钱往内地走的时候，同时因为农民把农产卖了，有了购买力，许多日常用品要从外面大商埠如天津、上海运到内地去。用品进到农村，农村的金钱便又流到外面来。从农村方面来说，农产品出去，金钱进来，用品进来，金钱出去，如此周流不息，中国的农工商业都有了办法。可是近年来，因为农村破产，生产降低，应当出去的农产品不能出去，同时国外的农产品又尽量向我国倾销，如小麦棉花稻米等都大量的进来，而使农产品的价格一天一天的降落，这样一来，农村的痛苦就益趋严重了。民国二十二年，我亲眼见过这种情形，农产品是整个的卖不出去，价钱则低到不够成本，如无锡养蚕的农民因受外丝的影响，所得的丝茧卖不出去，当地的丝厂也都通统关门。前几天我在重庆同民生公司的人谈话，知道因为四川今年旱灾严重，农民没有生产，购买力也就非常薄弱，因之进出口货就稀少，商人同银行界也都没有生意可作，政府的税收也无形要减少。所以这里更可以证明，今日的中国无论是商人银行家以及政府当道，一切都须依靠农村；所以农业对中国整个的社会关系太大，痛痒

太切，是最不能忍受压迫的。同时因为这里的痛苦太切，一受压迫，则反抗的力量，翻身的要求，也比较别的急迫，所以从事实的推移，客观的形势来看，我们只有利用这个良好的机会，去求挣脱压迫的途径，这是第二层。

第三，刚才说过，不恢复农业，大家都不得了。现在我们要问，恢复农业容易不容易呢？我们回答，容易，这不是很难的问题。中国现在非生产不可，至于增进生产力到底从工业入手来增进生产快一点呢？或是从农业入手快一点呢？从这里容易呢？从那里容易呢？显然的，要从农业来增进生产，是一个近便的道路，因为我们是一个很老的农业国家，农业上所需要的土地与劳力这种种条件，在我们都是现成的，所以从农业去求生产的增加，是一条很方便的道路，而且一定很快的在数量上有很好的成绩。可是如果要从工业上去求增加生产，在目前不特是非常困难，而且也是太不救急。中国目前一方面是要求农产出口的增加，一方面是要求外货输入的减少，必须增出减入，才能维持国际贸易的平衡，挽救农村经济的衰落。我们现在极力去谋农产的增加，并不是难事，只要将各项农产整理整理，下一点功夫就行。就棉花来说，稍为作一两年的功夫，中国棉花的产量就增加得很快，这都有统计数目可凭。其所以这样快的原因，就好比一个高大的汉子生了病，没有力气，虽是卧床不起，可是因为本来元气充足，只要吃药见效，恢复一分力气，这一分力气就不小，病好起来也很快，不象一个小个子的人，尽管有十足的力气，这力气也并不大。所以就目前的情况去看，中国农业的根基深厚，要谋改良与增加，并不是件难事，这是第三层。

还有第四层，我们知道要求恢复农业是很容易的事，难道

我们就只达到恢复农业为止吗？不！我们不这样就甘心，我们的目标在工业，必须引发到工业上去，达到工业化的目的，中国经济方可望翻身。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究竟在发展农业的时候，工业能否跟着抬头而渐次促成工业化的实现？”我们回答是一定可以成功的，不但一定成功，同时我们还可断言，中国工业的建立，如不借着农业的引发，是没有旁的道路可寻。因为如果离开农业来讲工业，就是从商业来发达工业的路子。大家为营利而生产，去走资本主义的险道，可以断言是绝走不通的。第一就是处于这个国际经济竞争最严重，压迫得最凶猛的时候，他们不计成本的倾销政策，直可置中国工业于死地。因为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工业后进国，一方面国家本身没有丝毫保护的力量，一同人家竞争，乃是一个中国的商人直接的与国际力量抗衡，怎样能抗得了而不遭失败呢？所以我们先须认清中国往前去，不能再象这样零散的状态，必须一致的联合起来，共同去谋经济上的自立与自卫，庶几才有挽救失败的希望。不过我们要知道，商人最不容易联合的。商人是图营利，营利就有竞争，各自为谋。农人可就不同，是最容易联合的。由此也可以证明从营利竞争的商业来发展工业是走不通的道路，必须从适于联合的农业入手才有前途可求。

第二就是我们要谈工业必须先研究资本与市场这两大问题。我国资本缺乏，没有法子很快的〔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所以我们资本的增殖，也是无法子一步登天的。照例工业后进国想要发展工业，大都拿农产品去掉换工业国的机器，苏联便是实例。可是目前中国的农产，不但不能拿去掉换人家的机器，连本身的消费也难供给。至于市场问题，我们知道外国的市场壁垒森严，不易插足。我们自己的工业生产只须能够本身的消

耗，已经是很好了，可是因为整个农村破产的结果，农民的购买力薄弱，又那里去找市场呢？由此我们要离开农业去谋工业的发展是绝对走不通的路子，要是从农业上来引发工业，则情势完全不同。从农业的发展上可以开出来对于工业的需要。一方面是从农业的生产上可以开出来对于工业的需要，一方面是从农民的消费上可以开出来对于工业的需要，就是农业经济进步，自然需要工业。我们对农业不下工夫则已，一下工夫，自然要走到新的路子上去，就是说一定要谋农产品的改良，必须有一些机器的设备，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如果仍是用土的方法，旧的方法生产，农产品的品质不会提高，是没有法子能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取得高的价格的。走上一点新的路子的時候，也就是往科学上工业上走一点，比如农业技术要求进步，农具的改造是需要工业的，农产品的要求出路而跟着来的农产制造也是与工业相连系的，这是所谓从农业的生产上开出对于工业自然的需要来。其次则是农产增加一点，农民的购买力也就增加一点，自然需要种种的工业品以适应其需要的，这是从农民的消费上开出对于工业的需要。有了以上两面的需要，工业才算是建立了根本，而且从这样建立起来的工业才是合理的工业。这里我们还要补说一句话，就是当我们改良农业的时候，必须要使农民走上合作的组织，因为没有合作的组织，就不能用科学的技术，比如养蚕，屋子里的空气要怎样？光线要怎样？温度要怎样？种种设备，种种家具，大概都是要农民联合建立才行。若是农民零零碎碎各自设备，一定难得成功。所以新的技术，一定需要合作，这是从技术上说。其实农业根本非走合作的路子无法采用新的技术，而新的技术又可以促进合作的组织。这样我们一面利用新的技术改进农业，一面合作组织日臻健全，然

后才可以抓住自己本身的需要去建立自己的工业。这时我们的市场不必求之于人，从自己这个需要地方就建立起来了。尤其是消费的轻工业，更容易建立，比如纺织工业，农村有现成的棉花，及过剩的劳力，用自己现成的劳力，加在自己现成的原料上来谋自己的需要，这是最简单的事情。这样建立起来的工业，谁也打不倒的，因为这样的工业不是营利性质的，只是顾及自己的生产怎样去发财；不是脱离了农村的需要而无目的生产的。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记牢一句话，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留下给中国人营利的余地。因此如果要想走营利的路子去求中国工业的建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中国的工业必须站在非营利的立场，方可望其建立。所谓非营利的立场，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把消费者组织起来，把自己的需要抓住，自己现成的劳力，现成的原料，制成日常用品来供大家使用。现在就中国最近几年来的情势观察，在工业上有一个趋势，就是内地设厂的问题。就是许多的工业，设在天津上海的不好维持，站不住，设在比较内地一点的倒好维持得多。这个趋势里边包含三点重大理由：

第一就是内地设厂可以就地采取原料，如面粉厂，就地收买麦子；纱厂就地收买棉花等都是。

第二是可以就地推销出品，拿它附近的社会作它的市场。

第三是工人便于管理与训练，没有上海那样淘气。

内地设厂的三点好处，也正适合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为满足自己消费而增加生产建立起来的工业，所以这种工业要到内地去，要到农村去，工业农业合作起来，恐怕是一个自然的趋势。本来真正谈到工业，绝不仅是这样，必须要求重工业的发展，始能达到完全工业化的程度。然而重工业的发展，必须要全国通

盘筹划统一的办法才行。说到这里，那就关系到了政治的问题。如果没有健全的行政系统，也就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府，决不能统筹计划。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须先求政治问题的解决。关于这方面的理由，因为没有时间来说，现在只说一个结论。

在政治上也是非从农业入手走我们现在的乡村运动、乡村建设的路子，没有法子树立中国国家的力量，没有法子安定中国的社会，没有统筹全局的政府。我们必须有这种运动的组织。要有了这种运动组织的力量，才能够建设中国，才能够谋中国经济的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刚才说过，一定要走上计划经济的路子才行。可是计划经济的路子的前头，是解决政治问题的，而政治问题的解决，照我的认定，必定要走乡村建设的路子。要走乡村建设的路子才能够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才能增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才能够统筹计划，建设中国的重工业。有了重工业才有轻工业，要不然，还是没有根本。这个工业根本的工业——重工业，那非统筹计划不可。关于政治问题解决没有时间来说，只说了这个结论，请大家看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乡村建设理论》好了。

以上归纳起来，从农业引发工业，去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可能的事实。中国经济的建立，舍此无旁的道路可走，其理由包含政治的与经济的两方面。经济的理由比较说到一点，政治的理由没有说到，这都是本着客观事物的推移，逼到只有这条路可走，再无旁的路子可通。可是这个比较可通的路子，实在就是一个好的路子。为什么是一个最好的路子？我们可以看看西洋各国的事实。他们的工业大都是脱离农业而发达，就是都市离开乡村而发达。他的都市，他的工业，并不是建筑在乡村之上。他的工业，并不是为他自己的需要，比如英国的纺织

工业，其开门、关门、开工、停工，完全以中国市场的情形为转移。他的工业与他自己的社会没有关系，原料取之于外，市场也在外面，是离开了乡村而发达都市，离开了农业而发达工业。他于乡村的关系乃是于他工业已经发达之后才回头来整理乡村，整理农业，可是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两种毛病。

第一个毛病就是都市的畸形发展；第二个毛病就是都市与农村的极端矛盾。我们在日本看得最清楚，他的政治问题，是政党与资本主义站在一起，农民又站在一起，一面代表农村，一面代表都市，农业与工业的矛盾很利害。英国社会则是都市畸形发达，人口百分之七十都在都市，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在乡村，而在都市里头又有阶级间的矛盾。这个完全是由商业的路子来发达工业，工业离开了乡村，离开了农业而发达。我们不走这一条路。天然逼迫我们非从农业引发工业的路不可。工业跟着农业起来，工业才可以同农业配合，都市与乡村才得沟通。我们知道都市的发达是随着农村而来的，都市是一个中心点，文化的中心点，政治的中心点、经济的中心点，如果普遍的社会都进步，这个中心点自然也就发达起来。都市的发达一定要跟着乡村的进步来，所以我们讲乡村建设，并不是遗漏了都市，因为说了乡村，就包含都市在内。可是如果单讲都市，那就包含不了乡村，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由农业来引发工业，农业工业就可以配合，都市与乡村也没有一点矛盾。这个完全是新的社会、更进步的社会，与西洋的社会、日本的社会完全不同。这个社会是天然平等的合理的社会，他的出发点，是走的合作的路子，不是走的竞争的路子。承认大家，承认每一个人，所以结果自然往平等的道路走，社会关系也往调和里去。许多详细的话，我们没有时间来说，如果大家高兴研究这类问题，



---

可以看我所著的《乡村建设理论》这本书，对于刚才所说的许多问题，都能一一的详细解答。

《四川教育》，7、8期合刊，

1937年8月。

## 青年与时代<sup>〔1〕</sup>

厅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我们到成都，承各方面邀约讲演。最初的时候，觉得对于初中同学讲话不大容易，尤其是谈到问题更是不容易，但是我很愿意同青年朋友见面，所以在讲演的日程中，还是排定了。今天我见着诸位，充满了许多意思，充满了许多要说的话，充满了与青年同学见面的一种热烈情绪。因为我总觉得每一个青年都很可爱的。

我不知道诸位自己觉得没有，人在青年时代，实在是为许多人、许多方面的眼光所注意。这个注意，可以说是有很多好的意思，但也有很多不好的意思在内，因为人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很好活泼，很好利用，而且力量很多的份子，所以你也要来注意青年，他也要来注意青年，至少其中的一半都不免有这样的一个用意。

我去年到日本参观，看见日本普遍设有青年学校，这种青年学校，在日本是比较一个新的事情，在教育上也是比较一个新的办法。在他从前是有一种青年训练所及一种实业补习学校，到去年的时候，将实业补习学校同青年训练所合并起来，改设为青年学校。这个青年学校所注意的有“精神训练”“军事训练”“职业训练”等。现在青年学校在日本已经普遍设立，虽不

〔1〕 1937年6月11日在成都省党部对初中学生演讲。肖仲泉速记。

强迫入学，但是差不多十之八九的青年都入了这种学校。除了这个学校以外，在日本还有一个青年团的组织，据说是一个修养的团体。本来在日本乡村里面团体很多，有职业团体、经济团体、地方自治团体，然而在这许多团体里面，“青年团”要算是顶重要的，顶活跃的了。日本每一个乡村里面，都有这种青年团的组织。在日本的教育当局，对于这种事情看得非常重要。不但是教育当局重视，就是日本的统治阶级，日本的政府都想把他们的意思灌输到青年，都要想法子运用这些青年，说得不好听一点，都想利用这些青年。他们对于这些青年格外做工夫，他们晓得每一个青年都很活泼，很有力量，而且也好做工夫；下过工夫以后，很好替他们完成他们的目的。这种情形，不单是日本如此，苏联也是如此。苏联对于青年的教育，青年的训练，与青年的组织，都是特别的注意。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在德国也是如此，差不多好多国家，尤其是象刚才所说的几个国家，他抱着一种主义，怀着一种野心，要想达到他们的目的，对于青年更是特别注意，都是给他们一种训练，给他们一种组织，他们这种作法，一半是很好的意思，一半也是免不了利用青年的意思。象这种情形，不知道我们的青年觉得没有？觉得我们青年在今日这个时代实在是最为各方面所注意，大家都看重没有？

现在再拿中国国家来说，当然应当看重你们，应当看重你们青年，也应当对你们青年作一种特殊的教育工夫，作一种训练与组织。可是我们的国家没有象苏联意大利德国那样的对青年作工夫，没有怎样的训练大家、组织大家；就是作了一点，也还作得不够，作得不好。这种情形，从一方面说是缺陷，但从另一方面说，也许是一种好处，就是免得可爱的青年被野心家

利用。然而从缺点上来说，我们处于今日这样的时代，青年人实在是最有用的，正好培养来应付我们的国难，应付我们现在社会的改造。要完成中国社会的改造，非靠大家不行，这样就须给大家一种训练，一种组织。可是此刻没有作好，这是一个缺点。刚才我说，给大家说话，一面觉得很难，一面也很愿意，心中有很多的话想给大家说，感触最深的情绪，就是这一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这个觉得没有。我们的国家对大家的训练组织，来得很缓，很不够，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另一方面，也许是一个好处。我们的国家没有利用青年，没有象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政府有计划的来训练青年，组织青年，或者可以说是没有那样的野心。我们也只是盼望我们中国的青年都能启发一点自觉心，都有一个自爱的意思，都有一个向上的志气。假定大家都有这种自爱向上的心，那吗，就应当来认识大家的任务，互相勉励，负起自己应负的任务，这样也许比较国家来训练大家、组织大家——象苏联意大利那样——还好一点。不过讲到自爱、向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说出这个意思拿来提醒大家，希望大家互相勉励，担负时代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刚才我说过的两个任务：

一是应付国难。

一是完成社会的改造。

因为这两件事情（国难与社会改造）正是我们中国所遭遇的两大事实。中国老的社会，老的文化在近百年来因为世界大交通，受到西洋人的影响而变化，而破坏崩溃，到今天差不多没有什么存留的了。从今天往前去，就是要建造一个新的社会，完成这个社会的改造。这个完成中国社会改造的任务必在我们青年人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因为年纪大了的人恐怕

不够担当，未来的中坚力量一定是现在的青年。这一点要希望我们的同学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是在社会改造的时代，这个社会改造的工夫要靠我们的青年来完成。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我们民族危难的此刻应付国难的任务。这个事情，在眼前也得要靠成年人，可是中国的国难，不是三年两年可以渡过的。要继续来应付国难，挽救民族的危殆，还是要靠我们的青年，以上说的这两点（国难与社会改造）都要希望我们青年同学来负担。认清了我们的题目，大家彼此互相勉励的来担负这两个任务。

在担负这两个任务上，我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团体生活的注意。所谓团体的生活，就是要有组织的能力与有纪律的习惯。这是我们所最缺乏的，中国人在近百年来的失败，就是因为中国人对于团体生活没有习惯。中国人散漫，中国人不合作，就是不会过团体的生活的明证。今后新的中国，一定要靠中国人习惯团体的生活，一定要靠中国人养成组织能力。这两点也不能不期望于大家，因为有许多成年人，习惯已经固定，不易改变，而青年人就很容易得多。在团体生活里面，须要有的两条件，也得分别的说一说。

第一个是纪律的习惯。团体一定要有纪律。这个纪律习惯，我想比较容易养成，如大家所受的童子军训练，如一般学生及民众所受的军事训练，大概都可以帮助我们养成纪律的习惯。所谓纪律习惯是什么？就是在人多的时候，还能够不因人多而紊乱，还能够有一致的行动表现，并且这种行动非常的敏捷，如同一个人行动一样，这个就是好的纪律。

第二就是组织的能力。纪律习惯在集团生活中是很要紧的，而同时应当注意的还有组织能力。组织的能力不是象刚才所说

的受军事训练可以养成的，组织的能力是要靠大家在平时种种的团体生活中培养来的。大家能够彼此商量着办事，这就是组织的能力，单纯的服从不是组织能力，单纯的发号施令也不是组织能力。培养这种能力是很不容易的，团体生活没有组织能力也是不行的。所谓组织能力，就是所谓民治的精神。团体生活中的民治精神是一定很必要的，如果大家能够注意培养在团体中的组织能力——民治精神——则严重的困难可以应付，中国社会的改造才可以完成。

我现在综合的说一说：

第一，希望大家觉得这个青年时代，你们最为各方面所注意。此刻中国的国家还没有象苏联、意大利那样组织大家，训练大家，只好希望大家自己勉励自己，担当起当前的任务。

第二，要完成中国社会改造，应付中国国难。现在应该彼此勉励，同时集中精神，培养团体生活，养成纪律的习惯与组织的能力。

《四川教育》，7、8期合刊，

1937年，8月。

## 如何创造中国的新学术〔1〕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张院长刚才介绍的话，很不敢当。我实在是没有学问。我常常想我自己没有什么长处，如果要说的时侯，只是觉得我还是一个活人，我有知觉，痛痒。因为有知觉，痛痒，所以常常感到许多问题。我对于这许多问题都〔能〕够用心思，有些意见，有些认识而已。我觉得如果一个活人，生在中国此时的社会里，由他的知觉痛痒，一定要感到许多问题，处处有希望改造的要求。我又想如果大家都真有知觉痛痒，大家能够有感触，都不放松这个感触，都用些心思去研究所感触的问题，也许中国的一些问题会有解决的一天，不然的话，不感觉痛痒，不求解决这许多的问题，那么，恐怕这许多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的一天。我今天到这个高等学术机关来，自然有所感触；这个感触，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我的感触是什么？就是感触中国的学术缺乏，中国的学术尚待创造，感觉到大学教育与我们实际社会太不相关了。尤其是我们作乡村工作的，于此感触更多。现在我想先粗略的说〔说〕我们的工作，使大家明白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感触。我的工作，就是大家知道的乡村建设工作。如果我们不拿乡村工作说得很高，不十分往深处去想，很平淡的去说，那么，我们的乡村工作，就是

〔1〕 1937年6月11日在成都四川大学讲演。

要从中国社会最不进步的地方——内地乡村——来求社会的进步，想法子来推进这个社会。我们能够从内地乡村来作推进社会的工夫，来求这个社会的进步，则可以得到中国大社会的平均发展，普遍的进步。从粗浅平淡处来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就是如此。于此就可以明白，所谓乡村建设，内容包含方面很多。总而言之，乡村民生上的许多问题，文化上的许多问题，我们都要想法子来解决，想法子把乡村的生活改善，乡村的文化增进。乡村进步了，而后都市才可以发达，这是我们的用意。至于推进社会的工夫，则是要我们每个教育者启发农民的自觉，指导去如何如何，所以乡村工作也就是社会教育、民众教育这一类的工作。不过现在我们所作的，也许不仅是教育，因为把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都包括进去了。乡村工作的实际问题很多，都待我们去想办法，比如较为粗浅一点而是当前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就是治安问题。治安问题能有法子解决，其他问题才可以随着作工夫。这个问题必须要从农民自己保卫上作工夫。现在山东邹平全县，除了六十名雇用警察外，整个乡村的治安，都是农民自己。农民能够自卫，就不需要雇用似的许多军队了。诸如此类的乡村实际问题，一天一天的都要能够把它解决才好。这些问题是非常之多，而又牵连得非常之广的，比如地方行政也是自然要牵连到的。二十二年中央提倡各省办县政建设实验区，由内政部提出，经政治会议批准后公布出来，我们更得到一种机会，许多的问题都可以放在实验区来研究、实验。比如县行政组织制度应当怎样？户籍行政应当怎样办理？财政经费以至于卫生教育道路各项怎样做法？自这种办法公布后，都有机会研究试验。我们研究实验的范围，除了行政的问题外，还有地方自治问题。中国地方自治问题，在清末即已提倡，关于人员



的培养和各种组织都已实行。如县议会，省议会，都成立过，但实在没有作好，没有那一个地方自治是成功了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研究，需要实验的。恐怕这个事情不单是草一个章程，下一个命令就可以成功的。在我们的工作里，从乡村自治到一县自治的完成，都是我们要作的工作。而我们最注意的，还是社会的改进问题。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都可以包括在这里面。大约我们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当我们作这种事情的时候，痛感中国的学术缺乏，痛感大学与社会没有关系。我们在乡村工作，非常痛苦，非常缺乏学术的指导。我们请教各项专家，可是难得人来指导，没有人来指导！我们现在先来讲明学术缺乏这个话。中国本来没有科学，近代的科学是由外面输入的，好比是洋货入口一样。我们没有法子运用原料，专靠现成的洋货，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来制造，一定要创造中国自己的学术才行。诚然有些学问没有什么地域的不同，分不出中国外国来，比方数学，逻辑；不是中国另外需要一种数学或逻辑。这些纯理科学没有中国外国的地域之分，是很显明的。然而讲到应用科学，以及研究生物的一切学问，则不能不创造自己的，至于社会科学则更非创造中国自己的一套不行。比如农业这样学问，就是有地方性的，而且研究的对象又是动物植物这些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感觉中国有创造新农学的必要，尤其是作乡村工作的人，感觉的更为迫切。当我们研究的时候，当然可以借助于外国的方法，然而还不能不从中国实际的问题中去研究，才能有新农学的发见，中国的农业才有法子谋改进。又如地方自治，地方行政，以及许多社会方面的事情，因为外国的情形与中国的不一样，都不一定能用得上。我们不能拿外国的方法来办中国户籍人事的登记。我们作这些事情要与中国社

会的情形，人民的程度，社会的经济等关系相符合，才能办得好。又如地方的财政怎样整理？也决不是拿外国地方财政的书就可以整理中国地方财政的。这个整理财政的问题又多又困难，大学里讲财政，都讲不到这个，也不知道中国的财政是怎样的。又如乡村的卫生，都是乡村最要紧的事情，可是中国的医学教育，在学校里讲一点公共卫生与农村也没有有什么关系。就是乡村建筑工程，恐怕也不能学外国的。中国社会的事实摆在下面，中国的大学教育，放在上头，一个非常高，一个非常低，上下不通气，学术归学术，社会事实归社会事实。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话，这个痛痒处不发痛痒了。如果我们活人，有知觉，有痛痒，哪能看见这一些事实而不发生问题的？哪能不在这些问题上作研究想法子来解决的？中国国家要有前途，中国民族要有前途，那就非创造自己的学术不可。刚才举的农业农学院等是一个例证，其他的社会问题，偏乎应用的还多，大概都非创造自己的不可。在没有自己的学术时，社会上许多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不能解决，这个社会就没有法子进步。我们的社会不进步，或者以为是中国的国力民力太贫乏了，可是国力民力怎样才能富厚？这个恐怕要靠新学术，没有新学术，没有法子创造，就没有法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这是从一面的问题说，再要补说一面，社会与大学没有关系，原因还在培养的人才不合社会的运用，譬如法科毕业的学生作县长，对一切县政都是茫然，简直莫明其妙的，因为社会所有的问题，统统与法规不合。法律解决不了，作了县长还要从头学起。真正能够作县长的还不一定是大学的学生。你们的学问虽是很高，然而不合适用，所以作不成。养尊处优，不去作实在的事，缺点尚难看透，如去作事，作乡村的事，乡村是最实际的地方，这

里一点一滴的问题，都要解决，决不是与实际问题离开而作研究的人所能有办法的。这种能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材很少，所以一到乡村工作，便痛感人力的不足，学术的不足。然则如何才能创造中国的新学术呢？我心里感觉这个问题，用过一些心思，也就有一些意见，现在姑且说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教。

当我感觉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但是对于大学有一个改造的要求，实在是对于中国整个的教育制度，发动了改造的要求。我们在乡村作的工作，大都是教育的工作。我们从实际问题中感到现行教育制度的不合适，所以要求教育制度的改造。因此在民国二十二年写了一篇中国教育改造的方案，题名是《社会本位教育系统草案》，在邹平出版的《乡村建设论文集》内可以看到。民国二十二年有好几种教育杂志，也都替我刊载过。如果诸位留心去查，就可以查得这篇文章。很希望各位先生各位同学赐教。今天因为时间很短，不能把原拟的草案从理论到办法通盘说出来，我只好粗略的把意思说一下。

我的意思要把中国所有的现行学制，小学、中学、大学，以至于专门师范，所有的这些学校，统统废掉。废掉后又怎么办呢？我有一个新鲜的方法。我把中国社会分成许多大小的区域。最小的区域，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村；村以上是乡，多少乡叫做县，多少县成功一个省，多少省成功一个中国。这村、乡、县、省、国五个阶层，都各在区域内设立学校，就是村设村学，乡设乡学，县设县学，省设省学，国设国学。没有小学、中学、大学这些名称，只有村学、乡学、县学、省学、国学五个阶层。所谓村学就是一村的教育机关，这个教育机关，要对于全村负责。紧要的意思就是这个话，就是要教育机关对社会负责。我们痛感教育机关不负责，教育在那里研究学术，结果与社会没

有关系，研究的内容不合社会的需要，培养的人材也不合社会的需要，仿佛这个教育机关不是为这个社会而有的。我们痛感教育对于社会不负责，所以扭转这个教育制度，创造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就是明白规定教育机关要对社会负责。村里面的教育机关对村负责，乡教育机关对乡负责，县教育机关对县负责。至到国学要对全国负责。照这样的办法，我们县里面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专门问题，我们就请教省学，省学不能替我们解决的，就请教国学。譬如四川大学，要负责四川的一切问题。如农业的问题，四川大学的农学院就要负责解决，这个不仅是解决什么病虫害的问题，什么问题都要去解决。这个方法，就是要拿问题来逼他——学术机关——刺激他，如此才能产生新的学术。我们这个组织是一层一层的，县学统属于省学，省学统属于国学，一面有统属，一面有责成；上面责成下面，上下成一系统。国学指导省学，省学指导县学，县学指导乡学，乡学指导村学。这个办法就是从人材来说，也才能有一个计划的培养，就是我们要负这个区域的责任。在这个社会里头需要那几项的人材，需要什么程度的人材？譬如就四川来说，农业一方面，现在需要什么人材？需要好多人材？我们就可以有计划的来培养。属于粗浅的人材，县学去培养，省学就培养高深一点的人材。总之，是要负这个实际需要的责任。同时因为上下的系统构成，从下面村学乡学，可以收集许多的问题，许多的材料送上来，上面依据这些问题材料来研究这些问题。材料恐怕是研究新学术第一个必需的，那吗，这种（人事）问题，调查材料，就可以由村学、乡学负责，比如土壤的问题，村学把当地的土壤送到上面去研究。又如发生什么病害，村学也可以将情形送到上面去研究。社会问题，也可以随时报告。如果很

专门的问题，非亲自考察不能解决的，上面便再派人考察。总之，贡献粗浅的问题，粗浅材料，下面村学可以负责。村学、乡学的作用，一面把实际的问题材料送上去，一面把上面的方法传达到农民，指示农民。大体上村学、乡学是站在前方，省学国学是站在后方。上面的学府是后方，下面的学府是前方，那吗，上面后方的学府得到了问题、材料，受到这个问题材料的刺激，便来研究。研究以后，即将所得的结果传下来。这样上下相通，凡是有所需要考察的，归诸下面，有所需要研究考虑的就归诸上面。这样上下循环相通，我想新的学术必能创造出来。有了新学术，社会就由此进步。因为上面所有的方法，都拿来指导下面，下面的社会就得到好方法来改进；同时社会上发生的问题，下面送上来研究，研究得有结果，有发明，又传下去。这样就是相互不断的前进。其要点就是必需要上下相通，必需要学术与事实接合。自然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教育系统，主要的对象不在个人而在社会，尤在社会的成年人。教育主要的工作，即在推进社会。所以要先对成年人作工夫，要改变现行学制的仅注意社会未成年人的教育。我们这是新的教育制度，是完全注重对社会，对社会负责，因此勉强造一个名词，叫做“社会本位的教育”。其中的理论与办法只是略略说到一些。很

盼胡七字系了我的名字后下文比教小去

建设协进会，关于乡村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研究实验，由各大学分别部门来作。比如清华大学的工学院，许多教授到济宁来参加。在一定时间内，也要他们的学生到济宁来实习。比如济宁要做的挖河造桥梁这些事情，他们工程学系的学生可以来实习测量、绘图，及指导工人作工。我们拟在本年暑期的时候，举办济宁全县地形地势的测量。这个试验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学生平时也难得这样的机会。经费则山东与学校各出一半。好在技术人才是教授与学生，通统是现成的，不费多少钱。再如农业上的许多问题，则由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学生来调查研究。协和医学院现在研究乡村卫生、济宁的公共卫生工作就由他来作。地方的财政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现在请南开大学的教授担任财政科长，学生随同工作，使他们能从实际问题上去下手整理。又如领导农民一项，则由燕京大学的教授学生负责来研究设计。诸如此类的事情，有这几个大学分别去研究，去实际工作，并从这些实际的问题中训练了学生。这一个新的组织尚不是我讲的那个理想的学制，理想的教育制度。可是这一个新的组织对我们的要求，仿佛可以解决一部分。这是我附带报告给诸位的。

《四川教育》，7、8期合刊，

1937年8月。

## 我们在山东的工作<sup>〔1〕</sup>

厅长，各位先生：今天是拿我们在山东的工作向诸位说一说。我所说的，不讲理论，只拿工作的内容以及工作变迁的事实，粗略的报告一下，并先报告在山东工作以前的事实。如果回溯在山东工作以前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在河南创办的一个村治学院，在北平出版的一种《村治》月刊。《村治》月刊是我们作这个运动的开始。筹办此事是在民国十七年，出版是在十八年一月一日。村治学院在河南，筹备也是在十七年，当时已经将章程经费决定，负责人也发表了，不过因为大局的变动，到十八年的秋天间才招生开始工作。这两件事情，一个村治学院，一个《村治》月刊，都是在十七年和十八年才开始办理的。以后又从河南迁到山东，就是因为十八年开学以后到十九年，遇着中原大战，中央讨伐冯、阎。在这个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这个学院，已经停顿了。十九年冬天才由河南迁到山东。民国廿年才成立现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说到这里，我要插入一段话，就是常常有朋友问到邹平与定县不同的地方？这个话，很难回答，因为要拿两个的情形比较很费事，不过有一点比较容易回答，就是邹平的工作从他的发动上说，与定县不很相同。定县是从识字运动扫除文盲，而作平民教育的运动。以后从识

〔1〕 1937年6月12日在成都省党部对中等学校教职员讲演。肖仲泉速记。

字这件事情扩充到公民卫生各项工作。他是从乡村来推行平民教育，从推行平民教育而走到乡村建设。邹平的工作回溯他的动机，则与定县不同。在河南的时候，大家所以要从从事乡村工作，比较的说是受中国政治的刺激而有的一种反应，而有的一种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一种乡村自卫，地方自治，所以我们用“村治”这个名词。从“村治”两个字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动机。这个运动是充分含着政治运动的形势，而不是教育。平民教育是识字运动，可以就是一种教育。定县是从教育而做到乡村工作。山东河南这种工作，始终是中国政治刺激而发动的运动。从动机上分别邹平与定县不同，但是落到实际工作上说接近的地方也很多，（自然不同的地方也有）此处不多说了。现在来说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我们在山东工作的总机关，叫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地点设在邹平县，距离济南不远，不过二百里。从济南坐火车，两点半钟到周村车站。邹平离火车站还有三四十里，有汽车可通，坐黄包车也可以。研究院的工作，大概分为三大项：

第一项就是研究工作。以前在河南村治学院的时代，主要的工作是训练人才，算是训练工作。以后觉得有加设研究工作必要，所以迁到山东的时候，就设立研究部，对于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的文化改造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以及中国整个的政治问题，都想加以研究。不过我们的主张是要从乡村做起，所以这一部分就叫做乡村建设研究部。

第二项就是训练工作，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研究工作，是由大学或专门毕业的学生来作；训练工作所训练的程度比较的粗浅，是招收中等教育的人，给他一年短期的训练。不过很有变迁，开头招不到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后来招收中等毕业学生，



过后招收高中毕业的学生。我们训练的时间，是整个的一年，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一年到头没有假，一个整年差不多要当其他的学校一年半。

第三项就是实验工作。在河南的时候，我们没有法子实验，感觉缺憾。乡村工作需要到乡村作一个实验，才可以推广，决不能一下就普遍推行。并且训练人才，单是在课堂里训练也就不够，必需（的）在大社会里去练习，一面学，一面作才行，所以，实验是很必要的。我们在山东工作就划邹平县为实验区，推行我们的实验工作。

归结来说，研究院分研究、实验、训练三大项工作。这个工作开头的时候，大概是注意训练工作，就是注意培养到乡村去服务的人才，而对研究工作实在没有十分照顾到。对于实验工作起初也不好作，就是因为当时邹平实验区的权限没有划定清楚，只是作到研究院对于县政府可以用命令这一点，而实际上当时山东各县的组织，是县政府以外还有四局（公安局、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县长没有多大的权，各局直接受省政府各厅的指挥，（公安局，直接民政厅；财政局，直接财政厅；建设局，直接建设厅；教育局，直接教育厅）县长没有法子指挥作事，因此我们对于邹平县没有好大作法；有实验区之名，而实际工作并不好作。所以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乃是因为山东省政府向中央报告，说是在山东成立一个乡村建设研究院，划了一个实验区，中央对于研究院，没有批驳，实验区则批驳了，仿佛是说全国除了广东中山县特别划为实验县之外，不见再有第二个实验县的名称。中央虽没有通过，而省政府仍是承认这个事情，所以说未能将权限划得如何清楚。因此我们在卅年、卅一年的时候，只能领导学生在邹平的地方上作一种实习的工作。

我们想要作的乡村工作，能作的很有限。到了廿二年以后，才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候，外面的局势变了，社会上的空气也变了。中央对于乡村问题很注意，对于邹平、定县的工作也很注意。内政部想推行地方自治，认为我们作的乡村工作对于地方自治有帮助，所以廿一年，中央下命令指定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各省成立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并指定晏阳初先生担任河北省地方自治的指导员，指定兄弟担任山东地方自治的指导员，这样可以看出中央看重了我们的乡村工作，其实中央对于我们毫未接过头，发表了这个命令，我们才晓得。此时正是我们在地方上没有作法，想推行地方自治也很困难。现在既是中央对于地方自治注意，乡村事业注意，我们的工作也注意，愿意同我们接近，乃是我们工作的机会到了。这时中央又召集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时间是在廿一年十二月，地点在南京。开会以前，内政部特别先行电约我们邹平、定县，帮他参酌几个重要提案，比如县政改革，地方自治等。在县政改革的提案内，内政部先提出来要设实验区的话，名称叫做县政实验区。我同晏阳初先生的意见，以为用县政实验区的名义，太注重了地方行政。我们认为当真要改革县政，就要从社会方面入手，求社会的改进，实在是必要。要求社会改进，就要先从扫除文盲、改良农业、组织合作社，改善人民生活，以及提高文化为最要紧。认为这些工作是根本，所以我们建议不要叫着县政实验区，最好改称建设实验区，以一县为实验的范围。当时内政部长就是此刻湖北省府主席黄绍雄（兹）氏，他说调和一下，两个名字同时并用，以后就决定改用县政建设实验区。从这一次会议就看出一个要点来，我们邹平的工作着重改进社会，在最初实在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帮助，不过这时政府有这个意思，内政部提

倡要设实验县，这是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这个变得很快，在廿一年的时候，请求设立不准，等到转过年来，就提倡了。我们同内政部把提案参酌好了，就提到内政会议，大体通过以后，呈报中央政治会议核准。山东根据这个办法，进行县政建设，于是划定邹平、菏泽两县为实验区，统辖于乡村建设研究院。所以到了廿二年我们的工作就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同以前的工作有两点不同，第一我们注重实验工作不注重训练工作。从前注重训练工作，培养到乡村服务的人员，现在政府既然给我们这一好机会，我们就把训练工作暂停一年，将院内所有的教师暨毕业的学生统统分配在邹平、菏泽两县的乡间工作。我们的工作最初注重训练，现在不甚注重训练了，这是一个变动。

还有一个变动，就是所谓实验区工作的内容与以前不同了。以前只是想从这个社会的改进，渐渐的达到乡村建设，对于行政改革没有包含在内，这时我们有机会来作，而事实上也要求作，因为乡村种种事情，实在是与县政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在实验区的工作，大概也可分为三大项来说明：

第一就是一县地方行政改革的实验。比如一县的行政，县政府应当怎样组织才合适？纵的一方面，从县到乡村去，这个乡的制度，行政上应当怎样作？这个问题要研究，要实验；横的一方面，比如刚才说到从前邹平县有四个局，这四个局直辖于省政府各厅，这个制度，究竟好不好？大家现在都知道的所谓裁局改科的主张，就是当时我们的作法，但是究竟要设几科才对呢？还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邹平菏泽两县内应本着我们研究的所得来实验的，因为实验区，是不受中央法令的限制的。这个还不够，还要包含各项新政的举办，比

如卫生行政，普通各县没有办法，在实验县就要作。又如很重要的户籍行政，关于人事变迁的登记，如出生、死亡、迁徙、分居，都要随时登记，这是其他一切行政的根本，普通县不能作，实验县也是应当要作的。总之一切旧的改革，新的举办，都要来研究，来实验，来改革。这是第一项的工作。

第二就是地方自治。中国从满清末年，就提倡地方自治，可是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三十年，没有一个地方的自治作成功。在清末的时候，关于城镇乡自治的章程，曾经颁定，选举的事情也作过，成立过县议会，省议会。四川不知道作过没有，但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地方自治成了功。地方自治提倡很久没有成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那末对于地方自治的推行，从乡村自治起达到一县的完成，这是我们实验区应该作的。这是我们第二项的工作。

第三就是社会改进。社会改进包含很多，如人民生活、风俗习惯的改善，都包含在内，都应该作一些研究实验的工夫，这是廿二年开始的；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变动。现在我们要比较两个实验县的工作了。关于乡村工作的进行，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方式，在邹平方面，是用村学、乡学，在菏泽方面，是用乡农学校。这两个方式的内容是怎样分别呢？他的内容，我来简单的说说。邹平的村学乡学，是以一村一乡的人为主体，而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参加进去，去作村学乡学的教员。村学的组织，统统是用本地人，负责办事的各校长，都是用的本地人。这是含着有启发地方自治的意思，虽然不完全是一个地方自治，却含着做地方自治的意思。乡农学校则不然，他的校长教员都是由我们派去的，把一县分成若干乡，每一乡设一个乡农学校，去作训练民众的工夫。从一方面说是民众教育机关，社会教育机

关；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下级行政机关。这个乡农学校，好象是一个小县政府，凡是县政府的命令，都是经过乡农学校传达到乡村，所以含着启发地方自治的意思少，而是凭藉着行政的力量去作社会改进。这是和邹平工作方式不同的地方，简单的说，大概如此。

廿二年菏泽受水灾情形很严重，破坏得很厉害，然而因为有乡农学校分别负责，在水来的时候，大家一齐去抢堵；挡不住，水进来了，大家一齐去救护；救护不了，就设法赈济。所谓抢堵救护赈济这些工作，我们的学生（乡农学校的职员），能够领导民众来作，作得很有条理。这次的水灾，是我们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同农民打成了一片，平时很不容易同农民打成一片，在这患难当中彼此相亲，大家合作起来让我们的工作能作通。所以山东省政府认为乡农学校很有成效，就想拿这个办法来推行全省。二十四年划济宁等十四个县（菏泽也包含在内），来推行乡农学校，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长官公署，以我们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副院长担任区长官，在这十四县推行乡农学校。这是二十四年一月一日开始的，到明年十二月的时候，正值华北局势紧张，日本压迫华北，要华北五省独立自治。日本压迫很紧急，活动得很凶。他指定的五省，就是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缓远，要这五省在河北开会，成立五省自治政府。日本人天天逼迫韩主席，要他去北平开会；关东军的参谋长坐飞机到济南来接韩主席，一次不去，再来仍不去，一连来了好几次，始终没有去。一去就完了，华北就归日本利用了。没有去而在威胁的时候，我们想找韩主席，韩主席也找我们，就是找我们商量怎样对付国难的问题，要想一个根本的办法。结果决定了一个三年计划，就是各县普设乡农学校，先拿菏泽所作的工作，

选择其中两项，在山东全省来作，不要求各种工作同时并进，因为各种工作同时并进，恐怕作得不实在。所谓三年计划，是把全省分区分期的来作。所谓分区就是把全省划为若干区，次第举办乡农学校，分期来作，就是今年作这一区，明年作那一区。这个分期分区主要的目的，是人才不够用，要陆续培养能担负乡农学校工作的人员。计在第一年（即是廿五年，计划则是廿四年冬天定的）第一期扩充到卅一县，第二期（廿六年）再增设四十县，第三期（廿七年）全省完成。

所谓选择来作的两项工作，一是行政改革，一是民众训练。行政改革，又包括三项，详细的来不及说，只能粗略的说个大概。行政改革包括三项：一是乡村行政的改革。乡村的行政，决定利用刚才说的乡农学校这个制度，他一面是社会教育机关，民众教育机关，同时担负下级行政的责任。乡农学校的校长教员，就是我们研究院的学生。区域增加，学生不够用，乃于二十五年四月将省十二个师范学校将要毕业的学生，集中来训练半年，毕业以后，再到乡村实习两月，然后分派到各乡农学校工作，担负下级行政的责任。二是县政府本身要改组。在他的组织制度上包含有好几个要点，不过我们时间不很多，暂不说他。三是县政府以上，设立行政专员。行政专员，代省府分负责任，每个行政区的大小七八县或九十县不等。这个行政专员，要对于地方的治安问题及一切建设事项，都要统筹计划，负责指挥。这就是行政改革所包含的三点。

现在再说民众训练。民众训练，包含两个阶段。一是初级民众训练，这个训练就在乡农学校内办理，一半是军事训练；使他能够有自卫的能力，一半是公民训练，成年教育。这种训练很粗浅，受训练的人，自十六岁起到四十岁止的男丁。训练时

间开始四个月，慢慢减到三个月。训练的费用是由县府筹办，受训人的伙食，公家津贴一部分，自己也出一点。其次是高级训练，这就是集中的训练。这种训练比较多偏于军事方面，关于这一部分不及详细的说。行政改革与民众训练这两项工作，实是为应付国际环境而有的。这个工作的推广是从二十四年起的，这又是一个新的阶段。二十二年是一个新阶段，二十四年又是一个新阶段。这是我们从二十一年起到现在工作的大概情形。

在这里尚有几点要补充说的：第一，是关于训练的问题。训练乡村服务人员的这个工作，现在有一种变动，有一种新的办法，就是今后不在研究院训练。研究院，只是作研究的机关，不是训练的机关，关于训练的工作，我们另外设机关来作。这个机关，在山东有好几处，第一就是现在山东新成立的乡村建设师范学校。为什么要用师范学校的名称？因为训练出来的人是去办乡农学校；乡农学校，乃是一种教育工作，培养办这种教育的师资的学校，还是叫着师范学校的好。再则要改革现在的师范学校，是主要的师范生到乡村去也能办民众教育，社会教育，而我们这个新的师范学校也不能不培养乡村小学的教员。这是仍用师范名称的又一原因。这个新的师范学校，现在分设两处，一在邹平，一在菏泽，这是两个培养到乡村服务人员的学校。还有一个是乡村建设专科学校，设在济南。它是培养较高的技术人才，内面分为农业、经济、教育各方面，入学的程度，是高中毕业，修业年限三年，三年毕业以后，还要实习。这个学校，等于一般专门学校大学的程度，不过是专门培养在乡村服务的人员而已。再有一处，就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设在济宁，是今年上半年才设的。刚才说过我们因为人才不够用，集中全省师范学校将要毕业的学生，共有八九百人，加以半年的

训练，两个月的实习后，就分派到行政区开办乡农学校，所以就成立了这个机关，来作这项训练工作。当时本是一种临时性的，现在才改为长期设立。今年六月要招一千二百人来训练，准备明年三月，增设三十几县的乡农学校之用。这个训练处所以要长期设立的用意，是在对于全体乡村服务人员的补充或抽调以及进修等项，有一个全省统筹分配的机关。这个训练处是由省府韩主席兼处长，第一区行政专员兼副处长。第一区行政专员，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一任的院长梁仲华先生；第二区行政专员，就是研究院第一任的副院长孙廉泉先生。关于训练工作，大概如此，这是要补充的。

再要说说山东乡村工作的主要地方有三处，一是邹平，二是菏泽，三是济宁。济宁菏泽这两个县，都是用乡农学校来进行。此刻更进了一步办理村农学校，因为一县只有十八个乡农学校，数目太少，现在设立村农学校，对于乡村作一种普遍训练，就在村中办理是不妨碍人民的生活与工作的。当在训练民众的时候，是要举办很多事情的，如指导农业改良，指导办理合作社，以及整顿乡村，如禁赌，禁毒等这些事情，现在我都不及详细说了，只把邹平的几项工作大略说一说。

一是邹平的“户籍”。刚才说过，户籍是行政的根本，这个工作在邹平算是作好了。全县的人口，随便有什么变动，如出生、死亡、迁徙、分居，都要到村学去报告，各村再以电话向县政府报告，县政府设有户籍室，对全县的户口完全清楚，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都清楚得很。比如邹平这个地方，有一种早婚的习惯，有在十岁以前结婚的，十二三岁结婚的很多。这是很不好的，我们要禁止。这件事情在旁的县份很不好作，在邹平很好作，这是因为邹平的户籍办得好。我们规定男子十八岁



以上才结婚，如果你是十五岁十六岁一定要说十八岁，在别的县份，可以蒙混过去，这在邹平不行，县府对于你的年龄非常清楚。现在邹平又在办清理地亩的工作，这部工作，本年内亦可完成。

二是卫生行政。办理乡村的公共卫生，在县城里有个卫生院，各乡分设卫生所。这个卫生所是自己慢慢培养人才到乡村去设置的，尤其培养妇女作接生的工作。这个事情，在邹平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接生不好，不讲究清洁，所以死亡率很高，一周岁的小孩，死亡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生两个一定要死亡一个，这个情形不得了。所以我们培养乡村的妇女来作这个接生的工作。训练时间很短，一点不妨碍她们的日常工作。训练后给他（她）一套家俱，这个家俱都是简单的土货，并不是洋货。自此以后，我们再调查，现在十个之中难死一个。可是又另外发生了问题，就是小孩通统不死，小孩多了，大人也就多了，户口也就增多了，人口增多，不又是问题吗？

三是乡村的保卫工作。邹平全县除了六十名警察是雇用的，每月有他的薪水外，其余全县的治安，完全是靠农民自己。山东各县原来有三个武力，第一是公安局，第二是民团大队，还有一个武力，就是团务局。现在这三个武力，邹平都撤裁了。从前雇用这些人，大都是无聊赖的人，甚至团丁也通匪。我们通统把他裁撤了，把维持治安的责任放在有身家的农民身上，经我们训练以后，把他们组织起来的。这种训练组织的经过，大概是第一次先训练干部，干部训练好以后，再训练民众。民众是征调来训练的。这里要注意的是训练以前的征调与训练以后的组织，组织如果不好，没有用处，训练以前的征调，如果不到家，这个训练也没有用处。我们先训练干部，在训练民众时，

干部便加入工作。民众训练以后，便把干部分配下去当队长。邹平分成十三乡，每乡有乡队长，乡队队员，每月集合一次，练习打靶，会操训话，平日是这样。每年还有两次特别工作；第一次就是所谓夏防。北方在夏天时常青纱帐起，土匪容易混入，如果维持治安，还是照平常各自在家里就不行。一乡抽调十名，集中在乡学里，由他的队长领导去各处放哨、服务的天数并不长，十天八天，轮流担任。在集中服务期间由公家给他伙食。除夏防外，还有冬防，办法也是一样。如此所有乡队队员，都是农民，农民在家里生活，乡村没有负担，而却有自卫的力量。这是初步的训练组织，此外还有一个叫做地方警察队的，队员是从各乡乡队轮流抽调来的，一乡抽调两三名，集中在城里，总数不过四五十名，再给他们四个月较高的军事训练，及其他生活上的一些知识，如农业改良、合作组织等。在这四个月内，也就是他们服务的时间，有保卫地方治安的责任。所以全县除了行政警察传达政令而外，维持治安的责任完全是农民自己。

四是接着这个训练而来的还有乡村青年训练，这就是乡村民众的普遍训练。这种普遍训练，由各村自己办理，在农民离家不远的地方训练，不致妨碍他的日常工作，各自回家吃饭，经费也不发生问题。至于担任训练工作的人，则由曾受警卫队四个月高级训练以后，回乡担任村组长者，担任军事教育；村学教员担任民众教育，时间是在冬春农隙的时候，每年约有七十天。当在普遍训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村庄里，都在唱歌下操。全县男丁从十六岁到四十岁止，一万三千多（邹平全县人口十七万），同时都在活动。至于训练的内容则是每年不同，如今年注重国防，明年则注重经济建设。现在我们又训练几十名号兵，散布在各乡村，一旦遇紧急事情发生，这个村庄

吹号，那个村庄也吹号，全县的壮丁，马上就可以集合起来了。

五再者就是合作社。要说邹平的合作社，还得说说邹平的农业改良与推广。可惜讲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不想多说，只就邹平合作的推行，不同于旁处的情形说个大概。邹平的合作社办得很晚，是从农业的改良，来提倡组织合作社的，所以邹平的合作社，偏乎生产运销方面。业务比较发达的，要算美棉运销合作社。邹平棉花是美国脱子棉，经上海商品检验局批评，认为是全国最优等的棉花，上年产量三千余包，约计五千多担，每担卖价陆拾余元，超过了山东所有棉花的价钱。现在我们的棉花，各大工厂都来收买。棉运合作社，现有两百。其他如造林、养蚕、信仓等合作社亦有百余社。邹平全县三百余村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合作社。关于农村金融的流通，以前特设一个农村金融流通处来办理，现在已遵照中央的办法改组为合作金库了。好了，耽误大家的时间很多了，报告就到此结束了。

《四川教育》，7、8期合刊，

1937年8月。

## 我们如何抗敌<sup>〔1〕</sup>

今天讲的题目，是“我们如何抗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有些朋友，以为我们作的乡村工作不能应付现在的国际问题，认为乡村建设工作虽好，缓不济急。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国际环境很紧迫，要怎样才能应付这个环境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但感觉得乡村建设工作来得很缓，不是现在的要紧工作。我觉得不然。我想说明我们作乡村工作，不但是根本的工作，还是积极救亡的工作，眼前抗敌，非此不可，所以用“我们如何抗敌”这个题目。

我们现在就从抗敌说起。我们如何抗敌？努力讲国防吗？修军备吗？但实际恐怕不能办到这样。我不是军事家，不能来讨论这个问题，可是我也知道一个大概。我们的国防是很薄弱的，不但海防不能讲，连内河也受外国人的威胁。至于从事整顿军备，一定要建立重工业，制造机器。虽然我们听说中央对于国防军备、重工业都在那里作工夫，这个大概也是实在的。不过明明不可靠，因为相差得太远了，就是在讲求，极力在讲求，都没有法子跟上人家。我们知道造军器主要的机器是发动机，这个发动机，我们自己不能造。近几年来日本不敢与苏联作战，听说就是发动机的生产不及苏联。中国就更说不上，虽然听说中

---

〔1〕 1937年6月13日在成都省党部公开演讲。肖仲泉速记。

央极力想办法，恐怕距希望还很远。我想在国防上讲求，军备上讲求，恐怕不是好的路子，不是真正知己知彼的办法。似乎我们应当在种种的短处当中，在可能的范围以内，选择我们可以走的路子，选择我们能走的路子才行。这个路子怎样来选哩？这个时局怎样去应付呢？就我们想到的，我们要抗敌，恐怕有两个根本的原则是我们现在应当采择的。

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靠现在有限的兵力，恐怕是不行的。现在我们中国的常备军虽是很多，但是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备军之外，便无其他。以这个有限的兵力，恐怕不能抵抗敌人征兵制下无限的兵力。大概我们有限的兵力，不难在短期内被人家摧毁，这是很明白的。我们抗敌，一定不能完全靠这有限的兵力，而要靠那无限的兵力，我想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原则。

还有一个原则，恐怕我们不能够在很痛快的来摧敌这上面设法，这样恐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恐怕要在怎样持久陆陆续续不断的抗战这里来要求，来希望最后的胜利。这仿佛是军事家所谓的消耗战。要想抗敌，而能得到胜利，恐怕要走这个路子。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持久。如果敌国不能够持久，他的兵力，虽然很强，但是整个的国力还是有限，而且社会内部矛盾很严重，支持很久的时候，或者支持不了，社会内部就要发生问题。我们推想，如果我们抗敌要能够胜利，恐怕只有靠支持很久才能得到，决不是主力战能够得到胜利的，主力战简直不能作。这是粗略的说。我们对军事不十分清楚，我们想到的，恐怕是如此。归结下来：

一个原则，我们不靠有限兵力，我们要靠无限的兵力。

一个原则，我们摧败敌人，要能够支持长久；希望我们能够支持长久，而敌人不能够支持长久。

我再深刻的来说这两个原则。我们常常想到恐怕是我们没有法子抗敌，我们只能够在被敌人毁坏的时候希望不久就能恢复，这就是很好的。在毁坏我们的时候，我们虽然被毁坏了，而不久能够恢复。这个就是最好的。因为敌人很强，我们想要不被敌人毁坏，恐怕是很难，所以我们想到就是你来毁坏我还能恢复，我想恐怕只是如此。这个话与刚才提出的两个原则有密切的关系。

底下讲我们提出来的注意点，我们要在这两方面预备，注意。哪两方面呢？

一面我们当真要抗敌，就要加强政府统治的力量。这个道理很明白，要对外的时候，非加强增高政府统治力，没有法子应付环境；因为要应付环境，必需要能够敏捷，敏捷必需要政府的统治力量来作。当真要抗敌的时候，恐怕一切的话都不能讲，惟有想法子来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这是一个注意点！应当在这里做工夫。

还有一点，这一点从刚才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来说，也可以说是两回事，也可以说是一回事。这一点怎样？就是增厚国民抗敌的情绪与能力。这一点跟刚才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可以分开说，而实在也不必分开说，实在不是两回事，也可以看作一回事。这个话底下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我们姑且认作两回事情来说。我们需要两方面作工夫，一面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一面增厚国民抗敌的情绪与能力。如果现在，我们来作的时候，那吗，也许在刚才所说的，我们有限的兵力之外，还有无限的兵力，或者可以持久。这个主要的就是加强的统治力量，增厚国民抗敌的情绪与能力。底下我们就分开来说。

一点就是所谓政府统治力量的问题。这一点怎么是必要？我

们稍为想想过去几年的国际环境，过去几年国际对于我们的压迫，我们不能够解除，而且一天一天加重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日本这个国家跟中国同样的是受世界大交通的影响，受西洋人的刺激，受西人通商的压迫。在几十年以前，三十年四十年以前，日本的国际环境并不好过我们，而日本能够慢慢解除国际压迫，能够解除国际的枷锁，其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政治安定，政府比较有力量，是一个统一的政府。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他能够修改不平等条约，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能够应付国际环境。反过来说中国，中国恰好是国家不能统一，国家不能统一，便没有力量来对外；政权分裂，所以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应付国际的压迫。我们试一回想过去的失败。过去吃亏的地方在哪里？可以说过去的吃亏，就是因为政权的分裂。我们看清楚了过去的失败在政权的不统一，那就需要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这个是再清楚没有的一个道理。底下不是问旁的话，不是问政府的统治力量该加强不该加强的这个问题，只是问怎样可以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我们既然认定要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我们就要来想办法，想一个适当的办法。我想很清楚的是要从两方面来加强政府的力量，加强政府统治的力量。

一点就是政府必需能够得多数国民的支持，多数国民在后面支持政府的政权，多数国民作政府的后盾，然后这力量才能够强。假定政府没有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恐怕是没有力量，这个理由很明白。可是这一件事情很难作。要怎样来作，就必需让我们社会里边，中国国内种种不通的情形，上下不通的情形，要打破要扫除；一定要想法子融通上下之情。现在的情形实在是隔阂。我所说的隔阂，并不是讲知识分子的这个主义那个思

想跟中央与国民党不能相通。我不是说的这个。我说的是上下不能相通，是说政府与国民，此刻的政府，不但是中央政府，乃至至于省政府，实在是跟农民，跟乡村的痛痒太不相关。他不能够与乡村与农民同一个痛痒，所谓上下不通就是这个痛痒不通，根本不相关系。政府没有多数国民作后盾，彼此的感情并不相通。如果彼此感情不相通，象现在这个情形，政府与国民，政府与社会都很隔阂，恐怕不能抗敌。这个国民是指的真正大多数国民，不是指的少数分子，不是指着我们，是指着农民。上下的情感不相通，彼此不生关系，这样恐怕没有法子抗敌。这是加强政府力量里头的一点顶要注意的。

第二，不但是上下的情感要相通，国民与政府，政府与国民，要能够互相生关系，而最重要的还是系统与机构；要有一个系统，也要有一个机构；没有系统，没有机构，而只是有感情，没有用的。国民得到政府的帮助，政府运用国民，第一必需感情相通，痛痒相同，这是根本不可少的。第二个是系统机构，尤其是不可少的，假使上下有了痛痒相关的情形，政府得到了国民作后盾，同时上下有系统，有机构，条理，组织都有，这样作起来，我想一定有办法。所谓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恐怕要由这两方面作来。关于加强政府力量的话，暂且说到这里。

底下再说第二项。第二项就是增厚国民抗敌的情绪与能力，这一点刚才我说过，要抗敌必需在有限的兵力之外有无限的兵力。所谓能够持久，就是要靠国民，要靠多数人。这一点格外重要。如果在这一方面，自相残杀，不识国家与自己的关系，这就很危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就是在北平郊外有两个大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做清华大学，一个叫做燕京大学。当



着国际问题紧张的时候，学生很激烈，自动到乡村去讲演，希望民众必要抗敌。当你说的的时候，乡里的人不开口，等到开会游行散了，单独到乡里去谈话，有个乡下的人跟学生说这样的话：谁来以后，不要我们种地的吗？谁来作朝廷，不要我们种地吗？反正我都是种地，那吗，就是日本人来了，未必不要我们种地？他也需要种地的才行。我们是种地的。中国人作朝廷，我是种地；日本来作朝廷，我还是种地，他也还是要我们种地。这个话，这个情形，虽说不是普遍的，不过这个实事是有的，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可惜此刻没有时间说得那样多，又没有亲身经验，不若说得那样亲切。什么事情？就是在热河抗战的时候，热河离北平很近，北平的青年很热心，有些真是跑到前方去，不但是参加救护的工作，简直参加到热河里边作义勇军的工作。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广东人，叫杨庆堃，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此刻在美国。这个人的身体非常之好，真是有血性的青年，他就跑到里边作这种工作。他后来把在里面作工作所看到的情形，作了二个报告。这个报告，不能公开，因为有许多事情真不堪告人。我今天举两件情形来说。一个就是义勇军自家斗争，往往因一件小事便斗争起来，例如我有一匹马在这里吃草，说是把他的草吃了，他的马就没有草吃，就起斗争。随便一个小问题，就打仗。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乡下人在日本还没有来的时候，就预备好了日本旗。这个也是事实。你看这样的国民能不能抗敌？绝对不能够。这个也不能全怪乡下人。当时热河的省府汤玉麟太压迫人民了。他种鸦片烟，卖鸦片烟，无理的压迫民众。人民本来是一字不识，什么知识都没有，而政府这样的压迫，他与政府一点感情也没有，他

怎么知道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什么叫做政府？与政府一点感情也没有。日本来了只好挂旗欢迎。这是我那个朋友说的。我现在再举一个比热河更近的事情。这是什么时候？就是李守信在察北，占据察北六县，这六县的地方失了，简直是无声无臭的。这六县失掉以后，谁也不说。我听到当时的情形：就是李守信从多伦那里开过来，恰好察哈尔把这地方的队伍搬〔撤〕到张家口，张家口距察北，不是六十里就是九十里，队伍刚刚撤退，李守信便开过来了，那时城里头慌了，怎么办？怎么应付？大家开会，县长不能守城，走了；地方上的人开会商讨怎么办？出城欢迎吗？最后结果，商会的代表与各法团出城欢迎。因为没有办法，你不欢迎也是进城，那进来就会毫不客气的，欢迎也许秩序稍为好一点。没有力量，绝对不能抵抗的，讨论的问题就是欢迎与不欢迎，结果还是欢迎。这个也是事实，还是很近的事情。我说这是〔些〕话的意思，就是证明如果不能增厚国民抗敌的情绪与力量，事前没有作这个功夫，而只是说抗敌，开口抗敌，闭口也抗敌，单是在报纸上、杂志上抗敌，是没有用的。我想不实际做工作，而空口的喊，恐怕事到临头，这个喊的人也是会跑的。

还有一点，就是日本人这样说，他说中国人现在不承认东三省、热河是日本的，是日本拿去了的。我们不必争是日本的，中国的，满洲国的。我们不要怎样来争论；几年以后我们用国民投票来决定，看看国民到底愿意归中国吗？还是愿意归满洲国？他说他敢相信投票的结果，一定是满洲国。日本人讲这个大话，改〔该〕有旁的道理，就是乡下人对于国家没有感情，亦是国家对于人民没有好处，无从生出感情来。假使日本军队驻在热河较之中国军队驻在热河时土匪少一点，负担比较轻一点，

我想恐怕要投票归满洲国，不投票归中国。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话：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增厚国民抗敌的情绪与能力。这两点不是两回事情，而是一回事情。要是政府能够得到国民作后盾，一定就是国民抗敌的情绪与能力已经增强；国民抗敌的情绪与能力能够增强，也就是国民与政府上下的情绪相通，一

头指挥的领袖亦要养成。主要的是一个集团生活，集团生活没有领袖，是不行的；没有领袖，大家一定自乱。要如何培养出这种人来，就靠下面各乡村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又能够成一个系统，完全的系统，上下相通，政府能够运用农民。村的组织非靠这样不可，非作这个功夫不可。这个功夫就是我们所作的乡村工作。刚才我们的话就是归结到两点，一点加强政府力量，一是增厚国民抗敌的情绪与能力。这两件事情，实在很简单，一个通上下之情，使上下痛痒相关，一点〔是〕有系统，有机构，农民有组织有训练。政府的力量加强就是农民抗敌情绪加强的时候；农民能力加强的时候，亦就是政府力量加强的时候。这两个事情，完全是一回事情。我们作乡村工作者所用的功夫是什么？就是通上下之情。我们苦于乡村没有人管。我们就是要把农村的痛苦宣达出来，让大家注意，大家在这里下功夫，要想法子解决。还有一点，就是训练。这一种训练农民、组织农民，实在是广义的教育功夫。但是这个教育，没有法子当成教育来作，一定要从政治来作，一定要解决这个组织问题，那就要解决许多法律制度的问题。大家看看讲抗敌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不是能够积极应付敌人的。这个办法不能应付，中国就不够应付。中国一定要靠飞机大炮，这个是不能够的，这个根本不能够应付敌人。只有刚才讲的两个原则，我们只有靠持久，靠无限的兵力。我们要在敌人毁坏我们以后，能够容易恢复。我们要容易恢复，就要农民有训练，有条理，否则，敢说不待敌人毁坏我们，我们自己都要毁坏。怎么自己会毁坏？土匪风行，大家自乱，人多自乱，就是自己毁坏自己，自己打自己，自己糟踏自己。这个就是没有训练，没有条理。在这个危难当中而能够有条理，有办法，建造自己，在必要的时候，让他来破坏，

破坏以后，容易恢复。中国这个大社会，要这样，那就要作乡村工作。而此刻散漫的农村，一点组织也没有，这有什么能力！所以要国家有力量，就要上下沟通，要有系统机构。这是抗敌的根本问题；根本的工作。若舍此以外，而讲国防修军备，这个是不及，不能抗敌的。那吗，坐在屋里头喊抗敌，报纸上、杂志上喊抗敌，更是没有用处。归结的话非到乡村工作不行。我们的乡村工作，就是为的抗敌。——挽救中国危难，非作乡村建设工作不可，所以希望大家相信乡村建设，努力乡村建设。

《四川教育》，7、8期合刊，

1937年8月。

《乡村运动》周刊，16期，

1937年7月19日。

## 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

不容已的民族抗战似乎开始发动了。发动了，怕就不能收。与其达不到民族解放目的而收束，还不如慎于发动之前。所以既然发动了，我们就要下决心，不达民族解放目的，誓不甘休！

因此，将要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持久性的一大战争。我们须要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副精神，好生应付。在这里，我想到下列几条原则必先认定：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这三条原则是互相关联的，其理由亦都不难明白。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比较量，胜负关键全在后方。而况我们欲为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就是要合全国人才物力为一国力，以应敌。古人称“节制之师”，今不独军队须受节制，全国国民的动作乃至全国国民的生活亦都要受节制才行。讲节制就必须统于一最高中枢，这是没有疑问的。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才物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第想要举国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就是全国国民的感情要求思想意志，必须疏通条达，求其调协而减少矛盾，求其沟通而减少隔阂。政府要与社会打成一片，而后统一节制始得顺利

进行。

这三条原则都是理想，离现实情况很远很远。例如国家的统一不过是最近才有的趋势，还未完成。纵然大家都愿意服从于统一的军令政令之下，而机构不灵活，习惯未养成，就可以使你理想成空，何况事情还不这样简单呢？试举粮食问题来说，统一管理何尝不好，然而全国人愿受管理否，怕是疑问。至于现在的行政机关能否胜此任，那是更大的疑问。再如政治的民主化，三十年来所未能作到者，何能仓卒间一旦成功？并且在应战抗敌之时利于军事独裁，又如何能在此时讲民主？此时讲民主，又怎样才能不貽误军事？所谓“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有知识者出知识”，并不是象今天这样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各处募集捐款之类，而是举国上下各尽所能，有系统、有计划地向着唯一目标而活动。但中国的事向来就没有系统，缺乏计划，为人所共知；现在如何能使他达于有系统有计划呢？

总之，原则是对的，没有人不承认，可惜事实难作到。如果能拿得出办法来，亦许多少能作到几分；再加随时讲求，不断练习，亦许逐有进步。如果没有办法，则这三条原则只是好听的理想话而已。但要请大家注意：如违反这三原则，抗战必然失败！所以大家应当在办法上用心去求。现在我且以我想到的办法说出来请教。

我的设计可分条述之如下：

一、为实现第一条原则，达于其理想，除直接参战之军队自有其编制系统外，全国国民应设法纳入一大组织系统中，而配合于军队系统。

二、此国民组织仍因其社会生活之地段区域（如街坊村乡），划为单位，以大统小（以市统街坊、以县统村，）上下相

属（不同于军队编制以人数兵种为准。）。此军民两系统，在上要汇合为一，在下亦要有相当配合，第为说话方便暂别之为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

三、第二系统实即平时之行政系统，不过在战时一切政令都有军事性质或属军事策划，故其系统之上端系属于军事最高机构而富军事性。第其工作任务究有别于军队，仍不外乎各项之行政，其系统大段亦仍为行政机构。

四、第二系统虽大段不异平时行政机构，然此时要在领导国民直接地间接地应战，国民之一切活动悉受节制，人力物力悉资国用，其工作之复杂烦难十倍于平时，尤以下层机构直接民众者为最，故下层单位宜小不宜大；旧日自治保甲等制度均须变通，而为一教育机构，兼行政机构，随事运用教育工夫，完成其军令政令所付予之任务。诚以军令政令之接受并非易事。而我民众太缺乏教育，内地乡村尤为甚也。

五、第一系统为直接作战的，第二系统为间接作战的。直接作战者殆纯乎消费，且消费甚大，则所谓间接作战者其主要任务即当为生产。在战时环境下，农工生产必有许多改变与进步，主持策划者为第二系统之上端，推进实施则资于其下层机构。主持策划不能无借于学术研究，推进实施尤必赖乎教育工夫。

六、为实现第三条原则，达于其理想，除“有钱者出钱”一项另谈外，将所有的人粗分为军事人才，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三大类，为适宜地分布，有机地配合，使其从乎一定计划发生预期的作用。

七、所谓军事人才包括高下各级，除大部隶属第一系统外，更须以相当数量配置于第二系统，分布于各地方，务使普遍于



社会之间。对内则维持治安、稳定秩序，对外则随时策应以协助于第一系统，更且训练壮丁补充前线。

八、所谓知识分子包括学术专家以至粗受教育者，除一部隶属第一系统外，余者各视其程度，因其所宜，全数配置于第二系统，务使匀称地普遍于社会之间，凭借上中下各层机构，领导一般民众，完成最高军事计划所付予之任务。

九、如是，今之学校制度必须打破，整个教育皆当改造，而纳入第二系统中，毋使别自为一系统。关于此问题另成专篇讨论之。（题为《国防教育应该怎样讲》，在本刊下期发表。——原编者注）

十、所谓普通民众，除老弱病废者皆属之。所用多在其体力，此项人不与军事人才、知识分子为有机地配合，殆难发挥很好的作用。而在军事人才、知识分子亦正有资借于此以成其用，互不能离。除一小部分经过训练以补充于第一系统外，所余全部当以服役于生产工作为主。

十一、战时生产之受妨害、受破坏者必甚大，虽努力生产犹虞不足，故必限制消费。在限制消费之时，钱多亦无所用，公务员薪俸一律减低，并减其差度。（如今日厚薄悬殊者非所以共患难）。

十二、“有钱者出钱”仍以自己乐输者为限。国家对于特别有钱的人可以征用其一部分，将来偿还，不付利息。

十三、实行计划经济，不为营利而生产，最为理想。但行之太骤必致妨碍生产。宜因其习惯而转变其趋向。此须集合专家为缜密之研究设计。

十四、为实现第一条原则，达于其理想，即以第二系统之下层机构最小单位，还而为构成国家主体之一个细胞。在此一

细胞组织中有下级军事人才，有粗受教育之知识分子，有若干普通民众及老弱等，一面营其社会生活，一面为间接应战之活动。在应战上，他们是工具，就国家说，他们是主体。要他们为有力的工具，还须当他们为真正的主体。所谓政治的民主化指此而言，所谓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须在这里求。其详当另成专篇论之。（题为《抗战中的民主政治问题》，定在本刊发表——原编者注）。

以上的设计（自一至十四）须先完成一粗略的轮廓，再求进于周详。

使我们这设计不易成功的，有两大困难：一是中国本身（自军政系统以至社会本身）一向分裂隔阂矛盾不通之处太多，欲其系统化而愧无夙养；一切调查统计直是没有，欲为计划而缺乏事实根据。所以只能由粗疏而渐入于精密，不能一蹴而就。一是战时环境不让我们从容进于有系统有计划地步，而且加以打击破坏，所以亦只能在战争中慢慢锻炼出来。我想全国若有一万个身心健全的知识分子，便可克服这两大困难。他们要有热血，有胆识，又细密沉着，分布在全系统上中下各层（尤注意下层），一面细心地凭借机构作调查，凭调查作计划，同时以渐修正改进其系统机构。一面坚忍沉着务使上下前后左右不失联络，遭遇破坏，偶尔脱离系统，仍能独自应付环境，不久便又恢复联络。如是，使此系统网络日进于周洽详密，日进于牢韧不拔，则敌人虽强亦未有不屈于我者。（8月3日写）

《乡村运动》周刊，18期 1937年8月9日。

《大公报》（上海），1937年8月11、12日。

## 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初编

著者按语：《乡村建设理论提纲》为济宁训练处讲课而作，仅粗略地指出乡建运动的意义和所取途径，于其间较深细之问题则未及谈，拟更为续编以完成之，故名此为初编云。

26年9月20日 漱溟

一、乡村建设理论只在解答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有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干什么的？

二、从近十年来乡建运动的事实经过（详《乡村建设理论》一书，468—471页<sup>〔1〕</sup>），而认识乡建运动的意义：

1. 从乡村自救以至于政治改造（153—155页）；
2. 从救济农村以至于经济建设（149—155页，155—160页）；
3. 从乡村教育以至于教育改造（469—470页）。

概括言之，其手段近于社会改良，而其使命则在完成中国革命。

三、从中国当前两大问题而说明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所

---

〔1〕《乡村建设理论》收在本全集第二卷。本文所标原书页码均已改为第二卷之页码——编者。

谓两大问题：

1. 从中国自身说，如何完成社会改造？
2. 从对外说，如何抗敌御侮完成民族解放？

四、目前如何抗敌？须认定两原则：

1. 必须靠无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为不足；
2. 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

五、为实现前项原则，必须注意下面两点：

1. 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与能力；
2. 加强政府的统制力量。

六、要政府的力量加强，有赖于多数国民的支持，为其后盾；但今日上下之情未通。要政府能遂行其统制，有赖于下层机构的健全灵活；但今日民众缺乏组织、缺乏训练。

七、上下之情果然得通，则国民的抗敌情绪必然增厚；民众果有组织训练，国民的抗敌能力必然增强。所以上面所说两注意点，实在作起来只是一樁事，都要从农业和农民入手。

八、所谓从农业和农民入手的，就是：

1. 先解除农业上的种种妨害，更进而积极促兴农业（515--532页）；

2. 切近农民日常生活予以组织训练，更进而为临时对外抗敌的组织训练。

九、此其理由，就为：

1. 国民多数是农民；
2. 非政府关切农民的生活问题，农民得以乐其生，则农民不会爱国家，不会拥护政府；
3. 感情不相通则组织训练不会成功；
4. 没有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而径求临时对外的组织训练

则为无根。

十、总而言之，要抗敌御侮亦非在乡村里作功夫不可；而此非常时期的乡村工作仍不能不从平时的乡村工作作起，这就是乡村建设在当前抗敌上的意义。

十一、所谓平时的乡村工作是从中国社会自身为完成社会改造而有的工作，盖乡建运动起于中国革命运动之后，其任务正为完成中国革命。

十二、中国革命为近百年世界大交通所引发出来的，其问题背景在东西文化之冲突比较，其前途使命为世界新文化之创造（163—166页）。

十三、所谓完成（中国）革命，即指辟建新社会，求得一历史演变应有之结局（190页）。

十四、乡建运动的进行，在其消极一面为反对一切在民族社会内的斗争，反对一切破坏行动，其理由：

1. 中国革命是自外引发的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而不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爆发的阶级斗争（451—459页）。

2. 中国社会一向散漫流动，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174—190页），现在仍未形成阶级，即使倡导斗争，亦斗争不出来结果，结果乃指一新政权的建立（409页）。

3. 尤其在旧社会秩序推翻后，破坏无所施。中国现在是没有秩序，而不是有一不平等的秩序（212页，215—240页）。

4. 旧秩序的残余势力亦是有的，但必待新秩序起来才得替换过，如再从事暴力破坏，徒使社会沉沦淹滞而不进步，新秩序愈不得形成，旧秩序的残余更延展（232—240页）。

十五、乡建运动的积极工作，是在逐渐解除国际束缚，与调整社会内部关系之下，进行有方针有计划的整个新中国的建

设。此分三层说明：

1. 有人误认要先解除国际束缚才得进行建设，其实二者辗转相因相待，不可分先后。

2. 有人不注意调整社会关系，而遽行建设，其建设或阻于内部冲突而不得进行，或虽得进行而加重社会的矛盾，酝酿未来斗争，亦是不对的（512—513页）。关系的调整与建设的进行，亦须辗转循环的往前进。

3. 中国必将“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然其前提全在有方针、有计划。

十六、如是则必求中国政治问题得一相当解决，形成一个能动的力量，以担负此工作。此亦分三层说明：

1. 外界束缚为何久久不得解除？内部建设为何不得进行？总皆为政治上无办法（153页）。

2. 依通例应以社会改造运动的团体（革命党）掌握政权，施行建设，完成社会改造（革命），中国亦不能外此；但以中国革命本质的不同，社会形势的有异，所以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随之而两样（460—488页）。

3. 有人以为现在不要谈政治问题，一则目前政治比从前像是有办法，二则目前正要对外，不宜对内生枝节。其实不然，因为从我们的理论，解决政治问题，不是要政权，而是拥护现政权（439—443页），谈亦无妨；且有谈的必要，我们解决政治问题的活动，一可以增厚现政权的力量，二可给现政权一个方针（493—494页）。

十七、所谓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指政权之稳定统一。然政权不虚立，必靠多数人在经济上的要求所形成之一大势力为其支柱。此分两层说：

1. 中国近二三十年来政权陷于分裂单弱不固定（441页）；

2. 此其故盖以近二三十年来政权随思潮与武力为转移，从未有植其基础于社会经济者。

十八、乡村建设运动实发于此大社会在经济上之一要求。此要求具体化且凝合成一大势力时，则政权于是统一稳定。过去所以徒见思潮与武力之左右政局者，实以经济崩溃尚不剧烈，尚未深彻，而多数人在经济上之一共同要求尚未发见之故。

十九、乡村建设运动所以异于过去一切维新运动，革命运动，救国运动而独能统一中国，担负建设工作者，盖由下列三点：

1. 过去一切运动，其要求失于广漠、空泛、抽象，今之乡建运动实从农村经济崩溃而激起，其要求较亲切，较实际。

2. 近年实由农业破坏而牵动百业。今后复苏经济，必先振兴农业。乡建运动盖不只代表农业生产者的要求，同时亦为工商业者的要求，乃至全社会各部分各阶层的要求（478—479页）。

3. 此不徒为一主观的要求，同时亦适为一客观上可以走通的路。中国经济建设之一明朗的方针路线于此可得，从而切合实际的具体计划可以产生。

二十、如是，当研究两问题：

1. 乡建运动所要求之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路线是什么？是否能切合实际而具体化？

2. 乡建运动本此要求如何凝成一大势力而解决中国政治问题？

二十一、中国经济建设，照乡建运动的要求，应采取的方针路线（489—532页）就是：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

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了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分析言之，有三要点：

1. 非个人营利，亦非国家统制，而是从农民的联合以达于整个社会的组织化；

2. 从农业引发工业，而非从商业发达工业；

3. 从经济上的自卫自立入手，以大社会自给自足为归，自始即倾向于为消费而生产，最后完成为消费而生产，不蹈欧美为营利而生产的覆辙。

二十二、前条第一点是因为：

1. 我们生产技术落后，大都为零碎小经营，在今日国际竞争压迫下又乏国家力量之保护，逼得只有联合自卫一路；

2. 此经济的联合自卫，必从组织农民入手，因为无论从生产或从消费来看，第一都要数到农民；

3. 而农民又正是最适于合作组织的（工商业者不同）；

4. 但农民的墨守旧习、勤俭保守，不知联合应付新环境，非由知识分子指导其改良技术，组织合作不可。

二十三、前二十一条第二点是因为：

1. 我们翻身在工业，而凭借以翻身者则为农业；

2. 非农业生产者不能走联合的路，又非联合无以求经济上之自卫与自立；

3. 中国工业要建立在非营利的立场，超出竞争漩涡；

4. 由以上三点可以得到社会关系的增进与调整；反之，从商业发达工业，则增加社会间的矛盾，日趋于阶级分化；

5. 在农业技术前进程中，工业自相缘相引而俱来；一般购买力随生产兴盛而抬头，尤刺激工业之兴起。如是，生产力购



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迭为推引，产业日进无疆，是为真正之自力更生。

二十四、前（二十一）条第三点是因为农业生产偏于自给，农业生产者容易联合；唯其自给所以容易联合，唯其联合所以更倾向于自给里去。联合是经济生活社会化之端，自给是为消费而生产之端，故工业由农业引发，将自远于资本主义而归于社会主义。

二十五、知识分子下乡领导农民，使进于经济的合作组织，政治的自治组织之途，是即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六、中国经济建设，头一步当先集中力量解决农业上各问题：

1. 治安问题；
2. 运输问题及商业上的问题；
3. 农民负担问题；
4. 灾害问题；
5. 土地问题；
6. 农业金融问题（树立农业金融系统）；
7. 农业技术问题（推进科学技术）；
8. 农业经营问题（发展合作组织）。

二十七、农业要从方方面面（如上列各问题）促其发达进步，而工业则当统筹建设：

1. 将全国产煤，产石油和有水力可以发电的地方调查清楚，确实估计，而后将全国划分区域，统筹分配，次第开发利用，以供给工业上的动力于这些区域内。这样，农业及其他生产运输等业自必进于工业化。

2. 同时要注意钢铁出产和机械制造，亦同样为有计划地供

给各处。动力没有机械是不能动的，而机械没有钢铁是制不成的。

3. 为一般工业建设相关条件的化学工业以及水泥、木材等问题，皆应统盘筹划，预为之备。

4. 铁路、轮船、港口等一切商业运输上的工程和事业，其间接刺激工业生产，力量甚大，均应善为规划安排。

二十八、工业建设的前提有二：

1. 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面开出来对于工业的需要；
2. 从知识分子领导农民组织，树立担负此统筹工作之系统。

二十九、关于工业建设之统筹工作，至少以下三系统担负之：

1. 国家以至地方之行政系统；
2. 全国乡建运动联合之系统；
3. 全国合作社组织之系统；

无论言调查，言计划（尤其在计划上斟酌于彼此供求需给关系之间），此三系统缺一不可。

（自二十一条至此，具详 489—553 页）

三十、以上三系统：

第三系统须由第一第二两面力量产生之；

第二系统方在萌芽苗长，其培养发展有赖于第一系统；

第一系统现粗具规模，而根基未固，关系之间亦欠调整，尤其下层不健全，不充实；欲求其根基稳固，关系调整，以至下层健全充实，则又非有赖于第二系统不可。

三十一、所谓第一系统非得第二系统不能稳固其根基者，即指政治问题要靠乡建运动为解决。大抵政府所以强固有力，全在能担负其当时社会所切需于它的一种使命。中国今日社会所

切需于政府者，一为御侮，一为完成社会改造，而其根本皆在经济建设一樁事。此“国防的”与“完成社会改造的”两要旨，绝不冲突，而且在事实上十分一致。乡建运动之中心要求，即在此种之经济建设。此要求实为社会多数人之要求，政府措施无方针，或有违于此要求，则无望其强固；政府而果能担负此使命，则其强固有力又不待卜。况乡建运动又将本此要求提供明朗具体的方针计划在社会上凝合一大势力以为政府后盾。

三十二、乡建运动欲完成其解决政治问题之使命，必须把握一个要点：即守定在野的营垒，而不自操政权（前所谓途径两样指此）（460—489页）。

三十三、何以不可自操政权？此即为没有反对党的原故。必有反对党，乃逼出其自操政权的必要。同时其自身自成一党，亦始有自操政权的可能（439—443页）。而所以没有反对党：

一则为中国社会散漫流动，阶级分化不著，乃至职业的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亦每为家族的或地方乡土的关系所掩（446—460页）；

二则为中国革命，其问题不在内，故空间两势力之对抗不著；而以问题在外，外界形势一时一时有异，潮流一时一时不同，则所以反应之者，转从时间上前后分殊，变化甚大；故中国的党派，空间上的分别不大，而时间上的分别大（582页）。

三十四、乡村建设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亦外界问题演变至今应有之反应，将以完成过去维新运动、革命运动所未了之任务，初非在民族社会内划然自有其立场之一党派。——中国原不能产生西洋式的政党或革命党。

西洋式的党团，实原于其社会有许多不同的分野，各从其一定之背景，而有其一定之立场，彼此分离对立，虽秉政在朝，

仍自有其社会基础而未尝或离。在中国不然。此以囿囿整个民族为背景的运动，不能外于大社会而自有其立场，其立场即不分明；当其在野，固与大社会气脉相通而保持一致，一旦秉政在朝，便与社会宛若有对立之势，而失其根基。故唯有守定在野营垒，始能领导社会，而保持此大社会于统一的立场上（460—488页）。

三十五、当此大社会有其明著而统一、统一而明著的立场时，国家于是统一。中国国家的统一，当于其社会的统一求之；此必须深识不忘者（460—466页）。

三十六、乡建运动即中国社会统一运动。乡建运动联合系统之树立，可使中国社会联系为一体，而有其社会意志可见。此分四层说明：

1. 中国社会大部为乡村，乡建运动组织乡村，更求各地乡村之联系。

2. 农民与知识分子为此大社会最重要之构成员，而乡建运动即把握此两要点而粘合之（451—460页）。

3. 乡建运动天然必为二重组织（非单一团体而为团体之联合），最能容纳全国知识分子，消除其不同之意见，而统一其趋向（475—476页）。

4. 全国各方面各职业各阶层间之矛盾本不深刻，乡建运动更能把握其在目前比较相同之一要求而联系之，并进而调整其关系，消弭其矛盾（477—480页）。

综合言之，中国大社会意志唯借此得以形成，其道全在抓住多数人亲切实际的痛痒要求，而宣发条达之，贯串统一之。

三十七、二三十年来之地方割据，实原于武力之不能统于一（218—219页）。

武力本是工具，例必以一阶级势力或一集团势力为之主，但此为中国素所缺乏，在今日亦造不成（462—466页）。中国社会将从阶级之缺乏径直渡达于无阶级的社会，乡建运动即担负此过渡工作者。当其联系此大社会为一体之时，则武力于此隐然有主，更不得分。军阀于是消灭，国权由此树立（463—488页）。

三十八、大局统一，国权树立，经济建设乃可施行。经济建设之施行，国权更以强固。经济与政治，政治与经济，相因相待有如连环：

1. 在社会一面对于经济建设的要求明朗有力，则政治问题可得相当解决，而国权树立；

2. 国权树立，对外可以应付，对内可以统筹，经济建设乃得施行；

3. 经济建设之施行，国权更以强固；

4. 国权强固，经济建设更得畅遂施行。

三十九、中国政治问题之解决，当分两步。以上所言国权树立，为第一步之相当解决。必待在经济建设前进程中，经济生活渐趋社会化；而政治的民主化随之，最后一民主主义之新政治制度确立于中国，乃为完全解决。是谓第二步。

四十、吾人尝云：“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的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生产分配并时解决，指中国必从合作以发达生产而言。政治经济并时解决，即指以上所说。所谓并时解决，非解决于一朝，乃言其辗转循环不可分先后（419—420页）。

四十一、国权树立而后，经济建设虽可施行，但其施行不可徒恃行政力量，更须赖教育功夫。此其故有二：

1. 当进行经济建设时不能徒着眼经济，更须着眼于经济以外之一切；此一切莫不与经济相联，必须联带配合进行。故经济建设时即为求社会整个进步，开出一新文化之时，非运用教育功夫不能完成（523—524页）。

2. 此合作主义的经济，以人为主体，其道在组织。从民众的启发领导，迄于社会的组织健全，胥必于教育是赖（471—472页）。

四十二、中国问题为自外引发之文化改造，故历来之维新革命以迄今日之乡村建设，莫不自知识分子发动之（450—456页）。乡村建设即是一知识分子领导民众完成文化改造之运动，其内容主要为经济建设，其工夫则彻始彻终全在教育。故乡村建设必自教育改造始（472—475页）。

四十三、教育改造之根本意义在以教育完成社会改造。现行学制必须废除，而建立一担负社会改造工作之新教育系统，其要点如次：

1. 其教育不在绵续既成文化，使少数未成熟的个人（儿童及少年等）能适于其社会环境；而在创造新文化，使社会环境改从吾人之所求。

2. 其教育所施不重在社会未成熟分子，而着重一般成人。

3. 其教育当就其人所在环境（现实社会）行之，而不宜设为特殊环境如今之学校者。

4. 其教育设施包涵社会生活之基本教育，各项人材之培养训练，学术问题之研究实验等一切而言；其间得随宜运用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各种方式，而无分所谓社会教育、学校教育。

5. 其教育设施应厘定其教育对象之区域；以社会区域之大

小统属，别其等级，著为系统，各负其区域内之教育责任。今假定即以现行国家行政区域地方自治区域为教育设施之区域，则应有国学、省学、县学、乡学、村学之五级。

6. 各级学府应负其学区内之一切教育责任，但下级学府力所不能办者，其责任归属于上级。由此各级设施任务各有其偏重不同之点，例村学只能侧重基本教育，而人材训练必归属于县学、省学；县学只能侧重某种程度之人材训练，而更高人材训练及学术研究必归属于省学、国学。

7. 上级学府应辅导下级之进行，下级学府应受上级之指导，各级学府间于上有系属，于下有责成，期于有统制有计划的进行。

8. 村学资藉于上级学府之辅导，视其力之所及又事之所宜，进行下列工作：

甲、酌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等施以其生活必需之教育，则于本村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现代社会，并从而改进现代社会之生活能力。

乙、相机倡导本村所需要之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如禁缠足、戒早婚等），兴办本村所需要之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如合作社、造林、修路等），期于一村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增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

村学以上均仿此，各分为对社会分子（个人）之教育及对社会之教育两项工作。除村学乡学直接作社会活动外，其县学以上之学府则负责研究问题、供给方法，居于间接辅导地位。

9. 乡学应兼为县政府之佐治机关，负下级行政之责；村学当期其与当地地方自治组织融合为一体而不分。

10. 在行政系统内之技术人员、技术机关应与教育系统内

之各专门学科合并或沟通，例如省学农科负责研究本省农业上之一切问题，而供给其设计方法，指导下级学府以推广于社会；所有农业改良研究推广皆可纳入各级学府工作中，即无另置机关之必要。

四十四、前条各点，意在：

1. 教育系统与行政系统沟通合作，以行政力量辅翼教育，以教育功夫推行政令。

2. 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互相沟通。上级学府（省学、国学侧重学术研究）经下级学府（村学乡学）从社会上实地调查得到问题及相关材料，而从事研究实验；还以研究实验之所得，指导下级工作之进行，或经下级学府以推广于社会。社会教育之内容得以充实，学术亦得发挥其效用。如是，下级不断以问题刺激上级之研究而学术进步，上级不断以方法供给下级以施教而社会进步。上下往复相通，而学术与社会乃相借而并进。

四十五、此即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所谓乡村建设固无外于教育工作。然乡建运动仍必自有其组织系统，独立于教育系统之外。此以：

1. 乡建运动团体先于此教育系统而存在；

2. 教育工作者尤其服务于乡村者，诚为乡建运动之大量的主要分子，然乡建运动分子不限于此，更须得各方面、各职业人士之参加；

3. 教育工作者尤其服务于乡村者，得从社会运动方式自由地组织起来，互相策勉，其负使命，于工作当有亲切自发意味，由各地小组织进而树立全国大联合之系统，便俨然为推动全国建设之一大动力。

不然者，使乡建运动而遽化作国家的以至地方的教育和行



政而止，必致丧其活力，失其指针，将不复能完成其创造中国新文化之使命。（333—345页）

四十六、吾人将以全国乡建运动联合的中枢组织为知觉和用思想的机关，而以政府为行政机关。但不必从法律上取得此种地位，而要在事实上能代表大社会的痛痒，同时集中人才以学术头脑规划前途，为政府施政之指南（518—519页）。

四十七、新教育制度既立，社会将如飞进步，新政治制度、新经济制度随以开展而确立。一新社会（或新文化）于是出现（556页）。

四十八、此新社会对中国旧日社会言之，可谓转消极为积极；盖新社会已融取近代西洋两大长处而发挥之（556—557页）：

1. 科学技术；
2. 团体组织。

四十九、中国融取西洋近代两大长处，但所成就则殊不同于近代西洋社会，此盖以科学技术之发达的途径不同：

1. 西洋过去以竞争营利而刺激技术之进步；技术发明，个人擅其利；
2. 中国将必以技术随团体组织以俱进，则技术前进，社会享其福。

其根本分歧，全在一则从商业发达工业，一从农业引发工业也。

五十、此新社会与西洋近代社会之不同，可谓之转偏敬为正常；何谓正常？此有六点可言：

1. 农业工业相结合，而非相分离，二者为自然均衡地发展而无敬轻敬重。

2. 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不相乖离而相调和。

3. 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的，而非物支配人的。

4. 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之两极端。

5. 政教合一，政治经济合一；综合言之，是三者合一。

6. 社会、秩序出于理性而非由武力统治；是“无阶级的社会”，而非“阶级的社会”。

中国革命于是完成；而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所引起中国历史从来未有之剧变，至是乃得其结局。

《乡村建设理提纲》（初编），

1937年10月，乡村书店。